

第一部分

3

拉丁美洲的 殖民时代遗产



《宏伟的城市特诺奇蒂特兰》(局部),1945年,迭戈·里维拉(Diego Rivera)绘。国家宫,墨西哥城,墨西哥。(© Banco de Mexico Trust, Schalkwijk/Art Resource, NY)。

对大多数北美洲人来说,或许殖民地的过往遥远且风景如画,它和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几乎没有关系。但是,拉丁美洲的情形迥然不同。历史学家伍德罗·博拉(Woodrow Borah)说:“即便那些到拉丁美洲随意观光的人,也被那些遗留下来的显著殖民制度和特征所震惊。”殖民遗留物的名单中包括许多日常生活的一些约定和做法、土地使用和劳动制度以及众多社会关系和态度。

拉丁美洲这个舞台的特点是殖民和现代元素的共生和混合:挖掘棒、脚犁和手摇纺织机与拖拉机、输送带和电脑共存。在拉丁美洲,殖民的过去并非令人怀念,而是令人不舒服的现实。它意味着经济倒退、政治专横、腐败和裙带关系;阶层分明的社会秩序以及精英的高傲和对平民的蔑视态度。

我们对拉丁美洲殖民时期的历史考察从对古代美洲的一些说明开始。在古代美洲这个名称所指的那一段很长的时期,美洲土著发展出了事实上独立于旧世界的自身文化。这一过去深刻地影响了殖民时代的特征。西班牙帝国在美洲的主要中心出现在老的土著腹地——墨西哥人和秘鲁人的地区绝非偶然,那里是数百万勤勉的土著人的家乡,他们已经习惯了对他们的统治阶层奉献自己的劳动。西班牙人非常清

楚,这些土著是真正的东印度财富。土著人口少的地区在西班牙人的殖民计划中微不足道。

同样,殖民时期的决定性特征是西班牙背景。征服者是与穆斯林斗争了七个世纪的西班牙人,战争几乎已经成为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通过战争也创造出了庞大的蔑视体力劳动的贵族(hidalgo)阶层。从某种意义上,如同西班牙编史者弗朗西斯科·洛佩斯·戈马拉(Francisco López de Gómara)所说的那样:“对印第安人的征服是在结束对摩尔人^①的征服后,西班牙人也许总是用战争反对异教徒。”西班牙经济落后且财富普遍不平均,这严重地限制了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或者说甚至限制了让大多数西班牙人过一种体面的生活;这也有助于解释西班牙征服者不顾一切的勇气以及他们在与印第安人打交道过程中的冷酷无情。有一点似乎也很重要,殖民者中的许多大首领,如科尔特斯(Cortés)、皮萨罗(Pizarro)、瓦尔迪维亚(Valdivia)和巴尔博亚(Balboa)都来自西班牙最穷的省——埃斯特雷马杜拉(Estremadura)贫瘠的土地上。

另一个也许能有助于解释征服者凶残掠夺这一特征的因素,即当代仍存在于西班牙的暴力风气,这显然是再征服及其社会状况和价值观的遗产。巴托洛梅·巴纳萨尔(Bartolomé Bennassar)在他的《西班牙人的性格:从16至19世纪的处世态度和心智状况》(*Spanish character: Attitudes and Mentalities from the Sixteenth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一书中提到,为了得到沾满鲜血的报酬——通常只是一小笔钱,而向谋杀社会地位卑微阶层的个人颁发特赦令,这一古老的赦免做法却使得暗杀行为激增。但承认这种制造暴力氛围的历史背景并不是说这应归因于西班牙人的残忍和暴虐。众所周知,殖民的、帝国主义的和国内的战争无论哪一种都充满着暴行和恐怖事件。实际

^① 摩尔人:非洲西北部阿拉伯人与柏柏尔人的混血后裔,公元8世纪成为伊斯兰教徒,侵略并统治西班牙,直到15世纪晚期才在安达卢西亚建立文明社会,现在主要居住于非洲西北部。——译者注

上,在那些历史上的殖民政权中,西班牙的独特之处在于,它造就了一小批人,在面对世界时谴责了他们自己国家人的罪行,并且尽其所能去阻止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Bartolomé De Las Casas)所谓的“东印度的毁灭”。

5

自16世纪始,西班牙殖民档案的捍卫者已经用偏见和夸大其词指控拉斯·卡萨斯和其他原告,声称他们捏造了西班牙人残忍和暴虐的“黑色传奇”。事实上,每一种殖民力量都有自己的黑色传奇,那并不是传奇而是悲惨的现实。与西班牙征服的残暴相匹配的是种族灭绝的“印第安战争”,它是由美国的民族英雄如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将军和总统掀起的,他指挥销毁了大约800名克里克人的尸体,割掉鼻子计数并保存了死亡记录。菲律宾人在1899至1902年间由反抗美国的殖民主义而被屠杀镇压,他们以“水刑”逼供,并把市民囚禁在集中营。富兰克林·贝尔(J. Franklin Bell)将军参加了那次镇压,据估计,仅吕宋岛就有60万人被屠杀或死于因战争引起的疾病。

西班牙人在土著社会的废墟上建立了新的殖民秩序。这一秩序有三个重要方面需要强调。第一,其经济结构、社会组织和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封建特征占主导地位。这一封建特征异常清晰地表达在西班牙人的“印第安人”政策中,政策规定印第安人世袭的奴隶阶层地位,他们必须以商品、现金和劳役交纳贡赋,还要和他们的欧洲主人从事不平等贸易。同样的封建原则也以独立的合法状态分配给欧洲人、卡斯达人(Castas,混血人种)和黑人,以规范每一类别人种的行为和生活方式。这些封建特征和一些资本主义要素混合在一起,形成了西班牙(以及葡萄牙)留给独立后的拉美的遗产,它们也可以解释今天在这些地区一些过时的制度仍然顽固存在的原因。

第二,殖民经济对外依赖于贵金属以及这些产品如糖、可可、烟草以及兽皮的出口,并逐渐融入17和18世纪在北欧兴起的新资本主义秩序。西班牙在经济上逐渐提高了对北方资本主义的依存度,却无力阻止殖民财富和商品通过偷运、劫掠以及外国人接管西班牙商人房产的方式流向其竞争对手。在加入欧洲资本主义体制的过程中,封建殖

民经济也具有了一些资本主义特征。因此,与欧洲的父权制相比较,奴隶制在加勒比海殖民地具有尤其残忍的特点,把“文明的过度工作的恐怖”,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嫁接到了奴隶制的野蛮的恐怖上”。

第三,西班牙的殖民秩序植根于王权与征服者及其后代间的冲突之中。王权害怕殖民地领主阶级的崛起,因此试图控制殖民者的野心;另一方面,王权在安全上又要依赖殖民者对付内外威胁,这使得王权要对他们作出重大让步。与这一背景相对照,为了控制土著劳动力和贡赋,西班牙王权和征服者及其后代之间发生着持续的斗争,有时是公开的,有时是非公开的。在这一斗争中,殖民者逐渐占了上风。

西班牙 17 世纪的衰落是因为权力平衡朝着有利于殖民者进行转移。拥有大量土地和劳力的世袭殖民贵族的出现代表了王权的失败和王权对土著群体利益作微弱维护的失败。当 18 世纪后期西班牙国王试图加强对殖民地的控制,从高级官员职位上排除克里奥尔人(creoles,美洲出生的西班牙人),并进行有时会冲击克里奥尔人既得利益的制度改革时,已为时太晚。这些政策只是疏远了强势的殖民者精英,那些人已经开始感觉到国家的曙光并梦想着和外部世界进行自由贸易的益处。

第一章 古代美洲

焦点问题：

- 古代美洲不同地区的环境如何影响文化发展？
- 形成时期、古典时期和后古典时期的显著特征是什么？
- 玛雅社会如何组织？它在约公元 900 年崩溃的原因是什么？
- 阿兹特克社会如何组织？阿兹特克的统治者如何治理其帝国？
- 印加社会如何组织？印加帝国与阿兹特克帝国相比如何？
- 什么是“性别平行”，古代美洲妇女的角色与欧洲妇女的角色相比如何？

在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时，占据美洲的是众多的印第安部落，他们说着不同的语言，拥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对他们欧洲征服前和征服后的历史经验做仔细的考察，可以对洞察其内部和外部力量在塑造人的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提供有趣的见解，这已被拉丁美洲当代土著权力活动家迅速地获悉。因为在欧洲人发现新世界以前至少 1 万年的时间中，它事实上和旧世界是完全隔绝的。美洲和亚洲之间零星的和断续的接触毫无疑问存在，一些文化特质，主要是装饰风格的交流很可能发生。然而，土著美洲人的文化发展主要反映在各个土著部落之间的关系，他们常常彼此冲突的关系，以及他们和物质环境的相互作用。

古代美洲的环境和文化

数千年的与世隔绝已经使美洲成为一个独一无二的社会实验室。在那里,土著部落发展出他们自己的命运,他们采取各种不同的方式适应独特的社会环境。到 1492 年,这个过程产生的结果表明,早期人类文化演进的模式基本上全世界相似。发现土著部落的第一批欧洲人和部分旧世界的人经历过文化发展的相同阶段:旧石器时代捕猎者和食物采集者时期,新石器时代的耕种者,以及和青铜器时代的埃及、美索不达米亚一样复杂的帝国时期。

古代美洲的居民是几种亚洲体格类型的混合,并且具有与现代印第安人同样的体格特征:黑眼睛、直或卷曲的黑头发,以及黄或红铜色的皮肤。他们的远古祖先可能是移民浪潮中穿过白令海峡的亚洲人,这一移民浪潮很可能早在 4 万年前就开始了,且一直持续到大约公元前 1 万年。然而,围绕着美洲第一批人居住的可能时期有许多争论。一些考古学家认为,没有充分的证据驳斥传统的观点,这种传统的观点是基于遍布北美洲和南美洲的所谓的“福尔松石弹点”(Folsom stone projectile points)的发现,那些居住点是在大约 12 000 年前开始的。修正者指出,那些发现,尤其是在智利和巴西的发现,表明更早的人的居住。最近,支持这种有更早居住的论证已经通过语言学证据得到了加强,语言学的证据解释说,古代美洲许多语言的形成需要巨大的时间跨度。

两股移民浪潮似乎已经发生。第一股移民浪潮产生了主要是以采集野果、捕鱼和捕获小猎物为生的原始部落。最近的考古发现表明,这些原始捕猎者和采集者大约在 22 000 年前经过了秘鲁。第二股移民的进入产生了捕获大猎物的猎人,如同他们的祖先一样散布在整个美洲大陆。到公元前 9000 年,这些亚裔进入者或他们的后代已经到达了美洲大陆最南端的巴塔哥尼亚。

美洲的第一次殖民发生在重大的地理纪元的后期,即被称为更新世(Pleistocene)——巨大的气候变化期的后期。在冰川纪时期,冰毯

覆盖着旧世界和新世界的广袤地区,当温度上升到大约今天的水平时,冰毯在不同时期开始交替融化。即使在无冰地区,冰河世纪的降水也大大提高,这促使了牧草和林地的繁茂生长,因而有助于各种捕猎活动。因此,这个时期美洲的大部分地区都是狩猎者的乐园。在平原和森林中,许多巨大的史前动物在漫步。整个美洲在靠近这些动物遗体的附近,都发现了史前狩猎者的石弹点。

大约在公元前 9000 年,最后一次冰川作用的消退(威斯康星冰川)之后出现巨大的气候变化,对印第安人的狩猎经济造成了威胁。更温暖、更干旱的气候占据了广大地区。草地减少,生长在那里的大型动物逐渐灭绝。更新世后期狩猎技术的提高也加速了这些动物的消失。狩猎者现在必须或者适应变化的环境,或者随着那些维系他们生存的动物的消失而消失。

美国西南、墨西哥北部和其他地区都发现了成功适应新环境的考古证据。印第安人的食物逐渐转向更小的动物,如鹿和长耳大野兔以及可食的野生植物,尤其是种子,这些都可以做出美味的饭菜。这种新方法最终导致了农业的发展。起初,农业仅仅是对更早的狩猎活动和采集食物的补充;对农业的使用也几乎构不成“农业革命”。这种从食物采集到食物生产的转换更可能是逐渐累积了越来越多的农作物,并逐渐代替了野生可食植物。经过了漫长的时期,之前投入到捕猎和采集植物的时间和精力都逐渐转向农业活动,如清洗、种植、除草、园中种植、采摘、收获和食物加工上。但从长远来看,农业在旧世界和在新世界一样,已经有了革命性的后果:人们开始过更有规律、更稳定的生活。食物充足、人口增长也使劳动分工成为可能。

在墨西哥高地的洞穴中,考古学家发现野生植物逐渐被培育,其中比较重要的是南瓜、豆子和玉米。这些植物的家庭培育可能发生在公元前 7000 至前 2300 年之间。在这些成就中,最重要的就是玉米的培育,它成为古代美洲文化最重要的中流砥柱。在公元前 5000 至前 1000 年之间,木薯(一种在森林中耕种作为主食的淀粉类根茎)和土豆(在秘鲁)被补充到重要的培育植物名单中。

植物从产地或原产地迅速遍及整个美洲大陆。到 1492 年,从今天美国边界的北端到智利都在耕种玉米。但并非所有勤劳的人们都把农业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一些人,例如居住在南美洲最南端火地岛荒芜废墟上的人,就不得不由于恶劣的气候条件或者捕猎或者采集食物或者挨饿。其他人,如在太平洋西北海岸的人就可以过上富裕、稳定的生活,水中鱼多、林中兽足,他们没有理由放弃他们的好生活而转向农业。

在那些农业成为主要的经济活动的地方,农业产量依赖于这些自然因素:土壤的肥沃、气候以及农业技术的运用。森林地区的人们通常运用火耕方法耕作。人们砍伐并焚烧树木和灌木,在清除后的地里用挖土棒种植玉米和其他主食。由于这种方法不久就会耗尽地力,因此人们就让这块土地休耕而转向清除一块新的土地。当这个过程足够长的时候,整个村庄就要迁移到新的地方或者采用分散定居的方式,以使每个家庭都有充足的可用土地。因此,火耕农业结构上的弱点通常会严重地限制使用此种方式耕种的人群的文化发展。一种强大的、支配性的强权能够至少暂时地克服这种方法的缺陷,玛雅的成功表明了这一点:他们灿烂的文明崛起在热带森林的环境中,而且是基于由强大的祭祀者指导的火耕农业,但是现在大量的证据已经表明,从一开始起,这一耕种方式就以更精细的农业方法为补充。

在崎岖的中美洲高地、安第斯高原和秘鲁沙漠的沿海地区,发展出了一种产量更高的农业。这些干旱或者半干旱的国家,拥有温和的气候、天然肥沃的土壤,土地易于灌溉,而且利用挖土棒方法耕种,使得其肥力保持得更长久。最重要的是,作物产量可以随着灌溉的便利而提高,这导致了人口增加和劳动分工更加细化。灌溉工程对合作和调节的需求较高,这有利于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崛起和他们的权力向更广泛地区的扩张。阿兹特克帝国和印加帝国就是在这种自然环境下崛起的。

最终,居住在美洲大陆上的巨大人群在西班牙征服前可以根据他们的生存基础和社会组织的复杂性分成三个级别或范畴:部落、酋邦和城邦。这些范畴对应于文化演进的一个阶段。最简单或最原始的,

群体和部落成员,通常与艰苦的环境关联(茂密的森林、旷野或者非常潮湿、干旱、寒冷的地区),严重地限制了其生产力。提倡平等主义的群体,其特征是依靠打猎、捕鱼和采集;与农业相交替;或者把这些活动集合起来。打猎和采集群体的特征是根据季节可以得到的猎物和可食用植物而形成的模式,在某一特定区域游牧、迁移。那些以打猎、捕鱼和采集为生的农耕农业群体是半稳定的。那些生存的自然基础并不稳定,因此群体或部落的人口密度低,而且阻碍了劳动分工的发展。个体成员的社会单位是自然形成的群体或村庄,群体成员和村民之间没有联系,以血缘、友谊或认可的关系形成部落。社会分层不明确;群体成员,或者至少可以得到猎区、渔区和土地。村庄和部落的首领或酋长通过战争中的勇敢表现或其他突出的能力赢得权威。他们对权力行使也仅仅限于狩猎期、军事操练或其他公共活动。

这些类型又在社会在亚马孙盆地的许多巴西部落中很典型。他们中间一个经常出现的特征是为了获取俘虏,而在部落之间持续发生的战争。在武士被杀几周或几个月后,这些人就按照仪式被处决,他们的尸体被部落成员烹而食之,以获取精神力量并保持部落领地的永恒。16世纪时,法国哲学家米歇尔·德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在游记中提到了他们的习俗,并把遇到的一些巴西印第安人带到法国。他们的极度贫困与欧洲司空见惯的巨大财富形成鲜明对比,便使得这位哲学家对他们的民主精神和自由产生了强烈的触动。他用这些印象画了幅影响深远的贵族原始人的文字肖像,无知的食人者代表了免于文明之恶的完美道德类型。

酋邦,第二种所有的社会组织范畴,代表了中级水平。酋邦最通常的生存基础是密集农业,这种农业支持高密度人口在村庄居住。这些村民已经失去了自治权,他们由一个精英核心统治,这个核心是由最高酋长和支持他的次一级酋长们构成的统治阶层。在酋邦的社会组织中,等级是重要的因素,而且限定在血缘关系中,个体等级是根据他们和最高酋长在谱系上的亲疏,那些关系近的个体常常担任神圣的角色,并且出行时由大批长官和佣人随从。最高酋长通过支付必要的贡品和

强迫捐献获取剩余产品。剩余产品中的一部分都用来有选择性地重新分配给长官、侍从和战士,以提高他自己的权力。酋邦之间的战争非常普遍,而且合并附近的村庄很可能在他们的膨胀和扩张中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战争使得那些被俘的人成为为胜利者劳动的奴隶,这也对最初社会分层的增长做出了贡献。

在西班牙征服前夕,古代美洲存在着许多多酋邦,绝大部分分布在环加勒比海地区(包括巴拿马、哥斯达黎加、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以及伊斯帕尼奥拉岛、波多黎各、牙买加和古巴)。仅仅在哥伦比亚的考卡山谷(the Cauca Valley)就有不少于 80 个酋邦。

复杂的人口众多的奇布查人(Chibcha)部落和穆斯卡人(Muisca)部落位于哥伦比亚东部高地,也许可以用他们来描述这个级别的社会和政治的融合。他们赖以生存的基础是密集农业和捕鱼,打猎是重要的补充活动。农业技术很可能已经包括了梯田、有垫高的种植床(在湿润的盆地种植以控制水分),以及火耕方法。除了玉米,这些酋邦也种植土豆、藜麦(一种类似荞麦的耐寒植物),以及大量其他植物。手工业,如陶器、编织和冶金高度发展。对他们最重要的冶金术在古代美洲的手工业中位居前列。

在西班牙征服时,穆斯卡人的大部分地区由两个相匹敌的酋邦统治,它们分别集中在波哥大和通哈(Tunja)。这个地区的人口估计约 150 万。穆斯卡人生活的大村庄有几百到数千人。每个村庄都是由木杆和茅草的房屋构成,且周围环绕着木栅栏。社会被分成平民和精英,不同部分的成员都分担不同的权利和义务。平民要上交贡品贡献劳动以支持酋长和贵族们,这些人控制着剩余产品的分配和消费。

酋邦标志着向下一阶段或最高阶段的组织转换,这一阶段有时也称为文明,或者更简单地称为社会和政治融合的城邦层级。这两个阶段之间的分界线,特别在比较大比较复杂的酋邦中是难以划分的,因为城邦反映了已经存在于酋邦中的趋势的扩展和深化。这些都表明存在劳动分工的增长和细化,即不再从事农业的手工业者群体的形成,负责宗教和智力活动的神职人员的增长,以及明显的武士

阶层和被委托从事城邦行政管理的官僚阶层的增加。这些变化都伴随着额外的社会阶层和相应的观念体系的变化。在平民变得更弱势并被分化时，一种关系在事实上或者在理论上已经把最高酋长和精英联结在一起。酋长阶层结构的出现，是统治阶层宣称他们和为他们工作的平民出身不同。位于神职——国王或者皇帝位子上的城邦首领有时被赋予了神圣性。

城邦层级组织需要生产力高的技术基础，通常在密集农业中已早使用灌溉工程和其他高级技术。城邦的规模和人口也不同于酋邦，存在不同地区商品交换的增加，有时还伴随着职业商人阶层的出现。真正的城市出现了。除了人口、管理和产业中心，这些城市还常常有公共性建筑、祭祀中心，而这在西邦中并没有发现，阿兹特克、玛雅和印加社会就是社会组织城邦层级最知名的例子。

11

在五代美洲，从酋邦到城邦发生质的飞跃的决定性因素是什么？有些人把战争导致的暴力征服作为这个过程首要的推动要素；另一些人则认为，城邦出现的首要因素是它作为一个强制机器从经济上解决了不同等级之间的内部纷争；还有一些人强调宗教观念形态对推动精英集中控制人，及其资源方面的重要性。所有这些因素都展示了城邦形成过程中的一个方面。

可以肯定的是，如上面所提到的，对于早期城邦，特别是其最高形式——帝国的形成而言，特定的环境条件比其他因素更有利。实际上，我们对此有更多疑问，即这样的城邦能够出现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下，如北美洲的绿色平原，它坚硬的草地令挖土棒无计可施；或者亚马孙的热带雨林，人们通常认为不适合耕种，除了那些短暂的火耕清理区。^① 学者们常常把城邦和帝国的崛起与必要的环境条件联系起来的有利于地区称为核心美洲。

① 考古学家最近已经发现的证据表明，沿着亚马孙河岸的不同地点的复杂社会都有精细陶器、有土壁的房屋和大量酋长的雕像。但是这些古代亚马孙社会似乎没有一个表现出已经发展到超越酋邦的级别，且他们的起源和人口数量仍有疑

1492 年的人口

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的研究结果表明古代美洲以飞快的速度发展。学者们更容易留下印象的是古代美洲文明的复杂性，且经常是与古代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这种高度发达的古代世界文化相比较而言。关于古代美洲人口史的新研究也提升了对其文化成就的重视。如同我们在许多社会研究中那样，假定人口密度和某科技术及文化水平相关，那么就可以大胆地推测，1492 年的土著人口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判断其社会成就和在其毁灭基础上产生的殖民社会。

然而，就美洲征服前的人口问题已经产生了很多争论，甚至大范围的争论。第一批到达新世界的西班牙人记录的人口密度很低。根据一般估计，伊斯帕尼奥拉岛（现在的海地和多米尼加共和国）土著居民的数量是 200 万到 400 万。著名的传教士莫托里尼亚（Motolinia），1521 年到达墨西哥，他虽然没有提供具体的数字，但是说那里的居民多得像“田野里的草叶”。印加帝国和中美洲也有关于人口密度的早期报告。当我们在 20 世纪评价这些早期记录时，倾向于把它们分成两个部分。一方面而言，有些学者认为这些记录是可信的。20 世纪 20 年代美国考古学家斯宾德（H. J. Spinden）和德国考古学家卡尔·萨珀尔（Karl Sapper）在考虑了土著人的技术和资源后，提出了同样的数据，新世界的总人口是 4 000 万至 5 000 万。其他的人，如美国的考古学家克罗伯（A. L. Kroeber）和阿根廷学者安吉尔·罗森布拉特（Angel Rosenblat）则得出结论说，土著人的技术不能支持早期材料所列举的人口密度，西班牙人有意无意地夸大了他们发现的人口数量以增大他们自己作为征服者和传教者的功绩。克罗伯估计拉丁美洲的人口是 840 万；罗森布拉特提出的数字则是 1 338.5 万。

20 世纪 40 年代初，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三位教授：伍德罗·博拉（Woodrow Borah）、谢尔本·库克（Sherburne Cook）和莱斯利·辛普森（Lesley B. Simpson）提出了针对古代墨西哥的一系列引人注目的研究，打开了质疑古代美洲的人口统计学历史的新缺口。伯克利学院

研究运用了大量数据和精密的统计方法,表现为从已建立在西班牙为印第安人计数这一基础上的撤退,他们认为,墨西哥中部在征服前夕的人口数量是2500万。

同时,库克和亨特又把质疑扩展到其他领域。尤其令人瞩目的是他们对1492年伊斯帕尼奥拉岛人口数量的结论。以前对这个岛上人口数量的估计是16世纪西班牙修士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Bartolome De Las Casas)提出的,在低至60万至300、400万之间,但这一数据一直被看做是来自“黄色传奇”狂热者的夸大。库克和亨特在亨特收集了一系列数据和对于1492至1520年之间伊斯帕尼奥拉岛原住民人口的估计之后,他们不仅证实了拉斯·卡萨斯数据的真实性,而且还提出了700万至800万人口这一更大的数字。

到了1964年,库克和亨特提出,1492年美国的人口也许已经“超过1亿”,但库克和亨特没有试图估计整个大陆前哥伦布时期的人口数量,这一系列性的估算工作是由美国考古学家亨利·多宾(Henry Dobyns)完成的。亨利·多宾假定土著人口在接触到欧洲人后减少了90%,理由是他们对新的疾病没有获得免疫力,他猜测前征服时期的人口在9000万至1亿之间;他还把这一数字分配到墨西哥中部和秘鲁各3000万。

但库克和亨特的发现和方法已经激起了激烈的争论。对这些大数字的估计无疑受到持异议者中有两个人值得注意,他们是威廉·桑德斯(William T. Sanders)和大卫·赫尼格(David Henige)。然而,一般而言,过去半个世纪这个领域的研究结果都相当一致地指向较大的人口数量,而不是我们之前接受的那样。综合伯克利学院及其反对方的发现,并从中据实出发进行推论,这一成就归功于威廉·德内文(William T. Denevan),他估计人口总数是5730万,远远大于克罗伯1939年估计的840万。

学者们总是试图确立古代美洲长期的人口发展趋向。用伍德罗·博拉(Woodrow Borah)的话来说,学者们一般都同意在整体上“美洲的印第安人相对平静,除了自然灾害如洪水或干旱引起的谷物缺乏,他

们似乎享有特别健康的身体”。直到1492年，他们仍与世隔绝地保护他们免于疾病，如天花、麻疹、斑疹和伤寒这些在17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形成的疾病的集体发生。这种观点是有争议的，即使如此来看，即使他们不和欧洲人接触，也许这些疾病也已经发生了。在许多地区，土著人已经发展出把狩猎-采集和农耕农业联合起来的系统，其中玉米、豆子和南瓜三合一为基础，这是可持续的系统，而且对生态系统造成的破坏很小。西部印第安泰诺人(Taino)已经发展出了农业的精细形式，即发展出了以齐膝高的土堤为基础，称为conucos的永久耕地，他们在这里种植木薯、甘薯，各种各样的豆类 and 南瓜。这一方法延缓了对土地的侵蚀，而且“用最简单的方法和最少劳动给予了可持续性，以最高粮食回报”。几乎没有证据表明这些地区的食物生产存在任何人口压力。另一方面，人口统计学历史已经发现证据：西班牙入侵，迅速造成了威胁。博拉忧郁地观察到，“到15世纪末，虽然没有欧洲人的征服，墨西哥中部的印第安人已经注定要灭亡了”。现在的学者认为，在人口匮乏的地区，人口压力也许在美洲中部玛雅古典文明的崩溃中起了主要作用，这些证据包括慢性营养不良的迹象、婴儿死亡率高以及在1500年内人口从约1200万减少到剩余的约180万。与这次危机相关的是砍伐森林、水面消失、过度耕种、地力耗尽以及其他因素。

核心美洲

墨西哥和秘鲁是辽阔的文化发达地区的中心，包括墨西哥的中部和南部、中美洲以及南美洲的安第斯地区。这是古代美洲的核心地段，是第一次农业文明的家园。早期村庄生活的证据和基本的文明技术——农业、陶器、编织已经在这一区域的几乎每一个地方都有发现。

最近几十年来，这一地区是考古学发现的主要现场。在墨西哥山谷、南部及其墨西哥湾沿岸、玻利维亚高原以及秘鲁沿海沙漠的沙子中的发掘，已经开掘出了壮观神殿的遗迹、巨大的坟墓、大城市和市镇，以及陶器和手工精美的编织品。用铲子挖掘出来的证据和历史解释提供的证据结合在一起，专家们已尝试重建核心美洲的历史。这一努力的

• 制度工作是数个连续的阶段,这些阶段以技术、社会和政治组织、宗教以及特定时期艺术为基础。专家们对这些连续的阶段通常给予的划分是古代阶段、形成或前古典阶段、古典阶段以及后古典阶段。这一划分在细节上是模糊的,在不同的阶段之间有很多时间上的重叠,而且从一个地区到另一地区,一些时期的延续有相当大的变化。

古代阶段开始于大约 9 000 年前,当从采集食物和狩猎逐渐向农业转变的时候,在核心美洲的许多地方开始了这一阶段。然而,这种初始农业在这些社会中没有引起革命性的变化。大约过了数千年,人们仍然生活在与以前基本相同的原始方式中。社会群体小而且可能没有文字,纺织尚未为人所知,但在这一时期即将结束的时候,一些地区出现了简单的陶器。

在公元前 2 000 至前 1500 年之间,在核心美洲的许多地区,主要的文化发展开始进入形成或前古典时期。几个世纪偶然的植物实验导致了人们开始培育各种改良的、高产类型的植物。这些进步从根本上产生了基于农业和村庄生活的稳定经济。玉米黍和其他重要的培育作物都在细心的耕作中产生;灌溉在一些地区开始应用;一些动物被驯养。到这个时期末期,陶器和纺织高度发达。粮食产量的增加使村民开始对神职人员提供支持,这些神职人员在人和神之间进行居间调停。为充裕的粮食也释放出劳动力转向仪式场所的建造——一些地面被由木头、棕榈或茅草建造的神殿所覆盖。

形成时期的社会单位是村庄共同体,由一个或更多血缘关系的群体组成,但到这个时期末,发展出了由几个村庄组成的小酋邦。由于耕地和食物相对充足,人口数量少,战争肯定还比较罕见。宗教集中在对子孙和生殖神的崇拜上;人祭可能不存在或很少。

形成时期发展的高峰便是古典时期,这个时期的开始也是基督时代的开始,一直持续到大约公元 1000 年。古典这个术语指的是这个阶段标志性的物质、智力和手工业文化的繁荣。在技术上没有根本性的变化发生,但是一些地区灌溉工程的扩展导致了粮食产量的提高和剩余人力转向建筑和技术工作。人口也增长了,而且在一些地区,出现了

真正的城市。建筑、制陶和编织技术达到了不错的水平。和秘鲁的冶金业一样,中美洲(墨西哥的中部和南部以及毗邻的中部美洲)的天文学、数学和文字也同样繁盛。较早的土丘让位于巨大的石制金字塔,以及装饰精致、气势雄伟的神殿。宫殿及周围其他公务建筑的建造,使每一个仪式中心成为城邦的行政首脑,由大祭司控制。社会阶层已经很充分,祭司者是主要的统治阶层。然而,在古典时期后期,战争的频率增加了(可能是由人口压力引起的,人们对耕地和水的竞争更激烈),这也使得得胜的勇士得到更多的认可和奖赏。宗教势力划分更细致的多神教,由更大的祭司阶层把持。

古典时期的典型文化是中美洲的特奥蒂瓦坎(Teotihuacan)文明、墨西哥西南的蒙特·阿尔万(Monte Albán)文化以及尤卡坦(Yucatán)南部和危地马拉北部的玛雅低地文化。墨西哥的低地奥尔梅克(Olmec)文明展现出了一些古典时期特点,但这一文明一段时间之后就衰落了,因此这些特点通常被认为是形成期。在秘鲁,这一时期最出色的代表是沿海沿线灿烂的莫奇卡(Mochica)和纳斯卡(Nazca)文明。有证据表明,古典阶段局限于中美洲、安第斯地区中部(高原地区、秘鲁及玻利维亚的沿海地区)地区以及巴拿马沿海地区。

古典时代在核心美洲的北部和南部都突然消失。公元1000年后不久,中美洲和秘鲁的大多数重要古典中心,在经历内战或外来入侵这些灾难之后被遗弃或摧毁。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些文明最后的出现是长期衰败的高潮。人口压力、土壤侵蚀以及农民叛乱都是由过度的上贡要求引起的,这也是人们提出的人的古典城邦和王国崩溃的原因之一。

这是一个麻烦不断的时代,到处充满了难解的争斗,人们四处迁徙。但伴随着这些灾难,一个新的文明却在旧的废墟上出现了。从大约公元1000至1500年,后古典阶段似乎被大量复制,只是以比前一个时代更复杂规模的兴衰模式进行着。数不清的要塞和设要塞的社区反映了长期战争的存在,而且越来越强调城市生活也成为这个阶段的突出特征。此外,帝国由一个强有力的城邦对其他许多城邦的征服而形

，一个城市用占用被征服人们一定数量的产品，其首要目的是为了统治阶级的利益。阿兹特克和印加帝国是这个时代的典型。

古典时期没有出现重要的技术发展，但一些地区，灌溉网得到扩展，战争在打猎和兵，商业在兴起，贵族和平民、富人和穷人在经济上分离，武士阶层代替了神职阶层成为主要的统治阶层。帝国思想影响了宗教体系，提高了战争神和人祭的重要性。艺术和手工艺术表现出从古典时代的倒退，在一些地区编织和陶器更倾向于标准化和大众化。

古典期权力斗争之后，和古典时期他们的先驱一样，各个帝国也衰落了。在古典期之后，秘鲁的蒂亚瓦纳科(Tiahuanaco)文明和印加帝国是美洲古典期成长和发展的两个循环，然而第一个真正的墨西哥帝国，阿兹特克帝国，是阿兹特克征服者，这一帝国直到西班牙人征服美洲才终结。

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中美洲的玛雅、墨西哥的阿兹特克以及秘鲁的印加，成为古典期之后美洲其他文明的注意中心。这一偏见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对这些人和他们的生活方式了解得更多。阿兹特克和印加文明在西班牙人到来的时候依然繁盛，一些征服者对他们所看到的做了详细的描述。征服墨西哥和秘鲁的那些丰富多彩的故事，以及两个帝国皇帝蒙特祖玛(Moctezuma)和阿塔瓦尔帕(Atahualpa)的悲惨命运，也成为历史和文学对阿兹特克人和印加人关注的焦点。不幸的是，这些被名声和魅力环绕着的人们使他们的先驱者——那些玛雅、阿兹特克和印加的文化奠基者的巨大成就变得模糊了。

早期美洲文明

早在公元前1000年，墨西哥谷地的居民生活在环绕着玉米、豆子和南瓜地的小村庄里。他们用砍伐和焚烧的方法耕种田地，制造出简单但制作良好的陶器，生产了大批象征生殖神信仰的小泥塑像。到旧世界开始基督时代时，小的、颈部平坦的土堆已经出现，表明已出现更形式化的宗教和有指导的祭祀。

更早时候(大约从公元前 1500 至前 1000 年),墨西哥湾低地出现了早熟的、超一般的奥尔梅克文明,它的影响辐射范围广泛,一直到墨西哥中部高原和美洲中部。奥尔梅克文明的起源、发展和消失至今都还是个谜。

奥尔梅克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它的仪式中心,如今既有头雕刻和雕塑、象形文字,同时很可能还包括历法系统。奥尔梅克文明的主要遗址在今天墨西哥维拉克鲁斯州(Veraacruz)的拉文塔(La Venta)和特雷斯·萨波特斯(Tres Zapotes)。奥尔梅克文明的发现及其艺术方式广泛辐射的证据使下面这一古老的观点站不住脚,即玛雅文明在中美洲位列第一。似乎奥尔梅克文明才是中美洲文明的鼻祖。

形成时期高度发达的技术、手工业和科学都使古典时期的文化成就达到了最高峰。古典时期的墨西哥中部高地文明(玛雅)大约在基督开始的时代,距墨西哥城大约 28 英里的特奥蒂瓦坎很可能已经建造了以太阳和月亮命名的金字塔,耸立在一群醒目的庙宇和其他建筑物

15



特奥蒂瓦坎最大的城邦仪式中心,死亡大道连接着“城堡”——皇家宫殿住宅群和太阳、月亮金字塔。据估计,人口在 12.5 万至 20 万之间。在公元 600 年,它是世界第六大城市。【科比斯·理查德·库克(Corbis Richard A. Cooke)】

用来装饰房子的石像、雕刻作品及其磨光技术优美得令人叹为观止,加上神庙都是特奥蒂瓦坎艺术高度发展的证明。古代水神,后期玛雅特克人利其为特拉洛克(Tlaloc),似乎已经是特奥蒂瓦坎主神之一。但是,有美洲虎的尖牙以及羽毛的蛇,后期他们称其为羽蛇神(Quetzalcóatl),也同样主管水和生殖,而且显著地出现在最大的庙宇中。相对前一些阶段,战争和人祭就没有了。祭司以和善的姿态出现在他们侍候的衣服在壁画中占据主要地位。

这个重要的仪式中心在特奥蒂瓦坎是神圣之地,而且很可能只居住于祭司贵族和他们的仆役。再进一步是官员、手工业者和商人的居住区。据推算,特奥蒂瓦坎的人口至少达12.5万。在城市郊区约7英里外的地区,住着更多的乡村人口,他们给大都市提供粮食。很像是使用水车灌溉的密集农业和山坡上的梯田构成了特奥蒂瓦坎文明经济基础。虽然特奥蒂瓦坎的宗教和艺术以和平为主导,但它似乎不仅拥有主要贸易中心,还有一个军事城邦,它直接控制的地区远达危地马拉高地。

其他中美洲的古文明与特奥蒂瓦坎相比都黯然失色。在西南方的蒙特阿尔班(Monte Alban),瓦哈卡(Oaxaca)的崎岖山脉中,萨波特克人(Zapotecs)建造了一个重要的仪式中心,也是个真正的城市。但他们的成就之一——复杂的象形文字体系,却很可能是奥尔梅克人(Olmec)开创的。与此同时,玛雅人的古典文明也在危地马拉北部的佩腾(Petén)地区兴盛起来。

中美洲的玛雅

在古代美洲的文明中,玛雅文明在文化成就上无可比拟。当然,也没有任何一个群体曾经在建筑、雕塑、绘画、数学和人文学上展示出这样卓越的能力。今天的墨西哥东南、几乎整个危地马拉、洪都拉斯西部,整个伯利兹以及萨尔瓦多的西部当时都有人居住,玛雅文明在热带雨林的低地达到了其发展的最高峰,其核心是以尤卡坦半岛为基础的危地马拉的佩腾地区。这就是从大约公元250至900年玛雅古典文

明的首要中心。这一地区的猎物和建筑材料(石灰石和精细的硬木)都很丰富。但几乎在其他每一方面该地区对于建造高等文化都存在巨大的障碍。用那时仅有的原始器具清除茂密的树木以耕种和控制杂草都是费力的工作。没有金属工具,水的供应完全依赖,交通工具也贫乏。然而正是在这里,玛雅人建立了一些他们最大的仪式中心。

把环境的限制和玛雅人的成就相比较,导致了一些权威人士推论玛雅文明是从其他更有利的地区移植过来的。这种观点一直由于在低地遗址发现的前古典时期漫长的序列事物而被强化。如今,大量的语言学 and 考古学的证据表明,低地玛雅人是公元前1500年生活在美索不达米亚或其附近地区的人群的后代,他们带来了中美洲文明的主要组成部分。他们及时地把这些要素融合到他们自己的科学、艺术和建筑的特殊成就中。

正如人们疑惑玛雅低地文化在这样不适宜人类生存的环境中兴盛起来一样,其迅速的衰落也同样让人疑惑不解。这导致了当地建筑活动逐渐停止,并最终使之在公元800年之后不再作为仪式中心。专家们已经针对这一衰落提出了许多种解释,包括大耕农业导致的地力耗尽、出于同一原因玉米地被野草侵蚀、水资源缺乏、农民反对统治的神权贵族的暴乱,以及已经和玛雅地区断绝商业和政治联系的特奥蒂瓦坎崩溃的破坏性影响。然而,上述解释没有一种让人完全满意。

最近,一种更复杂的关于古典玛雅崩溃的解释出现了。根据这个理论,在约公元550年时和特奥蒂瓦坎政治和商业联系的中断,导致了核心政权的瓦解。这很可能首先是由蒂卡尔(Tikal)——低地南部最大和最重要的仪式中心开始发挥作用的,核心政权瓦解的同时却增强了地方玛雅精英们的自治。这些精英们通过建造甚至更精巧的仪式中

① 然而,最近的考古发现革命性地更新了传统上认定的玛雅古典时期时间。在低地马拉北部茂密的热带雨林中,纳克贝(Nakbe)城的新发现中包含了大量从公元前600年至100年的石碑和庙宇,把古典时代的时间段推迟到现在还广泛认为是前古典时期。

——这也增加了农民的负担,表现了他们的自负和权力。人口增加、饥荒发生、粮食资源紧张,都迫使人们采用更精耕细作的耕种方法。这些反过来也增加了对耕地的竞争,战争的增加和尚武主义的强化便进一步反映在农业生产量的提高暂时地缓解了人口压力,并且使古典后期(从公元前100年至800年)成为可能,以仪式中心的建造、建筑和艺术发展为中心。但是更新的人口压力、食物短缺和地区之间的战争——这些世界其他地区同样遭遇更加恶化,在古典时期的最后一个世纪导致“文明和社会的重退化”压力的组合——这个理论这样论述,“产生于玛雅文明中的衰退,其之便是由于战争、营养不良和自然灾害而人口大量减少,直到那些活下来的人能够在人口密度和社会组织更低水平上重新获得稳定的农业社会”。

18

这种衰退并没有发生在尤卡坦半岛北部,一个石灰岩的低地平原,一片地,被茂密的高荆棘丛生的草丛的森林。在人口数量上和南部有多,玛雅人占据着这里,尽管文化成就更少引人注目,但这个地区仍然是重要的仪式中心,由矮胖的金字塔、多层宫殿和人的方形庭院组成。在公元前1000年,大批入侵者从墨西哥中部高地侵入这个地区,他们自称是比奇奇提的图拉(Tula)过来的托尔特克人(Toltec)移民。托尔特克人占领了尤卡坦北部,确立了对玛雅人的统治,他们来自奇伊察(Chichen Itza)城的神庙发号施令。入侵者带来了托尔特克风格,表现在艺术、建筑上,包括有柱廊的大厅、战士队列和被称为“查可莫克”(Chac Mools)的躺着的石雕像等方面。托尔特克的影响也反映在人们对于人越来越迷信。公元1200年之后,玛雅的文化 and 政治影响又日渐衰微。奇伊察被遗弃,权力转移到玛雅潘的城邦中,玛雅统治者在一个大型的、有围墙的城镇中统治着半岛的大部分地区,让部落酋长和他们的家属作为人质以从周围各个地方得到确定的贡品。但至15世纪,实际上所有的集权统治都消失了,以此成功的暴动推翻了玛雅王朝。政府在1411年摧毁了这座城市。至此,玛雅文明已经完全衰落了。在16世纪白人到达这里时,这个地区所有的政治集团或者帝国组织都已经消失了。

玛雅的经济和社会

过去30年的考古学发现极大地修正了我们对于古代玛雅生存基础的观点。直到最近,主流的观点还是认为,在玛雅人的饮食中玉米占首要地位,他们几乎只依赖于火耕(刀耕)农业体系。这一体系排除了在诸如特奥蒂瓦坎和其他中美洲古典期和后古典期中心发现的人口稠密的可能性,人们的传统解释是,农民人口是分散居住,房屋是典型的一间柱子-茅草结构,广泛分散在整个仪式中心和行政中心之间或者聚集在小村落中。这些中心,包括房子、金字塔、和受保护的广场和其他建筑,都被认为没有真正的“城市”特征。学者们认为,这些中心只是玛雅的精英们——人数稀少的祭司、贵族和官员及他们仆役生活的地方。另一方面,乡下人住在他们的农田旁边,去这些中心只是因为宗教节日或者其他特殊原因。

这一传统观点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受到强烈质疑,详细的地地区地图显示,环绕着蒂卡尔仪式中心的郊区人口稠密,并且已经从中心之外扩展到几英里远。后来发现,同样高密度集中的居住群也在其他主要甚至次要古典时期的中心出现。用诺曼·哈蒙德(Norman Hammond)的话说:“玛雅的各个中心之间的空间充分开放,那些曾经分布过着田园牧歌生活的农民,突然变成了挤在一起挨饿的郊区居民。”

古典玛雅的规模和居民密度之间的关系迫使人们对支持他们经济体系作重新评估。目前清楚的是,玛雅人除了火耕农业之外,还使用了精细且长久的农业,包括高产的菜园——在主要产品如玉米间种植蔬菜、树木栽培、开筑梯田和台田——在低洼地区建造人工土壤平台挖土。

围绕着仪式中心如蒂卡尔,郊区人口密集的证据已经引起了关于玛雅低地当时城市化程度的讨论。传统的观点,即认为古典时期的玛雅中心实际上被遗弃了许多年已经站不住脚了。然而,人们对于在某种意义上,诸如特奥蒂瓦坎之类的地区是否是“城市”,并没有达成一致

尤卡坦半岛,位于佩滕的中心,确定无疑是个大都市,中心约有5万人,郊区人口在20平方英里之内的地区人口稠密。后古典时期的尤卡坦北部也有某种真正都市化的证据,也许是托尔特克人影响的结果,那里的人们建造了把城市或城镇建造成一个要塞。奇琴伊察,古典时期一个古老的仪式中心,在托尔特克人的影响下得到了很大扩展,而当玛雅统治者奇琴伊察将其作为政治和军事中心时,建造了城墙环围的大城区。

由于人们看到了古典时期玛雅人口的广度和密度、他们大部分农业耕作特点,以及这种复杂状况对严格的社会控制的要求,这些便导致了人们对玛雅社会组织的重新计价。比较传统的观点是,统治阶层由一小部分和平的精英,他们在基本上已经被遗弃的空旷仪式中心里,统治着分散在各地的农业人口。随着对矗立在古典玛雅中心石柱上象形文字破译水平的提高,人们能够更好地理解玛雅的社会秩序。人们曾经相信,雕刻的文本是无例外是宗教的和人文学的。然而最近几十年来的证据表明,许多刻在石柱、楣梁和其他纪念碑上的象形文字记录的都是战争、战争和其他世俗统治者生活中的大事。

新的解释认为,伴随着不同阶级之间鸿沟的,是存在着的复杂社会秩序。在社会金字塔的顶端是世袭的统治者,他使城邦的政治、军事和宗教的领导层联合起来。他的周围是上层阶级或名门贵族,他从中挑选行政和执行官员。有知识的专业人士,如建筑师、祭司和抄写员也许已经形成了另一个社会阶层。在他们下面是无数的手工业者,他们需要建造仪式中心和城市:制陶者、雕刻者、石匠、画家等。在金字塔的最底层是普通劳动者和农民,他们提供劳动和粮食以支撑起这巨大的上层建筑。沉重的负担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压垮了他们,他们的不满很可能激起了暴乱,最终导致了玛雅低地文明的崩溃。

关于古典玛雅家庭和居住方式已经有了新的考古发现。大多数玛雅房屋都建造在抬高的平台上,而且以三个或更多的数量出现的事实,表明玛雅家庭已经不再是核心家庭,而是大家庭。这很可能是由两个或更多核心家庭跨越了两代或更多代,他们有共同的祖先。通过男性墓

穴上更丰富的装饰和男性在纪念碑艺术上的杰出表现表明了男性的优势地位,因此人们得出结论说,血统是父系的,从父亲到儿子。玛雅人的服装和饮食,如同其房屋一样,也反映出阶级差别。玛雅人的衣服跟阿兹特克人的服装很像:棉的缠腰带、皮质带子鞋、有时男性的肩膀上还系着斗篷;女性则是棉质的裹裙以及为头和颈围常带着的短上衣。上层阶级穿的衣服式样相同,只不过装饰更过度。

玛雅的宗教和知识

玛雅宗教的重要对象,如同西班牙主教迭戈·兰达(Diego de Landa)的简洁描述那样,是那些“给予他们健康、生命和粮食的‘众神’”。玛雅的主要神,比如阿兹特克人的诸神,代表了那些“对力量和最直接影响人们的物质战争的诸对象”。玛雅神谱中的最高神是伊察姆纳(Itzam Na),它是一个自身包含了許多其他神祇的创世神,不仅创世,而且火、雨、粮食和泥土都在其职责或者统辖范围内。其他重要的诸神包括太阳神、月亮神、雨神、玉米神和让人恐怖的死神。如同阿兹特克人一样,玛雅人也相信存在许多世界接连出现继而毁灭的情况;当前的世界也会在灾难中终结。

20

玛雅人相信来生:上界由十三层组成,下界有九层。每一层都由特定的神统治着,死神阿·普切(Ah Puch)统治着下界的最底一层。像阿兹特克人和其他中美洲的人们一样,玛雅人也用各种各样的仪式活动膜拜和抚慰诸神,包括斋戒、以放血的方式忏悔、焚香和人祭。古典时期后期,人祭已经广泛存在,这通过玛雅低地各城邦之间越来越多的政治动乱和纷争留下了痕迹,但也许到后古典时期,在托尔特克人的影响下,人祭越来越多。

玛雅人的祭司沉迷于时间,他们被分配的任务是神秘并且有魔力的。他们发明出一种历法,这种历法比我们要做出调整的太阳年的实际长度更精确。玛雅的神学家相信,时间是上帝背负在他们背上的沉重负担。某一时间段结束时,一个神卸下他的负担,另一个神则背负起来继续时间的历程。特定的一天或一年是幸运还是不幸,依赖于那时

·与背负神是善良还是不善良·因此,玛雅人的日历首先是角色占卜——用来预测特定时期的状况。

玛雅人有两本日历——一本为宗教历,周期是260天,与仪式生活的模式相对照——这本日历由两个时间长度不同相互结合定期循环的周期组成:一个周期13天,以数字计数,另一个周期20天,以名字计数。从14天命名,从第一人的名字再重新开始下一个周期。第二本为太阳历,1年周期是365天,被分成18个“月”,每个月有20天,加上这个周期最后5个不幸运日,在这5日所有不必要的活动都是禁止的。这两个周期每52年完成一次重合。石柱上雕刻的象形文字所指示的日期和其他日历的数据,如月亮的状态、金星的位置等经常在52年循环结束时和其他时间间隔时雕刻上去。

玛雅人比其他任何中美洲的邻居在数学科学上更发达。他们的计数单位是1、5和20,1用点表示,5用木棍,20或20的数倍用位置表示。数字的位置价值基于0这个标志,这很可能是古代美洲智力发展的最高水平。在这个系统中,数字的位置决定其价值,这就可能对表达数字大小的象形符号的数量加以限制。它的简洁性使其远远优于当代西欧的算术体系,后者体系运用繁琐,由罗马数字构成的每一更高单位都有不同的符号。它是阿拉伯人从印度带去的数字概念的留存,最好的体系在其他地方已经被创造出来了,但是,玛雅人的数学似乎主要被应用到历法和天文学的计算上。还没有关于玛雅人对人或物进行计数的证据。

直到最近,人们才相信,玛雅的象形文字和数学一样,主要是为宗教和占卜服务的,而不是出于实用的目的。我们现在已经有大量的证据表明,刻在纪念碑上的许多象形文字是历史性的,它是玛雅统治者生活的真实人事记。除了出现在石碑、楣梁、楼梯和其他纪念遗迹上的铭文,玛雅人还有许多圣书或抄本,只有其中的三部幸存到今天。这些书画在折叠的屏板——由树皮制成的本地纸板上。这些书涉及了上面提到的所有内容:天文学、占卜和其他相关主题。它们揭示的玛雅天文学家的观测和计算的复杂性确实让人震惊。

玛雅人没有字母,严格意义上说,他们的大多数文字代表着思想或者事物而不是声音。但是玛雅文字通过符号字谜的使用已经达到了语音学的音节阶段,词的声音是通过把事物的图画或符号串联起来表现的,说出的事物是词的形成中事物的象声名字。如玛雅人用词“金星”(kintunyaabil),是由四个符号构成的:太阳或白天的符号 kin、时间的单位石块或 360 天 tun、太阳年 haab 以及子夜 il。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一位俄国学者提出了这种理论,即玛雅文字是真正音节式的,因此能够通过当代玛雅人最常用的声音要素与古代文字中最常见的符号相匹配而得到破译,计算机的使用能加快这一破译过程。现在学者们通常已经接受了这一观点,即在玛雅人的书写中存在纯粹的语言象形文字,但它们在已经破解的材料中似乎相对罕见。

21



在博纳蒙派克(Bonampak)卫城发现的古代壁画描述了玛雅的文化仪式,它融合了历史、音乐和舞蹈。壁画中,舞者穿着龙虾、鸟和鳄鱼服,伴随着乐师演奏的鼓、马拉卡斯葫芦(gourd maracas)和喇叭庆祝王室继承人首次登基。【伦敦等档案馆/艺术档案馆】

玛雅文字并没有叙事体的文学记录,相反,大量的玛雅神话、传说、诗和传统历史都是以口头方式代代相传的。这方面的例子,我们在《波波尔乌》(Popol Vuh)中发现了一些。《波波尔乌》是危地马拉基切(Quiché)玛雅人所谓的圣书。这本书包括了两个勇敢的双胞胎乌那普(Hunahpu)和斯巴兰克(Xbalanque)的探险,他们在获得了许多功绩后,升到天堂成为了太阳和月亮。这本书是在西班牙人征服时代后期当地人根据人们的口述史用字母系统书写的。

玛雅人——一种手工活动类型,已经超越了所有其他的中美洲人。玛雅建筑与玛雅提特兰的庙宇和金字塔通常比其他玛雅人的地方更令人着迷,因为它们更精美和细致。玛雅建筑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使用了材料,而不是拱。其他中美洲的人通常使用水平的木梁连接,而玛雅人更喜欢笨重的方形。玛雅人用石头把两面的开口越远越好,使它们更坚固。用石头连接起来而解决了这一问题。玛雅建筑的一个特点是庙宇和宫殿正面很壮观,装饰了许多雕刻过饰。这些雕刻是古代玛雅人的视觉佳。庙宇和宫殿的内墙通常饰以绘画,但今天保存下来的很少。这些绘画中最值得一提的是1946年在博纳坎坎发现的壁画,在墨西哥恰帕斯州西北角的热带雨林中,是一处孤立的遗址。这一遗址可以追溯到大约公元800年。在一处有三个房间的小建筑内,墙上几乎全覆盖着壁画。这些壁画讲述的故事是以一个舞仪式开始的,然后描绘在一次远征中俘获了用以献祭的俘虏,接下来是战争的场面,最后以人祭、仪式和舞蹈结束。尽管它的风格在很大程度上是世俗化的、静止的,缺乏透视和阴影,在人的计数上也有明显的错误,但是它具有的视觉影响却是在其他中美洲的艺术中常常缺乏的。

玛雅的手工艺也常常证明了那些玛雅人令人钦佩的个人素质——尽管技术有限且生活在非常艰苦的环境中,但他们却创造出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文化传统之一。迭戈·德兰达主教焚烧了27本玛雅抄本,认为它们是“邪世的著作”。尽管如此,他也发现,玛雅人相当慷慨大方且热情好客。他写道,只要走进他们房子的人,都会被给予食物和水。

22

玛雅的衰落和中美洲的转型

到公元800年,一场似乎从一个古典中心波及另一个中心的危机撼动了中美洲的根基。特奥蒂瓦坎,那个时代的罗马,在入侵者的铁蹄下灭亡了,入侵者在大约公元650至800年之间焚毁了这座城市。再到后来,蒙特·阿尔万(Monte Albán)的重要仪式中心也被废弃。到公元800年,瓦解的进程已经到达了古典玛雅的腹地——尤卡坦南部

和危地马拉北部,那些中心一个接着一个被荒废或摧毁。

从中美洲这个战乱不断的时代开始(大约公元700年至1000年),一种新的后古典秩序出现了,有时也恰当地称之为武士精神。然而,祭司们和仁慈的自然神有时也许会掌管古典时代的中美洲社会,武士和可怕的战争神显然控制着在后古典世界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城邦。在墨西哥中部,特奥蒂瓦坎的统治很大程度上是首先以文化和经济上的优势地位为基础的,也让位于新兴城邦的纷争,它们彼此之间因为土地、水和贡品而战斗。

最重要的是,特奥蒂瓦坎权力的后继者是托尔特克人^①,他们的首府在图拉(Tula),距今人的墨西哥城大约50英里。图拉位于墨西哥山谷的外围,也许曾经是特奥蒂瓦坎的高地,在它的边界上,它抵抗沙漠北部的游牧部落。随着特奥蒂瓦坎的崩解,托尔特克这一部落从南方突然发动袭击,进入了墨西哥谷地,倾覆了特奥蒂瓦坎那些可怜的幸存者。

托尔特克在托皮尔岑(Topiltzin)的统治下达到了其权力和繁荣的最高峰,他于大约公元980年迁都图拉。显然,托皮尔岑还重新定义了特奥蒂瓦坎人崇拜的古代最高神羽蛇神的力量,羽蛇神用它的光辉支配了他和他的城市19年,使他和他的城市都成为了传奇。羽蛇神的歌曲讲述了图拉奇观,一个真正的乐园,地上生长着雪白的棉花,土地的产量已经到了这种程度,小的玉米穗不再用来当食物而是作为热蒸气浴的燃料。古代墨西哥的传说讲述了托尔特克人的超人力量和入分。他们被描述成艺术家和文化的创造者。伟大的神君——羽蛇神统治着这一黄金时期,它也因此使特奥蒂瓦坎的荣耀得到复兴。

到羽蛇神统治的末期,图拉似乎已经成为两支宗教传统暗地斗争的舞台。一支和对特兹卡特利波卡神(Tezcatlipoca)的崇拜相关,它被描画为全能、善变的神,需要人祭。另一支和古代对羽蛇神的信仰完全相同,它赐予玉米、知识和男女的艺术。关于羽蛇神传说的一个版本,也许可以反映后征服时期基督的影响,神要求人们只用平和的玉石、蛇

和羽蛇神。这两支宗教之间的争斗在当地的传说中能发现各种各样表述,传说讲述了人们特兹卡特利波卡的巫师怎样用它的黑魔力使神灵的律法和野性风度尽失,并迫使它从图拉流放。

无论羽蛇神传说的实际基础是什么,它都承诺了一种神秘的救赎,它会在某一天返回拯救它的国家,古代墨西哥人深受这个传说的影响,它在中美洲世界的崩溃中起了重要作用。唯一的巧合是,羽蛇神许在波朗的降临,正是科尔特斯登陆维拉克鲁斯的那一年。传说中的神灵有比于文化上著的抵抗,至少在起初时是这样。

托尔特克第一位国王被更小的国王代替,他徒劳地努力想解决托尔特克日益恶化的问题。这个危机的原因至今仍不明朗:巨大的干旱也,曾经引起了谷物绝收和饥荒,这一情况很可能由于托尔特克人忽视农业,向更善于从其庄稼的人那里收取贡品而更加恶化。一系列革命角斗反映了托尔特克的经济和社会困境。最后一位托尔特克国王休马克(Huema)仍然是在约1174年自杀的。托尔特克城邦也伴随着他的死亡而毁灭。接下来的一年里,托尔特克人分批四散离去。图拉也在约1224年陷落于野蛮人。

23

位于墨西哥谷地边界的图拉的陷落,打开了说纳瓦特尔语(Nahuatl)的北方人全面入侵山谷的通道。这些新的征服者,被称为奇奇梅克人(chichimecs),他们也许可以与侵入奄奄一息的罗马帝国的日耳曼入侵者相比较。像日耳曼人一样,奇奇梅克人的首领尊重并试图吸收被征服地人们的优秀文化。他们渴望与幸存的托尔特克人的皇族和贵族通婚。

这些入侵者在墨西哥谷地的湖国建立了许多后继的城邦。无论在法律上,他们的统治者都承认托尔特克血统的尊贵。就艺术和工业发展而言,1260年组建的特斯科科(Texcocan)王国很容易就超越了他的邻居。特斯科科文明达到其顶点是在两个世纪后的内萨瓦尔科约特利(Ncozahualecoyotl,1418—1472)统治时期,在古代美洲的废墟中慢慢出现了著名的诗人、哲学家、立法者,以及可能是最杰出的人物。

墨西哥的阿兹特克人

在奇奇梅克人后期到达谷地的是阿兹特克人，或者叫阿兹特兰人，这是他们给自己取的名字。他们从北方启程的一些人相信是公元1111年，由四个祭司和一个带着“创造万物之神”的女儿开始，开始他们的旅程——维奇洛波奇特利(Huitzilopochtli)的追随者。他们在漫无目标的流浪之后，于约公元1218年到达墨西哥谷地。传统观点认为，阿兹特克人基本是狩猎—采集生活，对农业只是有一些了解。但这种观点曾经受到一些学者质疑，这些学者认为，阿兹特克人到达墨西哥谷地的时候，他们在文化、宗教和经济社会组织上已经是成熟中美洲人民了。他们发现最令人满意的地方已被其他人占着，便只好被迫把特斯科科湖的湖心岛沼泽地作为避难所，公元1314或1315年，他们在那里建造了特诺奇提特兰(Tenochtitlán)城。此时，阿兹特克人的社区是由少量的血缘关系组成的，地主群体称为卡尔普利(calpulli)。

形成阿兹特克领土坚实基础的一块块小土地上，逐渐搭建起了座座藤条和芦苇茅屋。到后来竟形成了更宽敞的草皮、砖坯和发亮石头结构的建筑。随着人口的增加，更大面积耕地就成为必要，而且阿兹特克人也采纳了他们邻居的耕种技术“水中田畦”(chinampas)——用土和湖泊沉积物建成的人工田圃，田圃用柳条围护。最后，柳条根会扎根于湖底并成长，构成了牢固的基础。阿兹特克人在这种水中田畦里种玉米、豆子和其他产品。

阿兹特克帝国的扩张

很长一段时间，阿兹特克人都屈从于他们强人的邻居阿兹加波扎尔科人(Azcapotzalco)，后者也是14世纪后期和15世纪早期那个湖国的统治力量。1428年是阿兹特克历史的转折点。阿兹特克人在他们的军事领袖伊兹科亚特尔(Itzcoatl)的带领下，加入了特斯科科城邦和小一点的特拉科班(Tlacopan)城邦的起义，推翻了阿兹加波扎尔科人的暴政。他们这一结盟的胜利(1430)导致了三国联盟首先征服了谷

以,玉米又征服了中美洲地区的大部分。慢慢地,权力平衡被打破,并转移到莫奇利奇的阿兹特克城邦。特斯科科成为主要的合作者,特斯科科用它的影响力——阿兹特克岛屿要塞的牢固地位、形成联盟时的政策以及策略性地让陆上的城镇分享征服的战利品,都有助于解释阿兹特克人为什么成功地获得了墨西哥谷地的控制权。反过来,对谷地的征服也提供了征服中部美洲的基础。谷地由易于防守的大山作为屏障,有与太平洋岛国相近这一优势。面向北、东、西、南,灵活的阿兹特克勇士都很容易利用邻近的山谷。

通过征服高兹加波扎尔科,阿兹特克人得到了他们湖滨的第一块重要领地。大部分征服的土地和居住在其上的农民被分配给那些战功卓著的战士——贵族。起初分配这些土地是为了生活,但这些土地往往成为可以永久性有可继承的封地。因此,战争在阿兹特克社会中创造了新的经济和社会分裂。在这个过程中,最初基于血缘关系的卡尔普利逐渐削弱,在墨西哥谷地,它失去了大部分的自主性,变成主要是社会和政治上的行政单位。大部分平民要对阿兹特克城邦纳贡、服劳役和兵役,卡尔普利则由世袭的精英家族领导,这些精英家族则完全听命于那些高级的阿兹特克军官,并执行他们的命令。

在墨西哥谷地和其他高度发达的地区,从前和卡尔普利联系起来的公有公共土地关系开始遭到削弱,引起这一结果的原因在于:逐渐增长的人口压力迫使一些成员离开;内部的经济差异;以及在饥荒年代或一些危机出现时需要售卖或出租公有土地。原始的血缘关系的卡尔普利,即地主所有这种类型在那些阶级分层和城邦形成过程更缓慢的地区保存得更好。然而,到西班牙征服时,无土地者和佃农已经遍布墨西哥中部的大部分地区,他们和类似农奴的农民一起,很可能构成了阿兹特克人口的绝大多数。这些失去自由的农民对于地只拥有使用权,而且必须向拥有土地的贵族服务并交纳贡赋。最近的研究在人们面前展现出了一幅画面,这一社会“犹如欧洲中世纪的社会,高度复杂且地区差异大”。平民和贵族之间的鸿沟逐渐扩大,这以观念的形式反映在神话的起源中。人们在神话中声称,阿兹特克贵族有独立的(不同于羽蛇神的)神圣起源。

其他观念上的变化有：部落神维齐洛波奇特利被抬高到和墨西哥谷地原来崇拜的伟大的诸自然神同等重要的、最高的位置；焚烧古代图画文本，因为这些书忽略了阿兹特克人；他们还重造了新的阿兹特克人伟大的历史。一个新的方面在于，战争中抓捕的囚犯被用来在阿兹特克人的神坛前作人祭，以确保世界的运转。

伊兹科亚特尔的后继者——有时是单独的，有时是和特斯科科联合，扩大了阿兹特克的统治，并使其延伸到墨西哥谷地之外。到蒙特索玛二世(Moctezuma II)于公元1502年成为统治者时，阿兹特克王从数不清的大小城镇征收贡赋，从干旱的北部高原的边缘地带，到特旺特佩克(Tehuantepec)低地，从大西洋到太平洋。在这一广袤的地区，只有少数的城邦或王国，如凶猛的塔拉斯科人(Tarascons)的城邦或者特拉斯卡拉(Tlaxcala)城邦保持着完全独立。其他的城邦，如乔卢拉(Cholula)是以他们善意的中立立场或者与阿兹特克人的合作才得以和平保留。根据一些有争议的当代推算，被阿兹特克人和他们的联盟统治的人口大约有2500万。

阿兹特克人发起战争并不管是否有理由。如果一个组织拒绝向阿兹特克统治者交纳贡赋，或者如果一个地区的保护人伤害了经过的阿兹特克商人，都被认为是发动侵略的正当理由。阿兹特克商人也报告他们做生意的那些地区的资源和防御情况，为征服做准备；有时他们也在敌对区充当间谍。如果这些勇敢的商人安全地返回家乡，统治者会用琥珀色的唇环(amber lip plugs)和其他礼物给予他们荣誉。可是，如果他们的敌人发现他们，那后果就太可怕了。“他们会被伏击杀死，还佐以辣椒酱上桌”，当地的记录这样说。

① 一些社会学家试图解释阿兹特克人大量人祭的做法，以及与这一仪式伴随的吃人的习俗，认为是由于阿兹特克人的饮食中缺乏蛋白质。这一理论与阿兹特克人许多崇拜是吃动物食物相矛盾。而且事实是，甚至在大饥荒时期，印第安人和西班牙人的材料中都没有谈到吃人肉习俗这一做法。这一做法也加快了阿兹特克人在西班牙人征服时的人口。还有，人祭是有计划的，以使参与者都能分享到作为人祭的囚犯。正如神坛仪式，这本身很简单。但抓捕者不能吃他的肉，因为阿兹特克人认为，抓捕者和他的囚犯之间在某种神秘的姻缘关系



墨西哥谷地

25

战争胜利的结果总是相同的：战俘带着长长的队伍进入特诺奇提特兰的旅程，而后被放在诸神的祭坛上献祭。此外，战俘们还要被强迫定期进贡贡赋，如玉米、棉布、蓬戈或其他物品，根据各地区的地块和资源而定。一些土地也被留出来由他们耕种，以扶持阿兹特克人的士族、神职人员和城邦官员，或者作为封地授予在战争中表现卓越的勇士们。贡赋管理或征收者常驻城镇里，有时要由远征军子备一个子其他方面，被征服地的人们通常继续享受着政府、文化和风俗方面的自治。

26

由于这种非完全融合的特点，其反映就是被征服地的人们享有相对的自治，阿兹特克的政治和军事影响在被征服地区很少显现，所以，与印加帝国具有中央集中管理、常备军、大量的人口迁移和其他融合政策相比，阿兹特克帝国在传统上只被看做一种层次低的、有缺陷的政治组织。然而，最近有人认为，阿兹特克帝国体系并非层次低的，而是代表了另一种可选择的方式（效率并非低下）——它从这一国家的人们那里可以最小的行政和军事支出提取剩余物资。阿兹特克帝国军队只是为了进一步地征服和镇压叛乱。借助于把战败的政权留在当地，造成了直接的地区控制——在融合度更高的帝国内部固有的，阿兹特克城邦节省了费用，却保留了地方行政权，常备军、子备队和防御工事。

阿兹特克的文化和社会

阿兹特克的首府特诺奇提特兰的人口估计在 15 万和 20 万之间。如同在椭圆形的岛屿上建立的城市威尼斯，它通过三条汇集到市中心的堤道和陆地相连，这三条堤道也是其主要的交通要道。威尼斯没有街道，数不清的河道中拥挤着许多独木舟，由小路连接着河道两侧的千家万户。一条坚固的石头造成的水道从查普特比(Chapultepec)山上引下来清凉的泉水。

那些生活在偏远地区种植水中田畦的阿兹特克农民，划着小型独木舟把他们的产品运到城镇。他们住在茅屋里，把枝条编起来糊上泥巴就是墙，屋顶上覆盖的是茅草。每一个茅屋里都有一个三条腿的磨石(metate)；有一些垫子作为床垫和坐垫；陶器稍微多一点。人多数

是木匠、工匠、人匠、文职公务员、士兵和表演者,住在更壮观的房子。用砖或火山岩建造的房子,往往涂上石灰水,并且画上图案,使它们在阳光下整齐划一。奥尔吉利首领、商人和贵族的房子远比大多数房子更富丽堂皇。

阿兹特克人的穿着也根据个体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差有。平民穿用玉米衣,最主要的服饰有缠腰带,衣服前后都有图案,图案有几何图形和植物以及刺绣装饰,以及一个大小约一两码的毯子,毯子用长条织成,在右肩打结。平民穿的普通毯子是粗布织成,有的商人和贵族穿的则是非常精细的毯子。平民穿直筒宽松的长衫,女性穿的是直筒宽松衣服,白色的棉裹布,平民穿直筒宽松的短袖长衫。无论是直筒衣服还是短袖长衫,上面都有精美的刺绣。男人穿着皮的或者龙舌兰纤维织的带子鞋,女的则是赤脚。

食物也和职业一样:财富和社会地位决定了食物的充足与否或种类多少。一般阿兹特克人的食物构成包括玉米粉、豆子和辣椒酱烹调蔬菜。平民的餐桌上很少见到肉,但在节日时,可能会吃狗肉。贵族的食物则全不同。贵族们吃的食物在当地的记录中提到了许多种玉米饼、甜玉米粉羹、烤火鸡、烤鹌鹑和地南瓜种子、撒上果仁的鹿肉、各种各样的鱼和生菜,还有这样精美的食物,如龙舌兰蚜虫拌小辣椒、芳香开胃的蚂蚁翅和加调料的鼠肉。他们以巧克力汁——一种平民禁止喝的极美饮料结束就餐。

阿兹特克人的教育非常正规,而且用于双重目的,即为男孩和女孩在这个世界上的职责作准备,并给他们灌输阿兹特克人的理念。男孩在10岁或12岁上学。平民、商人和艺术家的儿子入青年之家(Telpochcalli),在那里他们接受宗教、好的实用技术以及战争艺术的指导。更高一级的学校是神学院(Calmecac),原则上是为贵族的孩子预备的,但一些商人和平民的孩子也可以加入。在这里,除了一般的训练外,学生们还受到使他们将来成为神职人员、公职人员和军队领袖的指导。课程包括我们今人所称的修辞学,或者说高贵的讲话方式;学习

- 27 那些在圣书的圣歌中揭示的宗教和哲学学说；年代学和天文艺术；以及通过学习各年代的书(Xiuhamatl)增强在历史方面的训练。圣人(Tlamatinime)在阿兹特克学校的教学中关注的是“真——信仰和真诚的心”如何形成，对于人性，纳兹特人认为引人注意的：“自我约束、谦虚、忠于职责、坚忍克己的清醒意识，即‘生命短暂，免不了艰难困苦，所有到来的终将离去’”。阿兹特克圣人在他们的训令中常常涉及品质和概念就包括无懈可击的举止礼仪和谦虚。

女孩儿上特别的学校，她们在那里学习知识、舞蹈、一次一香以及为崇拜对象准备食物这些庙宇工作；编织和其他女工活；以及学习其他一般准备。男性教育通常在20或22岁时结束，女性教育则通常在16或17岁时结束——这也是订立婚姻契约的年龄。阿兹特克武士精神的发展也许导致了女性地位的某种下降，阿兹特克“智者之谈”警告妻子，“服从丈夫是你的义务。你要为他准备饮料、食物、以及衬衫、头篷和裤子。”模范妻子的代表是勤劳的公主阿基尔达公主和公主阿基尔达的母亲。但在某些方面，阿兹特克妇女的地位不仅仅是服从丈夫，而是具有补充性。例如，孩子出生的象征意义可与战争相比：顺利出生等同于抓到了一个俘虏，出生时死亡则等同于战争中被害。在其他领域，阿兹特克妇女也以医生、艺术家、商人和祭司而闻名。

在这样复杂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中，争战和侵犯行为时有发生，不可避免，因此发展出详尽的法典成为必需。法廷等级制度的最高者是阿诺奇提特兰皇宫的两个高级法官。阿兹特克刑法也很严厉。谋杀、叛乱、穿异性的衣服和通奸都会被判死刑；偷窃者第一次会被罚做奴隶，第二次会被吊死。

阿兹特克的墨西哥人经济生活的基础是大规模的密集农业。在水源可靠的地区也采用密集灌溉；水中田畦是著名农业形式。田地休耕的火耕在一些地区也是惯例，但几乎在所有地区，玉米和豆子都是最主要的农作物。由于没有大量的圈养动物，因此肥料普遍缺乏。在墨西哥谷地中，水中田畦农业使用的肥料通常是“人粪”（人的粪便）。为了防止谷地的两条清泉被盐碱的水流污染（后者对水中田畦农业是

力),在整个干旱季节水量保持在一定的水平,伊兹科亚特尔王时期,建造精细的排水道、人工水道和输水槽道。这也导致修建了更大的人工水田,为特诺奇提特兰城生产粮食。然而,尽管产量丰富,特诺奇提特兰城人口、城市生存所需的5%,耕地的扩张受到剩余湖沼化的制约。因此,为了平衡粮食需要,特诺西提特兰必须依赖通商和贸易带来的粮食输入。详尽的、城邦控制的贸易和交通网络,以城邦和大型集市市场为基础,专业运输者(tlameme)的货运系统以独木舟和独木舟上的整个船坞独木舟交通,给特诺西提特兰注入商品和货币,以及大批商品。加工过的商品又被从特诺西提特兰运到它的腹地,形成了核心—外围的关系。

特诺西提特兰的交换和服务在特诺西提特兰巨人的市场上进行,这些市场让西班牙征服者科尔特斯大为震惊,他对许多活动都进行了详细描述:“每个市场都售卖不同的商品,”他写道,“而且他们也不把任何相似的东西和其他种类的相混淆;因此他们秩序井然。”阿兹特克人缺乏货币,但使用贝壳、棉斗篷、装满金粉的羽毛管以及小铜片作为货币,以作为物物交换体系的补充。阿兹特克人没有银行,但市场是建立在数量和度量上。市场由官员管理,他们检查交易公平与否,审理商人的诉讼并处理买卖双方的纠纷。

28

从15世纪起,随着时间推移,到征服的时候,阿兹特克人的劳动分工已经发展到了这样的程度:数量最大的人工业阶层已不再从事农业。手工业阶层包括木匠、陶工、石匠、银匠和羽毛工人。属于这一范畴的专业人士还有画家、猎人、舞者和乐师。所有这些专业人士都加入行会组织,每一个行会都有一个行工会会所和保护神;他们的职业可能代代相传。在阿兹特克行会中,艺术家和工匠享有更高的荣誉地位和责任。所有的艺术家和手工业者都认为本行业起源于托尔特克时期,因此阿兹特克人用托尔特克称呼那些绘画、歌唱、制陶和雕刻的真正大师。

地区劳动分工的发展和奢侈品市场的增长也导致了商人阶层的出现,他们组成了强势的行会。这一阶层的财富和它对阿兹特克承办重要的军队和外交支持,使商人成了阿兹特克社会的第三大力量,仅次于

武士贵族和神职人员。但是,商人阶层,有时也会引起阿兹特克统治者和贵族的不信任和敌意。普通人对商人的敌意反映在当地的语言中:“商人是那些富裕、贪婪的人;贪心的主子,贪婪的,吝啬,为了财富,控制着财富和家宅……卑鄙、小气、自私的人。”

神职阶层是阿兹特克社会主要的集合力量。通过拥有各种圣方法,他们调节农业活动的实施,在人们的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神职阶层也是全部知识积累和阿兹特克部落历史的宝库。借助于神职人员的特殊力量、知识和智慧,祭司被邀请介入到阿兹特克人每一个私人或公共的危机中。独身、简朴、不断从事放血忏悔,神职人员对阿兹特克人民行使着强大的影响力。

和神职阶层共同享有权力和名望的是贵族,这个阶层通过战争和政治集权获得权力。这个阶层构成了庞大的官僚机构,除了许多武士外,还包括贡赋征收者、法官、大使等等。这些官员得到的服务报酬是通过指定的公有土地的收益支付的。他们的职位并非世袭,但通常授予儿子与其父亲相同的职位。

武士贵族的财富主要构成是地。最初授予武士地产是为了他们的生活,这些土地后来称为私有地代代相传,而且能出售或交换。土地上的那些农民只是在形式上自由,他们可能转化成了和土地相关的雇农、农场工或租种土地的佃农。随着阿兹特克帝国范围的扩展,私有地产的数量稳步增长。

生活在阿兹特克社会边缘的是人口众多的奴隶阶层。奴隶是对各种过错的惩罚,包括无力偿还债务,以及为了换到粮食有些人自愿成为奴隶。奴隶主经常带着他们的私人动产到阿斯卡帕兹科(Azcapotzalco)的大市场上,把他们出售给富有的商人或贵族做仆役,或者把他们作为神的祭品。

阿兹特克的政治体系是王权专制和神权政治的混合。政治力量集中在神职人员和贵族统治阶级手中,他们是绝对的统治者。起初,整个阿兹特克社区的人都会被集合起来挑选他们的统治者。后来,统治者由议会或选举团挑选,议会和选举团被最重要的神职人员、官员、武士

以及国王的近亲。国王议会与特斯科科和特拉科班的国王商议,从上述统治者中选择一个兄弟或侄子外甥中挑选他们的元首。新的统治者一个王位,由他的议会辅佐。西班牙人征服时,其皇帝是倒霉的蒙特祖玛一世,他继承了其叔叔阿兹特克的职位。

在蒙特祖玛一世宫廷里,绚丽壮观和繁缛的仪式盛行。在他面前,王后和大贵族们穿着复杂的羽毛、玉石和黄金装饰,还要赤脚,眼睛看向前方,手也固定不动的伸举。蒙特祖玛在富丽堂皇的单间用餐,木质屏风把他和仆从、与他谈话的四个大贵族隔开。

财富、奢侈和仪式表明,曾经被蔑视的阿兹特克小部落在社会、经济上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不到两个世纪之前,它才来到特斯科科湖的沼泽地带。阿兹特克帝国达到了它自豪和权力的顶峰。然而,阿兹特克统治者却生活在恐惧中,这一点是通过阿兹特克编年史证实的。阿兹特克统治者持续增加的要求引起了进贡城镇的叛乱。虽然被镇压,但新的叛乱不断爆发。阿兹特克人脑海中萦绕不断地想着看到了世界末日。厄运之兆和麻烦不断的状况,如双头小孩的出生;波波卡特佩特(Popocatepetl)火山变得不常活动;彗星划过天空等。根据阿兹特克传说,公元1519那一年,神君羽蛇(Quetzalcóatl)会离开人世回到被驱逐的地方返回来,收回自己的领地。

秘鲁的印加

在11世纪中期,现在的秘鲁高地不知道从哪冒了一个小部落,到公元1500年它创建了古代美洲最强人的帝国。自从皮萨罗(Pizarro)时代发现和征服秘鲁,印加在政治和社会组织上的成就已经引起了大家强烈的兴趣。在征服之后不久,一场关于印加社会性质的讨论就开始了,这一讨论几乎一直持续到今天。对于一些人来说,它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帝国”;另一些人则把它看做我们自己这个时代“福利

① 波波卡特佩特(Popocatepetl)也是世界上最活跃火山之一。——编者注

社会”的祖先；还有人认为，印加王国希望的是 21 世纪的极权专政。可是，最近又有来自殖民地地区记录——官方的经济和社会记录、诉讼、遗嘱等的更详尽的研究证据，提供了关于印加社会更确切的了解，并且摒弃了传统的认识。

安第斯山脉中部地区的自然环境对于这个地区引人注目的文化发展是一个关键要素。在秘鲁，海边地区存在两种气候，剩下无灌溉灌溉的狭窄平原是真正的沙漠。洪堡基流(The Humboldt Current)沿着海岸从南极地带直到北方，使海洋比陆地更冷，因此二者都落在了海岸上。但是，从高山雪域上包冲下来的小河补充了缺乏的降水。这些小河在沿海不断地创造绿洲，提供了水来灌溉系统，补充了水。干燥的气候保存了土壤的自然肥力，这在降雨量大的地区却会流失。秘鲁的海岸水丰富可以发展渔业，它的海上岛屿在印加时代积累了大量的鸟粪肥料(guano)，为农业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肥料。

印加文化的起源

如同古代墨西哥的阿兹特克人一样，秘鲁的印加人也继承了伟大古老的文化遗产。这种传统的起源不在高地上，而是在沿海。到公元前 2500 年，主要基于捕鱼和食物采集，并以南瓜、利马豆子和一些其他农作物为补充的乡村生活，已经出现在沿海地区。玉米和土豆在公元前 1500 年被引进到秘鲁人的农业中，但直到许多世纪之后，它们才成为重要的农作物。

30 与中美洲相比，秘鲁从古代时期到前古典时期的转换似乎出现更晚而且更突然。在上面描述的漫长的数个世纪的简单乡村生活之后，约公元前 900 年，一种强有力的高级文化在沿海开始了。这一提升似乎已经和农业的进步联系起来，特别是玉米的更大利用，而且伴随着从沿海地区向河谷上游的迁移——这很可能是人口压力的结果。在公元前 900 年到公元前 500 年之间，一种独特的建筑、艺术、制陶和编织风格，被称为查文(Chavin，以 1916 年发现的重要仪式中心的遗址命名)，沿着海岸扩展，甚至扩展到了高地。查文最引人注目的特征是猫，很可

是假当做神。对猫的崇拜遍布查文影响的地区。

秘鲁的文明最繁盛期出现在旧世界的基督时代或之前不久,也在文明的进一步发展上反映出来,以灌溉和施肥著名。这种取代了查文文明的文化是纳斯卡文化(Nazca),位于今天沿着秘鲁海岸线区域以及高原高地。纳斯卡制陶显著的特征是对颜色的使用。一个陶罐经常有多达11种轻柔柔和的色彩。可爱的纳斯卡编织品展示了丰富的色调。

秘鲁南部沿海的莫奇卡(Mochica)文化更为引人注目。莫奇卡人建造了金字塔、神庙、道路和大型灌溉渠,他们还发展出了复杂、分层清晰的社会,有统治者阶层和强权的祭祀王。冶金术高度发展,这一时期铜质武器和工具的广泛使用以及金、铜和银的合金产品得到了发展。但是和纳斯卡艺术家一样,莫奇卡最著名的器物是他们的红陶器,色彩鲜艳,装饰着几何主义的完美设计绝无仅有。陶器上也经常装饰着很多繁多的几何主义绘画,包括性爱场景,今天它是收藏家的收藏对象。陶器上还有描绘战争场面,表明他们长期为了有限的耕地和水资源而斗争。英勇善战的莫奇卡人自己最后也被劫掠他们土地的入侵者征服,那时混乱的、文化衰退的时刻终于来到了秘鲁北部。

大约公元前600年,安第斯文明的中心从沿海转移到高地。它在一个叫蒂亚瓦纳科(Tiahuanaco)的地方,位于玻利维亚高原上的的的喀喀(Imicaca)湖之南。那里有一个壮观的仪式中心,以巨石建筑和人像纪念碑闻名。巨石建筑是用巨大的石块严丝合缝地垒在一起建造的。蒂亚瓦纳科似乎已经成为军事城邦的首府,它实际上控制着从阿雷基帕(Arequipa)内部到玻利维亚和智利高地的整个秘鲁南部。另外一些人,如瓦里人(the Huari),是从他们的家乡,即今天的阿亚库乔(Ayacucho)附近开始他们的征战生涯;他们的领土最终包括沿海和高地,最远直到北边的卡哈马卡(Cajamarca),南部到蒂亚瓦纳科边界。在几个世纪的统治之后,瓦里帝国在公元1000年崩溃,几乎是同时,蒂亚瓦纳科也拉别看走到了尽头。这些帝国分裂后,安第斯南部地区重新回到了政治和艺术的地区割据状态。

到公元1000年,许多很大程度上不亚于它们先辈的印加城邦已经建立起来,它们控制着秘鲁北干诺海的大部分地区。它们的崛起伴随着城市的增长。每一个河谷都有自己的城市中心,而且遍布的灌溉工程支撑起了更多人口的可持续性。这些印加邦中最大的奇穆(Chimu)王国。它的都城昌昌(Chan Chan)是个方宽达8平方英里的大城市,房子是用大块用模具压成的土坯砖建造的,分成大的住宅单元或大院。

印加的经济和社会

高地上同时还有大片比较不适宜居住的地方,在那里,一个新的势力正在崛起。印加人(他们是以自己统治者家族的名字命名的)在历史上给人的印象是谦虚朴实。众多小部落之一的印加人居住在安第斯高地的库斯科(Cuzco)地区,这些小部落彼此都要为了获得土地和水资源而奋斗。库斯科山谷有利的战略地形以及比其邻邦某种文化上的优势都有利于印加人开始他们的征服历程。以前的帝国——蒂里、蒂亚瓦纳科和苏木,毫无疑问给印加人提供了建设性的借鉴程序,以及通过各种各样的政治和社会经济技术得以征服。如同其他的古代帝国一样,印加也有许多神话和传说,描述他们统治者的神圣起源,并能给予他们的战士超自然力的偏爱和保护,使人的安全得到保障。

帝国的真正扩张似乎在15世纪5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此时是印加国王帕查库提(Pachacuti)统治的时候,他于公元1438年登上王位。通过运用如宣称神圣救助、许诺公平、威胁和暴力征服等策略,帕查库提和同样也是个伟大征服者的儿子——印加国王托帕(Topa)一起,得到了许多地方的臣服。帕查库提被誉为伟大的组织者和勇猛的战士,许多改革和革新也要归功于他,包括设置地区和详细的行政管理机构,使印加帝国的车轮滚滚向前。到公元1527年,太阳之子的边界记号北部已经到了今天厄瓜多尔和哥伦比亚之间的地方,南部则达智利的毛尔河(the Maule river)。大约有900万人衷心拥戴他们的帝王。当西班牙人到达的时候,统治者是阿塔瓦尔帕(Atahualpa),他刚刚击败他

又升上太阳，”^①下(Huascar)，披上帝上斗篷。

印加人用一系列措施来维持他们的权威，包括推广他们的克丘亚(Quechua)语(安第斯地区中部大约有六分之五勤劳的人民仍说这种语言)，推行共同的官方语言，强迫人们接受统一的城邦宗教信仰，以及将分散地区的酋长合并集中到一个中央政府机构中的精明政策。在印加帝国计划中重要的因素是重新安置政策，或者叫殖民化政策。政策包括：流放异见者，用来让帝国比较老的地区忠于他们的殖民者；*mitas*(*mitas*)代替畅通的道路网和步行道把行政中心连接起来，使可以从帝国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一些道路是铺设的，还有一些是用石块或石头铺成的；沼泽地的道路通过渡槽连接；悬空的道路；^②一些是用有浮力的芦苇架起的浮桥。印加人没有文字，但用有结绳保存记录的方法，这种帮助记忆的辅助物叫“奇普”(quipu)，由一根基棍或基绳上，上面系着打了许多结的细绳。不同的结绳代表不同的事物、人或区域；系在细绳上的结代表一个、二个、百个、千个单位的增加等等。

印加帝国的基础是它的密集灌溉农业，它毫不费力地支撑起不仅生产者，而且包括庞大的印加军队、臃肿的行政机构以及许多其他办事人员和工作人员的人。印加并没有进一步发展这种农业。到他们崛起的时候，起初的灌溉系统很可能已经扩展到了沿海所有适合的地区秘鲁高地。但是伴随着政治和宗教机构的建立，印加人引进了灌溉、梯田和施肥这些较更原始的文化所征服的人们的先进做法。梯田广泛推广以扩展耕地，并且避免了狭窄的安第斯山谷中雨季陡峭山坡上的急流对田地和其他地的危害。灌溉渠——有些只是壕沟，有些是精致的用石人造的渠，把水输送到需要浇灌的农田和牧场里。

农业工具少而简单。他们主要有犁地和给种植挖坑的脚犁，以及用木一般材料做的锄头。正如前面提到的，土豆和藜麦是较高的山谷的主要粮食；玉米较低纬度的主要农业做；大量的农作物，包括棉花、可

① 意译“结绳记事”。——编者注



天命印加国王库西·尤潘基(Kusi Yupanqui)，帕查库提(Pachacuti)印加,他的名字含义是“世界的救赎者”,继承了他的父亲印加国王维拉科查(Viracocha)的王位,成为库斯科王国的第九任皇帝

可和豆子都种植在地势较低、温度较高的山谷。印加城邦的一个主要功能是调节不同地区的产品交换,主要通过征收贡赋,并将其在印加社会不同的人群中重新分配。通过允许特定社区的成员开发安第斯“垂直”经济中不同层级的资源,印加城邦也激励人们自给自足。

印加社会组织的基本单位是“艾柳”(ayllu),一种声称家族成员出

① 尤潘基本是动词,意指“你将讲述”,用作称号,意思便成为“你将讲述过(君主)的丰功伟绩、杰出品德、博大胸怀、慈悲心肠和温柔性格”,是一种颂扬的用语,情况跟古罗马人对皇帝称呼为“奥古斯都”相同。转引自印卡·古兹曼著、崔拉维兹著、王下、王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30页。——译者注

个祖先且在村庄内部通婚的血缘组织。在婚姻中,两个人的结合,一个成员都以血缘关系联系起来,因此他们两个人“从此以后要像亲姐妹那样相待”。不仅兄弟姐妹有相同的父母,而且大表姐、表兄、表兄(也就是说,所有人都可以追根溯源到同一个曾祖父)都要把彼此看做兄弟姐妹。这样,婚姻造就了一个庞大的不断扩展的血缘群体。这个群体的成员希望在工作中互相帮助会超过一个单一家庭的能力。

村庄社区由几个艾柳组成,每一个艾柳都有自己的土地,这些土地被成批分配给族长们。每个族长都有权使用这些土地或者把它传给子孙后代,但不能卖掉或者以其他方法处理土地。村民在农活、住宅建造和其他私人或公共性质的事务上经常实行互助。印加统治者拿过这一社区原则,并以劳役——即无偿、强制劳动的形式利用它为自己服务。用考古学家纳唐·华德(Nathan Wachtel)的话来说:“印加帝国基于古代公共的生产模式在当地留了下来,它利用对等原则合法化其统治。”

性别平行开始时伴随着



印加帝国的扩张(1460-1532)

血缘平行,在艾柳的血缘关系组织和观念形态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妇女通过她们的母亲把自己看做妇女那一边的后代;男子则通过他们的父亲把自己看做男子那一边的延续。艾琳·西尔弗布拉特(Irene Silverblatt)在她关于安第斯社会性别关系的名著《太阳、月亮与巫师们》(*Sun, Moon, and Witches*)中写道:“通过平行家系构成性别关系和血缘关系的这一组织是内在的,是安第斯女性和男性建造和重建他们的社会存在的方式。性别平行的价值和其调在实践活动中通过他们对生活的建设和经历不断得到加强。”

平等的对话确保了女性可以通过她们的母亲享有土地、牧群、水和其他资源。性别平行也确定了安第斯社会的劳动分工,人们认为特定的活动更适合男性或更适合女性。人们认为,编织和纺织是女性的工作,而犁地和挑担是男性的工作。但是所有这些活动都被看做是相互补充、同等重要的。

然而,在印加人征服之后,西尔弗布拉特说:“男性的帝国观念在安第斯山地区成为标准。”“士兵”是给予男性市民的称号,已婚男性会被添加到帝国的人口普查册上;与其相对应的女性范畴则是“士兵的妻子”。有证据表明,在印加人征服之前,继承母亲权力的妇女有时候也拥有艾柳这一层次的领导地位。但是,印加帝国的规范——“把男性与政治权力和征服联系在一起,随着帝国的扩张已打破了性别关系的平衡。男性充斥于印加的行政和军队等权威部门,这就否认了妇女具有同等的社会地位。”但是安第斯的平行家系传统仍然允许印加贵族妇女有得到她们自己资源的要求,在库斯科地区还有权把土地从上一代贵族女性传到下一代贵族女性。

在印加征服之前,艾柳是由库拉卡们(curacas,世袭酋长们)管理,长老会议辅佐的。一个高级库拉卡或地主(大库拉卡,jatun curaca)管理所有人或城邦。在印加的统治下,通过有计划地迁走它的一些成员和在它们中间安置外来人口(mitimaes系统),艾柳组织基本的血缘关系被削弱了。各种大量的土地被从村庄收走并在印加的城邦和城邦的教会中行赏。艾柳成员除了要在自己 and 他们的库拉卡的土地上工作

农民必须耕种印加城邦和教会的土地。印加征服者还强制村民通过开垦山坡和整修梯田开辟新的耕地。新的土地常常作为私有不动产移交给库拉卡们和印加军队的首领以及贵族——那些对印加城邦贡献卓著的人。印加人自己还拥有私人地产,而且那些死去的帝王的后代也有自己的不动产,并用它们来保持对这些先前统治者的崇拜。这些私有不动产并不是由艾柳成员耕种,而是一个新的奴隶阶级——亚纳科纳(yanacona),西班牙语的原意将其定义为“永久的仆人”。每一个印加部族成员都有一些这样的仆人或家臣,他们也在印加的庙宇、宫殿工作,以及作为私家表演者服务。

除了农业劳动,艾柳的成员还必须在一个称为米塔(mita)的制度进行劳动,包括道路、灌溉渠、要塞和矿场工作,后来西班牙人为了自己的目的也承继了米塔这一制度。其他的要求是要村庄给城邦提供一定数量的织物供士兵和仆役做衣服之用。所有在某个年龄段之间的体格健全的平民都要服兵役。

34

在这些制度安排上,并不能发现社会主义或福利国家的印迹,这些制度安排并不有利于平民,而是有利于印加王室、贵族、神职人员、武士和官员。许多被引用以反映印加城邦的仁慈和远见的活动实际上是传统村庄和艾柳的功能。这种活动中有一种是社区把粮食和布料保存在仓库里以备灾荒年之需。印加城邦只是承继了这一原则,正如它已经承继的为了社区目的而合作劳动的原则一样,并且建造了仓库贮藏那些通过强制农民在城邦和教会的土地上劳动而生产出来的产品。储藏在这些仓库中的布料和谷物主要用于下述那些人的衣物和口粮,即军队、王室艺术家、公共工作的服务者,以及居住在库斯科和其他城镇的官员。

印加王和农民之间的关系基于互惠原则,这通过详细的赠礼和回礼体系得到了体现。农民耕种印加王的土地,把毛、棉加工成布料,并且为他做各种各样的其他劳动。印加王——神圣的世界之主——反过

① 在克丘亚语(Quichua)中是复数,但西班牙人将其作单数使用。

来也允许农民耕种公共土地,在物资短缺的时候也给村主发放自己仓库中的剩余粮食。因为帝国的赠礼是农民自己劳动的产品,通过印加的统治者和贵族,这种“互惠”等于加强了对平民的控制。但是,我们也不必低估这种观念形态的拥有,从宗教的世界观看,已把印加王看做有责任维护秩序和印加农民精神世界的存在。

在征服时代,平民所承受的严格管理和艰辛生活和印加贵族的奢侈生活之间已出现了巨大的鸿沟。社会金字塔的顶端是印加王与其同族人,由十二个家族构成。这些家族的人员有在耳朵上打洞和用人的饰物拉伸耳垂的特权——因此西班牙人把这些印加家族的人叫做大耳朵(orejones)。大耳朵不用服劳役和兵役,和真正的库拉卡人一样,他们曾经是拥有自己的权力的酋长,拥有一批特定人员——仆役、祭司、基普(qiupu)侍卫等其他官员以及歌舞伎。他们和印加城邦一起,控制了农民的剩余产品,控制不同地区的商品交换,并监督许多大型公共事务,这样在印加贵族和库拉卡中就出现了原始的封建主义。他们对印加王的忠诚和服务得到的回报是丰饶的土地、美洲驼(llamas)和数件亚纳科纳等赠品。随着资源的增加,他们也有了自己的地方从属者,并且获得了某种主权之外的相对独立,在皇帝死后接下来的继承人问题上有时起着重要作用。

印加王对农民的统治大部分是非直接的、通过地方酋长行使的。这可能因此而没有严重影响村庄里的日常生活规律。高地上典型的农民房屋是一个小茅屋,墙由粗石、或土砖垒成,屋顶覆盖着茅草。家具很少,包括一个睡觉的高平台、泥炉灶、一些泥做的罐和餐具。男人的衣服由腰布、无袖束腰外衣和一个披在肩膀上的大斗篷两个角系在前面;根据社会地位不同,所用布料的细致和装饰都会有所不同。妇女的衣服一块裹布从胳膊下面到脚踝,上边绑在肩膀上并用四柱针固定。有个环腰的装饰带和披肩就构成了妇女的服装。男子用耳塞和手镯装饰自己,女子则戴项链和使用披肩针。

西班牙人征服前夕,印加城邦看起来似乎拥有无限权力。但是,像阿兹特克帝国一样,深刻的矛盾冲突也使其分裂。被奴役的人们常常

在起义,再被暴力残酷镇压。甚至表面上忠诚的库拉卡人——从前城邦的地上,也屈怒印加充满戒备的管理,梦想有一天能重获他们失去的自由。

印加的宗教和知识

印加城邦的宗教和更古老的祖先祭祀以及数不清的瓦卡斯(wacas,当地的神体和地方)崇拜并存。印加的主神是不可名状的创世神维拉科查(Viracocha)和帕查亚查奇科(Pachayachachi,世界的主宰,高王者)。对神的崇拜很大程度上局限在神职和贵族阶层,似乎已无力与基督教的一教。重要性排在维拉科查之后的是太阳神,印加皇帝是它的直系祖先。其他著名的神还包括雷神,它给人们带来雨水和谷物,以及月亮神——太阳神的妻子,在调节印加庆祝活动中起着重要作用。印加有许多庙宇供奉他们的崇拜对象,祭司们负责指导和安排这些仪式,包括祈祷、献祭、忏悔和占卜活动。祭司的另一个功能是用魔力治愈疾病。还有一个圣女(mamaclia)参与了宗教活动中辅助祭司们的工作,她们立誓要永远保持贞洁。在举行重大场合还会举行人祭,比如重要的战争胜利或一些巨大的自然灾害发生时。

印加艺术的特点是具有很高的技术成就。建筑坚固且实用,特点是实用但不美观。当地土的石人雕像比沿海更多,人们将其描述为笨拙又丑陋。但是印加的挂毯编织是世界纺织品艺术的杰作之一,织艺优美精细。印加的冶金业也有很高的技术和艺术水平。库斯科,印加首都城,有大量金做的物体:王宫有金雕带和金银镶板,太阳神庙有一个花园,里面有栩栩如生的植物和动物造像,全都是由金子打造的。

虽然印加人没有文字系统,因此没有书写的文学,但是叙事诗、祈祷文和故事却世代口口相传。保存下来的印加圣歌和祷文以它们的高尚思想和表达优美而著名。其中一首长叙事诗讲述了印加神话、传说和历史,以西贡才又散文形式保存下来的只是其概要。

许多传统的印加爱情歌曲中都充满着忧伤和思念的情绪,呈现在

我们面前的仅有的几首音乐作品也是同样悲伤的调子。这种音乐基于五个音,或者叫五声音阶、音列,是由多种乐器共同演奏的:笛子、喇叭和口哨;锣、铃铛和拨浪鼓;以及各种皮做的鼓和小手鼓。有时候还有舞蹈伴着音乐代表了戏剧的最初形式。

虽然西班牙征服者破坏了印加的政治组织,并且这些毁灭性的打击也波及印加文明的所有方面,但是印加文化要素却在安第斯地区中部的每一个地方都保存了下来。这些保存下来的东西,有有形的,也有无形的,包括克丘亚语,大量当地的社区或艾柳,仍然非常地以互助原则为基础;广泛的无宗教信仰者和人们的习俗;当然,还有萨科萨华曼(sacsahuaman)的纪念碑遗址、奥兰太酒馆(Ollantay tambo),马丘比丘(Machu Picchu),皮萨克(Pisac)和库斯科城自身。印加文明也存活在秘鲁历史学家、小说家和政治家的著作中,他们描绘并使人忆起已逝的印加的伟人,并赞扬那些人古老的美德。对于许多秘鲁人而言,正是印加人高超的技术成就和社会管理确保了所有人都拥有适度的财富,这也给他们自己拥有的固有能力提供了证据,证明当今贫穷充斥、分崩离析的秘鲁也许仍然会有美好的前景。

第二章 西班牙背景

焦点问题：

- 征服对古代世界的伊比利亚半岛¹的发展有何影响？
- 卡斯蒂利亚人(Castilian)的制度、传统和价值观中的哪些东西塑造了拉丁美洲的未来？
- 再征服如何塑造了卡斯蒂利亚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
- 费迪南德(Ferdinand)和伊莎贝拉(Isabella)的统治有何积极和消极影响？
- 哈布斯堡(Hapsburg)王朝的政策是什么？它们对帝国的衰退有何影响？
- 公社社员(Comunero)暴乱的原因和意义是什么？

很久很久以前，征服就是伊比利亚半岛(Iberian Peninsula)历史的一个主要内容。不知名的艺术家画了精彩的阿尔塔米拉(Altamira)洞穴壁画，半岛的史前居民被含糊地称为伊比利亚人的许多部落和凯尔特人(Celts)控制，人们认为他们可能于公元前 1000 年以前分别来自

¹伊比利亚半岛，泛指西班牙和葡萄牙占领的欧洲西南一半岛。比利牛斯山脉将它与欧洲其他地区分开，直布罗陀海峡将其与非洲隔开。——译者注

北非和中欧。新的入侵浪潮带来了腓尼基人、希腊人和意大利人，这些贸易民族在沿海建立了交易中心和城市，但并没有做上任何努力试图控制内陆。直到后来，伊比利亚半岛在罗马和迦太基之间关于贸易主权的重大冲突中成为了帝国的赌注，并在公元前211年以罗马者的决定性失败而告终。从那以后的6个世纪，罗马在这个地区有决定性的权力。

不像其他更早的入侵者，罗马人试图在半岛地区在当地人中建立自己的政府，他们强制性地推广他们的语言、管理、制度，甚至名字：西班牙(Hispania)。源自拉丁语的官方语言有各种各样的地方方言，而且直到今天西班牙人都被迫说着这样的方言。罗马人代替了凯尔特人、伊比利亚人和其他当地人的习俗法。通过强迫改变居住地、把人们集中在城镇以及建立罗马殖民地充当安抚和同化措施，罗马人摧毁了当地的部落组织。农业、矿产和工业得到了发展，这些罗马殖民地和意大利有大量贸易来往，包括小麦、葡萄酒和橄榄油。罗马工程师建造了大型公共道路和水道，一些到现在依然在使用。罗马人给当地人带来了他们的教育制度、文字文化以及许多罗马市民，包括讽刺诗人马蒂尔(Martial)、叙事诗人卢坎(Lucan)和哲学家塞内加(Seneca)，他们或者出生或者居住在半岛殖民地，对拉丁文字作出了卓越贡献。

在5世纪初期，罗马军事力量衰退的结果是，许多日耳曼统治的野蛮人入侵罗马。到5世纪后半期，一群西哥特人(the Visigoths)入侵者已经控制了半岛的大部分。由于长期和罗马帝国接触，西哥特人已经吸收了罗马文化，并继续和西班牙-罗马人保持联系。西哥特王国信仰基督教，它的语言构成是拉丁语和一部分日耳曼术语的混合。在管理上，它因循了罗马模式。但是王权的延续则沿用了日耳曼的选举传统，这也常常是内部重大冲突的根源。

伊比利亚基督王国的中世纪遗产

王权争斗造成了哥特人的分裂，这对新崛起的穆斯林势力有利，它

现在阿拉伯人横扫整个北非平原。公元 711 年,伍麦耶王朝^①(Umayyad)哈里发组织的敌人越过海峡并决定性地击败了哥特王国最后一任国王罗德里克王(Roderic)。短短几年之内,除了坎塔布连山(Cantabrian Mountains)的北部地区之外,整个伊比利亚半岛都落入了穆斯林之手。但是,穆斯林人控制的一个位于荒芜丘陵上的基督教王国卡斯提尔(Castile)却从来没有富强过,因此,他们更愿意拥有西班牙南部气候温和的肥沃平原,他们把那地称为安达卢斯王国^②(Al-Andalus),即安达卢西亚地区的土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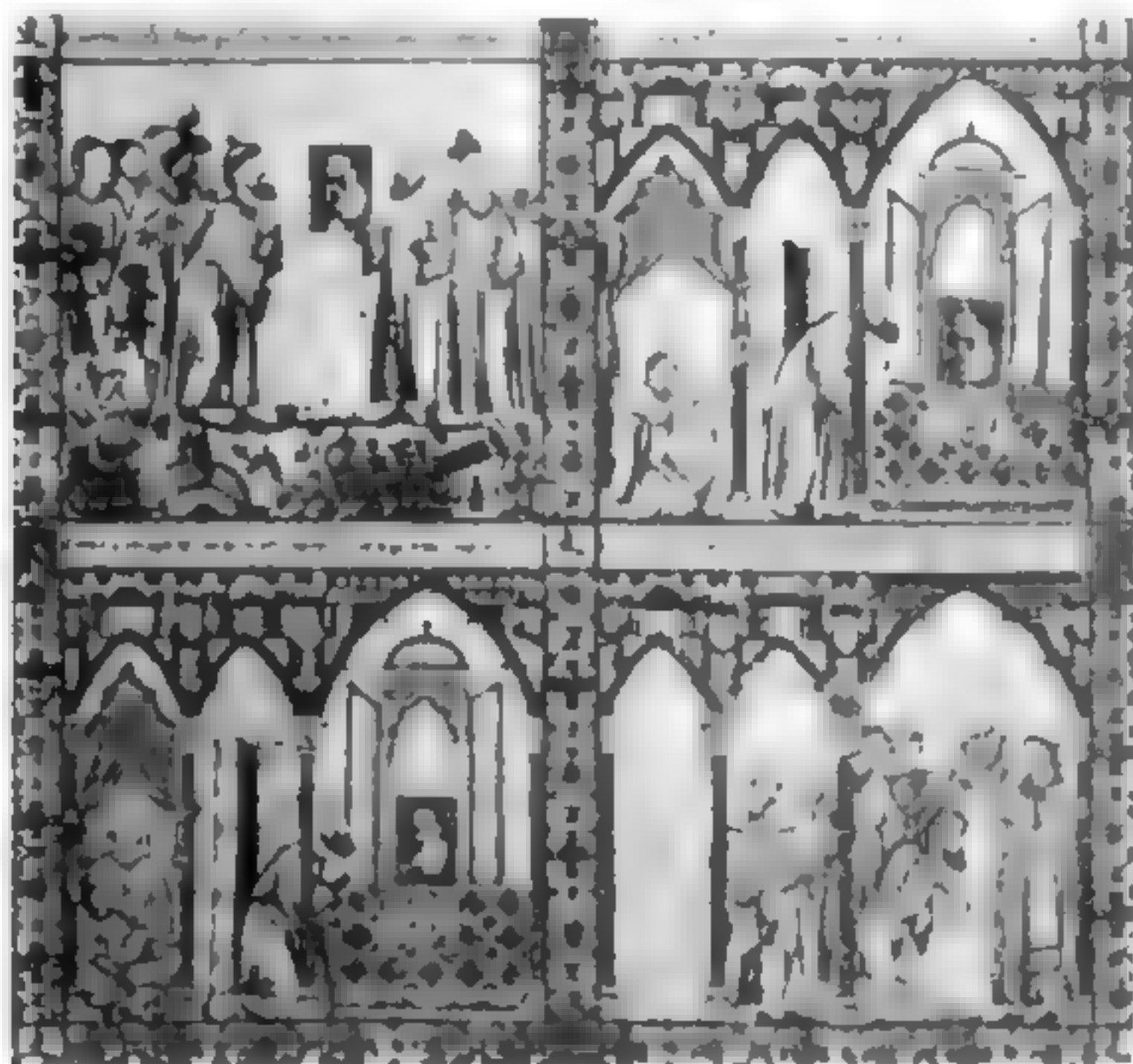
伍麦耶人继承了古代地中海人和亚洲世界积累的文化财富,他们继承了这一遗产,对科学、艺术和文学都作出了他们自己的伟大贡献。伍麦耶王朝的首府设在科尔多瓦(Córdoba),它就把伊比利亚世界变成了知识和财富的胜地,从那里新的知识和观念又涌向基督教的欧洲。农业上收获有新的灌溉技术的引进、抽水设备,以及新的作物如稻、藏红花、棉花、丝绸和柑橘类水果。通过诸如纸和玻璃这些对于基督教世界仍是未知的产品的引进,工业也人为扩展。穆斯林的冶金、纺织和皮革工艺在整个欧洲都是值得称道的。许多穆斯林统治者又是科学知识的保护者;学者国王哈库埃姆二世(Al Haquem II)建造了一座图书馆,据说里面有共计 40 万册藏书。

实际上,伍麦耶的征服者并不坚持要被征服的基督徒改变信仰,而是,他们选择是接受伊斯兰教信仰或者支付特别的人头税。这一相对宽容的穆斯林政策有利于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曾经遭到信仰基督教的西哥特人(Visigoths)严重迫害的犹太人,现在享受着官方的保护并且对医药、哲学和自然科学研究都做出了很大贡献。农民的生存状况也大为改善,因为征服者把西哥特地主的大量土地都分配给了奴隶们,他

^① 伍麦耶王朝: 750 年阿拉伯帝国第二王朝(661—750),其首都为大马士革。——译者注

^② 安达卢西亚: 穆斯林人征服伊比利亚半岛后,穆斯林人不多,新和建筑家,如建筑师和工程师,都来自北非和西西里。安达卢西亚的穆斯林人,在安达卢斯王国的百姓生活是当时最令人羡慕的,他们平时学习科学,数学,天文,写诗,下棋。

们只需要给穆斯林领主支付一定量的产品,剩下的就可以都留给自己。但是几个世纪后,在穆拉比人(the Almoravid)占领这里的时候,这些倾向却出现了逆转;巨大的地产再次出现,税收增加,对犹太人和莫扎勒布人(Mozárabes,基督徒,吸收了阿拉伯语言和习俗)的迫害已经使许多人逃跑到基督教地区。



借助于基督教王国对伊比利亚犹太人的镇压,伊斯兰军队在 8 世纪征服了伊比利亚半岛,并且开创了一段和平共存的时期,甚至直到基督教重新征服之后,他们对西班牙的艺术、建筑、音乐和文化诸方面都留下了但久的多元文化印迹。

38 尽管伍麦耶王朝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但它的统治基础并不牢固。第一,它在扩展哈里发帝国方面的大成功,造成了难以计数的冲突,10 世纪之后,稀缺资源耗尽,帝国扩张减缓。第二,由于帝国内部难以控制的激烈的政治和宗教争端,穆斯林世界分崩离析了。一些穆斯林人讥讽伍麦耶人为褻渎者,因为他们不情愿遵从“神的使者”而渴望王国的中央权力。在伊比利亚半岛,这些内在的分歧通过伍麦耶人和穆拉比人,北非的柏柏尔人(Berbers)之间的冲突而日趋复杂。柏柏尔人转信伊斯兰教不久,却比他们的前辈们更为狂热虔诚。到 11 世纪中期,科尔多瓦的哈里发已经侵占了许多王国,王国彼此之间的战争持续

11世纪这些骚乱使得一些在北部出现的小基督教王国幸存了下来,变身为卡斯蒂利亚王国,最终发起一场普遍抗衡穆斯林人的攻击。到12世纪中期,西班牙王国已经从卡斯蒂利亚中独立出来,并在两个世纪以后获得了其历史性的界线。中部的莱昂(León)和卡斯蒂利亚联合王国奋起发展,东部的阿拉贡(Aragon)王国以穆斯林诸城邦的分裂为代价稳步扩张。

再征服开始时,基督教国王和贵族们只是为了重新获得他们失去的土地和奴隶而进行的斗争;后来它才承担起了宗教战争的任务。9世纪中期在干岛西北发现的据推测是圣詹姆斯(St. James)的墓穴,成为著名的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Santiago de Compostela)的朝圣中心,一时也成了诸基督教王国的战士在再征服和对新世界的征服中,一个很为重要的保护神。但是著名的熙德(Cid)^①的职业生涯却表明,在战争的最初阶段还没有出现宗教狂热。在熙德那个时代,这一理念是真实的,他对领地的忠诚超过了宗教,而且作为萨拉戈萨(Saragossa)和巴伦西亚(Valencia)穆斯林国王的一个封臣,他与穆斯林和基督教的敌人都同样作战。公元1094年,当熙德夺取并统治巴伦西亚的时候,他允许穆斯林人信仰自由并拥有自己的财产,唯一的要求是要缴纳《古兰经》认可的贡赋。

伍麦耶人徒劳地通过号召新转教的、北非宗教狂热的穆拉比人来帮助他们,以寻求阻止基督徒的进攻。1212年,基督徒在安达卢西亚的拉斯·纳瓦斯·德托洛萨(Las Navas de Tolosa)战胜了庞大的阿尔摩拉维军队,成为再征服标志性的转折点。卡斯蒂利亚的费迪南德三世(Ferdinand III),穆斯林伊比利亚的重要人物,于1236年夺取科尔多瓦。1248年塞维利亚(Seville)投降,费迪南德三世控制了瓜达尔基维尔河(Guadalquivir river)河口并和海上建立了联系。到1252年费迪南德去世的时候,穆斯林的地盘已经回缩到格拉纳达(Granada)小王

^① 熙德,原名罗德里戈·迪亚兹·德维瓦尔,卡斯蒂利亚贵族,巴伦西亚的征服者和城主,西班牙民族英雄。——编者注

国。格拉纳达所处的位置非常有利,陡峭的山脉和难以逾越的峡谷保护了它,加上基督徒阵营内部出现的分歧,使得格拉纳达赢得了两个多世纪的独立生活。

卡斯蒂利亚

尽管 20 世纪弗兰西斯科·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统治下的西班牙法西斯主义者们通过认同他们 15 世纪祖先的历史成就,寻求他们同时代征服的合法化,但是直到相对比较晚的时候才有统一的称为西班牙的城邦国家出现在伊比利亚半岛。之前的西班牙是由许多独立或半独立的基督教王国构成的,它们彼此之间以及和它们的穆斯林占领者之间都有残酷的冲突,首先是争夺对地中海世界的控制,接着是海上控制权的斗争。卡斯蒂利亚,这个所有王国中最大最强的王国,在再征服中担负着领导任务。伟大的运动在卡斯蒂利亚人的性格中留下了坚忍的印记。数世纪反对穆斯林人统治的斗争使战争几乎成为卡斯蒂利亚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并且产生了大批的武士—贵族阶层,他们看不起体力劳动。在卡斯蒂利亚人的价值观里,军队的勇敢、坚忍和荣誉这些美德是最高级别的,无论贵族还是平民都接受这些价值观。劫掠、土地和其他回报的诱惑吸引了许多农民和手工业者加入到再征服的队伍中,而且通过他们把尚武精神和贵族的理念散布到整个卡斯蒂利亚社会。再征服中那些关于宗教战争的精神理念,尤其在其后期,更增添了宗教至上与宗教使命的强烈意味。

再征服帮助形成了卡斯蒂利亚的经济特征。随着穆斯林人的溃败,辽阔的土地成为王权的资产。国王们把土地的最大份额分配给贵族、教会和卡拉特拉瓦(Calatrava)、阿尔坎塔拉(Alcantara)和圣地亚哥(Santiago)的三个军队阶层。结果是,卡斯蒂利亚,特别是从托莱多(Toledo)南部开始的地区(新卡斯蒂利亚),成为拥有巨大地产且其贵族非常富有和强大的地区。

再征服也保证了在卡斯蒂利亚羊养殖业优先于农业。在战争、袭击和反袭击频繁发生的年代,可以移动的羊比土地在财产构成中显得

安全也更有价值。随着基督徒战线的推进,更多新的地区——经常由于太干旱只能用于简单农业,向养羊产业开放了。大约 1300 年,人从北方引进了美利奴羊,这正好符合了北欧迅速增加的对羊毛的需求,给卡斯蒂利亚的羊养殖业带来了明显的推动。到 13 世纪后期,羊所有者已经建立了他们自己的强大组织——梅斯塔(the Mesta)。作为对王权大力支持的回报,这个组织得到了许多特权,包括有权穿过卡斯特利亚大批迁移绵羊,从夏季的北方牧场到冬季的南方牧场,结果经常穿过经过的农田和森林。大贵族们控制着养羊产业和农业。他们的地租和赁利,从羊毛销售中得到的利润支持了他们在经济、社会 and 军事上的权力,甚至已经威胁到了国王的地位。

卡斯蒂利亚人的城镇是这种权力的唯一抗衡力。再征服的推进和对其征服地区主要促进了城市的发展。为了吸引新的定居者到被征服的地区,国王给了这些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城镇很大的特权(自由的特许状)。这些特许状赋予这些城镇行政自治和大量土地,把它们的管辖权扩展到周围的乡下。这些城镇由选举出来的被称为市长(alcaldes)的司法官员以及城镇议会成员(市议员,regidores)共同管理。13 世纪和 14 世纪的经济扩张和羊毛贸易的增长首先使卡斯蒂利亚人的城镇成为繁华的工业和商业中心。城镇的富有使它们在称为国会(Cortes)的咨询机构或议会的会议中显得特别重要。因为贵族和神职人员免于纳税,国王必须从城镇的代表那里提取资金,这些人以同意纳税为条件,要求对城镇损失的特别补偿,以前这是以为了公正而请愿的形式呈现的。用历史学家约瑟夫·F. 奥卡拉汉(Joseph F. O'Callaghan)的话来说,“除非国王或摄政者许诺公正的统治,否则他们就别想指望国会会盲目地同意征税。”

卡斯蒂利亚人的城镇曾经辉煌一时,但最终的结论是,中间阶层一直又小又弱,它处于大贵族们巨大权力的阴影之下。由于意识到自己的弱小,城镇居民联合他们自己的力量组成了民团(hermandades),即军事社团,以抵抗贵族、有时是国王的侵犯。但是城镇的姿态根本上还是防御性的。如果没有国王的帮助,他们就毫无机会在上层社会表达

自己的意愿。

随着穆斯林势力的衰落,大贵族们从与异教徒的战斗转向国内、城镇以及彼此之间的斗争。在 11 和 15 世纪期间,贵族在国王的争斗中占了上风,他们篡夺王室土地和收入,而且常常把国王变成他们的人质。王权的衰落在亨利四世(Henry IV, 1454 - 1474 年在位)统治时达到了最低点,那时中央政府和公共秩序几乎已经完全崩溃。然而,在这种无政府状态下面,经济生活的持续发展已经激起了对于能够维持和平和秩序的强有力王权的要求在不断增强。

阿拉贡

40

更小、人口更少的阿拉贡(Aragón)王国中世纪时的历史在许多重要的方面都不同于卡斯蒂利亚王国。阿拉贡的国王统治着三个城邦——阿拉贡、巴伦西亚和加泰隆尼亚(Catalonia),每一个城邦都可以看做是一个独立的王国(reino),每一个王国都有它自己的国会。在这三个城邦中阿拉贡是最贫穷落后的。巴伦西亚是大量穆斯林农民的家乡,他们服从基督教地主贵族的统治。加泰隆尼亚人在联盟中占支配地位,它的大城市巴塞罗那(Barcelona)已经把它的王权和大部分收益给了阿拉贡。繁荣的工业和强大的舰队已经使巴塞罗那成为以纺织品出口为基础的帝国商业中心。加泰隆尼亚人的军队已经为阿拉贡王室赢得了撒丁岛(Sardinia)和西西里岛(Sicily)。因此,在阿拉贡,统治阶级不是拥有土地的贵族,他们相对贫穷,而是巴塞罗那的商业和工业寡头集团。阿拉贡的宪法制度反映了这个阶层的最高地位,他们拥有加泰隆尼亚国会的立法权并为国会设置专门的监督委员会,以防止任何对权利和主体自由的侵犯。

在 14 和 15 世纪,黑死病的肆虐、加泰隆尼亚农村农业的动荡、商人寡头和普通大众在巴塞罗那的争斗,以及最重要的,传统的加泰隆尼亚市场被热那亚(Genoese)竞争者夺取,使巴塞罗那的繁荣渐渐衰落了。经济上的衰退使加泰隆尼亚的内部斗争更加尖锐化,王室在斗争中站在了普通人众一边。1462 至 1472 年内战的结果,是以对国王约

第五世(John II)有条件的胜利而结束,但是却最终使加泰隆尼亚完全毁灭。阿拉贡在卡斯蒂利亚联合前夕的衰弱确保了卡斯蒂利亚在联合王国中的领导地位。



伊莎贝拉和费迪南德使西班牙成为 15 世纪欧洲最强大的王国。

一系列事件导致了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的联合,这是以 1469 年卡斯蒂利亚国王亨利四世的妹妹伊莎贝拉和阿拉贡国王约翰二世的儿子费迪南德的秘密联姻开始的。这桩婚姻是复杂阴谋的产物,年轻夫妇的个人野心、许多卡斯蒂利亚贵族和他们国王的敌对以及约翰二世想把卡斯蒂利亚增加到他儿子的继承权中的欲望都在其中起着作用。当

1474年亨利四世去世的时候,伊莎贝拉在强有力的卡斯蒂利亚贵族和城镇这一派的支持下宣告她自己为卡斯蒂利亚的女王,并宣布亨利的女儿胡安娜(Juana)是非法的,这一声明导致了和葡萄牙的安娜的支持者的王制战争。到1479年,战争以伊莎贝拉的胜利结束。约翰二世已经去世,费迪南德继承了他的统治。费迪南德和伊莎贝拉现在成为了阿拉贡和卡斯蒂利亚的联合统治者,但是他们婚姻合约的条款中详细地规定了在卡斯蒂利亚的管理中费迪南德要服从伊莎贝拉,但在阿拉贡的管理中却把伊莎贝拉排除在外。然而,在卡斯蒂利亚领导下与卡斯蒂利亚与阿拉贡的联合,显示出一个根本性的优势,此后王便进入了一个国内发展、对外帝国扩张的了不起的历史时期。

费迪南德和伊莎贝拉：天主教君主

恢复秩序

年轻的君主们面对的紧迫任务是在他们各自统治的王国内恢复和平和秩序。卡斯蒂利亚一直麻烦不断的是封地领主和决定要结束他们合法奴役的奴隶之间的争斗。费迪南德介入此事并提出了一个相对有利于农民的解决方案。他在瓜达卢佩(Guadalupe)的统治(1486)结束了卡斯蒂利亚的农奴制,并使5万农民都成为了小土地所有者。然而,在改革阿拉贡旧的宪法制度上,他没有做任何努力,旧的宪法给王权设定了严格的限制。结果,尽管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建立了新的联合,但是他们依然沿着政治纷争的道路前行。

恢复秩序的任务在卡斯蒂利亚更为巨大。亨利四世时的无政府状态已经把城市变成了战场,把部分农村变成了沙漠。为了铲除盗贼和封地的暴力,伊莎贝拉首先依赖的是城镇和中间阶层的 support。马德里加尔(Madrígal)的科尔特斯(Cortes)(1476)在王权和城镇之间形成了牢固的联盟以平息骚乱。他们的工具是神圣兄弟会(Santa Hermandad),一种有薪酬的治安力量,主要由城镇的男性构成,但是由王宫直接控制。这一力量的效率、严厉和通过法庭实行的迅速惩罚逐

渐在卡斯蒂利亚恢复了和平。

但是伊莎贝拉的计划远远超出了这一直接目标。她提出中世纪所有卡斯蒂利亚的大机构——贵族、教会和城镇都要服从王室意志。托莱多(Toledo)的科尔特斯在1480年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削减了大公(阿方索)的权力。收权行动迫使他们归还了他们自1464年以来攫取的公共国库的王室收入。另一个改革重组了卡斯蒂利亚议会——王国的大政机构。这一改革把控制旧的王室议会的大公架空为虚职,把行政责任和权力授予了律法官(letrados,通常经过法律训练的官吏),他们是从低等贵族、中间阶层和皈依的犹太人(conversos)中选拔出来的。

国王有削弱贵族权力目的是通过建立等级分明的法官和书记官的阶层,这些人是从地方行政官(corregidor,负责城市事务的国会议员)中提拔起来的,从卡斯蒂利亚的最高法庭(cancillerías)到卡斯蒂利亚议会都有,这两者都是国家最高法院和最高行政实体。国王在事实上拥有最高司法权,包括介入贵族领地管辖权的权力。然而,这些努力的支持者成功要求国王要依靠它的强权而不是其凝聚力,但王权不能保证国内边界的安全或者维持其对不顺从民众的权威。历史学家杰克·欧文斯(Jack Owens)的观点让人印象深刻,他认为当贵族和农民相信真正的司法制度能带来公平裁决的时候,他们都同样只是认识到了国王“王权的绝对权威”。

国王利用巨大财富使他们成为卡斯蒂利亚城中名副其实的城邦,因此国王决定通过加强控制来削弱他们的权力。当1476年圣地亚哥大公职位空缺的时候,伊莎贝拉在政要的名单出来之前亲自赶到那里,并坚持把这一职位授予她丈夫;那些人温顺地同意了。当卡拉特拉瓦(Calatrava)和阿方坎塔拉(Alcantara)大公职位空下来的时候,他们也当然地把职位授予了费迪南德。通过这些行动,王室获得了新的收益和资助。

城镇在反对无政府状态的斗争中为主权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两个世纪之后,他们的民主传统就已经退化,许多地方都沦落到自私的

寡头统治者的统治之下。一些地方,如基维利亚已经成为贵族各派的战场。这些混乱给了伊莎贝拉接口,使她重新恢复她的祖先先前使用过的政策,即通过把地方行政官们引进城镇而介入市政事务。这些官员把行政和司法功能联合起来,并且逐步夺取了市长和市议会议员的职责。费迪南德和伊莎贝拉也开始转回他们的祖先实施过的另一个活动:拥有国王委任状的市长和市镇议员官员要由国王任免,而不是由居民选举出来。贵族或教会管辖的城镇(Villas de Señorio)许可了传统体制下的功能,只在必要的时候,王权才有权干涉。

城镇的顺从是伴随着市议会(Cortes)重要性的衰退而出现的。这种衰退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国王税收的大幅度提高,比如销售税(alcabala),它使得国王免于过度依赖卡斯蒂利亚人的供给。国王对城镇管理的增强也降低了他们在市议会的代表抵抗王权要求的可塑性。君主只有在需要金钱的时候才召集卡斯蒂利亚的议会,但是国王在免俗者和平占优势的时候,国王和王后就忽略了他们。

宗教和经济改革

当统治者正在走向专制权力的顶峰时,他们毫不犹豫地向教会挑战。在这种压力下,这一时期软弱的教皇出让了他的实际任免权(patronato real,在卡斯蒂利亚国内任命所有教会中主要的有体圣职的权力)。尽管不像英国的亨利三世那样,费迪南德和伊莎贝拉从来没有通过从交给卡斯蒂利亚教会的什一税和出售赎罪券所得的所有款项中提取三分之一,而夺走教会大量土地的所有权,但他们确实也榨取了教会的一部分财富。

为了确保教会的忠诚并且使之成为王权政策的一个有效工具,君主们必须清理一下它滥用的权力,如兼任圣职、旷工和纳妾。虔诚的伊莎贝拉在对教会教士(这些人属于修道会或教区)中持异见的那部分进行改革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强有力的联盟组织。这一群体自称为严守教规的教徒(Observants),反对同行的俗气,提出回归到严格遵守教会原始教规的纯洁性。改革斗争是在方济各会修士希梅内斯·德西斯内

西斯内罗斯(Jimenez de Cisneros)的领导下从方济各会内部开始的,希梅内斯·德西斯内罗斯是伊莎贝拉1495年任命的托莱多枢机主教。后来又召集到其他修道士。这一改革越来越激烈,以至于400个安达卢西穆斯林,宁愿死亡,也不愿接受新的法则。斗争以严守信仰的教徒和更虔诚的兄弟们而结束。

伊莎贝拉对世俗教士(或非修道院教士)的改革几乎没有成功,但也有一些进步。大教会事务不再由贵族垄断。伊莎贝拉宁愿从低级别修道士中选拔出高级教士,对候选人的道德和学识是很看重的。伊莎贝拉的分教改革对于新世界有特殊意义:它确保了信仰通过教士们精英传给印第安人,这些教士在他们的热情、人性和学识上通常都是卓越的。

君主也意识到了经济改革的需要。他们试图通过一些保护措施保护卡斯蒂利亚的工业。他们禁止出口金银,偶尔禁止进口布料以免和当地的产品形成竞争,还鼓励意大利和佛兰德艺术家在卡斯蒂利亚定居。他们颁布了航海法令,给自己域邦的运输船以优先性,并且资助贸易。他们废除了自从1461年以来就在卡斯蒂利亚建立的所有城邦公司的通行费,并且努力统一度量衡。在伊莎贝拉前辈统治的时候,已经发生了严重的货币贬值。为了重新恢复货币信用,伊莎贝拉废除了所有的私人造币厂,铸造了自己的钱币,使它们和外邦的货币等值。所有这些措施都对经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而且持续加速了王室收入的增加,从1474年的885 600里亚尔(reales)到1504年的26 283 334里亚尔。

尽管君主看起来基本上是务实的,但是他们对知识和艺术也同样有广泛的兴趣。他们把意大利的人文学者如亚历山德罗·杰拉丁尔(Alessandro Geraldini)、卢西奥·马里尼奥·尔奇西库洛(Lucio Marineo Siculo)和彼得(Peter Martyr de Anghera)都召集到城邦教导他们的孩子和卡斯蒂利亚王室的后代。具有启蒙思想的高级教士如枢机主教希梅内斯·德西斯内罗斯成立了能和著名的萨拉曼卡(Salamanca)大学相媲美的新学校和大学。卡斯蒂利亚自身也出现了

一些著名的新知识从业者,如语言学家、历史学家和词典编纂者安东尼奥·德内布里加(Antonio de Nebrija),他在1492年出版并献给伊莎贝拉一本卡斯蒂利亚的语法书——所有现代欧洲语言的第一部语法书。卡斯蒂利亚语言和生活的生命力体现在现实主义杰作:费尔南多·德罗哈斯(Fernando de Rojas)写的小说《塞莱斯蒂娜》(*La Celestina*)(1499)中。

外交政策

国内和平的重新恢复使君主把他们的注意力转移到外交政策问题上。对于卡斯蒂利亚的伊莎贝拉而言,对格拉纳达的征服首先提上了议事日程。当君主要求格拉纳达统治者缴纳他祖先也支付过的贡赋时,卡斯蒂利亚还没有稳固地恢复其权威。阿卜杜尔·哈桑(Abdul Hassan)回答说,他的铸币厂现在是用钢铁而不是用黄金铸币。格拉纳达王国的富有及其山区地形使穆拉比人(the Almoravids)维持了千年。但是卡斯蒂利亚优势的军力,特别是强大的新式炮兵最后终于打破了穆斯林人的抵抗。1492年1月,格拉纳达向费迪南德和伊莎贝拉投降,教皇亚历山大六世授予他们“天主教君主”的称号以纪念他们虔诚的圣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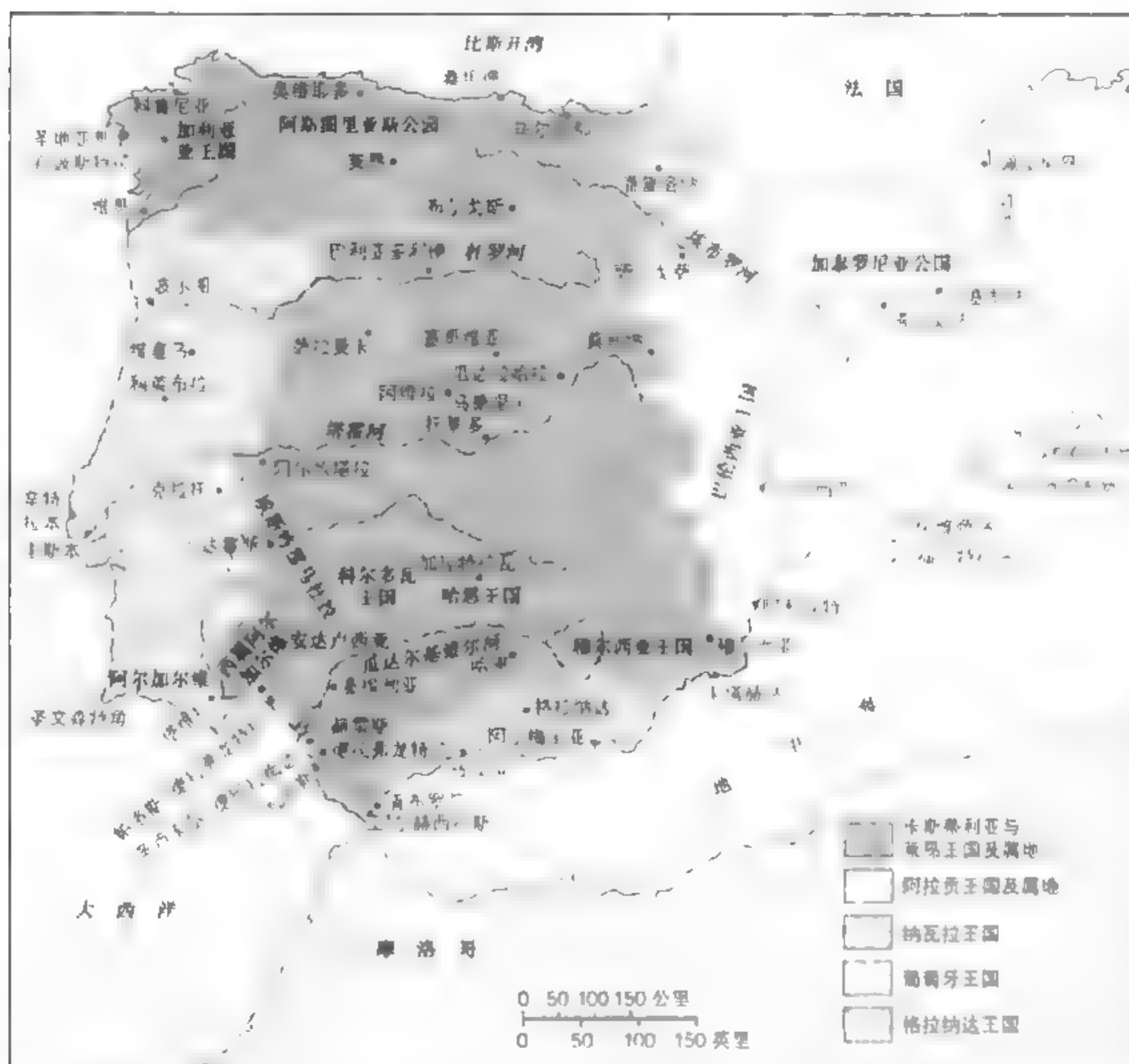
然而当伊莎贝拉的心在征服格拉纳达中安定下来时,费迪南德继承了阿拉贡的地中海帝国。传统上,法国和阿拉贡是敌对的,他于是把目光向东转向了与阿拉贡交恶的法国和意大利的边界地区。他在1504年伊莎贝拉死后已经实现了他的大部分目标。战争和外交的灵活运用,使费迪南德重新收回了在以前统治者手中被法国夺去的两个阿拉贡地区;使那不勒斯(Naples)王国并入阿拉贡帝国;并和法国一起策划围攻意大利。在费迪南德的意大利战争中,他的指挥官,特别是“大将军”贡萨洛·德科尔多瓦(Gonzalo de Córdoba)创建的一种新型军队火力装备引人注目,进攻和防守的武器都很强大。这一新兴系统首先在意大利战争中实验,确立了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在欧洲的军事优势。在他去世前,费迪南德以取得纳瓦拉(Navarre,1512年)而圆满

他结束了他的征服,纳瓦拉也是他的联合王国防御法国的牢固壁垒。虽然他的王权继承者以官方名义继续统治着卡斯蒂利亚、阿拉贡、纳瓦拉等王国,但是他们那些后来逐渐增加的欧洲对手还是用它的罗马名“Hispania”或西班牙称呼这一出现在伊比利亚半岛的新政权。

天主教君主为他们的人民做了大量的事。他们驯服傲慢的贵族、击败伊斯兰教的军队,并在追求共同目标的过程中组建起了封建的基督教王权。他们鼓励贸易和工业的增长,并使自己成为令人聪明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他们精明的外交政策使卡斯蒂利亚成为欧洲最高权力时殿之一。同一时期,美洲在卡斯蒂利亚人的支持下被发现,加勒比海成为卡斯蒂利亚的内陆湖,到他们统治结束的时候,这个王国的探险者和科学家已处于发现伟大的墨西哥和秘鲁印第安人帝国的边缘。因此,那些完成了如此成就的君主们成为后代们膜拜的国家偶像和传说的对象,这一点并不奇怪。

费迪南德和伊莎贝拉政策的再评价

对于近代史学家而言,天主教君主的名声已经失去了些许光彩。这些史学家指责费迪南德和伊莎贝拉的错误政策抵消了他们统治的许多令人赞赏。其中一个错误显然是偏倚贵族的经济和社会利益。如果贵族在费迪南德和伊莎贝拉统治时失去了他们的政治权力,经济领域就不会发生那样的事情。在他们的统治时期集中在贵族手中的土地数量增加了。1480年议会强迫贵族交出他们大约一半的土地和收益,这是他们自1164年以来从国王手中篡夺的,但是贵族又得到了明确的授权,可以拥有在那一日期之前得到的庞大财产。从对穆斯林人的再征服中得到的地盘,其中最大份额分配给显贵的政策也有利于土地垄断的增长。而且,在格纳拉达战争之后,大贵族运用他们的私人军队和增强的政治影响力以扩展他们的领地和加强领主的控制。这种“贵族的进攻”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来自王权的抵抗。结果,到1500年时,大约占人口2%或3%的人口拥有全部土地的95%。



克里斯多夫·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时期的西班牙

这种土地垄断使绝大多数卡斯蒂利亚农民沦为背负着沉重负担的佃农,要缴纳租金、领地费、什一税和其他税。虽然到1180年时,奴隶身份在严格的意义上显然已经从卡斯蒂利亚的大部分地区消失,而且卡斯蒂利亚的农民从法律上讲也可以离开他们的村庄自由迁移,但是贵族一直实际上拥有所有的土地,因此农民的“自由”,正如西班牙历史学家海梅·维桑·比维斯(Jaime Vicens Vives)指出的那样,是“死于饥饿”的自由。

有利于养殖羊而不是农业的汇率政策同样伤害了波斯尼亚的长远经济利益。如同他们的祖先一样,君主们也受到税收、山羊养殖者缴纳的出口税以及购买他们的羊毛的黄金流量的影响。结果是,他们就

授予了羊养殖协会,即梅斯塔(the Mesta)更多的特权。这些惠赐的巅峰是 1501 年的法令,这一法令规定那些曾经放牧过迁移羊群的所有土地都永久保留为牧场。这一措施使得安达卢西亚和埃斯特雷马杜拉(Estremadura)的大片辽阔土地都不能用于农业。牧羊者被授予特权可以砍伐树木用做燃料、筑篱笆或者开垦牧场,这些都使森林砍伐和土壤侵蚀更为严重。而且,羊群从他们的土地上合法迁移对庄稼和土壤造成了更大的破坏。在人口增长的时代,这些政策和措施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严重的粮食短缺。长期的粮食短缺在 16 世纪早期发展到顶峰成为毁灭性的粮食危机。

近代历史学家也质疑传统的观点,即在天主教君主统治下西班牙工业发达程度惊人。这些历史学家认为,那一时期仅有的真正工业是巴斯克(Basque)省的手织工业和卡斯蒂利亚中心区的织布业,它们从美洲的贸易和美洲市场的开放中获得了强有力的推动力。工业繁荣的成果一直持续到 16 世纪中期后不久。但是工业产品从来没有达到英国、低地国家、意大利的水平。可怜贫穷的农民占人口的 80%,极大地限制了工业商品所需的消费市场。资金和熟练劳动力的缺乏也遏制了工业的扩展。

工业发展的其他障碍还包括使用骡车和牛车运输穿过崎岖的半岛而巨额成本,以及持续把基督教王国分离的海关阻碍。君主的那些家丁作风措施并无益于工业。在费迪南德的影响下,基于严格的加泰罗尼亚模式的行会体系被引进到卡斯蒂利亚的城镇。在这个方面,君主对卡斯蒂利亚工业并没有做出贡献,因为行会组织牢牢地束缚住了工业发展,而这时正是发现美洲,开垦美洲殖民地以保证王国富有的时候。美洲的黄金和白银大量流入以及经济掠夺的结果都对卡斯蒂利亚的工业形成了挑战,使得它要转换技术、降低成本、提高产出和质量,从而确立了它在欧洲经济和政治上的霸权地位。

君主们政策中最粗暴的是他们反犹太人的措施。在中世纪早期,犹太人在卡斯蒂利亚成为举足轻重的富裕群体。到 13 世纪末的时候,相对宽容的精神盛行在诸基督教王国中。犹太人、基督徒和穆斯林教徒的关系密切亲如一家以致激起了教会的抗议。到 14 世纪,他们的关

系开始恶化。在教士的努力下,产生了对犹太人的歧视和恶趣的憎恨,而犹太人的高利贷和征税这样的经济活动,对农民和其他群体也造成了更深的苦难,对这个过程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反犹太主义的出现导致国王采取压制措施以及袭击犹太人社区的浪潮。许多犹太人为了活命,接受了洗礼,最终形成了数量巨大的皈依者层(converto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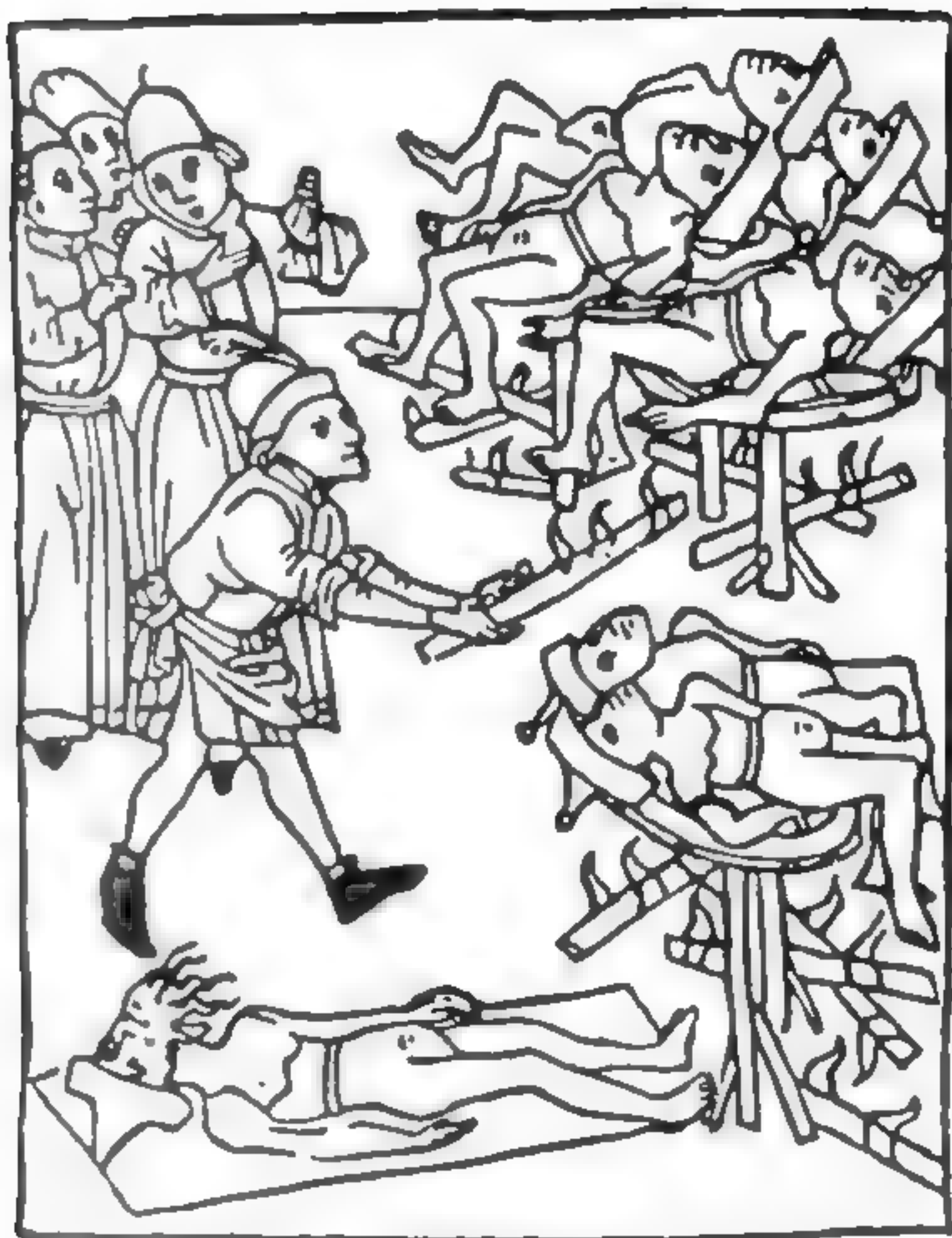
46

皈依者不久就作为税收包收人(tax farmers)、宫廷官员、律师和律师而获得了显著成功和威望。富有、不为封建传统所束缚、求知欲和强烈的野心,这些都使皈依者引起了不仅农民而且教会和许多贵族和王民的敌意。无论是否为异教徒,他们都对其土地、世袭地位和信奉天主教的封建秩序造成了威胁。他们引起的嫉妒和敌意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尽管君主周围环绕着犹太人和皈依者顾问,其中一个人(费迪南德)的血管中还有犹太人的血,但最后还是建立了宗教裁判所并将犹太人和皈依者逐出他们的王国。当王权制服了贵族和城邦以后,国王获得了更大的新的收益来源的时候,它对犹太人和皈依者的依赖就减弱了。犹太人和皈依者的牺牲使专制王权、教会和贵族之间的联盟更为牢固。

皈依者首先嗅到了宗教迫害气息是1478年在卡斯蒂利亚设立宗教裁判所。这个裁判所的任务是侦察、审理和惩罚异教徒,但主要目标尤其针对皈依者,许多人由于坚持信仰犹太教而被秘密监视。宗教裁判所活动的结果是,大约有2000名皈依者被烧死在大刑柱上;1002万人逃到国外。当一些卡斯蒂利亚的城镇在请愿书中提出反对设立宗教裁判所时,这一清洗已经造成皈依者和他们资产的大量外逃而对经济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

在花费巨大的格拉纳达战争期间,犹太人获得了12%的喘息时间,因为他们是王室财政的最大支持者之一。然而格拉纳达的投降又注定了他们的命运。稍作犹豫之后,君主就同反犹太主义的势力屈服了,1492年3月30日,他签署了法令,犹太人只能选择皈依或被驱逐。

16世纪末大量皈依者的破坏或逃走以及驱逐犹太人肯定在卡斯蒂利亚经济上呈现出的是—幅荒凉的画面。对皈依者的清洗也从卡斯蒂利亚人的生活中去除了非常重要的商业和艺术要素,这些人聚集在英国和



王与他们不但秘密监视犹太人的宗教和文化传统的时候，犹太人也公开地皈依基督教以避免遭受在这幅117年木版画上描述的迫害和火刑，这表明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在格拉纳达起作用了。

白兰，为工业革命奠定了基础。皈依的工匠业者的外逃给当地的手工业以重创，而且直接影响了王室的这条法令(1484)，即邀请外国手工业者到卡斯蒂利亚定居并免除10年的赋税。

君主的反犹政策也对科学和思想造成了普遍伤害。宗教裁判所破坏了自由质疑和讨论的精神，而那个时候文艺复兴正在给欧洲所有的知识领域以巨大的推动力。君主奠定的伟大帝国的基础只是暂时的，而且他要为它过早的衰退承担更大的责任。

47

哈布斯堡时代：胜利和悲剧

1501年伊莎贝拉去世使整个伊比利亚半岛除了葡萄牙之外都处于费迪南德的统治之下。伊莎贝拉的遗嘱让她的女儿胡安娜作为继

承者,万一胡安娜被证明不能胜任,作为预案,应当由费迪南德辅佐。因为胡安娜逐渐变得精神不健全而不适合统治,费迪南德便成为摄政者。胡安娜的丈夫,勃艮第英俊的菲利普在许多卡斯蒂利亚贵族的支持下,挑战费迪南德统治卡斯蒂利亚的权力;但是菲利普 15 6 年的突然去世,使费迪南德成为无可争议的王国主人。费迪南德自己于 1516 年去世,卡斯蒂利亚的王位就由他的长孙查尔斯,胡安娜和菲利普的长子继承。通过他的母系的祖母,查尔斯继承了卡斯蒂利亚、那不勒斯和西西里以及卡斯蒂利亚拥有的非洲和美洲。通过他父亲的外父,勃艮第的玛丽和神圣罗马帝国的马克西米安(Maximilian),他继承了勃艮第名下的领土和日耳曼哈布斯堡名下的财产。

查尔斯的统治

天主教的君主无论他们有什么过失,他们都是试图要加重王国的经济发展和其他各部分的联合;审慎的政策也限制了他们的野心。他们小心翼翼地提出专制主权,尊重敏感的民众和与他们对立的当地传统。

一个具有下巴向前突出特征的哈布斯堡严肃的年轻人查尔斯(Charles)在弗兰德斯(Flanders)出生和长大而且不会说西班牙语。成长在勃艮第的王宫中、浸染在上权专制主义的精神中,查尔斯却有不同的王权概念。当他一到达卡斯蒂利亚,就用他傲慢的举止和他的弗兰德斯朝臣的贪婪疏远了他的下属,他在所有重要的位置上都安排了他的弗兰德斯朝臣。他试图让卡斯蒂利亚人出钱为他作为他祖父马克西米安的继承者参加神圣罗马帝国的选举,这招致了更大的憎恨。他通过巨额花费满足了野心,但这也使他深陷德国福格尔(Fugger)银行的债务泥潭,查尔斯匆匆赶赴德国。

对卡斯蒂利亚人而言,选举似乎意味着国王缺席和更重的税收负担。在 1520 至 1521 年间,人民的愤怒引爆了卡斯蒂利亚城镇或村社的叛乱。村社社员(Comuneros)的叛乱已经被称为欧洲的第一次无产阶级革命,但是它开始时根本上是保守运动。反叛者要求查尔斯返回

卡斯蒂利亚并且在那里定居,结束在国外消耗金钱,并且不能再有外国人在本国任职。许多贵族在这一阶段支持叛乱,尽管那些大公们依然保持中立,支取息。但是革命的领导权不久就落入了更加激进的人手中。同时,在巴伦西亚也发生了手工业者和中间阶层反对大地主的叛乱。作为这些叛乱的结果是,村社社员运动几乎完全失去了贵族的支

持。1521年1月,村社社员军队遭到了完全的溃败,叛乱也开始解体。1522年7月,查理斯在1000人的德国军队的保护下回到了卡斯蒂利亚。卡斯蒂利亚人民试图挽回政治倒退,以阻止由天主教君主开始的大集权和专制主义政策的最后努力失败了。

至少有一段时期,查尔斯五世在新世界和旧世界的令人炫目的成

就将卡斯蒂利亚人融入了新的历史进程之中。他们从祝科尔特斯(Cortes)和皮萨罗(Pizarro)的征服,以及他们战无不胜的步兵在欧洲的胜利。他们梦想着传说中的黄金国(El Dorados)、世界帝国以及世界教会。诗人埃尔南多·德阿库纳(Hernando de Acuna)表达了对王国的赞扬:

大地上只有一个羊圈、一个牧羊人……
一个君主、一个帝国和一把剑。

查尔斯的统治以战争为主——和法国的战争、反对德国新教领袖的战争、和土耳其的战争,甚至和教皇的战争,因为他的扩张主义计划威胁到了教皇把持着的意大利的核心。实际上,这些战争中只有一个严重地

与王国的利益有关:和土耳其帝国的战争,因为后者逐渐扩张的海上势力危及到阿拉贡在意大利和西西里的资产,甚至威胁攻击王国的沿海地区。然而查尔斯从新教问题和与法国的战争中吸取了教训,在这次斗争中只寻求反对异教徒而不坚持其他;最后就沦落到只是维持现状。

卡斯蒂利亚军队在陆地上和海上的伟大胜利几乎没有实质性的结果,因为查尔斯卷入了太多的事务中,以致他不能充分利用他的成功。1556年查尔斯宣布把王位让给他的儿子菲利普。查尔斯在他的所有

主要的目标上都失败了。新教异教徒仍活跃在北方。而且其人在北非稳步扩展,他们的海盗船游弋在地中海。查尔斯让菲利普继承其帝国王位的计划也在德国王了、新教和大主教以及查尔斯自己,兄弟费迪南德的反对下流产了,因为他弟弟想让他自己这一系继承神圣罗马帝国的头衔。查尔斯的其他梦想,如通过菲利普和玛丽女王(Mary Tudor)联姻而把英国并入帝国也随着1558年玛丽的女王而告破灭。

与此同时,平民在帝国的发展中由于债务和赋税的重重压榨而痛苦地呻吟着,因为卡斯蒂利亚承担了大部分负担。帝国和意大利的大商人和银行家用王室的收益力担保贷款的那部分不断增长,夺走了卡斯蒂利亚经济的大部分。福格尔家族(the Fuggers)接收了军队供应、地产管理和阿尔马登(Almaden)汞矿的开发。他们的对手韦尔塞家族(the Welsers)控制着加利西亚的矿产,并且接受了美洲的麦内玛拉作为他们的封地,那里的居民遭到了他们的野蛮剥削。为了给他的幻想的国外企业找到资金,查尔斯采取了非同寻常的措施:他从卡斯蒂利亚的科尔特斯和阿拉贡抽取的赋税越来越大,课以数倍的赋税,并且把美洲带来的钱款掠为私有,用债券(juros)补偿受损失者。当1556年他的儿子菲利普登基的时候,王国已经破产。

菲利普二世的统治和残存的哈布斯王朝

菲利普(1556—1598年在位)的统治在所有重要的方面都延续着其父亲的政策,一般而言,也得到了同样的结果。西班牙在军事上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这并没有使菲利普摆脱债务危机,或者因为一些新危机而把他的注意力转移到其他方面。菲利普希望通过离间胡格诺教徒和天主教教徒从而控制法国的愿望也遭受挫折。当纳瓦拉(Navarre)的新教徒亨利进入天主教教堂的时候,这一举动已经把法国在亨利身后联合了起来,他迫使菲利普和他签订了《韦尔文合约》(the Peace of Vervins)。和土耳其的战争在海上取得了巨大的勒班陀(Lepanto)胜利(1571),这一胜利冲破了土耳其的海上防线,但是当菲利普结束其统治的时候,土耳其人依然控制着大部分北非。在繁荣的荷兰,他的帝国

最富饶的珠宝产地,菲利普的宗教压迫和专制主义激起的反抗持续整个统治期,而且使西班牙的国库几乎耗尽。和英国战争的结束使新教的伊丽莎白登上王位并暗地支持荷兰叛乱,以及英国的海盗船和走私船侵占美洲水域。

西班牙无敌舰队^①在 1588 年的溃败给了帝国的自信重重一击,而且事实上也确定了菲利普反对北方异教徒的宗教战争的注定要失败的命运。菲利普在另一件事情,即吞并葡萄牙王国(1580 年)上的胜利,大大增加了西班牙的海上力量,使得在反对北方新教的斗争中可以利用长长的大西洋海岸。但是菲利普并没有抓住这些战略机遇,而且葡萄牙的殖民地居民和船只现在已经成力荷兰和英国水手嘲笑的对象,而且由于在联邦中的不利要求好处,他们的不满也逐渐增加。

1598 年菲利普去世时,给菲利普二世留下的帝国已军力涣散,但仍有强大的军队,足以在疆域内产生震慑和尊重。在他的后继者手中,西班牙进入了迅速衰退期,首先显示出的迹象是在外交和战争领域。1609 年和荷兰休战并默认荷兰独立,这是西班牙力量衰微的早期信号。在著名的罗克鲁瓦(Rocroi)战役中步兵的溃败表明西班牙的军事组织和策略已经落后了,它标志着王国在大陆的军事优势的终结。到了 17 世纪的后半期,西班牙已经沦为防御性国家,而且不得不签署了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这些条约的签署使西班牙失去了荷兰、一部分弗兰德斯、卢森堡和一连串较小的资产。

危机不仅存在于国内而且也蔓延到国外。缔造更多基督教王国的努力使卡斯蒂利亚人承担了部分战争负担,这在卡斯蒂利亚国内产生的不满和抵抗酝酿已久。能干但鲁莽,讨人喜爱的菲利普四世——奥利瓦雷斯(Olivares)伯爵的努力引起了暴风雨,即要在加泰隆尼亚地区驻扎军队,否则这里就要为卡斯蒂利亚的战争努力做出贡献,付出的代价是放弃封地原有的司法权(fueros)^②或特权。1640 年,可怕的叛乱爆发并持续

① Fuero, 西班牙的法律体系的概念,它指一块用于市场、法庭和集会场所的一块开放地。这里是指赋予或得到承认的权力。——译者注

了12年之久,加泰罗尼亚的经济垮掉了。同时,葡萄牙对联合带来的损失大于收入忍无可忍,成功地发动了反对卡斯蒂利亚经济的叛乱,比斯开湾、安达卢西亚、西西里和那不勒斯都发生了暴乱。

经济和社会的衰退

卡斯蒂利亚统治者能力的退化无疑对其政治上的衰退雪上加霜,但根本上还在于帝国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的崩溃。到16世纪50年代时,在代价高昂的对哈布斯堡朝的投机外交政策的沉重压力下,卡斯蒂利亚的经济已经开始崩溃。菲利普二世几次借助于破产来免于支付外国银行的债务。他的后继者没有了菲利普的资源,迫于通货膨胀,大量的金银流失国外,直至国家货币主要是由铜铸造。但是,对王国经济危机的发展造成主要影响的,则是17世纪中期的几十年从美洲得到的钱财大幅锐减。1591至1600年这10年,从美洲殖民地得到的收益大约是13500万比索,但是一个世纪后收益则只有一半,1651至1660年这10年时间减少了1900万比索(关于减少的复杂原因将在第四章讨论)。

到1621年,经济衰退的迹象已经比比皆是。塞维利亚的丝绸和羊毛生产商已经从一个世纪前的1.6万家减少到只有约400家。16世纪时,托莱多成立的羊毛加工厂有50家;到1665年已经只有13家。农业的困境表现在长期的粮食短缺,有时几乎接近饥荒时的状况,随之农民们也大批离开农村。卡斯蒂利亚成为荒无人烟的土地。在1600至1700年期间,它还遭受了人口的绝对减少,从大约800万减少到600万人。接近饥荒的环境使传染病肆虐并日益恶化;1609至1614年间对摩里斯克人^①(Móriscos)或皈依的穆斯林人的驱逐,以及移民到印度都加重了人口的减少。

经济衰退导致王国的手工业者和商人阶层缩小,从而强化了贵族

① 摩里斯克人(Morisco),意思是“像摩尔人一样”的人,是指从穆斯林皈依入天主教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居民。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术语成为贬义词,被用来指那些名义上皈依天主教,但可能暗地里秘密信仰伊斯兰教的人。——译者注

价值观的优势,促进了寄生生活的增长。在17世纪,有理想的年轻人为了追求稳定的生活首先选择去教会和法庭。1626年,卡斯蒂利亚有一个修道院;到世纪末,在600万人口中大约有20万修士和神父。贵族形成了另一个庞大的非生产性阶层。到17世纪末,据统计西班牙的贵族数量已经是法国的4倍,虽然法国的人口要比西班牙多得多。贵族中最显赫的是伯爵、公爵和侯爵,他们坐拥巨大财富手握无上权力。地位最低的贵族是大量的伊达尔哥(hidalgos)、小贵族,他们的单独资产经常是他们的荣耀,而且珍贵的文字专利也证明了他们的地位和他们较之之下的平民(pecheros),如农民、手工业者和市民们的“耻辱”。贵族对劳动的鄙视传染给了所有阶级。流浪的人持续增长;同时农业却缺乏足够的劳动力去耕种土地。

50



迭戈·委拉斯开兹的肖像画《少女的荣耀》(*The Maids of Honor*)是西班牙17世纪学院派的巅峰之作。可以注意到,委拉斯开兹用完全冷漠的方式来处理王室的成员,如站着的女士、矮个子,以其他人为衬托轻松地强化了一个人的高贵或美丽。

文学和艺术的发展

颓废(*Decadencia*)扩展到生活的所有领域,也催生了悲观主义、宿

命论和玩世不恭的情绪。西班牙社会表现出极端的对比：巨富和赤贫，狂热的虔诚和造谣中伤的行径，孤注一掷地努力要复辟昔日往日的荣耀，但君主们有时甚至没有钱付给他们的仆役和支付王室的薪饷。西班牙人生活的矛盾，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对比都刺激了文学的想象力。此时的西班牙在其他方面如此贫乏，只有文学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早在1551年，就有不知名的作者写了第一部流浪汉小说《托马斯河畔的小孩子》，描绘了丑恶的社会现实，里面充满了血腥和流浪汉小说的英雄在冒险经历中接连遇到了一些恶棍、乞丐、吝啬的牧师、饥饿的小贵族(hidalgo)；最后终于实现了他的最高愿望，作为被遣传令员的美差，和为他提供过保护的牧师的情妇结了婚。

流浪汉这一题材的最高峰是《古斯曼·克雷斯皮拉》(1599)，它的调子是忧郁的悲观主义：“所有人都偷窃，所有人都撒谎，……你不会发现有一个人的灵魂是属于人的。”卡斯蒂利亚人的灵魂是分裂的，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冲突，这在米格尔·塞万提斯(Miguel Cervantes de Saavedra)的《堂·吉珂德》(*Don Quijote*, 1605)中获得了普遍意义和象征主义的表达。弗兰西斯科·克维多(Francisco Quevedo, 1580—1615)刻薄的讽刺表达了17世纪许多有识之士绝望的声音，“这里有许多事情，”克维多写道，“似乎存在并且活着，然而他们除了名字和外表，什么都不是。”

与文学相比，戏剧的黄金时代只是模糊地反映了国家危机。洛佩·德维加(Lope de Vega, 1562—1634)的剧本充满了创造力、发人深省的对话以及优美的诗篇；他描述的时气的小贵族、勇敢机智的女英雄和值得尊敬的农民都以一种奇特的对悲惨当下的漠然来呼唤卡斯蒂利亚昔日的优良传统。然而，17世纪后期卡斯蒂利亚的失败主义也反映在卡尔德龙(Calderón de la Barca)(1600—1681)的戏剧中，他强调现实的悲剧性和虚幻特点：“生命是一场梦，我们的梦也是其中的一部分。”

绘画的黄金时期和文学一样，反映了从16世纪早期的自信和赞扬情绪到17世纪末理想破灭的精神。绘画的伟大时代自格列柯(El

Greco, 1541—1616)始,他的作品混合了自然主义、刻意变形,以及传
 统的16世纪中期卡斯蒂利亚忧郁的宗教热情的强烈情绪。然
 而,格列柯的一些肖像画也表现出华丽的现实主义。格列柯的神秘主
 义——迭戈·委拉斯开兹(Diego Velázquez, 1599—1660)的油画作品中
 捕捉到——精妙——光线、色和运动,委拉斯开兹全方位地捕捉了两位西
 班牙王子的生活,表现出王子公主们、矮人和宫廷小丑们同样的

如我们将要在第五章看到的,17世纪的颓废深刻地影响了卡斯
 蒂利亚和它的大片殖民地之间的关系。殖民地宗主国和殖民地之间的
 行政联系一直都是松散的,随着殖民地的自足和自我意识的增强,就
 发生了有利于殖民者的力量平衡的转化——这一变化即使帝国付出最
 大的努力也难以逆转。

可怜的查尔斯二世于1700年的去世使哈布斯堡时代走到了它的
 尽头。即使在多灾多难的火亡之前,也出现了西班牙人口和经济的复兴,
 它的表现是于卡隆尼亚到17世纪70年代的时候已经从大萧条的深
 渊中奇迹地恢复。在世的异邦王朝——波旁王朝对王国所有进步方面
 均支持下,西班牙即开始非同寻常、多方努力的帝国重建。

第三章 美洲的征服

焦点问题：

- 欧洲的什么状况导致了对美洲的征服？
- 征服对美洲土著和欧洲人产生了什么影响？
- 西班牙征服者的动机、心态和社会背景是什么？
- 什么原因造成了少数西班牙人相对轻松地征服了伟大而又人口众多的当地帝国？
- 什么是“被征服者的视界”，与欧洲人和美洲土著人“遇到”的传统解释相比如何？

欧洲和美洲接触的结果导致了寻找通向东方的道路的努力，这将打破埃及和威尼斯在香料和其他亚洲产品的贸易中获利丰厚的垄断地位。他们把为数不多的金银榨取殆尽，这些金银都跑到意大利人和地中海东部的中间商的口袋中，这越来越让西欧的商人和统治者无法忍受。葡萄牙在寻找通向香料之国的水路竞争中起了决定性的领导作用。它在这场竞争中优势明显：长长的大西洋海岸优良的海港，人数众多的渔夫和水手阶层，以及贵族已经明白用贸易和造船的收入能补充内陆的收入不足。葡萄牙在所有的欧洲国家中最先成为统一的民族国家，在一个能干的王朝——阿维斯(Avis)家族的领导下形成了商人

和以高利贷获取个人利益的人的牢固联盟。这让葡萄牙在发现新航路上先走了一步。葡萄牙在阿勒祖巴洛特(Aljubarrota)(1385年)的胜利得到了英国人的支持,结束了一段时间以来,卡斯蒂利亚想通过它的小弟们的努力,给葡萄牙野心勃勃的海上扩张计划输入了力量。

伟大的航行

亨利王子的探险

著名的亨利王子(1394-1460)开启了葡萄牙的探险和征服时代。亨利,在某些意义上是被误称为“航海家”,因为他的航行从来没有远至赤道之外,他让中世纪的宗教战争精神和更现代的探寻未知陆地、海洋秘密以及大贸易扩展中获取利润的欲望结合了起来。1415年,亨利参加了夺取摩洛哥的休达(Ceuta)海港的战争,后者是一个重要的穆斯林贸易中心,军队从这里出发穿过沙漠到达廷巴克图(Timbuktu),在那里用东非和苏丹等地的黑人换回来的象牙和金子。拥有非洲人的身体开拓打开了葡萄牙人的宽广视野。只有进入休达的黄金资源,他们才能缓解葡萄牙人严重缺乏贵金属的状况;亨利也希望到达传说中为基督教统治者祭司王约翰(Prester John)的土地上,人们认为他就是阿比西尼亚(Abyssinia)皇帝,尽管没有人知道他的帝国究竟有多远。亨利希望能和这个统治者联合起来,用强大的基督教城邦联盟包围北非的穆斯林。

53

然而,扩展摩洛哥据点的努力几乎没有任何进展。如果葡萄牙人不能突破穆斯林人的屏障,这一屏障把他们和南方的黄金资源以及祭司王约翰的王国分隔开来,他们就不能通过海上达到那些目标吗?1419年,亨利在圣文森特角(Cape St. Vincent)的萨格雷斯(Sagres)——葡萄牙西南的码头建立了一个据点。在这里,他召集了一批专业水手和科学家。在拉各斯(Lagos)港口附近,他开始建造更结实更大的船,配备有指南针和改进的星盘。从1420年开始,他派遣了几批船队探索非洲西海

岸。每个船长都被要求记录他的航海日志,关于海浪、风向和天气状态以及海岸线的略图。一个著名的皈依基督教的制图者——耶胡达·克雷斯基斯(Jehuda Crespes),用这些数据画出了更详尽和精确的图表。

前十年探险的结果是发现了马德拉群岛(Madeira)和亚速尔群岛(Azores)。但是向南的进程缓慢;想象中的外岛炙烤区和其他一些障碍使水手们极度小心谨慎。1481年,葡萄牙人抵达多博角(Cape Bojador)——非洲西部海岸的首要地理的航标,对于当地人来说都是子虚乌有。到亨利1460年去世时,葡萄牙人已经推进到几内亚湾沿海的地区,已经在金粉和奴隶——奴隶中抓获或者从沿海部落买卖来的贸易中获得了丰厚的收益。亨利的去世延缓了探险的进程,但是沿着非洲海岸线的探险仍在继续,在私人赞助下成为奴隶交易地区,这是欧洲人海外扩张的第一个后果。1469年,一个葡萄牙人费尔南·戈麦斯(Fernao Gomes)获得了对几内亚(Guinea)(后来整个非洲海岸都以此命名)的贸易垄断权,条件是他要以每年100英里为速度继续向南探险。遵照这个约定,戈麦斯的船队向东沿着落产黄金、象牙和奴隶的海岸线,然后再向南几乎到达了刚果河河口。

海上东方航线

在1481年即位的精力充沛的约翰二世统治下,葡萄牙开始控制和发展非洲事业。在黄金海岸的米纳(Mina),若昂建立了一个要塞,这里成为奴隶、象牙、金粉和胡椒的交易中心,以及进一步探险的基地。亨利曾经梦想着发现金子和祭司王约翰,但是若昂国王对绕过非洲到达印度的项目更感兴趣。1483年,迪奥戈·曹(Diogo Cao)率领的一次探险发现了刚果河河口,而且航行了这条大河的一部分。1484年的第二次航行,曹向南推进到西南的克罗斯角(Cape Cross)。葡萄牙的君主感觉到胜利在望了。1487年,巴尔托洛梅乌·迪亚斯(Bartholomeu Dias)率领的船队离开里斯本,任务是要航行到比曹到达的更远的地方,如果有可能的话,还要绕过非洲最南端。迪亚斯确实航行得比他之前的任何一位船长都要远,一阵如有神助的大风把迪亚

达·伽马在里斯本过了好望角,并且在非洲东海岸登陆。他已经解决了航行路线问题,于是就返回里斯本向国王约翰报告他的喜讯。

达·伽马的航行成功了,但是国内和国外的问题分散了约翰对印度事务的兴趣。约翰于1495年去世,也没有再进行他已经精心策划好的航行,但是他的儿子曼纽尔一世(Manuel I),著名的幸运儿,执行了达·伽马的计划。1497年,一支4艘船的船队,在顽强果敢的贵族瓦斯库·达·伽马(Vasco da Gama)的率领下从里斯本出发开始了航行,达·伽马在1500年殖民主义时代。在绕过好望角以后,达·伽马继续航行,到达了非洲东部海岸。在今天的肯尼亚的马林达(Malinda),他遇到了一位阿拉伯向导,指导着船队到达了印度西海岸的卡利卡特(Calicut)。尽管遭到了占支配地位的阿拉伯人的反对,当地的有权势者也对他不感兴趣,并嘲笑他的礼节,但是达·伽马仍然坚持设法把他出发时四艘船中的两艘装满了香料和黄金,并于1499年返回了里斯本。佩德罗·阿尔瓦雷斯·卡布拉尔(Pedro Alvares Cabral)指挥的一支新船队很快装备齐全,出发时比达·伽马的船队在大西洋南部向西航行得更远,于1500年到达巴西海岸,然后派了一艘船在继续向印度航行之前返回里斯本,以便向国王报告。他带着香料和与阿拉伯商人混战的故事返回葡萄牙,因为那些商人决定要阻止葡萄牙人的入侵。

葡萄牙的军事和管理者阿尔索·德阿尔伯克基(Afonso de Albuquerque)于1500年出发去完成由达·伽马开创的工作。他知道挤走埃及和威尼斯竞争者的唯一方法是得到香料贸易的完全垄断权,这要通过占领印度洋航线中的几个重要据点来实现。马来半岛上马六甲的攻占使葡萄牙人控制了东印度的香料进入印度洋的海峡。占领马斯喀特(Muscat)和霍尔木兹(Ormuz)阻断了通向波斯湾的通道,关闭了欧洲船队到其他国家航线。尽管葡萄牙人的战略目标并没有完

① 霍尔木兹,即现在的伊朗曼德海峡的曼德。1581至1648年被葡萄牙占领,1711年成为阿曼首都。——译者注

全成功地达到,但它已经把里斯本变成了比较大的香料供应基地。

一段时间以来,葡萄牙一直沉浸在史无前例的繁荣光辉下。但是,维持东部建立起来的巨大防务任务的压力对葡萄牙有限的人力和财力资源而言太大了,而且支出开始超过收益。更糟糕的是,在西班牙人的压力下,国王曼努尔在1496年颁布了驱逐所有未受洗礼的犹太人的法令。这样,葡萄牙就失去了这群人,只有他们能够通过葡萄牙人在东方的胜利,从资金上提供投资探险的机会。佛罗伦萨和德意志的银行家迅速跟进并且转移走了海外东方香料贸易的大部分利润。里斯本本不打算只是成为个储藏库,货物从东方运到那里几乎立刻就装船运到了安特卫普或者阿姆斯特丹,那里的位置对欧洲顾客而言是更好的分发中心。荷兰和英国的竞争对手及时地从没落的葡萄牙手中抢走了非洲的大部分殖民地。

进军大西洋

大西洋东部有一些群岛——加那利群岛、马德拉群岛、亚速尔群岛和佛得角群岛,很早就引起了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的注意。这些群岛在对美洲的殖民中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它们提供了穿过大西洋的落地点和驿站。而且,对他们的征服和殖民经济组织也为伊比利亚在新世界的政策建立了一种模式。

马德拉群岛在1425年被开垦成殖民地,成为葡萄牙在大西洋东部最重要的殖民地。马德拉群岛的土壤和气候都适合种植糖,那个时代利润最丰厚的植物,而且随着一代代的经济和技术支持,糖产业已经在马德拉建立起来,使用的奴隶来自加那利群岛和后来的非洲。到1460年,马德拉有了第一家糖厂,到1478年,它已经是西方世界最大的糖制造厂。葡萄牙人把同样的成功模式——糖和非洲奴隶劳动力的联合运用到他们对巴西的殖民地开垦中。

从14世纪早期以来,欧洲人就已经知道加那利群岛,但是准确地说,该群岛被卡斯蒂利亚征服是在1402年。岛民古安切人(Guanches)过着游牧和农耕生活,是由许多相互敌对的部落组织起来的。由于遭到了

有的抵抗,卡斯蒂利亚人的征服直到约1497年也没有完成。不到两年之后,对伊比利亚群岛的征服又开始了,人口也许曾经在5万至10万之间,后来则大大绝了,主要是由于虐待和疾病。对加那利群岛的征服也是在加勒比海类似开发的预演。

和古巴群岛一样,加那利群岛成为测试政治和经济制度的试验,这些制度后来传到了美洲。尽管群岛的统治权在王室,君主和每个总督(cadellantes)签订协议书(capitulaciones),先遣官被授权征服这些岛屿,并授予很大的管理权和其他各种特权。这些协议类似后来由征服期间一些队首们,以及和哥伦布、弗兰西斯科·皮萨罗等征服美洲时同其他重要先遣官们签订的合同。

和古巴群岛一样,加那利群岛也成了建立在糖和奴隶劳动的农业体系基础上的试验场。到16世纪早期,那里已经有29个糖厂在运营。加那利群岛作为欧洲和美洲之间糖产品的中间站这一特点,通过加那利群岛传到加勒比的糖加工技术和使用扦插的方法种植甘蔗得到了证实。

55

哥伦布的航行

寻找到达印度的航线曾引起多种解决途径。如果说有些人相信,经过非洲的航线已经解开了到达东方的谜底,另一些人则更赞成向西航行穿过大西洋。这一观点得到了著名权威人士佛罗伦萨科学家保罗·托斯卡内里(Paolo Toscanelli)的支持,他在1474年建议葡萄牙人尝试向西航行,以“经与你们正在开发的绕经几内亚的航线”。他的信引起了名不见经传的意大利水手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的注意,他曾思考过这个问题,这封信更坚定了他的信念,即从欧洲到达日本(Cipangu)和中国(Cathay^①)会有一条使捷的通道。这一想法大大低估了地球的周长,并同样高估了亚洲的面积和向东部的延伸。所有有

① Cathay, 这个词在历史上与词中使元朝人指代中世纪对中国的称谓。它通常只指扬子江(长江)以北的地区。——译者注

学识的欧洲人都相信地球是圆的,这一问题没有进入哥伦布和他的反对者之间的讨论议程。主要的问题是欧洲和亚洲之间是否有域,在这一点上,反对者是正确的。

对于哥伦布而言,通过向西航行到达东方这一想法真得像着了魔一样挥之不去。作为从勃朗的中世纪的资本主义和科学世界过渡时期的人物,一个把神秘主义和实践行动奇特地联系在一起的人,哥伦布相信上帝已经启示他,“从这里航行到印度是可行的,而且在我心中种下了去执行这个计划的炙热愿望”。

约1484年,哥伦布那时居住在里斯本。他的约翰一世提中要探索向西航行的航线,但是专家委员会听了他的计划后,建议国王拒绝。哥伦布并不因为国王的断然拒绝就灰心丧气,而是接下来进行了里斯本和亚。经过八年令人丧气的耽搁和谈判,伊莎贝尔在最后关头才改变了主意,同意支持“印度事业”。女王和哥伦布签订了合同(*capitulacion*),任命他为海军上将和他将要发现的土地的总督、统治者,并承诺他在探的收益中分享巨大份额。

1492年8月3日,哥伦布带领他三艘船的小舰队——品达号(*the Pinta*)、圣母马利亚号(*the Santa Maria*)和尼娜号(*the Nina*)从帕洛斯港(*Palos*)出发了,驾驶船的并非传说中的囚犯,而是精明能干的船长领导下的有经验的水手。航行非常顺利,一路顺风。但航行很久还在不见陆地使一些人开始焦躁起来,到9月末,哥伦布的旗舰——圣母马利亚号上的水手们开始不满抱怨。据哥伦布的儿子费迪南德说,一些水手提出把海军上将抛到海里,返回西班牙报告就说他在观星时失足落水。哥伦布设法平息了不满,而且不久就发现了漂流的马尼藻以及热带鸟这些陆地的信号。10月12日,他们在今巴哈马的一个岛上登陆,哥伦布将其命名为圣萨尔瓦多(*San Salvador*)。

经巴哈马向南航行,哥伦布到达了古巴的东北海岸,他认为这是中国的一部分。一个派去寻找大汗的使者没有找到大汗,但是回来报告说他受到了当地人的热情接待,并介绍给西班牙人使用“他们吸抽的某种草”,即一种很早前提到的烟草。接下来哥伦布又向东航行探索一个

伊斯帕尼奥拉岛(今天的多米尼加共和国和海地),并命名为“伊斯帕尼奥拉”(Española)。在这里,西班牙人庆祝发现了一些冲积金矿和金矿。当地人拿这些金矿和西班牙人换一些小东西。

哥伦布从伊斯帕尼奥拉岛出发,在岛的海岸失去了旗舰,就返回西班牙。他带来了猜想中的印度。君主收到了他令人尊敬的信息,这令他马上准备第一次探险继续他的发现。葡萄牙人指控西班牙人侵占了他们的地区,因为根据以前与卡斯蒂利亚的合约,这一地区属于葡萄牙。费迪南德和伊莎贝拉对这一指控的反应是,请求本国的教皇和教皇八世的帮助。通过1493年签发的一系列法令,教皇把哥伦布在已发现的或者将要发现的所有土地分给西班牙,从亚速尔群岛和佛得角以西一百里格^①从北到南画了一条线,这一线以西的区域属于西班牙的探索范围。对约翰二世而言,这一分界线似乎威胁到了葡萄牙在南大西洋和有希望绕过非洲向东的航线的利益。于是葡萄牙国王,费迪南德和伊莎贝拉在1494年签署了《托德西利亚斯条约》(the Treaty of Tordesillas),确定了界线以西270里格为界。葡萄牙获得了这条线以东独立发现和征服的权力;卡斯蒂利亚则获得了这条线以西的同样权力。

56

哥伦布在1492年底返回伊斯帕尼奥拉岛,17条船的船队搭载了2000人,大多数是手工业者和农民,以及为数不多的“被金子和那块土地上的其他东西所吸引的绅士、小贵族和其他有身份的人”。移民者很快就反叛了他组织了全岛活动并开始劫掠土著人。作为一个出身不明的外国人,哥伦布缺乏权力和个人素质去控制这种攫取财富的混乱局面。

哥伦布在伊斯帕尼奥拉岛北海岸建立了伊莎贝拉镇以后,就又一次出发找寻另一块岛。古巴海岸南下几乎到达了它西部的端点。那个岛屿的印度伊泰和塔诺曾到达了亚洲大陆。为了打消所有的疑虑,他要所有的军官和船员都庄严宣誓,“如果他们任何时候否认”古巴就是亚洲大陆,“他们就要承受百次鞭打和割舌之痛。”哥伦布于1496年返

① 里格:一长度单位,相当于3.0法定英里(4.8公里)。——译者注

回西班牙报告他的发现,并回答不满的移民们对他的投诉。他把他的弟弟巴塞罗缪(Bartholomew)留了下来,后者从伊斯帕尼奥拉迁到了南部海岸一个更有活力的地方,并命名这个新岛为圣多明戈(Santo Domingo)。

尽管前两次航行哥伦布并没有支付工资,承担的费用,但君主仍然对哥伦布有信心,并且于1498年装备了第二支舰队。在这次航行中,他在特立尼达岛(Trinidad)和奥里诺科河(Orinoco)河口处发现大河的淡水洪流使哥伦布相信,他已经登上大陆海岸。但是他耽于幻想的神秘主义也使他认为,奥里诺科河是天堂的四大河流之一,它的源头就在伊甸园。

哥伦布到达伊斯帕尼奥拉岛时,发现那里一片混乱。贪婪的卡斯蒂利亚探险者欲壑难填的请求已经惹怒了温和的土著泰诺人(Taino),战争一触即发。西班牙人由于迅速发财的希望破灭,竟把他们的不幸迁怒于哥伦布的弟弟,并且在—一个名叫罗尔丹(Roldán)为首的领导下发起了叛乱。为了安抚叛乱者,哥伦布发布了赦令,承认叛乱者的土地和土著奴隶。与此同时,反对哥伦布的一系列抱怨也起作用了,君主已经派遣了一个特使,弗兰西斯科·德博瓦迪利亚(Francisco de Bobadilla)去接替哥伦布,并调查针对他的诉讼。到达岛上以后,脾气暴躁的博瓦迪利亚就把哥伦布和他的弟弟抓了起来并遣送回西班牙囚押。尽管伊莎贝拉马上推翻了博瓦迪利亚的鲁莽行为,但是哥伦布再也没有行使过他在新世界的总督和管理者职能。

哥伦布仍然沉湎于他巨大的幻觉中,继续梦想着发现到达香料之都的西行航线。他被允许再航行一次,这一次是所有航行中最困难和损失惨重的。他现在相信,在他最近登上的大陆和古代地图上的马来半岛之间有一个海峡,从那里可以到达印度洋。1502年他出发去寻找这条海峡和到南亚的航线。从伊斯帕尼奥拉岛出发,在那里他没有被获准登陆,于是他穿过加勒比海到达中美洲海岸,然后又接着向南到达巴拿马地峡。这时,他相信他再有10天的航程就可以到达恒河。在巴拿马他发现了一些金子,但是寻找海峡的希望继续诱惑着他。最后,他

在剩下的内装里离开了伊斯帕尼奥拉岛,但由于深受虫洞困扰,只好一直待在圣多明各海滩,在那里他和他的船员被困了一年以等待救援的到来。1500年11月,哥伦布返回欧洲。忘恩负义的君主们让他身体不行了,1506年,这个富有而饱经苦难的人离开了人世。

发现美洲的历史透视

在纪念哥伦布1491年发现美洲500周年时涌现了大量的研究著作,学者们试图寻找那一里程碑事件的新意义。学者们的争论仍然集中在哥伦布发现的主要后果,以及它们是否应该成为庆祝或遗憾的原

因。西班牙编年史家弗朗西斯科·洛佩兹·德葛梅拉(Francisco Lopez de Gomara)以充满帝国主义的骄傲,毫不怀疑那一成就。他在1522年写道,“自世(除了上帝道化肉身的创造)以来最伟大的事件就是发现印度群岛。”但是,1600年被作为异端烧死的意大利激进哲学家布鲁诺在当时则持强烈不同意见,他攻击哥伦布是那些“胆大妄为的海盗”中的一个,只是“扰乱了其他人的和平……增加了民族罪恶,通过暴力传播毫无经验的愚蠢,并且……教会人们以一种专制的新方式和方法自相残杀”。

然而,直到最近,也几乎没有欧洲人和美洲人质疑过哥伦布成就的辉煌和价值。在19世纪,他的航行被看做先驱和起因,在他之后展开了西方伟大的经济扩张和全球统治。美国关于哥伦布的庆典活动尤其丰富,因为在这里,人们看到了那一事件和伟大的西方共和国强盛崛起之间的神秘联系。在这一时期,哥伦布几乎被转化为神秘的英雄,一个关于其生命存在的人物征服了置于他道路上的所有障碍,以偏执和无畏的探险精神完成了上帝的旨意。

直到完全进入20世纪,这一“发现”应该唤起真正的骄傲和满意的观点仍很少受到挑战。只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引起的广泛的政治和经济变化以及由冲突释放的反殖民改革才导致了人们以一种新的方式看“发现”和它的影响。那种新的参照框架通常被称为“被征服者的视界”,因为把它作为出发点,哥伦布的航行不仅影响了欧洲而且影响了

美洲的人们和文化。由于意识到发现这一术语导致的民族主义和欧洲中心论的论调,许多学者已经用更中性的术语相遇(西班牙语的 *encuentro*)代替它。毕竟,当第一批欧洲人到达的时候,美洲并不是个空的大陆;它真正的“发现者”是数万年那些从亚洲经过白令海峡穿越过来的人们。但是相遇这个词,表明了人们和文化的和平相遇,几乎不适合欧洲人入侵美洲当地的残酷现实,因此,由于没有找到更好的词,我们会继续使用发现这个词。

“被征服者的视界”提出了对发现美洲及其后果的更利称的评价。对于美洲土著而言,发现和随之而来的征服完全是灾难。他们对多种组合的新疾病完全没有免疫力,还遭到野蛮剥削,由此引起社会崩溃从而使人们失去生活意愿,这也许是有历史记录以来人口损失最大的灾难。估计 1492 至 1575 年间,当地减少的人口在 50% 到 90% 之间。

发现和征服也切断了如阿兹特克帝国和印加帝国这样的文明的独立发展。许多学者都相信,这些帝国并没有穷尽它们进一步文化发展和繁荣的可能性。最后,发现也通过引进欧洲的动物、植物和农业实践而改变了长期稳定的生态系统,从而在新世界开始了生态灾难的进程。哥伦布在伊斯帕尼奥拉岛开始了这一进程,他引进了西班牙使用犁的密集农业系统和家畜放牧,导致迅速的土壤侵蚀和森林砍伐。这一从哥伦布开始的进程一直持续到今天,已经通过拉丁美洲雨林的迅速毁坏得到了证明。这也是“哥伦布遗产”的一部分。

发现对欧洲及其长期发展有更多积极的影响。那种影响,正如很久以前亚当·斯密和卡尔·马克思提到的,最清晰地表现在经济领域。历史学家们也许会讨论美洲珍贵的矿产对欧洲 16 世纪“价格革命”或者奴隶贸易对欧洲资本的“原始积累”的影响。然而,无可争议的是,这些因素和其他因发现美洲所涌现的事件联合起来给欧洲的经济现代化和资本主义崛起以强大的刺激,这反过来又加速和促进了它对全球其他地方的控制。

发现对欧洲智力影响更难以测量,但似乎人们一致认为,发现美

洲而产生的地理上的视界扩展伴随着精神视界的扩展以及涌现看待世界的新方法,在某种意义上对智力发展有贡献。伟大地理发现的首批受益者便是古代作家甚至教皇的权威。为此,西班牙修道士巴托洛米·德拉斯·卡萨斯(1481—1566)有声有色地描绘了不适宜居住区以传统信念,在一个段落里试图颠覆圣奥古斯丁(Saint Augustine)和古代作家的权威,“毕竟,他们知道的也不多”

对美洲及其居民的发现也引起对他们的起源和本性的争论,因而产生了人类学的基础。为证明根本人性和这些土著美洲人的平等要求,16世纪四十年代的一些传教士深入研究了他们的文化。这些人中一个最伟大的修道士-人类学家是巴托洛米·德拉斯·卡萨斯,他的一部著作收集了大量人种志学的资料,用来证明土著美洲人完全满足了亚里士多德提出的美好生活的要求。卡萨斯使他的案例首先基于经验和观察,提出了文化差异的环境主义解释,并且用科学的超然态度看待那些偏离欧洲标准的人祭和食人仪式。

对一些可能是新鲜和奇特的当地方式的反思,以及修道士-人类学家们理解和解释这些方式的努力,也导致了文化相对主义的发展,比如排斥权威,代表了和过去的决然分裂。例如,卡萨斯对野蛮人(barbarian)这一术语进行了细致的语义学分析,认为当人们把这个词用于先进的文化如阿兹特克或印加文化的时候,此词便失去了它的最人抨击意义。米歇尔·德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如饥似渴地阅读关于美洲土著的风俗描述,在他著名的关于巴西土著的随笔中观察到,“从读到的内容看,除了每一个人都把不是自己做法的无论什么都称之为野蛮之外,我认为在这个民族中没有什么野蛮和未开化”。

美洲及其居民的发现也启发陷入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社会不公正麻烦中的欧洲人提出了激进的政治经济组织新框架。例如,1516年托马斯·莫尔发表了《乌托邦》,它描绘了一个无宗教信仰的社会主义社会,其机构是通过公正和理性来管理的,这与其同时代的欧洲国家不同,莫尔将后者描述为针对穷人的“富人的阴谋”。莫尔书中的讲述者,讲了关于乌托邦居民和他们的制度,声称自己是个水手,跟随亚美利哥·韦

斯普奇(Amerigo Vespucci)航行过三次。莫尔思想关于私有财产的罪恶和大众政府益处的主要来源,出现在韦斯普奇的“第二封信”中关于当地风俗和信念的关键段落中:

他们依据自然生活,没有法律也没有宗教之说。他们对灵魂的不朽一无所知。这里的人不拥有任何私人财产,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是公共的。他们没有国王,也不服从任何人。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主人。没有司法,这是他们不需要的……

但是,如果发现美洲对欧洲智力生活产生一个有合影响的话,其反映就是对权威的新排斥,文化相对主义的增强以及对非正统社会和政治思想的推动,这也加强了欧洲人对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否定态度。伟大的弗兰德斯地图绘制者亚伯拉罕·奥特琉斯(Abraham Ortelius)在他1579年的世界地图中清晰地表达了这一态度。在欧洲地图上,奥特琉斯附加了一条注释,表明了欧洲征服世界的历史使命,西班牙和葡萄牙完成了这一过程,“他们统治了世界的四个部分”。奥特琉斯宣称欧洲人总是比其他地方的人更聪明、身体更灵敏,因此保证了他们去管理地球上的其他部分。

卡萨斯的宽阔视野使他声称“个体人类是一个人”,蒙田激烈谴责欧洲人的残暴,并提出欧洲人和新世界人们之间恰当的关系是“兄弟般的关系和理解”,他们都不是当时典型的对待这一主题的思想。殖民竞争者也许会谴责西班牙对土著美洲人的行为,但是他们通常赞同把土著美洲人看做被罪恶玷污的人和“可怜的野蛮人”。

59

把“被征服者的视界”的观点和历史研究的新态度结合起来,使我们对哥伦布本人和他对待被误称为“印第安人”的态度有了更好的理解。中世纪神秘主义和现代冒险精神的奇特混合也显示为哥伦布思想的矛盾,这可以通过他对金子的评价体现:“噢,极好的金子,拥有金子的人就拥有一个宝藏,他可以用它得到想得到的,把他的意志强加给世界,甚至帮助灵魂到达天堂。”在《美洲的征服》一书中,茨维坦·托多罗

人 Izvetan Ioderov)把哥伦布的观念形态(它代表了欧洲入侵者的观念)进行了深刻而精微的剖析,并揭示了其他的矛盾。哥伦布有时把“印第安人”看作“高贵的未开化者”,有时根据情况不同,他又把他们看作“野蛮人”。托多罗夫解释说,这两个虚构的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对“印第安人”的蔑视并拒绝承认他们是和他自己一样具有人权的人类。在最后的分析中,哥伦布把土著人不看作人类,而是看做物。这通过他在1498年写给西班牙君主的一封信中得到了很好的阐述:

以神圣的三位一体的名义,我们从这里运送的所有奴隶和巴西木料都可以出售。如果我的消息准确,若一个人卖出4000个奴隶,他将会得到至少2000万……而且我相信我的消息是准确的,因为在卡斯蒂利亚、阿拉贡、意大利、西西里、葡萄牙和阿拉贡的岛屿以及加那利群岛,他们所需的大量奴隶已经耗尽,来自几内亚的奴隶数量正在减少……尽管印第安奴隶现在也倾向于逐渐绝亡,但并非会是这样,因为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来自非洲和加那利群岛的奴隶身上。

事实上,哥伦布想实施探索的初衷是为了寻找从西方通向印度的航线,为了用对当地印第安人的奴役和在卡斯蒂利亚售卖他们而换取金子。为了使这个想法更对西班牙君主的胃口,他提出寻找奴隶仅限于假定的“食人”族——加勒比人。当伊斯帕尼奥拉岛的泰诺人起义反对他们的残酷对待时,这又为他们的奴役提供了一个合法借口。1494至1500年期间,哥伦布运送了大约2000个“印第安人”到卡斯蒂利亚的奴隶市场上。与传说的相反,大多数这样的运送,女王伊莎贝拉都同意了。

当然,哥伦布是从投机商人的背景看待奴隶制度的。他非常熟悉葡萄牙的非洲奴隶贸易,从前的热那亚商人们曾经非常热衷于这样的贸易。他在那里生活了一段时间,当时奴隶制在某种条件下还几乎被

普遍看做是合法的和适当的。他对生命已经缺乏关心而麻木不仁，奴隶的死亡没有使他成为恶人。如果他热切地渴望金子，并不仅是由于他的粗鄙贪婪。可以肯定的是，正如西班牙学者胡安·吉尔(Juan Gil)观察到的那样，他“着迷于银币(maravedis)的叮当声”。他艰苦地和西班牙君主讨价还价，为了从他的发现中寻求可能的最大利益。尽管他在上一年还悲叹他的贫穷，以至于头上连遮风避雨的屋顶都没有，但他死时已是个百万富翁。但是哥伦布还有另外一面。他把金子看做是推进基督教全面胜利的一种方式，敦促他皇君的主人用从印第安人得到的收入发动宗教战争，以从穆斯林手中夺取神圣的土地，并且以牙作则招募十字军战士。在哥伦布身上充斥着一种永恒的挣扎，即相信世界要在155年之后终结的中世纪神秘主义和文艺复兴时人们充满了去获取权力、头衔、财富和名誉的动力之间的永恒挣扎。

为了确切评价哥伦布成就的意义，人们必须承认他是——已经没有被意识到的历史力量的工具，这一历史力量就是从落后的中世纪到正在崛起的资本主义之间的转换，资本主义的成功就在于征服和全球市场的创建。这一过程反过来又要求意识形态上的正当性证明，即要骄傲地坚信白种欧洲人要比所有其他的人民和种族都要优越。哥伦布在加勒比海的工作代表了那一意识形态在新世界的第一和策略的应用。他如果不是殖民主义的鼻祖，至少也是鼻祖之一，而且对那一统治体系毁灭性的后果也要承担一部分责任。

61

巴波亚(Balboa)和麦哲伦(Magellan)

一些追随哥伦布船队的人们逐渐意识到了南美洲大陆海岸的巨大潜力。1499年，阿隆索·德奥赫达(Alonso de Ojeda)在水手胡安·德拉·科萨(Juan de la Cosa)和佛罗伦萨人亚美利哥·韦斯普奇(Amerigo Vespucci)的伴随下，向奥里诺科河(the Orinoco)河口航行探索委内瑞拉海岸。韦斯普奇还于1501至1502年参加了葡萄牙麾下

① 西班牙硬币。——译者注

第一次航行。这次探险借着1500年佩德罗·阿尔瓦雷斯·卡布拉(Pedro Alvarez Cabral)的发现从巴西出发,沿着巴西海岸在返回之际,探索了从巴伊亚(Bahia)到里约热内卢之间的海岸。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的赞助人乔万尼(Giovanni)和洛伦佐·梅第奇(Lorenzo de' Medici)的信显示,这个文雅的、受过良好教育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人用他敏锐的直觉对新世界的动物群、植物群和居民做了活灵活现的素描。他的信在16世纪早期发表并且广泛流传。1492年,哥伦布曾讲述了一次1497年并不存在的一次航行,并赋予他登岸美洲大陆第一人的名声。德国地理学家马丁·瓦尔德泽米勒(Martin Waldseemüller)决定通过在地图上用“亚美利加”命名新发现,以纪念韦斯普奇。这个名字很快流行起来,现在已用于称呼整个新世界。

土著劳动力越来越短缺,在伊斯帕尼奥拉半岛上的新移民也普遍缺乏经济机会,这导致了西班牙的奴隶贩子和冒险家去征服剩下的大安的列斯群岛(Greater Antilles)。1509年到1511年间,波多黎各、牙买加和古巴被征服。同一时期,发现哥伦比亚和巴拿马北部海岸殖民地的努力失败,剩下的两个探险队联合起来,由精力充沛的征服者瓦斯哥·努涅斯·巴尔博亚(Vasco Nunez de Balboa)带领,在巴拿马地区形成了新的达连(Darien)定居点。据当地的传说,大海的河口处有一块土地到处都是金子。巴尔博亚在这一传说的鼓动下,带领探险队穿过巴拿马的森林、翻过高山到达了太平洋海岸。如果没有引起他同性的妒忌——“两条腿的老虎”佩德拉里亚斯·达维拉(Pedrarías Davila)的嫉妒,他也许已经和秘鲁的印加帝国建立了联系。达维拉由查理斯五世于1511年派出作为地峡的总督。巴尔博亚被控告试图通敌和叛逃罪而判刑,并于1519年被斩首。

巴尔博亚证实太平洋存在之后,接下来的欧洲人航行集中在寻找通过或绕过美洲大陆通向东方的航线。麦哲伦,这个曾经在印度和东印度群岛战斗过的人,相信在巴西南部有一条到东方的捷径。葡萄牙国王对他的提议不感兴趣,麦哲伦转向西班牙却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从1519至1922年，麦哲伦环球航行的结果开辟了历史，代表了巨大的航海壮举并极大地增加了欧洲的世界知识储备。然而，除了为西班牙偶然得到菲律宾之外，麦哲伦的航行很少有什么价值，因为他的航线太长而失去了商业意义。最后的结果是指向了美国在西班牙人眼中的价值。很容易到达东方的幻梦破灭后，西班牙人把主要精力集中在扩展美洲的征服，以及掠夺新世界的人力和自然资源上。

征服墨西哥

早期和蒙特祖玛的接触

1518年，一个让人不安的消息传到了阿兹特克人的都城特诺奇提特兰。从墨西哥湾海岸的北边匆匆赶来的贞赋征服者品诺特(Pinotl)告知国王蒙特祖玛，带翅膀的塔里载着白面孔、大胡子的人从海上靠近。品诺特已经和这些人用手势交流过了，并且还与他们的首领交换了礼物。在离开之前，神秘的来访者还许诺不久要返回(品诺特对他们手势的解释)，并且要拜访山中这座城里的蒙特祖玛。

阿兹特克的记录支持这一点，即这个消息使蒙特祖玛沮丧。这些陌生人的首领是救世主羽蛇神返回来收复他失去的王国吗？根据阿兹特克的一个资料，蒙特祖玛大声叫嚷，“他出现了！他回来了！他会来到这儿，到他的王座和华盖这里来，因为这是他离去时许诺的！”

“带翅膀的塔”就是西班牙船长胡安·德格里哈尔瓦(Juan de Grijalva)的船队，是由古巴总督迭戈·委拉斯开兹(Diego Velázquez)派出，探索弗朗西斯科·埃尔南德斯·德科尔多瓦(Francisco Hernández de Córdoba)(1517年)在寻找奴隶的探险时已经发现的海岸。科尔多瓦在尤卡坦半岛登陆，那里居住的是玛雅人，他们的棉斗篷和华丽的羽毛装饰、石金字塔、庙宇和金饰物都表明，当地的文化要比西班牙人迄今为止遇到的所有居民都要先进。科尔多瓦惨败在遇到的玛雅人手里，返回古巴后就因伤死去。但是，他带回的大量金子和其他富有的信号激励委拉斯开兹又准备了一次新的探险，这次他托付给了

他的同族胡安·德格里哈尔瓦

1518年1月,格里哈尔瓦从圣地亚哥出航,沿着科尔多瓦的航线,到了蒙特祖玛王国边界,在那里他受到了挥舞着白旗的当地人的欢迎,并同意与他们靠近。在那里,阿兹特克人的官员品诺特登上了格里哈尔瓦的船只,他的报告曾在特诺奇提特兰引起惊恐。贸易生机开始发展起来了,阿兹特克人用金子和西班牙人物物交换绿色珠子。格里哈尔瓦现在确信,他已经来到了拥有许多人城镇的富有王国。在墨西哥克鲁斯罗附近,格里哈尔瓦把佩德罗·德阿尔瓦拉多(Pedro de Alvarado)留在了古巴,带着通过物物交换得到的金子。阿尔瓦拉多向委拉斯开兹报告已经完成了任务,并请求当权者建立一个殖民地并提供增援。格里哈尔瓦自己和另外三艘船继续航行,可能远达标志阿兹特克帝国的北方边界帕努克(Pánuco)河。然后,他又循原路返回,于1518年11月到达古巴。

科尔特斯——羽蛇神^①

委拉斯开兹已经在计划征服墨西哥大陆的第三次探险。他不再理会格里哈尔瓦,而是挑选了31岁的赫尔南多·科尔特斯(Hernando Cortés)——西班牙埃斯特雷马杜拉省麦德林(Medellín)人,作为探险的首领。科尔特斯1485年出生于一个中等收入的小贵族家庭。他在14岁的时候到了萨拉曼卡,在这所西班牙著名的学校申请到了位置,

① 有关墨西哥的传说,我们不妨把所有稀奇古怪的要素都加到对阿兹特克人事件的说法上,这一点是西班牙的传教士-学者圣贝纳迪诺·德萨阿贡(Bernardino de Sahagún)在其编纂的《佛罗伦萨手抄本》(Florentine Codex)中谈到的,因为它提出的对阿兹特克人心理和宗教反应的描述引人入胜。在传说的版本中,预言要归来的神君羽蛇神起了关键性的作用。羽蛇神,至少对阿兹特克人来说似乎已经被等同于神或者是神的使者。然而,最近一些持怀疑态度的学者已经提出,神話は阿兹特克人失败后当地人后征服的合理化行为,或者是西班牙人对阿兹特克人征服的创造,或者甚至纯粹是科尔特斯的发明。他曾两次引用蒙特祖玛告诉他的神话说:“这对阿兹特克人的观点作为非历史性的让我们印象深刻。历史记载的许多神话都预言了救世神君——12世纪中世纪的皇帝人和亨利特烈一世(Frederick Barbarossa)会归来,如果文艺复兴时期的葡萄牙人和本塞巴斯蒂安(Sebastián)王会归来,为什么阿兹特克人不能相信神君羽蛇神的归来?”

准备攻读法律,但是他在几年后为开并准备参军。一边是意大利,欧洲重要的战场,在那里西班牙军队在伟大的指挥官、贡洛·德·科尔多瓦(Gonzalo de Córdoba)的带领下赢得了名声;另一边是印度群岛,黄金之地、亚马孙和黄金国(El Dorados),他必须在两者之间作出选择。1501年,在他19岁的时候,他乘船前往伊斯帕尼奥拉岛。

科尔特斯到达岛上不久,就取得了他的第一次战绩:镇压因为西班牙的虐待而绝望反叛的阿拉瓦克人(Arawaks)。他得到的回报是赐封委托监护地(encomienda)。1511年,他在委拉斯开兹的部队中服役,他们轻而易举地征服了古巴。接下来的一年,他在古巴被任命为新成立的圣地亚哥市市长。1518年,他说服了委拉斯开兹让他指挥墨西哥大陆的新探险,但在最后时刻,不信任他的自杀决定阻止了他。科尔特斯对委拉斯开兹的命令不予理睬,1519年2月,他带着大约600人的兵力从古巴出发。因为委拉斯开兹还没有完成和当地土王的谈判,以便有一个协议授权对内陆的征服和殖民,所以科尔特斯得到的命令是他只可以进行贸易和探险。

科尔特斯的船队首先到达的陆地是科苏梅尔岛(Cozumel),在那里他们救起了乘船遇难的西班牙人杰罗尼莫·德·阿古拉尔(Jerónimo de Aguilar),他已经在玛雅生活了八年。1519年3月,科尔特斯登上了塔巴斯科(Tabasco)海岸,在一场尖锐的冲突中击败了当地土著,并从他们那儿得到了一个友谊的信物——墨西哥女孩马琳切(Malinche)^①,作为翻译、向导和情人为他服务。4月,科尔特斯在今维拉克鲁斯附近停船。他策划了一个使自己摆脱委拉斯开兹令人讨厌的权威的方法。表面上看,他只是顺从了大多数跟随者的愿望,声称征服

① 在墨西哥成功独立之后,马琳切对科尔特斯有一共睹的服务以及西班牙人的征服都使她的名字臭名昭著,成为出卖给外邦人的同义词,而且对许多墨西哥人而言,她的名字直至今日还仍然有这一含义。然而,从公道的立场谈马琳切,我们就会理解,那时居住在中美洲的各个种族中,并没有墨西哥人的国家或统一意志。一个来自最新的年轻女孩显然拥有卓越的语言能力,马琳切发现自己被无情地扔进了一个非常危险的环境中。弗·西斯科·卡特那(Frances Karttunen)写道,她生存的最大希望,就是为科尔特斯服务,而且她“宁愿为他服务。相反,她的一贯性不是背叛的体现,而是可以被称为完全忠诚地履行了职责”。

移民比仅仅以可能更好地服务于王室利益。科尔特斯建立了里卡韦拉·德·维拉斯直(Villa Rica de la Vera Cruz),并任命了镇的第一批官员,并将从委拉斯直那里得到的权力交到这些人手中。这些官员又授予科尔特斯陆军司令的头衔,并有权力征服和开垦殖民新发现的土地。这样,科尔特斯就用西班牙中世纪的市政自治传统给他的不服从披上了合法的外衣。

几天以后,蒙特祖玛的使节出现在西班牙的营地。特使们带来了珍贵的礼物,伟大的特拉洛克(Tlaloc)神、特兹卡特利波卡(Tezcatlipoca)神和太阳神的华丽衣袋。他们虔诚地给科尔特斯穿上华丽的羽蛇神衣服。他戴上嵌有绿咬鹃羽毛的蛇面具,把交叉的绿咬鹃羽毛和金耳环悬挂在耳朵两边。在腰间系带,他们又系上了装饰着绿咬鹃羽毛的背心;还在胸前挂了一截上中心有个金盘的珍贵石头做成的项链。手上的防护物装饰着金子、绿咬鹃羽毛、虎苏和绿咬鹃羽毛垂饰。他们还放在他面前了一双做工精致、刺铁匠将长系带鞋,犹如黑曜石那样黑。

阿兹特克人却对这些并不满意。“就这些了吗?”据说科尔特斯这样问,“这就是你们欢迎礼物吗?这就是你们的待客之道吗?”胆战心惊的特使们走了,又回来时带来了更多神喜欢的礼物,包括车轮那么大的月亮形金盘,更大的月亮形银挂件,以及一个镶满了天然金块的头盔。

特使们向蒙特祖玛报告他们听到和看到的,添油加醋地描画神的形象以及他们的财物。他们描述了加农炮的火力,阿兹特克的使者们报告说是科尔特斯下令展示的,并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个像石球一样的东西从它的内脏出来,发射出火光和火雨。冒出来的烟有让人讨厌的气味,闻起来像烂泥……如果大炮瞄准的是山,山就会啪的一声被劈开。如果它瞄准的是树,树就会被打成碎片。

他们还鲜明生动地描述了其他武器、盔甲和西班牙人的装备。

关于西班牙人可怕的战狗,特使们是这样说的:

它们的狗体形庞大，耳朵扁平，拖着长长的舌头，它们的眼睛是发亮的黄色；眼睛炯炯放射出火光。它们的喉咙是宽的，侧面长而窄。它们不知疲倦非常有力，四处蹦蹦跳跳，并伸出舌头喘息。而且它们身上的斑纹像豹猫一样。

64

蒙特祖玛的特使们向科尔特斯保证，他们会在他们留海期间为他提供一切服务，但是请求他不要会见他们的国王。这一请求是蒙特祖玛可悲策略的一部分，用不断地给科尔特斯以蛇神礼物并希望他会放弃继续向内地推进并收回他失去的王位。科尔特斯温文尔雅地告知使者们，他已经越过了许多海，从遥远的地方来到这里要见到蒙特祖玛并和他会谈，因此不会无功而返。

进军特诺奇提特兰

当科尔特斯得知阿兹特克附属各国严重不满阿兹特克的法律时，就决定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他鼓励沿海的托纳克人(Totonacs)抓有并囚禁蒙特祖玛的收税官，但是要马上释放他们，并把他们送到国王那里，表达他的问候和友好。然后他派了一艘船送一封信件给查尔斯特帝，在信中他描述他发现的地区的范围和价值之人，试图使他的行动获得准许。为了得到皇帝的好感，科尔特斯说服他的人不仅送给查尔斯特王室第五税(quinto)^①，而且包括他们从蒙特祖玛那里得到的全部财宝。然后他又坚决果断免除他的随从偷漏的所有税，还凿沉了所有剩下的船，借口是它们不适合再航海了。最后，科尔特斯和他的小部队开始向墨西哥-特诺奇提特兰进军。

进军到山区时，科尔特斯已经进入了阿兹特克人传统上的对手强硬的特拉克斯卡兰人(Tlaxcalans)地区。西班牙人在和这个强人的民

① 王室第五税是一种古老的王室税，缴纳给君主所获贵金属和其他物品(包括奴隶)的20%。它在中世纪的穆斯林城邦、基督教伊比利亚半岛，和整个时期在其海外殖民地实行。——译者注



著名墨西哥壁画家迭戈·里维拉描绘了可怕的奴役、压迫和种族灭绝,这些都是科尔特斯和西班牙征服者为了搜刮财富和扩张西班牙帝国而强加在土著人身上的

朕结成联盟之前,必须在战斗中证明他们的武器和战斗能力的优越性。接着科尔特斯就进军古代古典文化传统和羽蛇神的崇拜中心乔卢拉。据说乔卢拉人一直谋划在这里攻击他。科尔特斯就把他们集合到大院子,制造了一场对乔卢拉贵族和战士的大屠杀。当这一消息传到特诺奇提特兰之后,恐惧传遍了全城。

65

西班牙人继续他们无情的进军:

他们作为征服者列队行进到战场,所到之处扬起的尘土形成了旋风。他们的长矛在太阳下闪闪发光,他们的旗帜像蝙蝠一样摆动。由于他们的铠甲和武器碰撞而发出声音,因此所行之处吵吵嚷嚷。一些人从头到脚穿着亮闪闪的钢铁;每一个见到他们的人都胆战心惊。

蒙特祖玛的恐惧和疑虑至今为止已经使他因绝望而陷入犹豫不决的状态。他在投降和抵抗之间摇摆,在相信西班牙人是神和半信半疑他们缺乏神圣性之间摇摆。他派了新的使者,给科尔特斯带去了丰富的礼物,但是敦促他放弃访问阿兹特克都城的计划。蒙特祖玛认真地努力贿赂和哄骗可怕的“渴望和贪恋金子”的异邦人,但他们“像饿狼一样扑向金子”,一个阿兹特克人用痛苦的字眼这样描述,这些做法显然是无效的。国王派了一群巫师和占卜者去对西班牙人念咒语,但这被年轻的特斯卡特利波卡(Tezcatlipoca)神阻止了,它用魔法在他们面前展现了一幅可怕的画面:墨西哥-特诺奇提特兰被烧夷废墟。蒙特祖玛的力量最后耗费在欢迎科尔特斯进入都城上,并将其看做返回取回其宝座的合法统治者。通过允许让科尔特斯把他从自己的宫殿中绑架,而且和几个朋友一起作为人质在西班牙的驻地苟延残喘,阿兹特克国王完成了他的谢幕。

对阿兹特克民族的征服并没有结束。在科尔特斯离开城到海岸去面见总督委拉斯开兹派来逮捕他的探险队之后,他的中尉佩德罗·德阿尔瓦拉多(Pedro de Alvarado)下令进行了一场无谓的屠杀。在阿兹特克的酋长们和战士们用唱歌跳舞庆祝纪念大神维齐洛波奇特利(Huitzilopochtli)的宗教节日时,阿尔瓦拉多下令杀死了他们。这件事的结果是引发了大规模的起义,迫使西班牙人退回到他们自己的驻地。这一情形是在科尔特斯已经争取到了大多数新来者,并击败了其余人,当他返回到特诺奇提特兰与他的同志们会合时发现的。他试图安抚阿兹特克人的努力失败了。阿兹特克议会废除了被囚禁的蒙特祖玛并选举了新的首领,新首领对入侵者发起了猛烈的攻击。战争最激烈的时候,蒙特祖玛死了。根据西班牙人的记述,他是在呼吁和平的时候被他自己的人们用石头砸死的;或者依据阿兹特克人的材料,他是被西班牙人绞死的。由于担心长期围攻和饥荒,科尔特斯在人员损伤严重的时候从特诺奇提特兰撤离。活下来的西班牙人和他们的同盟军最后到达了友善的特拉斯科拉(Tlaxcala)。

通过与从古巴赶来的西班牙援军以及数千阿兹特克帝国内当地对

联合力量,科尔特斯于1520年12月又重新进军特诺奇提特兰(图23-1),在围攻并和阿兹特克人激战4个月后,他们的最后一任皇帝,骁勇善战的老乌特莫克(Cuauhtémoc)在饥民的恸哭声中投降科尔特斯。除了曾经是特诺奇提特兰城的那片废墟。

征服的后果

征服的过程从墨西哥山谷向各个方向扩展。阿尔瓦拉多征服了危地马拉,科尔特斯征服了洪都拉斯。1527年,佛兰西斯科·德蒙特霍(Francisco de Montejo)开始征服尤卡坦。但是直到1542年,玛雅人在尤卡坦中发动起义并被白人屠杀镇压。同时,达里恩(Darien)的探险征服了中美洲的拉瓜人(Nicaraguans)。这样,西班牙征服的两支主流都以伊斯帕尼奥拉岛为起点又走到一起。

在很短的时间里,科尔特斯成为古老的阿兹特克帝国无可争议的主人,并被命名为“新西班牙国王”。他授予他的士兵们委托监护地(encomienda),把最富有的城镇和地区的贡赋留给自己。作为对他服务的回报,国王授予他瓦哈卡谷地的侯爵头衔以及2.3万家臣;他的生活几乎是王室的,就餐时“有人说唱并吹奏喇叭”。但是,王室对这位伟大征服者的不信任不久就显示出来。就在他任总督的时候,他被剥夺了管理权。枢密法庭(audiencia)被授予权力,严密审查他的所有行为。他于1539年返回西班牙,并在第二年以他享有的声誉参加了对阿尔及尔(Algiers)的远征,但是遭到了国王的忽视和冷落。怀着满腔悲痛,他退隐在塞维利亚。1547年去世后,他的头衔和资产都留给了他法律上的大儿子,马丁·科尔特斯(Martin Cortés)。

66

征服秘鲁

墨西哥的征服挑战给其他西班牙人去建立像科尔特斯和他的同伴们那样的功绩。发现新传的黄金王国在“南海”之外的工作是从巴波亚(Balboa)开始的,但止于他死于佩德拉利亚斯·达维拉(Pedrarias Dávila)之手和中断。1519年,达维拉在地峡西侧建立了巴拿马镇,这

个镇成为沿着太平洋海岸探险的基地。一年后,帕斯卡尔·安达戈雅(Pascual de Andagoya)穿过了圣米格尔(San Miguel)海湾,返回时带回了更多关于叫秘鲁(Biru)的黄金之国的消息。

皮萨罗和阿塔瓦尔帕

达维拉把向南的航行委托给了佛朗西斯科·皮萨罗(Francisco Pizarro),一个目不识丁的贫穷士兵,人们对于他知道得很少。皮萨罗征召了两个去秘鲁人那里探险的伙伴:迭戈·德阿尔马格罗(Diego de Almagro),一个同样出身不明的探险者和赫南多·德卢克(Hernando de Luque),一个神父,他的任务是充当一个人的财务代理。最初的两次探险,分别在1521年和1526年整装从巴拿马出发,他们得到了足够多的金银,证实了难以捉摸的王国的存在。于是皮萨罗动身去西班牙以获得王权批准从事秘鲁的探险事业。当他返回巴拿马时,已经得到了大将军和先遣官(指挥官)的头衔,还带回了他的四个兄弟和其他随从者。阿尔马格罗不满意合同中的头衔和报酬分配,因此指控皮萨罗轻视他为国王的服务。尽管争执被平息下去,但已经种下了致命的仇恨种子。

1531年12月,皮萨罗带着约200人的兵力从巴拿马向南方航行,并于几个月后在秘鲁的海岸登陆。西班牙人一到达就获悉,印加帝国内战正酣。阿塔瓦尔帕(Atahualpa),即上一任皇帝瓦伊纳·卡帕克(Huayna Capac)与他第二个妻子的儿子已经开始起义反对另一个试图登基者:他的同父异母兄弟——瓦斯卡(Huascar)。阿塔瓦尔帕正向帝国的都城库茨科(Cuzco)挺进的时候,他接到了信使带来的白种异乡人到达的消息。在两个首领交换了信息和礼物之后,两支军队前进到群山之间的卡哈马卡(Cajamarca)镇会合。

也许是直接效仿科尔特斯,皮萨罗计划先抓住印加的阿塔瓦尔帕,赢得迅速且相对而言不流血的胜利,通过他也许还有希望统治这个国家,这正如科尔特斯对蒙特祖玛所做的那样。可是秘鲁人的情况在一个重要的方面不同于墨西哥的情况。如果蒙特祖玛的无所作为是他对

在圣入侵者时被迫接受,那么阿塔瓦尔帕的错误在于,他低估了小规模西班牙军队的集中打击力。他曾经被误导并相信,刺刀并不比妇女纺织的丝条更危险,火器只能发两枪,战马到了晚上就派不上用场了。此外,就是这最后一个误判导致他把进入卡哈马卡的时间推迟到傍晚而不是上午,正如皮萨罗被告知并希望的那样。

阿塔瓦尔帕和他的护卫出现在约定的会面地点卡哈马卡广场的入口处,他发现那里空无一人,因为皮萨罗已经和他的人隐藏在面向广场的大建筑里。然后神父文森特·德瓦尔弗德(Vicent de Valverde)在翻译的陪同下走向前,向慌乱的印加人滔滔不绝地宣讲他作为基督教皇帝和西班牙国王的义务,直到恼怒的皇帝扔掉瓦尔弗德递给他的一本圣经。皮萨罗一声令下,他的披着铠甲、装备有人炮的士兵冲上去杀死了数百人并俘获了印加王。“太壮观了,”一个西班牙观察家写道,“看到一个伟大的国王走过来时还权倾一时,转眼间就成了俘虏。”

67

阿塔瓦尔帕徒劳地祈求要用满满一屋子比人还高的金子物品作为条件赎回他的自由。皮萨罗接受了这个出价,数百头骆驼驮着金子从帝国各处赶来直到达到规定的高度。但是皮萨罗并没有放走皇帝的意思;阿塔瓦尔帕仍然被“保护性地拘留”,因为这个傀儡统治者能确保新命令被普遍接受。然而不久,西班牙人就开始怀疑阿塔瓦尔帕正成为广泛密谋反对他们的焦点,因而决定他必须死。他被指控叛国罪而被判处火刑,用这个月决代替绞刑是因为他接受了洗礼。

印加灭亡后,西班牙人进军印加的都城库斯科,并于1533年11月占领并洗劫该城。这一成功和后来的西班牙战役成功的主要因素是借助于印加皇族已故的瓦斯卡(Huascar)那一支以及库拉卡们(curacas),他们看到了重获失去的独立和权力的机会,在阿塔瓦尔帕被捕后就加入了西班牙一方,并给西班牙提供了军队和其他帮助。从库斯科掠夺的金银和阿塔瓦尔帕的巨额赎金一起都被融化并分给了士兵们。弗兰西斯科的弟弟赫尔南多·皮萨罗(Hernando Pizarro),带着给皇帝查尔斯的那一份战果回到了西班牙。赫尔南多带着成堆的金



阿塔瓦尔帕，独立印加帝国的最后一任皇帝，用黄金物件，包括无袖长袍、耳坠和头饰带奢华地展示了他的帝王权力

银回来引起了一阵狂热的兴奋，掀起了西班牙人到新世界寻宝的狂潮。与此同时，弗兰西斯科·皮萨罗已经开始建造一个全新的西班牙人都城——利马，众王之城，靠近海岸便于和巴拿马联系。

后殖民的麻烦

阿塔瓦尔帕死后，皮萨罗就装腔作势要拥立印加王系中具有合法地位的那一方，宣布瓦斯卡尔的弟弟曼科（Manco）为新印加王。但是曼科并不满足于扮演西班牙的傀儡角色，曼科亲自组织和领导了声势浩大的暴动在帝国的许多地方爆发。大批军队围攻库斯科达10个月，但最后在几乎就要占领城市的时候失败了。由于西班牙人先进的武器和策略以及军队食物短缺，曼科撤退到安第斯山脉偏僻的要塞中，在那里他和他的继任者维持着一个印加流亡政府直到1572年。该年，西班牙的军事探险队进入山区，冲进帝国皇宫，抓住了最后一个印加皇帝——

图帕克·阿马鲁(Tupac Amaru),在库斯科一个庄严的仪式中将他斩首。

当由皮萨罗和阿尔马格罗带领的一帮征服者和阿尔马格罗(Diego de Almagro)为争夺古印人国王拉马斯科城财物而发生内讧的时候,印加帝国正在其鼎盛时期几乎要被攻下。阿尔马格罗战败后被判处绞刑,但是他留下的一子嗣和一大帮支持者还是对他们的贫穷和所谓的错误感到不满。他们中的12个人,因为声称只有一件斗篷,而被皮萨罗授予“斗篷骑士”的称号,在1511年6月计划并实施了针对秘鲁印加统治者的一系列活动。但是他们的胜利没有持续多久。查卡斯(Vaca de Castro)充当皮萨罗的副手,为古印文萨罗的那些主要将领表达自己的忠诚,瓦斯卡尔为阿尔马格罗的儿子的战争,在“楚帕斯(Chupas)一战”中击败他的军队后,立即对他进行审判并以国王叛徒的罪名将之斩首。

68

然而,这并不标志着终结。1511年初,一个新总督布拉斯科·努涅斯·维拉(Blasco Nunez Vela)到达利马,公布了被称为东印度群岛上法律的法令。这些法律为印第安人的贡赋、释放土著奴隶以及禁止古印人买卖土地制度。那些征服者们义愤地哭喊说受到侵害,要求对秘鲁的西班牙地主暂停这些法令。当这些请求得不到关注的时候,绝望的被征服者们揭竿而起并找到了一个领导者贡萨洛·皮萨罗(Gonzalo Pizarro)——被谋杀的弗兰西斯科的兄弟。

秘鲁大叛乱的第一阶段随着总督努涅斯·维拉在基多(Quito)附近的一场战斗中失败并死亡而显然有利于贡萨洛·皮萨罗。皮萨罗现在成为这个国家时无冕之王。叛军领导者把他最初的胜利归功于足智多谋、有魔鬼般充沛精力的阵地指挥官和首席顾问,弗兰西斯科·德卡巴雅尔(Francisco de Carbajal)。卡巴雅尔异常残忍,把这些特征结合在了一起成为秘鲁的一个传奇。

在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后,卡巴雅尔和其他顾问一起敦促皮萨罗自称自己为秘鲁国王。但是皮萨罗比他具有钢铁意志的中尉软弱,对

自己革命行动的意义也犹豫不决。1548年代表佩德罗·瓦斯加(Pedro de la Gasca)到达后龙吉玛的西班牙人,很快执行了法令,所有对叛乱忏悔的人都将得到赦免和奖励,这引发皮萨罗军队中不断有少数人逃走,并很快发展为退军大潮。

最后,叛乱几乎不战而溃,叛乱领导者也被处决。在秘鲁内战之前这一恩怨一直在继续,皮萨罗因个“倒毒的兄弟”和何塞·马格家族,父亲和儿子,都因暴力致死;一个总督被杀;无数人充军入狱。直到弗朗西斯科·德托莱多(Francisco de Toledo)总督执政的时候,这个国家的和平和秩序才稳固地建立起来,他在1569年来到,即在内战开始的四分之三世纪之后。

少数西班牙人如何赢得了两个帝国

西班牙人的征服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一小部分西班牙人,起初只有几百人,如何征服了人口数量上百万,军队强大并且有自己军事传统的阿兹特克和印加帝国?西班牙人相对轻松地征服了阿兹特克人和印加人,这些人以城邦为组织,以密集农业为基础过着稳定的生活,完全服从皇帝的管理。另一方面,边缘部落的文化,如墨西哥平原北部游牧的奇奇梅克人或者智利的阿劳坎人,实行简单的轮耕农业和放牧,他们异常顽强;阿劳坎人几百年间不断和西班牙入侵者及他们的后代战斗,直到1883年。

16世纪的西班牙士兵和才智非凡的编年史家,佩德罗·奇扎·德莱昂(Pedro Cieza de León)对印加帝国的迅速崩溃和西班牙人未能征服“野蛮的”哥伦比亚丛林部落两者间的对照进行了思考,给出的解释是部落简单的社会和经济组织中的人们在西班牙人进攻之前逃跑成为可能,并且很快就在别处重建村庄生活。与之相对照,大部分的印加人,是温顺的主体,他们把皇帝的失败看做自己的失败,并很快服从于新的西班牙主人。因为对这些人而言,从印加肥沃的山谷逃到在地理上由沙漠、荒凉的高原和冰雪覆盖群山为主要的地区,将会是难以想象的。

尽管奇托的洞见深刻,但是人们并不满意关于这些伟大帝国迅速崩溃的解释。他们认为招致这一结果至少有四个原因:

1. 西班牙的武器和人炮,尽管依据现代标准而言是原始的,但是使入侵者具备了比阿兹特克人和印加人有决定性的优势。印加人装备是弓箭、木矛、长矛和飞镖、投石器、装有石头或铜头的战争棍棒,以及木头装有黑曜石的木刀。而对西班牙人更具决定性的是马,一种阿兹特克人和印加人都不了解的动物,它至少在起初让人畏惧。西班牙人装备精良的矛和剑,裹着铠甲和链子甲,力量强大令人吃惊足以抵消阿兹特克人的攻击力。一次又一次,少数西班牙骑兵部队击败了人数多得多的阿兹特克和印加勇士。

2. 疾病,尤其是天花,不知不觉被入侵者带进来,成为西班牙人的重要盟友。可以举一个例子,西班牙人围攻特诺奇提特兰城的时候流行天花,因此全特拉克(Cutlahuac)和许多阿兹特克士兵、市民都因之死去,因此也加速了它的陷落。

3. 西班牙人的观念基本上是文艺复兴时期时的世俗观念,而他们的对手则代表了一种更古老的世界观,在这一世界观中仪式和魔法起着重要作用。可以肯定地说,征服者部分是被宗教热情驱动的。然而,对于西班牙人,战争基本上是一门科学或艺术,是以欧洲数世纪以来军事战略和策略的研元和运用为基础的。对于阿兹特克人和印加人来说,战争有重大的宗教成分。比如,阿兹特克人的战争策略强调抓到西班牙人并把他们拖到神前祭祀,而不是当场杀死。阿兹特克人和印加人的战争也包括详细的仪式和风俗习惯,要求人们要给予袭击目标适当的提醒。西班牙人则不受这种风俗的限制。^①

4. 内部分化是这些帝国迅速崩溃的一个主要原因。进贡国的人们或者未被收服的人如特拉克斯卡兰人仇恨阿兹特克人,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他们在最后对特诺奇提特兰的战斗中形成了科尔特斯兵力中的

^① 阿拉瓦的《要求书》(Requerimiento),一份为满足西班牙国王的道德良心而设计的文件,它包含当西班牙人在征服美洲土著时要求。对于这一文件的滑稽运用,参见第四章。

大部分力量。在今人的秘鲁地区,在印加的两个王位继承者和他们的随从之间的冲突使王权直接落到了皮萨罗的手里。印加帝国是一个诸城邦的组合体,一些城邦刚刚合并到帝国,因此这些城邦的前任领主或库拉加们渴望重新获得独立,因此和西班牙这一方联合起来。等他们发现他们只是换了一个更糟糕的压迫者的时候就已经来不及了。

就这样,因为西班牙人优势的兵力和带来的导致大量死亡的致命性疾病、和当地帝国人不同的世界观以及帝国自身的内部分歧,这些发达、高度组织化的帝国就败给了西班牙人。

寻找黄金国(El Dorado)

在北美的失败

从其最初的西印度基地和从两个新的墨西哥和秘鲁中心,西班牙人伟大的征服运动向西面八方辐射。当西班牙人的舰队从太平洋水域出发寻找香料之岛的时候,寻找新的黄金王国的陆上探险运动在北美洲和南美洲内部正甚嚣尘上。

北美洲大陆早就吸引了以西印度为基础的西班牙淘金者和奴隶贩子。1513年,波多黎各总督庞塞·德里昂(Ponce de Leon)向西航行并宣称他发现了一块亚热带土地,并将其命名为拉·佛罗里达(La Florida),但接下来要殖民化这个地区的努力因他的死亡而告终。16世纪20年代的另一次探险由能力不足的潘佛罗·德纳尔瓦坎斯(Pánfilo de Narváez)带领,探险队在广阔无垠的佛罗里达遇到了灾难,只有四人活了下来。这四个人中有后来的编年史记载者,诚实而仁慈的阿尔瓦·努涅斯·卡布扎·德巴卡(Alvar Nunez Cabeza de Vaca),他在迂回徒步穿过得克萨斯平原后,安全地抵达墨西哥。

卡布扎·德巴卡的冒险故事和他们提供的远在地平线之外的人口稠密的城市的线索,激起了具有征服秘鲁的丰富经验的征服者赫尔南多·德索托(Hernando de Soto)的热情,他试图得到佛罗里达的财富。1542年,经过三年无益的游荡和与当地土著的战斗,在到达今人的卡

在戈川和萨姆戈斯川之间的广袤地区时,德索托因高烧而死于荒野中。

卡布拉·德马卡和他的三个同伴在 1536 年抵达墨西哥后讲述的冒险故事,甚至有个叫弗雷·马科斯(Fray Marcos)的人宣称,他已经发现了一个七个神秘黄金王国中的一个——西勃拉(Cibola),使安东尼奥·门多萨(Antonio de Mendoza)总督信以为真。他于 1540 年派了一支由弗朗西斯科·瓦斯奎兹·德科罗拉多(Francisco Vazquez de Coronado)带领的北方探险队。西班牙装备盔甲的骑士团在寻找传说中的黄金王国,经过了后来的亚利桑那州、新墨西哥州、科罗拉多州、俄克拉荷马州、堪萨斯州,可能还有内布拉斯加州。西勃拉王国,如果存在的话,也许在亚利桑那的祖尼布洛人(Zuni pueblos)简陋贫



在这幅大卫·阿法罗·西奎罗斯(David Alfaro Siqueiros)所做的壁画《与神话相反的考乌特莫克》中,他使考乌特莫克成为不朽。考乌特莫克是阿兹特克的最后一任国王,在抵抗西班牙人的征服中死去。对于许多墨西哥人而言,他已经成为反叛和抵抗外来入侵与压迫的象征。

穷的现实使科罗扩多的梦幻破灭了。他又继续向东推进以寻找另一个黄金国,这次被称为基维拉(Quivira)。入侵者在他们的行程中,没有留下任何踪迹,西班牙人被广袤无际的大平原击退,带着寻金无果的大受痛苦返回了家乡。

南美的挫折

虚幻的黄金诱惑西班牙骑士团进入西南沙漠,同时也在南美洲的丛林和山脉中召唤着他们。从奥基于1525年的现代哥伦比亚海岸的圣玛尔塔(Santa Marta)镇出发,贡萨洛·希门尼斯·德克斯达(Gonzalo Jimenez de Quesada)带领的一支探险队于1536年开始了穿越马格达莱纳河(the Magdalena River),寻找黄金和通向太平洋通道的艰苦行程。他们最终出现在奇布查人居住的马格达莱纳高原东部之前,遭受了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奇布查人主要是农民,在铸造金饰和铜饰方面技术娴熟,他们生活在栅栏围起来的镇子里,接受叫做奇帕(the Zipa)的首长统治。打败他们之后,希门尼斯·德克斯达在1538年建立了圣菲波哥大(Santa Fe de Bogota)镇,即后来的新格拉纳达(New Granada)省的首府。从奇布查人那里掠夺的大量黄金和翡翠财宝激发了西班牙人的想象力,也燃起了他们关于其他黄金王国的幻想。这些传说中最著名的是关于黄金国(金人)的传说。

香料梦也给西班牙征服者的冒险事业带来了灵感,他们被东方生长着大量肉桂树的说法所吸引。贡萨洛·皮萨罗带领了一支探险队,于1539年从今天厄瓜多尔的基多(Quito)出发,翻过安第斯山脉来到了森林密布的东面山坡。他们在那里发现了肉桂,但令人失望的是数量太少。西班牙入侵者在当地关于天边富有王国的荒诞故事的诱惑下,鼓舞精神继续前行,以致使这些寻宝者陷入旷野深处。贡萨洛的一个中尉,弗兰西斯科·德奥雷利亚纳(Francisco de Orellana)被委派带着几个人沿着一条河流寻找食物,结果因河流湍急无法返回,他们只好继续沿着一条大河前行。他们乘着两条勉强可称为船的船行进了1800里格,终于出现在河口,到达了西班牙在委内瑞拉的定居点。在

在圣佩德罗的岸边,奥雷利亚纳和当地人发生了冲突,连当地的妇女都加入到了战斗中。这个这条河命名的西班牙名字是亚马孙河,说明了在西班牙人的征服中制造神话的过程。

他们到达的大陆南部几乎没有金银,那里只有新的农业和游牧定居点。1537年,皮萨罗的战友和对手,迭戈·德阿尔马格罗在穿过崎岖的安第斯山脉,阿蒂普拉诺高原(Andean altiplano)和阳光炙烤的智利沙漠寻找金子但一无所获之后,极度失望地返回。两年后,皮萨罗的副手多·瓦尔迪维亚(Pedro de Valdivia)承担了征服秘鲁以南的任务。穿过智利北部的沙漠之后,瓦尔迪维亚到达了富饶的中部山谷,并在那里建立了圣地亚哥镇。在和阿劳加诺人的持续斗争中,瓦尔迪维亚建立了以其他更温和的当地人的奴役劳动为基础的西班牙殖民地的基础。他在1553年的一次南方探险中被阿劳坎人抓住并杀死。

同一时期(1536),西班牙殖民地的先遣官佩德罗·德门多萨(Pedro de Mendoza)的14艘船带了2500名殖民者,在拉普拉塔河(Rio de la Plata)河口建立了布宜诺斯艾利斯镇。但是不久,饥饿的居民就放弃了布宜诺斯艾利斯,迁移到约1000英里外的上游,并在巴拉圭建立了新的亚松森(Asunción)镇,那里气候温和、食物充足,而且大量温顺的瓜拉尼(Guarani)人也对西班牙人的定居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亚松森成为巴拉圭以及南美东南部所有西班牙人地区的都城。

征服者们

对美洲的征服吸引了大量的探险者,有些具有在意大利战争中服役的背景,有些想要忘记他们过去经历的专职士兵们组成了这支队伍。老资格的征服者贡萨洛·费尔南德斯·德奥维多(Gonzalo Fernández de Oviedo)曾经对人有这样的看法,他告诫探险的组织者要提防“衣着华丽者和夸夸其谈者”,他们“或者会杀死你、或者会卖了你、或者会在他们发现你在西班牙许诺的比你产生的更多时背弃你”。在塞万提斯《模范故事集》的一个故事中,他把美洲描述为“绝望的西班牙人的避

难所和庇护地,反叛者的圣地,谋杀者的通行区”。难怪这一类型的人们在玷污西班牙征服的暴行中比他们分内的贡献更大。但是征服者的背景非常不同,几乎涉及西班牙所有的社会阶层。大多数是平民,但是也有一些处于边缘的西班牙低等贵族依达尔哥和一些希望增加财富的穷绅士。1532年,168个人在卡哈马卡捉住了阿塔瓦尔帕,其中58人是希达哥,91人是平民,其余的人背景不明或不确。根据研究卡哈马卡事件中人物的詹姆斯·洛克哈特(James Lockhart),这群人中有51人肯定有文化,大约76人“几乎可以肯定有识字功能”。这群人中有19名手工业者,12名公证员或职员,以及15名“买卖人”。

到16世纪20年代,一个从西班牙的征服中承袭的机构《战友会》(compana),其成员根据一定的规则分享征服的利益,已经成为西班牙在新世界扩展的首要工具。其顶端是军队首领,通常拥有王家协议,被授予“先遣官(adelantado)”的头衔并且拥有被征服地的完全权。这些人有时利用自己的权利变富并且贡献巨大,有些人也由于探索的巨额支出而背上了巨额债务。意大利、德国和西班牙商人资本家和王室官员变富是通过奴隶贸易或其他方式提供装备船队需要的大量资金,从而获得马匹和奴隶,他们还供应武器和食物。

原则上,战友会实行军事民主,战利品的分配是由一个从整个部队中选出的人组成的委员会执行的。在抽出王室第五税(the quinto)和共同债务之后,剩下的战利品就被平均分配。阿塔瓦尔帕的财富被分为217等份,每份价值5345金比索,在那时是个小数目。分配与个人的级别高低和贡献相符。标准是雇佣兵(peón)或者步兵一份,绅士(caballero)或骑兵(一份给骑士,一份给马匹)两份,军官更多。

尽管有其民主的方面,但是军官、大投资者和王室军官控制着征服事业,而且他们自己攫取了其中的最大份额。战友会中,有些人是军官们或投资者们的仆役或奴隶,他们的全部或部分份额都属于他们的雇主或主人。另外的情况是,征服者必须借用或者借钱买他们自己的装备,因此他们收入的大部分都还给了他们的债主。今天的一些人埋怨一些军官的掠夺性方式,他们在需要的时候以可观的价格把装备卖给

的部下。在初期,每一次征服都有赐封式的分配。手工业者和其
 他在征服墨西哥和秘鲁后都得到了赐封地;然而,后来只有探险的
 领导者们和希达哥成员才被授予此种奖励。

许多征服者冷酷、残忍,彼此之间相处困难,和土著更难以相容。
 历史学家及编年史记载者贡萨洛·费尔南德斯·德奥维耶多(Gonzalo
 Fernandez de Oviedo),一个狂热的帝国崇拜者写道,一些征服者可以
 史无前例地首之利刃“是太阳的刽子手和毁灭者”。征服者的残酷也反映
 成其性格的条件:从长达7个世纪之久的反对摩尔人的战争中形
 成了西班牙暴力与血腥,大多数西班牙人在财富分配极其不均的社会
 中苦苦挣扎,以及血腥的殖民战争的影响。

然而,如果我们由此得出结论,认为所有的征服者都符合这种负面
 的评价却是不对的。一些征服者也由于他们的经历而转变了,变得谦
 虚并尊重当地土著人的价值观,或者甚至承认“印第安人”在道德上比
 西班牙人更有优越性。这是卡布扎·德巴卡从得克萨斯到墨西哥海湾
 沿岸徒步旅行八年过程中认识到的。他在叙述这次冒险经历时说,
 西班牙人表现得像野蛮人,而“印第安人”则表现人道而文明。另一个
 历史学家托·德莱昂,“编年史者中的王子”,曾高度赞扬印加文明,批
 评征服的残忍,并且明确赞同拉斯卡萨斯的观点。还有另外一个征服
 者,阿隆索·德埃尔西利亚(Alonso de Ercilla),16世纪西班牙最好的
 叙事诗《阿劳加那》(*La Araucana*)的作者,在诗中讲述了智利的阿劳
 加诺人反对西班牙人的斗争,赞扬甚至歌颂阿劳加诺人,他们在整首诗
 都是作为必定要出现的英雄人物出现的。然而,胜利的西班牙人则被
 刻画为胆小、贪婪和自私。

西班牙征服者通常被认定的动机有三个(上帝、黄金和荣耀),第二
 个在大多数人的头脑中肯定是最重要的。“不要说你去印度群岛是为
 国王服务,或者说为证明自己在服务期间是个勇敢的人,或者是一个希
 达哥应该做的那样”奥维多在一封给未来征服者的公开信中评论说,
 “因为你知道事实恰恰相反:你去只是因为你想比你的父亲或邻居有
 更多财富。”皮萨罗在他回答一个敦促他传播信仰的必要性的神父时更

为直白：“我来这里没有其他原因，我来这里就是为了拿走他们的金子。”征服者和墨西哥征服的编年史家，伯纳尔·迪亚兹·德尔·卡斯蒂略(Bernal Díaz del Castillo)坦率地宣称，征服者死于“为神及其威权的服务中，给那些仍在黑暗中的人以光明——同时也获得了大多数人垂涎的金子”。

大多数征服者的最终梦想是带着足够的金子返回西班牙，建立一个家庭，过着能赢得尊敬和被他们邻居羡慕的生活。只有一少部分人，主要是大商人和委托监护主(encomenderos)，需要得到金矿满足他们的野心，并不是所有这些人都会返回西班牙。大多数没有赐封地或其他财富来源的人，保持着且常常和更强有力的西班牙人形成依赖关系，他们通常作为艺术家、雇佣军人，委托监护地和其他手工业的看管人为委托监护主服务。1535年之后，越来越多未来的征服者来到美洲，那时加入获利丰厚征服的机会已经减少。结果，大量失业和骚乱的西班牙人的问题引起了官员以及国王的严重关切。

大多数征服者和其他早期定居西印度群岛的西班牙人是单身的年轻男性，也有少量已婚男性把妻子留在家中自己出来寻找财富。除了偶尔的女性或随军家属之外，几乎没有西班牙妇女陪同探险。然而，一旦战争停止，就有少数西班牙妇女渡过大西洋。一些是和她们的丈夫会合的妻子们(一般法律并不强制要求已婚男子必须和他的妻子生活在一起，或者他会被驱逐回西班牙)；另外一些是定居者的母亲、姐妹或者侄女、外甥女们。和当地妇女通婚并不常见；即使希达哥们也很高兴能有机会和富有的当地贵族女性结婚，如蒙特祖玛的女儿，德丰希珀(Tecuixpo, 又名 Isabel Moctezuma)先后有过三个西班牙丈夫。然而，16世纪中叶之后，各个社会阶层的大部分西班牙人都更愿意和西班牙妇女结婚，无论她们是移民过来的还是在西印度群岛出生的。到1575年时，以牢固的血缘关系和宗教信仰为基础的西西班牙家庭和家族已经重新建立起来。

在成千上万勇敢的军官和他们骑马或行军在卡斯蒂利亚旗帜下去征服美洲的随从中，几乎没有几个能活到享受他们的勇气、苦难和残酷

力与成果。“我不喜欢先遣官的称号，”奥维多写道，“因为荣誉和称号在西印度群岛实际上就是罪恶的预兆，许多拥有它的人都没有好结局。”那些在战争和行军中活下来的人中，很少能得到最好的战利品、土地和劳力；大多数人仍旧在简朴甚至更糟糕的环境中生活，而且常常举目无亲。^①征服者之间的贫富冲突对征服后几十年西印度群岛一触即发的紧张局势产生了重要影响。

74

诺普·德阿吉雷——征服的受害者

那种冲突是造成可怕情绪的主要因素，并导致了印加帝国陨落，以及残酷的内战和秘鲁西班牙人的叛乱。虽然贡萨洛·皮萨罗的军队于1548年被击败，但是并没有给秘鲁带来持久和平，因为它遗留下了许多满腹不满的探矿者，他们曾经从西印度群岛的四面八方汇集而来加入了反对皮萨罗的斗争。这些人希望从国王那里得到适当补偿。相反，诡计多端打败皮萨罗的拉·加斯卡(La Gasca)给那些站在皮萨罗反对国王这一边的富人和有权势的朋友们增加委托监护地。许多战士都有被出卖的感觉，佩罗·洛佩兹(Pero López)表达了这一情绪，他指责加斯卡抛弃了“陛下所有的穷仆役，但是让陛下的许多敌人保留他们的全部财产，甚至给他们更多。”

总督卡涅特(Canete)在他1551年写给查尔斯五世的一封信中清晰地描述了经济问题的实质；他报告说，在秘鲁只有480个委托监护地，但西班牙人的数量是8000人。即使把殖民地的行政管理工作包括在内，也只有1000个西班牙人可以“维持生计”。卡涅特提出解决秘鲁失业灾难的办法就是打发他们到新的征服地，“因为众所周知，他们不会工作，不会开垦，不会耕耘，而且他们说来到这里不是为了做这些事情”。皇帝同意了方案，允许新的征服，他在1555年12月写给总督的信中说，要“根除并清理那些当前仍旧在乡村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的人，他们将出发去从事那一事业……”为此，查尔斯废除了1549

① 即征服者之间的贫富冲突。——译者注

年签发的法令,那一法令是在拉斯·卡萨斯的强烈催促下禁止新的征服的。

著名的洛佩·德·安吉雷(Lope de Aguirre)的“流浪者”生涯,给丧失继承权的以土人自居的征服者的心理和精神上都投射了一丝诱人的曙光。安吉雷是一个经验丰富的征服者,30岁,一条腿受伤跛了,当关于亚马孙的旷野中心有一个新的黄金国的传言在秘鲁地区讨论的时候,他已经花费了四分之一世纪在西印度群岛寻找黄金。他认为无论传说中的王国是否存在,它都为潜在的征服者和社会提供提供了一个便利的解决途径。1559年,总督安德烈斯·乌尔塔多·门多萨(Andrés Hurtado de Mendoza)任命佩德罗·德·乌苏亚(Pedro de Ursúa)带领一支探险队寻找“奥马瓜族(Omagua)和黄金”的地区。探险队从亚马孙河的一条支流瓦亚加(Huallaga)河出发寻找传说中的王国的时候,安吉雷在他年轻的混血女儿的陪同下,加入了这支队伍。证明,乌苏亚是个无能的领导者,加上难以忍受的热、疾病和食物匮乏加重了不安情绪,不久就演变成兵变,领导者乌苏亚和乌苏亚被杀,而且尽管叛乱者推举西班牙贵族费尔南多·德·古兹曼(Fernand de Guzmán)作为他们的名义领袖“王子”,但是安吉雷很大程度地成为这支队伍无可争议的领袖。

他制订了一个大胆的新计划,这一计划和寻找黄金毫无关系。他在计划中号召征服秘鲁,推翻当前的统治者,奖励老的征服者奖励自己:

这是为了我们在征服中以及镇压那些王国中土著印第安人付出的劳动。因为尽管我们不辞辛劳、赴汤蹈火战胜了那些印第安人,但我们付出了代价却一无所获……相反总督却用欺骗和假象流放我们,说我们要去的地方是世界上最好的、人口最稠密,但实际上却是环境恶劣的无人居住区……

在亚马孙河岸建造了两艘大船之后,探险队沿着这条大河出发,准备去征服秘鲁。安吉雷不信任古兹曼,他不久就杀死了“主

“和秘鲁王子”以及他的情妇和随从们。1561年7月,当安吉雷和他的人进入大西洋的时候,其他的一些杀戮已经使西班牙人从370人减少到250人。他们航行经过圭亚那海岸的时候,夺取了玛格丽塔(Margarita)岛并杀死了地方长官。9月,他们在委内瑞拉海岸登陆,占领了巴伦西亚(Valencia)镇,并且宣布要以“火炮和刺刀内战内战争”反对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

第四章 殖民地生活的经济基础

焦点问题：

- 西班牙对土著居民采取了什么样的政策？这又如何影响到殖民地经济以及王室、教会和殖民者精英之间的政治冲突？
- 什么因素推动了殖民地劳动制度由委托监护制和奴隶制向劳役摊派制或米塔制、向理论上的自由劳动或债务劳役制演变？
- 哪些因素促使了委托监护制向大庄园制和采矿转型，并成为西班牙殖民地经济活动的基础？
- 殖民地经济被确定为资本主义性质或者封建主义性质，它们的典型特征是什么？
- 西班牙商业制度的主要特征是什么？它的结构性弱点又是如何影响走私和海盗的？

西班牙政府从征服一开始，就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如何协调征服者对廉价劳动力的需求与国王希望保留大规模的原住民以便向其进贡之间的矛盾，征服者却通常以极其浪费和破坏性的方式使用劳动力。殖民地前几十年的经历表明，因殖民者怜悯之心留下的原住民，要么灭绝了，像曾经发生在人口密集的伊斯帕尼奥拉岛（即今海地岛）上的

样；要么起义反抗，直接威胁到西班牙帝国在美洲的存在。国王自然不喜欢出现这两种情况。

国王还害怕西班牙殖民者对当地土地和劳动力的垄断性控制，有可能会导致独立君主政权的封建地主阶级势力的上升。对于这种事态发展，西班牙王室决定要进行阻止。教会对这个问题的兴趣也很大。如果土著居民因西班牙人的虐待而灭绝，拯救异教徒灵魂的伟大任务就会无法完成，且教会良好的声誉也会受损。此外，谁又能接着建造教堂和修道院，并且支持印第安人中上帝的仆人呢？

对土著居民政策的争论很快引发了各种思想激烈的斗争。由于深深根植于西班牙的中世纪历史之中，西班牙人16世纪的思想理念是极权主义或经院主义的。当经院主义在其他西方土地上逐渐消失的时候，在西班牙却被作为哲学方法和解决私人 and 公共问题的手段，保持着旺盛的活力。为使王室行为符合自然和神的法则，“履行王室良知”的需要就可以解释西班牙占领殖民地时的政策学说基础。土著居民的本质是什么？他们的文化水平如何？他们在本性上是亚里士多德所描述的奴隶吗，即一个次等种族，可能需要被征服并且为西班牙人服务？教皇把美洲授予西班牙国王，对土著居民要履行什么样的权利和责任？经常被国王们传唤回答这些或类似问题的法学家和神学家撰写了大量著作，他们引用亚里士多德、教父和中世纪哲学家的话，互相攻击。他们很少使用以直接观察为基础或者描述土著居民生活的资料来支持自己的立场。

77

西班牙殖民地的贡品和劳动力

然而，在西班牙对土著居民的责任进行争论的背后，一场复杂的斗争正在激烈地进行着。劳动力和贡品作为西班牙帝国在美洲的基础，应该由谁控制？国王、教会和殖民者是这场斗争的主要角色。

经院主义，中世纪占主导地位的一个哲学、哲学学说与要义体系，主要是以教父、亚里士多德及其诠释者的权威为基础。

委托监护制和奴隶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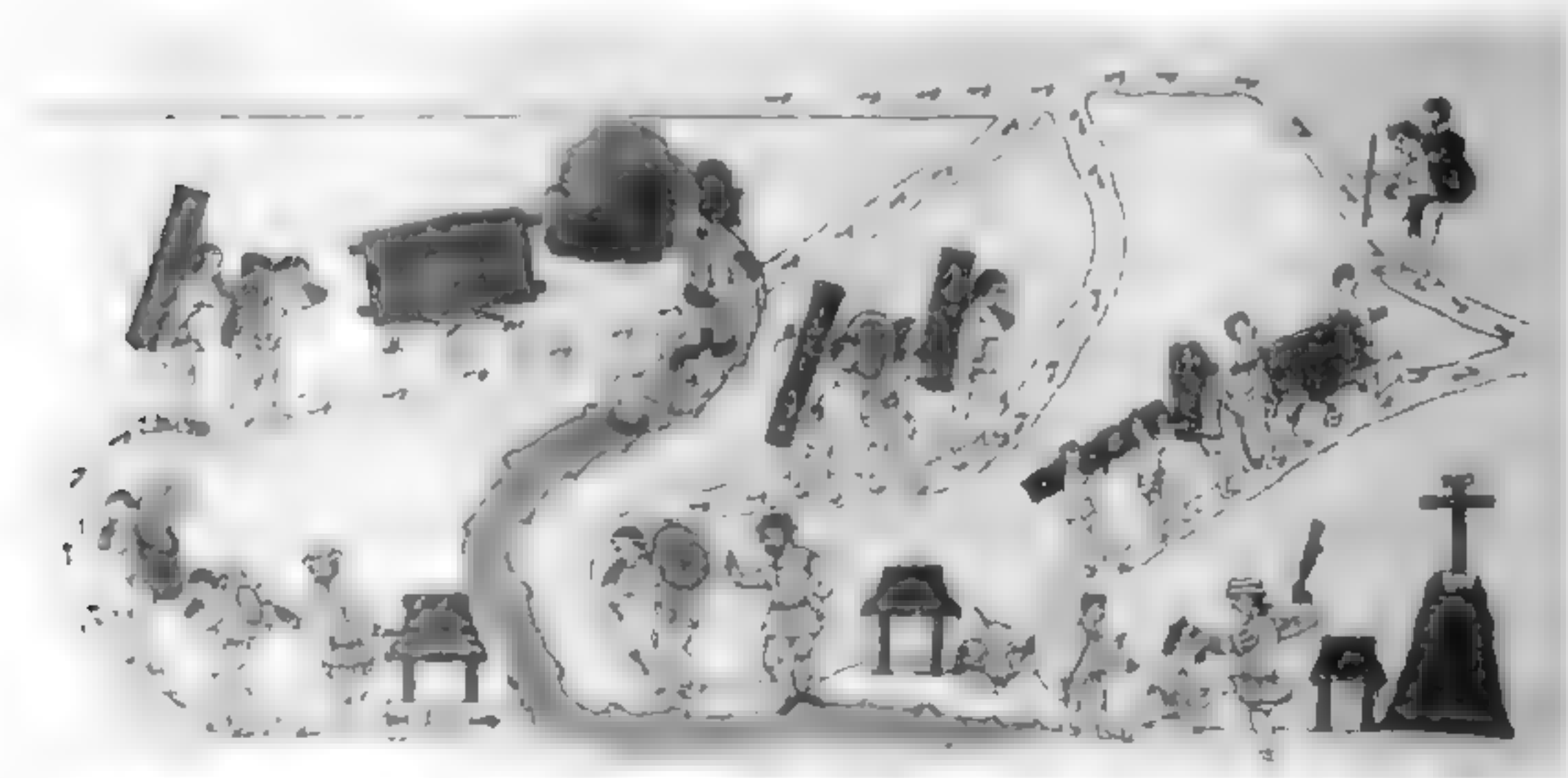
伊斯帕尼奥拉岛是西班牙政策的第一个试验场。当哥伦布在第一次探险到达该岛时,岛上的情况被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Samuel Elito Morison)恰如其分地概括为“伊斯帕尼奥拉岛简直就是地狱”。为了急切向国王证明他这个“发现”的价值,哥伦布强迫土著居民上交金粉作为日常贡品。当处于高强度劳动压力下的阿拉瓦克人起来反抗时,他们被穷追猛打,成百上千人被送往西班牙当奴隶。后来,哥伦布对难以控制的殖民者做出妥协,向他们分配阿拉瓦克人,并保证他们有权使用土著居民做强迫劳动。

这个临时性的安排,在尼古拉斯·德奥万多(Nicolas de Ovando)总督时期被正式确认,并得到国王的批准,最终变成了委托监护制。这项制度源于西班牙中世纪的实践,即给予士兵对从摩尔人那里得到的土地和人的管辖权。委托监护制规定了殖民者要对土著居民负应有的责任。土著居民要向殖民者提供贡品和劳动服务,反过来,殖民者要承担保护土著居民、支付教区牧师工资及协助保卫殖民地的义务。实际上,委托监护制在西印度群岛证明是可怕的奴隶制。这种虐待的后果基本上是使伊斯帕尼奥拉岛上的人口在20年内从几百万下降到了29000人。人口下降不是因为流行病,因为1518年前安的列斯群岛没有任何流行病的记录。

第一个反对这种状况的声音来自于1510年到达伊斯帕尼奥拉岛的“多明我会”的传教士们。他们的领导者安东·蒙特西诺斯(Antón Montesinos)神父,在1511年“降临节主日”(Advent Sunday)登上教堂的布道台,谴责了岛上的西班牙人会因对土著人的冒犯行为而遭受诅咒。愤怒的殖民者与“多明我会”传教士很快在法庭展开了辩论。费迪南德国王对此给予回应,批准了《布尔戈斯法》(Laws of Burgos 1512—1513)。这项法律仅仅是认可了现存状况,并加以合法化。

这些事件引发了一个更大的问题,即西班牙拥有西印度群岛的合法性问题。为了使王室的良心得到满足,一位出色的法学家胡安·劳

胡安·德巴托洛梅·卢比奥斯(Juan López de Palacios Rubios)博士起草了一份名为《请求书》(Requerimiento)文件,要求征服者在对土著人发动战争之前,认真阅读。这个奇怪的声明要求土著人承认教会和西班牙国王至高无上的权力和西班牙国王们对他们土地的主权,这些土地是1492年由教皇赠予西班牙国王的,而且建立在痛苦的战争和奴役之上。只有当土著人拒绝由翻译传达的那些要求时,才能合法地对他们发动战争。一些征服者蔑视这个“请求书”,在进攻土著人之前,只是含含糊糊地读一下,或者在突然袭击后,才向捕获的土著人阅读。编年史家贝内多·马丁内斯讲述道,当卢比奥斯听到他的文件如此奇怪地使用后,自己都尽情地大笑了。



与西班牙艺术中描绘的征服和殖民化的英雄主义文明影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个玛雅人的图画强调了西班牙人的野蛮,以及沦为奴隶的玛雅劳动力在殖民地经济中的关键作用。

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Bartolomé de Las Casas),一个以前的委托监护主,为自己的行为感到忏悔,后来成为了修道士,并加入了反对土著奴隶制度和卢比奥斯教条的行列。对于《请求书》的规定,德拉斯卡萨斯说,当他阅读的时候,不知道应该是笑还是哭。他还争论道,教皇把美洲赐予卡斯蒂利亚国王,只是为了皈依的目的;他授给西班牙国王的不是暂时的权力,而是对西印度群岛的完全占有。依据自然法则和国家的法律,印第安人理所当然地应拥有他们的土地。所有西班牙

牙人在新世界的战争和征服都是违法的。西班牙只能用一种方法把基督教带到土著那里,就是“对人们是合适、自然的……也就是,爱、和善和仁慈”。

德拉斯卡萨斯渴望在新世界以和平的方式搞殖民化,让西班牙农民和土著人生活居住在一起,教他们欧洲的耕种和生活方式,并慢慢地变成一个理想的基督教社区。一系列使幻想破灭的经历,包括1521年委内瑞拉海岸一个实验性的殖民地遭到破坏,这些都使得德拉斯卡萨斯在思想上寻求更为激进的解决方案。他最后的计划要求废除所有的委托监护权,把印第安人从所有形式的奴役中解放出来;除此之外,土著人自愿给国王少许贡品,以作为对基督教这个“礼物”的补偿,而且还要恢复土著人古国、统治者以及本应属于他们的合法土地。在这些国家之上,西班牙国王可担当“众多国王的皇帝”,履行把天主教徒的忠诚和基督教徒的生活方式带给土著人的神圣职责。实现这个任务的工具应该是修道士,这些修道士可享有对土著人的管辖权,并且保护他们免受世俗西班牙人的堕落影响。尽管德拉斯卡萨斯的建议看上去很激进,实际上还是服务于王室的目的,通过控制征服者的权力,阻止新世界中强大的殖民封建主义上升的趋势。总之,不是人道主义,而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部分地解释德拉斯卡萨斯的改革努力为什么在查尔斯五世(1516—1556年在位)统治期间得到了官方支持。

随着对富裕、人口众多的墨西哥和秘鲁帝国的征服,这个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国王最基本的利益是要求曾发生在西印度群岛的灾难不要在这片新征服的土地上重演。1523年,德拉斯卡萨斯看似获得了重大胜利。查尔斯国王给科尔特斯下达了一个命令,禁止在新西班牙(指以前的阿兹特克帝国)实施委托监护制,因为“上帝创造的印第安人是自由的,不是受别人支配的”。科尔特斯已经给他自己和他的同僚们分配了委托监护权,所以并没有强制执行这个命令。在他那些顽强士兵的支持下和基于士兵们的需要,他振振有词地为委托监护制辩护,这项制度是殖民地福利和安全所必需的,因而王室的命令就被取消了。委托监护的贡品和劳动力,不断由战争中抓捕的奴隶作为补充,继续作为

土著者收入的主要来源,并持续到16世纪中期。

西印度新法和委托监护制

尽管对科尔特斯的不服从做出了让步,国王还是试图努力把土著人的贡品和劳动力纳入到王室的控制之下。国王小心翼翼地遏制征服者的权力。继第一个“匪徒式”的检审庭狂暴统治之后,公元1531至1532年新西班牙成立了第二个检审庭(audiencia),专门掠夺科尔特斯,并无情地镇压土著人。在采取对贡品和劳动力管理的第一个步骤中,第二个检审庭减少了许多土著城镇所要交纳的贡品,提供贡品评估登记,而且原则上不经过他们同意,禁止把土著人当做运输工具来使用。随着1542年《西印度新法》(New Laws of the Indies)的宣布,王室的干预达到了高峰。这些法律似乎预示着委托监护制将寿终正寝。它们禁止把土著人当做奴隶,命令释放无法证明自己合法身份的奴隶,禁止强迫印第安人提供私人服务;管理贡品,并且宣布既存的委托监护权在监护主死后失效。

在秘鲁,新法激起了强烈的反抗,而在新西班牙,也引起了委托监护主和大部分教士的抗议风暴。迫于这些压力,王室又一次做出了让步。尽管法律重申禁止奴役土著人和强迫劳动,但是委托监护主后代的继承权利被认可了,可传给第三、第四代,有时候甚至传给了第五代。自此之后,或此前没有继承人的,委托监护权将转到王室名下。随着事态的自然发展,委托监护权的数量持续下降,而王室的城镇越来越多。

截至公元1560年左右,委托监护主局部地被“压制”住了。王室的主干预制约了委托监护主的权力,并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贡品和劳动力的供应,至少在殖民地的首府是这种情况。现在贡品在多数地方由检审庭评估,并且一直努力根据土著村庄人口和收成状况调整贡品数量。为此,设立了“巡查”(Visita)和“账目”(cuenta)制度。巡查是对一个土著人城镇进行检查,获取该城镇有关进贡的资源或能力,从而决定每个人的进贡额。同时,还要确立“账目”,确定进贡者人数。在1560年左右,在新西班牙,每对已婚的进贡者每年通常向国王或委托监护主进

贡一银比索和五分之四蒲式耳玉米,或者等量的其他作物。

这种评估机制和内容翔实丰富的保护性立法并没有给土著人带来重大的或持续的解脱。委托监护主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夸大人人口数量,滥用权力都是司空见惯的现象。更重要的是,在进贡者人数迅速缩减后,对重新确立“账目”和进行评估一直被拖延,导致幸存者不得不为已死去或逃跑的人承担进贡的负担。另外,在1556年菲利普二世(Felip II)登上王位之后,西班牙政策的主要动机是为了增加王室收入,以减轻国王的严重金融危机。自此,免除进贡的土著人失去了他们曾享有的优惠待遇,且进贡定额持续增多。这些措施,再加上委托监护权逐渐归王室所有,使得王室每年在新西班牙收到的贡品额在1550年至18世纪末期间,由10万比索上升到了100多万比索(这些数据没有考虑到同期价格上涨对贡品价值的影响)。

然而,对殖民者来说,委托监护权的经济价值不断下降。1549年,他们失去了从进贡者那里获得劳动力的权利,而且使委托监护权永久化的斗争也失败了。16世纪后半期土著人人口灾难性的下降,是对委托监护主阶层最致命的一个打击。在墨西哥中部,人口由1519年的人约2500万跌到了1605年的100万多一点。在秘鲁海岸中部地区,到1575年,进贡的人口只占征服前人口的4%。原因尚不明确,墨西哥和秘鲁的人口下降率,似乎沿海地区要高于高山地区。疾病,尤其土著人对来自欧洲的疾病没有免疫力,比如麻疹、天花、斑疹伤寒和疟疾,是人口数量大幅下降的主要直接原因。但是,过度工作、缺乏营养、严重的社会混乱以及丧失了生存意志也都可以解释为什么死亡率这么高。在秘鲁,毫无疑问,1535至1550年间的内战和混乱,在物质方面,加剧了人口减少。

随着进贡人数的减少,委托监护主从贡品中获得的收入也相应下降了。然而,他们的开支仍保持原样,甚至增加了,其中包括保留收取贡品的管家、支持教会牧师等费用,以及缴纳沉重的赋税。结果是,很多委托监护主,连同没有委托监护权的西班牙人,都开始从事农业、畜牧业和矿业这些有利可图的行业。土著人口的下降,急剧减少了食物和金属

1500年,刺激了生产粮食和肉的大庄园(hacienda)的迅速发展。

因而,到16世纪70年代,在墨西哥中部,以及在16世纪末期的安第斯山地的北部和中部,委托监护制失去了它原有的使用土著劳动力而不支付工资的制度特征。它作为西班牙殖民者收入来源的重要性大大降低了,并且随着委托监护权不断收归王室所有,通过这种方法,委托监护制也就消失了。然而,这些变化没有在所有地方发生。在缺乏贵金属的地区,或在农业产量很低的地区,以及在不存在殖民者权力扩张的地区,国王继续允许委托监护主继续剥削土著人,强迫他们劳动。在智利就是如此,以私人服务为基础的委托监护权一直延续到1791年;在安第斯山,这项制度一直延续到17世纪80年代;在巴拉圭,一直到19世纪初,委托监护制还依然存在。国王还允许委托监护制作为一种劳动制度在新西班牙一些地方如瓦哈卡和尤卡坦继续存在。

在巴拉圭,委托监护制表现出一个独特的形式,反映了瓜拉尼人的文化和社会组织。试图对阿根廷殖民的尝试失败后,西班牙人就迁移到了现在亚松森城市附近,并发现了有人居住的村庄,每个村庄有四至八个公共建筑物。每个建筑物里居住着由几户人家组成的父系宗亲,族长是一夫多妻。他们没有世袭的首领阶级,首领的任期主要取决于他们的个人品质,而且也没有高于村庄级别的政治组织。西班牙人赢得了瓜拉尼人的友谊,因为帮助他们打败了瓜拉尼人好战的邻居,一个游牧狩猎的族群。瓜拉尼人还以食物和女人作为礼物回报西班牙人。实际上,西班牙人变成了瓜拉尼人社会的首领阶层。由于妇女在瓜拉尼人农业和社会组织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并成为了西班牙人的姘妇,作为亲属关系中的一项义务,这些妇女的亲戚都要为西班牙人提供劳动服务。宗族或家庭由此演变成了巴拉圭人的委托监护制的基础——用这个称谓是说明,西班牙人对其周围的姘妇及她们亲人的控制正规化了,并让他们提供服务。因为西班牙人想方设法得到更多的姘妇,从而增加劳动力的数量,官方试图阻止殖民者入侵土著人村庄抢掠妇女,或者阻止用妇女与马或者狗交换,但这些努力都是徒劳的。同样,试图限制瓜拉尼人必须为西班牙人工作人数的努力也是徒劳的。

这类安排就是初始委托监护制(encomienda originaria),它一直延续到殖民地末期。与此同时,1556年,出现了第二类委托监护制——米塔亚(mitaya)。生活在以亚松森为中心、139英里为半径的区域范围内的瓜拉尼人被分配给西班牙人,根据受计人的社会等级或功劳不同,进贡者的人数也有所不同。巴拉圭不像帝国中部地区,这里不存在向劳动者支付费用,或交纳以钱或商品衡量的具体数额的贡品。截至1688年,因为疾病的灾难、混血的影响以及迁徙,只剩下21950名被委托监护权控制的瓜拉尼人登记在册。到1778年,这个数字下降到了几百人。结果是,西班牙人的后代混血种梅斯蒂索人(mestizo)开始用黑奴补充少数存活下来的瓜拉尼人,用巴拉圭茶的出口支付他们。巴拉圭茶是这个地方的主要特产,在南美洲南部极其珍贵。到1782年,该地区的黑人数量超过了瓜拉尼人。

劳役摊派制,土著仆役制(又称亚纳科纳制,yanaconaje)和自由劳动力

在1550年之后的墨西哥中部和安第斯高地的主要地区,劳役摊派制(Repartimiento)这一新的制度取代了强迫劳动的委托监护制。在这个制度下,所有印第安人成年男性必须每年轮流在西班牙的矿区或作坊、农场和畜牧场以及公共工程中劳动一段时间。王室希望这样能够调节使用日渐减少的土著劳动力资源,并使得委托监护主,特别是日益增长的没有委托监护权的西班牙人能够获得劳动力。印第安人收到了象征性的工资,但是像委托监护制一样,劳役摊派制实质上是奴隶制的一种伪装。那些逃避劳役和未能按时上交定额贡品的社区领导被关进监狱或罚款,甚至体罚。

在秘鲁,土著的状况似乎比新西班牙还要糟糕,劳役摊派制(这里被称为米塔,Mita)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16世纪70年代,由弗朗西斯科·德托莱多(Francisco de Toledo)发展出来的这个制度规定,在实施米塔制的所有地方,所有健全的上等男性必须在波多西(Potosi)或其他矿区中心工作六个月,或者被分配给其他西班牙雇主。在米塔

同时,对矿工来说,波多西银矿和万卡维利亚(Huancavelica)水银矿就是臭名昭著的死亡陷阱。在秘鲁和玻利维亚,米塔制是矿业和农业劳动力的重要来源,一直延续到殖民地末期。

在安第斯地区,还存在从印加社会继承过来的土著仆役制度,作为对劳役摊派制的补充。这项制度把土著人从他们的社区中分离出来,被迫以私人奴仆的身份为西班牙人服务。像欧洲的奴仆一样,这些奴仆们作为财产的一部分,在庄园主之间相互转让。估计到了16世纪末,西班牙人庄园里的奴仆人数几乎与生活在他们社区中的土著人的数量旗鼓相当了。

虽然劳役摊派制暂时解决了严重的劳动力供应问题,但是很多西班牙庄园主对此并不表示满意,因为它不能提供一个可靠、持续的劳动力供应渠道。很久以前,新西班牙的矿主和大庄园主就开始越来越多地使用需要支付工资的劳动力。繁重的贡品和劳役摊派的负担都落在了不断缩减的土著人头上,再加上西班牙人对印第安人社区土地的侵占,迫使很多人愿意接受大庄园主的邀请而成为农场的劳动力,因为可以获得工资,大多数情况都是以实物支付的,很多人在他们的社区和大庄园之间奔走工作,而另外一些人变成了大庄园的常住雇农。然而,还有一些人被吸引到工资相对较高的北部银矿区去了。

当国王1630年废除了墨西哥中部的农业劳役摊派制时,几乎没有激起任何反抗,因为大多数大庄园主依靠带工资的劳动力。然而,劳役摊派制仍在新西班牙的矿区保留着,一直沿用到18世纪,但其重要性微乎其微了,因为新西班牙的矿区主要靠合同制劳工运转。在秘鲁和玻利维亚,付工资的劳动力不占重要地位,因为土著仆役制作为米塔制的补充,为高成本的银矿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然而,在17世纪的波多西矿区,矿工雇佣了4万名土著人自由劳动力,被称为“民咖”(minga)^①。

① 在17世纪末,由于传染病肆虐以及实施米塔制地区土著的迁移逃离,土著劳动力逐渐短缺,导致了米塔制劳役摊派制被工资所替代。这些银子是从土著社区收取的,并由他们的头领(cura)支付给矿主用来雇佣。矿主们用这些银子支付“民咖”自由劳动力,并雇用弥补“民咖”劳动力不足的米塔制下的劳动力“米塔么”(mitayo)。

从一开始,这种支付工资的劳动力常常与债务劳役相联系。17世纪后半期,劳役摊派制或商品摊派制(*repartimiento de mercancías*)发展了起来^①,后者指土著村庄必须强制性地从督办(*corregidores*),市长(*alcaldes mayores*)那里购买商品。除了其他负担外,摊派制是土著被迫接受西班牙人地主预付的现金和贡品的一个强有力的诱导因素;而贡品的支付通常也应计算在内。一个负债累累的土著人必须为他的雇主工作,直到偿还所有债务。不管债务劳役名称的言名,不管是否为债务所迫,它还是有其绝对的优点。它通常把印第安人从周期性的贡品和他们社区摊派劳役的负担中解放出来,并且可获得小块土地,为他们自己和家人劳动。但是,如果说大庄园提供了从无法忍受的条件下逃离的机会,那么它却加重了仍然生活在祖先遗留下来的土地上的人们的困难。大庄园通过合法或非常的方式扩大,牺牲了土著印第安村庄的利益,合并了一个个城镇,并没有给其他人留下足够的土地。大庄园主从印第安村庄里吸引了大量劳动力,使得土著城镇很难完成他们的贡品和摊派的劳役。在通常被西班牙文献称为印第安人城镇(*republica de indios*)和西班牙人城镇(*republica de españoles*)两种城镇之间,横贯着一道充满敌意和不信任的鸿沟。

债务劳役制作为一种保护和维持劳动力的重要方式,似乎与支付工资的劳动力供应有所不同。在劳动力稀缺的墨西哥北部,债务劳役被广泛采用,但是在劳动力充足的墨西哥中部,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一些近期的研究强调,债务劳役制“更多是激励,而不是束缚”,它的发展规模反映了劳动力与雇主的讨价还价能力,且大庄园主有时候几乎根本不会费力去找回没有偿还债务而逃跑的劳工。对这种相对很少关注逃亡劳工的事实主要来自18世纪后期的墨西哥,那时劳动力已经变得越来越充足。在之前的劳动力稀缺时期,存在大量证据表明,印第安人被强迫留在大庄园,直到还清债务才能离开。的确,大庄园主和官员有时候把墨西哥的债务农看作为欧洲的奴仆,他们所拥有的债务农提

① 劳役摊派制这个术语也被用于定期招募土著人作为西班牙人社区的劳动力。

服务的权利,随着大庄园的转让而转交给新的主人。

债务劳役在农业和矿业上被广泛应用,在很多生产布匹和其他商品的作坊(cobra)里,呈现出了最为苛刻的形式。这些作坊在16世纪和17世纪许多地区涌现出来。西班牙法官向作坊的主人们分配被剥夺的劳动力,这就是早期“免费”土著劳动力补给方式,他们通过各种手段诱骗土著人来获得这种劳动力。土著人通常被一些酒和一点钱引到作坊里,一旦进了大门,就再没有被放出来。“用这种方法”,17世纪的观察员写道,“他们聚集和欺骗了很多已经有家室的已婚印第安人,他们被迫在这里长达20年,或者更长,甚至他们的妻子或儿女都出生在门内,他们不知情;即使他们想逃出去,也没有办法,因为警惕性极强的看门人把守着出口。”

黑奴制

与奴隶制奴隶制——劳役摊派制和债务劳役制同时存在的还有黑奴制。之所以如此,有诸多原因,其中包括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习惯于使用黑奴,并存在着这种信仰,即黑人是《圣经》中含^①的后代,忍受着他们的目光,且最好能够承担种植园里艰辛的劳动;“印第安人”的西班牙保护者也没有对沦为奴隶的非洲人表示出同样的热情。

83

实际上,15世纪初甘蔗农业在西印度群岛迅速发展,造成对黑奴劳动力的需求持续增加,以补充不断减少的土著人劳动力。就此,出现了有利可图的奴隶贸易,主要是由外国私人或公司与西班牙国王签署合同来实施。由于购买奴隶费用高昂,对他们的使用也就更多地局限于高利润的种植园,或者在富人家中提供家政服务。多数黑奴居住在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沿海海岸,在这些地方被雇佣,从事可可、糖和烟草等农作物生产。在秘鲁沿海边山谷里,他们在糖和棉花种植园里劳动,但在印第安人居住的所有地方,都能发现小规模的黑奴聚居地。在第五章,我们会讨论一个富有争议的问题,即在西班牙美洲的非洲人奴

① 含,《圣经》中诺亚的次子,传说是非洲人的祖先。——编者注

隶制是否比在其他欧洲殖民地的“更温和”。

概括来说,所有的殖民劳动制度都依赖不同程度的奴役和压迫。尽管合同制劳动力作为理论上的规范慢慢出现了,但上文描述的所有劳动制度在整个殖民地期间都是共存的。例如,1712年,对于土著人的奴隶制被合法地废除了,但在边远地区,它依然以各种借口一直存续到了18世纪。在一定时期和特定地区,哪种劳动制度居于主导地位取决于以下这些因素:比如,该地区的自然资源、欧洲人的数量和他们的经济活动的特征、当地人口规模和文化水平以及土著的经济和政治利益等。最后,应注意的是,在16和17世纪,由于梅斯基索人、自由黑人、穆拉托人及贫困白人的加入,劳动力规模逐渐扩大了。这些人大多免除了委托监护制和劳役摊派制规定的义务,通常从事支付工资的工作,并且自由迁徙,但是,像印第安人一样,他们因债务而被控制。在第七章,我们将讨论18世纪劳动制度的变化。

殖民地经济

征服打断了土著人社会群落传统的仅“勉强维持生存并进贡”的经济。战争和疾病夺走了很多人的生命,以致危害了生产。在一些地区,由土著人中央权威建立和维护的复杂灌溉网络遭到破坏或化为废墟。征服还改变了经济活动的特征和节奏。随着金银物品已被搜刮殆尽,对财宝的疯狂争抢也就随之结束了,委托监护制变成了从被征服者那里榨取财富的主要途径,阿兹特克和印加帝国的人们习惯了用劳动力和商品向统治者和贵族进贡。但是,尽管在征服前夕贡品的数量明显增加了,但是,这些传统的统治阶级对进贡的需求要受到风俗习惯和统治集团利用贡品能力的限制。这些贡品大多是为了消费或展示,而不是贸易。另一方面,新西班牙主人的需求却是无限的。主要是想获得金银物品,如果不能直接获得,委托监护主就会提出,在本地或远处的市场销售他们的贡品,以换取金银。受对财富无限想象的刺激,西班牙人没有考虑土著人的进贡传统,并无情地剥削他们。一位富有同情心的传教士,在1554年的记述中指出,征服前,土著人在他所在的墨西哥

教区的生活是这样的：

从来不需要给他们这么多棉布匹，也从来没听说过床、精美的棉布衣物、蜡或成千种便宜而俗艳的东西，如床单、桌布、衬衣和裙子。他们从事的一切就是耕种地上的田地，给他们盖房子，修建寺庙，并且当地主要求的时候，就同他们上交一定的实物地租。

作为商人的科尔特斯

埃尔南多·科尔特斯的商业生涯则说明了一些委托监护主经济活动的不同种类和规模。到1528年，科尔特斯的身价已达到50万金比索。一部分财富是他在征服期间前和征服刚刚结束后从特诺奇蒂特兰（阿兹特克帝国首都）及其他地方掠夺来的。但他的收入主要来源是其拥有的委托监护权。他把阿兹特帝国最富有的进贡地区分配给了自己。到1547年他去世的时候，尽管他的委托监护权已急剧减少，且贡品估价也大大降低，他每年仍可收到3万金比索。他从受委托监护的村镇里收到了大量的金粉、纺织品、玉米、家禽和其他产品。仅仅奎尔纳瓦卡（Cuernavaca，靠近墨西哥城）的印第安村庄每年就要向他进贡价值五千金比索的布料。科尔特斯的代理人把布料和其他贡品卖给贸易商，贸易商再把这些东西在墨西哥城和其他西班牙城镇零售。科尔特斯在墨西哥城拥有大量的房产。在市中心广场及其附近，他建造了店铺，一些店铺供自己使用，还有一些被租了出去。

用经济和政治词汇来衡量，科尔特斯是一个帝国的创建者。他把从委托监护领地获得的贡品和劳动力等财富投向了很多行业。尤其矿产吸引了他的注意力。在瓦哈卡和米乔阿坎（Michoacán）地区，他拥有大量的土著奴隶为他淘金，每个地区都超过了1000人；很多奴隶因过度劳累以及食物不足而死去。1529年，这些矿区给他带来了价值12000比索的黄金。除了他自己的矿区财产外，科尔特斯还有其他合伙经营的矿业，如在墨西哥的塔克斯科（Taxco）地区的银矿。在这些合伙经营中，他的投资通常包括商品、家畜、委托监护权或黑奴劳动力。

除了从委托监护领地上交的贡品，农业和家畜养殖也是科尔特斯

收入的主要来源。他在墨西哥的很多地方拥有大量土地，一些是国王赐予的，另外一些则是侵占土著人的。他使用受其委托监护的劳动力在他的土地上耕种玉米，仅仅是靠近瓦哈卡的土地每年就生产 1 万至 1.5 万蒲式耳玉米。他把部分谷物在西班牙人的城镇和地区出售；一部分用来供给洗金厂的奴隶食用。科尔特斯还饲养了大量的牛和猪，并在自己的屠宰场宰杀。在特万特佩克(Tehuantepec)附近，他有超过 1 万只的野生群，生产的牛皮和牛油出口到巴拿马和秘鲁。

不安分的科尔特斯还是墨西哥制糖工业发展的先驱。到 1547 年，他的种植园每年可生产的糖超过了 30 万磅，大部分卖给了欧洲的出口代理商。正如他宣称的那样，他不是第一个在新西班牙实验生产丝绸的人，否则，他一定会大规模进入这个行业，利用土著劳动力种植成千上万的桑树，对他们支付现金或可可豆就可以了。然而，实际上，在这次商业冒险中，他损失重大。科尔特斯多样化的广泛的商业利益则表明，把大家熟悉的征服者仅仅描绘成投身于战争和掠夺的纯粹封建主义形象，而鄙视所有的贸易和工业，是多么具有误导性！

大庄园的发展

在第一代殖民者中，像科尔特斯拥有如此大规模的商业的人很少。典型的委托监护主满足于占领一小片赐予的土地，并从土著那里收取贡品，而土著则继续在他们祖先留下来的土地上生活、劳作。由于土著人口的大幅度下降和国王的严格立法都使得委托监护制下的贡品收益减少，在 1550 年之后，出现了从依赖委托监护制下的贡品向发展西班牙商品农业和牲畜养殖业的重大转型。西班牙人城镇严峻的食物短缺为西班牙农民和牧场主创造了新的经济机会。同时，人口下降留下了大片辽阔的未被占用的土地，西班牙殖民者们竞相占领，用来种植小麦，更常见的则是作为羊或牛的牧场。

到 16 世纪末期，西班牙人拥有的大庄园促成了农业的商业化生产，而且强势排挤殖民地经济中不断萎缩的部门。西班牙殖民者用各种方式把土地从土著人手中“释放”出来：购买、侵占和人口聚集居住。

congregación, 通过土著人集中居住在新社区, 显而易见方便控制他们(教化)。尽管如此, 西班牙的政策宣称是为了保护社区土地, 大量的法律禁止侵占这些土地, 但并未能阻止大庄园的扩张。大庄园主中有王室官传教士和牧师, 他们的权力一般都凌驾于政策之上。

在 17 世纪, 面临着严重漫长的经济危机, 实际上, 国王鼓励了以定例手段侵占土著人的土地, 通过对国王支付一定费用就把侵占者的土地合法化了。不仅仅是土著社区, 而且西班牙人的社区或梅斯夸托人(小农社区)都眼睁睁地看看自己的土地被不断扩张的大庄园吞并。这个过程的目的特征不是获得土地以供使用, 而是通过剥夺他人土地或掠夺小农生产, 或者之间的竞争, 来获得日常的劳动力和债务关系。梅斯夸托(Mixtazgo)的建立确保了固定财产在主人的后代中永久占有。但是这种封建主义的手段需要得到国王的许可和支持, 费用高昂。因此, 只有一小部分非常富有的家族从中获利。

土地兼并中较为通用的策略是在家族内部通婚, 通常是表兄弟或堂兄弟。在大多数情况下, 这种或其他确保家族地产永久占有的策略都不会成功。西班牙的继承法要求应在后代中平均分配地产, 但土地兼并者通过大量消费和对教会捐赠而导致投资资金不足等诸多因素造成土地兼并是不稳定, 且地产所有权的转手率很高。历史学家拉莫斯·拉米雷斯(Susan Ramirez)研究过 300 年前生活在墨西哥南部地区的殖民地精英家族的集体传记。她发现, 与传统相反, 这些精英是“不稳定的、开放的, 并且不断流动”, 绝大多数家庭都不会超过两代或三代。历史学家卢卡斯·阿拉曼(Lucas Alamán), 作为墨西哥的殖民地精英家族的一分子, 就提及了这种不稳定性, 并引用墨西哥谚语指出:“父亲是商人, 儿子是绅士, 孙子是乞丐。”

土地集中速度在不同地区间因其资源和距离市场远近有所差异。以墨西哥山谷为例, 到殖民地末期, 大量土地都被掌握在大庄园主手中。另一方面, 土著人及其首领仍保留着瓦哈卡省的大部分土地, 农作物的市场非常有限。近期对殖民地大庄园的研究强调, 不同地区的大庄园在规模和生产类型上存在很大差异。在广阔的西班牙美洲帝国, 这

种规模和生产率的差异性反映了地区间的潜在生产力的多样性，它取决于附近的水源、土壤质量、劳动力供应和市场等多个因素。

尽管土地集中是长期趋势，但是也慢慢出现了一个人多由混血人种构成、土地规模不定的小农阶级。在墨西哥，这些小农主要是梅斯蒂索人，被称为“农场主”(ranchero)；他们广泛分布在墨西哥中部及南部高地的土著村庄和商业地产中。一些人是以前大地主的管家或工头，从地主那里租种或租借他们不使用的部分土地，生产农产品并在当地市场销售。他们的资源有限，并且高度依赖大地主，这使他们的处境总是任人摆布；在土地升值繁荣时期，他们仅有的财产通常也被所有的邻居吞并了。很难看到，有成功的农场主能够扩大财产规模，并加入土地精英行列。

新世界的西班牙农业

西班牙农业与土著人的土地使用在很多方面都不同。第一，西班牙的农业规模很大，用犁和畜役耕种大面积土地，这与土著人小规模的本棍挖掘种植农业形成了鲜明对比。第二，西班牙农业主要是商业性质的，生产的产品向本地或远方市场出售；相比之下，土著人的传统农业特征只是为了维持生计。为了满足进贡和履行其他义务需要支付现金，土著人进行市场化生产的压力越来越大。然而，一般来说，由于大庄园主拥有更为优势的资源，土著人很难与之竞争，除非是在大丰收的时候，而且他们还很可能跌回到只能维持生计的农业水平；在农业歉收期，他们有时候还不得不为当地的大庄园主工作。

西班牙殖民地农业早期大规模生产小麦，并在城市中心销售，如墨西哥城、利马、韦拉克鲁斯和卡塔赫纳。玉米在大庄园也被广泛种植，供给墨西哥城和利马规模相当大的土著人消费市场。像小麦一样，蔗糖是欧洲带给美洲的农业礼物之一。西班牙人把它从加那利群岛带到了伊斯帕尼奥拉岛，在这里很快成为该岛繁荣的基础。到1550年，有20家糖作坊把甘蔗加工成糖，这些糖用船被大量运往西班牙。“蔗糖工业是那些岛上的主要工业，”何塞·德阿高斯达(José de Acosta)在

16 世纪末这样写道：“人们培养出了这样一种对甜味的喜爱。”从西印度群岛开始，甘蔗业传播到了墨西哥和秘鲁。继银矿开采之后，炼糖是印度群岛中规模最大的商业，并且伴随着大量的设备和黑奴投入。

在秘鲁沿海的灌溉谷地里，葡萄酒和橄榄也像蔗糖一样被大量生产。丝绸业在 16 世纪一度繁荣，但很快就衰退了，原因是劳动力短缺。及来自马尼拉的大帆船从菲律宾转运到阿卡普尔科港口的中国丝绸。第一西班牙当局继续地试图努力阻止葡萄酒、橄榄和丝绸的生产，因为这些产品会干扰西班牙同类产品的出口，但似乎没什么效果。西班牙人在所占领的殖民地种植的其他农作物还包括烟草、可可和靛青。胭脂红是墨西哥和中美洲出口的一个独特产品，欧洲的布料工业给予了高度评价。它是一种鲜红色的染料，由寄生在胭脂仙人掌上干燥的昆虫躯体制造而成。

通过引进鸡、驴、马、牛、猪和羊等许多家畜动物，西班牙对美洲的经济生活作出了重要贡献。驴和马给交通带来了革命性变化，负载着货物的土著人排在长长的队伍的景象由此慢慢消失了。马和驴变成了矿业开采中拖拉和运转机器的重要动力。牛和更小的家畜动物极大地增加了大陆上的食物来源。肉是矿业开采中不可或缺的食物，因为矿工只有吃肉才能维持繁重的体力劳动。“如果所有的矿山都开发了”，一位西班牙法官在 1606 年写道：“这要归功于大量便宜的家畜供应。”除了肉之外，养牛业还向西班牙和其他欧洲皮革生产中心提供了出口的牛皮，同样，牛皮和用来照明的牛油还自制使用，尤其在矿区。随着纺织作坊在殖民地很多地方的兴起，养羊人为他们的羊毛找到了一个大市场。

在过度放牧的地区，如墨西哥中部，西班牙人的牛羊群爆炸性增长带来了灾难性后果。动物成群地涌向田地，不仅入侵那些因土著人口下降而腾空的土地，而且还入侵了按照他们的制度所保留的用于轮流耕种的土地。牛群踩踏上著人的庄稼，造成数不尽的破坏；暴雨侵蚀了大量的山谷坡地，因为这些山坡上的植被早被羊群啃食了。然而，到 16 世纪末期，墨西哥养牛业稳定下来了。原始牧场早已枯竭，为获得

牛皮和牛油进行了大量屠宰,西班牙官方努力禁止在土著人的主粮地里放牧,这些因素都造成了牧群明显减少。在17世纪,中部谷地的土地不断朝西班牙人手中累积,导致这一过程进一步恶化。这些人建立了生产龙舌兰酒(很受当地人欢迎的发酵饮品)和小麦的大庄园。渐渐地,牧牛场和羊群就搬迁到了零散地,位于北部干旱地区的永久性牧场。

88

同样,在阿根廷拉普拉塔河宽广富饶的潘帕斯草原上,也迅速出现了大量的马、驴和牛。在这个近乎无边无际的草场上,这些畜群的数量超过了潜在的需求,像在西班牙美洲其他地方一样,随处可见的野牛群成了拉普拉塔地区普遍的现象。这个偏远省份的居民,被西班牙法律禁止与外部世界进行海上运输贸易,且缺乏价值高昂的贵金属和充足的劳动力,为摆脱贫困,他们只能与荷兰和其他一些商人从事陆路贸易,由这些商人把牛皮和牛油运销到欧洲。此外,他们还将马和牛、牛皮和牛油运到“上秘鲁”(现玻利维亚)的矿区销售。

另一个牛养殖业中心是西印度群岛。1560年,何塞·德阿马西斯写道:

在圣多明戈和其他岛屿,牛群繁殖如此之快,在森林和田野里成群结队地到处游荡,它们没有主人。人们猎杀这些牛也仅仅是为了牛皮;白人和黑人骑着马出去,带着弯曲的勾刀,去追赶牛群,任何落在他们刀下的动物都是他们的。他们杀牛,把牛皮带回家,牛肉被留下任其腐烂;没有人想要肉,因为肉太多了。

殖民地矿业和工业

矿业,作为王室以“五一税”^①形式获得收入的主要来源,受到了国王的特别关注和保护。银,而不是金,是美洲矿区的主要产品。西班牙

^① “五一税”(quinto)指王室以出售贵金属产量的五分之一形式,对开采贵金属者要征收五分之一的税收。——译者注

，“新世界”中最富豪的财产就是在“上秘鲁”的波托西大银矿，在1579—1635年间从中获得了巨额财富。1545年，波托西银矿被发现，墨西哥萨卡特卡斯（Zacatecas）和瓜纳华托（Guanajuato）银矿也分别于1548、1558年发现。同一时期，在智利中部和新格拉纳达（现哥伦比亚）内陆发现了重要的黄金漂沙矿床。

最初，银矿是：简易、低廉的熔炼技术加工生产的，其工艺是使用木炭和石磨粉碎矿石，然后投进使用碳或其他燃料的熔炉里冶炼。但是，冶炼是劳动密集型的，且高度依赖燃料的充足供应，这就给安第斯山区带来了很大的问题，例如，波托西位于山区的林木线之上，冶炼用的燃料特帕斯则位于半干旱地区，且远离人口密集的中心区。1576年，引进了混汞法工艺，是用水银把银从矿石中分离出来，极大地刺激了银矿业。波托西银矿所用水银的主要来源是秘鲁的万卡韦利卡（Huancavelica）水银矿，那里的健康隐患和恶劣的工作条件使劳动成为“一件可怕的事情”。墨西哥的银矿主要使用来自西班牙的阿尔马登（Almaden）矿生产的水银。

矿藏逐渐耗竭，且采掘的深度越来越深，但缺乏资本改进技术，还有木材以及其他燃料，再加上垄断的水银成本高昂，这些都造成了1600年之后波托西的银产量急剧下降。但是，这种下降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被秘鲁的奥鲁罗（Oruro）和基罗德帕斯科（Cerro de Pasco）新银矿的产量抵消了。在平地上，银产量水平也是波动的，像萨卡特卡斯这样的老银矿产量是下降，而像帕拉尔（Parral）这样的新矿的产量却增加了。就整个17世纪来看，银产量的长期趋势还是上涨的。尽管早期的历史学家曾宣称，土著人口灾难性下降造成的劳动力的短缺是新西班牙银产量下降的根源，但现在看起来，矿工在弥补劳动力短缺时并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在1650年之后，在秘鲁和墨西哥，银矿出现了从萨卡特卡斯和波托西这样的大中心矿区向小型、分散和人员可移动的矿区转移。同一时期，很多矿工抛弃了以稀有昂贵的水银为基础的混汞法工艺，而转向使用冶炼方法。因为一个矿工购买的水银量变相告诉了王室官员他的银子的精确产量，而使用冶炼技术，矿工不仅能减少花费，而且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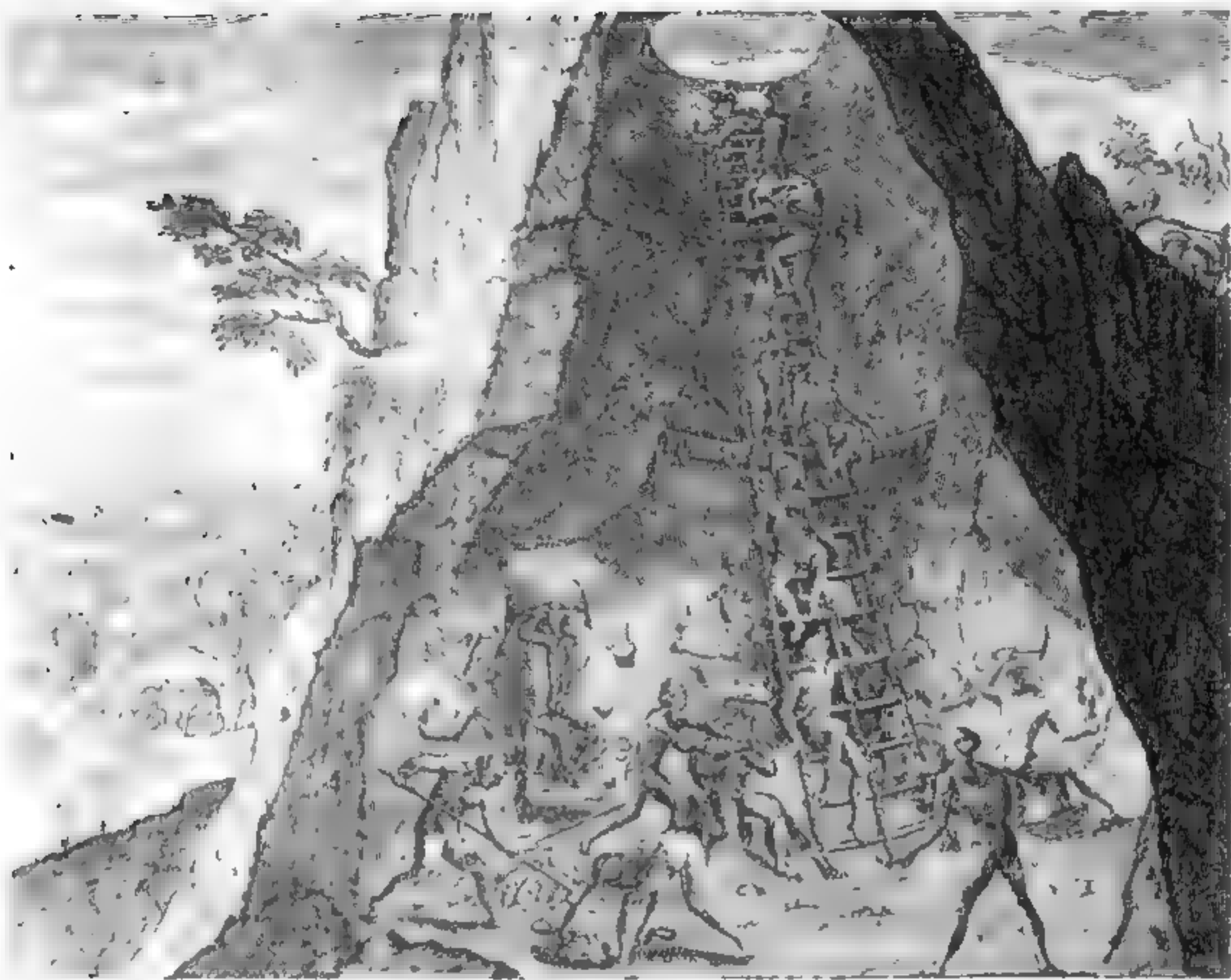
能逃部分税,如“五一税”、营业税和其他税收等。这也损失了王室的财政收入。大量没有征税的、非法的银子在本地流通,或由家支付商品走私流向了欧洲或亚洲。王室对银质量和大部分产量的严格控制后,使得殖民地长期以来的银币短缺和信誉不可靠的问题恶化,由此导致更多地依靠物物交换和地方上的货币替代,还增加了长途贸易的困难。

17世纪银矿开采业还造成了其他后果。一个就是使原来出现的向大矿区中心提供谷物、牛皮、牛油和畜役的高效率农业网络崩溃。像在新西班牙北部,商业农业和家畜养殖业的萎缩促成了这一时期具有典型特征的自给自足的大庄园的兴起,里面住着一个庞大的精英家族,由族长来领导,他统管一切,管理他自己的小世界,包括劳力、教堂、监狱、作坊、仓库和私人军队。

学者们继续讨论17世纪是否是西班牙美洲殖民地的危机和萧条时期。几十年前的主流观点持肯定态度,但是目前很多学者倾向于认为,无论是经济方面,还是政治方面,殖民地的自治权都在扩大。殖民地经济危机论的支持者引用的论据是1630年之后输往西班牙的银明显下降。然而,近来对殖民地财富记录的研究表明,这种下降的原因大多是西班牙官员为支出当地行政费用和防卫需要决定把大量的银子留在了美洲。另外一个原因是殖民地自给自足经济的发展,再加上大规模的走私,都急剧降低了对西班牙高价商品的需求。到17世纪初,墨西哥、秘鲁和智利在粮食及部分葡萄酒、橄榄油、五金器和家具等方面都实现了自给自足。17世纪,美洲市场的丧失使得西班牙的工业已奄奄一息。

1985年,一位名叫米切尔·莫里诺(Michel Morineau)的法国学者出版了一本书,彻底改变了对殖民地“经济危机”的争论。根据荷兰商业杂志记载的从殖民地运往欧洲港口的贵金属和商品,他表示运往西班牙港口的贵金属的下降,被同一时期走私到北欧港口的金银抵消了。如果把走私的金银和合法流入到西班牙的金银加总起来,可清楚地看到17世纪运往欧洲的贵金属总量并没有下降,因而基于假设殖民地“经济危机”的命题也就失去了它的分量。

争论仍在继续,但有关殖民地经济趋势的事实大多混杂不清,甚至



西奥多·德百瑞(Theodor de Bry)1590年的版画栩栩如生地描绘了对在波托西银矿沦为奴隶的劳工的剥削,他们创造的财富非同寻常地刺激了欧洲的经济的发展。

自相矛盾,难以对17世纪经济“萧条”的真实性做出判断。比如,在新西班牙,营业税作为经济状况的重要指标,其持续增长一直到1638年,之后才略有下降。如果17世纪的经济危机果真发生了,它的影响就是平均的,有些地区和部门的经济会上涨,而另外一些则会衰退。因此,在中美洲,伴随着土著人口下降,可可产业崩溃了,但委内瑞拉和墨西哥之间出现了繁荣的可可贸易。简而言之,并不存在所有行业的生产和国内贸易水平都下降的证据。至于国外贸易,莫里诺的发现表明相反的判断才是正确的。

西班牙人在墨西哥、中美洲和秘鲁文化发达的地区,发现了一个兴旺的手工艺品行业。在整个殖民地时期,大多数土著人继续供应着自己生活需要的瓷器、衣物和生活用品。在西班牙人城镇,为了应对从西班牙高价进口的产品,出现了模仿西班牙的手工艺品行会。为防止来

自很快学会工艺品技术的土著人、黑人和梅斯第索人工匠的竞争,他们被纳入了由西班牙人控制的行会中,并被禁止成为能够带领徒弟的师傅。然而,由于长期缺乏有技术的劳动力,这些种族限制很快变得没有实际意义。这些行会试图小心翼翼地服务于殖民地土著阶级需要的工艺品质量和数量进行控制。

直到1630年,这一段时期出现了大量的生产供大众消费的棉花和羊毛产品作坊。大多数作坊是由私人拥有的,但也有一些为土著社区共同所有,生产应交纳的贡品。很多新西班牙的城镇(如墨西哥城、普埃布拉和特拉斯卡拉等城市)都是纺织业中心。其他的行会^①生产香皂、瓷器和皮革这类产品。17世纪末的人口增长也刺激了制造业的发展。几乎没有证据表明,为试图限制殖民地制造业发展,西班牙断断续续的立法努力取得了成功。

商业、走私和海盗

殖民地的商业制度

91

西班牙殖民地的商业制度是以限制、排斥和管制为特征,这与那个时代的重商主义者标准相一致。在西印度群岛皇家委员会(Royal Council of the Indies)的管理下,殖民地的所有贸易都由1503年在塞维利亚成立的贸易署(Casa de Contratacion)来控制。该机构批准和监督所有船只、乘客、船员和来往于西印度群岛的商品。它还征收进出口税收和王室对西印度群岛生产的贵金属和宝石的应有份额,给领航员颁发执照,并维持西印度群岛贸易船只的航线都应得到遵守。它还创办了一所航海学校,培训跨大西洋贸易船只所需的航海员和官员。

直到18世纪,与殖民地的贸易仅操纵在塞维利亚和加地斯(Cádiz)的富有商人手中,他们以行会的形式组织起来,对与殖民地贸易相关的所有事务都可施加巨大影响。为阻止走私和维护塞维利亚的

① 又称“贸易商会”。——译者注

贸易的地点，贸易被集中在3个港口：新西班牙的韦拉克鲁斯、新格拉纳达的卡塔赫纳，及巴拿马地峡的迪奥斯港(Nombre de Dios)。塞维利亚商人、和西印度群岛相关的商人集团，尤其是墨西哥城和利马的商人公会，都会巧妙地保持殖民地市场供货不足。总之，他们以牺牲殖民者的利益为代价互相勾结，殖民者被迫购买以合法渠道从欧洲进口的商品价格。不可避免的是，这个制度引发了殖民地的不满，并刺激了走私贸易的发展。

为了实施港口关闭政策和保护商船不受外国攻击，16世纪发展了一种舰队护航制度。16世纪中期，这种舰队制度得到改善，它要求由三个武装舰队来护航，每个舰队有50艘或者更多的船只。一个舰队从春天开始，驶往韦拉克鲁斯，并且带着这些船只往来于韦拉克鲁斯和墨西哥群岛之间；另一支舰队从8月开往巴拿马，护航船只往卡塔赫纳和南美洲北部海岸的其他港口。韦拉克鲁斯向墨西哥和一部分中美洲地区提供商品；从波托韦洛(Portobelo)起航，商品通过巴拿马地峡被运往利马，利马则作为西班牙商品的分销地点，从这里可运到智利和布宜诺斯艾利斯。装满回程的银和殖民地商品后，舰队会在三月返回塞维利亚，并在春天飓风季节到来之前开往西班牙。17世纪，因为西班牙经济衰退和走私贸易的大量增长，舰队航行变得越来越不规律。

16世纪70年代，墨西哥商人成为开拓阿卡普尔科和马尼拉之间贸易的先驱，并得到了丰厚的利润。每年马尼拉大帆船远航到墨西哥用中国的丝绸、绢、瓷器和香料，交换中国有巨大需求的墨西哥银。一个外国观察者估计，控制贸易的墨西哥商人每年可以赚到双倍的钱。从阿卡普尔科到马尼拉，顺着信风，船只航行时间八至十周。然而，返程时，因要经过风同多变、台风频繁的海域，可能需要四至七个月；在漫长的航程中，“饥饿、口渴和坏血病会把一只船变成一个漂浮的墓地”。西班牙官员不喜欢贸易，因为贸易吸走了产于秘鲁的金银，且秘鲁到处充斥着中国丝绸，减少了对西班牙纺织品的需求。但是，对丝绸的需求是如此难以满足且供应不足，大量丝绸由驮畜队运载，穿过墨西哥到达韦拉克鲁斯，再从那里让船只运往西班牙。随着跨大西洋贸易的发展，西班牙试

图管理和限制与亚洲的贸易,1593年把船只规模限制到300吨,并且每年只允许两只船航行。马尼拉大帆船在1811年进行了最后一次航行。

一艘船从塞维利亚驶离,前往西印度群岛,要小心翼翼地通过从瓜达尔基维尔河(Guadalquivir)到地中海的浅滩,整个漫长航行都充满了危险和困难。海上的饥饿、口渴、晕船和坏血病以及像韦拉克鲁斯和波托韦洛等热带港口的黄热病和疟疾都是常见的折磨。海上风暴给船只带来了巨大损失;外国海盗和武装的海盗船也构成了长期威胁。外国走私导致殖民地市场上商品过量供应,国王频繁没收金银,但迟迟不予补偿或补偿不足,这些常常使商人无利可图。

西班牙的工业因受行会组织和技术落后的制约,不能向殖民地提供低廉、充足的制造品,并换回殖民地的食品和原材料。确实,允许大量的制造品流向殖民地不符合塞维利亚和加地斯的垄断商人的利益,他们是在确保商品稀缺和高价的制度下获取财富的。大量的税收也同时提高了殖民地消费者要支付的价格,包括护航税(averia)、进口税(almojarifazgo)及营业税(alcabala)。不可避免的是,北欧发达工业国家的制造商和商人试图通过武力或欺骗的方式,进入这个巨大没有满足需求的西班牙美洲市场。北欧岛国的国王们野心勃勃,藐视西班牙对整个西半球的统治,除了部分属于葡萄牙的领土,他们公然反抗西班牙禁止外国人在美洲水域航行或与美洲海岸进行贸易的法令,否则,船只和船员将受到攻击惩罚。据说具有讽刺性的质词是,在法国弗朗西斯一世(Francis I)给西班牙和葡萄牙国王的信中,他概括总结了外国人的观点:“我请求你们,给我看看我们亚当之父的遗嘱,这样我就知道他是否真的让你们做他唯一的全权继承人。”

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海盗和外国掠夺

英格兰很快上升为西班牙帝国在美洲的主要威胁。在都铎王朝(Tudor)的推动下,资本积累和制造业的发展使英格兰的商业能量在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期间爆发出来。旧世界无法给这些迸发的商业能量提

足够的利润,而且英格兰的商业冒险急切渴望走向美洲。1562年,约翰·霍金斯(John Hawkins)开辟了驶向西印度群岛具有历史意义的奴隶贸易航线,由此开启了英格兰打入西班牙美洲封闭市场的动力。一半是商人,一半是海盗,霍金斯全副武装来到西印度群岛,在枪炮下与土著居民进行交易,但在与西班牙人的交易中,他表现为纯粹的诚实商人,甚至向西班牙人可支付费用和缴纳海关税。霍金斯的成功要归功于西印度群岛的土著,他们满足了西班牙定居者的需求。这些西班牙人已做惯了生意,与这个走上路德教的异教徒或魔鬼进行交易,以满足他们对奴隶和欧洲产品的迫切需求。为掩盖这些违反西班牙法律的贸易行为,当地土著官员假装做了一些微小的抵抗。到1567年,这种假装结束了,以致西班牙政府有所警觉,下达愤怒的命令,要赶走英国走私者。一些西班牙人反抗不断加强,西班牙海军1568年在韦拉克鲁斯近海击毁在美洲贸易舰队时,这种抵抗达到了高潮。

只有两艘英国船只设法成功逃脱:一艘是由霍金斯指挥的,另一艘由他表兄弗朗西斯·德雷克(Francis Drake)指挥的。四年后,德雷克带着1艘小船离开英国,前往巴拿马地峡。经过他大胆和仔细的策划,他洗劫和掠夺了迪奥斯港,并在黎明时逃走了。后来,他捕获到从地峡太平洋一侧去往迪奥斯港的运载着秘鲁银的驮畜队,完成了海盜史上最为丰盛的收获。1577年,德雷克又一次启程去完成得到了伊丽莎白一世秘密资助和支持的远征,它的目标是通过捕获西班牙国王运载宝藏的船只,并抢劫他的殖民地城镇来“烧焦西班牙国王的胡子”;探索整个美洲的太平洋海岸,掌控西班牙占领区之外的地区;借助第二次全球环绕旅行,展示英国高超的航海本领。由德雷克领导的1577年远征队实现了这些目标。16世纪80年代,德雷克完成了对卡塔赫纳、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和圣多明各的报复性掠夺航行。毫不惊奇,德雷克成为让殖民地海岸城镇居民感到恐惧的一个名字。

1670年,英格兰和西班牙签署《马德里条约》之后,海盜活动开始减少。根据条约,英国政府同意帮助镇压海盜;作为回报,西班牙则要承认英国对西印度群岛中一些岛屿的主权。然而,法国的海盜活动依

然猖獗,直到1697年签署了《里斯维克条约》,西班牙才正式承认法国拥有圣多明各。

尽管以往的海盗使西班牙的繁荣和声望蒙受了巨大损失,但与外国悄无声息的走私相比,这种损失就显得相形见绌了。在整个16和17世纪,走私贸易持续增长。欧洲人在牙买加、圣多明各和圣安托斯群岛都建立了据点,与西班牙殖民地进行走私贸易。布宜诺斯艾利斯则是另一个“漏斗”,荷兰人和其他国家的贸易商在此聚集了大批白银,甚至可运到秘鲁市场。到17世纪末期,法国公司能够以在圣多明各和法属地斯西班牙人商号的名义来运作,甚至主导着与西班牙殖民地之间的法属贸易。

约翰·坎贝尔(John Campbell),一个精明的英国人,人言到了西班牙不幸的主要根源:它的经济脆弱性。他评论道,西班牙人只不过是欧洲其他地方服务的乘务员:

他们的大帆船把银子带到西班牙,但没有替其积累财富……银子就像进来时一样,又很快流走了,不仅如此,速度还更快……乍看似乎很奇怪,且不可思议;但当我们仔细考察时,这个秘密就不难以理解了。来自西印度群岛的银子和贵重的商品并不是白白来到这里(除了国王的税收),而是为了支持投……属于西班牙王室控制的商品和制造品。因此,显而易见,西班牙商人除了只是代理人之外,什么也不是,大部分来自西印度群岛利润都归属于与他们谈判的外国人了。

17世纪西班牙的经济学家理解造成西班牙困境的原因。他们的著作不折不扣地批评了当时的现状,并提出了富有建设性的改革建议。但是,他们的主张无力改变西班牙的政策路线,因为一小撮商人和贵族集团支配了政策,他们的特殊利益和特权与改革动机完全不相容。

殖民地的经济框架

殖民地经济是资本主义的,还是封建主义的,抑或介于二者之间?

：一个问题是，学者们激烈地争论过——一些人认为，为市场进行生产是资本主义的必然特征，由此认定自从1492年起拉丁美洲经济就是资本主义性质。其他人则否认以取自欧洲背景下有关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框架来解释殖民地的特殊现实。然而，多数学生承认，殖民地上存在着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甚至更古老的因素，比如前哥伦比亚的社区农业和土地所有制。西班牙努力保留和保护这种古老农业制度，尽管这种努力没有持续下去，因为它有利于国王直接控制土地和劳动力，根据自己的利益和政策，国王可把土著劳动力分配给殖民地的精英们。因为西班牙农业部门的扩张，集体农业在殖民过程中受到了严重冲击，但是在殖民地末期，在很多地区仍保留着这种土地制度。

殖民地经济中的封建主义或半封建主义因素包括以不同程度奴役和强制劳动为特征、很多非货币特征的经济交易，以及技术落后和农业。这些反映了低水平的生产投资，并与高水平支出形成鲜明对比，比如宗教消费、教堂和慈善事业。管制制度，例如禁止土著人穿欧洲人的衣服或拥有自己的私有土地，都严重阻碍了市场发展，这些特征也许可称之为封建主义。

殖民地经济中的封建主义的天出特征反映了西班牙自身的落后性。实际上，在殖民过程中，西班牙在某些方面变得更力封建、更加领主化(seigniorial)。部分原因是多数从西印度群岛流向西班牙的财富被用来支付高昂的战争和外交费用，维持一个寄生的贵族阶级，并且从北欧进口产品，这样，用来发展的财富便所剩无几了。西班牙依赖殖民地的财富及对殖民地贸易的垄断不可避免地强化了主导性的贵族意识形

① “拉丁美洲的封建主义”这个观点的主要倡导者是安德烈·冈德·弗拉克(Andre Gunder Frank, 1918—1992), 他在1979年出版的《资本主义和欠发达》一书。该观点受到一些学者广泛攻击,“拉丁美洲的封建主义”为以生产者和雇佣的劳动力而非劳动力为基础的生产模式。例如,约翰·梅尔斯·科尔(John Mears, 1915—1991)《拉丁美洲》(1991)pp. 5-17。

② 根据约翰·梅尔斯·科茨沃斯(John Coatsworth)的研究,直到18世纪中期,新西班牙的大概10%的贸易是货币化的,各地市场还是在贸易中使用代金券。

态,并且阻碍了一个充满活力的企业家阶层的出现。实际上,贵族头衔的继承制度影响到了中低阶层,他们很快放弃了贸易,并把财富传给了长子们。如果整个国家贵族阶层的封建权力被国王削弱的话,他们将会设法得到补偿,约翰·林奇(John Lynch)说道:“这个过程是他们通过扩大经济权力来实现的,在这一过程中王权本身就是一个自愿联盟。”他们在自己的领地上还保留了他们的封建权力,例如,征收封建税收,任命官员,并且进行司法审判。的确,在哈布斯堡王朝时期,贵族重新获得了大部分原有的政治权力。“到17世纪后期,”亨利·曼(Henry Kamen)写道:“毫无疑问,西班牙人大概是西欧国家中唯一一个完全由贵族控制的国家。”这个贵族霸权提供了经济衰退和倒退的处方。我们看到西班牙在18世纪挽回这种趋势的努力太微不足道了,也太迟了。

殖民地经济还包含一些资本主义因素。尽管以半资本主义劳力制度如奴隶制和债务劳役制为基础,但金银矿和大庄园、牧场以及生产糖、牛皮、胭脂、靛青和其他商品的大种植园已完全融入了扩张的世界市场。这些商业反映了价格波动和市场兴衰,并促进了资本积累,这不仅是在西班牙,而且在英格兰和其他新兴资本主义国家都是如此。一些资本主义萌芽也在殖民地出现了,明显的表现就是大型矿区中心、糖磨坊及其他作坊里雇佣劳动和劳动分工得到了发展。

殖民地的资本主义处于萌芽阶段,但是,其进一步发展被多种因素抑制住了。例如,封建主义关系和态度的力量非常强大,殖民地的财富被西班牙抽空,而且西班牙本身愈发成为西北欧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卫星国。殖民地种植园的双重特性——内部交易常常自给自足,采用非货币的形式,但是生产却是以欧洲市场为外部导向的——却都反映了殖民地经济的双重性。

第五章 国家、教会与社会

焦点问题：

- 在殖民地运行的政治制度和机构的主要特征是什么？
- 为什么西班牙王室不能执行殖民地的法律？
- 教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它对改革后的传教士、教会内部分歧以及传教士的道德下降有什么影响？
- 殖民地的阶级和社会等级结构是什么？它是如何反映种族的社会构造的？
- 殖民地妇女的地位、殖民地社会内部性行为和对自由选择婚姻不断变化的观念是怎样的？

西班牙帝国在美洲的政治组织是集权、专制的，它本身对国内的统治也是如此。美洲被征服后，卡斯蒂利亚议会制度以及地方自治的权利和义务豁免都失去了昔日的生命力。在哈布斯堡王朝最早的两个国王执政时，大主教君主的权力达到了历史巅峰，中央集权过程也由此正式开始。在卡斯蒂利亚出现了一系列由皇家委员会掌管的繁冗的行政官僚体制，他们由国王任命，并直接为国王负责。西班牙北部的一个地区阿拉贡顽固地抵制王室对它的司法权的侵蚀，这使得它直到18世纪还享有很程度上的自治权。然而，甚至在卡斯蒂利亚，哈布斯堡王朝

的专制也给人贵族们原封不动地留下了对农民的正式和非正式的权力。在阿拉贡,封建土地关系更为根深蒂固,假使贵族们声称在其领地拥有广泛的司法权力,包括掌握对农奴的生杀大权,一直延续到17世纪最后几十年。权力在王室官员手中的王权集中与地方大地主实际执行至高无上的权力形成了对比,这也是对独立的西班牙美洲政治体制特征的概括。

西班牙帝国的政治制度

殖民地管理的形成

95 1492年至1550年是西班牙对殖民地管理模式形成的重要时期。最终的结果反映了西班牙国内中央集权的稳步增长,并通过运用不断摸索的方式来解决殖民地政府的问题。西班牙国王们授予了哥伦布、科尔特斯、皮萨罗和其他伟大的远征领导者全面的政治权力,使得他们几乎成为自己所征服的领土内的君主。但是,一旦这些征服的重要指示出来,王室很快就会对征服者产生猜疑。征服者的权力会马上被撤销或受到严格限制,那些曾在西班牙被用来实现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机构也以同样的目的被移植到了美洲。到了16世纪中期,西印度群岛的政治组织一直保持着固定的形式,直到18世纪末才略有变化。

西印度事务委员会(the Council of the Indies)是于1521年特意设立的一个独立机构,最初是卡斯蒂利亚所有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会,几乎到了殖民地末期,一直是西班牙帝国行政管理的领导者。尽管贵族和王室的亲信大都被安排到这个委员会,但到了17世纪,委员会成员主要是律师了。在国王的领导体制下,每个国王积极参与委员会工作的程度则因人而异,委员会是最高的立法、司法和政府执行机构。它最重要的职能之一是向国王提名到殖民地任职的所有高级官员。委员会还为西印度制定了许多法律,其中包括著名的1681年《西印度法》(the Laws of the Indies),这项法律包含了最重要的法令,同时也有一些琐碎细节。在哈布斯堡王朝早期,很多有良知和能力的官员被任命到委

一个世纪,但是在17世纪无能的国王统治下,官员的素质开始出现下降。不过,为时已晚,应当感谢西印度委员会对殖民地历史、地理、资源、人口和人物广泛搜集。对研究西班牙美洲殖民地的学生而言,包含这些信息的报告是极为丰富的资料宝库。

王室代理人

在殖民地的主要代理人有总督、都督和检审庭。总督、都督有相似之处,差别仅在于分配给前者的管辖区域更为重要、范围更大。在总督辖区,两者均是至高无上的民事和军事长官,负责诸多事务,包括维持治安、平收入、防御和土著人福利及其他很多责任。16世纪,在西班牙的末期设立了两个美洲总督辖区——一个是新西班牙总督区,以墨西哥城为首府,包括巴拿马地峡北部所有的西班牙殖民地;另一个是秘鲁总督辖区,以利马为首府,包括除委内瑞拉沿海地区以外的所有西班牙人占有的所有地区。从理论上说,都督隶属于总督,但实际上是独立于总督,管辖属于他们广阔领地的各个细分地区。在一些地区,没有土地,由检审庭管辖。检审庭的法官一般充当管理者,但军事权力还保留在总督手中。在整个殖民地时期,管辖权的重叠和变动十分普遍,这也是造成王室官员之间经常发生争端的主要原因。

殖民地总督通常被看做是王室主人的形象代表,被授予无限的权力,且通常由于和下级官员本性情弱、腐败,都放大了总督的权力。总督可能是律师出身,或甚至是一个有背景的牧师,但绝大多数是来自西班牙的富有的贵族家庭。为显示自己的高贵地位,他们效仿卡斯蒂利亚建造宫苑,使用众多随从,生活排场浮华。理论上说,西印度委员会制定的法律和指令制约了他们的自由行动度,但意识到法律要适应当地环境需要,这样又给予了他们很大的自由裁量权。总督们的一个行事准则是:我服从,但不执行。即对不切实际和不能执行的法律置之不理。

16世纪,在西班牙出现了一些有才干甚至著名的总督,如弗朗西

斯科·德托莱多总督(Francisco de Toledo, 1569—1581年在位)——“秘鲁最重要的创建者”，他是一位精力充沛、勤劳工作的管理者，他在秘鲁巩固了西班牙的制度，并强制实施王室权力。然而，弗朗西斯科实施的再殖民计划和在矿区采用的“米塔”强迫劳动制度，严重地打乱了土著人的社会组织，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新西班牙有能力的行政官员，如安东尼·德门多萨(Antonio de Mendoza, 1530—1550年在位)和他的继承者，路易斯·德贝拉斯科(Luis de Velasco, 1550—1564年在位)都致力于解决征服者遗留下来的问题。他们力争约束西班牙征服者的权力，促进经济发展；有时还试图在一定限度内维护土著人的利益。但是，殖民主义者的掠夺成性的精神、王室对殖民地高级官员的不信任以及来自官僚体制内部的反对都阻碍了这种努力。17世纪，在金融危机、腐败、西班牙王室犬儒主义的影响下，总督们的素质不可避免地开始下降了。比如，1695年秘鲁和墨西哥的总督辖区，实际上都出售给了出价最高的竞标者。

每任总督和都督在履行职责时由检审庭协助，检审庭是他们辖区内的最高上诉法院，并且作为总督的政府委员会发挥作用。在行政会议上，由总督和检审庭联合做出的决议具有法律效力，这样就给予了检审庭立法权，这大致可比得上国王授予西印度委员会的立法权。虽然总督有最高的执行和行政管理权，但在法律上并没有规定必须听从检审庭的建议。尽管如此，检审庭的至高威望和直接同西印度委员会联系的权力，对总督权力形成了事实上的潜在监督。王室一度不信任殖民地官员，逐步建立了对他们的监督和制衡制度，从而确保对所有重要问题有充分的审议和磋商，但是，这又助长了优柔寡断和办事拖拉的风气。

除了听取上诉案件审理和同总督或都督召开磋商会议外，法官还需要定期视察所属省区，对当地的经济社会条件、土著人的待遇和其他涉及国王利益的事项进行彻底调查。尽管总督和法官都是按照殖民地标准领取薪水，但他们职位所需要的生活花费非常高昂，如果他们不能利用职权谋取财富，就会希冀很快返回西班牙。

省区管理

在“印度”，省区的管理委托给了王室官员，他们以各自的首府为中心，管辖着规模大小和重要性不同的地区，这些人的头衔为督办或市督。一些人由王室任命（他们常常从总督那里花钱买来这个工作），另一些人则由总督任命。他们在自己的辖区内不但拥有至高无上的司法和政治权力，而且在市政会（cabildo）里代表着王室的利益。对于确定刑事和民事案件，则由市政官员向督办上诉，再由他继续上诉。如果督办不是律师，在司法案件审理过程中，必须有一名法律顾问协助他。

督办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掌管西班牙人城镇；另一种则称为印第安人督办，掌管由王室进贡的印第安人城镇，通常任期3年，主要职责之一是保护土著印第安人不受欺骗和勒索。但是，现有大量的证据表明，印第安人督办本身就是最坏的侵犯者。印第安人部落酋长通常是他们的敌人。督办滥用权力最严重的方面与劳役或商品摊派有关，要求土著居民必须从督办那里购买物品。表面上看，本来设计是为了保护土著人免于西班牙商人的欺骗，而督办同土著人交易的特权实际上却变成了他们自己让自己快速致富的手段。

国王运用了大量的规章制度确保殖民地官员能够很好和诚实地履行职责。总督和法官被禁止从事贸易，在自己的管辖区内，不能持有土地或接受财物，甚至他们的社会生活也受到了诸多限制。自总督以下王室所有官员在任期结束时，都要面临对其行为的留任审查（Residencia）。审查采取公开听证的形式，人们在法官面前对有问题的官员提出控告或作证。在最后环节，法官会对官员是否有罪进行裁决，并做出宣判，有时一些诉讼要向西印度委员会申请裁决。另外一项制度是巡查（Visita），通常由国王任命的巡查官（visitador）对官员的行为进行另外调查；对于级别较低的官员，由总督同检审庭协商巡查。

在西印度能满足地方自治愿望的唯一的政治机构是市政会。然而，任何提出市政会包含了许多种民主特征的看法实际上都是没有任



17世纪早期,菲利普·瓜曼·保玛·德阿雅拉(Felipe Guamán Poma de Ayala),一位自学成才的印第安人作家,记述了督办们的腐败和不受法律惩罚的事件。他写道,督办们“不害怕正义,对上帝也毫不畏惧”,利用权力通过盘剥贫困的印第安人、拷打他们的酋长和偷盗印第安人社区创造的财富来聚敛私人财富

何基础的。早期,市议员(regidor)和市长由国王任命。在菲利普二世及其继任者时期,国王将这些职位卖给出价最高的竞标者已经成为既定惯例,同时,中标者仍有权转售和遗赠,条件是每次转让收益的一部分以税收的形式上交国王。但是,在一些城镇,市议员选择他们自己的继任者。

在整个殖民地时期,市政会是封闭的,由富有的庄园主、矿主和商人组成的政治寡头贪恋职位,把“市政会变成一个排外的俱乐部经营

这些人通常不领取薪水,但会利用职权获得土地和土著劳动力,服务于他们所在阶级的有限的一部分人。他们的公务包括监管当地市场、分配城镇土地和当地税收。他们也选举市长,市长履行着一审法院司法管辖权。由于受到省长或督办的严密监督,市政会早期就很大程度失去了自治权。尽管市政会存在非民主特征,效率低下、声望和自治权逐渐下降,但它还是有一定的潜在意义。作为唯一的政治机构,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克里奥尔人(在美洲出生的西班牙人)的利益,它注定在19世纪末的18世纪独立战争中起到重要作用。

上述描述到的官员和机构仅仅只代表了殖民地政府的很小一部分。还有很多书吏(escribano)从事不同部门的文书工作。他们没有工资,只会得到一定的服务费作为对所提供服务的补偿。此外,警官、王室“五分之一”的征收者、拥有特定司法权的市长等官员也都人数众多。在卡洛斯五世时期,这些官职都是掌握在西班牙的高官手中,并出售给打算去西印度赚取服务费的个人。从菲利普二世开始,很多职位的任命权被收回,由国王直接出售给最高价的竞买人。17世纪后半叶,由国王或国王出售的官职,从以服务费为报酬的职位发展到了更高的工资职位。一般而言,这些交易的受益人尽可能在投资中获得最大利润,试图返回西班牙,成为富人。因此,在这个时期,腐败成为政府中比较严重的问题。殖民地官员不管官职大小,以多种方式、精明地滥用赋予他们的权责。

如果说国王的权威在首都及周边农村是至高无上的话,那么在相对较远、封闭的地区就不是这样了。在这些地区,王室的权威微乎其微,而大庄园主拥有绝对的权力。在规模宏大、自给自足的大庄园里,庄园主们以封建地主的方式管理司法,开庭审理案件,在自己的监狱里囚禁苦工;豢养和维持他们的私人军队,并通常以君主的姿态处理所有的事情。有时这些权势人物把实际掌握的军权和司法权力与官职头衔相结合,使自己成为附近一带地区的国王代表。17世纪末期,西班牙的经济和政治实力不断衰落,弱化了母国与殖民地之间的联系,使得这种分权面临着有利的环境。

近乎无效的殖民地法律

100

违反西班牙殖民地法律是殖民地政治生活中的大事。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现状反映了王室官员在对殖民地精英执行法律时所面临的困境。强大的殖民地精英们与官员们既有着紧密的社会和经济联系,又强烈反对执行这些法律。这种困境最尖锐的表现是王室希望立法管理西印度真正的财富土著劳动力与殖民地精英追求利益最大化之间发生的冲突。然而,结果是这些保护性法律遭到了有组织的违抗。国王经常对违反行为视而不见,不仅是因为希望避免和强势的殖民地精英之间发生对抗,而且还因为这些法律有时会与他自己狭隘的、短期的利益相冲突(需要获得收入资助战争、外交和支持贵族们的奢侈生活)。

因此,我们能够看到为西班牙在美洲的行为辩护时经常引用的保护性立法与殖民地上著人生活和劳动的实际情况之间的矛盾。阿隆索·德索里塔(Alonso de Zorita),一位在西印度从事19年行政管理的法官,于1561年退休时,仍是可尊敬的穷人。他在给菲利普二世的一份报告书中写道:

陛下和王室议会的愿望是众所周知的,并且在每天颁布法律都已明确阐释,应支持和保护贫困印第安人及其人口增长。然而,这些法律仅仅是被遵守,而没有强制实施。因而,对印第安人的毁灭是无止境的,更没有人会在意陛下您的任何法令了。

但是,并不是所有殖民地的法律都是如此松懈执行的。相当一部分充满剥削和歧视的法律依然有效,其中包括要求土著人纳贡,支付象征性工资的强迫劳动,货物以固定价格强行卖给他们,把他们的土地所有权限制在最小范围内,却允许西班牙人的地产无限扩大。

在整个17世纪,西班牙作为一个遥远的欧洲国家,国力不断衰退,又如何解释它统治美洲殖民地的时间如此之久?答案不在于西班牙的军事力量,因为直到18世纪西班牙在西印度只维持了很少的军队。西

西班牙统治得以持久的原因看起来在于王室的政策,为获得和保持殖民地和精英的忠诚,王室对他们做了大量妥协。总督、检审官、督办及类似人物的政治设置对执行王室计划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经常不能执行保护性立法,剥削性法律被严格执行,通过向国王支付一定费用使侵占土著人的土地合法化以及忍受殖民地政治寡头滥用权力等都是说明上述王室政策的实例。可以肯定的是,国王与殖民地精英之间存在未明文规定的协议,即共享权力和剥削西印度土著人、黑人和混血人的果实,此外,他还一直努力约束殖民者的权力和野心。直到18世纪,这种努力仍不能对已有的制度安排起到威胁作用。

西印度教会

在与穆斯林长达数个世纪的斗争中,西班牙教会崛起了。当时,穆斯林非常富有,其权威仅次于国王。天主教君主——费迪南德和伊莎贝拉特别倾向于将传教士及其传播影响力作为国家统一和王室专制的手段。他们建立的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具有政治和宗教用途,在他们的曾孙菲利普二世时期,成为国王最强有力的支持者。随着西班牙城镇陷入政治经济衰退,贵族沦为取悦国王的朝臣时,教会却不断获得财富和影响力。在哈布斯堡王朝末期,教会甚至对王室至高无上的权力构成了威胁。18世纪开明的波旁王朝的国王们采取了一些措施来限制教会过多的权力。

王室对西印度和西班牙教会事务的控制是牢固地建立对其资助的基础之上的。如同在殖民地的实施一样,西班牙国王拥有绝对权力任命美洲的教会官员、征收什一税、修建教堂和修道院。迫于来自费迪南德国王的外交压力,罗马教皇尤里乌斯二世(Julius II)于1508年授予了西班牙统治者特权,宣称使新世界的异教徒在皈依方面提供协助。西班牙君主们将对教会重要职位的任命权视为最宝贵的特权,一旦有人冒犯,他们就进行激烈的反抗。

对美洲的精神征服

从哥伦布第二次航行开始,每次驶往西印度的远征船队都带着几

个传教士,此后,大量的传教士涌向了这片被征服的土地。紧跟征服之后,修道士组成了第二次宗教入侵的先鋒部队。总的来说,在征服后前十年到达美洲的第一批传教士都是宗教精英。他们是中世纪教会禁欲主义和戒律周期性复兴的产物,特别是由西班牙大主教若卡发玛、经红衣主教西斯内罗斯(Cardinal Cisneros)全力以赴实施宗教改革的结果。这些传教士的先遣队常常把敏感的社会良知和热爱学习的习惯与传教士的热忱结合为一体了。土著人都很朴素,没有欧洲人的贪婪和野心,这些令人钦佩的品质给传教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巴斯克·德基罗伽(Vasco de Quiroga)曾是一位王室法官,后来的墨西哥米却肯州(Michoacán)主教,他写道:

你无论如何对这些人,他们大都很虔诚、勤勉,而且很容易接受灌输基督教义。他们有着与生俱来的谦卑和顺从的本性,并受到了基督教徒的贫困、赤裸和藐视世间万物的做法的刺激。他们也赤脚出门,光着头不戴帽子,长长的头发就像耶稣的十二使徒长度一样;总而言之,他们大腿一片空白,时刻为留下印记做好准备。

相信千年至福的人,和乌托邦理想主义者对征服最后前十年来到西印度的新传教士有着深远影响。受众多土著人的灵魂需要拯救的鼓舞,他们梦想在基督教教义的引导下,能够实现土著文化与西班牙文化的完美融合,回归到原始的纯洁状态。胡安·德苏马拉伽(Juan de Zumárraga),墨西哥第一位主教及枢机主教,巴斯克·德基罗伽(Vasco de Quiroga)和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都深受伊拉斯谟(Erasmus)的人道主义和新教思想以及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思想的影响。事实上,德基罗伽曾向西班牙国王提议,应按照莫尔所设想的政治实体建立和组织土著人城市,这样土著人的优点就可以在基督教教

① 千禧年说是基于《启示录》的预言,和基督教传教士为接受这一世纪教旨,即基督将返回地球实现一千年的和平和正义,之后便是世界末日进行最后审判。

义和文化的培训才得以维持和完善。当国王不理睬他的提议后,德基罗伽自己出资建立了印第安人村庄,或在米却肯州建立了圣塔菲·德·洛巴。在这些共同体中,德基罗伽确立了财产集体所有制、有组织的农业和手工业劳力轮、六小时工作日、女性的工作、按劳分配、避免奢侈浪费等一系列制度。德基罗伽梦想在剥削的委托监护制和大庄园制的海里建立一个充满仁爱和互助的岛屿,这种梦想终究注定要破灭,但是,直到今天,米却肯州的土著印第安人仍崇敬“巴斯克老爹”的名字和事迹。



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谴责了征服者们的种族主义态度,针对欧洲人的蔑视,他极力维护印第安人的文化。他的教义强调了所有人的尊严。

革新派传教士的这些态度不可避免地委托监护主和世俗西班牙人发生了冲突,因为他们寻求无限制地剥削土著人,并把他们称之为“狗”。可以肯定的是,并不是所有传教士对这个问题的看法都是相同

的。其中一些人,如著名的天主教方济各会的托里维奥·德贝纳文特·莫托利尼亚(Toribio de Benavente Motolinia),通常被称为“现实主义”或“温和主义者”。这些传教士认为,委托监护制对保护土著人的福利作了周密的规定,这对保证西印度的繁荣和稳定都是必要的。其他的人,如由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领导的多明我会,认为委托监护制和土著人的福利不相协调,必须废除。

如第四章所述,在查尔斯五世(Charles V)统治期间,他担心以委托监护制为根基的殖民地封建主义将会上升。德拉斯卡萨斯派传教士获得了胜利,在他们的推动下《西印度新法》诞生了(1542)。在激进分子为保证法律的实施而努力的过程中,德拉斯卡萨斯和他的门徒们通过激进的措施,确保这些法律能够实施,结果招致了委托监护主致命的敌意。德拉斯卡萨斯多次遭到威胁。1550年,以总督儿子为首的群体暗杀了尼加拉瓜主教安东尼奥·德巴尔迪维索(Antonio de valdivivieso),生前他曾经试图依据新法强制废除土著人奴隶制。今天,这些和其他勇敢的印第安人利益的维护者可能仍被视为天主教进步潮流的先驱,比如哥伦比亚主教胡安·巴耶(Juan del Valle)、秘鲁主教弗赖·多明戈·德桑托·托马斯(Fray Domingo de Santo Tomás)。拉斯卡萨斯强烈要求西班牙人“结束以血统和以被悲惨压迫的人的血汗成为绅士”的做法,他的这种思想似乎预期到了当今的拉丁美洲解放神学,并成为“穷人的优先选择”。

尽管拉斯卡萨斯在查尔斯五世执政期间赢得了局部胜利,但这种势头在菲利普二世1556年即位后就开始下降了。对违反保护印第安人法律的西班牙人,拉斯卡萨斯和他的宗教同伴们曾拥有是否赦免的权力,并以此为武器保护印第安人的利益,但后来却被王室的一些法令取消了。教会只关注礼拜仪式和布道,而把西班牙人与土著人的经济社会关系问题留给了当权者。当权者通常都是迎合了委托监护主、大庄园主和其他统治阶层的意愿,征服者的后代们最终获得了对土著人直接的、不受挑战的统治权,这项权力曾是他们的先辈们为之而奋斗过的。尽管委托监护制处于衰落,劳役摊派或米塔制,甚至是奴隶制靠多

西班牙美洲殖民地的基础性制度。这一制度是以西班牙十多世纪的自然奴隶理论为基础的,该理论认为土著人是天生低等的。此前,萨拉斯卡萨斯和西班牙其他的神学家几乎都谴责了这一理论。

16 世纪早期,第一批传教士认为保护土著人免于奴役和剥削,与他们的传教任务不是相分离的;他们主张,为使得皈依更为有效,土著人必须首先在他们最熟悉的环境中幸存下来,与原有的旧宗教相比,基督教对他们来说,他们会攀附和生活得更好。尽管遭到了异教徒和土著人的强烈反对,但修道士们还是教化皈依了不计其数的土著人,墨西哥土著人广泛地接受了侵略者的新的、更强大的神祇。在墨西哥,方济各会的传教士们声称,到 1531 年,他们已教化了 100 多万人;墨西哥的莫特利尼亚(Motolinia)宣称,他曾经在一天时间内教化了 100 多万人!一旦武力失败,包括武力在内的各种压力接踵而至,被用来使土著人皈依。一些进行了洗礼并陷入盲目崇拜的土著人以接受了基督教而受到惩罚;一些土著人贵族被处以绞刑或烧死在火刑柱上。为了使传教,修道士们学习当地语言,编写了对当今学者仍有学术价值的语法和词汇表。

修道士,尤其是方济各会的修道士们非常重视设立学校,让来自土著社会的青年在学校接受包括拉丁文、逻辑学、哲学和基督教义在内的人文学科方面的教育。其中最著名的是方济各会在墨西哥的圣克鲁斯学院(Colegio de Santa Cruz)。由于土著人的世俗敌意或缺乏兴趣,以及修道士们自己本身的热情也在减退,16 世纪 60 年代,这个学校开始衰落。在此之前,很多学生从这所学校毕业,他们对欧洲文化很狂热,有时也宁愿他们自己以往异教徒的生活。这些人的价值在传教士建立土著人古老文明的历史、宗教和社会制度的过程中是无可估量的。

尽管早期的一些传教士毁坏了异教徒所有的历史遗迹,如神像、神龛和图画,但第一代传教士却深信,如果不对被征服前异教徒的生活方式进行系统的学习和理解,将难以战胜异教徒们的宗教信仰。在墨西

哥,出现了一所名副其实的人种史学校,致力于收集哥伦布时代前的丰富文化。如果这些努力的动机与传教士所需要发现异教徒隐藏的仪式与惯例知识相武装起来,那么知识分子在发现消失的古国的物质、艺术和社会方面的成就的好奇心和快乐求知也发挥了作用。

传教士们后来自己承认教化并不完全成功。针对墨西哥的情况,历史学家路易斯·M. 布格哈尔(Louise M. Burkhar)得出结论,阿兹特克人“在没有放弃他们基本的思想和道德导向的前提下,在殖民地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中也足以成为一名基督徒”。这里传教士所做努力的结果是新旧宗教理念相互混合,有时对圣母马利士的崇拜和对异教徒的崇拜混淆不清。在征服墨西哥半个世纪以后,多明我会的迭戈·杜兰(Diego Durán)看到,在土著人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存在着异教徒的信仰和实践,他写道:“在他们的舞蹈、市场、浴场及歌声里,都有对失去古老神灵们的哀悼。”同一时期,学者型传教士萨哈贡(Sahagún)抱怨道,他们继续庆祝他们古老的节日,所演唱的歌曲和所表演的舞蹈都表达出了隐藏着异教徒的意味。在秘鲁,教化更为不成功。内森·瓦希特(Nathan Wachter)写道:“如果印第安人承认存在一个基督教神,他们认为,他的影响力也仅局限于西班牙人的世界;他们向自己的神灵寻求保护。”直到今天,危地马拉和秘鲁的土著还在举行从玛雅和印加时代延续下来的仪式。

传教士们还必须为他们的内部分歧而斗争。不同教会之间会因为土著皈依者所要求的受洗前教诲的程度不同而发生激烈的争执。譬如,多明我会和奥古斯丁会与方济各会相比,他们的要求较为严厉。对于一个特定的地区或城镇,由哪个教会管辖也会出现争端。更为严重的冲突是在世俗传教士和受教规约束的传教士之间。在美洲,应由受教规约束的传教士履行牧师和圣礼的职责常常只委托给了教区里的神父们了。教皇的特殊立法(1522)要求将这些职能授予受教规约束的传教士,这是早期达到西印度的一小部分世俗传教士做出的必要妥协。但是,到了16世纪中期以后,他们的人数激增,而且主教越来越热衷于开创由世俗传教士管辖的新教区。在对皈依者的精神指引方面,他们企

代替天主教会的传教士。后者以各种方式进行抵制,但最后以失败告终。

教会内部进一步分裂的来源是美洲出生的传教士和半岛传教士之间:更确切地说,前者在17世纪,由于克里奥尔人日益增多,在省级地区,半岛人丧失了主导地位,半岛人的职位越来越受到威胁,因为他们更努力于在获取主教教权在他们与克里奥尔人之间轮流担任的教令。

传教士的堕落和传教的推进

天主教团体的传教士们的使命感和道德感的逐渐丧失,和其他因素一起造成了传教人员的知识和精神影响下降。随着帝国中心地区教会的中心主义,许多教皇信徒们的热情不可避免地消退了;后来到达的传教士倾向于安逸的生活和获利,而不是禁欲苦行、服务众生。到了16世纪最后几十年,修道院的数目和财产过度增加,经常受到指责。财产的主要来源是地主的遗产和捐赠:如果一个富人死后,在遗嘱中留下一笔教会财产,将是一件且同一向教会、女修道院或其他宗教机构捐赠。一般做法是,地主以一定数量的财产为抵押,每年将5%的收益支付给僧侣人等。在西班牙,这种表达虔诚的方式广为使用,“据说到18世纪末,几乎没有哪个大庄园不需要承当一个或更多的抵押捐赠。”^[1] 一种能够满足捐赠者虔诚或家庭兴趣的方式是建立一个可用来长期做弥撒的小教堂,以颂扬他或她的灵魂。通过委派一位家族成员作为牧师,捐赠者确保了对捐赠财产收益的控制权仍保留在家族手中。所有这些方式不断消耗了大庄园主的收入,墨西哥历史学家恩里克·弗洛雷斯卡诺(Enrique Florescano)写道:“这对动摇已经不稳定的大庄园起到了推动作用,实际上让宗教组织成为了真正的大庄园主、农村收入的受益人。”^[2]

教会获得的财力以永久所有权或经营的形式存在,不可剥夺。如果把这些财力投向土地或者抵押,便能谋得更多的财富。惊人的经济实力赋予了教会比其他竞争者有着显著的优势,尤其在经济衰退时期,使它能够在兼并相对较弱的地产者。最后达到西班牙美洲最重要的教团

是耶稣会(1572),它是最为富有组织并拥有最多的捐资者,它的许多事业也最有效率,基本上是用这些收入支付它的慈善和传教。

传教士理应指导精神生活,但对印第安人,他们却难以避免地恶化了他们的卑微大众的关系。早在16世纪70年代,就对教会机构收费过高和神职人员过度剥削土著劳动力就发出了指责的声音。1679年,新西班牙总督马尔瓦斯科·蒙特克拉罗斯(Marques de Monteclaros)向国王菲利浦三世进谏,在传教士管理之下,土著居民遭受了最为严重的压迫,一个土著人口所在教区税率是当时西班牙本土交给国王的20倍。随着物质上又不断上升,土著道德堕落。殖民地后期的传教士与女性姘居十分普遍,似乎并没有引起官方的严厉谴责。到了殖民地时期最后几十年,传教士的道德堕落达到这么一种地步,被独立时期一位教派的领导人、墨西哥历史学家阿拉曼(Lucas Alamán)描述成可耻的形象。从这些谴责中,一般可以把耶稣会传教士排除在外,他们以高道德水准和严格的纪律而闻名;当然,在修道士和世俗传教士中,也有一些杰出的有社会良知的人物。

第一批修道士的传教推动最迅速及未曾开发的边疆地区,被认为是基督教界的边缘地区。方济各会的修道士最先渗透到了新西班牙南部内陆地区,遇到了怀有敌意的“野蛮的印第安人”。他们是伴随1598年奥纳特远征队到达新墨西哥的,直到殖民地末期,一直坚持着他们的使命;对远在佛罗里达和佐治亚的西班牙前哨据点,也能发现他们的足迹。在1767年耶稣会修道士被驱逐出西印度后,方济各会的修道士代替了他们,指导在加利福尼亚的传道工作。

传教是与三个制度紧密相连的——另外两个是引防(presidio)和移民定居点——目标是为西班牙帝國的扩张和防御北部边境服务。希望传教能够把土著皈依者聚集起来成为独立的宗教社区,训练他们耕种土地、饲养家畜和掌握各种技能,直到完全被基督教化和西班牙化。引防据点为周围的传教活动提供了军事保护,并保证了印第安人新的修道士的合作态度。最后,在免费土地的诱惑下,低收入的西班牙人蜂拥而至,聚居在这些地区,形成了繁华的生活和贸易的移民定居点。针对外国入侵,他

们用尽一切办法,要么收回失去的边境,要么保持和平,或奋力抵抗。

这种对游牧土著三合一的进攻并不十分成功。北部边境的一些部落,比如,强大的亚利桑那、新墨西哥和得克萨斯的阿帕切族和得克萨斯的卡曼其族,从来没有向传教士屈服过。但传教士们在定居的印第安人地区取得了成功,如在新墨西哥的普韦布洛、墨西哥西北部及得克萨斯东部。然而,即使在这些和平的社区中,暴乱、逃亡也十分常见。1680年,按照许多已被基督教化的新墨西哥普韦布洛人却发生了暴乱,修道士被杀死,并针对西班牙人的再次征服做了长期的顽强抵抗。一名领导者声称,古时的神和原有的生活方式是最好的。这次起义导致人们大规模逃亡。由于受到附近驻防士兵的虐待和对阿帕切族和卡曼其族的恐惧,很多人也都逃离了教区。

移民定居很显然也不是很成功的。到殖民地末期,北部边境也仅有几个零散的城镇,并且频繁的袭击使得生命和财产安全没有保障,新墨西哥的定居者申请离开的人数超过了所招募前来定居的人。最终,保护西班牙人的全部任务要依靠在现今美国和墨西哥边境建立的一系列驻防据点。连续的军事挫败迫使西班牙军队躲到驻防据点高墙后面避难。西班牙最后被迫采取新的政策,定期向阿帕切族和卡曼其族赠送礼物,以缓和矛盾。然而,独立战争爆发后,这种礼物也中断了,他们又回到敌对状态,西班牙的军事据点防线毫无用处,他们一直打到墨西哥境内。

传教士最为著名的成功例子是耶稣会在巴拉圭的传教活动,至少从经济的角度看是这样。巴拉圭气候温和,土壤肥沃,耶稣会修道士在这个国家组建了30多个布道团,这是他们在美洲的主要活动。纪律严明、组织集权以及对土以千计温顺的瓜拉尼劳动力的完全控制产生了大量的经济剩余,使得耶稣会把他们的传教变成了有高额利润的商业。大量的棉花、烟草和皮革由巴拉那河运往布宜诺斯艾利斯,再向欧洲出口。耶稣会传教制度教士应被更准确描述成“神权资本主义”,而不是“基督教社会主义”。

1767年,继王室颁布敕令把耶稣会逐出殖民地之后,耶稣会在巴拉圭的统治和在殖民地其他地方的传教活动也就随之终结了。王室的

这种做法有多个动机,即波旁王朝的民族主义教会政策和耶稣会强调的教皇至高无上的权力发生了冲突,甚至怀疑耶稣会士的日常工作,并且坚信他们的传教制度将会建立国中之国。将耶稣会驱逐出巴拉圭导致了西班牙官员和庄园主对瓜拉尼人更为严重的剥削。在一代人的时间内,之前繁荣的耶稣会村庄被毁灭殆尽。

新世界的宗教裁判所

106

1569年,菲利普二世在墨西哥和利马设立了宗教裁判所,宗教裁判所正式进入西印度。在此之前,它的职能通常被授予或拥有审判权力的传教士来行使。宗教裁判所具有的特权,区别于其他法院以及西班牙人对异教的恐惧,使得宗教裁判所成为对无论是宗教,还是政治和哲学方面的“危险思想”进行有效审查的制度。然而,宗教裁判所审理的大量案件与对道德的冒犯或略微偏离天主教教义的行为有关,如亵渎罪。

从伊莎贝拉女王开始,西班牙的统治者,都禁犹太教徒、穆斯林、前基督教徒和被宗教裁判所宣判赎罪的人进入西印度。但是,许多新基督徒希望能够获得财富和逃离西班牙国内到处充斥着的猜疑和敌意的气氛,他们大都以海员或以获得批准的乘客服务员的身份来到西印度定居,有时甚至直接从国王那里购买特许证。有些人获得了财富和权力。到16世纪末,许多新基督徒定居在秘鲁和新西班牙。1580年葡萄牙被西班牙吞并后,宗教裁判所的势力开始扩展到那里,很多葡萄牙人被迫来到了西印度。第一个达到新西班牙的人是路易斯·卡瓦哈尔(Luis de Carvajal),后来成为北部地区新莱昂的军官和统治者。卡瓦哈尔是虔诚的大主教徒,但他的儿子和其他亲戚则是狂热的犹太教徒,他们还劝说新西班牙天主教会信徒们皈依犹太教。由于有人向宗教裁判所揭发了他们,他们被审判,以异教徒的罪名被判死刑。判决于1635年在墨西哥以公开行刑的方式执行。1635年,利马的宗教裁判所打击了该城市的新基督徒。一些人被处以入刑,所有的人都被判处没收财产。利马的新基督徒大多是富有的人,宗教裁判所没收他

的财产后,迅速成为世界上最富足的机构。

如同在西班牙一样,西印度的宗教裁判所主要依靠告密者揭发和“定罪”。宗教裁判所造成的破坏不不仅仅局限于剥夺生命、没收财产,还包括制造恐怖、怀疑、僵化的精神顺从的气氛。伟大的女诗人索·马·德·克鲁斯·伊内斯·德拉克鲁斯(Sor Juana Inés de la Cruz)认为调查异端是宗教裁判所的一项重要事务。作为一个品德高尚、诚实的高级女教士,她遇到了种种困难,常常暗中提及这种残暴的气氛。刚开始,土著人和印第安宗教裁判所法官们负责,因最新的皈依者智能有限以及没有能力为背弃信仰的越轨行为负责,后来也就取消了法官们的调查和惩罚权,转交给主教管辖的法庭审判、惩罚。

教会和教育

教会对殖民地不同层次的教育有着实际上的垄断权。除少数情况外,由传教士经营的学校和中学仅对西班牙上层社会和土著贵族的儿童开放。然而使土著人和混血人种陷入文盲状态。到殖民地末期,大约有了250所大学,但入学的权利却更多的仅限于富裕家庭和血统“纯正”的青年人。

1531年,第一所特許在利马和墨西哥城建立的大学成为第一批永久高等教育机构。通过模仿西班牙的类似机构,殖民地的大学忠实地完全复制了他们中世纪的组织、课程和教学方法。与实践或科学研究不同,对圣经权威的奴性崇拜、亚里士多德、教父、某些中世纪学者以及对神学或哲学吹毛求疵的辩论激情构成了殖民地学术生活的特征。神学和法学是当时主要的学科;到18世纪,科学才是哲学的一个分支,源于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

对外书出版的严格审查(未经王室议会批准,任何书刊都不可在西班牙和其殖民地出版发行)限制了新学说在殖民地社会的传播。在最近几十年中,相关资料显示,禁止小说进入西班牙殖民地的法律完全是无效的,但这种容忍并没有允许为异端邪说或颠覆性作品的流入。殖民地宗教裁判所的记录揭露了许多悲惨的囚禁、拷打案件,一些人因私

藏或阅读禁书而被处死。至少到了18世纪,西班牙美洲殖民地的精神铁幕开始消散,殖民地的人民可以触及到了异教和传统政治倾向。

尽管受到官方审查的限制,殖民地学者在他们自己能力范围内仍作出了巨大贡献,尤其在土著人史、人类学、语言学 and 自然史等领域。16世纪是这些学科在西班牙美洲研究的黄金时期。在墨西哥,一大批传教士,尤其方济各会的成员对当地语言、宗教和历史富有耐心地进行了长期调查研究。在土著人提供信息的帮助下,修士伯纳迪诺·德萨阿贡(Bernardino de Sahagun)完成了《新西班牙史》这部不朽的作品。它是一本可称得上有关阿兹特克文化所有方面的百科全书,学者们现在仅开始对他的作品中丰富的人种志材料进行挖掘。另一个方济各会修士是托里比奥·德贝纳文特(Toribio de Benavente),他通常以土著名字莫托利尼亚(Motolinia)而闻名,他写的《新西班牙印第安人史》是研究被征服前后土著人生活的珍贵的入门书。以他对阿兹特克绘画和编年史(由一位阿兹特克贵族用当地语言撰写,但现已失传)的研究为基础,教父迭戈·杜兰写了一本古代墨西哥史,该书保留了阿兹特克的叙事诗和传奇故事的内容和精神。为满足西班牙人对新世界和阿兹特克与印加的好奇心,耶稣会修士何塞·德阿科斯塔(José de Acosta)撰写了《西印度的自然和道德史》。全书行文简单欢快,展现了那个时期少有的批判精神。这本书很快在西班牙流行起来,并且翻译成了西欧的主要语言。

土著人或梅斯蒂索贵族写了不少历史著作,他们的写作受不同的动机所驱使:对他们本土遗产的兴趣和自豪感,以期证明他们祖先曾对征服提供过重要的服务以及他们要求贵族头衔和土地的合法性。教会学校的作品通常把基督教徒的虔诚与对他们祖先以往荣耀的怀念融合在了一起。一位特斯科科国王的后代费尔南多·德阿尔瓦·伊斯特利尔斯奥齐特尔(Fernando de Alva Ixtlilxochitl)写了很多史学著作,显示了他对欧洲历史方法的熟练掌握。这些作品把很多有价值的信息和高度理想化的特斯科科文明很好地结合在了一起。

17 世纪中期另一位作家是梅斯蒂索人加希拉索·德拉维加(Garcilaso de la Vega),他既是西班牙征服者的儿子,也是印加王子,他提供了《印加王室述记》一书以及大量有关印加物质文化和历史的珍贵资料,这些内容展现了秘鲁人在印加国王仁义统治下田园诗般的生财生活。他的西班牙语行文雅致、流畅,其作品不仅仅是一本历史著作,也可以堪称一流的艺术品。在欧洲,再也没有像他这本如此流行。当西班牙灭亡了,讨人喜欢的印加文明形象直到现在还在继续影响我们对古代秘鲁人的看法。

17 世纪印加马托人贵族菲利普·瓦曼·普马·德阿亚拉(Felipe Waman Puma de Ayala)完成的《新编年史》是一部信息量很大、反映征服前后秘鲁社会环境的很有价值的著作,书中配有作者自己以欢愉朴素手法所做的插图,但本书手稿直到 20 世纪初期才为世人所知。他叙述道,他的父亲是为了“了解贫困的印第安人,并去解救他们,对他们而言,这个国家不存在正义”,他还希望菲利普三世能够读到这本书。瓦曼·普马费力地使用着自己不熟悉卡斯蒂利亚语说话方式表达想法,这是一种由克丘亚语点缀的富有激情的表达方法,忧思和幻想破灭表现了作者的真诚和他对残酷现实的谴责。

科学、文学与艺术

17 世纪后半期,殖民地学术性作品的数量和质量都在下降。这是巴洛克文学风格流行的时代,强调双关、精巧和造作,内容从属于形式,意义让位于过分修饰的表达。这个时期有两个重要人物:一位是墨西哥人查尔斯·西哥恩萨·贡戈拉(Carlos Sigüenza Góngora),另一位则是秘鲁人佩德罗(Pedro de Peralta Barnuevo),他们以自己广泛的兴趣和对科学实际应用的关注预见 18 世纪启蒙运动的到来。西哥恩萨是数学家、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他抨击旧有的但当时仍盛行的占星术迷信,这些都体现在他与天主教神父基诺(Kino)关于彗星的争论中。为了科学研究的兴趣,他还抛开偏见,在遗嘱中捐献躯体以供解剖。

佩拉尔塔·巴尔努埃诺(Peralta Barnuevo)作为宇宙学家和数学

家,他的天文观察曾刊登在法国皇家科学院的杂志上,并被选为他们的通讯员。他还指挥了利马防御工事的建设。这位有才能、对科学的好奇心永不满足的学者还向巴洛克风格神秘主义文学靠拢。在他后期的著作里,他总结道,真正的智慧是对上帝的认识,人类是“很难理解的”。

尽管有些例外,但殖民地文学是母国文学流行趋势的苍白反映。孤立于外国影响、对各种读物的严格审查以及有局限的读者都使得文学创作比较艰难。丧失信心的墨西哥诗人贝内多·德·普埃布埃纳(Bernardo de ballbuena)因此称墨西哥文学是“一个残缺不全、发育不良的世界”。更糟糕的是,17世纪殖民地文学侧重于对“巴洛克主义”的夸饰文体(Gongorismo)的追求,模仿这种晦涩、混乱和造作的文学风格。

正如一位文学史学家所描述的,17世纪的夸饰文体为西班牙人如同一群“吵闹的喜鹊”,在这种气氛中却出现了一位“女人”,即“胡安娜”,即为当代人所熟知的“第十位缪斯女神”胡安娜·伊内斯·德·克鲁斯修女:著名的修女和诗人。她在女修道院结缔的数首诗作是当时最好的之一,但胡安娜并不能逃离她所面临的环境的压力。她曾广泛受到了普埃布拉主教的责难,这使她最终放弃自己的写作以及对文学的热衷,并把余下的短暂生命时光贡献给了宗教和慈善事业。

由于胡安娜修女极力维护女性受教育和其他公民活动权利,并抨击盛行的不理性的男女性行为(她在一首十四行诗中写道:“愚蠢的男人们,为什么你们在煽动她们变坏时,还想她们成为好人?”),她的作品属于“殖民地颠覆性的布道”,挑战了官方的意识形态和教会和政府提出的理想化的殖民地生活方式。殖民地的批评家们以讽刺和嘲弄为武器,揭露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空洞性,常常以极端的怪诞扭曲方式来反映殖民地生活理想化的憧憬与现实堕落的差距。他们从西班牙以流浪汉为题材的小说和以西班牙社会中的丑闻和缺点为主题的讽刺诗中寻求灵感。由于对出版物的严格审查制度,殖民地的讥讽作品主要以手稿形式流传,而讽刺作家经常采取措施隐藏身份。

第一位西班牙美洲讽刺作家是在半岛出生的马特奥·罗萨斯·德



索尔胡安娜·伊内斯·德拉克鲁兹(Sor Juana Inés de la Cruz),经常被称为殖民时代西属美洲最伟大的诗人。她在18岁时进入修道院,11岁去世。她的诗作既有世俗题材的也有宗教题材的,但人们最为推崇她的爱情诗。

马科·罗萨多(Marco Rosas de Oquendo),他的作品《对1598年秘鲁纪事的讽刺》披露了利马的社会弊端、在殖民地首府所炫耀的财富以及广大民众生活所经历的“苦难的海洋”。在另外一首讽刺叙事诗里,在叙述总督打击英国海客时,罗萨斯把庆祝西班牙舰队击败一艘英国船的仪式描述为“一群母鸡围绕一只鸡蛋咯咯乱叫”。朱莉·格里尔·约翰森(Julie Greer Johnson)总结道:贵族统治阶级与社会底层有着共同的“且悲、且败和且仿的基本特性”,差别在于表现方式不同而已。“法庭上的无政府状态和虚弱如同他们在大街上一样,这次通过收买权力和

影响,金钱再次支配了生命。”

同样有嘲讽传统的作品是《牧羊人》(El Carnero,这个日期与世至今还尚未确定),讲述了西班牙对新格林纳达进行殖民的第一个世纪的历史,这个过程始于一个贫困的瓦里奥尔人,即胡安·罗德里格斯·弗雷利(Juan Rodriguez Freile)的晚年,到1638年还未结束。格里尔·约翰逊指出,这部作品的讽刺口吻反映了“志在美国的华,瓦里奥尔人对被认为是二等西班牙人感到不满和沮丧,更多的则感到自己被殖民,而不是如殖民者相待”。罗德里格斯·弗雷利一改西方历史学家对征服和西班牙在美洲的作用态度,质问“征服的合法性、殖民的有效性甚至西班牙征服者的品质”。

政府官员看起来好似笨手笨脚的傻瓜,“在各自履行职务时,一个夸张地互相倾轧”。罗德里格斯·弗雷利犹如一名“无所不能的算数员”,对一系列犯罪和蠢事进行计价,但他能够自嘲,甚至承认“追随征服者探寻虚幻的黄金国”。

1645至1648年期间,胡安·德尔·巴雷·卡维埃迪斯(Juan del Valley Caviedes)从西班牙来到秘鲁,他被公认为是最好的殖民地讽刺作家,且作为一个诗人仅次于胡安娜·伊内斯·德拉克鲁斯修女。显而易见,由于作为病人时一段不幸的经历,利马的医生成为他主要的辛辣嘲弄对象,他还对利马的妇女、贵族阶层和其他社会阶层的人进行了猛烈的言语攻击。在他的诗集《帕纳萨斯山的牙齿》中,不合格的庸医们互相串谋对付病人,他们被形容成由死神将军领导的一支军队。卡维埃迪斯把秘鲁17世纪的医生等同于16世纪的征服者和不断对殖民地构成威胁的现代海盗,给自己的嘲讽赋予了颠覆性的色调,他视征服者、医生和海盗对造成西半球的死亡和破坏扮演了同样的角色。更为大胆的是,当死神将军点名介绍医生时,他还给利马一些最为有名的“庸医”命名。其中一位是弗朗西斯科·贝尔梅约·罗尔丹(Francisco Bermejo y Roldán),秘鲁的主治医师。卡维埃迪斯给他赐予了首席刽子手的头衔,并指控他通过“开出要当面操作的针剂来奸污他的女病人”。

阶级结构和种姓制度

西班牙新社会秩序的出现是在对原有的印第安人社会破坏的基础上进行的,如同在西班牙,它以贵族的或封建的准则为根基。种族、职业和宗教是判断一个人的社会地位的标准。当时人们认为所有的手工业都是低俗的,与从事大规模交易则是和贵族身份相符的,至少在西印度更是如此。人们强调的是血统的纯正性,这意味着最重要的是出身于“正基督教徒家族”,没有与新基督徒或穆斯林混血。这种出身证书都被谨慎地保管着,有时甚至是人为制造的。

在不同种族和种族混血加以仔细区分,然后按等级制度予以分级。有黑人血统的人在法律上就剥夺了他担任公职或从事其他职业的权利,以及其他种种权利和特权。对人数众多的梅斯蒂索人,也是如此。当然,西班牙王室赋予了婚生儿完全平等的合法权利,但直到殖民地末期,一些殖民地行会和学校的章程还不加区分地把所有的梅斯蒂索人排除在外。

缺乏完整的人口统计资料以及历史学家关于被征服前人口规模存在重要分歧,使得只能对1650年西班牙美洲总人口数以及各种族群体所占比例进行估计,这些都是严格推测的。数据显示,在当时甚至更早,土著居民人数长期下降的趋势已经结束,并出现缓慢恢复。另外,欧洲人所占比例迅速扩大。但数量增长最快的是混血人种,且绝大多数人都是非婚生。

正如前面说明的,西班牙的法律和舆论以财产和特权为标准将所有人种族群的社会地位按降序排名,其中欧洲人居首,然后依次是混血人种、土著人和黑人。虽然正式的排名不一定与个人的社会地位完全相符,但它为殖民地的统治阶层的统治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合法性。这还制造了一个冲突性的社会,土著人和黑人、混血人之间都相互对立,贫穷的西班牙人对其他人种的优越感也出现膨胀,所有这些都阻碍了受剥削劳动阶层的团结,并促成、维持了一个压迫性的社会秩序。和其他地方一样,拉丁美洲的“种族”理念是社会构建合理化的,并维护了少数精英的权力。

统治阶层

实际上,种族的界限划分并不是十分严格。在西印度,白色皮肤是上等社会的一个标志,近乎与西班牙贵族头衔旗鼓相当,但它并没有现金价值。并不是所有的白人都属于享有经济特权的群体。殖民地的资料证实了存在一大批贫困的“白人阶层”,包括流浪者、乞丐。更糟糕的是,他们鄙视工作,经常以损害印第安人为生。这类西班牙人因被方所迫选择混血人为配偶,一般也就决定了人体他们的后代处于低等的经济社会地位。但是,富有的西班牙人大地产主与国王或商人的梅斯蒂索或穆拉托儿子,如果被承认或称为合法的继承人,就可以进入殖民地的贵族阶层。如果土著人或非洲血统的痕迹过于明显,父亲可与主管洗礼证明的教区神父达成谅解;另外,对富裕的梅斯蒂索人或穆拉托人来说,可以从国王那里购买一份文件,证明他是合法的白人。财富是区分殖民地贵族的主要特征,而非出身名门和血统纯正。尽管基于这种事实,毫无疑问,白人以绝对优势占据了殖民地金字塔的顶层。

白人统治阶层本身因各团体之间的妒忌和敌意造成了分裂。西班牙人把他们地区内的竞争和世仇也带往了新世界,包括旧卡斯蒂利亚人和安达卢西亚人、卡斯蒂利亚人和巴斯克人之间的矛盾冲突,在西印度这种无政府的氛围下,竞争经常会爆发为争吵,甚至出现战争。但是,上层社会中不变的裂痕是在殖民地出生的被称为克里奥尔人与在西班牙出生被称为半岛人之间的分歧。在法律上,克里奥尔人和半岛人是平等的;实际上,在担任公职时,西班牙法律倾向于征服者的后代或早期的移民者。在整个殖民地事情,克里奥尔人确实遭到一系列的制度歧视,他们在高级教会、政府以及大规模商业方面的就业机会都被剥夺了。

与克里奥尔人相比,偏袒半岛人的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他们有更多的机会接近宫廷、各种特权的继承以及土宰对克里奥尔人的不信任。16世纪后半期,征服者的儿子或孙子们开始抱怨国王的偏心,他的官员倾心于从西班牙刚刚到来没有财富的新人。克里奥尔人怨恨这些后来的人,他们常常夺走了市长和其他政府职位。弗朗西斯科·德特拉

斯(Francisco de Terrazas),这位墨西哥诗人用一首押韵诗表达了克里奥尔人的抱怨:

西班牙:对我们来说,你曾经是严厉的继母;对陌生人,你却
又是一个温柔、慈爱的母亲;对他们,你挥霍了所有宝贵财富;而与
我们,你分享你的烦心事和危险。

随着时间流逝,殖民地上层社会中的矛盾越来越深。两大集团都在竭力为自己立场辩护。半岛人常常以克里奥尔人的懒散、无能和不努力参照,证明自己的特权地位,他们有时把这些归因于美洲的气候和其他环境因素。克里奥尔人以同样的方式回应,把欧洲人形容为贪婪、贪婪的暴君。克里奥尔人从矿山、种植园及牧场积累的财富日益增多,使他们对所遭受的歧视的怨恨更加强烈。

梅斯蒂索人:一个模糊的身份

自征服的第一年起,梅斯蒂索人在种族混合过程中就出现了。在征服初期,由于西班牙女性较少,国王和教会在某种程度上支持西班牙人和土著人之间通婚;当时混合婚姻是常见的现象。但是,随着国王采取了一种种族隔离政策,这种态度很快发生了变化。17世纪前25年,西班牙殖民地立法的官方立法起草人胡安·索罗萨诺·佩雷拉(Juan Solórzano Pereira)这么写道:“有体面职位的西班牙人很少与印第安人或黑人妇女结婚。”结果是,众多的梅斯蒂索人都是源于非正式的婚姻结合。这一不合法的污名,不能获得财富补偿,使得大部分人注定要沦为社会底层。一些人沦为了苦工,过着和土著人一样的生活;另外一部分人却加入了本已庞大的流浪者队伍;还有一部分前往入伍。梅斯蒂索人还是构成牧场工人、中低等艺术家、监工、店主的主体。由于在土著人和西班牙人社会没有根基,并受到了他们的鄙视和不信任,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低等的梅斯蒂索人有着暴力和动乱的名声。

土著人：一个分裂的民族

与梅斯蒂索人相比，在西班牙的法律和实践法中，土著的地位是非常明确的。他们构成了一个分裂的民族——印第安人社会，属于世袭的纳贡社会阶层。然而，土著统治者的后代和世袭贵族却受到了特殊照顾，一方面，部分原因是西班牙人尊重这个西班牙或合法的主人，另一方面的原因是，他们可以作为西班牙统治者和当地纳贡者之间的调解人发挥作用。这些贵族允许保留全部或部分祖传的地产，并且享有骑马、穿欧式服装、携带武器等特权。

大量的证据表明，土著贵族是他们自己人民最坏的剥削者之一。在墨西哥的阿兹特克时代，就已出现了土封建制度，类似农奴的人构成了人口的主要部分，一些阿兹特克地主利用因征服带来的动荡侵占公共土地、向租户征收过量租金、强迫平民为其工作。在墨西哥和秘鲁，他们的新角色是西班牙人的贡品收缴者和劳动力的招募者，这些土著精英提供了与市长、委托监护主以及神父之间不惜牺牲平民的利益玩弄手段的机会。例如，部落酋长与市长伪造贡品名单，然后共享其上的利益；他们可能隐瞒米塔或劳役摊派所需的劳动力数量，让他们在自己的庄园里工作。在秘鲁，传统的亲属、宗教仪式和相互依存的传统关系强有力地把头人(Kuraka)和艾柳(Ayllu)平民联系起来，大部分头人首先要在以下三者之间保持平衡：服从新统治者对劳动力和纳贡的要求、保护艾柳平民免受西班牙人的过度强征以及保护自己的利益不受侵犯。然而，总体上来说，为适应新的商业气氛，他们开始剥削平民，以饱私囊。

许多头人凭借本身的条件成为大庄园主。据秘鲁史学家路易斯·米洛尼斯(Luis Millones)所述，到16世纪末，一些头人控制了庞大、复杂的商业，为秘鲁内部市场生产了各种各样的产品，他们也开始雇佣西班牙人来协助生产。伊莲娜·西尔韦布拉特(Irene Silverblatt)写道，土著农民妇女更是头人的主要剥削对象，因为她们特别容易失去土地和水源。17世纪印加编年史学家瓦曼·普马·德阿亚拉声称，无论殖

西班牙精英。著名精英对贫穷男性农民进行了怎样的剥削，“他们从农民妇女身上掠夺更多”。他还指责头人们在他们的管辖权内剥削妇女劳力，并对她们实行性侵犯，这些人与西班牙官员、委托监护主以及神父的做法一样。

史蒂夫·斯特恩(Steve Stern)写到，头人和艾柳平民之间对立趋向于结果是形成了一种更为紧张、不信任的关系，在其中获得了更为强烈的、对这种经济权力的重要性”。比如，1737年一个艾柳社区的印第安人控告头人，控告他非法掠夺公共土地，建造自己的辣椒种植园。在审判过程中：“在他们的证词中，所有证人都说头人的主要目标是农民妇女。”

查理·吉本斯(Charles Gibson)所说的墨西哥的情况也类似，也是典型的真实写照：墨西哥酋长无节制的需求和侵犯行为及秘鲁头人对平民的做法都反映了在面对西班牙人侵占土地和剥夺土地所有权时平民的“一种努力维持自己的地位和安全的紧张反应”。^[1] 然而，15世纪末期，相当一部分贵族处于衰落期，尤其是小贵族无力产中，很穷，墨西哥比秘鲁衰落得更快。很多阿兹特克贵族在战败中失去了他们的侍从，或者西班牙的立法要求以前的下等社会阶层的自由民化。在墨西哥和秘鲁，西班牙拒绝承认许多人的贵族身份，并将他们变为纳贡者。贵族破产的一个原因是西班牙人侵占了他们的土地，他们做出的反应要么是进行法律诉讼反抗，但成本高昂，往往毫无希望；另一个选择就是替西班牙人向平民收缴贡品。由于传染病或其他原因，当纳贡者数量下降时，酋长或头人必须自己补足纳贡欠款，或被投进监狱。为了弥补赤字，他们可能需要出卖、抵押自己的土地，或者冒险触怒平民，向他们谈判额外的纳贡任务。

然而，殖民地时代行将结束的时候，存在着一个完全西班牙化的酋长和头人家族，他们除了做西班牙精英和当地居民之间的调解人之外，还经营着大地产和各种商业，最终成为有产阶层的正式成员。例如，在18世纪后期的墨西哥，阿梅卡美卡(Amecameca)的一位酋长拥有一座大庄园和其他财产，生产小麦和龙舌兰，每年能产生成千上万比索收

益。查尔斯·古本指出：“和其他西班牙人庄园主一样，酋长能够收到印第安人的贡品，他们还需要在酋长的庄园里伐木、饲养动物。酋长的宅邸装饰着西班牙的家具、银质餐具和昂贵的挂毯；他拥有私人军械库、手枪、钢制和银制刀剑。他的马厩、仓库及其他财产可与富有的西班牙人相媲美。”

在18世纪的秘鲁，库打卡·何塞·加布里埃尔·孔多尔坎基(Kuraka José Gabriel Condorcanqui)是当时阶层规模较小的土著酋长或梅斯蒂索贵族的著名代表。莉莉安·费希尔(Lilian Fisher)写道，他的生活和西班牙贵族一样，身穿“长外套和及膝天鹅绒长袍，马裤由透明金丝做成，价值七八十美元；内衣由亚麻布缝边内衣，长袜也是丝绸的，鞋子带有金扣；他头戴一顶价值25美元的西班牙毛织帽，头发卷成了小环卷曲，几乎可伸展到腰部。”他的财富资源包括拥有500头骡子，用来向波托西、可可种植园或其他地方运输水银和其他货物。

与土著统治者能享受的特权相比，广大平民承受着纳贡、劳役、教会费用等沉重负担。他们在本质上被看做是劣等民族和永无西班牙保护的人，因此他们有义务为西班牙监护人纳贡和提供劳动力。在殖民地的文献中，“缺乏头脑的人”(Gente sin razon)是经常被用来描述土著人。在法律上土著人下等和被监护者的地位体现为：禁止签订有约束力的合同或订立多于5比索的债务契约，并尽力减少他们和其他种族之间的接触。表面上，看起来这些和很多其他对土著人活动的限制是对他们的保护。但是一位开明的墨西哥高级教士，曼努埃尔·阿巴迪·奎博(Manuel Abady Queipo)主教争论说，这些给予他们的所谓“特权”大多数情况是有害而无益：

印第安人被限制在一个600平方杆面积的狭小空间里^①，根据法律对印第安人城镇的规定，他们没有自己个人财产，被迫在公共土地上劳作……被禁止和其他种族交往，他们被剥夺了从别人

① 一平方杆约为30平方码。——译者注

那里获得教育和帮助的机会。他们因自己的语言和一个无用、独裁的政府而被隔离起来。

我们得出结论，这些表面上的“特殊照顾”是白人阶层用来侵犯印第安人的武器，而从来都不是保护他们。

然而，土著平民并没有形成一个单一、无差别的贫困、受剥削的社会，有一个部分人在新殖民地制度下发现了通往成功道路的职业。他们包括手工业和运输，当时需求量很高。工匠们很快以银器匠、瓦工、铁匠、木匠等身份进入了西班牙人的职业。史蒂夫·斯特恩谈到，16世纪末的秘鲁，一个独立的印第安人工匠能挣到相当可观的收入。一个石匠可以在两个月以内做成一个价值60比索的石轮。一个赶牛车工可挣到80至160比索。一些人积累了足够的财富就开始购地，生产粮食、蔬菜和其他的商业产品。为保护不被征用（当时官方定期检查公社土地，并把“多余的”土地重新分配给西班牙人申请），根据西班牙法律，这些农场主需要获得个人的所有权，使土地所有者的土地公社土地同样被合法地充公没收了。沉重的纳贡额和劳役摊派使土著平民难以积累足够的资本，购买土地或经营其他商业，但是，贫民可以通过获得一定的义务豁免，可以成功抵制西班牙人的盘剥。除了贵族的酋长和头人外，得到豁免的人还包括独立的女户主、工匠、市议会的土著人官员以及天主教神父的助手们。

然而，一小部分成功平民为取得这些成就也付出了一定代价。在写到16世纪后期秘鲁的情况时，史蒂夫·斯特恩注意到：“印第安人成功的范围在于那样有活力、权势和富有的人们接受了西班牙人的风格和关系，也就巩固了殖民地制度的支配地位。土著个体的成功是在一个对印第安人有组织的剥削社会中实现的，受教育的印第安人视西班牙人为上等人，而把安第斯人看作低等人。”

大多数土著人居住在自己的市镇，其中一些是征服前遗留下的，另一些则是由分散人口汇集定居而组建的新城镇，称之为“土著村落”（Reduction）或“教会聚集地”（Congregation）。为方便西班牙人的控制和

收缴贡品,这些市镇按照半岛模式进行了重新规划,市政议会也是以西班牙国内市镇的设置为模型。在西班牙和秘鲁的上著地方政府组织有着很大的不同。在西班牙,到16世纪中期,市政会逐步取代了征服世袭上著统治者的政治制度;市政会有着自己的议员和市长,其中市长审理较小的案子,而市长则负责收缴贡品,并运送给督方或委托监护主。西班牙殖民地法律规定要对这些人和其他政府官员进行定期选举,但投票通常仅限于男性社会精英的小团体,而且按照习惯,候选人要从范围更小的世袭贵族家庭中选拔,对于官员的选择通常由所有者聚会讨论、协商,直至最后达成共识。然而,选举的争执是不容忽视的,常常反映了精英内部的派系分歧。尽管妇女被禁止参加投票和担任公职,但很多时候在她们在争竞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何塞·玛丽亚·弗朗西斯卡(Josefa Maria Francisca)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她是一个18世纪20年代一个墨西哥城派系的领导人。何塞法以其坚持不懈要求免除该城镇上著人应承担的可怕的采印劳役,作为主要诉讼当事人,她已“臭名昭著”;她还被对手们指控树立了“一个危险的榜样——公开鼓励人们加入她的永无止境的案件诉讼”。

- 115 在秘鲁,弗朗西斯科·德托莱多(Francisco de Toledo)总督实施了两级行政结构。在上著市政会里,关键人物是市长(一个社区有一或两个市长,取决于社区内家户数量),他负责一般行政事务,并有两个市议员和其他官员协助。所有这些官员每年都要选举换届,不能连任。这些官员视为西班牙政府的工具,很难在当地社会赢得尊重。据凯伦·斯伯丁(Karen Spalding)所述:“西班牙人强加的新权力结构切断了安第斯传统的以年龄和地位继承基础的世袭制度。”托莱多不信任安第斯的传统精英——头人,但又不能免除他们;这些人的地位最后在法律上被定位为省级贵族,其工资以他们社区上交的部分贡品和提供的劳役进行支付。头人在官场上担任着重要职位,并且经常作为以西班牙人行政长官、神父和委托监护主的盟友和代理人的身份出现。但是,他们要为整个社区的米塔制和贡品义务承担责任,有时使他们陷入必须出售自己财产的险境,或者因地方长官征收,失去了自己的财富。

典型的土著村庄通常由一个或多个近邻或有亲属关系的村社组成,每个村社都有自己的世袭长老,他们代表本村社处理与外部的争端,担负着婚姻媒人角色,并监督土地在村社成员间的分配;此外,还提供其他方面的服务。土著在一定程度上西班牙化,最重要的不仅表现在宗教方面,而且还体现为接受了不同的工具和衣食物品。西班牙向各个不同村社之间树立的障碍以及他们互相之间长期的敌对状态,阻碍了他们之间的彻底文化同化过程。为反抗西班牙人的侵犯和剥夺,土著村庄内部更加团结,他们不仅为了保护土地,而且也为了捍卫文化身份、语言、社会组织 and 传统歌舞进行了顽强的斗争。除了亲属关系,村庄集体行为和安安全全最重要的工具便是“教友会”(Cofradia),其成员负责维持宗教活动。

征服及其后果不仅在物质上给土著人带来了巨大损失,而且还造成了严重的心理创伤。西班牙人的叙述中经常引用土著长老们对失去往日的严格纪律、牢固的家族关系、高道德标准等方面而悲恸的事例。一位西班牙人引用了一位土著长老对西班牙人来到墨西哥所做的评价说:“所有事情开始完全颠倒……撒谎者、作伪证者、通奸者都不再像以前一样受到惩罚,原因是贵族失去了惩罚犯人的权力。印第安人说,这就是为什么有这么许多谎言、动乱和不道德女人的原因。”

黑人、穆拉托人和桑博人:社会最底层

黑人、穆拉托人和桑博人(非洲人和土著人的混血)处于殖民地的社会阶梯的最底层。到16世纪末,大约有75 000名非洲奴隶被运往西班牙殖民地。臭名昭著的“中间通道”(非洲黑奴穿越大西洋的航线)是令人毛骨悚然的东西。耶稣会传教士阿隆索·德桑多瓦尔(Alonso de Sandoval)负责奴隶的皈依工作,曾写了一本贩卖黑奴的书,对刚刚运到普格拉纳达韦塔赫纳港口的奴隶,做出了如下令人痛苦的描述:

他们到来时,骨瘦如柴;完全赤裸地被带上岸,随后被关闭在一个院子里或围墙内……看到这么多生病和需要帮助的人却又被

剥夺了任何照顾和帮助的机会,真是令人痛心。通常而言,他们被丢下躺在地上,光着身子没有任何遮盖物……我记得曾经看到两个人,已经死了,像动物一样面朝夭躺在地上,嘴巴张着,里面全是苍蝇,两只胳膊抱着,好像在做痛苦的挣扎……看到他们死于这样非人道的暴行,我感到非常震惊。

到18世纪末,大约950万奴隶被输往美洲。奴隶密集分布在巴西和加勒比地区,种植园是这里的主导经济。历史学家们对拉丁美洲的黑奴制度是相对温和或是严酷进行过激烈的争论。最近的研究倾向于支持这么一种观点,即经济活动节奏是对奴隶的刑罚程度和种植园刑罚残酷性的决定因素。毫无疑问,和英国、荷兰或法国的殖民地相比,在西班牙美洲,对奴隶有一定的解放。这种结果最有可能的解释是在某些情况下奴隶制无利可图了,而不是传统文化导致的结果。不管何种原因,在殖民地时期结束时,奴隶只占了黑人和梅拉托人总人口的一小部分。无论受到什么样的待遇,奴隶都保持着对自由的渴望。对奴隶反抗的恐惧一直困扰在西班牙统治阶层的心头,并且奴隶经常从主人那里逃跑。他们其中的一些人在偏僻的热带丛林或高山里组成了自己独立的社区,成功地抵制了西班牙人向他们发起的惩戒性征战。

黑奴们频繁的起义、逃跑和其他形式的反抗都反映了他们对自由不屈不挠的追求,这表明对拉丁美洲黑奴制度是否残酷的争论回避了最主要的问题:即使“最温和”的奴隶制度在本质上也是没有人性的。这些背井离乡的非洲人在暴力下被强行带到这里,与亲人相分离,在新环境中经受着文化消亡(deculturation)的痛苦。考虑到安全问题,奴隶主倾向于购买不同种族来源、语言有别及宗教信仰各异的奴隶,并有意扩大他们之间的种族矛盾。种植园主的经济利益要求绝大多数进口的奴隶应当较为年轻,大概在15至20岁之间。这也加速了黑人奴隶文化的消亡,因为年老的黑人是非洲社会民间传说和传统的“储存器”,他们鲜有以奴隶的身份来到这里。

因缺乏女性(1716至1822年间,女性占古巴种植园中奴隶人口的比

（9—11 世纪），奴隶们的生活被扭曲，造成严重的性压抑和家庭不稳定。教会可能坚持奴隶拥有权利享有正派的基督教婚姻和婚姻神圣性，但直到 19 世纪，西班牙殖民者才开始禁止分开买卖奴隶家庭成员（丈夫、妻子和儿女）。奴隶主很难再随便卖出或开除男性奴隶家庭成员，及与女性奴隶发生性关系，如此一来，奴隶也可有了正常的家庭生活。对于种植园世界更像一个监狱，而不是社会，给拉丁美洲留下的是种族主义歧视和落后，很多问题在大部分国家仍在等待亟解决的答案。

非人的待遇、贫困的生活条件以及缺乏女性都使得奴隶的出生率降低。另一方面，由白人主人和女性奴隶杂婚而出生的穆拉托人却日益上升。自由黑人和穆拉托人为殖民地经济作出了重要贡献，无论是在农业方面，还是在手工业方面。但是，他们也被要求纳贡。



这幅 16 世纪的肖像画是由当地画家安德烈斯·桑切斯 (Andrés Sánchez Gual) 所画，描绘的是厄瓜多尔某个省份的黑人统治者唐·弗朗西斯科 (Don Francisco de Aroa)。这名统治者于 1547 年向西班牙军队投降。然而，在接下来的十年间，当地的反叛活动仍然持续挑战着西班牙人的统治。

城市和大庄园的生活

除了著名村社外，西班牙殖民地的社会生活有两个中心：殖民地城市和大庄园。与欧洲不同的是，殖民地城市通常不是自发形成的贸易和工业中心，而是以计划的方式发展，以满足西班牙人定居和对周边

地区管理的需要。有时一些城市是建在古时首都的废墟之上，墨西哥城就是这样的例子。更多的时候，城市的选择考虑的是战略或其他方面的优势，如利马城。与西班牙混乱的城市布局相比较，典型的殖民地城镇通常遵循格子式规划，包括一个巨大的中央广场，其周围建有大教堂、总督宫殿和其他公共建筑。从这个中央广场，延伸出很长、宽阔、笔直的街道，然后互相交叉形成了统一的矩形街区。对这种一致性的酷爱反映了文艺复兴新古典主义作品在建筑方面的影响以及王室对规范管理的热衷。与仔细规划的殖民地核心城市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土著人的街区布局混乱不堪，贫民窟里居住着大量的土著人和梅斯蒂索人。在饥荒或其他困难时期，他们为西班牙人城市提供廉价的劳动力和燃料。

矿山、种植园以及周边的畜牧场产生的财富大都流入了首府城市。在这些城市里，矿主和大地产主所住的房子大小和距离市中心的远近反映了他们的财产和社会地位。他们以豪华的住宅、陈设、着装和马车，以及众多的仆人和奴隶来展示自己的财富。到16世纪末，墨西哥城已经名声显赫，这里的女性、马匹和街道异常美丽，店铺种类多样，人们的花销毫无节制，娱乐生活丰富，贵族们也是慷慨无比。诗人贝尔纳多·德巴尔布埃纳(Bernardo de Balbuena)，在《伟大的墨西哥城》这首长诗里写道：

每个家族都慷慨地给予
没有人在乎代价多大
珍珠、金、银和丝绸

到17世纪末，据估计，墨西哥城的人口达到了20万人。

利马，建于1534年，秘鲁总督引以为豪的首府；波托西，秘鲁的矿业中心，它的财富成为了传奇。这是殖民地的另外两个主要城市。到1650年，它的财富开始下降时，波托西的居住人口达到了16万，成为南美的最大城市。

15世纪以来,尽管政府更替和风俗习惯能够带来一定的稳定,但社会动荡不安,充斥着西班牙不同派别之间的决斗、暗杀,甚至战争事件,这在官方史料和私人日记中被提到。在令人感到恐怖的环境下,西班牙的大城市经常会发生暴乱。1621年,因大饥荒和枢机主教不赞成国王将势力迁往教会,墨西哥城发生了骚乱,出现了“邪恶的国王”“教会万岁”的口号。他们到处破坏和抢劫财物来发泄不满情绪。1622年,类似的情景也引发了更大的暴乱,结果造成很严重的人员伤亡,包括总督的官邸和其他公共建筑被毁坏。

庄园也进入了殖民地社会生活的另一中心。我们必须再次强调大庄园和母国大庄园在土地制度及其他方面存在很大差异。由于经济制度不同,大庄园的土地制度、产品和所有权也会发生变化,大庄园有时会出现两个不同的类型,反之亦然。在整个殖民地时期,总体趋势是土地所有权日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通常是以牺牲小农场主为代价。然而,由于殖民地大庄园具有多形态特征,下面对它社会生活的描述可能被认作是带有“偏见”的。庄园主要分布于墨西哥和秘鲁的特定地区,而不是任何地方都有这种庄园。

在大庄园里,居住着克里奥尔贵族,因为他们无力应对城市生活的种种压力,或者他们的地产位于偏远的省份或边远地区。到17世纪末,许多地区的大庄园基本上变成了自给自足的经济单位,拥有可耕土地、牛羊牧场、提供燃料和建材材料的林地,甚至还有制造和修理庄园设备的作坊。庄园通常还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单位,里面有教堂、商店和监狱。教堂由定居的牧师照管,工人使用工资从店铺里购买物品,监狱里关押着不顺从的苦工。在大庄园主宽敞、陈设豪华的大房子里,居住的不仅是他的直系亲属,还有许多需要他保护和供养的亲戚。

大庄园里通常有一个或几个土著村庄,他们曾是这片土地的主人,而现在却以农奴的身份在这里生活和工作。他们居住在用泥砖砌成的只有一居室的房间或茅草屋里,唯一的家具是一些睡觉的草垫、磨玉米的石头(在新西班牙被称为磨盘)。他们不像那些独立的土著村社继续以造反或组织持久的诉讼等形式抵制大地主主的侵犯,这些常驻雇农

通常学会了对他们的主人进行适当的反抗。具有经济和社会组织特征的大庄园最真实地体现了殖民地社会封建性的一面。

婚姻、性行为 and 女性的地位

精英社会的婚姻和家庭关系的主要特征是男权占主导地位,表现为父亲有安排女儿婚姻的习俗权利和天主教上的双重标准,责令妻子和女儿严格遵守贞操,而对丈夫和儿子则没有相应约束。天主教会的守护者——教会,关心婚姻的政治和经济后果的政府,都曾试图对其实施监督和控制。在整个 16 和 17 世纪,教会倾向于支持孩子选择婚配对象的权利,但又承认父母在这件事上的发言权。然而,在 18 世纪中期,由于财产利益的重要性和影响力不断增强,政府和教会逐步改变了立场,支持父母反对不“门当户对”的婚姻,以保持家族“荣誉”。1778 年王室法令只认可父母反对跨种族的“不平等”婚姻,但殖民地的审庭清楚地解释认为,富裕的程托家庭与富有的西班牙家庭是平等的。帕特里西亚·西德(Patricia Seed)写道:“对一个程托人或程托人的后代来说,只要他是穷人,他就不会和西班牙人是平等的。这种趋势的决定因素不仅仅是种族不平等,而是经济不平等和种族差别绑定在一起了,才造成了惊人的社会不平等。”当然,这种情况很少出现在精英上层,因为他们选择婚姻伴侣的标准几乎是一成不变地以保持或增加他们贵族家庭的财富为目标。

同时,女性的贞操观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以前,当一个年轻女子因婚前性行为而失去“贞操”,并且要求通过结婚或其他赔偿来恢复荣誉时,教会倾向于坚持男性应承担 responsibility,要求他与女性结婚,或对她的损失作出补偿。然而,到了 18 世纪中期,贵族家庭的父母们认为,女孩婚前性行为会使她“不平等”,而不是“他”,因而也就对婚姻造成了障碍,而男孩则不然。帕特里西亚·西德指出:“与性别有关的贞操新观念设置了一项复杂的双重标准,即允许年轻男性可以夺走年轻女性的贞操,而不损害他们自身的名声或家庭,但同时对女性同样的行为又倍加谴责。”

尽管西班牙有关贞操的法令强调了贞洁和婚姻忠诚,但包括上层社会在内的大多殖民地女性漠视传统道德和教会守则,有婚前性行为、私通现象。在已婚情侣中,发生性关系也非常普遍。婚外生子的上层社会女性有很多办法掩盖这种失检行为,并使这些子女合法化。很多社会底层女性缺少手段,甚至可能不愿恢复失去的“贞操”。在17、18世纪,私生现象在殖民地城市无处不在。私生,意味着耻辱,对谋求晋升构成了障碍,难以在教会、军队和政府中获得更高职位。不过,对私人亲属的生育以及有机会接受教育都减轻,甚至消除了私生造成的障碍。有一支王家加西拉索·德拉维加,以是西班牙贵族征服者的亲生子女家;修女马安娜·伊内斯·德拉克鲁斯发现自己是非婚生的,这并没有妨碍她在文学事业上取得辉煌的成就。

在殖民地的大种植园地区,如委内瑞拉,男人们和女人们的实际性行为与正式的贞操法令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些地方大规模的奴隶制普遍存在,且有权力的人地产主往往忽视法律和习俗对性行为的约束作用。1770年,委内瑞拉主教马蒂(Marti)在主管教区做了一次巡回工作,评估教民的身体健康状况,他邀请了他走访过的每一个村镇的人,让他们私下里诉说关于他们及其邻居的罪行。马蒂这些详细的记录、报告以及他自己的调查和判断都反映了当时性行为的泛滥。凯西·瓦尔德龙(Kathy Waldron)写道:“1500多人被指控,主要原因是不当性行为”,“省内近乎十分之一教职人员遭到指责,甚至马拉开波政府也受到了谴责。这些指控包括通奸、私通、纳妾、乱伦、强奸、重婚、卖淫、淫乐、同性恋、兽奸、堕胎和杀婴”。

殖民地的女性在经济、社会和身体上从属于男人,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男性的主导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西班牙财产法的限制,法律要求财产应在继承人之间平均分配,而妇女在婚姻期间和婚后有权管理自己的嫁妆和所继承的财产。一些殖民地女性还开办了独立于她们丈夫的商业;女性通常是丈夫遗嘱的指定执行人,并且在其丈夫去世后接管他的生意。该研究领域的两个专家阿桑奇·拉弗林(Asuncion Lavrin)和艾迪斯·考图里耶(Edith Counturier)得出结论,

殖民地女性比人们想象的要享有更多的经济独立，“确实存在差异，但这不是全部现实，女性的表达能力并没有完全被剥夺。”

对精英和社会上层女性而言，修女生活为她提供了公开自我表达和免于男性监护和阻碍的一种特殊重要的方式。事实上，将一个或多个女儿进女修道院是十分普遍的现象。在17世纪，利马有15个女修道院接纳了该城市20%的女性。女修道院是自我管理的机构，为女性在管理、理财中展现各种能力提供了机会，有时修道院也成了为获得控制权而进行派系斗争的场所。乌塔维奥·帕斯(Octavio Paz)在他为伟大的女诗人胡安娜·伊内斯·德拉克鲁斯修女写的传记中提到，



一些天赋极高的女孩子，如伊莎贝尔·弗洛雷斯·德奥利瓦(Isabel Flores de Oliva)，在修道院中找到了在艺术和思想上独立的可能。她后来被称为利马圣玫瑰(Saint Rose of Lima)，是美洲第一位女圣徒。

“又修道院的政治生活经历了叛乱、争端、阴谋、结盟和报复。”修女们频繁地反抗教士与护驾女修道院院长的苛政,而且有时会发生不为人知的事。胡安娜修道院也是繁忙社会生活的一个写照;修女们揭开面纱接见来访者,尽管规定有外人在场时,她们不准露出面庞,当见面由木头栅栏隔开时,这个规定就没有得到很好的遵守。帕斯还写道:“这些修女在制作精美书籍和艺术品方面非常卓越,但在折磨她们自己及其姐妹方面也同样毫不差劲。”帕斯想知道,胡安娜修女作为对17世纪欧洲天主教思想有看透彻认识的知识分子,她是如何在鞭笞和神秘主义氛围中保持理性的。她在给普埃布拉主教的一封信中,承认修道院生活“增加了许多与我性情相抵触的很多义务”,她还指出“修道院的纪律”干扰了“我书中的宁静”。以某种方式,她成功地在自己的才能和这种氛围之间保持了距离,这种做法不是她的大性,但她自我控制的压力也会偶尔爆发。帕斯讲述了一位来自上层社会母亲的故事,她向胡安娜的大主教抱怨胡安娜修女傲慢,并指责她言语粗鲁:“安静,母亲,你是一个愚蠢的女人。”大主教是胡安娜修女的朋友,他在诉讼书的空白处写道:“与此相反,我将作出判决。”

尽管有这些缺点,修道院对向胡安娜这样的年轻女性而言仍意味着上帝赠送的宝贵机会,她们家庭出身一般,也没有独特的宗教倾向。她才华满溢,使她难以找到合适的婚姻伴侣,且无论如何,她也没有足够的嫁妆来吸引一个这样的男人。然而,修道院为她提供了逃脱性剥削陷阱的机会,使她能够培养自己的才能。路易斯·马丁对殖民地秘鲁的西班牙女性所做的一项最新研究,将秘鲁女修道院形容为“一座女性的堡垒,一个真正的女人岛,在这里,女人可以保护自己免受腐蚀和非人性化势力的迫害”。但要适当地指出:马丁的书针对的是绝大多数上层社会的西班牙女性,她们蔑视,甚至有时虐待身边的奴隶和仆人们。

西班牙美洲殖民地土著人女性的生活正在慢慢被人所知。有事实表明,尽管有西班牙家长式社会关系的破坏性影响,土著人妇女并没有成为消极的牺牲品。她们作为商品的生产商和贸易者,有着重要的经

济地位,她们也有自己的财产,使用各种策略,从动员亲戚到使用巫术,起诉或反抗男人们的虐待。她们在有组织地反抗西班牙威胁她们的公共利益的举措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威廉姆·泰勒对墨西哥殖民地142起叛乱的研究中,注意到了女性所起的作用。他写道:“至少在四分之一的案例中,女性明显地表现出更有进攻性、侮辱性和反叛性。”

第六章 殖民地巴西

焦点问题：

- 葡萄牙的殖民制度有哪些主要特征？与西班牙的殖民制度相比，又有何不同之处？
- 跨大西洋市场、国外竞争及葡萄牙对土著居民的政策是如何影响大种植园的经济、社会组织的？
- 在殖民地时期的巴西，黑奴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 大地产主和殖民地高官、教堂权贵及富有商人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

1494年，西班牙和葡萄牙签订的《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确定以佛得角群岛以西37°经线为两国海外势力的分界线，这就把南美洲大

片广阔的海岸线划归为葡萄牙人的探险和定居地区。而此时，巴西的

存在还不为欧洲人所知。1500年，为跟随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奔赴印度的伟大航程，佩德罗·阿尔瓦雷斯·卡布拉尔(Pedro

Alvares Cabral)与一支大型舰队也起航了。根据一种说法，因风暴影

122

① 约合1770公里或1100英里。——编者注

响,他偏离了原来计划的航线,直向西航行了很远,并于4月22日在巴西海岸登陆。一些历史学家推测,他是故意改变航线,是为了调查有关向西方存在着土地的传言,或者为了,人们以前已发现。不管他向西航行的原因是什么,卡布拉尔在巴西发现这块土地为他的国家所有,并派一艘船返航,向国王汇报这一发现。

巴西殖民地的开始

葡萄牙有限的资源全都投入到对非洲和远东的贸易上,已无法对巴西进行大规模的殖民。但是,葡萄牙并没有完全忽视巴西,葡萄牙王室考察探险队发现了一种珍贵、称之为巴西红木的染料木材,它们大量地生长于伯南布哥州(Pernambuco)和圣保罗(Sao Paulo)之间的海岸上。商人资本家很快获得从事巴西红木贸易的特权,并建立了一些零散分布的贸易栈点。在这些地方,用欧洲的小装饰物及其他商品可以与当地人交换巴西木材和各种有异国情调的商品。于是,小规模定居者开始出现了,一些是乘船遇难而被抛弃的人,还有一些是被驱逐出葡萄牙帝国的犯人们。这些流放者多数被当地人接纳了,并繁衍了大量的混血后代,这些人对于葡萄牙的殖民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法国人的商船也被巴西红木所吸引,出现在巴西海岸。这些闯入者引起了葡萄牙的警惕,国王若昂三世(King Joao)在1530年派遣一支由马蒂姆·阿丰索·德索萨(Martim Affonso de Sousa)带领的探险队赶走了入侵者,并在巴西建立了永久定居点。1532年,巴西在现今的桑托斯(Santos)港口附近建立了第一个名为圣维森特(Sao Vicente)的葡萄牙城镇。

都督辖区制度

葡萄牙王室资源有限,加之在香料丰富的东方所承担的沉重义务,迫使国王把对巴西殖民化的主要责任分配给了私人个体。这种责任采用了为都督辖区制度(*captaincy system*^①),该制度已在马德拉群岛、亚

① 又译为“将军辖区制度”。——译者注

葡国君主“为后嗣万勿使用”。巴西海岸线被分成 15 条平行的条带，1500 年，伊托尔德西里亚斯(Tordesillas)的不确定边界线将这些条带以教皇为世袭的辖区分配给 12 个人，每个人都答应自己担负开发、发展、发展和保护各自的辖区。都督辖区制度表现了殖民主义与商业因素的融合。接受封地的人或受赠者不仅是殖民者，而且还是一个商人，企图从自己的领地中获得大量



殖民地时期的巴西

利益,并通过出卖土地从殖民者那里获得税收。这和封建制度和商业元素的结合从一开始就刻画了葡萄牙殖民事业在巴西的特性。

不管是从经济还是政治角度来看,几乎没有都督辖区被证明是成功的,因为几乎没有哪个接受封地的人同时具备投资的资本和相应的行政管理能力,能够吸引定居者,并且保护他们的辖区不受土著人袭击和外国人的入侵。其中最成功的一位是杜阿特·科埃略(Duarte Coelho),他曾是一名西印度公司有经验的老手,获得了伯南布哥都督辖区。他在殖民地的大量投资获得了丰厚的回报,到1775年,他的儿子成为巴西最富有的人,从50个糖厂中征收了巨额的役税(替代支付封建劳役的一种租金费用),并每年出口20多艘船的糖。

到16世纪中期,糖取代了巴西红木,成为巴西经济的首要。受限于当地的土壤和气候,东北区域(伯南布哥州和巴伊亚)发展为甘蔗文明的中心,具有三个特征:大种植园、单一作物经营和奴隶劳动。那里很快涌现出一个大地主阶级,广阔的种植园和财富把他们与还不够富裕的邻居们区别开来。只有最大的农场主才能建得起种出口加工厂,小农场主必须把他们的甘蔗拿到这些工厂去压榨,为此要支付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收成。因为欧洲对糖的需求似乎难以满足,所以生产糖能够快速带来巨大利润,故而种植园主们也就没有动力推广农作物的多样化,而食品农业基本上局限于小农场来生产。

尽管制糖业的基本技术从16世纪后期至18世纪后期几乎保持不变,但巴西制糖业获得的传统和落后的名声看起来并不公正。17世纪,巴西制度被认为是模范,其他国家企图效仿。直到18世纪中期时,当巴西糖的需求和价格下降并造成危机,并且巴西的竞争对于加勒比国家也发展了新的制糖技术时,巴西的那种落后性才出现。甚至后来,历史学家斯图尔特·施瓦茨(Stuart Schwartz)也说:“这种指责是不应当的。”

葡萄牙的土著人政策

劳动力问题首次得到解决是袭击当地的村社,袭击者带回了大批俘虏,并卖给农场主和其他需要劳动力的雇主们。这些挑衅行为是造



有昆奴背”的士兵，如这个穆拉托人士兵，在深入巴西内陆探险、寻找黄金、土著奴隶和逃跑的黑奴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土著人和葡萄牙人之间长期战事不断的主要原因。但是，从经济角度看，这种劳动力不能令人满意，因为土著人缺乏种植园农业所需要的有组织性的劳动传统，尤其容易受到旧世界疾病的传染，他们对那些疾病缺乏相应的免疫力；同时，又表现出各种各样的抵抗，从试图逃跑到自杀（从最后一点来看，当然，他们的反应和后来逐步取代他们的非洲奴隶没有太大区别）

结果是 1550 年之后，大种植园主开始大量使用从非洲进口的黑奴。然而，由于荷兰海盗和其他外国人的活动，黑奴的供给经常被切断，或急剧减少；巴西的奴隶猎手们在整个殖民时期不断地为自己的“商品”寻找市场。最著名的奴隶“猎手”是来自圣保罗高地定居点的“捕奴队”（来自词语 *bandeira*，意思是“旗帜”或“武装团队”）。无法在

制糖业中占据优势条件的东北方人种和印第安人，这些人中多数是梅斯蒂索人，在内陆主要占领区内掠夺奴隶。在种植园中，对印第安人关于白银的永恒信念极大地激励着他们的工作。葡萄牙人通过贸易，或在入侵者到来之前通过用“携奴队”将人带到内陆地区，在不断的征战中，慢慢地扩大了巴西的边境。

尽管没有斗争，巴西土著并不接受失去土地和自由的事实，但是，他们的抵抗严重地被部落之间致命的相互竞争阻碍了，而这一状况正好被葡萄牙人加以利用。葡萄牙人的先进武器和组织，使土著人退到内陆，而他们经常对孤立的葡萄牙人社区进行毁灭性的屠杀。16世纪初，巴西海岸的延伸地区还由于这类持续不断的战争而受到阻碍。

但是，像西班牙殖民地一样，这种不公平的战争最终也是在这里结束了，以土著人的彻底失败而告终。过度劳累、失去住所的印第安人，以及欧洲疾病的肆虐，造成沦为奴隶的土著人大量死亡。对抵制奴隶的人或寻找其他借口而实施的惩罚性远征，也造成了人口减少。耶稣会神父安东尼奥·坎维拉(Antônio Vieira)对残忍的葡萄牙人的谴责，让人想起拉斯卡萨斯对西班牙的控诉，他声称葡萄牙人10年中对土著人的虐待在亚马孙地区造成200多万人死亡。一位出色的英国历史学家，查尔斯·鲍克瑟(Charles R. Boxer)认为这种说法虽有些夸张，但他承认葡萄牙人“经常用非常野蛮的方式灭绝整个部落”。

唯一发出反对奴役和虐待土著人的声音是那些耶稣会士传教士了。最初的传教士们由曼努埃尔·达·诺布雷加(Manel da Nobrega)带领，跟随托梅·德索萨(Tome de Sousa)将军于1549年到达这里。1年后，另一个有名的传教士若泽·德安谢塔(José de Anchieta)到达巴西。远至南部的皮拉蒂宁加(Piratininga)平原，诺布雷加和安谢塔为葡萄牙人、混血儿和土著人儿童建造了学校，并成为这类机构的典范。围绕这个定居点，逐渐形成了圣保罗城镇，此处是“探险家寻找黄金，而传教士寻找灵魂”通往内陆的重要的起点。

耶稣会制定了一个计划，把皈依的土著人安置在村社中(aldeias)，他们生活在这里由牧师保护，完全隔绝于葡萄牙殖民者的伤害性影响。

这个计划引起了很多奴隶“猎手”和大地产主的抵制,他们考虑的是另外的目的。在一场对负责殖民地宗教事务的王室“道德宗教委员会”(Mesa da Consciencia e Ordens)的愤怒抗议中,大庄园主企图扭转局势,声称在耶稣会村舍里居住的人是“真正的奴隶,不仅是作为学校的劳动力,而且也是所谓西印度大陆的劳动力,最终还会变成耶稣会神父们的大庄园和糖厂的劳动力”。

在17世纪中期,大庄园主、奴隶猎手和耶稣会传教士的利益冲突达到了顶峰,尤其累罗地区而言,捕奴队的活动最为激烈。在巴西的大部分地区,大庄园主开始发起叛乱,驱逐耶稣会,公然反抗王室宣布的奴隶主著人法令。1653年,安东尼奥·坎维拉,这位拥有出色演说才华和文笔的僧侣到达巴西,带着国王的全权授权,用他认为合适的办法对付这些僧侣。在大斋期,坎维拉为马拉尼昂人(Maranhão)人进行了一次有名的布道,他谴责对上著人的奴役,他的措辞堪比1511年蒙特·诺斯在圣多明各的演说。但是,他强烈的批评却被他的建议削弱了,因为他希望奴隶制在适当的条件下能够继续存在下去,而且还有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耶稣会团体中本身就有上著奴隶和黑奴。当然,毋庸置疑,在耶稣会传教区村舍生活的上著人的条件要比生活在葡萄牙人城镇和庄园里的奴隶要好得多。一个更为强硬的反对耶稣会的争论是隔离制度,尽管它原本是善意的,但却表现出了把不相容文化模式独断,机械地强加给了上著人,它阻碍而不是促进了真正的社会融合。

尽管王室总是同情耶稣会的立场,但迫于大庄园主阶级的压力,在近两个世纪里一直采取一种妥协的政策,使耶稣会和大庄园主都不满意。一个决定性的转折在蓬巴尔(Pombal)侯爵内阁(1750—1777)改革期间到来了,他把耶稣会驱逐出了葡萄牙和巴西,并使传教活动世俗化。他禁止奴役的立法接受了耶稣会关于上著人的权利的观点,同时还接受了帮助上著人过上文明生活的必要性的思想;他甚至接受了这样的准则:即把上著人集中在由行政官员管理的社区内,并对他们的教育和福利负责。但是,他的政策没有把土著人和葡萄牙人社区分离开来,而是使土著人成为殖民者能雇佣的有薪劳工,实际上,这促进

了两个种族的联系和交融,包括跨族婚姻。同时,艾蓬巴尔夫的支持,非洲奴隶贸易的增加减少了对土著劳动力的需求。尽管蓬巴尔夫的法改革是否显著提高了土著人的物质生活条件,还是值得商榷的,但对同化殖民地人口,直至最终形成巴西这一整体国家,具有极大贡献。这里具有决定性的因素是种族融合,该过程在耶稣会一时失去权力之后不断加快。

法国和荷兰的挑战

巴西的染料木、糖和烟草很早以前就对外国势力很有吸引力。法国人首先向葡萄牙在殖民地的控制权提出挑战。在土著人联盟的帮助下,他们通过断断续续的努力,在沿海建立据点,并于1555年建立了里约热内卢,作为他们称之为“南极法国”(Antarctic France)的首都。法国人同土著人交往产生的一个文化副产品是为他们创造了一个“高贵的野蛮人”法国式形象,并在16世纪法国哲学家蒙田的随笔《论食人族》中成为永恒。但是,法国对巴西的侵犯被国内的大主教徒和胡格诺教徒(Catholic-Huguenot)之间的斗争所削弱,1567年,葡萄牙指挥塞麦姆·德圣(Mem de Sao)把法国人驱逐了出去,占领了里约热内卢的定居点。

荷兰人对葡萄牙在巴西的主权构成了更为严重的威胁,他们的西印度公司夺取和占领了巴西海岸糖种植业最富饶的地区近四分之一世纪(1637—1654)。在荷兰莫里斯王子(Prince Maurice)执政时期(1637—1644),荷兰在巴西的首府累西非(Recife)成为杰出的科学和艺术活动中心。起初,葡萄牙对荷兰的斗争是联合巴西各地的所有种族,已获得独立。这些混杂的力量在第一次和第二次瓜拉拉佩斯(Guararapes)战役(1618—1619)中战胜了荷兰。受到巴西的顽强抵抗,以及同时与英格兰发生战争,荷兰于1654年撤离了伯南布哥。但是,他们也带走了所学会的制糖和烟草的生产经验,并在西印度群岛进行了重建,不久,在巴巴多斯和其他加勒比岛屿上的人种植园和糖厂,同巴西的制糖业在世界市场展开了激烈的竞争,最终导致价格下跌。

到17世纪最后10年,巴西的糖业进入了漫长的停滞期。

矿业周期、畜牧业和商业制度

在这段经济低迷期,1695年在西南部,即现在的米纳斯吉拉斯,发现黄金的消息很快传到了沿海地区。这一发现开启了一个新的经济周期,使内陆建立第一个有效的定居点,巴西的经济和政治的重心开始从北方和南方转移。大批来自巴伊亚、伯南布哥和里约热内卢的殖民者带着他们的奴隶和仆人,涌向了矿区。他们大规模地从原来的地方迁移出来,导致农业劳动力急剧短缺,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淘金热”进入高度发展阶段的18世纪中期。王室试图通过立法或制定政策吸引人口迁移,但这些努力都是徒劳的。在20年(1700—1720)里,王室在矿区颁布其权威和收取五一税从来没有成功过。敌对群体间的暴力冲突不断,尤其是来自圣保罗的开拓者们和出生在欧洲的新来者之间的冲突更为激烈,最终于1708年达到了爆发内战的程度。这些斗争的结果导致双方实力都被削弱,最终使王室能够重新恢复秩序。

1711年,一个新的名叫“圣保罗和金矿”的都督辖区建立了;1720年,它被拆分为“圣保罗”和“米纳斯吉拉斯”。1729年,在这个地区发现了一种特殊的石头,以前都被认为是水晶,而实际上却是钻石,这是一个让人疯狂的惊喜发现;很多探险家又带着奴隶,从淘金转向了钻石开采。供应欧洲的钻石大量增加打乱了市场,造成价格大幅下跌。最终,葡萄牙政府制定了对“钻石生产区”进行严格控制的制度,限制开采,防止走私,以维持钻石价格。这个制度实质上把“钻石生产区”与外部世界隔离开了。

像糖业生产一样,矿业周期的特征是,随着新资源财富迅速和粗放地被开采,紧接着的却是急剧衰退。矿业收入大约在1760年到达顶峰,从那以后,米纳斯吉拉斯河床上的金矿和“钻石生产区”的矿藏量逐渐出现了枯竭。到1809年,英国旅行家约翰·马威(John Mawe)把维拉利卡(Vila Rica)金矿中心描绘成“几乎没有留下丝毫曾经辉煌踪迹的小镇”。

然而,矿业周期给巴西留下了永恒的路印,在西南部地区,形成了新的定居点中心,不只是在米纳斯吉拉斯,而且扩展到了后来位于巴西西部的戈亚斯(Goiás)和马托格罗索(Matto Grosso)省,这些地方正是淘金先驱们所开拓的。即使矿营被废弃了,矿业城镇却能保留下来,尽管失去了活力。矿业的下降也刺激了这个地区农业和畜牧区的发展。经济和政治重心由巴伊亚和伯南布哥向南部米纳斯吉拉斯和里约热内卢的转移最终于 1763 年被正式承认,当时里约热内卢成为总督区的首府。

当米纳斯吉拉斯和戈亚斯省逐渐衰退时,由于欧洲对糖、棉花和其他热带产品需求的增加,东北部地区经历了局部复兴。1750 至 1800 年间,巴西的棉花产量大幅增长,但因来自美国更有效率的棉花种植者的竞争,产量又很快下降了。咖啡产业的兴起,作为巴西未来经济的支柱,也同样始于殖民地末期。

养牛业也对巴西的边疆扩大和南部地区的重要性作出了贡献。沿海的集约性农业和诸如巴伊亚及米纳斯吉拉斯这些沿海城市的人口集中,创造了对新鲜肉类的需求,刺激了养牛业的最初发展。由于大种植园农业在沿海地区没有为放牧留下足够的土地,养牛业必然不可避免地 toward 内陆发展。

17 世纪下半叶,人们的活动已从巴伊亚和米纳斯吉拉斯深入到遥远的圣弗朗西斯科峡谷(Sao Francisco Valley)。强势的牧场主,带着他们的牛群、牛仔和奴隶进入偏远地区,驱赶土著人,建立了有防御工事的牧场,同时,还为仆人修建了村庄。在官方向牧场主赠予了这些实际上是封建领地的大片土地的前后,上述的占领已经被合法化了,对养牛大亨而言,在他们的地产里,他们的话简直就是法律。大牧场主向沿海城市和矿区提供牛肉,向大种植园主提供畜力,皮革则向欧洲出口。

畜牧业后来扩展到最南端的南里奥格兰德(Rio Grande do Sul)地区,这个地方的殖民政府是考虑到抵御西班牙扩张而专门设计的。这里大片的土地被分配出去。在南部与牛仔(vaqueiro)对应的是加乌乔人(gaúcho)。和牛仔一样,加乌乔人是专业的牧马人,但在他们的语言

中混杂着葡萄牙和塔帕地区的混合文化,是葡萄牙语、西班牙语和当地方言混合而成;他们的穿着是阿根廷牛仔宽松肥大的裤子;他们的主要武器是一根套绳或绳子系着的石头球,该物品是被潘帕斯草原土著人用来套住和击倒动物的。

像西班牙一样,葡萄牙追求重商主义的商业政策,尽管不能始终如一,也不那么严格。葡萄牙和西班牙在 1580 至 1640 年间,出现过松散的联系。这一时期,巴西的贸易严格地仅限于葡萄牙的国民和船只。荷人,作为东印度群岛和草轮往欧洲的主要承运者,对这种限制给予了打击,进而大举走私,直接进攻巴西最富饶的糖种植地区。

在葡萄牙人驱逐西班牙之后,与英格兰结盟,于 1703 年签署了《梅森条约》(Methuen treaty)。根据该条约,英国商人被允许在葡萄牙和巴西自由从事贸易。但是,英国船只经常忽视履行在里斯本贸易的承诺,直接与殖民地定期进行走私贸易。因为葡萄牙的工业不能满足殖民地数量和质上所需要的制成品,大部分驶往巴西的商船满载进口都是外国的纺织品和其他产品,其中英格兰的货物占据了最大份额。同时,巴西的主人葡萄牙,自身变成了荷兰和英国商人的殖民地,他们的办公室就设在里斯本。

18 世纪,在若·何塞一世(Dom Jose I)执政时期(1750—1777),他的总理大臣蓬巴尔侯爵是一位有能力、思想开明的专制主义代表人物,对葡萄牙帝国开展了行政和经济改革,可与当时在西班牙和西班牙美洲进行的波旁王朝改革相提并论。蓬巴尔的方案是通过建立拥有足够资本、能与英国商人竞争的葡萄牙商人阶层,且发展民族产业,能够把英国的产品排挤出巴西市场,并以此对葡萄牙和巴西之间的贸易实施国有化。这项计划需要国家积极干预,在帝国经济中设立一个贸易委员会,对在葡萄牙和巴西的商业金融家以利润丰厚的特许经营给予补贴;建立公司,被授权垄断与巴西特定地区的贸易,以期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通过国家对新、旧产业的扶持,建立进口替代的政策制度。尽管犯过错误、遭受过失败,以及 1777 年蓬巴尔被迫辞职后出现过局部的倒退,但蓬巴尔改革至少取得了部分成功,为葡萄牙收复了巴西市

场。1796 至 1802 年间,运往巴西的 3/4 的商品都是葡萄牙人制造的,尤其是棉布。但是,1808 年因拿破仑的入侵,葡萄牙王室从里斯本逃往巴西,两年后同英格^[1]签订条约,给予英帝国要求的互有贸易特权,实际上也就“惨痛地拆毁了自 1750 年建^[2]起的雄伟的保护性建筑”。英帝国再一次享受到了对巴西的真正贸易垄断。

政府和教会

葡萄牙王室在巴西首先建立的政府赠予制度很快便令人满意了。在受赠者的巨大权力和君主的权威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矛盾;而且,鲜有受赠人能解决他应负责的防卫和殖民问题。结果就是政府改革。1549 年,托梅·德索萨以总督的身份被派往巴西,领导一个由 4 个殖民地行政机构——位于伯南布哥和圣维森特这两个繁荣定居点之一,累西皮亚,成为了他的首府。随着国王委派的其他代替受赠者,这些人的巨大权力和特权也就被逐渐取消了。随着殖民地扩张,也设立了新的都督辖区。1763 年,像前面提到的,里约热内卢的都督取代了他在巴伊亚的同事,并以总督的头衔成为殖民地行政机构的领导。实际上,与其他都督相比,他并没有什么特权。

管理者们和他们的缺陷

葡萄牙的巴西政府和西班牙的殖民政府在精神、结构和缺陷上具有广泛的相似性。然而,明显的区别就是葡萄牙的行政管理机构规模要小得多。两个帝国的经济差异可解释这种差异。西班牙的西印度有着相对多样的经济,不仅能够供应当地和整个地区,而且还能满足海外市场 and 大量土著人的需求。1600 年,加上 30 万西班牙人(当时巴西只有 3 万葡萄牙人居住),上述条件创造了成百上千城镇的崛起并创造了需要大量官员负责管理劳动力、收取贡品及其他财政和行政管理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在葡萄牙美洲,以下几个因素使得精心设计的官僚体系显得没有必要:出口,特别是糖具有压倒性的重要地位,但在里斯本卸货时,应交纳税收;大种植园主导了经济和社会生活,却阻碍了城

舌的发表；土著人作为劳动力和王室收入来源的作用不大。

在与西班牙结盟期间，葡萄牙 1604 年成立了西印度委员会 (Conselho de India)，其职能同西班牙的西印度委员会类似，两国在殖民政策上保持了合作。1736 年，这个委员会的职能被新成立的海外委员会所取代。在国王领导之下，该机构制定巴西的法律、任命官员，并集中他们的权力。省长、都督或总督集军事、行政，甚至司法权力于一身。他们似乎拥有绝对的权力，但也受制于一些因素：母国政府持续不断的干预，以甚密、严格和详细的命令对他们构成了束缚；其他权威部门的监督，尤其是检审庭同时兼具了行政和司法功能；还存在一些特殊行政机构，比如在金矿和钻石矿区设置的监督官，他们完全独立于总督。因此，像西班牙的殖民地一样，在巴西运行的监管和制衡行政系统通过以分散权力与重复设置和官员们的相互监督来实现的，这个制度反映了母国政府对其代理人的不信任。其他削弱总督权力的因素包括地域面积过大，人口分散、社会不稳定，土地集中度高，大种植园主和牧场主拥有的封建权力实际上难以撼动。

地方政府最主要的机构是市政议会 (Senado da Câmara)。该机构与城市规模大小不同而各异。不管选民是否仅限于财产所有者，还是由国王来选择，它的成员都代表了由商人、大种植园主和特定职业人士构成的统治阶级。选举的特征经常表现为敌对的派系为争夺控制权的斗争，大庄园主和克里奥尔人为一方，另一方则是商人和半岛人。市政议会的权力扩展到它管辖的整个地区，通常地域异常广阔。但是，它的权力常常受到王室法官 (ouvidor) 的干预。总的来说，城市的规模越大，财富越多，且距离总督的首府越远，它的权力也就越大。

王室和市政议会都征收了大量的税收，而征缴通常被分配给了个人。这些人为王室收税，作为回报，除了向国库上缴固定数额外，只要能满足规定的收入额，他们就可以留下剩余的税收。当然，这个制度助长了各种各样的欺骗和欺诈。另外一个严重的负担是什一税，税率高达 10%，最初以实物支付，后来只能使用现金。巴西历史学家卡伊奥·普拉多·茹尼奥尔 (Caio Prado Junior) 认为，什一税“同征兵齐头

并进,是殖民地政府向人民加征的最大负担之一。”

西班牙殖民行政机构残缺——低效率、腐败、拖延和贪污和重难返——在葡萄牙的殖民体系里也是常见。司法不仅成本高昂,而且让人难以置信地拖延和复杂。诉讼从低等法院提交到初审庭,最后直至王室申诉委员会,至少要花费1—1.5个月时间,有的新成员

然而,殖民地地域辽阔,殖民行政机构和人员数量上是不存在的。除了个别的大城镇,当地政府几乎意味着大地主们的存在,他们能对政府部门施加个人影响,因为王室的总督总是从他们中挑选合适的人。司令(capitae mor)——民团司令的权力几乎不受限制,包括任命、命令、逮捕和惩罚,它成为专制和压迫的象征。有时候,这些人使用暴力在事实上作为发动封建战争的工具,同有血缘关系的家族或部落的斗争——冲突经常以决斗的方式解决,或两个家族的仆人们进行决斗。

腐败从上到下都渗透到了政府和器中。收入微薄的人以多种方式出卖他们的权力:挪用公款、贪污、受贿几乎普遍存在。在极具才干、精力充沛的蓬巴尔侯爵的支持下,至少在更高级的机构中,采取了一些改进措施。这个时期,波旁王朝的殖民政策特点是集权化,葡萄牙的政策同样也出现了这一趋势。蓬巴尔侯除了依然存在的世袭都督辖区,限制市政当局特权,同时加强了总督的权力。

在重商主义者看来,蓬巴尔改革是力求促进巴西的经济发展,以实现葡萄牙的重建,当时葡萄牙的状况确实较为悲观。这些开明总督的典型代表是拉瓦拉迪奥(Lavrado)侯爵(1769—1779),他的成就包括把咖啡从帕拉移植到圣保罗,使其在这片肥沃的红土地上生长得异常繁茂。然而,蓬巴尔改革对于巴西行政机构的影响甚小,在拉瓦拉迪奥给继任者的信中曾提到过,他忧郁地观察到:

由于这些法官的薪酬很少……他们试图利用诉讼和煽动纷争扩大收入;这不仅让人们不得安宁,而且还使他们承担沉重的费用;他们的行为与自己的职业背道而驰,目的就是为了他们自己和部下的卑劣私利。这些人是动乱的主要策划者。

这位总督写道,在巴西执政的12年中,他从来没有发现这些法官做过一件有用的事。

教会和国家

像在西班牙殖民地一样,在巴西,教会和国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然而,与西班牙殖民者们相比,葡萄牙的国王们似乎对教会疏于管理。他们通过保教权(padroado)控制教会事务,教皇授予了葡萄牙国王在其国内和海外领地中拥有教职任命权。国王通过一个专门的道德教委员会(Mesa da Consciência e Ordens)实施权力。但是,罗马通过耶稣会的机制仍然保持着强硬的间接影响。耶稣会在葡萄牙法院有很大的影响力,直到1759年被驱逐出葡萄牙和巴西才结束。

除了个别令人尊敬的案例外,耶稣会神职人员在巴西卑劣的道德和行力让人感到沮丧。因为勒索费用以及在神职岗位上表现的粗心大意,牧师们经常受到指责。有时,他们把神职工作和世俗活动混淆在一起。其中很多人是大庄园主,其他人则从事各种各样的商业活动。一位巴西高级官员总结了他对牧师的印象:“他们想要的一切就是钱,他们才不在乎自己的好名声。”

然而,教会和教士们还是为巴西殖民地的生活作出了他们自己的贡献。传教士们在殖民地建立了教育和人道主义场所。尽管存在特别的教规要求,这些地方还是向那些有才华的人开放的,甚至招收混血儿。从它们的各级机构中,殖民地巴西出现了很多科学、学问和文学方面的著名人物。在他们中间,耶稣会作家占据了重要地位。但是,由于缺乏大学和印刷出版机构,巴西殖民地的文化贫瘠还是暴露出来了。

主人和奴隶

种族融合在巴西民族形成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殖民地缺乏葡萄牙妇女,清教徒式生活态度的缺失,大庄园主对土著人女性和黑奴妇女的暴虐,都促进了不同种族间的通婚。三种可能的种族结合是:白人和黑人,白人和土著、土著和黑人,其中第一种情况最为常见。这

种结合大多数都是在婚外进行的。1755年,蓬巴尔侯爵,为增加人口和加强巴西的秩序,颁布了一道命令,鼓励葡萄牙男性和土著女性通婚,宣称他们的后代有资格享有荣誉和尊贵的地位。然而,这种恩惠并没有扩展到其他族际间。

肤色、阶级和奴隶制

一般而言,种族的肤色界线被严格地划分出来。例如,一个“纯种”的白人妻子或丈夫,是上层阶级不可或缺的要素。但是,婚姻之外大量的跨种族结合产生了庞大的后代群体,至少其中一部分人得到了葡萄牙父亲的慈爱和相应的教育及财产,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肤色界限模糊不清和正当、频繁的肤色“代传”现象。当时存在从种族上对人进行划分的倾向,如果肤色不算太黑,通常按社会和经济地位来划分,而不是他们的外表。英国旅行家亨利·科斯特(Henry Koster)在他的趣闻轶事中提到了一位民团司令,暗示了这种“文雅的虚构”,科斯特怀疑他是穆拉托人。针对他的质疑,他的仆人回答:“他以前是,但现在不是了。”他要仆人解释,仆人继续说道:“民团司令能够是一个穆拉托男人吗?”

在种族形成过程中,奴隶制如同种族混合一样,在巴西社会组织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个制度的社会后果完全是负面的。奴隶制使非洲奴隶遭到了残酷对待,使奴隶主和奴隶都堕落了,助长了有损劳动者尊严的态度,也扭曲了巴西的经济发展。把劳动力等同于奴隶的倾向极大地限制了葡萄牙人或其他混血人进入社会能接受的大量职业。如此一来,就出现了由流浪者、乞丐、“贫穷白人”,或其他被降职和混乱人群构成的一个人口众多的阶层,他们不愿也不能与奴隶竞争农业和工业的工作职位。不可避免的是,就奴隶而言,工作没有激励,他们的劳动效率和生产率非常低下。

很多更老的历史文献形成了这么一种观点:与其他殖民地相比,巴西的奴隶制是比较温和的。部分原因,这个传统认识之所以流行,应归因于巴西社会学家吉尔伯特·弗莱雷(Gilberto Freyre)的著作,他

为了在巴西东北部甘蔗种植园社会中,奴隶主和奴隶之间存在的家庭关系。但是,弗莱雷所描述的奴隶通常是在室内工作的奴隶,他们有一定的特殊地位。与在巴伊亚和伯南布哥的甘蔗及烟草种植园的大多数奴隶相比,他们的境况非常不同。查尔斯·鲍克瑟说,在庄稼收获时,“甘蔗一半的时候,有时奴隶整日工作,至少从日出工作到日落。在甘蔗生产季节,工作时间没有那么不长,但仍要“保持严厉的纪律,对违抗者施以最残酷无情的酷刑”。1700年,王室的一份快报指责了奴隶主“施残酷肉体刑罚虐待奴隶的野蛮行径,并特别谴责了女奴隶主强迫女性奴隶从事卖淫活动的行为。”



一幅巴西奴隶制的场景。从非洲新到的奴隶在奴隶交易站里等待,而坐在椅子上的奴隶主与一位可能的顾客就小孩子的买卖讨价还价。

大种植园苛刻的劳动纪律反映了成本与收益的计算。斯图尔特·施瓦茨说:“奴隶主估算过一个奴隶一年平均能生产750公斤的糖。按照当时的价格,这实际上意味着,一个奴隶两三年内糖产量可相当于当初购买奴隶的价格和工作期间的生活花费。因而,一个奴隶只活五六年,那么大庄园主的投资就要翻倍了,就可以购买一个新的精力充沛的替代品了。”这种推理证实,奴隶主没有改善工作条件,或提高奴隶生育

率的动力,因为幼小的奴隶需要抚养到12或11岁,才能成为生产性劳动力。施瓦茨总结了奴隶管理的基本理论似乎是“让他们拼命工作,赚取利润,然后再购买”。

显然,奴隶受到的待遇因奴隶主个人的性格而截然不同。尽管王室赋予了奴隶可获得赔偿的合法措施,但没有证据表明,这些措施对奴隶摆脱困境是有效的。牧师作为教会在种植园内的代表,由大地产主向他们支付工资和提供住宿,他们可能在奴隶待遇的问题上也发挥不了什么影响。奴隶的低生育率和频繁自杀现象充分地说明了他们的状况。很多奴隶逃跑,并在丛林中形成了逃亡奴隶的聚居点“茅屋”(quilombos)。其中最著名的一个被称作帕尔马雷斯(Palmares)共和国,于1603年在东北部阿拉戈斯(Alagoas)都督辖区内陆建立,这是一个自给自足的非洲人王国,有上千居民居住在10个村庄里,延绵分布在90英里领地里。帕尔马雷斯的“茅屋”,无论是在规模和组织的复杂程度上,还是在抵抗殖民地当局对他们的反复征战都存活下来的能力方面,都是独一无二的。直到1694年,经过两年的围困,还是被捕奴队武装消灭了。但是,“茅屋”一直让大庄园主和殖民当局感到恐惧,到了1760年,对巴伊亚附近的“茅屋”构成威胁的抱怨已司空见惯了。

解放是奴隶获得自由的另一种方式。奴隶主们根据他们的意愿或奴隶洗礼时,经常会释放一些喜爱的奴隶或在大房子(Casa Grande)里抚养大的孩子们(有时候是他们自己的孩子)。有时候,奴隶用家庭和朋友的财富,赎回自己的自由。获得自由是有条件的,要保证以后仍继续提供某种服务。因此,以经济的、文化的和宗教动机等不同方式,出现了自由人及其后代的这一阶层,他们到18世纪,在巴西殖民地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奴隶制是巴西殖民地经济生活中的决定性因素,在各种社会关系中都留下了烙印。然而,除了奴隶主和奴隶外,还存在一个巨大的由不同种族构成的自由农民群体,他们生活在大庄园和村社里,这些小村子零星地分布在整个巴西的农村。一些是小农场主,有几个自己的奴隶,

他们的甘蔗带到“糖磨坊”压榨或出售。他们经济上的劣势,使得他难以独立,他们的土地和奴隶在土地集中和社会分化的过程中,很有可能会被大地产主的手中。他们绝大多数人是租佃农或收益分成佃农,要对大地产主忠诚,并为其劳动,作为回报,而获得一小块土地的经手特权。其他的小农是在17和18世纪被赶出沿海地区,而在偏远地区定居下来的人却被那些声称拥有土地所有权的牧场主和大地产主看做是“入侵者”。

巴西的工人是自由,包括很多黑人或穆拉托自由人,他们满足了大地产主的要求。一个重要的有薪工人群体——监工、机械师、桶匠和铁匠的人们——为制糖业提供了所需的专门技术。

大地产和殖民地城镇

巴西社会和经济组织的核心是大地产或大庄园,通常建立在黑奴隶的基础之上。大庄园以“大房子”为中心,构成一个家长制的社区,包括大庄园主和他的家庭、牧师和监工、佃农和仆人;还有社会底层的白人,受到大庄园主的保护和帮助,作为回报,他们要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

在这个自给自足的世界里,在主人、奴隶及白人或混血下属之间产生了复杂的人际关系网。毫无疑问,长期的接触有时会使这些关系变得更亲近和人性化,给这种纯商业的关系添加了感情纽带。主人的保护角色在教父(compadrio)关系中得到体现,他成为了受洗礼的孩子或见证新婚夫妇的教父。这个制度暗含着在大庄园生活里的互助关系和家长制所维护的利益。但是,它绝没有排除对这些人的严厉剥削,或实施最残暴的酷刑,如果他们反对或对抗大庄园主的绝对权威。

在东北部的甘蔗种植区,大庄园主变成一个特殊的贵族阶级,拥有家族传统,以家族的名号和血统而深感荣耀。在赛尔唐(sertao)和南部的养牛地区,奴隶人数不多,牛仔或加乌乔人性格独立,工人们的活动更为自由,这些因素都共同营造了一个相对更为民主的氛围。然而,

巴西历史学家卡伊奥·普拉多·胡尼奥尔(Caio Prado Junior)认为,每一个地方都“明显地存在社会差别,所有者和主人绝对的、家长制的主导权不可避免地总是与殖民地大地产主密切相连”。

与大庄园的重要性相比,殖民地的大多数城镇只是乡村的附属物,在政治和社会层面上被乡村权贵们所主宰。即使像在巴伊亚和里约热内卢这样少数的几个人城市,社会的主导阶层也是由大庄园主和制糖厂主所构成的。这些人通常把经营大庄园的任务交给管家和监工,比起乡下枯燥乏味的日常生活,他们更喜欢城市的享乐和热闹,但是,在城市里也居住着与大地产主争夺或分享权力的其他社会阶层:殖民地行政机构的高官、教会的重要人物、富有工匠和商人,尤其是律师;还有人商人,几乎都是半岛人,他们有些看进,口贸易,为大庄园主提供融资。

商人的社会地位不是很高,因为中世纪以来对商业的偏见也从葡萄牙传到了这里(这个偏见并没有阻止高官进行贸易,尽管是谨慎进行的),但没有什么可以阻止商人成为市政议会的成员。本地出生的大地产主和欧洲出生的商人之间的冲突,被反对暴富移民的民族主义的不满所激化,有时还会引发武力冲突。一个例子就是海贩之战(War of the Mascates, 1710 - 1711),一方是奥林达(Olinda),由甘蔗大庄园主控制的伯南布哥都督辖区首府,另一方是由商人们所掌控的邻近港口累西腓。

这场巴西土生白人和半岛人之间的斗争预示着后来要产生更为广泛的巴西民族主义和早期的巴西独立计划。到18世纪后期,米纳斯吉拉斯,巴西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地区,拥有了最多元化的经济。由于政府为加强该地区对葡萄牙出口商的依赖、征收大量非法税收、开征新的人头税,这个地区成为了动荡不安的温床。一群不同政见者1788至1789年密谋造反,筹划以北美为榜样成立共和国,其中的大多数人是殖民地社会上层的精英。其中唯一不是贵族成员的密谋者是何塞·达·席尔瓦·哈维尔(José da Silva Xavier),一个低层的军事官员,业余从事“拔牙”,他以此名在巴西历史上被人所知。作为美国革命

史者，巴斯科·达维尔显然拥有独立宣言和美国政府宪法的复制件。谋叛案结束后，所有的主要密谋者都被判死刑，但最后所有的人均被赦免，除了市民席尔瓦·达维尔。他以极大的勇气面对残暴的皇家法官，从而成为了巴西独立的先驱。

第七章 波旁王朝改革和 西属美洲

焦点问题：

- 波旁王朝经济和政治改革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又是如何影响殖民地的经济和社会关系的？
- 克里奥尔人的民族主义如何利用欧洲的启蒙运动和古代美洲土著社会的“古典传统”？
- 波旁王朝的改革对土著社会、非洲奴隶和混血人种产生了怎么样的影响？
- 为什么波旁王朝时期在殖民地历史上出现了最大规模的民众起义？
- “没有发展的增长”这个词如何与波旁王朝时期殖民地经济相联系的？

135 1700年12月，病重的查尔斯二世去世，在西班牙历史上，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的美好时代的开始，尽管出现新时代的迹象还比较渺茫。临终时，不幸的查尔斯在弥留之际才更像一个国王，他不顾一切奋力阻止了三个有继承权的人之间分裂西班牙帝国的阴谋：巴伐利亚王子、奥地利大公查尔斯和路易十四的孙子——昂儒的菲利普。在他人生的最后时刻，查尔斯签署了遗嘱，任命法国的菲利普，即后来

菲利普五世(Philip V),继承他的所有领土。

英国对法国和西班牙联合的前景深感恐惧,于是加速了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2—1713)。战争以签署《乌得勒支条约》(1713)宣告结束,规定将直布罗陀和米诺卡岛割让给英国;在西属美洲,给予英国贸易特权;在菲利普五世统治下,禁止法国和西班牙王国任何联合。第二年,签署了另外一个和平条约,把西属尼德兰和西属意大利的领地授予了奥地利。

改革和复苏

西班牙因失败而蒙羞,加深了当时弥漫着的悲观主义和失败主义情绪,但也有一些信念:王位继承战争的失败驱使国内要求对西班牙进行彻底改革的呼声高涨,失去荷兰和意大利的领地给西班牙留下了一个更好管理、更加西班牙化的帝国,这个帝国由卡斯蒂利亚王国、阿拉贡王国和西印度组成。

波旁王朝改革

和平的到来使得新王朝可以把注意力转向实施改革计划。这项计划受到了法国模式的启发。改革和接下来的西班牙复兴与波旁王朝的三个王公有关:菲利普五世(1700—1746年在位)和他的两个儿子费迪南德六世(1746—1759年在位)和查尔斯三世(1759—1788年在位)。在“开明专制”的庇护下,波旁王朝的国王们对已有的政治和经济组织进行了彻底改革,使国家生活焕然一新。只有这样全面的改革才能缩小西班牙与欧洲强国的距离,才能以强大的工业、繁荣的农业和稳固的中产阶级为武器把国家武装起来。它需要防止被英国及其联盟打败,以争夺主导18世纪的帝国地位。

尽管改革运动是在王室权力和天主教正统框架范围内实施的,但还是无可避免地在教会和贵族内激起了保守派的反对。结果是,尽管受到如佛罗里达布兰卡(Floridablanca)伯爵和阿兰达(Aranda)伯爵这样开明贵族的支持,波旁家族还是从低层贵族和中下阶层中招募主要

大臣和官员。这些人深受法国百科全书派、理性主义思潮的影响,尽管他们反对法国的反教权主义和自然神论。他们代表了与西班牙启蒙运动的特征,在宗教和政治上是固执的正统派,同时热情追求有用的知识,批判教会和牧师的缺陷,坚信有教养的理性力量通过遵从更加理性的路线重组社会从而能够改进它。

国家重建始于菲利普五世,但在查尔斯三世执政时达到顶峰。这位伟大的改革国王试图消除人们对于手工劳动的鄙夷,建立国有纺织工厂,邀请外国技术专家到西班牙,鼓励技术教育,以复兴西班牙的工业。为扶持农业发展,他限制了各产业者团体的特权,1749年承认地租农民,并在半岛被遗弃的地区安置外国农民。在前辈们的基础上,他继续努力鼓励造船业,通过修建道路和运河,促进贸易和交通。1767年驱逐耶稣会和颁布限制宗教裁判所权力的结果,是教会的势力下降了。在有能力和忠诚的大臣们的感召下,政府官员中开始出现节俭和服务的新精神。

但是,不应夸大波旁王朝统治期间西班牙经济和社会改革的程度。王室同封建贵族和教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改革并没有触及原有秩序的根基——贵族对土地的垄断,后者必然导致彼方的藩篱和农业技术的落后。这些缺点连同缺乏资本发展工业以及中产阶级的脆弱,都使得西班牙与英国、法国或荷兰相比,仅是欧洲一流或三流国家,尽管其人口和生产有了显著进步。

1788年12月,查尔斯三世去世后几个月,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实际上让改革戛然而止。受法国君主政体被推翻和王室亲属被处刑的惊吓,查尔斯四世和大臣们流放或逮捕了主要的改革者,并严禁法国理性主义和革命文学流入西班牙。然而,不管在西班牙,还是在殖民地,时间不能,也不会倒流。譬如,在查尔斯四世腐败政府的统治下,弗朗西斯科·赛维尔·巴尔米斯(Francisco Xavier Balmis)1803年从西班牙

① 著名的《百科全书》(1751—1780)的撰写者们,他们代表启蒙运动,支持自然神论和理性主义的世界观。

带着疫苗接种方法来到美洲和亚洲的殖民地,这一举措可能挽救了不计其数的生命。

波旁王朝在殖民地的改革缓慢而谨慎,考虑到原有的秩序符合强权者既得利益集团,这是很自然的。从来没有想到要赋予殖民者更大政治权力,更允许他们更自由地与非西班牙语世界进行贸易往来。相反,波旁王朝进一步集权化管理殖民地的行政机构,目的是提高行政效率。此外,但丁的商业改革是为了减少走私和加强西班牙和殖民地之间的贸易权,在某种程度上为西班牙“重新征服”殖民地。

殖民地商业的复苏和贸易垄断的瓦解

在一个波旁王朝——菲利普五世主要是集中精力减少走私和复苏经济——早期,商业自由化制。随着《乌得勒支条约》的签订,英国商人阶取得了巨大胜利。南海公司(South Sea Company)被授予向西属美洲殖民地贸易的专有权,此外,每年还有权向波托韦洛(Portobelo)运送一批货物。众所周知,像每年驶往美洲的运送供给的船队一样,运送的船队都装载着走私货物。南海公司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经营的贸易货栈成为英国商人走私贸易商品的又一通道,这些商品甚至远销到秘鲁。

为制止在加勒比海的走私,西班牙政府委托海岸警卫队(guardacostas)在主要的贸易通路上巡逻,查找装载走私商品的船只。政府也试图终止加的斯贸易商会(consulado)的垄断权,这种权利规定,只有其成员才可以装饰西班牙出港船。这一垄断之墙被加拉加斯公司(Caracas Company)于18世纪20年代打开了第一个缺口,该公司是在比斯开地区的资本家资助下组建的。作为对获得与委内瑞拉贸易特权的回报,这个公司负责在沿海打击走私者,并开发当地资源。尽管公司声称在实现这些目标方面很成功,但它其实未能阻止与附近的荷兰殖民地库拉索岛(Curaçao)之间活跃的走私贸易,也未能平息委内瑞拉大种植园主和商人间的敌意,他们控告公司支付的可可价格极为低廉,对烟草和其他产品的购买量太少,但所出售的西班牙产品价格却很高昂。

比斯开人和加泰罗尼亚人利用资本成立了类似的公司,与哈瓦那、伊斯帕尼奥拉岛和其他一些在殖民地贸易旧系统中未开发的地区开展贸易。这些企业在经济上都失败了,一部分原因是缺乏资本,一部分原因是管理不到位。这些加加的斯贸易商会的垄断出现裂缝的新组织并没有给克里奥尔商人带来好处,这些商人完全被排斥在外,不得参与西班牙和它的殖民地之间的合法贸易。

第一代波旁王室成员们几乎没有变革殖民地政府的行政结构,而是满足于通过更细致地甄选官员来努力提高行政能力。一项主要的改组是把安第斯地区(现在的厄瓜多尔、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同北方从秘鲁总督辖区分离出去。1739年,它变成了名为新格拉纳达(New Granada)的总督辖区,首都位于圣达菲(Santa Fe,现在的波哥大)。这个改变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显示出为加勒比海岸,尤其是卡塔赫纳要塞提供更好保护的愿望。它还同时反映了哥伦比亚中部高地人口的迅速增长。在这个新的总督辖区内,委内瑞拉被设为都辖区,首府为加拉加斯。这个辖区实质上独立于圣达菲。

像国内改革项目一样,殖民地的改革运动在查尔斯二世时达到了顶峰。这项改革的部分内容在一名杰出的西班牙经济学家——何塞·坎皮略(José Campillo)的著作中早已提到。何塞·坎皮略还是费迪南德六世手下的财政大臣,他于1713年去世前不久,撰写了关于殖民地事务的回忆录,提倡废除加的斯贸易商会的垄断,减少向运往美洲的商品所征的税收,成立与美洲正常通信服务的机构,鼓励殖民地之间进行贸易,并发展殖民地农业和经济活动,但前提是不与西班牙的制造业产生竞争。1765年,这些建议的人多数被写入一份递给查尔斯三世的王室委员会报告中。西班牙在“七年战争”中的失败,使它失去了佛罗里达,差点失去了古巴,这个打击给帝国改组和改革提供了动力。

在这一时期,加的斯贸易商会的垄断贸易慢慢消失了。1765年,西印度群岛打开门户,允许同包括加的斯和塞维利亚在内的其他七个港口开展贸易。这项改革在古巴糖业开始扩张的时刻到来,对岛上的经济产生强烈的刺激。这个特许权慢慢延伸到其他区域,直到1778年

“自由贸易”法令允许所有被认可的西班牙港口和所有美洲行省间贸易往来,新西班牙和委内瑞拉(1789年,新西班牙和委内瑞拉之间,在利马和利马下互通贸易)。这项贸易要征收的繁重的关税,由从价税(ad valorem)代替了,其税额只有原来的6%或稍低一些。贸易的限制也被逐步去除,但是贸易被极大地限制为殖民地之间。改革的主要受益者是拉普拉塔河地区,它在1776年,在马德里和该地区开展贸易。同时,作为古老秩序象征的贸易商(Casaca Corporation)渐渐失去它的重要性,直到1789年关门歇业。皇家审计署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作为一个咨询机构,它一直存在到18世纪,但是它的大多数职责却被国王任命的一位殖民地大臣接管。

“自由贸易”改革的成功反映在西班牙与西属美洲交易商品的价值上,据估计在1778至1788年间达到了700%。新的外国商人和商人纷纷进入西印度开展贸易,税收的减少,以及令人厌烦的贸易限制的去除,都开始产生影响,增加了生意的数量,降低了价格,也许也减少了走私(不过这有点不能完全肯定,因为减少限制不可避免会有利于走私者的活动)。

但是波旁立宪改革的成就不能被过高评价。这个改革最终没有达到其目的——为西班牙重新征服殖民地市场,其中有两个基本原因:首先是西班牙的工业缺陷,这是波旁家族无论如何也无法解决的;其次,在与英格兰的战争时期,西班牙无法保持通往美洲的海运线畅通,外国商人于是又一次涌向了西属美洲的各个港口。确实,西班牙政府也公开承认了自己无法在战时为殖民地提供所需的商品,其表现为:在1797至1799年间和1805至1809年间,两度取消针对来自中立国的外国船只(主要是指美国船)的禁令。允许殖民地同中立国开展贸

贸易要付出的代价是,这些改革并没有削弱加的斯的垄断统治地位,以及在殖民地贸易中的美洲代理人身份。直到1796年,依赖于它在航运、保险、仓库和通信方面的先进设备,超过85%的贸易是通过加的斯的。

易,这增进了美国、加勒比地区和拉普拉塔河地区之间的贸易活跃

经济活动的增长

也许,波旁商业改革最重要的成果是对西属美洲经济活动的刺激。很难确定这些经济活动的增长有多少要归功于波旁改革,或者18世纪西欧普遍的经济增长。但可以肯定的是,那个世纪的后半叶,西属美洲的农业、牧业和矿业生产都出现了增长。受波旁改革和欧洲对糖、烟草、皮革和其他特产需求增加的刺激,这些产品的产量在这一时期为大幅增长。一个明显的趋势出现:区域趋向专门化,即专一种植某种经济作物。1770年以后,生长在委内瑞拉和古巴的咖啡、甘蔗、烟草和糖,成为了加勒比区域主要的出口作物。人口的逐渐增长也刺激了本地市场的粮食作物生产,尤其是小麦,因为比起玉米,欧洲人更喜欢小麦。什一税的收取成为农业增长的指标:从1779至1789年的10年间,在主要农业区收取的什一税比10年前增长了10%。

然而,农业的繁荣似乎被极大地限制于生产出口作物和容易接触到国内市场的地区。大卫·布拉丁(David Brading)描绘了18世纪墨西哥庄园经济状况的暗淡景象。除了墨西哥谷地、巴希奥(Bajío)和瓜达拉哈拉地区外,市场太小使这些庄园难以收到满意的回报。遥远的距离,不完善的道路,高昂的运费都阻止庄园生产发展超越当地市场的需求。个体庄园比教堂庄园更糟,因为他们要付什一税和天灾税,还要忍受地主和居住区行政长官造成的双重负担。拥有大量土地的家庭,因为在不同地区拥有多处庄园,为不同市场生产各种产品,就显得幸运多了。他们的利润平均占到18世纪后期资本价值的6%到9%。幸亏有了廉价劳动力,即使生产率很低也可以得到大量收入,这也使庄园保持着领主式的奢华生活。但很多庄园仍欠下当时的主要“银行”——基督教机构大笔债务。

① 一个达到一定城市化程度的地区,拥有多样的经济(农业、牧业、制造业),位于现代墨西哥的瓜纳华托和克雷塔罗两州境内。

应该提到的是,农业生产的提高,不只是因为劳动工具和技术的提高,更多是依赖于土地和劳动力的广泛利用。低效率的大庄园(hacienda),大量使用报酬微薄的苦力还有奴隶种植,对农业生产贸易的落后负有主要责任。普鲁士旅行家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曾评论过墨西哥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度,他指出:“新西班牙的财产,像旧西班牙一样,大部分掌握在一小部分有势力的家族手里,他们渐渐地吸纳了小庄园。在美洲,像在欧洲一样,数量众多的平民落入了放牛和永远贫瘠的境地。”

18世纪上半叶,在墨西哥和安第斯中部,土地所有权集中化的加剧表明,当局希望在受限制的市场中消除小生产者的竞争,同时让价格保持在较低水平。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大农场主把他们的庄稼收获后存在各仓库,在粮食最紧缺、价格最高的时候,再拿到市场上卖。鉴于殖民地农业的低生产率,诸如干旱、早霜或者降水过量这样的自然灾害,很容易就打破了粮食供应和人口之间不稳定的平衡,从而造成可怕的饥荒,比如1781年至1787年在墨西哥中部发生的饥荒。成千上万的人死于饥荒引起的饥饿和疾病。

糖、可可和咖啡对加勒比地区意味着什么,皮革就对拉普拉塔河地区意味着什么。欧洲对皮革需求的增长(主要用于制鞋和工业目的);1765年允许注册船只与西班牙直接通商,这些引起了拉普拉塔河地区的经济增长。在潘帕斯草原无管理的捕杀野牛行为很快让位于在建好的养牛场(estancias)饲养牛。直到18世纪末,这些养牛场都很大,面积有15至20平方里格,通常有8万至10万头牛。到1790年,布宜诺斯艾利斯每年大约出口150万张皮革。动物的肉以前大多没用,只有小部分能被马上消费掉,但现在因为人们对咸牛肉的需求,可以卖上不错的价格。咸牛肉在大规模的腌制工厂(saladeros)生产,其主要还是在加勒比地区找到了市场,尤其是古巴,用来作为奴隶的食物。拉普拉塔河地区养牛量的增加,受惠于土地集中到更少人的手中,是牺牲农业而得来的,农业在那里一直保持着低迷的状态。

18世纪同样见证了西班牙殖民地银矿的显著复苏。秘鲁和墨西

哥共同分享了这个进步,但是在波旁时期,墨西哥的进步主要得益于他们的秘鲁对手。矿工包括克里奥尔人和土著人,但是投资新设备的西班牙商人获得了最大的利润。像农业的例子一样,产量的增加不是主要依靠改进的技术,而是由于许多新移民的带来,以及劳动力的增加。王权统治,尤其是在查尔斯三世时期,为变革提供了许多物质条件,包括给企业家更多的鼓励刺激,并且努力克服保守、闭塞落后局面。刺激政策包括减少税收,撤销政府的垄断。

在新西班牙,王权促进了一个矿业协会的成立(1777),协会的活动包括经营银行向给发展提供相应的资金。在这个协会的支配下,第一个矿产学校于1792年在墨西哥建立了一该校聘请了有能力的教授,提供了现代化的设备,同时也提供了优质的理论和实践指导,从而代表了墨西哥启蒙思想的一个重要源头。外国和西班牙的专家,以及技术工人,来到墨西哥和秘鲁向矿场主介绍新机器和技术的情况。这些值得赞扬的努力被矿场主的传统主义,缺乏资本进行投资改革,以及不当的管理极大地遏制了。但银的产量还是持续增长。和巴西的金一起,制银产业促进了北欧的工业革命,并在世界范围内刺激了商业活动。另外,美洲的银产业填补了波旁王室常年战争的花销。

1774年,一名财税改革家何塞·安东尼奥·阿列切(José Antonio Areche)来到了新西班牙总督安东尼奥·马利亚·布卡雷利·乌苏瓦(Antonio Maria Bucareliy Ursua)的领地,准备递上一份关于墨西哥经济状况的报告。他把墨西哥的经济描述为落后的,它的实践和理念将会给现代化带来无法逾越的障碍。人们抛弃农村,来到城市,使城市充满了失业者和不能被雇佣的人。造成这个飞跃的原因是低效率的农业,这种农业因为原始的耕作方法,负债累累的庄园和恶劣的工作环境,造成生产率低下而且没有利润。阿列切抱怨地主用商品而不是现金付工资,工人待遇不好,只愿意集中进行少部分基本商品的生产,而不愿尝试新的产品和服务。因为给工人付商品而不是现金作为工资,而且流通的硬币太少,零售贸易滞后。他还批评商人们喜欢把商品强卖给当地村庄,却意识不到这些社区巨大的潜在市场,它们可以消费大

各种各样的产品。但是阿列切没有看到西班牙利用墨西哥作为“提款机器”(John Coatsworth)的话,从殖民地的银产量中抽走一大部分用于西班牙的赋税,在殖民统治的最后半个世纪里,大概为5亿至6亿比索),导致了墨西哥缺乏足够的资本,经济结构滞后。

阿列切的报告也指明,波旁时期增长的经济活动并没有带来殖民经济重大的质变,“没有发展的成长”这句话适用于现代拉丁美洲的表现,也同样适用于波旁时期的殖民地经济。

殖民地制造业在长期稳定的增长后,在18世纪后半期开始衰落,主要是廉价的外国商品的流入,而当地产品无法与之竞争。阿根廷主要的纺织业和畜牧业开始衰落,因为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和蒙得维的亚的市场上,它们输给了廉价的外国酒和服装。厄瓜多尔基多省(Quito)的毛织品生产者也因为遭遇同样的失利而抱怨。在墨西哥的制造业中心普埃布拉(Puebla),瓷器生产在1793至1802年间遭遇了灾难性的下跌。尽管如此,普埃布拉和克雷塔罗(Queretaro)仍然是纺织制造业的重要中心。

尽管西班牙采纳了重商主义者的立法,旨在限制殖民地的生产业,尤其是精良的纺织业,但这个立法似乎对于大规模增长的制造业只是一小瓶抑制剂。更重要的是,这个抑制剂缺乏资本投入,西班牙人更喜欢把土地和矿产作为投资目标,劳动力处于半屈从状态的制度也同样对工人和生产力造成危害。洪堡在1803年参观了克雷塔罗的毛织品作坊,留下了不愉快的印象:

不仅染料准备的技术过程有很大的缺陷,而且在这个特定的工艺下,工人暴露在不健康的环境条件和恶劣的待遇中。在工作间,自由人、印第安人、有色人种和被司法发配的犯人混在一起,被强迫工作。所有劳动者都是半裸的,身上覆盖着劣质不成形的破布。每个作坊都像是黑暗的监狱。双扇的门永远是关闭的,工人不允许离开房间。有家室的人只能在星期天看望家人。如果他们不小心最轻微地触犯了作坊的规定,等待他们的都将是无情的惩罚。

雪茄和香烟的生产是极少数的大规模工业生产线之一。在克雷塔罗的同一个小镇里,洪堡还参观了一个拥有 3 000 名工人的烟厂,其中有 1 900 名女工。



妇女经常在纺织厂不卫生的条件下工作,尤其是像这个厄瓜多尔奥塔瓦洛的工人那样的土著妇女,她们把羊毛纺成线,再用原始的织布机织成布料

18 世纪的劳动制度

洪堡的评论证明了从开始到结束的整个殖民时期,劳动制度的重要元素是持续的奴役和压迫。尽管波旁王朝理论上不喜欢强迫劳动,但他们仍试图在西印度加紧劳役偿债制度的合法实施。为了更好地收取贡赋,何塞·德加尔维斯(José de Galves)——查尔斯三世的改革人

，试图让当地人和他们的印第安村庄及庄园有更紧密的联系。1769年，西班牙国王引进了结关单制度(*clearance certificate*)，结关单是证明一个人没有欠任何债务可以向其他地主找工作的文件。没有结关单的人，即使是印第安人，他们的债务是由新西班牙的矿产条例造成的，结关单和金矿租契也有同样的功能，结关单制度像在墨西哥的使用一样，在这里也被采用。詹姆斯·里雷(James D. Riley)的一项研究指出，1785年以后，波旁王朝的政策趋向于使债务在墨西哥变得“不那么重要”，但也指出没有官员愿意追捕欠债人，并强迫他们还债或者工作。尼古拉斯·库什纳(Nicholas Cushner)认为，在18世纪基多(厄瓜多尔)的耶稣会农场里，“债务是为了保持稳定劳动力的机制”，但劳动者“一文不值”。他又补充道：“这是印第安人版的黑奴制。”

波旁王朝的意图，实际上，劳役偿债制的重要性和它严格的强制性都依赖于劳动力的可用性。到18世纪末期，新西班牙的人口增长，带来了劳动力的增长和小生产者的消失，极大地减少了债务作为固定和维持劳动力的重要性。例如，埃里克·冯·杨(Eric Van Young)记录了孟达扎哈地区居住劳工人均负债的减少，表明了他们在对付雇主讨价还价时的力量有所增强。这种新的状况使庄园主根据生产状况的变化选择保留或解雇工人。因此，在18世纪后期的墨西哥，地主在收成不好的时候，突然想起可以节省给工人的报酬，就简单地解雇工人。这个变化还伴随着一个趋势，实际工资的减少和乡村生活水平的下降。

在安第斯区域，米塔制在受其支配的省份里，一直为矿产业和农业劳动力提供了重要补给，直到殖民时期结束。在其他省份，农业劳动力理论上自由的，但是繁重的进贡要求和商品摊派制(*repartimiento de mercancías*)的运作，产生了对现金的需求，这就迫使许多当地人寻找在西班牙王国的工作。这些亚纳科纳债农包括一大批所谓的外来者(*forasteros*)，他们逃离当地的印第安村庄，为了躲避可怕的米塔制劳役债务和进贡的负担。除了在庄园的土地上工作，这些劳动者或佃农以及他们的家庭成员还必须为主人的家庭提供服务。理论上自由，但这种依附的状态大大限制了他们的流动。

早期劳动斗争

我们对于西属美洲殖民地的劳动斗争的知只是很破碎的,部分是因为历史学家对这些内容没有什么兴趣,直到最近才有改观。第一次相当现代式的劳动冲突大概是发生在18世纪末的墨西哥,墨西哥是经济发展最快和最具多样性的殖民地。罢工有时候发生在工匠的店铺,比如1784年,工人在巴西利乌·巴达木勒(Basilio Badamler)的面包店罢工,抗议“可怕的工作条件”。更常见的是,他们出现在集中了大量工人的行业,或者实行劳动分工以促进工人合作和团结的行业中。一个大规模的工业是被王室烟草垄断的雪茄和香烟制造业,它的建立伴随着一场对生产这些产品的工匠的无情的镇压(1773—1776)。这个垄断经营的巨大工厂在墨西哥城雇用了约7000名男女工人。工人包括土著人、梅斯蒂索人和西班牙人,他们被付现金工资,在18世纪80、90年代,他们每年的工资总额大概75万比索。工人的战斗精神在罢工和抗议中展示出来,这让政府很担忧。1788年,墨西哥城的贸易商会声称,这种大型工人集合对公共安全造成威胁,以在总督宫殿的总行为例,这次游行是因为工作日的“小小延长”而引起的。工人冲过守卫,涌入宫殿,占领了庭院、楼梯和走廊。总督听到了他们的抱怨,“谨慎地给他们一个字条,命令工厂的管理人员废除那些改革,还有上帝的帮助,骚动结束了,民众离开了,带着那个字条像是大获全胜,总督决定忽略这个很可能造成叛乱的骚动”。1791年,工人又一次在总督宫殿游行,抗议一个合同安排的改革,改革允许他们把工作带回家,为第二天的工作做准备。

一场更富戏剧性的劳动斗争在1780年代墨西哥的银矿上爆发。冲突场景发生在墨西哥北部的雷亚尔·德尔蒙特(Real del Monte)的矿区。在这儿,像所有其他墨西哥银矿一样,大多数的劳动力是自由的,但小部分工人是从周围的当地村庄通过分派劳役制或者强抓劳工的方法招募的。抓壮丁部队也会挑选被称为“懒汉”或者“流浪汉”的人,去缓解常年的劳动力短缺。就是这些没有技术的工人的抱怨,引起了一

的对抗，甚至使假发斗拱的雇主完全停工。银矿业中劳动的过度——把矿石从下面的矿层中取出，装到上面的驴子上需要 30 个不同的步骤——渐渐发展成一种工人间的利益共享和合作。

在 18 世纪，工作很危险的，矿工每天暴露在野外，事故会夺去他们的生命；有时，矿主患上了让人虚弱或者致命的疾病。当时墨西哥银矿专家弗朗西斯科·德冈博亚(Francisco de Gamboa)说，矿工们“由于会倒毙，岩石会滑落，沉重的负荷会压断他们的背，由于下矿太深，还有，还有酷暑、炎热、让人窒息的热量”。在殖民地，直到 19 世纪中期，人们坚持称，墨西哥的矿工很少有活过 35 岁的。但到了殖民晚期，生活是很不错的：下到地下的工人每 12 小时的轮班，可以得 1 莱阿尔(real, 10 分)(1 莱阿尔可以买一磅毛织品或者 5 磅玉米)，工资比农业或者工资的两倍还多。他们还能得到“好处费”(gratudo)津贴，“好处费”是皆有技术的工人有权分享一部分他白天运送的超过定额的银矿。

矿工多梅辛·德特雷罗斯(Romero de Terreros)试图把矿石搬运的工资从 1 莱阿尔降到 3 莱阿尔，增加定额量，逐渐废除“好处费”，这些引起了一系列冲突，形成的危机。一个有同情心的教区牧师建议工人们通过合法手段达到他们的目的，还试图和雇主调解他们的纠纷(这个牧师后来因为激进行为被赶出印第安人村庄)。最终事态还是受到了干预，考虑到银产业对王室财政的至关重要性和因为常年劳动力的短缺，工人占据着坚硬的讨价还价地位。作为重要的矿产业和矿产业法律专家的弗朗西斯科·德冈博亚，被派去仲裁冲突。他的裁定满足了所有工人的需要：虐待人的老板被逐走，降低工资被取消了，“好处费”的权力用书面得到了确认。^①

多里斯·拉德(Doris Ladd)对这些事件进行了出色和微妙的重

① 但是工人在西班牙-德尔蒙特的胜利不是这个时期新西班牙矿区劳动力冲突通常的产物。在波旁时代早期，西班牙雇主对他们的人采取的是更具侵略性的态度。受到正规军和准军事力量的支持，他们反对消灭或者减少“好处费”，工人被允许留下来，并且会降低工资。

构。她解释说,在雷亚尔·德尔蒙特的斗争作为一种阶级斗争在劳动阶级存在之前出现了,反映出强烈的阶级意识,并指出工人的思想是“激进的”和“革命的”。她引用了工人律师表达的思想:罢工者对社会和经济公平的坚持是,“在所有神的、自然和世俗法的制度里,都存在着的一条戒律,即劳动和利益之间应当有公正的比例。”但是这种对公正的诉求有一种有限的范围和意义。它只适用于一群自由的、有相当特权的、有技术的工人,但并没有考虑到那些被抓奴从从家里拖到矿区并被迫劳动的土著人。依赖于当时一系列的有利条件,罢工者取得了胜利,这意味着回到了斗争发生前的普遍状况。但这个胜利还是把被征召来的当地工人留在了和从前一样无法忍受的境况中。因此不免让人怀疑,是否把这种屈服当做正常的思想能够被真的描述成“激进的”和“革命的”。

政治改革

在查尔斯三世的统治下,对杂乱的帝国领土区划进行整顿的工作还在继续。秘鲁总督辖区已经因新格拉纳达总督辖区划分而进一步减缩。这次变动反映了西班牙政府关注拉普拉塔河口的大规模走私。这也反映了他们害怕外国可能会进攻这个地区,因为英国已经把他们的触角伸进了其附近的马尔维纳斯群岛(又名福克兰群岛),还有已经从巴西开始向南扩进的葡萄牙人,他们已经在拉普拉塔河口南岸上建立了萨克拉门托定居点,以此为据点,他们威胁里约和蒙特维地亚城。要消除这个危险,西班牙政府集结了大批军队进行远征,为了全面控制河的两岸。总指挥官佩德罗·德赛维略斯(Pedro de Cevallos)以布宜诺斯艾利斯临时总督的身份出现。1778年,随着何塞·德韦提斯-萨尔塞多(José de Vertiz y Salcedo)的法命,总督辖区长久性地确立了,在他跨越10年的统治期间,这个地区蓬勃发展的繁荣景象出现了。这个繁荣景象要主要归功于1778年的“自由贸易”法令,法令直接授权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和西班牙的贸易往来,以及受到许可的殖民

是之。的贸易以来。1783年,布宜诺斯艾利斯建立的王室检审庭,完成了拉普拉塔省省份的解放,摆脱了利马的远程控制。

随着西属美洲行政管理去中心化的趋势,必须越来越加强来自马德里监督和干预,这不仅反映了反对外国军事力量和贸易侵入的斗争,而且也产生了对一些问题的启蒙性意识,比如如何解决交流和不同行政单位分离所引起的问题,而这个意识是被制图技术的提高和对大陆具体地理知识的增长共同激发的。这个趋势有两个明显特征:18世纪都督辖区享有更大的自治权利和这类辖区数量上的增长。墨西哥和智利被提升到都督辖区的地位。都督辖区享有的自治权利与西班牙使用封邑制管理者出现了,比如智利的安布罗西奥·奥希金斯(Ambrosio O'Higgins),他尝试经济改革,刺激矿产业和制造业的发展,引进新的农作物,总之他不仅要提高西班牙王权的利益,还要提升智利人民的福利。

墨西哥都督辖区和都督辖区的建立与另一个重要的政治改革紧密相关:1782至1790年,监政官制度被移植到殖民地,这个制度是从法国传到西班牙的。这个改革是为了更高的管理效率,并希望能让王室从殖民地获得更多的收入。监政官是依靠辖区内资本进行统治的管理者,被指望能从负担过重的总督身上接管一些职责,尤其是财政事务。在他们的其他职责中,监政官被期望能进一步推行本地区的经济发展,通过培养新的农作物,改进矿产业,修建道路和桥梁,建立商业行会和经济社团。在他们的刺激下,已日落西山的市镇议会在某种程度上被激发出更大活力。监政官制度同时废除了督办和市长这些镇压当地人的臭名昭著的统治工具。这些官员被称作协助代理官(subdelegados)的当地城镇管理者代替,这些管理者是由监政官推荐,然后被总督确认的。

改革高峰时期的很多监政官都是有能力和有素养的人,他们不止追求增加经济活动和经济收入的目标,也同样在提升教育和文化的进步。但这并不包括他们的手下大部分的协助代理官。这些人像他们的前任那样,很快因为压迫行为而变得臭名昭著。通常的抱怨是,他们强迫当地人和他们进行通商,尽管监政官法令禁止商品摊派制。1780年

代普遍的反抗人部分是由当地人和混血群体所要求。18世纪一个多进步的果实但最终失败而引起的,因为经济上主要受益者是西班牙人和克里奥尔人地主、矿主和商人。

加强防御

146

波旁商业和政治改革的主要目的是增强收入。这些收入的主要目标是加强帝国的海域和陆地防御。18世纪以来,西班牙王室已经放在了海军力量上:海上保卫队和海岸警卫队。18世纪中期以前,在殖民地保持武装力量是被忽视的,政权主要依靠地方武装力量。当地武装力量。“七年战争”的灾难,特别是被英国人夺走了圣多明各和尼拉(1762),导致了弥补殖民地防御系统不足的问题。一方面重要港口的防御工事被加强了,同时建立了殖民地军队。这些士兵很多,他们永久驻扎在殖民地或者在半岛和海外之间轮流服务,还有殖民地民兵,由志愿兵和招募的新兵组成。

为了使军事服务更吸引克里奥尔上层阶级,因为他们会提供武装力量的军官团体,王室向接受军衔职位的克里奥尔青年给予额外的特权和赦免。为了增加声望和荣誉的诱惑,参军者能获得免除受民事法律和约束的特权,除了某些特别指出不在赦免之列的罪行外。这种如此与殖民地官员的阶级保持一致的特别的法律和社会地位,有助于形成了一个在拉丁美洲一直保留下来的传统:武装力量作为一个特殊的阶层拥有自己的一系列利益,不从属于作为政治生活仲裁者而行使的政府权力,通常是为了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在波旁王室的统治下,殖民地的军事力量被诸如教会和国家官僚体制这种互相竞争的团体所控制。

尽管波旁王室推动的殖民地军事力量建设给上层阶级的克里奥尔青年提供了机会和好处,但对缓解克里奥尔人长期以来的抱怨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克里奥尔人感到自己实质上被排除在国家高级官员、教会和大规模的商业运作之外。波旁政策关于这个问题的考虑分为两个阶段。18世纪上半叶,富有的克里奥尔人有时候可以买到高官职位,在

段时期里,他们占据了墨西哥城和利马有名望的检审庭中的职位。但是到了18世纪后半叶,发生了反克里奥尔人的逆动。查尔斯三世的民地大臣何塞·德加尔维斯就是代表那个朝代开明专制思想的典型化身。加尔维斯不相信克里奥尔人的能力和忠心,就把高地位的克里奥尔人从国家管理机构中去除了。新的上层官僚几乎都是在西班牙本土出生,以及接管总督很多权利的监政官们。

其他的改革政策伤害了克里奥尔人的既得利益或者给他们的感情和传统造成了创伤。1801年,西班牙王室实施了一项紧急收入措施——*普定莱阿*法令,命令殖民地的教会机构召回他们所有的未偿资本、扣留资本和抵押资本,这些资本的利息支持了教会仁慈和虔诚的活动。这个过程是贷款给王室,王室会每年给教会付利息资助教会的活动。尽管该措施的主要动机是缓解王室紧急的财政需要,但它还有一个次要目的是把殖民地经济从“永久性经营”(mortmain)的负担中解放出来,从而促进财产更大的流通。

这个措施使殖民地秩序的两个堡垒受到了沉痛打击:教会和有财产的精英。大量的庄园主、商人和矿主在教会机构借了大笔债,现在必须还清所有债务,要不就会失去财产或者破产。很多精英家族也把庄园的部分财产转让给教会以获得一个牧师的职位,每年付利息提供牧师的薪俸,牧师通常是家族的一个成员。尽管教会并没有借贷这个资本,但负责实施措施的官员要求涉及的家族马上用现金交回这个捐助的财产。很多小型和中型地主,和其他中间阶级从教会借钱的人也同样受到该法令的威胁。

这些措施引起了暴风雨般的抗议,但抗议也渐渐被软化,表现为负责官员开始协商偿还的数量和其他偿还方式。欠债人(克里奥尔人和半岛人都有)对法令的反对十分强烈,以至于在新西班牙之外几乎难以实施,在1808年拿破仑入侵西班牙措施被取消之前,收到的1500万比索中超过三分之二是来自新西班牙,该项政策留下了一个苦痛的遗产,尤其是对像后来墨西哥独立战争的旗手米格尔·伊达尔戈(Miguel Hidalgo)神父那样的个人,因为无法按规定还债,他的庄园被

封了几年。

因此,尽管(而且部分因为)改革开明改革的精神,克里奥人渐渐和西班牙王室疏远了。这种疏远拒绝了克里奥人民族主义萌发,它否定直接的政治出路,可是在文化和宗教上找到了主要表达方式。

殖民地文化和启蒙运动

至少到18世纪,被教会和国家政权强加的17世纪宗教禁令,极大地限制了殖民地智力和想象力的发挥。因此殖民地文化从殖民者的缺陷中深受其害,但是又无可避免地缺乏西班牙文学和艺术所具有的活力,因为西班牙文学和艺术是一个更为古老和成熟的文明产物。尽管有这些和其他一些困难,诸如缺乏书籍市场,但殖民地文化还是留下了大量不同寻常而宝贵的遗产。

殖民地文化的主要灵感来自于西班牙帝国,尤其是16世纪的影响,它们对当地的影响有时候可以在设计和装饰中看出来。波多黎各的基多和墨西哥城是艺术活动的主要中心。新世界的第一个艺术学校在王室的支持下于1779年在墨西哥城建立。可以想象,宗教主题主导着绘画和雕塑。在建筑领域,殖民地模仿西班牙传统,从16世纪严格的古典主义风格,到17世纪巴洛克的装饰风格,再到18世纪更繁冗的装饰风格。

西班牙殖民地的知识氛围并没有引出科学的探究或者成就。直到1773年,哥伦比亚的植物学家穆提斯(Mutis)还被控告为异端,因为他在波哥人举行了哥白尼学说的演讲。宗教裁判所的检察官称穆提斯“也许是拉丁美洲唯一支持哥白尼的人”。18世纪最后十年,经济的长足发展和知识阶层与欧洲的接触,开明掌权者的资助和保护为科学活动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科学在新西班牙富有的省份迈出了最伟大的一步,在这些地方,矿产业的扩张引发了对地理、化学、数学和冶金学的兴趣。在墨西哥城出现了一个矿产学校、一个植物园和一个艺术学院。墨西哥的科学复兴产生了一批杰出的精英人物,如安东尼奥·德莱昂伽马(Antonio de Leon y Gama)、安东尼奥·德阿尔卡特(Antonio de

Alzate)、华金·贝拉斯克斯·加迪纳斯-莱昂(Joaquin Velazquez Cardenas y Leon)。这些人将启蒙运动追求理性主义、经验主义和进步的激情与严格的天主教正统结合在一起。比如,阿尔萨特激烈指责欧洲哲学家的“不忠”和怀疑论。

身处波旁王朝统治下的西班牙自身,对殖民地的知识复兴作出了贡献。18世纪早期的修士本尼托·费霍(Benito Feijoo)通过多篇文章对各种愚蠢行为和迷信学说发起进攻,同时在西班牙和它的殖民地传播了巨大的自由化影响。费霍用他对培根、牛顿和笛卡尔的崇拜,加速了启蒙运动在西班牙语国家中被接受。西班牙人到美洲后,利用他们的海外探宝,得到王室的授权,有时候还会得到资助,为西班牙带来了科学思想的发展,并把殖民地介绍给一些杰出的欧洲一代大人物,如法国人查尔斯·玛丽·德拉·孔达米纳(Charles Marie de la Condamine)和德国人亚历山大·冯·洪堡。

在殖民地当中,耶稣会在调和教会教条和启蒙运动思想的努力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最具技巧和策略。在墨西哥,安德烈斯·德·格瓦拉(Andres de Guevara)、佩德罗·何塞·马尔克斯(Pedro Jose Marquez)、弗朗西斯科·哈维尔·克拉维杰罗(Francisco Javier Chavigero)等人继续讲授培根、笛卡尔和牛顿的学说。这些耶稣会士把物理放在圣经十字之上,把实验方法置于抽象推理和推测之上,但他们都把这些信仰与对教会教义坚定不移的忠诚结合起来。因此,把耶稣会从西属美洲驱逐出去,也就让这里失去了最有力也最细致地捍卫传统天主教世界观的人群。意大利是多数耶稣会士被流放后的定居点,在流放期间,有些人利用空闲时间写了一些关于他们美洲故乡的历史和地理书籍。这其中最重要的作品是弗朗西斯科·克拉维杰罗的《古代墨西哥史》(1780—1781),该书是根据时间序列撰写的最好著作,也是天主教正统与启蒙运动批判和理性方式混合下,体现耶稣会特征的最好阐述。

尽管往往忠诚于王室,这些殖民地知识分子的著作还是揭示了对社会和政治压迫的敏感,这是一种对经济落后的不满,和一种包含对西

班牙政权具有潜在危险的国家自强的端倪。在西属美洲受过教育的克里奥尔人中,殖民地报纸和刊物在批判和改革思想的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因为受到教会和国家的强制性审查,以及深陷于多年的财政困境,它们的寿命也是短暂和充满反对的。

18 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和 19 世纪初期,在殖民地受教育群体中,禁书的传播和影响持续增长。尽管如此,也不能像一些作家那样下结论说,宗教裁判所在 18 世纪变成了没牙的老虎,激进的思想能够几乎完全不受惩罚地被宣扬。确实,宗教裁判所的影响在改革时期减弱了,尤其是在查尔斯三世时期,因为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反对影响。但是审查制度从来没有放松过,宗教裁判所还在继续保持着警惕,随着驱使西班牙和法国分裂的外交车轮的每一次转动,审判官的螺丝就被拧紧一次。法国大革命在墨西哥引发了对宣扬激进思想的广泛反对,在墨西哥城的一次较大的信仰审判中达到高潮,长期监禁判决和其他严厉的惩罚都被用了出来。但西属美洲独立的先驱们在文章中表明,这些试图压制新思想运动的行为是多么无力。他们的作品显示出对洛克、孟德斯鸠和其他启蒙运动重要人物思想的广泛认识。

克里奥尔民族主义

克里奥尔民族主义的萌芽建立在其他基础上,而不是欧洲的启蒙运动,这一点对大多数人来说是陌生和值得怀疑的。对各自的省份越来越认同,将其看成是祖国(*patrias*),18 世纪克里奥尔知识分子收集整理出一个壮观的论据库,旨在反驳知名欧洲作家的攻击,比如孔德·乔治·德布冯(Comte Georges de Buffon)和康尼利乌斯·德包弗(Cornelius de Pauw),他们宣称新世界及其居民有内在的自卑感。

大体上说,克里奥尔爱国者的祖国全都在美洲。早在 1696 年,墨裔法国人奥古斯丁·德贝坦科特(Agustin de Vetancurt)就宣称新世界在自然美和资源方面都优于旧世界。他在辞藻华丽的散文中写到,新西班牙和秘鲁是整个世界吮吸营养的两个乳房,嗜血变成了黄金和

“眼的乳汁”。在形象的变迁中,他把美洲比作一位佩戴着从资源丰富地区珠宝盒中拿出的珍珠、翡翠、宝石、水晶和黄玉的美丽少妇。

在《古代墨西哥史》一书的序言中,克拉维杰罗陈述道,他的目的是“恢复已经消失的事实,被难以想象的大量美洲作家模糊的事实”。

克拉维杰罗赋予古代墨西哥历史的史诗性英雄主义角色反映出克里奥人对根源的寻找——寻找真正的古迹而不是半岛人宣称的欧洲。他为特拉斯特兰人和阿兹特克人的编年史提供了大量像古希腊和罗马历史中一样的英勇、爱国主义、智慧和美德。墨西哥的古迹中展示了可为文明和进步的英明的奇奇梅克国王霍洛特尔(Xolotl)和如尼萨瓦尔科特尔(Nezahualcoyotl)与尼萨瓦尔皮里(Nezahualpilli)这样的君主。通过这种方式,克拉维杰罗提供了一个初生的墨西哥国家形象,拥有相应的尊严和英勇气概的过去。智利教士胡安·伊格纳西奥·莫利纳(Juan Ignacio Molina)在他的《智利历史》(1782)中也表现出同样的主题。

克里奥尔人努力发展的一个集体性的自觉意识,同样在宗教思想和象征主义中找到了表达。在《奎策尔扣特尔和瓜达卢佩:墨西哥国家意识的形成》(*Quetzalcoatl and Guadalupe: the formation of mexican national consciousness*)中,雅克·拉法耶(Jacques Lafaye)展示了克里奥尔知识分子如何发掘两个有力的传说而获取墨西哥的精神自治,甚至超过西班牙。一个是关于1531年圣母马利亚在墨西哥城附近的特佩亚克(tepeyac)山显灵的传说,说圣母马利亚向一个来自库奥蒂特兰(Cuauhtitlan)的名叫胡安·迭戈(Juan Deigo)的印第安人显灵,并且通过他向墨西哥主教传达了在那里建立一个教堂的命令。主教要求的证据是来自特佩亚克山冬天的玫瑰被胡安·迭戈的长袍包住,而长袍被奇迹般地绘上了圣母的形象。从17世纪开始,棕色皮肤的圣母(indita,与据说帮助过的洛斯·莱梅迪奥圣母相反)被称做瓜达卢佩圣母,在整个墨西哥被崇拜。借助她的名义,米格尔·伊达尔戈得以在1810年反对西班牙统治科尔特斯的大规模起义中,成为大量当地人和麦斯蒂索人的领导者。

另一个伟大的传说是关于托尔特克人的救世主，日月和神灵——魁扎尔科亚特尔的。后来殖民地时期的作家揭示出，魁扎尔科亚特尔就是基督教使徒圣托马斯。1791年12月12日，克里奥尔人多米尼古·塞尔万多·特雷萨·德米尔(Dominican Servando Teresa de Mier)在



瓜达卢佩圣母的传说，被克里奥尔民族主义者利用，催生了他们19世纪为独立和文化主导权的斗争，后来又被下层阶级的当地人和梅斯蒂索农民为社会公平的斗争所利用。

瓜达卢佩建起了他的讲坛,声称魁扎尔科亚特尔就是圣托马斯,他在很久以前带着四个弟子来到新世界为《福音书》传道。他获得了成功,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在某种程度上肯定被修改的基督教已经统治墨西哥了。如果米尔是对的,美洲就没有任何东西源自于西班牙,甚至基督教。西班牙殖民者很快重新认识到米尔传道的革命性暗示,于是逮捕了他,将其流放到西班牙。

这个插曲说明了克里奥尔民族主义迈向最终目标的曲折路线。其中之一是克里奥尔人对当地人和混血群体的霸权,霸权建立在对共同社会认同上,以及像墨西哥瓜达卢佩圣母这样的全民崇拜符号的集体凝聚力之上。在18世纪80年代,那些人积攒的愤怒爆发为1808年的革命,攻击在殖民地社会和政治秩序的根本性存在。在这个革命中,克里奥尔上层阶级表明他们的贵族国家在它的孩子中并不真正包括印第安人、梅斯蒂索人和黑人。

1750—1810年,过渡时期殖民社会的概况

日本学者吉本·桑德斯·吉本做过估计,西属美洲在殖民地时期的人口增长情况,人口数量大概为1700万。吉本推测,其中有750万是印第安人;大约320万是欧洲人;大约75万是黑人;剩下的550万是混血人种。这些数据表明了从17世纪衰落的低点开始,当地人口持续稳定的上升,也表明了欧洲人人口数量的快速增长,甚至混血人种人口更迅速的增长。

在殖民地后期,曾经用来描述和划分种群的分类变得越来越模糊,即根据“米普”或缺少“米普”来定义构成殖民地人口的群体。一个原因是殖民地人口流动性的增加,导致西班牙化和种族融合的快速化。禁止印第安人住在西班牙城镇,白人和混血人住在当地人城镇的法律慢慢地被忽视了。大批想要逃脱贡赋和摊派制负担的印第安人,移民到西班牙城市和其他地方,在那里学习说西班牙语,穿欧洲的衣服,并且适应其他的西班牙生活方式。那些住在远离西班牙经济活动区域的村子的人,不太容易被西班牙人和梅斯蒂索人的出现影响,所以保留了更多的

“当地性”。因为许多涉及当地历史、地理和经济形式的问题,秘鲁总督辖区的当地社区比起新西班牙的当地社区,似乎更加反对文化同化。但是政治和社会变化也慢慢地改变了秘鲁人的身份特征。它的亲缘基础被削弱了,这是因为外邦人、农民和从其他省份逃出来的受矿区米塔制统治的劳工的流入。这也可以看到了18世纪后期波旁政策的影响,波旁政策按照地理位置对其进行了重新定义,定期按照人口数量重新分配土地,为了皇家国库的利益,拍卖多余的土地。

18世纪后期,那些离开当地印第安村庄,并在服装和语言上被西班牙人同化的人,还有那些甚至获得相当水平财富的人,慢慢被合法地当做了西班牙人,即克里奥尔人。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当地土化了的梅斯蒂索人,以及也许少一些的里人和穆拉托人身上。简而言之,一个独立的种族,慢慢趋向于不是被肤色所定义,而是被职业、服饰、言谈和自我自觉这样的特征定义。

波旁时代后期的经济进步,以商品农业、矿业和国内外贸易的飞速发展作为特征,它为一些幸运的低层阶级个人提供了机会,也为种族等级重要性的下降作出贡献。一群规模壮大的富有梅斯蒂索人和穆拉托家族企图在社会层面上得到地位的提高,通过让自己的儿子或女儿与西班牙精英的孩子结婚。查尔斯三世关于种族通婚的政策反映出这个改革国王的困境,他希望促进一个进步的中产阶级的增长,但又害怕会破坏古老贵族秩序的基础。查尔斯三世把这个污名与土地劳动联系起来,一方面颁布法令说与贵族阶层通婚不受禁止,一方面又颁布法令授予殖民者家长特权,可以拒绝同意他们孩子的种族通婚,如果他们觉得这样威胁到了他们家族的“荣誉”。就像高级殖民法庭解释的那样,这些法令作为规定,只有当打算结婚的双方在财产上不平等的时候,才会批准这样的家长拒绝,这意味着,像前面提到的,一个富有的穆拉托人也可以是西班牙精英成员合适的结婚对象。最后的波旁国王也促进社会的流动性,允许帕多斯(pardos,自由的穆拉托人),不管他们是否奴隶出身,可支付能让他们从“声名狼藉”的地位获得自由的《血统净化证书》(cedulas de gracias al sacar),从而成为“法律上的白种人”。

不能错误地认为这些对小部分富有混血人群的让步,反映出了这一等级制度在它依附的意识形态的瓦解,种族偏见和刻板成见还是继续在殖民地的思想环境中占统治地位。比如,像刚才提到的,穆拉托人和帕多斯人包以地想要通过付补偿费变成“白种人”,但像加拉加斯和利马这样的精英群体却抗议波旁种族政策所赋予的越来越大的自由,认为这些政策促进了“白人和帕多斯人的混合”。最后,一些家长也常对他们的孩子提出诉讼,阻止他们同深肤色个体的婚姻。

这种有当地或非洲血统的个体对精英社会的渗透,即使在最高的人,也不会改变等级结构的坚硬,阶级分歧的尖锐,以及分离富人和穷人两大阵营。洪堡用“权力和财产如洪水猛兽般地不公”形容后期西班牙殖民地。但是殖民地后期也出现了一些变化——精英经济基础改变,以及各种它们在相对重要性上的一些转移。如果说17世纪是大地主的黄金时期,那么18世纪,尤其是最后几十年,他们的优势受到了挑战,这些挑战来自进出口商人阶级增长的财富及其政治和社会影响,其中多数成员是西班牙移民血统。这些商人为矿产业提供了所需的资本,并且从中获得了大量的利益。他们同样为购买督办的职位提供资金,督办是奉命与当地人社群进行贸易并与商人勾结的官员。为了提供反对商业损失的保护手段,而不只是保护地主制度认同的威望,富有的商人需要地产,建立综合庄园,生产各种农作物,并且要位于能供应大量市场的位置;然后变得越来越多元化,建立磨坊厂或者纺织作坊,不仅在城市而且在乡村,把自己作为主要的零售商。那些最富有和有权有势的克里奥尔人扩展了家族的势力,形成了稳固的地位,他们的后代在殖民地政府和教会重要和显赫地位的任命,占有优先权。

18世纪后半期出现了一股新的从半岛来的移民浪潮。这些通常出身卑微的新来者的出现,激化了传统克里奥尔人对新来者(gachupines或chapetones)的不满,因为他们与美洲出生的西班牙人竞争有限的工作机会。尽管根据洪堡所说的,“最底层受到最少教育并且没有教养的欧洲人认为自己优于在新世界出生的白人”,但多数的新来者无法找到他们所期盼的高地位和高报酬工作。1753至1811年墨

西哥城的审查报告列出,一些西班牙人从事不需要技术的苦力工作和家庭仆人,而且还有很多人没有工作。《墨西哥日报》(*Diario de Mexico*)经常刊登着这样的广告,无业的西班牙移民希望接受任何低级的管理职位。两个敏锐的西班牙官员,豪尔赫·胡安(Jorge Juan)和安东尼奥·德乌略亚(Antonio de Ulloa),在大约1750年到访新格拉纳达的卡塔赫纳,发现那里的克里奥尔人和欧洲人做的都不算什么大生意。“但是不可能所有人都成功,大部分人没有办法保持足够的存款,他们变得贫穷和迷茫,由于对继续以前在欧洲从事的贸易感到反感,又不能让那些有钱人炫耀自己在西印度拥有的财富,这些人正在经历着最复杂的悲惨境遇。”

大众起义

152

传统上,一般把当地人大致描绘成西班牙制度不同程度上被动接受者,或者描述为文化同化的过程。在近几十年里,关于他们对西班牙制度反应的更深入仔细研究,表明他们不是“被动的西班牙殖民化的受害者”。相反,存在大量这样的证据说明,他们是从一开始就用各种策略反抗西班牙制度的积极活动分子,因此改变着殖民地环境,并且塑造着自己的生活和未来。这些策略包括起义、斗争、暴乱、蓄意破坏,有时候甚至利用他们主人的合法规定,达到防御和进攻。

在西班牙激烈竞争当地劳动力的环境下,逃跑使有效地躲避了西班牙的压力。比如,当地人抛弃了受米塔制劳役体系控制的印第安村庄,而可以作为亚纳科纳在农场、牧场和其他免除劳役区域的企业工作。历史学家杰弗里·科尔(Jeffrey Cole)正确地指出这“是他们最有效地反对米塔制,以及市长们和督办们强加的其他义务的方法”。当地人也有策略地运用西班牙的合法法规,来达到“防御、补偿,甚至进攻”的目的。历史学家史蒂芬·斯特恩(Steven Stern)关于秘鲁瓦曼加省(Huamanga)的研究表明,他们通过“进行进攻性的、持久的,而且经常是敏锐地利用西班牙的司法机构去降低法定指标、推迟具体的服劳役和贡赋的上交、扰乱生产等等”,从而减轻了米塔制的负担。在墨西哥,

18世纪有数不尽的暴乱，印第安人让西班牙政权认识到不能再在他们身上为所欲为，而且必须注意他们的不满。

近期的历史学研究强调当地人作为能动主体，通过利用西班牙司法机构和扰乱当局，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把握自己的生活 and 未来，虽然这种看法有其益处，但有时候也会产生误解。因为这些努力绝不是总能成功的，有时候会造成严重的报复行为。历史学家马丁·闵乔(Martin Marcham)在其关于18世纪基多的研究中写道，当印第安人抱怨强大西班牙贵族侵占他们的土地时，当地官员对他们的鲁莽进行了回应，夺回了土地上的71所房子，并把这个人传唤到法庭上。另一个墨西哥历史学家伊德米·托·马丁内斯(Hildeberto Martinez)进行了一项个案研究，是关于当地人试图阻止与他们的土地分离的。这是两块位于16、17世纪里奥普雷地领主土地的土地(现在的普埃布拉)，这个研究表明他们诉诸法律诉讼和其他和平手段都完全没有用。西班牙掠夺的方法包括完全的暴力、欺骗价格和租赁协议的操纵、偷窃房地产契约文件，以及在他们想要的土地上放养家畜，除此之外，还有更多微妙的手段。在1521至1611年间，这些手段造成了在这两个社区里，超过13.7万公顷的土地流失。

起义是被压迫者反抗西班牙制度最让人难忘的形式。大量的当地人和黑奴的起义打断了西属美洲历史的殖民时期。在西班牙制度完全建立之前，很多地区的印第安人起来反对他们的新主人。在墨西哥，米克斯顿战争(Mixton war)从1540年延续到1542年。尤卡坦的玛雅人在1546年上演了大规模起义。一个印加国王的后代——曼科二世，针对秘鲁的西班牙征服者，领导了全国范围的起义。在智利，不屈服的阿劳卡诺人开始了为争取独立而进行的斗争，这场斗争一直持续到19世纪后期。在西印度群岛、中美洲和南美洲北部的丛林和山区中，一批批逃跑的黑奴建立了自己的社群，成功地抵抗着西班牙企图消灭他们的行动。这场革命风暴在17世纪开始下降，但是在18世纪波旁改革加重普通人负担的时候又达到了顶峰。

波旁改革帮助殖民地的地主、商人和矿主更加富有，美化了城市，

扩展了上层阶级青年的知识视野,但是大量的平民并没有分享到这些利益。相反,波旁政府为了努力增加王室收入,建立了政府性的垄断和有特权的公司,强征新税实际上加剧了低级阶层人民的悲惨生活。这种环境也就解释了1780至1781年同起义的广泛特征,不同于克里奥尔人后来的独立战争。除了个别特例,拥有特权的克里奥尔人团体或者支持西班牙人反对当地起义,或者迫于压力加入革命运动,只是为了后来抛弃他们。

多数的18世纪起义都有一个占主导地位的角色——当地农民。一个重要的例外是1765年的基多起义。安东尼·麦克法拉内萨(Antony McFarlane)在关于这场起义的研究中,把它称为“18世纪西属美洲最长、最大和最令人敬畏的城市起义”。与西班牙和外国走私进口的竞争导致了基多纺织业下降,进而导致了经济危机,为了反对这一状况,部分精英联合工匠和店主进行抗议,反对具有威胁性的新税收,以及在朗姆酒(aguardiente)垄断中威胁既定利益的改革。不管后来的暴动有多大规模,以及对西班牙商人表示出多大的敌意,起义从来没有撼动过西班牙的统治权。墨西哥城在18世纪有一系列的暴动,是由波旁管理者努力镇压乞求、管理酒品使用以及改变烟草工厂的工作条件引起的。西尔维娅·阿罗姆(Silvia Arrom)发现在墨西哥城,和在基多一样,城市的穷人成功抵抗了波旁政府试图管理他们生活的企图,这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因此,大众阶级争取对自己生活的掌控权,他们通常都会赢。”

秘鲁的起义

18世纪,西班牙对秘鲁印第安人的压力和需要极大地增加了。主要的剥削当地人的机制是前面提到的商品摊派制,这是统治当地人的最令人厌恶的勒索之一。最近一项研究表明这被认为是18世纪秘鲁大部分起义的原因。这个制度是这样运作的:一个利己的商人要支付从王室购买督办这个职位所需的钱;他还可以用“分摊”的办法来配置督办这个职位,也就是说,强迫他管辖区域的当地居民购买这些商品,

有时候是一般市场价格的6至8倍。在库斯科地区,典型的摊派商品是羊子和纺织品,但有时候这些商品也包括一些当地人几乎不会使用的产品。他们被强迫要在规定的时间内支付费用,否则就会被关进监狱;很多人为了获得所需的现金而离开村庄去矿区、纺织作坊和庄园工作。这个制度因此有助于破坏当地传统的农民经济,也有助于两个目标群体——贵人和其他的统治阶级团体:促进了商品内部市场的扩张和劳动力市场的扩大。

在同一时期,矿业米塔制强征的税收负担增加了。为了决心把波多西银矿的产出量恢复到原来的水平,王室和矿主进行了革新,更加残酷地剥削当地劳动力。米塔制工人(Mitayos)生产所需的矿石定额从1711至1714年间翻了一倍,从每人15担增至每天30担。强迫这些招募来的工人在相同的工资条件下工作更长的时间,还迫使工人的妻子和孩子帮助他们完成定额量。在这一时期,招募的工人和自由工人(mingas)的工资都减少了。这些革新到达了预定的复兴波多西银矿目标,银产量翻倍,但是当地人的健康和生活水平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营业税翻倍增长,商品摊派制和米塔制的持续滥用引起了强烈的不满。1777年,查尔斯三世派视察官何塞·德阿列切(Visitador Jose de Arce)到殖民地进行改革,这是一个关键时刻。他加紧收取贡赋和营业税,扩大进贡部族的范围,包括了梅斯蒂索人。这个改革每年增加了100万由印第安人贡献的比索。这些措施不仅让普通人更加艰难拮据,也给当地的百领带来了更多的困难,因为他们负责让普通人达到要求的进贡定额。阿列切自己也预料到了这场风暴的来临,他写道:“缺乏公正的法官,印第安人的米塔制和省内的商业形成了这个美洲的躯体。督办们只对他们自己的事情感兴趣……如果这些可怕的滥用权力的状况不被改变,而这一切都已经持续了这么长时间,那么毁灭一切的时刻就近在咫尺啊。”

大众对无法忍受的境遇的不满,激发了弥赛亚式的梦想和快速恢复印加文明和印加帝国的期待。普遍的想象把印加帝国变成了理想的

状态,没有饥饿和不公,没有殖民地政府的压迫,也没有土著土人的矿区、庄园和作坊。这个再造的印加帝国的乌托邦影像,对1780年至1781年间的大规模起义有着重要作用,并且决定了它的发展方向。

这个起义是有先驱的;在1730年至1780年间,在安第斯山地区共发生了大大小小128次反抗活动。从1712年至1755年,一个叫做胡安·桑托斯(Juan Santos)的当地领袖,在他安第斯山脉东部山坡的根据地,发动了反对西班牙人的游击战争。当何塞·加布里埃尔·孔多坎奎(José Gabriel Condorcanqui)起义开始的时候,秘鲁对于他还是记忆犹新的。一个受过很好教育的印加王朝后代和富有秘鲁背景人,受到加西拉索·德拉维加的《王家述让》关于辉煌的印加文明描述之影响,孔多坎奎不断地进行没有结果的尝试,通过合法途径为土著人民能够获得解脱。在1780年12月,他高举起义的大旗,在乌塔(Úta)附近伏击了令人憎恶的督办安东尼奥·德阿尔里加(Antonio de Arriaga),并在简单审讯后将他处以死刑。同时他给自己取了印加帝国最后一个首领的名字,自称图帕克·阿马鲁二世(Tupac Amaru II)。在他的行动之前,还发生过加塔里(Catari)兄弟在玻利维亚境内发动的一次起义。截至1781年前几个月,秘鲁总督辖区的南部高地被起义的烈火点燃了。尽管各种革命运动缺乏一个统一的方向,起义的领导者们一般都会把图帕克·阿马鲁认为是他们的首领,在他死后还引用他的名字。

在起义的第一个阶段,图帕克·阿马鲁并没有完全清晰的目标。在一些公开陈述中,他宣称自己忠于西班牙国王和教会,这限制了他的一些诉求,包括废除米塔制、商品摊派制和其他税收制度,监督督力和对当地土著人的省级官员的任命。但很难相信一个受到良好教育,并与西班牙官场打了多年交道的图帕克·阿马鲁,竟然认真地相信他可以通过协商而从王室那里获得全面的改革,尤其是当他处决了阿里亚加督办之后。他关于忠诚的主张很快就与一些文件产生了冲突,在这些文件中他把自己刻画成秘鲁国王;也与他发起的反对半岛西班牙人(只除了教士)的火与血的战争发生冲突;还与他为了掌握领土权而建



作为最后的印加帝国的后代,何塞·加布里埃尔·孔多坎奎给自己取了图帕克·阿马鲁二世这个名字,1780年,他和他的妻子米塞拉·巴斯蒂达斯(Micaela Bastidas)领导了反对腐败总督的具有广泛根据地的反抗运动。起义成为几十年后遍及美洲大陆的独立战争的前驱。

立的政府发生冲突。毫无疑问,他对西班牙的忠诚是一个面具,借助这个面具,他可以利用仍然强大的信仰,而这种信仰多数存在于在西班牙国王虚构的恩惠中。也可以吸引克里奥尔人支持者按照他的意愿进行改革,或许万一他最终失败了,还可以减免对他的惩罚。

对于图帕克·阿马鲁,这个在西班牙的学院里受过教育,并且全面吸收了西班牙文化的价值的人来说,起义的目标是一个独立的秘鲁国家的建立,但是在政治和社会组织机构上必然是欧洲式的。他的计划是要求从西班牙完全独立,驱逐半岛西班牙人,废除总督、检审庭和督

办的办公机构。印加帝国要被恢复,他自己担任国王,由其他库斯科贵族氏族的后代组成的贵族辅助统治。等级制度应该消失,给予图帕克·阿马鲁重要帮助的克里奥尔人会和本地人、黑人以及梅斯基纳人一起和睦地生活。天主教会被保持为国家教法,并得到什一税的支持。图帕克·阿马鲁的经济计划要求抑制米塔制、商品摊派制、海关和营业税,也要求废除大庄园和奴役,但允许小型和中型规模的土地所有,并且鼓励贸易活动。总之,图帕克·阿马鲁的计划要求反对殖民,进行一场国家革命,该革命将建立统一的民族和一个能促进经济发展的欧洲式现代国家。

但是当地响应他号召的农民对这些意义和目标有着不同的理解。在弥赛亚式的兴奋中,他们把这个当做“帕查库提”(pachacuti)——一场巨大的灾难或者“颠覆行为”,可以把现存的社会秩序颠倒过来,并且回到理想的印加帝国状态,在那里身份卑微的农民(runas)不会居住在会底层,而是社会的主角。他们有报复的欲望,针对征服者的残酷行为和 250 年的残酷剥削,他们洗劫了庄园,杀死了他们的主人,没有想过这些人是克里奥尔人还是欧洲人,是西班牙人还是白肤色并穿着欧洲人衣服的人。随着起义的扩大,古老的异教宗教在沉寂和繁荣了许多世纪后,再一次从地上涌上来。图帕克·阿马鲁原本希望和天主教会保持良好的关系,在外面时经常有两个牧师陪伴,也希望能得到库斯科的莫斯科索(Moscoso)主教的支持。但是他的农民追随者洗劫了教堂,剥去圣衣和装饰物,并袭击和杀害神父,在围攻库斯科时,吊死了很多天主教修士。在 1780 年 12 月,图帕克·阿马鲁进入一个村庄,召集了这里的居民,他们用“你是我们的上帝,我们不需要牧师缠着我们”这样的话迎接他。他回答说,他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因为这就意味着“在他们死的时候”没有人照顾他们。

这种对图帕克·阿马鲁起义目标相反的理解,以及它的农民追随者共同导致了图帕克·阿马鲁政策的失败,没有形成在除了半岛西班牙人之外的所有社会和种族团体面前,一种共同的提前独立意识。农民起义的自发和无法控制的暴力,彻底终结了几乎不存在什么希望的,

“吸引克里奥尔人、像莫斯科索主教这样的改革教士和其他当地贵族支持的机会。至少20个领袖,出于对图帕克·阿马鲁的嫉妒,或者害怕失去自己的特权地位,带领着他们的下属投奔了西班牙阵营。一个著名的保王人士是迭戈·乔奎汉加(Diego Choquehanca),他是秘鲁最有名和最有权势的库拉卡(Kuraka)家族的首领。16世纪和他有同样名字的祖先也曾宣誓效忠王室,并被西班牙王室封予萨利纳斯(de salinas)伯爵的头衔;到1780年乔奎汉加在阿赞加罗(Azangaro)省共有11处庄园。”“不用感到惊奇的是”,尼尔斯·雅各布森(Nils Jacobson)说,“乔奎汉加家族在图帕克·阿马鲁危机时保持着坚定的保王立场。”

尽管起义的主要基础是自由农民团体艾柳,但也吸引了一批梅斯提佐人和少部分克里奥尔人,主要来自中间阶级的职位(工匠、店主、文士、城市里挣工资的人),这些人中的一些构成了反抗队伍领导层的一部分。从亭堡的督办辖区开始,在具有战略意义的库斯科谷地东南边缘地带附近,反抗运动爆发并深入到提提加加湖盆地,在那里进行了持续最久和最激烈的斗争。受到之前胜利的鼓舞,图帕克·阿马鲁带领一支由数千人组成的起义军向南挺进,很快就完全控制了普诺(Puno)南部的高原地区。但他没能好好利用之前的胜利。战术错误导致了他的失败,包括早期进攻库斯科的失败。一是受了他妻子米塞拉的鼓动。他的妻子是起义的女英雄,也是他的主要顾问,她想在西班牙援军到来之前,好好利用古代印加资源的政治和心理的重要意义。另外,反抗力量之间的交流是很贫乏的,王室军队拥有占很大优势的武力和组织。西班牙人同样调来了大量的亚纳科纳,他们帮忙突破库斯科的围困并镇压了起义。尽管开始有一些胜利,但起义很快就遭受了完全的失利。图帕克·阿马鲁,他的家庭成员,还有他的主要将领被逮捕并处以死刑,有些人还遭受了可怕的酷刑。在现在的玻利维亚境内,起义又持续了两年,在两次持久的对拉巴斯的围攻中达到了顶点(1781年3至10月间)。

最后的印加起义促使王军实施了一系列改革,包括把令人厌恶的

督办替换为监政官和行政助理,在库斯科建了一个检事处,是图帕克·阿马鲁在起义前的另一个愿望。但是这些和其他的改革最终还是流于形式,而没有实质的内容。拿着卑微薪俸的很多人以前是修士,继续着之前的剥削,包括被《监政官法令》禁止的商品摊派制,只是在小范围内变得不那么频繁。同时,因为起义而造成的一些西班牙地主、教士和保王的库拉加人士的逃跑或死亡,让农民掠夺者占有了他们的地产。“在独立前的几十年中,”尼尔斯·雅各布森写道,“一种不确定的感觉渗入了高原地区的社会和财产关系中。那些认为是农民丢掉了图帕克·阿马鲁起义的果实的人,也只说对了一半。”

新格拉纳达的起义(1781)

新格拉纳达的社员(comuneros)起义,像在秘鲁一样,有无法磨灭的经济条件的根源。但不像秘鲁那般动荡,它被明确地限制在解决不满的目标里。市镇辖区一系列新税收的增加,包括割草税和人头税,在索科鲁(Socorro)地区激起了反抗。索科鲁是北部农业和制造业的重要地区。反抗很快传到了其他地区。起义的改良主义精神在一个标语上表现出来:“国王万岁,混蛋政府下台!”

从它的组织和努力建立一个所有不满和反抗西班牙人的殖民地种群的共同战线来看(除了黑奴),社员起义标志着-一个进步,它不再是路线混乱的向南方前进的运动。在索科鲁镇,来自附近城镇的成千上万的农民和工匠选举出了一个中央委员会(Común),领导了起义。每一个参加起义的城镇都有自己的领导委员会,以及被大众选举出来的指挥官。

在犹豫踌躇或者不情愿的克里奥尔人领导者的命令下,大量当地人和梅斯蒂索农民以及工匠到首府波哥大进行游行。持续了一段时间后,直到海岸的援军到来,王室检审庭才派遣了一个由大主教带领的委员会,去同社员代表谈判协商。运动呈现的群众特性和被压迫者团体的统一,在反抗代表提交给西班牙使团的条款表现出来,后者签了字,但后来又否认了;这些条款包括当地人和梅斯蒂索人进贡和营业税的

、土地归还被夺走的土地,废除烟草新税,以及在官员职位上,克里奥尔人优先于欧洲人。

1781年5月1日最终达成了一个协议,实质上满足了所有反抗者要求,通过一个特殊的宗教仪式,由大主教签署。但是,西班牙使团却拒绝签署了这个文件,声称协议无效,因为是被强迫签署的。兴起的起义者解散了,回到自己的家里。只有何塞·安东尼奥·加兰(José Antonio Galán)——一个年轻的梅斯蒂索农民领袖,完整地保持着他的小部队,继续着起义。

在解散起义军队的目的之后,西班牙官员准备完全捣毁反抗力量。何塞·安东尼奥·弗洛雷斯(Manuel Antonio Flores)公开否认西班牙的罪行。接着大主教对不满地区进行了牧师性质的访问,把王室的改革承诺和被确认的反抗会被永远罚入地狱的威胁结合起来,从而警告来自西班牙部队进入该地区,并抓捕大量的人入狱。起义的克里奥尔人领导者为了赶紧补偿他们的政治罪过,开始与王室进行合作。加兰在波哥大发动了徒劳的起义,被一个叛变的领导人抓获并移交给了西班牙人。西班牙人判处他死刑,并在1782年1月30日处以绞刑。社员起义至此结束。

第八章 拉丁美洲的独立

焦点问题：

- 拉丁美洲独立战争的原因是什么？
- 拉丁美洲和北美洲为独立进行的斗争为什么不同？有何不同？
- 为地方自治进行的斗争与谁将统治地方进行的斗争有什么不同？
- 独立斗争的四个主要中心是哪里？它们之间对比如何？
- 独立战争的主要政治、经济和社会后果是什么？

158

波旁改革,以及 18 世纪欧洲经济的复苏,给西属美洲许多上层等级的克里奥尔人带来了物质繁荣和随之而来的实质利益。开明的总督和管理者带来了改进和改善,使殖民地城市的生活更加健康而且更有吸引力。教育的改革带来新课本和思想的流入,而且更多到欧洲学习和旅行的机会扩大了克里奥尔年轻知识分子的视野。

然而,这些收获并没有加强克里奥尔人对母国的忠诚之感。相反,他们扩展了自己的期望,不满的情绪也在加剧。克里奥尔精英的一些部门增加的财富使其实际上从管理和教会部门被排除出去的处境更加难堪。同时,克里奥尔人庄园、种植园和牧场增长的生产量也顶着西班牙重商主义保持的贸易禁令压力。加拉加斯的管理者何塞·阿巴洛斯(José Abalos)警告说:“如果他的主人没有给予他们(克里奥尔人)所

“新的贸易自由，那么他就不要指望他们的忠诚。”同时，波旁王室的政策也满足了美洲制造商所需的反对欧洲严重竞争的保护。

独立战争的背景

克里奥尔人和半岛西班牙人

西班牙和殖民地之间的利益冲突在克里奥尔人和半岛西班牙人之间的裂缝中得到了最尖锐的表达。这个冲突被不断到来的西班牙人不断更正着。在18世纪后期，典型的移民是贫穷但是努力工作和节约的巴斯克人和加利西亚人，他们成为半岛商人的学徒，经常是亲戚。随着时间推移，他们的优点得到认可，移民可能会与半岛商人家中的女儿结婚，然后最终继承生意的所有权。商人自己的一个克里奥尔儿子可能会被分给一个拥有土地的地产；其他克里奥尔儿子可能会进入教会或者法律机构，这两个地方都挤满了职业人士。

因此，尽管在国内和国外的贸易中都存在着一些克里奥尔精英，但是半岛西班牙人仍继续统治着有利可图的进出口贸易和省份间的贸易。西班牙出生的商人，组织成有力的商人行会，同样也在投资矿产和西班牙官员在当地人开展的商品摊派生意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合乎情理的是，一些上层等级的克里奥尔人慢慢养成了贵族习惯和散漫奢侈的生活方式，这些都被半岛人所诟病。很多其他一般的克里奥尔人，无所事事地从事着薪酬微薄的地方助理神父和政府里的小官职工作，极度厌恶那些阻挡他们晋升的制度化歧视。

结果，尽管一些有钱有势的克里奥尔人与他们的半岛对手保持着良好关系，通过联姻和形成同盟而把彼此的经济利益融合起来，但是克里奥尔人和半岛人似乎形成了互相仇视的两个阶级。半岛人有时候为他们的特权地位辩护，说是因为克里奥尔人天生的懒惰和无能造成的，这样的性格特征被有些西班牙作家描述成是由于美洲气候和土壤的有害影响；克里奥尔人则反驳，把欧洲人描绘成卑鄙和一味攫取的暴发户。这些团体中的一些成员带着如此强烈的仇恨，导致一位新西班牙

的西班牙主教抗议。一些年轻的克里奥尔人，“如果他们能把自己血管中的西班牙血统清除干净，他们会很乐意这样做的”。这甚至不可避免地促进了克里奥尔民族主义的成长；在殖民地晚期年代，西属美洲流行的洪堡男爵，报道了一个常见的口头语：“我不是西班牙人，我是美洲人”。

启蒙运动思想进入拉丁美洲毋庸置疑导致了克里奥尔人不满的增长，但是各种影响的相对分量是不确定的。波多黎各行政官自身也通过多方的官方改革试图努力削弱克里奥尔人的力量，以提高殖民地生活的品质。这种团体的典型代表是省长胡安·安东尼奥·里阿诺(Juan Antonio Riano)，他把一种法国语言和文学品味引入到他的瓜纳华托省省会墨西哥城；他还负责“绘画和音乐兴趣的教育，以及学校中数学、物理和化学教育，这些学校以前都被耶稣教会管理”。

很多受过教育的克里奥尔人阅读被禁止的著作，如卢梭、康德、伏尔泰、卢梭和其他激进的哲学家；此外还有另一个拉丁美洲在启蒙主义的传播启蒙思想的机构，那里有包括百科全书、莱布尼兹和牛顿理论为基础的科学的读本，它们在殖民地自由地流通着。到18世纪，克里奥尔精英已经十分熟悉这些当代欧洲的先进思想。

美洲革命导致殖民地“危险思想”的增长。西班牙人非常警惕美国施加给西班牙帝国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威胁。西班牙在美国革命期间又对英格兰的战争中，不情愿地与法国联合起来，但是它与反抗者保持一定距离，拒绝承认美洲的独立，而且在合约的商议中，试图把美国围在阿勒格尼山脉以内，但是没有成功。1783年以后，美国增长的船只合法或不合法地触碰到了西属美洲的港口。和“扬基佬观念”一起，这些通道有时候引进了颠覆性的文章，比如托马斯·潘恩以及托马斯·杰弗逊的著作。

法国革命大概对克里奥尔人的思想起到了更大的影响。阿根廷革命家曼努埃尔·贝尔格拉诺(Manuel Belgrano)回忆道：

自从我1789年在西班牙起，法国革命就引起了我思想的变化，尤其是与我通信的人之中，自由、平等、安全和财产的思想深深

地牵引着我，我看到了在任何地方都限制人享受上帝和自然赋予人的权力的暴君。



这个沦为奴隶的海地人雕塑，手里拿着大砍刀，并且用海螺贝壳召唤他的同志反抗可憎的奴隶制度。这个雕塑是为了纪念导致海地独立的斗争，这个斗争在整个美洲范围内引起了克里奥尔贵族内心的恐惧。

另一个受过教育的克里奥尔人——哥伦比亚人安东尼奥·纳里诺 (Antonio Narino) 在 1791 年招来了西班牙人的怒气，因为他自己翻译并出版了《1789 年法国人权宣言》。他被关在非洲的监狱里长达 10 年，后来成为哥伦比亚独立运动的领导和创始人，并见证了革命的胜利。

然而法国革命很快采取了激烈的转向，克里奥尔贵族不再对把它当做榜样抱有幻想。一些西班牙殖民者和巴西的零散密谋都是受法国榜样的激发，但它们始终如一地只是小部分激进分子的工作，仅仅从一些底层阶级人群中吸引支持。法国革命直接造成的最重要结果是法属海地的奴隶在有才能的黑人和混血人领导下进行了反抗：图森·卢韦

蒂雷(Toussaint L'Ouverture)、让·雅克·德萨利纳(Jean Jacques Dessalines)、亨利·克里斯托弗(Henri Christophe)和亚历山大·佩蒂翁(Alexandre Petion)。1804年,图森的部下德萨利纳宣告建立了海地新政府的独立。黑人革命者建立了拉丁美洲的第一块解放领土,同时结束了殖民主义和奴隶制。但是这个成就来得而不是促进了其他殖民地克里奥尔精英对独立的支持。因此,害怕因为西班牙可能引发奴隶起义这个想法,在拉丁美洲独立战争期间和之后,都加强了临近的古巴种植者阶级对西班牙的忠诚。

尽管存在一些秘密社团组织中的小密谋团体,他们在欧洲和美洲都有联络人,但是独立运动还是极可能在长时期内处于微不足道和无效的地位。直到1806年,当革命先驱弗朗西斯科·德米兰达(Francisco de Miranda)带领着大概两百名外国志愿者组成的部队,登陆到他的祖国委内瑞拉的本上海岸时,他的革命号召还是没有引起任何反应,他不得不急忙撤退。如果外部没有发生什么人的变化,克里奥尔人的胆小和政治上的缺乏经验,以及人民的无动于衷,这些因素都将会推迟独立的到来。

革命的原因

在1808年到1810年逐渐酝酿成熟的革命危机的原因中,无能的查尔斯四世领导下的西班牙地位的下降肯定是最主要的原因。法国革命引发的欧洲战争明显地暴露出波旁改革的失败,改革试图纠正西班牙经济和社会生活的结构性缺陷。1793年,西班牙加入了英格兰和其他反对法国共和的国家联盟。斗争对于西班牙来说是惨烈的,1795年,王室最宠爱的大臣曼努埃尔·德戈多伊(Manuel de Godoy)签署了《巴塞尔和约》。第二年,西班牙变成了法国的盟友。英国人的海上力量迅速把西班牙船只从大西洋上驱赶出去,实际上切断了西班牙和殖民地之间的联系。严重的需求强迫西班牙允许中立国家船只与它的海外附属地进行贸易,这些船只从西班牙驶向国外港口。美国商人和船主是违反古老的限制制度的主要受益者。

戈多伊在与英格兰战争中实施的灾难性政策还造成了其他结果。一个英国海军长官霍姆·波帕姆爵士(sir Home Popham)自己主动进攻了布宜诺斯艾利斯。他的舰队在1806年4月从好望角开往拉普拉塔,船上带着一批士兵。它沿着一大批英国商船的路线,这些商船急于通过西班牙殖民地制度的裂口去倾销大量的商品。英国军队登陆后很快取得了一次敏捷的胜利。英国士兵进入布宜诺斯艾利斯,只遇到了象征性的抵抗。英国指挥官希望获得民众的支持,发表了一个声明,确保私人财产、自由贸易和宗教自由的权利。但是,克里奥尔人和半岛人联合起来驱逐他们不需要的解放者,一个志愿军队被秘密组织起来,袭击和击溃了占领的部队,逮捕了英国将军和他的1200个下属。面对一个英国官员提出的作为英国的受保护国的独立理念的引诱,克里奥尔人曼努埃尔·贝尔格拉诺回答道:“要么是我们的旧主人,要么什么都没有。”

同时,英国政府向拉普拉塔派遣了强大的援军。当通过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狭窄街道时,第二次的入侵力量遇到了有准备的密集火力进攻,损失严重,终被击退。英国指挥官被顽强的抵抗镇住了,放弃了斗争,并且同意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和先前占领的蒙特维迪亚城撤离。经验丰富的英国军队被由帕特里西奥斯军团打先锋的民兵击败,这是阿根廷独立道路上迈出的的一大步。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克里奥尔人已经尝到了权力的滋味,不会情愿再一次放弃了。

在欧洲,西班牙的痛苦达到了顶峰。领导着法国的拿破仑,渐渐把西班牙降级为一个没有用处的附属地。1807年,拿破仑被葡萄牙拒绝加入他的对英国船只关闭港口的大陆封锁政策激怒,在查尔斯四世的许可下,法军可以通过西班牙入侵葡萄牙。法国军队横扫半岛;当他们接近里斯本时,葡萄牙王室和宫廷在英国的护航下逃往巴西。10万法国军队继续占领了西班牙城镇。他们的出现以及皇家宠爱的戈多伊的亲法国政策,引发了民众的不满,爆发了暴风雨般的暴动,强迫查尔斯四世退位,让位给他的儿子费迪南德,而拿破仑则作为父子间争论的调解人进行干预,并提供帮助。愚蠢的是,这对父子毫无疑问地接受了

拿破仑的邀请,并与他在法国城市巴约纳(Bayonne)进行协商。在那里,拿破仑强迫他们两个人都退位,支持他自己的弟弟约瑟夫作为西班牙王位的候选人。拿破仑之后召集了一次西班牙王公的大会,这些王公们都没骨气地支持他的独裁。

162

西班牙人还没有发表自己的意见。1808年5月2日,一个反对法国占领军队的起义在马德里开始了,并像野火一样蔓延到整个国家。起义者在他们控制的地区里,建立了地方管理洪达。后来,一个中央洪达以被俘虏的费迪南德七世的名义,制定了抵抗运动的方向。它迅速与英格兰和解。当西班牙军队与受过极佳训练的法国军队在常规战役战场上战斗时,通常遭受失败,但是游击队的战事围住了大量法国军事力量,并使拿破仑对征服领土的控制极其不稳定。

然而到1810年代早期,法国的胜利看上去是不可避免的了,因为法国军队占领了安达卢西亚,并且威胁到了西班牙手中的最后一个城市加的斯。中央洪达这时自行解散,并任命一个摄政政府统治西班牙;这个机构超过了它的权力范围变成了一个国家议会,该议会在1810年到1814年间在英国海军枪杆的保护下在加的斯召开和运行。因为多数的代表来自加的斯,因而这里自由主义和世界主义的氛围很难成为西班牙的代表,他们的观点比整体西班牙人要更解放。1812年通过的议会宪法决定实行提供了有限君主制,承诺演讲和集会自由,并且废除了宗教裁判所。但是议会几乎没有对西班牙的美洲殖民地做出让步。它邀请西属美洲人代表一起进行商议,但是很清楚的是,半岛人的统治和商业垄断制度会依然没有触及。

在西属美洲,克里奥尔领导人期待很快发生西班牙的垮台,考虑着如何把这个剧烈的事件冲击作为他们的优势。那些事件已经把自治或者完全独立的理想转变成了现实的目标,这个理想直到当时还是一个遥远的期望。自信于不可战胜的拿破仑军队将会粉碎所有反对势力,一些克里奥尔人领导者准备在忠诚于“受人爱戴的费迪南德”的前提下,开始把权力接管到自己手中。他们借鉴西班牙地区洪达的榜样调整自己的行动,洪达以被逮捕的国王的名义进行统治,西班牙官员被

又人密使的到来扫清了,这些密使宣布费迪南德和约瑟夫·波拿巴都是西班牙的合法国王,这个困惑也让克里奥尔人占了便宜。

在1810年春天,随着加的斯沦陷的明显迫近,克里奥尔领导人采取行动。他们控告总督和其他王室官员对费迪南德不忠诚,在加拉斯、布宜诺斯艾利斯、圣地亚哥和波哥大组织了民众示威,强迫这些政权向克里奥尔人控制的地方洪达移交统治权力。但是克里奥尔人期望的独立的和平转变注定要失败。他们的保王声明,并没有骗到真正的西班牙群体,在爱国主义者和保王主义者之间爆发了战斗。

南美洲的解放

拉丁美洲的独立战斗与美国革命形成了鲜明对比。两个剧变中存在一些明显的相似之处。二者都试图推翻一个母国的统治,因为这个母国的重商主义制度限制了殖民地经济飞速成长的进一步发展。这两次起义都由受过良好教育的克里奥尔人领导,这些克里奥尔人从启蒙运动的意识形态中汲取口号和理想。二者都是国内战争,而且民众的大部分群体都站在母国一边。二者最终的胜利都部分受益于外国的帮助(尽管,北美洲的反抗者得到来自法国盟友的帮助多于拉丁美洲从外部接收到的帮助)。

然而,两次革命的不同之处也如此明显。拉丁美洲的独立战争不像美国革命那样,没有一个统一的方向或者策略,不只是因为遥远的距离和其他地理上统一的障碍,还因为拉丁美洲地区之间经济和文化隔离。而且,拉丁美洲独立运动缺乏如英国殖民地更民主和流动的社会提供的强大群众基础,克里奥尔人精英自身,就是进行剥削的白人少数群体,害怕反抗的当地人、黑人和混血阶级,因此自然试图在斗争中把这些人的干预降到最低。这种缺乏统一的地区和阶级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拉丁美洲不得不进行如此长期的斗争,而斗争的对象是像西班牙这样被很多内政和外问题削弱和困扰的政权。

独立斗争有四个主要中心。西班牙南美洲有两个军事行动的主要战场,一个在北部,一个在南部。一股解放浪潮从委内瑞拉开始向南流

动；另一个则从阿根廷开始向北流动。在秘鲁，大陆上西班牙最后的防御工事处，这两股水流汇合在一起了。巴西完成了迅速和相对和平的从葡萄牙的分离。最后，墨西哥不得不在获得独立以前，进行困难而曲折的旅途。

解放者西蒙·玻利瓦尔

西蒙·玻利瓦尔(Simon Bolivar)是南美西北部解放斗争的象征和英雄。他1783年出生于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来自一个拥有大量土地、奴隶和矿区的富有克里奥尔贵族家庭。他的知识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受到启蒙运动理性主义和唯物主义经典阅读的影响。1803至1807年间，他在欧洲国家的游历进一步扩展了他的知识视野。他回到加拉加斯，并很快加入旨在推翻西班牙政权的密谋活动中。

1810年4月，加拉加斯的克里奥尔人党组织了一次示威，强迫总督辞职。一个克里奥尔人掌权的洪达誓言要保卫被逮捕的费迪南德国王的权力，但是它保证的忠诚既没有骗倒当地的西班牙人，也没有骗倒加达的斯的摄政委员会。一个相当数量的种植者组成的富有克里奥尔人阶级也反对独立，当独立获胜的时候，很多人移民到古巴或者波多黎各。爱国者也对该遵循哪些政策产生了分歧：一些人赞同立即宣布独立，比如玻利瓦尔，而其他人赞成推迟这个事宜。

也许为了不让玻利瓦尔挡他们的路，革命洪达把他派到英格兰请求英国的帮助。他没有成功地完成任务，但是说服了经验丰富的革命者弗朗西斯科·德米兰达返回委内瑞拉并且指挥爱国者军队。1811年，第一届委内瑞拉国会宣布了国家的独立，并提出了共和宪法的框架，这个宪法废除了一些特殊的特权(fueros)和当地人的进贡，但是保留了黑奴制度，使基督教成为国教，并把完全公民权仅赋予于有产者，但该项条款并不适用于自由的黑白混血人种。

爱国者和保皇者之间爆发了战斗。除了半岛人，摄政委员会还从波多黎各派出军队，再加上克里奥尔贵族的一部分，保皇者的事业还受到了一些自由黑人和混血儿的支持，这些人被共和国否认他们作为全



由何塞·吉尔·德卡斯特罗(José Gil de Castro)绘制的解放者西蒙·玻利瓦尔的肖像。其中他的外貌和当代对玻利瓦尔的描述几乎一致。

体公民的一部分激怒了。很多地区的黑奴利用混乱的形势进行起义，同时杀戮克里奥尔人和半岛西班牙人庄园主。但是多数民众还是保持中立，随着皇家或者共和国征兵的临近而逃离他们的村庄；如果被征用，他们会在可能的时候当逃兵或者站到另一边，如果那边的希望更大些。

在爱国者一方，主要将领米涅达和他的年轻军官们之间出现了分歧，尤其是玻利瓦尔，他不满米涅达的军事保守和犹豫不决。在这些争论期间，1812年3月26日发生了一次地震，导致加拉加斯和其他爱国者领土上重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也波及西班牙统治下的一些地区。保皇者教士宣称这次灾难是神对反叛者的惩罚。一系列军事失败使革命事业的破灭画上句号。

随着自身军队力量的解体，米涅达试图与保王派指挥官协商一个条约，然后带着共和国的部分财产逃离这个国家。他可能原本打算继

续独立的事业,但是情况看上去却是他希望保全自己。玻利瓦尔和他的一些同志,把米兰达的行为当做一种背叛,在他开始行动之前就抓住了他,并把他交给西班牙人。四年后,米兰达在西班牙的监狱中死去。玻利瓦尔因为家族一位朋友的影响而从西班牙的反击中获救,并且被安全引导出来,离开了那个国家。

玻利瓦尔来到新格拉纳达(现在的哥伦比亚),这个地方还在一定程度上处于爱国者的统治下。这里像委内瑞拉一样,克里奥尔领导人也为政府的形式而争吵。他抵达两个月后,玻利瓦尔对新格拉纳达的公民发表了一份声明,在声明中,他要求统一,指责联邦制度在战争条件下是不切实际的,并催促作为哥伦比亚人安全的必要应重新统一。拉,他被派指挥一支小部队去围剿马格达莱那河的敌人军队时,他采取了一个以快速运动、进攻性战术和士兵前进这些仇敌为特征的策略,而不考虑社会背景和肤色。

胜利给玻利瓦尔带来了哥伦比亚军队的将军头衔,并且他解放委内瑞拉的计划也得到了同意。在历时一个月的旅行中,他领导人们穿过委内瑞拉的安第斯山脉地区,向加拉加斯挺进。在委内瑞拉,西班牙人开展了反对所有爱国者的恐怖运动。在前往加拉加斯的途中,玻利瓦尔在特鲁希略宣布要展开一场反对所有西班牙人的你死我活战争。随着玻利瓦尔接近首都,西班牙军队开始撤退。他胜利进入加拉加斯,并从城市委员会收到了解放者的称号;不久,恢复共和后心存感激的国会进行选举,赋予他独裁的权力。

玻利瓦尔的成功是短命的,因为国内外的局势发展开始反对他。1814年拿破仑的衰落还给了费迪南德七世西班牙的王位,使西班牙军队可用于西属美洲,并且提升了王室事业的重要性。同时,共和国的政策疏远了下层阶级的大部分群体。克里奥尔贵族顽固地拒绝给予奴隶自由。结果,奴隶继续斗争,但独立于西班牙人和克里奥尔人之外,共和派力量不得不转向一些奴隶起义的地区,进行严酷的远征。

委内瑞拉高原(llanos)上的牛仔(Llaneros)也转而反对共和国,因为农业法令没有得到所涉及的地主的书面认可,试图结束在平原地区

与抗猎戈老聚拢牛群的农业法令。这些法令还试图把牛仔转变成半农半牧的农奴,强迫他们携带身份证并且归属于一个牧场。这些对他们“权利和自由”的打击激怒了这些牛仔。在令人畏惧的何塞·托马斯·博韦斯(José Tomás Boves)的领导下,一大批牛仔,用令人害怕的方式进行武装,入侵了高原地区,猛然袭击了加拉加斯,粉碎了所有抵抗。1811年7月,玻利瓦尔迅速放弃了这个城市,并且带着剩余的军队逃往哥伦比亚。尽管博韦斯在1811年后期的战役中战死,他还是毁灭了委内瑞拉的“第二共和国”。

玻利瓦尔于9月抵达卡塔赫纳,发现哥伦比亚处在混乱的边缘。西班牙人一方面面临入侵威胁,还有省份间的互相争吵,而且反抗西班牙统治的“权贵”在确定了当下的形势已经没有希望了之后,于11月于1811年5月离开那里前往英属牙买加岛屿。同时,一支强大的西班牙军队在卡布洛·莫里略(Pablo Morillo)将军的领导下登陆。莫里略开始了殖民地的再次征服,然后开始了包围卡塔赫纳的征讨。由于力量悬殊和补给断绝,这个城市在12月投降了,哥伦比亚其他三个省份也很快被平定下来。在西属美洲的所有省份中,只有阿根廷保持着起义。要是费迪南德做出让步,把白人的同等权利赋予支持他事业的混血儿和印第安人,那么美洲的西班牙帝国可能会延续得更长。但是保守的费迪南德没有做出任何让步。

玻利瓦尔仍然抱着不可动摇的信念,即独立会不可避免地获得胜利。他从牙买加写出了一封有名的信,在这里他重申了那个信念,并提供了一个西属美洲形势和前景的精彩分析。他嘲笑西班牙的能力——“年以百计老奸巨猾”,妄图把西属美洲保持为永久的附属地。玻利瓦尔还研究了大陆的政治未来。他认为,君主对于拉丁美洲的传统是外来的:只有一个共和国政权才能被它的人民接受。每个地区单独政府是不切实际的,应当根据气候的差异、地理的多样性、冲突的利益和不同的特征进行划分。玻利瓦尔考虑到经济和社会结构,大胆地预测了不同地区的命运。比如,智利对于他来说,似乎有一个民主的未来,而秘鲁注定会遭受独裁,因为它拥有“两个与每个公正和自由原则都冲

突的因素：金子和奴隶。”

玻利瓦尔从牙买加来到海地，在那里他得到了来自海地人总统亚历山德烈·佩蒂翁(Alexandre Pétion)热情的聆听，以及一些物质性支持。作为回报，总统要求玻利瓦尔在他能够解放的领土上给予奴隶自由。在1816年3月，玻利瓦尔和一小队追随者登陆委内瑞拉海外的玛格丽塔岛，他试图在大陆上获得立足之处的两次努力，都被轻松击退了，玻利瓦尔很快又退回到西印度群岛。他反思自己的失败，得出结论，认为入侵防御稳固的委内瑞拉西部海岸的尝试是一个错误，并且决定在奥里诺科河谷区域建立根据地，那里远离西班牙力量的中心。流动的爱国者部队仍然在这个地区活动，玻利瓦尔希望赢得牛仔们的拥护，这些牛仔不再对他们的西班牙盟友抱有幻想。1816年9月，玻利瓦尔从海地驶向奥里诺科河三角地，从那里他溯游而上直到小镇安戈斯图拉(今玻利瓦尔城)，并把那里作为他的总部。

战争的潮流现在开始涌现出对他有利的一面。爱国者游击队接受了他的领导。更重要的是，他得到了主要牛仔首领何塞·安东尼奥·帕埃斯的支持。欧洲的发展也有利于玻利瓦尔。拿破仑战争的结束使一大批英国士兵无所事事，这些老兵中的许多人来到了委内瑞拉，组成了以在战役中表现英勇著称的英国军团。英国商人提供贷款使玻利瓦尔能够在接下来的运动中确保人员和武装。费迪南德七世的顽固态度也很有帮助，他拒绝对殖民地居住者做任何妥协，这导致英国政府失去了耐心，他们开始用更为友好的眼光看待西属美洲独立的前景。

在1819年决定性战役的前夕，玻利瓦尔在安戈斯图拉召集了一次临时国民大会，大会赋予他独裁的权力。他向这次大会提交了一个委内瑞拉宪法计划，在计划中，他督促废除奴隶制，并且把土地分配给革命士兵。但是提出的宪法还是有一些非民主特征，其中包括一个拥有实质性国王权力的总统，一个世袭的参议院，而且把投票权和官方职位限制在拥有财产和受过教育的精英之中。大会忽视了玻利瓦尔的改革建议，但是选举他为共和国的总统，并且采纳了一个包含了他很多理想的宪法。

然而,战争还是要取得胜利。玻利瓦尔为委内瑞拉解放和哥伦比亚设想的大胆策略,从完全出乎意料的方面给西班牙力量带来了沉痛教训。帕埃斯手下的牛仔骑兵分散开来,并且在委内瑞拉北部用出其不意的攻击袭击了西班牙部队的主要部分时,玻利瓦尔带着2500名由自由组成的军队沿着蜿蜒的奥里诺科河和阿苏科河前进,穿过平原,然后翻过与峰峦的哥伦比亚安第斯山脉,一直到达新格拉纳达的首都波哥大,并处在它的地区。在博亚卡(Boyaca)地区,爱国者军队用短暂而锋利的战役出其不意地击败了保土者,抓获了1600名战俘,收获了相当多的装备。波哥大没有进行任何防御,玻利瓦尔在人民的欢呼中进入了首都,这里的人民在西班牙的统治下遭受着苦难。

166

玻利瓦尔留下他的助手弗朗西斯科·桑坦德尔(Francisco Santander)去组织一个政府,然后很快离开安戈斯图塔,准备委内瑞拉的解放。然后,令人振奋的消息从西班牙传来:1820年1月1日,一个等待运往南美的军团发生了反叛,开始了一次起义,强迫费迪南德恢复1812年自由宪法,并且放弃政府再次建立殖民地的计划。这个消息给爱国者带来了欢乐,但给委内瑞拉保土分子带来的却是沮丧和被抛弃。1821年7月玻利瓦尔和帕埃斯的部队在委内瑞拉的卡拉博博(Carabobo)粉碎了最后一个重要的西班牙力量,只剩下一些海岸城市和要塞还掌握在被围困的保土者手中,委内瑞拉已获得了自由。

玻利瓦尔已经把注意力转向南部。只要西班牙人还掌握着安第斯中部地区大量山地的防御工事,西属美洲的独立就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当玻利瓦尔准备从波哥大对基多进行一次重要进攻时,他派遣了有能力的年轻助手安东尼奥·何塞·苏克雷(Antonio Jose Sucre),从哥伦比亚太平洋海岸的海上夺取瓜亚基尔港口。在苏克雷到达之前,瓜亚基尔的克里奥尔人竟举行了起义,宣称独立,并且把港口置于玻利瓦尔的保护下。随着阿根廷将军何塞·德圣马丁(Jose de San Martin)率援军的到来,苏克雷的势力更加壮大,他向厄瓜多尔高地挺进,在靠近基多的皮钦查(Pichincha)山的山坡上击败了西班牙军队。同时,玻利瓦尔从波哥大开始向南部挺进,沿着考卡(Cauca)河谷沿岸,遇到了顽

强的保王军抵抗,这次抵抗抵消了苏克雷在皮钦查的胜利。那些组成前新格拉纳达总督辖区的省份——未来的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和巴拿马共和国——现在从西班牙的统治中解放了出来。1821年在玻利瓦尔的倡导下,新格拉纳达和委内瑞拉建一联盟,暂时联合成一个叫做哥伦比亚或者大哥伦比亚的国家。

南部解放运动和圣马丁

玻利瓦尔领导的解放运动与从阿根廷向北流动的运动结合起来的时机已成熟。自从1806至1807年被英国入侵击败后,克里奥尔人虽尽管在名义上效忠于西班牙,但实际上控制着布宜诺斯艾利斯。入侵英雄和当时的总督圣地亚哥·利涅尔斯(Santiago Liniers),与克里奥尔人领导层进行全面合作。由塞维利亚洪达派遣的一个新总督代替了利涅尔斯,与利马的总督联合起来粉碎了秘鲁高地(玻利维亚)不成熟的克里奥尔人起义。但是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革命进程缓慢,因为他意识到克里奥尔人至高的权力。在他们的压力下,他颁布了一个法令,允许与反法联盟国家和中立国进行贸易,但遭到加的斯垄断代表的坚决反对。但是这个让步并没有拯救西班牙政权。革命仍是空中楼阁,正如他们中一个成员说的那样,克里奥尔人领导者只是在等着果实的成熟。

在1810年5月,当得知法国部队已经进入塞维利亚并且威胁到了加的斯,秘密的爱国者社团组织了一次示威游行,强迫总督召集一次公开的城镇会议,决定殖民地政府的未来。阿根廷第一次国会选举罢免了总督,建立了以费迪南德名义统治的洪达。革命洪达正试图巩固它对广阔总督辖区的控制。内陆省份在激烈的斗争后顺从了。穿过拉普拉塔河位于东岸的蒙特维迪亚(位于现代乌拉圭),1811年之前正处在西班牙的统治下,该年便陷入了阿根廷的围攻中。革命洪达遇到了来自乌拉圭潘帕斯大草原加乌乔牧人的更顽强抵抗,这些人由何塞·赫尔巴西奥·阿尔提加斯(José Gervasio Artigas)领导,他要求乌拉圭在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松散联邦联系中得到自治。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局

阿尔本不与阿尔提加斯的加乌乔牧人的民主扯上任何关系,于是,一场内战开始了。结束之时,阿尔提加斯被困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和葡萄牙武力之间。在属于巴西的战火中,他不得不逃到巴拉圭。乌拉圭直到1828年才获得独立。

在巴拉圭中部的管辖区内另一部分的巴拉圭克里奥尔贵族,同样怀疑布宜诺斯艾利斯洪达的目的,并且击败了派去解放亚松森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武装力量。之后,亚松森的克里奥尔人党起义了,罢免了西班牙总督,并宣布巴拉圭独立。这次起义的重要人物是杰出的何塞·何塞·罗德里格斯·德弗朗西亚(José Rodríguez de Francia),他很快成为该国第一个独裁者和独裁者。布宜诺斯艾利斯洪达解放秘鲁高地北部山麓的努力同样大败了。爱国者军队两次突然进攻这个地区都被击败,失败者败退于山区。陡峭的地形、长距离的通信和玻利维亚当地人的无动于衷都导致了这些失败。

布宜诺斯艾利斯政府还有其他严重的内部问题。一场争论爆发了,一方是洪达秘书以及社会改革的拥护者,脾气暴躁的马里亚诺·莫雷诺(Mariano Moreno)及其自由主义支持者,另一方是由大地主康涅利亚·萨维德拉(Cornelio Saavedra)领导的保守党派。这个争论预示了独立后阿根廷历史头几十年的主要裂缝,即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的分歧。1813年,国民议会给了这个国家一个名字——拉普拉塔联合省(the United Provinces of La Plata),并且实施了一系列改革,如废除米塔制、委托监护制、贵族头衔和宗教裁判所。然而,一份独立的声明拖到1816年才被宣布。

同样在1816年,军事天才何塞·德圣马丁打破了长期的军事僵局。圣马丁出生于今阿根廷北部地区,是一名西班牙军队的上校,当布宜诺斯艾利斯革命爆发的时候,他已具有20年的军队服役经验。他很快来到拉普拉塔,把他的利剑贡献给爱国者政府。他很快被升为秘鲁高地的军队指挥官,这支军队在图库曼彻底完败在保王者手中,现在正处于恢复元气的阶段。他感觉到即将到来的在秘鲁高地对西班牙地位的攻击注定会失败,便提出了一个为获得完全胜利的计划,这个计划受到

了联合省执政胡安·马丁·德普耶雷登(Juan Martín de Pueyrredón)的支持。圣马丁建议进行一次为解放智利而跨越安第斯山的行军,西班牙在智利的反击已经推翻了革命政权,这个政权是1810年由贝尔纳多·奥希金斯(Bernardo O'Higgins)和其他爱国者领袖建立的。此计划如若成功,拉普拉塔和智利的联合力量可从海上袭击秘鲁。

为了在西班牙的眼目下掩饰自己的计划,并且争取大规模组织的时间,圣马丁获得了一个职位,即作为库约(Cuyo)省省长,该省首府门多萨(Mendoza)位于战略通道的东部终点处,这个通道穿过安第斯山区到达智利。他花了两年时间招募、训练和装备他的安第斯军队。像玻利瓦尔一样,他曾经承诺保护里人和昆白人志愿兵的目的,后来宣布他们是他最好的士兵。智利的难民为了躲避西班牙在他们国家的反击,同样加入了他的军队。

圣马丁有条不紊并且全面地要求布宜诺斯艾利斯政府提供军队、军火、食物和各种各样的装备。1817年1月,军队开始了跨越冰冻的安第斯山通道的征程,其难度可与玻利瓦尔攀爬哥伦比亚高地相比。21天后,军队涌入智利的土地。西班牙军队2月在查卡布利(Chacabuco)的决定性失败开启了圣马丁进入圣地亚哥的大门。他在迈普(Maipo)又赢得了一次胜利(1818),这是一场结束智利独立最后威胁的战役。圣马丁拒绝了智利人提出的要他担任共和国最高统治者的邀请,这个位子是由奥希金斯制定的,圣马丁开始准备从海上攻击5500英里以外的利马。

他执行的计划需要建立一支海军。他招募了一批英国和美国的船只,并且邀请了一名尽管古怪但是很有能力的海军长官托马斯·柯西兰爵士(Thomas, Lord Cochrane)组织他的海军。1820年8月开往秘鲁的远征由7只战舰和18只运输舰的舰队组成。圣马丁让他的军队在利马以南大约100英里的地方登陆,但是推迟了向秘鲁首都的移动。他希望通过经济封锁、宣传和与西班牙官员的直接谈判获得胜利。利马贵族、克里奥尔人和半岛人希望避免武力斗争,因为那些斗争可能引起当地人和奴隶的反抗,这就帮助了圣马丁的策略。1821年6月,西

才军队撤离利马，阿安第斯山区撤退。圣马丁进入首都，在一片节日的气氛中宣布了秘鲁的独立。

但是他的胜利远远没有完成。他还要对付反革命的阴谋和利马上层精英对其社会改革项目的抵抗，这些改革包括结束当地人的贡赋和给予奴隶的孩子们以自由。圣马丁在1821年8月取得军队和政权的高权力，这又增加了小宗派的反对。同时，一支规模庞大的西班牙军队在利马鲁南进行训练，向圣马丁提出战斗挑战，但他不敢用比自己规模小很多的军队去参与战斗。阴谋和围绕在他身边的敌意氛围让圣马丁失去信心，他开始相信只有君主才能带来西属美洲的稳定，他派了一个密使去欧洲，为秘鲁的王位寻找一位王子。

这也是圣马丁前去瓜亚基尔的背景。1822年7月26、27日他在那里与玻利瓦尔进行了会晤。会议的议程包括几点：一是关于瓜亚基尔的未来。圣马丁宣布秘鲁拥有这个港口城市；然而玻利瓦尔已经把它并入大哥伦比亚，圣马丁面对的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另一个议题是西属美洲的政治未来。圣马丁主张把君主作为新国家出现混乱的解决方法；玻利瓦尔则相信一个形式上共和、而内容上为寡头政治的政府制度。但是两人面前摆着的重要问题是如何通过击败秘鲁的西班牙力量而完成大陆的解放。

圣马丁在会议后从公众生活突然告退，但两个解放者都不愿意透露在那个会议上说了什么；而稀缺的真实会议档案记录又用一种神秘的氛围包裹了这次会议，从而产生了两个相反而且偏袒性的解释。一种观点是阿根廷历史学家赞成的，即圣马丁来到瓜亚基尔寻找军事帮助，但是被玻利瓦尔断然拒绝，因为他不愿意与对手分享将独立战争进行到底的光荣。于是圣马丁毅然决定离开秘鲁，并允许玻利瓦尔继续他已经开启的事业。另一方面，委内瑞拉历史学家则认为圣马丁来到瓜亚基尔主要是想把瓜亚基尔收归秘鲁。许多历史学家否认圣马丁向玻利瓦尔要求更多的部队，并坚持他是因为个人原因离开秘鲁的，与这次会议无关。

两种解释都趋向于削弱两个解放者的形象和现实主义情感。圣马

丁不是一个烈士,玻利瓦尔也不是一个富有野心的阴谋诡计者,为了自己对权力和光荣的热情而牺牲圣马丁。圣马丁一定已经理解玻利瓦尔只想整合所需的军事、政治和心理资产,用来清理秘鲁宗派系统的老巢,并最终获得战胜西班牙在山地地区军队力量的最终胜利。鉴于利马的形势,圣马丁的出现只能抑制那些任务的完成。考虑到这些,玻利瓦尔独占战争领导的地位以及圣马丁退出的决定反映了他们对秘鲁问题以及所需解决方法的真实估量。

圣马丁返回利马发现在他缺席的期间,他的敌人已经广泛流传,通过把他的主要改革大臣贝尔纳多·蒙塔格udo(Bernardo Montegudo)驱赶出国家来打击他。圣马丁没有试图重新攫取权力。1822年10月,面对第一届秘鲁国会,他宣布辞去保护者之职,并马上离开。他已经想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在智利,他的朋友奥希金斯则政府。处于边缘。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人们似乎忘记了他的存在。在奥希金斯陪伴下,他在1823年底航行赴欧洲。1856年他在去世时默默无闻。他被美化成阿根廷的国家英雄是25年以后的事情。

圣马丁的离开使利马和它控制下的领土陷入了被重建。巨大的西班牙军队重新征服的严重危险之中。玻利瓦尔没有采取行动把利马互相争吵的派系从困境中拯救出来;他让这个形势一直恶化到1823年5月,此时秘鲁国会向他请求帮助。然后,他派苏克雷只带着几千人出发了,因为他想让利马的政治家臣服于他的膝下。西班牙军队短暂占领首都带来的恐慌让克里奥尔领导人接受了玻利瓦尔的绝对统治。

玻利瓦尔在1823年9月到达秘鲁。他要求用近乎一年的时间达到政治的稳定,并将他手下的军队和在他指挥下的不同国家的军队合并形成一支联合力量。在一个月艰难的高山地区的跋涉中,海拔极高的高度让玻利瓦尔和他的手下都遭受了高原反应。爱国者的骑兵军团和保王者的军队在胡宁(Junin)湖附近的地方进行了战斗,西班牙人战败(1824年8月6日),保王军指挥官何塞·德坎狄拉克(José de Canterac)向库斯科撤退。留下苏克雷为指挥官,玻利瓦尔返回利马召集援军。苏克雷在阿亚库乔(Ayacucho)最后的重要战事中获得了击

西班牙军队的苦难。在山地和海岸一些地点只有零星的抵抗有待扫荡。大陆解放的事业完成了。

巴西独立的取得

与西班牙的专制独裁、经济紊乱以及军事毁灭相比,1808 至 1815 年巴西推迟独立进程则是一个相对没有流血的转变过程。巴西的独立运动产生于 18 世纪,当时作为巴西人对葡萄牙为了母国利益而实行的国内高压政治和经济政策的一种反应。第一个反葡的密谋于 1788 至 1789 年在米纳斯吉纳斯组织起来,以反对这个地区价格控制金和钻石的生产和价格,同样还有繁重的赋税,这反映了社会不满;这个地方还存在一个知识分子团体,他们在欧洲流行自由主义和启蒙运动的理想。但是这个密谋从来没有超越讨论阶段,与葡国的密谋就被发现并且粉碎了。其他在里约热内卢(1794)、伊塔瓜拉(1798)和圣保罗(1817)的密谋,以及伯南布科的短暂起义(1817),都反映了社会里相对部分克里奥尔精英,甚至一些下层阶级的不满。18 世纪和 19 世纪所有密谋和起义都夭折了或者被很快粉碎。巴西生长期以后以及奴隶制下对葡萄牙的反抗可能引起奴隶的反抗,都有意识地抑制了独立运动。如果不是欧洲历史的一个偶然事件,巴西的独立可能还会被推迟很久。

法国入侵葡萄牙(1807),紧接着是葡萄牙王室逃到里约热内卢,给巴西带来了重大好处。确实,王室的迁移实际上意味着巴西取得了独立。葡萄牙王后——摄政王若昂(Joao)打开了巴西港口,向友好国家的贸易开放,允许了地产业的兴起,并建立了巴西银行。1815 年他把巴西提升到和葡萄牙同等的王国法律地位。在某种程度上,巴西的新地位是用一种独立形式替换了另一种的独立。从葡萄牙的控制中脱离出来以后,巴西又处于英国的经济统治下,英格兰在 1810 年的《斯坦福条约》中获得了重要的关税优惠以及其他特权,其结果就是廉价机器生产的商品的涌入使该国的手工业产业陷入困境。

巴西精英对巴西的新角色以及对他们阶级不断增长的教育、文化

和经济机会表示满意。但是这个谎言又和不满混合在一起,不满来自于成千的葡萄牙侍臣和随从,他们跟随葡萄牙来到这里,并且与巴西人竞争工作和利益。在他们看来,巴西的葡萄牙人已经到了里斯本贸易垄断转移的苦头。因此,巴西境内也改变加添了与松博人(mazombos,出生在巴西的葡萄牙人)和雷诺伊人(reinois,出生于巴西并且忠诚于葡萄牙王权的精英)之间的冲突。

与母国分离即将来临之际,1820年葡萄牙革命爆发。葡萄牙革命者为主国制定了自由主义宪法框架,但是一涉及巴西,就变得很保守。他们需要唐·若昂(Dom Joao)马上返回里斯本,结束他曾经策划好的双重君主制度,并且恢复葡萄牙的商业垄断。唐·若昂的胆小和犹豫不决,让他不知道该转向何处。在他那些急于返回葡萄牙并重获他们失去的地产的侍臣的压力下,他最终批准了新的宪法,并返回葡萄牙。然而,他留下了他的儿子和继承人唐·佩德罗(Dom Pedro)作为巴西的摄政王,并且在一封私人信件中说,如果发生巴西人要求独立的事件,建议他担任运动的领导人并且把巴西的王冠戴到自己头上。佩德罗也从何塞·博尼法西奥·德安德拉达(José Bonifácio de Andrada)那里得到了同样的建议,后者是一名巴西科学家,他在葡萄牙的停留让他对葡萄牙的殖民改革能力不再抱有幻想。

很快,葡萄牙议会想要把时钟往回拨的意图已经昭然若揭,它企图通过废除1808年以来巴西赢得的所有自由和让步。其中有一项法令坚持要唐·佩德罗马上从巴西返回完成他的政治教育。事件的步伐在1822年迅速前行。1月9日,在何塞·博尼法西奥·德安德拉达和其他巴西顾问的敦促下,唐·佩德罗拒绝葡议会要求他返回葡萄牙的命令,并发表了他著名的“我留下”宣言,他的那些顾问认为这是一个向独立转变的绝佳机会,并且不会受到民众的干预。9月7日后来被所有巴西人当作独立日,在这一天,他发表了更著名的“伊皮兰加呼声”(cry of Ipiranga):“独立或者死亡!”1822年12月,在击败了葡萄牙军队的轻微抵抗后,唐·佩德罗被正式宣布为巴西的立宪皇帝。

墨西哥的独立之路

在新西班牙,和其他殖民地一样,1808至1810年间的波旁王朝危机,助了一些克里奥尔领导人为了能在“费迪南德的名义”下,实施自己完全独立,而进行斗争。但是,在墨西哥,独立运动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转折,暴露出明显的分歧,一方是那些仅仅为了争取管理国家而斗争的人,另一方则是那些反对国内统治而斗争的人们。这些民众,本来保持冷漠,但是加入到了斗争中,在一段时间内,试图把两个精英之间的私人争斗转变成初期的社会革命。

1808年7月,拿破仑逮捕查尔斯四世和费迪南德七世以及拿破仑入侵西班牙的消息,传到了墨西哥城,从而在墨西哥精英间激起了强烈斗争。面对西班牙迫在眉睫的垮台前景,克里奥尔人和半岛人一样希望夺取权力,并确保他们的团体可以控制新西班牙,而不管西班牙危机的结果怎样,克里奥尔人先行动了。墨西哥城市议会是一个克里奥尔人的机构,他们要求总督召集一次议会,由克里奥尔人控制的市议会派出代表大会。这个不同精英团体的代表组成的代表大会,代为管理墨西哥,直到费迪南德七世的被迫退位无效和取消,并重新获得王位。总督何塞·德伊图里加拉伊(José de Iturrigaray)支持这个号召,指出西班牙正处于“无政府状态”。

必须强调的是,支持建立一个殖民地议会的保守并且拥有土地的精英,期望的是自由贸易和自治,或者在西班牙帝国的范围内进行地方自治,而不是独立。他们没有打算在战斗中拿起武器,因为这些战斗很可能带来被压迫阶级的危险干预,而给他们自己的人身和经济生存带来危险。重要的克里奥尔思想家弗雷·梅尔乔尔·德塔拉曼特斯(Fray Melchor de Talamantes)向筹备中的议会推荐的改革表明了克里奥尔精英野心的局限:废除宗教裁判所和教会特赦权(fuero,教士从公民法庭获得赦免的特权);实施自由贸易,以及促进矿业、农业和工业改革的措施。

然而,克里奥尔人为了地方自治和自由贸易的运动,给半岛商人带

来了威胁,这些商人的财产依靠现存的以塞维利亚为中心的封建商业系统而持续。1808年9月15日的晚上,商人发起了反王。富有的半岛商人加布里埃尔·德耶尔默(Gabriel de Yermo)领导一个军团的民兵先发制人,赶走了伊图里加拉伊总督,并且逮捕了带头支持自治的克里奥尔人。一系列短暂的半岛人统治的政权掌握着权力,直到一个新总督弗朗西斯科·哈维尔·德贝内加斯(Francisco Javier de Venegas)在1810年9月从西班牙来到这里。

克里奥尔贵族的领导者,担心自己的大量财产利益,没有回应半岛人的反攻。克里奥尔人控制墨西哥命运的运动领导权现在转到了一个主要由“边缘精英”组成的团体手里——站在相对适中的经济和社会场的巴伊奥(Bajío)上层阶级个人手里,该地是一个大致属于克雷塔罗监政区的地理区域。

这个地区特殊的经济和社会条件有助于解释它在墨西哥独立战争第一阶段中的决定性作用。它是墨西哥地区农业和工业结构中最现代的地区。那里极少有传统类型的原住民社区;大量的人口由部分欧洲化的城市工人、矿工、农奴或者各种类型的佃农组成。农业被大规模的商业灌溉庄园控制,这些庄园为上层阶级生产小麦和其他产品;平民的主要食物为玉米,只有贫困的佃农在边缘土地上耕种。那里还有一个重要的纺织工业,它经历过一次变迁,从利用奴隶和其他强迫劳动力的大庄园转变成承包外销制度(putting out),在这个制度中,商人-出资人向工匠家庭提供棉花和羊毛,工匠用自己的织布机把它们变成布匹,“通过用更长的工作时间获得微薄的报酬强迫数量不断增长的工匠家庭剥削自己”。矿业是该地区利润最高和资本最密集的工业;在一些不错的年份里,瓜纳华托最大的矿区巴伦西那(Valenciana),可以给它的主人净赚超过100万比索的利润。巴伊奥经济的准资本主义结构,基于大量的自由劳动力,这也就促进了工人阶级意识和战斗精神的增长。比如,瓜纳华托的矿工用各种方法抵抗试图结束“好处费”(他们开采的超过定额的铁矿而获得的相应的分享)的尝试,包括降低产量;而雇主则召集民兵强迫重新开始全面生产回应他们。巴伊奥的劳动力在18

最后几十年里,经历了工资和生活水平以及就业机会的下降。这主要是由一些他们无法控制的情况造成的结果:迅速的人口增长使地租降低工资或者用季节性劳工代替长期工人;国内纺织业面对廉价的工业化生产商品出口的竞争;以及矿区因老化而增长的费用。这些因索造成了深重的不安和不满。然后在1808年和1809年,干旱和饥荒又开始了袭击伊奥,现有的紧张和抱怨进一步恶化。就像先前发生在1763年的圣里科一样,大地主从处于水深火热中的贫苦人民身上榨取利润,先将他们的粮食远离市场,然后在价格上升到顶峰的时候卖出去。正是在这种社会不安和严重的生存危机的背景下,墨西哥的独立斗争开始了。伊奥是这次风暴的中心,这里的农民和工人阶级形成了革命的先锋。

1810年,一个克里奥尔人的起义密谋在克雷塔罗重要的政治和工业中心克雷塔罗。只有两个谋反者属于克里奥尔人地区精英的最高圈子,他们试图把其他有名的克里奥尔人吸引到这个密谋中的努力被拒绝了。大多数人是“边缘精英”——苦苦挣扎着的地主们,一个食品杂货商,一个地产管理人,一个教区神父。一开始,谋反者似乎就计划动员工地人和混血人无产阶级,大概因为他们也怀疑自己能够赢得他们阶级大多数人的支持。多数密谋者的动机是希望发动军队。米格尔·伊达尔戈是多洛雷斯(Dolores)城镇的一位神父,也曾经是巴拉多利德(Valladolid)的圣尼古拉斯修道院的院长,他深深地同情着土著人。博学的伊达尔戈因为他的自由思想的理想早已引起西班牙政权的注意,他还因他的科学兴趣和在教区发展新工业而闻名。

得知他们的密谋已经被告发给西班牙官员后,密谋者们举行了紧急会议,决定发动起义,尽管筹划还没有完成。1810年9月16日,星期天,伊达尔戈召集他教区的教民聚集起来做弥撒,以反抗他们的西班牙统治。这里像西属美洲的其他地方一样,也使用了“以费迪南德的名义”;伊达尔戈宣布领导一次起义,是为了支持受人爱戴的国王,因为他被不信神的法国人背信弃义地逮捕并且罢免。不到两周的时间,起义的领导者们已经召集了上千的反抗者,并开始向瓜纳华托的工业和矿

业中心进军。在进军中,伊达尔戈紧握着携带瓜达卢佩圣母形象的旗帜,并宣称圣母是他的运动的庇护人,因此呼吁他的追随者献出宗教的虔诚。整个进军路线沿途,当地的精英们没有加入起义。他们带着沮丧的神情观望着,反抗者抢夺店铺,并夺取在两年的干旱和饥荒后1810年充足的丰收带来的粮食。在上千名矿工的帮助下,9月28日瓜纳华托被攻占了,这些矿工联合起来进攻丰盛的市政粮仓,但是西班牙官员、民兵和当地精英都试图逃离这些起义。随后是成百上千的西班牙人在粮仓和城市被杀害。瓜纳华托的屠杀和洗劫是反抗运动的一个转折点,因为它把双方的冲突公开化了,一方是伊达尔戈和他的盟友的基本目标——克里奥尔人对自治或者独立的墨西哥的统治,另一方是



何塞·克萊門蒂·奧羅斯科(José Clemente Orozco),墨西哥最有名的壁画家之一,创作了这个墨西哥解放者伊达尔戈的大胆形象,手里拿着燃烧的火炬,领导墨西哥人反对政治压迫和社会不公正的运动。

是他们的低层阶级追随者对报复和社会公正的渴望。从瓜纳华托事件得到启示后,克里奥尔精英的大多数在伊达尔戈没有能力控制的运动的巨大暴力之前,害怕地退缩了。

在他的第一次胜利后,伊达尔戈颁布了法令,废除奴隶制和纳贡,——是土著人和混血人每年上缴的人头税。三个月后,他在瓜达拉哈拉向总部下达命令,要求把已经被西班牙人占用的城市附近的原著民的土地交还给印第安人村庄,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涉及土地问题;他的愿望是“只有印第安人在他们各自的村庄才可以使用那些土地”。尽管这些改革中规中矩,但是它们使墨西哥斗争带有一个民众特征,而这个特征在南美洲独立运动中一直是缺失的。但是这样一来就疏远了克里奥尔人,他们可能希望自治或者独立,但不是社会革命。另一方面,这些改革走得并不够远,巴伊奥和哈利斯科(jalisco)这些地区中伊达尔戈的农民和工人阶级追随者的根本性苦难:没有土地、吃不饱肚子的工资和高昂的租金、佃农的缺乏保护以及利润丰厚的地主对粮食谷物的垄断等这些问题都没有解决。缺少明确的社会和经济结构改革的计划,伊达尔戈的追随者们把他们在无法忍受的境况下的愤怒,通过屠杀西班牙人,以及掠夺克里奥尔人和半岛人等的财产发泄了出来。

173

伊达尔戈没有能力把他的反抗团体锻炼成一支有纪律的军队,也无法充分利用先前的胜利。在墨西哥城附近击败了一支保王者军队后,他在城市外面扎营三天,然后在他让对方投降的要求被拒绝后,他没放一枪就莫名其妙地从这个几乎没有任何防御的城市撤退了。这表明他害怕重复先前胜利后的暴行,或者他相信如果没有当地民众的支持,他不能保住这个大城市,根据历史学家埃里克·凡·杨(Eric Van Young)的研究,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导致了伊达尔戈的运动注定要失败。但是中部高地的农民也没有召集起来继续伊达尔戈的目标,这些农民还拥有社区土地,可以满足他们的最低需求,并通过在大庄园赚的微薄工资弥补不足的种植收入。随着他的军队因为逃兵而慢慢减少,伊达尔戈向巴伊奥撤退。被保王者军队赶出瓜纳华托后,伊达尔戈和

其他起义领导者向北逃去,希望在科阿韦拉(Coahuila)和得克萨斯建立运动的新根据地。在起义开始不到一年的时间,伊达尔戈在逃亡美国边境的途中被逮捕,被一个宗教裁判所指控为异教徒和亵渎罪,并且被行刑队处死。

伊达尔戈的失败和去世没有结束他发起的反抗起义。起义的火焰继续在广阔的墨西哥地区燃烧着。后起的领导人从伊达尔戈战败的失败中得到启示。很多人发展出了一种灵活和移动的游击队战斗方式,放弃了试图通过在常规战场上的高级武器和训练来击败保皇者的力量。在他们反对拿破仑的战斗中,西班牙人自己有效地采用了游击战——用小卫队进行进攻和撤退的快速运动式的战争,充分利用熟悉的地形和乡村民众的支持来阻挠进攻和追击。墨西哥的反抗战略不是为了赢得快速胜利,而是使敌人筋疲力尽,并且通过掠夺和摧毁富人们的店铺和大庄园、扰乱贸易以及制造对战争的厌倦感和对越来越专横的殖民地政权的敌意,摧毁社会和经济基础。

伊达尔戈死后,一名梅斯蒂斯神父何塞·玛丽亚·莫雷洛斯(José María Morelos)成为革命运动的最高指挥官。莫雷洛斯在他为伊达尔戈服务之前,曾给炎热和潮湿的米却肯太平洋低地贫困的宗教团体提供过援助,伊达尔戈要求他在那个地区组织起义。海岸低地地区的经济和社会条件与巴伊奥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它的主要工业、糖、棉花和靛青,因为来自高地市场附近地区以及进口布料的竞争而处于下降状态。所以,庄园佃农和劳动力的地位已经变得越来越依附和不安。当地村民的物质生活条件也在恶化,因为村头目把社区土地租给外来人,这个行为使很多家庭失去了维持生计的最后土地。

这些状况引发的不满给莫雷洛斯和他的起义运动在海岸低地地区提供了大量的民众基础。莫雷洛斯非常清楚该地区乡村人民的问题和需要。像伊达尔戈一样,他命令结束奴隶制和进贡。他还废除了原著民社区土地的租金,废除了社区财库(cajas de comunidad),这些资金经常被村里的显要人物乱用或者被土宰官员慢慢剥削干净;村民从此以后可以留住他们的劳动收入。莫雷洛斯还扩大了伊达尔戈的社会改

计划,禁止所有的强迫劳动,废除所有种族条款的使用,除了“加丘平”,因为他们是被人们憎恨的半岛西班牙人。莫雷洛斯支持激进的土地改革,这个基本没有什么疑问。在他的文件中找到的一份“计划”,提出把所有大于两库格的庄园分割成小地块,还谴责了一种情况,即“一个个体拥有大量没有耕种的土地,而让成千上万的人沦为奴隶,这些人作为农奴(gánanes)或者奴隶在这些土地上被迫工作”;他看到了土地所有制的社会益处。但是莫雷洛斯的行动自由被他与印第安土地精英之间的联系限制了,一些精英是他的助理官员,他答应会尊重他们的财产。

莫雷洛斯是一个出色的游击队领导人,他用严格的纪律、训练和统一方式代替了伊达尔戈的松散方式,在太平洋低地地区建立了一个军事基地后,向战略性的中央高地和首都挺进。他向墨西哥城南部有矿产和产粮区推进没有获得当地原住民社区足够的支持,这些社区仍保留着相当可观的土地所有,他被迫向南撤离,进入了瓦哈卡(Oaxaca)地区的丛林山地。他的军事努力被抑制住了,因为与难以控制的印第安盟友之间分歧和他希望建立一个代表性政府的决定,他的决定是在军事条件变得越来越岌岌可危的时候提出的。1813年秋天,他在奇尔潘辛戈(Chilpancingo)召集的一次大会上宣布墨西哥的独立,制定了莫雷洛斯的社会改革,并赋予他至高无上的军事和行政权力。但在后面几个月中,战争的潮汐开始涌向起义事业相反的一面,这部分因为莫雷洛斯的战术错误,包括放弃流动的游击战而采用阵地战,这个错误在他长时间被困阿卡普尔科要塞中表现得最为突出。1813年后期,莫雷洛斯在保王党力量的手中遭遇了多次失败,对方是由能力强劲且咄咄逼人的总督菲利克斯·卡耶哈(Felix Calleja)领导的。

拿破仑的失败和1814年凶残保守的费迪南德七世返回西班牙王位,使成千上万原打算被送到海外镇压西属美洲起义的士兵得到了解放,奇尔潘辛戈大会逃跑了,变成了一个流浪的团体,国会的争吵和对保护的需要分散了莫雷洛斯对所有重要军事问题的注意。他带着重新

恢复起义事业的希望,想通过提供代替费迪南德残酷暴政的选择而获得克里奥尔精英的支持,他在阿帕兹甘镇(Apatzingan)举行了代表人会并且起草了一个自由主义宪法(1811年10月),提出了一个共和政府框架,还宣布在法律面前市民平等,以及演讲和出版自由的条款。在1815年的进程中,无情的保王派压力迫使代表人会从一个地方逃到另一个地方。11月,在进行了一场使代表大会可以逃脱的后方保护战斗后,莫雷洛斯被一支保王党队伍逮捕,并被带到首都。和伊达尔戈一样,他在1815年12月22日被行刑队枪决。

伟大的游击队领导者去世了,革命运动尽管无组织,但还在继续着。确实,大量起义部队和西班牙镇压起义之间的斗争在1815年和1820年达到了新的致命性高度。为了避免伊达尔戈,甚至是莫雷洛斯的错误,斗争的领导者避开了激战,也没有努力去夺取大量人口的中心地区。相反,他们指挥一个流动性的战争,用小队伍占领和毁灭保王的庄园主,中断贸易,或者征收贸易费用,切断通信,并且控制大乡村地区。当被镇压起义的军队追击时他们就逃跑,然后当大量西班牙部队离开后再重新出现。一场无望的战争给经济带来的破坏性后果,地区指挥者和地方洪达强加给所有居民的支持那场战争的沉重赋税,以及对不只是起义者,而且还有赞成妥协和自治的高职位克里奥尔人的残酷对待,都使得克里奥尔精英,甚至可以说是其中最保王的人群发生了变异。

这些群体和很多保守的西班牙人一样,试图寻找一个走出僵局的方法,以避免莫雷洛斯提出的共和政权下的那种激烈的社会变革。1820年,西班牙强迫费迪南德七世接受1812年宪法时,一场自由主义起义爆发了,一个走出僵局的方法似乎也出现了。被选入西班牙议会或者国会的墨西哥代表,提出一个解决方法,可以保留与西班牙的关系,但是要给新西班牙和其他美洲“王国”在帝国范围内的自治。议会中的大多数西班牙人拒绝这个提议,从而也决定了帝国的命运。

议会在1820年采取的激烈改革,包括废除教会和军事特权,招来了保守的地主、教士、军官和商人,不管是克里奥尔人还是半岛人的怨

限。出于害怕失去特权,他们计划把墨西哥从母国那里分离出来,并且在保守派的支持下建立独立国家。他们的工具是克里奥尔军官奥古斯丁·德伊图尔维德(Agustín de Iturbide),他发动了对起义者毫不留情地镇压战争。伊图尔维德向主要的起义领导比森特·格雷罗(Vicente Guerrero)提出了和约和和解。他的计划将独立、君主、罗马天主教会的所有土地权,以及克里奥尔人和半岛人的国民平等都放在一起。格雷罗是一个真诚的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者,伊图尔维德则是一个肆无忌惮的机会主义者,梦想着把王冠戴在自己头上。但是当时,伊图尔维德的计划给双方都带来了好处,而格雷罗还是不情愿地接受了它。格雷罗和伊图尔维德的联合力量迅速克服了保王党人零散的抵抗。1821年9月28日,伊图尔维德宣布墨西哥独立,八个月后,由伊图尔维德召集的选举大会确定了他作为奥古斯丁一世成为墨西哥皇帝。

除了华而不实的辉煌,伊图尔维德的帝国没有民众基础。短短几个月内,奥古斯丁一世不得不退位,并且被警告永远不能回来。伊图尔维德怀着复辟的希望,于1821年从英格兰返回,带着一小队人在海岸登陆。他很快被新共和政权的部队逮捕,并被处决。

墨西哥的解放给拉丁美洲的独立斗争带来了成功的结局。如果不提拉丁美洲妇女对这个结局的贡献,那么战斗的故事就不会圆满。一个墨西哥女英雄唐娜·何塞法·奥蒂斯·德多米尼格斯(Dona Josefa Ortiz de Domínguez)是克雷塔罗克里奥尔镇长的妻子,是位勇敢的女生,她曾同伊图尔维德和其他密谋者发出警告,西班牙政权即将前来逮捕他们,因此在革命还未开始之前就拯救了革命。在西蒙·玻利瓦尔领导下解放的土地记住了它聪慧漂亮的女主人曼努埃拉·萨恩斯(Manuela Sáenz),她让自己的英国丈夫加入解放者队伍,并在刺客手中把她的丈夫从死亡线上救了出来。“她分享他的思想,安慰他,鼓励他为了自己的信念而战斗,这些都是不能否认的。”哈罗德·比坎尔克(Harold Bierck)写道,“在很多方面,她就如同多数人叫她的那样,是位女解放者(la libertadora)。”

在拉丁美洲的每一个部分,女性都参加了武装斗争。她们通常来



一名西班牙贵族的私生女曼努埃拉·萨恩斯,被天主教女修道院驱赶出来,后来成为政治独立和女性权利的激烈倡导者。在独立斗争中,她遇到了西蒙·玻利瓦尔,并与他陷入爱河,在1825年,她还拯救了他的生命。

自中间和低层阶级。玻利瓦尔赞扬哥伦比亚的“女战士”,在她们中间有英雄波利卡尔帕·萨尔瓦利埃塔(Policarpa Salvarrieta),当西班牙人因为她帮助革命而处决她的时候,她只有23岁。在巴西,玛丽亚·奎特伊拉·德耶苏斯(Maria Quitéria de Jesus),出生在巴伊亚省一个养牛和种植棉花的小牧场,把自己伪装成一个年轻男性,加入了革命军队。她的英勇使她在1823年赢得了独立巴西的第一个统治者唐·佩德罗颁发的奖章。弗朗西斯卡·米勒(Francesca Miller)说道,在海地独立的战斗中,女性是“无处不在的”,一些人还指挥着部队。

在独立斗争的余波下,许多妇女因为她们参与了斗争而得出了合乎逻辑的结论:如果妇女为了独立战斗而且牺牲,为什么她们不能获得投票和被选举的权利?这是1821年提交给萨卡特卡斯(Zacatecas)墨西哥政府的一份请愿信:“妇女也希望获得市民的头衔……看到她们

“作为女公民 II 或女公民 N 被算入统计数据中。”但是过了一个半世纪,所有拉丁美洲妇女才实现了那个愿望。

拉丁美洲的独立：一项总结

经过十多年的战争,并伴随着大量生命和财产的损失,多数拉丁美洲国家赢得了政治上的独立。革命伴随着或者紧跟着一系列社会变革。独立带来了主教裁判所的灭亡,结束了以人种族群为基础的合法权利,剥夺了多数土地贵族的头衔。它还促进了奴隶制的废除,促进了公共权力的建立,以及相同的改革。然而,所有这些变革都是非主导的;独立留下了完好无损的现有经济和社会结构。这很自然,因为领导者,如克里奥尔精英没有改变现存秩序的意图。他们希望代替半岛君主在权力的位子上,并且把他们的港口向世界贸易敞开,但是不希望有什么劳动和土地制度的变革。确实,他们作为在欧洲和北美市场上出售的原材料和食物的生产者,其利益需要保持大庄园制度,因为庄园里有被奴役的当地无产阶级进行劳动。独立没有伴随着任何农业改革。被放弃或者被保土者没收的庄园通常落入了克里奥尔贵族的手中。一些土地还落入了梅斯蒂索人或者白黑混血人官员的私囊中,这些官员被克里奥尔精英所同化,他们自然很快忘记了自己出生的那个群体。

革命没有为拉丁美洲扩大土地所有制的基础,实际上却缩小了基础。革命政府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在某些情况下,因为要求在其成员中分配社区土地,而毁坏了原住民社区的土地所有制。这个过程加速了这些社区土地被克里奥尔地主侵占的过程,也加快了西班牙殖民地的当地农民转变或短工或苦工的进程(见第九至十一章)。因为没有发生结构性的经济变革,尽管披着共和国宪法和法律法规的装饰性外衣,贵族价值观还是继续统治着拉丁美洲社会。

第二部分

19 世纪的拉丁美洲



《咖啡种植园》，1935 年，坎迪多·波尔蒂纳里绘制。

独立以后，殖民时期的社会结构在很大程度上仍保持原状。对独立前自由主义者而言，事实是显而易见的。1853 年，哥伦比亚自由主义者拉蒙·默尔多(Ramon Mercado)声称：“反对西班牙的战争不是一场革命……独立只触及了表层社会问题，其本质特性没有变化。”取得独立以后，为了实现经济政治稳定，新拉丁美洲国家开始了长期艰苦的斗争。由于对发展起到促进作用的经济社会变化没有伴随独立过程而出现。比如，没有进行对下层社会有利的土地和收入重新分配，使新兴国家面临巨大的障碍。大庄园大体依靠简单工艺以及奴隶、苦工，并且继续在经济生活中处于支配地位。事实上，有土地的贵族影响力处于上升趋势，而这是在独立战争中军事上起到主要作用以及西班牙日渐没落两方面的原因所致。然而，我们不能贬低发生变化的限度和程度。尽管独立并未产生主要的社会变动，但不排除发生较小变化，这使得精英内部分裂，旧社会秩序的贵族支持者被从渴望更民主的资产阶级秩序中分离出去。西班牙和葡萄牙统治时期结束后，其二者之间的斗争是 19 世纪上半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取得独立以

179

后,尽管从前贫苦的民众只能在政界处于附属地位,并且只允许一小部分人晋升到精英行列,比如工匠和南美牧人,但已近突破接纳这一关。拉丁美洲一些主要港口对外开放,还在思想方面建立了相对自由的市场,至少在首都及其他大城市是如此。在几乎没有时间放慢脚步的情况下,新欧洲思想学说进入拉丁美洲,并适用于解决大陆问题,比如不切实际的社会主义、浪漫主义以及实证主义。这些新的学术风潮吹过不久前曾经布满灰尘的殖民地通道,有助于此地区知识更新,并促进更深入的社会变革。

照字面意思,新共和国宪法至少保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并使殖民地社会等级不再具有法律基础。然而,由于比例关系变化甚微,人种、种族和社会阶层之间界限仍基本保持不变财富,权力和权威继续由重铸殖民地种族结构并将自己等同于白种人的统治阶层掌控;然而,在一些国家,比如委内瑞拉,包括较暗肤色的人在内,都试图利用战争或政治活动中的非凡能力攀登社会阶梯。

组成旧社会阶层的所有群体中,庄园主的地位变化最小。墨西哥历史学家查尔斯·玛丽亚·布斯塔曼特(Carlos Maria Bustamante)是为数不多的克里奥尔领导人中一员,他认识到独立并没有使他摆脱枷锁。他写道:“尽管他们自以为有自由,而事实是仍受原有障碍的束缚。”当地人的纳贡和强迫劳动在独立战争中或者战后遭到废止,但在很多国家纳贡和强迫劳动很快又以其他名义再次出现。更糟糕的是,本地人的公有土地、社会组织以及文化本应受到殖民地时期西班牙法律政策一定程度的保护,却越来越多地遭到抨击。自由主义者尤其相信,同西班牙投票系统以及特殊优惠权一样,这些社会传统成为阻挡进步的绊脚石。

然而,直到大约 1870 年,在墨西哥、中美洲以及安第斯山地区仍有相当一部分土著居民生活在土地公有制度下。然后,出口经济的快速增长、铁路时代的到来以及所导致的土地价值和劳动力需求大增使白人和混血人庄园主以及受庄园主操纵的政府开始向本地人土地发起猛烈侵占。土地没收与劳务偿债、佃农人数增长在同时进行。为使劳动

者隶属于种植园，雇主不惜使用从负债劳役到彻底强制的各种手段。在一些地区，出现了同经典的欧洲模型极为相似的农奴身份。例如，在安第斯山地区除了在主人农场工作外，艾马拉佃户还需在庄园主家或在城市提供家庭劳务，并且家庭服务期间农奴可以被买卖或者赠送。这种或者其他形式的农奴制一直生存到 20 世纪。

在牧师和地方官吏的协助下，主人阶层试图通过对当地人实行心理控制来增强经济征服。这最终演变成一种关系及角色形式，即指定一人或几行善人物，由他来确保苦工和佃农的生计，后者则用完全服从来换取主人在紧急情况下对其予以保护。在拥有大量土著居民的国家，雇主和苦工之间的联系通常包括复杂的规矩，即要求土著与主人讲话前需先获得申请批准，在主人面前卑躬屈膝，在作出包括婚姻在内的所有重要个人决定前也要先获得批准。

但是，这些更多表现寓住苦工特点的关系和卑屈姿态并不为所有当地人接受。19 世纪下半叶，在安第斯山地区、墨西哥以及其他地区，本地幸存的土地拥有者为防止自己土地被前来侵占的庄园主吞并，进而成为无土地劳动者的进程而进行了顽强抗争。他们用所有能支配的手段进行斗争，包括作为万不得已手段的武装起义。19 世纪 60、70 年代，武装起义在墨西哥爆发，被土地拥有者和政府官员称为“共产主义”，最后遭到强大的军队的无情镇压。

独立后拥有更多的活动自由，更多当地自治社区逐渐消失以及当地人和混血人混杂的大庄园的发展，增强了始于殖民地末期的文化互渗趋势。这种文化渗透反映在双语制的发展：土著人同白人交流时，使用西班牙语越发频繁，本土语言只用于本族人之间沟通。一定数量的公立学校进驻本地区，也有助于土著人接受西班牙语为自己的第二语言，他们有时甚至完全放弃了使用母语。据墨西哥历史学家爱德华多·鲁伊斯(Eduardo Ruiz)回忆，小时候他只说塔拉斯科语，但已经忘记在 12 岁时学的西班牙语。“我不得不承认不想有那些记忆，因为被当做印第安人受教育是羞耻的事情。”随着频繁摒弃地区潮流，偏好类欧洲风格，一些文化互渗在衣着方面也表现出来，而有时是迫于法律和

罚金。例如,在许多墨西哥地区,粗缝棉布料的白色裤子加衬衫以及宽边帽几乎成为本地人的制服。

善意的自由主义者希望通过现代工薪社会的教育和工作,加强对土著人的文化同化和融合,进而使之融入白人社会,但往往事与愿违。19世纪末,由于各种原因在五个拥有最多土著居民的国家:墨西哥、危地马拉、厄瓜多尔、秘鲁和玻利维亚文化互渗过程中,土著社区的规模并未明显缩减。独立后一二十年,经济停滞和政治困境加强了社会孤立和文化分歧的情况。出口部门扩大使拉丁美洲经济得以复苏,而这次经济复苏很大程度上以土著的利益为代价,并主要致力于凸显拉美国家的贫穷落后。经济上被边缘化,政治进程中几乎被排除,受白人和混血人庄园主、神父和官员的极度剥削,同时不信任和憎恶造成的障碍也把土著人从白人世界割离出来,从而阻隔了任何切实的文化互渗,更不用说融合。

土著社团承认对同化压力做出让步的必要性,但保留了将土著人和基督教特征融为一体的传统住房、饮食、社会组织以及行政区。在一些地区,征服前时期包括偶尔的活人献祭在内的迷信仪式仍存在。土著人终日受剥削,并被处于统治地位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称为下等人,迷信仪式在拥有大量土著人口的国家普遍存在,以上都是这些地区形成民族意识的主要障碍。先驱者 墨西哥人类学家曼努埃尔·加米奥(Manuel Gamio)于1916年写道,墨西哥没有建立拥有一个欧洲意识的国家,却选择由众多在语言、经济、社会组织和心理方面有所不同的小民族组合而成。

独立战争通过推广“成功青睐有才之人”理论,使许多本地人和出身卑微的混血人能够在军事、政治和社会领域飞黄腾达。自由主义总统 墨西哥的比森特·格雷罗和胡安·阿尔瓦雷斯(Juan Alvarez)以及才华横溢的各国领导人 厄瓜多尔的胡安·何塞·弗洛雷斯(Juan José Flores)、玻利维亚的安德烈斯·圣克鲁兹(Andrés Santa Cruz)、秘鲁的雷蒙·卡斯蒂利亚(Ramón Castilla)都描绘出了一条混血人的飞腾之路。

混血和白黑混血领导人的发展在某些克利奥尔精英中激起恐惧，它始于玻利瓦尔，他悲观地预测会爆发种族战争，在富人和穷人之间会发生冲突。玻利瓦尔将勇敢仁厚的墨西哥爱国主义者比森特·格雷罗斥责成“蒙昧的印第安人和凶残的非洲人极为失败的作品”，这其中就显示出 racial 的种族歧视。事实证明这些恐惧毫无理由，尽管一些混合种族领导人仍然骄傲或者用另一种方式表示忠诚于自己的出身——卑微的民众，如格雷罗和阿尔瓦雷斯，但是大多数人很快就与克里奥尔贵族同流合污并坚定维护其利益。

另一方面，后殖民时期的克里奥尔政治家必须将混血人种中的中产阶级政治新力量考虑进去，尤其是技工人员组织。他们在政治上允诺满足、甚至实现民众强烈愿望的白人精英的剥削。上述情况曾发生于波哥大，在反对保守王权者过程中哥伦比亚自由主义者状告工人；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胡安·曼努埃尔·罗萨斯(Juan Manuel Rosas)则成功地将自己与混种的加乌乔人及城市工匠结成统一战线，一致反对贵族自由主义中央集权派。

中世纪以后，欧洲种族主义思想意识影响力日益增加，导致对肤色敏感度提高，拉美塞哲学生物决定论的影响尤为严重。从墨西哥到智利各国均认为：所谓的白人精英，甚至中产阶级优于土著人和混血人。黑色皮肤日益成为社会地位提升的障碍。

21 世纪初，猖獗的伪科学种族主义典型是德国移民的儿子——阿根廷人查尔斯·邦吉(Carlos Bunge)的相关评论，他认为混血人和白黑混血人是“不纯正的，隔代遗传的反基督教者；他们就像童话中九头蛇的两个头，缠绕一位美丽柔弱的圣母——西属美洲，令其窒息”。

通常，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均不受当时无处不在的民族主义影响。阿根廷自由主义者多明戈·萨米恩托(Domingo Sarmiento)认同欧洲资产阶级秩序和白人至上主义的观点，出于对这种文明的狂热，他认为：“可能有人野蛮人、破坏初始文明、征服使用自己土地的民众看起来不公平，但正是这种不公平使美洲免于被遗弃到没有进步能力的野人民族手里，今天生活在美洲大地上的是高加索种人，一个居住在地

球上的所有民族中最完美、聪明、漂亮、进步的民族。”少数拉丁美洲知识分子不赞同这种观点。其中包括智利人弗朗西斯科·毕尔巴鄂(Francisco Bilbao),他指责“用文明来掩盖犯罪和暴行的虚伪嘴脸”,这明显与萨米恩托反对土著人和高加索人的战争有所关联。另外一名反对者是古巴的何塞·马蒂(José Martí),他公开指责以“文明”为夺取“野蛮人”土地的自然权利为托辞,而其中“文明”是通常专用于当代欧洲国家所设的名词,而它们则是急需得到其他民族的土地,却将“野蛮人”的称呼给予其他所有非欧洲、非欧洲出身的人。

甚至在独立战争以前,黑奴在拉丁美洲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数量已经开始下降。这种情况出现,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经济发展使得奴隶制度无利可图,因此,人们开始倾向于解放或者将奴隶制度转向租佃制度。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奴隶逃跑到附近丛林山区的事情时常发生,而在那里能组建自治社区。大约在1800年,据估计在委内瑞拉87 000名奴隶中大概有24 000人曾经是逃亡者。当然,废奴运动最强有力的证据是,被奴役的非洲人及其后代,在图森·卢韦杜尔和他的海地朋友的带领下,拿起武器捍卫共同的自由,从拉丁美洲奴隶制度中解放出来。

独立战争是对解放的最大激励。爱国主义指挥官——比如玻利瓦尔和圣马丁以及保王官员都经常为回报其军事服务而主动给予奴隶自由,有时黑人奴隶是双方主要战斗力量的重要组成者。在安第斯山战役中,黑人大约占圣马丁军队总人数的三分之一。此外,战争引发的骚乱和秩序通常导致农场秩序崩溃,也可能引发奴隶战争,使庄园的恢复困难重重。

墨西哥独立以后,奴隶制进一步衰退,其中部分原因是奴隶制公开排斥新政府自由派的观点,但是更多的是英国敌对态度的后果。英国于1807年在本国废止奴隶贸易,此后对所有仍然从事奴隶贸易的国家施加压力;英国对巴西的施压直接导致巴西奴隶制危机及其最终灭亡。

奴隶在不是主要劳动力的国家获得解放最早、最快;由此,智利、墨西哥以及中美洲联邦(1823—1839)于1823至1829年之间相继废除

奴隶制。在其他国家,奴隶主展开了一场持久的保卫奴隶制斗争。在委内瑞拉,制定过程极为缓慢的解放法案于 1821 年就通过了,但是直到 1851 年奴隶制度才最终被废除。而在秘鲁,雷蒙·卡斯蒂利亚于 1875 年废除奴隶制。经过较长时期平息了反叛奴隶的暴力斗争后,西班牙议会于 1873 年在波多黎各、1880 年在古巴颁布法令废除奴隶制,但在古巴这项制度仍然变相存在,直到 1886 年才最终废除。

一些历史学家认为,文化和宗教因素使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奴隶制在美洲各国盛行。但应当指出的是,19 世纪拉丁美洲国家的奴隶制也并未支持这些历史学家的观点。在对巴西咖啡和古巴蔗糖需求不断增长以及劳动力短缺的条件下,有充分证据表明这两个主要奴隶制中心有利用鞭笞来保证奴隶工作得更长、更重的残暴行为。奴隶以不同形式的反抗作出回应,其中包括从减慢劳动速度到公然反抗。正是这种反抗导致了奴隶制度最终废除。

185

独立以后,高度仪式化行为的父权制家族组织和从容的生活方式仍然是拥有土地的贵族和拉丁美洲精英的特征。家长制大家庭的亲属关系网在宗教仪式亲(compadrazgo)制度下进一步扩大,而正是这种制度建立了上层社会教父母面向低等社会教子及其父母的保护关系。继而,下层阶级家庭成员也期望成为教父家庭的追随者,并致力于维护教父家庭的利益。

在殖民地时期,大庄园主大部分时间通常在城市居住,而把庄园留给总管负责(但绝不允许他们不详审账簿、不关心盈亏账目的情况出现)。在同样的上层社会中出现了一个自诩为创业者的小部分人,他们敢于挑战社会中的传统土地偏见,如理查德·格雷厄姆(Richard Graham)所说:“他们最终的结果是被资本主义思想、对工业化的信心以及对工作和实际的忠诚所俘获。”巴西的马乌阿子爵(Maua)是上述群体的代表人物,他于 1850 至 1875 年创立了反对传统主义者的银行和工业帝国。然而,马乌阿的帝国最终瓦解,原因有二:巴西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条件尚未完全成熟;官员无动于衷,甚至持反对态度。企业家时代还未到来,19 世纪拉丁美洲经济史中遍布早产的工业项目残

骸。这些惨败还象征了资本主义思想方法和价值观的失败。

新殖民主义秩序是以拉丁美洲经济融入国际资本主义体系而形成的。19世纪中叶后,随着新秩序则逐步发展,尽管政治领域仍然保留一定的前资本主义特征,却开始倾向于接受资本主义价值观和理念。19世纪80年代的一名阿根廷作家指出,大庄园主不再处于野蛮、半封建状态,转而成为终日往返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新宅庄园以及巴黎的住所之间的科学管理者。事实上,只有极少数大庄园主才成功转变为“科学的管理者”。他们更喜欢将管理庄园的工作交给他人,但是作家还是认为精英们逐渐欧化已经开始在整个拉丁美洲进行。

精英欧化过程始于独立后,19世纪中叶后大大加速。独立后的十年内,习俗和消费模式变化凸显。西班牙驻墨西哥公使妻子露德·卡尔德隆·德拉巴尔卡(Fanny Calderon de La Barca)出生于西班牙,她在一系列欢快的信函中将圣安娜(Santa Anna)时期的墨西哥上层社会描述为“时尚改变”。“优雅的黑丝披风逐渐为不雅致的女裙取代。画板上绘有吉多·奥罗拉(Guido Aurora)肖像,行驶缓慢的古时四轮篷车最终被伦敦制造的四轮马车淘汰。老的东西缓慢且不适当地让位于新的东西,让位是在进行的,至少在殖民地世界是如此。”

在散懒的殖民地城市,比如厄瓜多尔的首都基多,19世纪60年代,美国驻厄瓜多尔大使弗里德里克(Friedrich Hassaurek)对许多基多的社会和习俗进行了严厉批评,他带着不满的情绪指出:“虽然运输非常困难,但在基多仍有120架钢琴等待运送。”据此时期的另一位美国赴基多拜访者詹姆斯·奥顿(James Orton)教授所述:“上层社会追随巴黎模式,而男士将老式西班牙经典外衣放入衣柜。”他酸酸地说道:“这种现代宽外袍很适合厄尔多瓜人,可以防止他们的胳膊做任何事情,并能够掩盖大量罪行,尤其是骄傲和贫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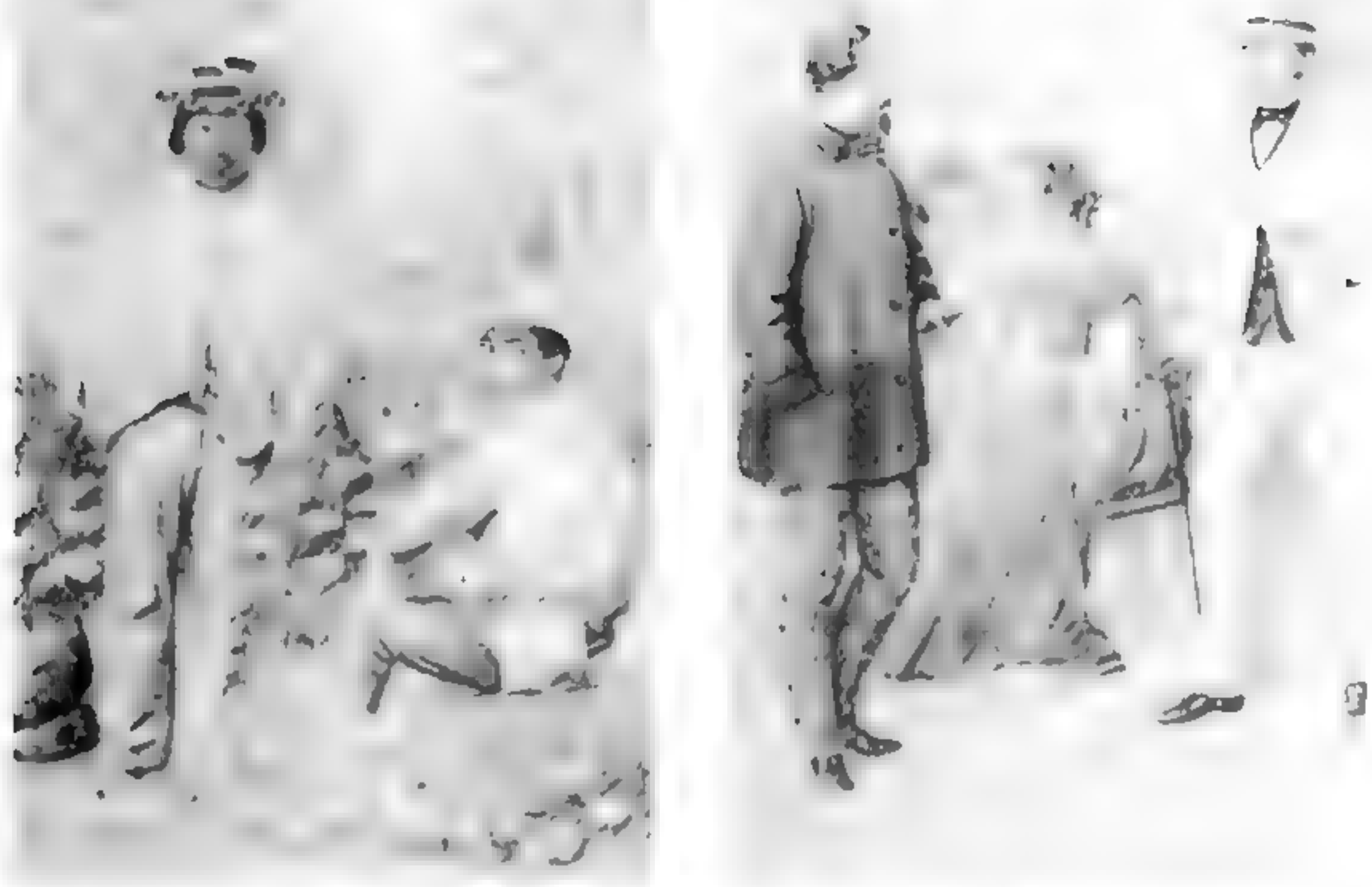
在共和国治下,衣着是社会地位的重要象征,这点同殖民地时期是一样的。奥顿写道:“在基多没有一个绅士会穿着斗篷上街,因而市民被分为穿斗篷的人和穿外衣的绅士。”更甚者可以从衣着来区分不同政治派别的追随者。在罗萨斯管辖下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城,当

“成为加乌乔的主要成员时，即被称为“穿夹克的人”，形成对比的加乌乔精英是中央集权派自由主义者，胡斯托·何塞·德乌尔基（Justo José Urquiza）是罗萨斯的征服者，在他的加乌乔人军队中，萨米恩托（Sarmiento）是唯一穿着呈欧洲风格的阿根廷官员，在挂上勋章、成为加乌乔人中，他的教士服和平顶帽显得尤为怪异”。约翰·林肯（John Lynch）写道：“对萨米恩托来说，这只是原则问题，是对罗萨斯的反对，反对罗萨斯，反对其考迪罗主义的抗议……加乌乔人要求不改变阿根廷军队的军装，我们就一定会有自己的考迪罗’。”

19 世纪末，欧洲样式在大城市除去本土人在外的所有人中取得优势，成为布宜诺斯艾利斯和布宜诺斯艾利斯。对服装的态度仍然反映社会等级，并将轻视手工劳动表现得淋漓尽致。例如，19 至 20 世纪之交，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穿工人短上衣的人被禁止进入银行和国会大厦。约翰·斯科比（James Scobie）所述：“所有人均试图掩盖其手工劳动者之间联系的事实”甚至工人本身也倾向穿戴传统的外衣和领带。

1850 年，欧洲移民蜂拥入阿根廷、乌拉圭和巴西，同时较少一部分人选择移民到其他国家，比如智利和墨西哥。结合城市化不断发展以及出口部门的持续扩张，外来移民加速了社会变化。这些发展有助于形成一个较少的现代工业工人阶级，并增加了蓝领和中产阶级白领工人总数。

除少量的工人阶级接受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或者工会组织主义学说之外，移民并未威胁到现存社会结构以及占主导地位的贵族思想意识，相反许多移民按现存观点同化。能进入上层社会的外国人通常是受过教育或者管理阶层人士。从中产阶级移民出身到融入上层社会的过程极其困难，并且发生比较少，而对下层社会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少数移民通过贸易往来或者投机生意创造财富。他们的子辈和孙辈一直坚持掩盖财富的来源，通过投资土地使其看起来更加体面。这些新生代富豪同他们的贵族伙伴一样对当地人和工人表现出极度轻蔑。



这两幅图分别描绘了哥伦比亚的梅斯蒂索人农夫和一些上流社会的人物,有力地表明,在 19 世纪的拉丁美洲,服装的已分识别作用仍然非常明显。

独立并没有使女性的地位发生任何变化。事实上,由于资产阶级式的法典增强了丈夫对妻子财产的控制权,女性的公民地位可能进一步恶化。女性陷入更多来自家庭的羁绊,并且一直被教会和父母灌输顺从、温柔和没有私欲的观念。

两性之间任何关系均以父权观念为主,其中较为典型的是哥伦比亚人马里亚诺·奥斯皮纳·罗德里格斯(Mariano Ospina Rodriguez) 1864 年在女儿玛丽亚同何塞·马里亚诺·罗迈·巴特雷斯(José Mariano Romay Batres)新婚前夜给女儿一封信中的建议:“你的幸福取决于是否真诚、始终如一谨守这些美德:谦卑、耐心、顺从、克制……而维护家庭关系的恰当行为亦是以上述基督教美德为标准。”

马里亚诺·奥斯皮纳继续告诫女儿:“你的首要职责是留心查看丈夫的爱好、习惯和嗜好,以便做到永远不与其相抵触。不管在你看来有多重要,永远不要试图强加你自己的意愿,或者让他放弃自己的习惯或

者爱好；相反，只有这样他才可以不受打扰的情况下保持这些东西……通常，你会发现自己有与他不同的习惯和喜好，但永远要毫不犹豫地牺牲自己取悦于丈夫。”这种双向标准的性行为十分盛行；教导女性克制性欲，认为生育是性交的唯一目的。但女性的实际行为不必完全遵守法律和思想意识。例如，西尔维亚·阿罗姆(Silvia Arrom)的行为表明，这些限制未能阻止 19 世纪初期墨西哥女性搞婚外情。

然而，整个 19 世纪拉丁美洲精英阶级女性，如女权主义者、社会主义先驱弗洛拉·特里斯坦(Flora Tristan, 1803—1844)，就大大偏离了正当行为的权限。她是秘鲁贵族庄园主的女儿，同时是一名法国母亲，大部分时间生活在法国，被视为一位秘鲁女权及社会主义者。她容貌出众，具有非凡的文学才华，活跃于法国女权及社会主义界内。1835 年，她出版了一本小说《道德》，书中提到基于社会主义和女权主义行为准则的社会过渡；1840 年，又出版了《伦敦漫步》，书中主要描述英国社会中心巨大的贫富差距。在最后一本书《工人联盟》(1844)中，她号召“世界上的男性工人和女性工人”联合起来，这同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提的相比早了四年。特里斯坦清楚地识别出被社会性别化了的受剥削阶级。她写道：“受压迫最深的男性还可以压榨自己的妻子，因此女性是最下层阶级中的下层阶级。”她还通过论证“妇女解放是男性解放的必要条件”，预先构想 20 世纪的女权主义理论。

独立后上半世纪的民主自由运动刺激了一些有利于女性的发展。萨米恩托写道：“在阿根廷，人类的文明水平可以通过女性的社会地位来衡量”；他的教育规划将女性的主要的角色设定为小学老师。在墨西哥，革新运动成功后，颁布了新学校法令，法令号召为女孩设立中学以及培训小学教师的师范学校。1870 年后，这两个国家均出现小规模的女权主义运动，大部分由学校老师组成，他们组建社团、编辑报刊，为女性文化、经济和社会进步服务。

即使在奴隶制度趋于衰退的社会，如巴西，胡安娜·保拉·曼索·德诺英哈(Joana Paula Manso de Noronha)创办了一份女性权利报刊，她在力：太太杂志(*Jornal das Senhoras*)(1852)写的社论中对自己从

事社会改进以及妇女精神解放工作的目的进行了等待。19世纪末,随着工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工厂和血汗工厂,并按男性工人工资的一半领取薪酬,这成为资本主义雇佣者超额利润的一大来源。到1887年,据统计,在布宜诺斯艾利斯39%有酬全工作的劳动力由女性组成。

在一些国家,由于许多教士在独立战争期间的保王主义态度,使得教会丧失了名誉,并在同外面世界以及新思潮有更多接触后更进一步衰退。在许多国家,教会在教育、婚姻、葬礼及类似方面进行限制,而自由主义者通过取得的各种成功向其专制统治施加压力。由于教会一直坚持同保守派结盟,自由主义者的胜利便意味着对其积累的财富以及特权,以猛烈打击的形式进行报复。

垄断性宗教团体的殖民地准则,很早就被允许自由礼拜声高权重的英国商人的需要所粉碎。事实上,保守的罗萨斯不喜欢外国人,他在阿根廷重新恢复耶稣会,并捐献布宜诺斯艾利斯第一个圣公会所在地的地产。尽管一些狂热教士刺激民众反对外来异教徒,基于双方友好互惠的原则,天主教徒同反对者和平共处的体制得以逐渐形成。

宗教裁判所泛滥所招致的信徒们的厌恶,在独立战争期间消失了。然而,在许多国家,政府仍有权对颠覆性的异端作品进行审查或查封。政府不定期行使这项权利。19世纪20年代,教士及保守派反对势力向哥伦比亚自由派副总统弗朗西斯科·德保拉·桑坦德(Francisco de Paula Santander)施加压力,迫使他授权法学院停止使用唯物主义者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的书作为教材。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罗萨斯公开烧毁颠覆性的书及其相关资料。然而,据图略·霍尔珀林(Tulio Halperin)所述,布宜诺斯艾利斯书商的出版广告表明这种镇压是一种极其无效的手段。19世纪40年代,在圣地亚哥弗朗西斯科·比尔瓦奥(Francisco Bilbao)反对西班牙和天主教的激烈论坛被政府刽子手焚烧。然而,据萨米恩托所说,招致这种后果的不是比尔瓦奥书中的内容而是其粗暴刺耳的口吻;比尔瓦奥只是因为蠢笨受到惩罚。

19世纪中叶后,实证主义登上历史舞台,它将崇尚科学反对神学

作为通向教育普及之路,力求在许多国家减少甚至完全避免禁止发表异端思想或者反教权作品的事件。总体上看,19 世纪下半叶拉丁美洲存在一个相对自由的思想市场。所谓自由,即只要这些想法是用理论形式表达,或者同国家其他部分有基本联系,而没有直接反对现任政权。甚至像智利那样,对有关安全威胁内容的报纸或者宣传手册进行迅速查封或者没收,当局也不在意包含最大胆社会理论书籍的发行量。举实例而言,1850 年墨西哥墨西哥实行独裁统治,对涉嫌敌对的新闻工作者及报纸进行打击,但是,也许自由买卖发行马克思以及无政府主义理论家彼得·克鲁泡特金(Peter Kropotkin)的著作。

独立后的大众教育,使得教会在影响力 and 权力方面遭受进一步衰退。但是,天主教教会和天主教社会导致一种强烈支持教士行为的产生,其代表人物是加夫列尔·加西亚·莫雷诺(Gabriel Garcia Moreno)为代表,他在 1830 年至 1845 年统治厄瓜多尔。拉斐尔·努涅斯(Rafael Nunez)于 1850 年至 1855 年统治哥伦比亚实行独裁统治,他同梵蒂冈起草了一份宗教条约,使得天主教会在殖民地时期享有的大部分特权。但是这样的条约未能阻止教会在知识界中社会 and 知识影响的全面衰退。反教权主义成为大多数拉丁美洲知识分子和大部分其他上中层社会男性(包括那些虔诚礼拜者但蔑视教会外在形式和宗教仪式的人)的思想意识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是教会对所有阶层的女性、土著人和贫苦群体仍有普遍的影响。

独立后,由于欧洲预期流入的大量外资未兑现,而且欧洲对拉丁美洲产品的需求也低于期望值,最初的经济生活处于停滞状态,一些地方手工业行业已经遭廉价欧洲工厂所制进口产品摧毁殆尽,因而自由贸易带动海岸地区商业活动增长的份额几乎也被前者抵消。经济活动步伐缓慢以及区内贸易和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市场相对匮乏助长了地方经济自给自足、孤立,政治不稳定,甚至混乱的状态。

由于上述因素,对许多拉丁美洲国家来说,19 世纪 20 至 70 年代是一个暴力时代;是一个独裁交替的时代;是开展集体的后殖民斗争与构建与众不同的国民身份的革命时代。其标志便是考迪罗(caudillo,

铁腕人物),它诞生在此为基础,而不是一种国家制度。地区最高考迪罗通常在稍低级别各地区的考迪罗联合协助下管理国家事务。考迪罗们不管怎样,都表现出赞同共和思想及制度。被贴上“保守派”和“自由党”、“集权派”和“联邦派”标签的各个政党,活跃于大部分新成立的州。保守主义的大部分支持力量则来自大庄园主和城市中的同盟者。而自由主义者通常有地方庄园主、专业人士以及非他们过去曾享有较小权力并满足于现存秩序的群体。通常,保守主义者试图保留殖民地时期的社会安排,并对高度中央集权的政府情有独钟。大多数情况下,自由主义者受美国榜样的鼓舞,他们提倡联邦制政府,保护公民权利、政治教育管制并终止教士和军队享有特权。没有哪一个政党关心解决农民和下层社会群体所面临的问题。

欧洲工业革命大约于1870年开始加速发展,刺激了拉丁美洲政治更快发展。涌入拉美地区的欧洲资金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而这正是为满足扩展商品贸易以及实现现代化的需要。不同国家经济发展的速度和程度是不一样时,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本国制造业和自然资源。

极度片面是新经济秩序的主要特征。单一产品成为国家的主要出口,使得这些商品在世界市场需求和价格波动面前极为脆弱。相比之下,由于劳动力和土地向其他行业转移而衰退,其他部门则多亏经济停滞不前。

19世纪末期,发展新增了两个特点:其中最重要的出现在土地租佃和劳动力庄园制度结构内部,并伴随外商对该地区自然和人造资源的控制而稳固增长。到1900年,随着英国和随后的美国取代西班牙和葡萄牙在拉丁美洲地区处于统治地位,出现了最终被称作新殖民主义的新依附结构或殖民主义。

新经济秩序需要和平和政府的持续,事实上,1870年以后拉丁美洲政治条件向更加稳固的方向发展。保守党采纳实证主义者所坚持的科学和进步思想,使得旧政党统一战线彻底瓦解;而自由党不再关注宪法方法和公民自由,开始热衷于物质财富。新型自由主义领袖的出现标志着发财政治的形成,其中包括墨西哥的波菲里奥·迪亚斯,哥伦比亚

（巴拉圭的何塞·罗萨斯和委内瑞拉的安东尼奥·古斯曼·布兰科（Antonio Guzmán Blanco）。独裁和革命仍在许多地方循环，只是革命发生的频率和毁坏性均有所下降。

1820 至 1900 年期间拉丁美洲政治经济历史的主要趋势伴随拉丁美洲生活和文化方式等方面的变化而变化。第二部分主要介绍 19 世纪墨西哥、阿根廷、智利、巴西、秘鲁、古巴、中美洲联合省以及大哥伦比亚的简短历史。所有这些历史包含了那个时代的拉丁美洲国家普遍存在的历史，但是每项历史各不相同，各自都反映出为确定国家而发起的独特斗争。

第九章 非殖民化进程和寻求国家身份(1821 — 1870)

焦点问题：

- 独立战争对土地贵族、军事和对外依赖等方面有何影响？
- 什么是考迪罗主义下的经济和社会？
- 19 世纪早期，拉丁美洲自由派与保守派之间的主要差异是什么？
- 墨西哥自由主义思想发生了怎样的改变？
- 19 世纪早期巴拉圭的发展与阿根廷有何不同？
- 外国干预和阶级、种族间的冲突对 19 世纪早期中美洲地区的民族身份认同产生了何种影响？

独立并没有给拉丁美洲的解放者们带来他们所期望的有秩序的自由和繁荣。在绝大多数新兴独立国家中，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统治终于结束，接着却是数十年的内乱。许多爱国领导者开始醒悟了，玻利瓦尔就是其中之一，他在 1829 年写道：“在美洲根本没有信任可言，在美洲各国也如此。条约就是一堆废纸，宪法只是书面的东西，选举如同战争，自由就是无政府主义，生命是一种折磨。”拉美的停滞不前和社会混乱与英国前殖民地——美国的迅速进步形成鲜明对比，这进一步加剧了一些拉美国家领导者和知识分子的悲观和自我怀疑情绪。

独立成果

旧有的期望破灭了;随之,争取解放的斗争也开始了。因为独立并未带来摧毁殖民模式的经济和社会上的改变,除了西班牙和葡萄牙贸易垄断的终止,殖民经济和社会结构仍完好无损。西葡大庄园、大农场、大地主们,运用旧时的技术,雇佣大量苦工和奴隶,继续控制着农业;农民阶级并没有被号召起来挑战大地主的经济政治特权。确实,战争虽然摧毁了西班牙殖民机构——总督、监政官和检审官;削弱了人们对于一个中央权威机构的根深蒂固心理,但却增强了贵族的声望。相反,其他拉美精英——商人阶层,随着大量保王派商人被驱逐或是移民,力量大量削弱;矿主遭受了战争的摧残或是其财产被没收;命运;教会,尤其是高级,以前经常支持西班牙殖民统治,现在却在冲突中挣扎,力量减弱。

由于其他因素有影响,还由于革命军官地位的提高,贵族统治阶级失去了军事精英的权威,这些军事精英曾因战争胜利而获桂冠加冕。在数年的战争中最和战争后的社会不稳定,新独立国家加速了军事化过程,以确保统治集团的统治地位。现役部队通常消耗国家财政支出的一半以上,且人数不断增长。军官由于不满足于充当维持社会秩序和国家安全的角色,而变成政治纠纷的独裁者,所做的决定通常代表的是与保守的国王和大地主有密切联系的城市精英的利益。

经济停滞

独立领导人本期望随着西班牙商业垄断的结束,对外贸易会得到扩大,以援助和恢复国内经济。事实上,对于在自然资源或是地理位置上有优势的一些国家,比如巴西(咖啡和蔗糖)、阿根廷(皮革)和智利(金属和皮革),它们能迅速从革命危机中恢复过来,在经济上稳步发展;但对于其他的一些国家,比如墨西哥、玻利维亚和秘鲁,由于它们的采矿业遭到致命的打击,不能恢复到殖民时期的生产水平。

19世纪早期,经济停滞不前,这使许多新兴国家受困,这是由几大

因素所造成的。国家独立并没有带来土地和收入的再分配，与土地和收入的再分配本可以刺激国内市场和生产力的增长。也没有引进大量外国资本——一部分原因既是政治混乱使外国投资受阻，一部分是因为那时欧洲和美国正投资国内的工业革命，而没有什么资本输出。拉美主要产品的出口仍然低于墨西哥，因为欧洲仍主要视拉美为其制成品，尤其是英国纺织品的倾销地。廉价欧洲工业制成品的大量涌入损害了本土的手工业，耗尽了新国家的金银储备，由此产生了长期的贸易不平衡问题。控制拉美市场的英国人进一步削弱了无法和他们竞争的本地商业阶层。直到19世纪中叶，从墨西哥城到圣多明各艾马斯再到瓦尔帕莱索，最富有最豪华的意大利里都是英国人的。尽管如此，伊比利亚商人仍继续控制着许多区域的省市的零售贸易。

总体来讲，以上的发展状况阻碍了本国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却加强了大庄园主在经济和政治生活中的统治地位。国内道路的缺少和交通运输的自然阻隔（如丛林和火山）加剧了拉美国家内部的经济停滞，从而也加剧了地区主义倾向和增强了大小考迪罗在地区的统治地位，这些头目通常是本区域的大地主。经济活动的停滞不前鼓励和促使这些头目雇佣私人的苦工和仆人在全国范围的政治斗争和革命中充当棋子。确实，政治斗争和革命在一些国家已成为经济活动的一种方式，以此来弥补其他机会的缺乏，因为赢家会控制所有重要的海关机构（征收进出口税）和其他的国家税务来源，从而为他们自己和忠于他们的人谋得政府工作、合同、土地和另一些利益。精英分子把依靠政治和军事活动作为一种职业，把海关作为政府税收的来源会造成两种消极的结果。一种是军事和官僚机构臃肿加剧，进而经常挪用经济发展的资源；另一种就是对国外贸易的依赖性倾向加强。

政治：保守派和自由派的方案

新国家的政治制度对19世纪的自由主义思想作出了很大的形式上的认可。除巴西外，所有新独立国家都采用了共和政府的形式（墨西哥有两次帝国统治的时间间隔），并推崇议会和代议制政府。它们的宪

也适用于整个社会、法院；也对个人权利的维护做了详尽的阐述。

然而，这些具有现代特征的表面工程却没能能够掩盖它们背后的独裁和寡头政治的现实。具有代表性的是，无论宪法是怎样规定的，实际的行政长官都是依靠武力夺取权力的考迪罗；通常，他的统治得自于大小考迪罗联盟的支持，这些小考迪罗在自己的属地都是处于最高地位，司法和立法部门的独立都是虚的。一般来说，选举都是一次徒劳的活动，因为执政克通常会拉票，而反对党除了反抗引无选择。

文法和财产数量的多少剥夺了绝大多数人民和混血人的选举权利，即使他们有选举权，赞助者经常会迫使他们为他或是他的候选人投票。有名投票运用不够（选举通常是公开的，用的是彩色选票，迫使选票落到某一边）。无论是自由党还是保守党，他们都一致同意，一方面使农民、牛仔和另外一些更低层次的人处于政治生活的边缘，以阻碍他们参与政治；另一方面防止他们这些人组成有思想、有目的某些团体。1830年，为克里奥耳宪法和其他法律条款规定本土居民在法律上人人平等，本土居民有划分和处理公共土地的权力，这样就导致了土著人、克里奥耳人和反殖克里奥耳人世界的个人主义竞争能力。但是，处于边缘群体中的尤其是那些有智慧的、有野心的、很幸运的成员有道德被吸进克里奥耳人精英集团，其中一些还成为了最为本国的领导人，有两个例子，一个是墨西哥的萨巴特克·贝尼托·华雷斯，另一个是智利著名的混血总统安托列斯·圣·克鲁斯。

乍一看，在独立后的半个世纪里，拉美的政治历史就是上演着一部漫长的独裁政治和叛乱轮番上演的历史剧，看似毫无意义和微不足道了。但是，这时期的政治斗争不仅仅是上层之间争斗利益的斗争，不同阶层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差异性导致了这些冲突的发生，也造成了失败一方的痛苦。各个党派都为自己贴上所谓的“保守”、“自由”、“集权”和“联邦”的标签，但有些领导人非常机会主义地给自己贴上某些标签，并很快又把这些标签拿下来。

大体说来，保守派代表的是传统的权力拥有者、权威和想维持现存

制度的人的利益。因此,大地主、上层教士、高级军官和大官僚还有商业垄断集团都倾向于保守党。相反,自由党代表的是在殖民时期很少或者是根本没有经济政治权力的这些群体的利益。他们自然渴望改变现有的制度。因此,自由党得到了来自各大省市的地主、律师和其他专业人才(这些群体都乐于接受新的思想)、军官,还有农民的支持。自由主义思想也吸引了有野心有激情的土著人和混血人。但是,地区冲突和家族冲突抹掉了他们的差异性,使政治形势复杂化。

自由派想要瓦解滋生于殖民时期的官僚社会结构,他们想依样照美模式建立一个以中产阶级为主的国家。受到美国这一成功例子的鼓舞,自由派通常倾向于建立一个能维护个人权利的,能控制教育领域的联邦政府,这也就意味着教会和军事独裁统治的终止。他们具有现代热情,有时还呼吁要废除、拆毁女修道院,没收教会财产,要求农奴制。自由派的联邦主义思想对新国家的一线地区也有很大的吸引力,因为它们渴望拥有开发自己资源的权力,免受资本家和其他沿海地区对它们的控制。

而保守派坚持建立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政府,确立罗马天主教会对宗教和教育的垄断以及教士和军官的特殊权威。他们对类似于言论自由、出版和宗教自由等这些新事物充满不信任。简而言之,保守派想要寻求和挽回能和新生共和制度相调和的殖民秩序。事实上,一些国家的保守派已对共和制失去信心,梦想着要建立一个绝对君主政权。

无论是保守派还是自由派,他们都不在乎土著居民、黑人和混血人的利益。在大多数拉美国家,这些人却占据人口的绝大部分。自由派不能容忍土著民族的落后状况,认为他们的集团主义阻碍了资本主义企业的发展,侵犯了公共土地分配政策的合法性——以牺牲土著人利益而使地主受益的一项政策。尽管自由派在理论上是维护小地主和农村中产阶级的利益,但是他们却不愿意实行任何一项彻底的土地改革。而保守派则视大地产为其权力的基石。作为传统主义者,他们有时呼吁继续执行西班牙式的对土著居民的殖民政策。

对独立后，一个世纪里的拉美保守党派和自由党派特征的这种概括，无疑地涵盖了保守派和自由派在制度和理论上的变迁，这些变迁适应了不同国家不同的国情。下面对墨西哥、阿根廷、智利和中美联合王国等国的探讨，不仅仅揭示了这一共同主题，也揭示了政治生活的多样性。

墨西哥

墨西哥独立战争是由激进的教士伊达尔哥和莫雷洛斯领导，最终由安东尼奥·洛佩斯·德·索托马约尔领导获得胜利。他领导一个由克里奥人、土著人、保丁和土组成的联盟。这些人对1812年重新确立的宪法深感担忧。在这些保守派支持下所获得的独立，并不意味着经济和社会模式不会有什么改变。确切地说，由伊达尔哥发起的起义至少对墨西哥的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有短期的影响。例如，约翰·立托指出，巴伊奥叛乱摧毁了大庄园生产，大庄园主有当价格回涨和玉米有飙升时，才把一直储存的玉米拿出来卖，从而获得暴利。叛乱也改变了雇用牧场工人生产的方式，这种生产方式使生产规模最大化，这在半个世纪里“不仅为农村生产玉米的生产，也为城市工业消费者带来真正而持久的利益”。同样，弗洛伦西奥·马龙和彼得·雷诺强调受欢迎的农村和城市团体应参与墨西哥19世纪的政治斗争，这反映了他们对墨西哥国家的形成和农民觉醒有长期的影响。

尽管如此，大庄园主仍继续控制着许多区域的农村地区。尽管土著农民努力保留大量公共土地，随着西班牙殖民统治结束，他们的经济和政治地位也有某些改善。但是由于西班牙保护性法律失效，侵占本地人的土地倾向越来越严重。依附于大庄园的苦工和佃户经常遭受债务奴役、低工资待遇、高租金、高宗教费的压迫。在1856至1857年的宪法公约中，自由主义者庞西安诺·阿里亚加(Ponciano Arriaga)宣称：

除了少数例外，墨西哥富有的地主们……都如同中世纪的封

建领主。在他的庄园土地上多多少少已形成了惯例：地主制定并执行法律，行使司法和民事权力，征收税款和罚金，自己拥有监狱和刑具，自行施加惩罚和打骂，垄断商业，禁止经营不被他允许的任何生意，除非是为庄园攫取土地。

一位当代匿名作家写到了土土独，即下层阶级幻想破灭的情况：“独立有名无实。以前他们是通过西班牙来统治我们，现在是通过这些方式来统治我们。剥削依然存在。衣食住行没有任何变化。”

墨西哥经济

战争的蹂躏使煤矿、开园荒废，经济停滞甚至倒退。尽管西班牙金融垄断的结束带来了外贸大规模增长，驶进墨西哥港的船只从1823年的148艘猛增到1826年的639艘，但是出口没有跟上进口的步伐，所导致的贸易赤字不得不利用出口贵重金属来弥补。金银的外流加剧了新政府各方面的矛盾，新政府一开始接手的就是一个亏空的国库，所以它不得不支持臃肿的官僚和军官阶层，而这些阶层反对任何建议减少他们人数和工资的政府。西班牙商人和其资本的外流使新政府的经济更为困难。战争遗留下的社会混乱又使这些问题进一步复杂化；抢劫团伙时常危及行人的安全，以至于无论是去普埃布罗或韦拉克鲁斯还是从那里回来，墨西哥城的游客都有可能在路上遭抢劫。

外国贷款看起来是摆脱危机的唯一出路。1824至1825年间，英国银行向墨西哥贷款达到3200万比索，以墨西哥海关关税做担保。但是墨西哥只得到仅仅1100万比索，因为在贷款到期之前，高额的贷款利息已使墨西哥银行走向破产。到1843年为止，所欠的利息和本金使外债高达5400万比索。债台高筑不仅仅造成沉重的利息负担，而且也危及墨西哥独立和领土完整，因为外国政府可能因墨西哥违约而进行干涉。

尽管主要来自英国的投资能对经济起决定作用的采矿业部分恢复，使战争时期废弃的、损害的旧矿产重新开业，但是，可用的资金不充

，建炉技术更是比预期更严重，产量仍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

1824年阿维奥银行建立，为工业发展提供政府援助。这刺激了墨西哥的复兴与现代化进程。手工业，主要是纺织业在独立后30年已取得了有限的进步。主要的工业中心包括墨西哥城、普埃布拉、瓜达拉哈拉、杜兰戈和韦拉克鲁斯。但由于资金短缺，没有一个相应的保护手工业的政策，以及社会经济结构严格限制了国内市场的发展，这严重阻碍了墨西哥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到1843年为止，阿维奥银行几乎完全不得不关闭。这样一来，墨西哥的经济仍继续依赖采矿和农业。墨西哥主要的出口产品是贵金属，尤其是银，还有诸如土布、烟草、棉布、皮革等（用于制绳的一种植物纤维）的农业产品。而进口的产品之一是工业无法制造的工业制成品。

政治：自由派和保守派

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的分歧冲突充斥着墨西哥独立后半个世纪的政治生活。1821年9月27日，前起义军领导人，“解放者”伊图尔维德与两位起义军领袖、坚定的共和主义者和自由派人士比森特·格雷罗（共和党人士）和瓜达卢佩·维多利亚（自由党人士）肩并肩地进入墨西哥城，宣告墨西哥独立。政治冲突从此开始。1823年，伊图尔维德被迫退位，这就为共和制的建立扫清了道路。但很明显的是，共和派又迅速分成了自由派和保守派、联邦主义者和集权主义者。

1824年颁布的宪法是自由派和保守派相互妥协的产物。宪法规定19个州拥有征税的权力；一人有一票的选举权，总统和副总统每四年进行一次改选。这就满足了各省的经济利益集团，因为他们担心会出现一个高度集权政府，国家的立法机关是两院制的，一个上议院（参议院），一个下议院（众议院）。通过确保各省官僚的权力，联邦结构也满足了各省中产阶级的需求，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参与政治活动。但是这个宪法也带有保守主义的色彩：尽管教会失去了对教育的垄断地位，但天主教被规定为官方宗教，教堂和军队的特权（*fueros*）仍被保留。

独立战争的英雄、自由派领袖瓜达卢佩·维克托利亚被选为新宪法颁布后的第一任总统。为了维护国家统一，他把保守派人士卢卡斯·阿拉曼选进内阁。但是好日子不长，1825年阿拉曼被迫离开政府。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的分歧最终以对抗的形式出现，这反映了英美竞争对墨西哥所产生的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影响。由美国部长乔尔·罗伯茨·波因塞特创立的约克共济会支持自由派和联邦主义，波因塞特把美国作为自己改革的样板。而他的对手，由美国代亨利·沃德赞助的苏格兰共济会却支持保守派。保守派所代表的是旧时贵族、教会和军官，垄断商人和一些制造商的利益。它的发言人和组织者是阿拉曼，他是政治家，是一位从保守主义的角度描写墨西哥革命历史的作家。

自由派所代表的是克里奥尔人和混血人中的上层——大地主、专业人士、工匠、等级低下的教士和军官的利益，他们决定结束上层等级的特权和政治、经济权力的集中。既是牧师又是经济学家何塞·玛丽亚·路易斯·莫拉(José María Luis Mora)曾坚定地表达了自由派的立场。但自由党内出现了分化：温和派提倡改革循序渐进，有时也可以加入保守派；而正统派却提倡进行彻底的反封建、反教会改革。

在独立后的第一个十年里，每个派别都没有能稳固对整个国家的统治，但是在1833年，自由派取得了伟大的成就。总统瓦伦廷·戈麦斯·法里亚斯在莫拉的支持下，促使国会进行了一系列彻底的改革：废除军队和教会的特殊权力及豁免权，这意味着军官和教士必须服从法院的管辖，废除什一税，使墨西哥大学世俗化，减少军队，建立一个公共教学部门并组织民兵。通过中央政府来推动教育和经济的发展，自由派认为他们不是自由放任主义的追随者。

自由派的改革计划不可避免地遭到教士和保守派的反对。军官开始谋反；牧师宣称1833年的“霍乱”是神明不满自由派所作所为而进行惩罚的标志。这时，安东尼奥·洛佩斯·德圣塔·安娜将军(Antonio López de Santa Anna)，一位曾经支持自由派活动的老考迪罗，现在却

为了保守派谋反的领导人。他领导叛军攻占首都,将瓦伦丁·戈麦斯·阿图罗和乌里加尔驱逐境外。随后他当选总统,自己精心组建反动政府,颁布了1833年的改革法律,废除了1824年的宪法,并于1836年颁布了新的保守主义宪法,这部新宪法削弱了地方上的权力,所有部门都归中央政府控制;确定了上层阶级靠金钱的多少进入权力中心的制度;恢复了教会和军队。

1831至1854年,桑塔·安纳和保守派统治墨西哥长达20余年。桑塔·安纳的集权主义倾向,在于他把地方上的利益都集中到繁荣的人口密集的城市墨西哥城、普埃布拉和韦拉克鲁斯。他的集权主义倾向在1837年宪法中得以集中体现,关税法恢复了海关、销售税制、内陆海关和对外贸易。因此,从而确保了税收能源源不断地流入墨西哥城。

然而,桑塔·安纳对内陆和边界地区像墨西哥北部和尤卡坦的忽视使墨西哥在1850年被分裂。桑塔·安纳对地方自治权的损害使爱国主义者发动起义,反对桑塔·安纳的独裁统治,这也就促使以萨姆·休斯敦为前导的詹姆斯美国殖民主义势力开展活动。在尤卡坦,1841年的科苏战争既是一场反对保守派中央集权的地区战争,又是一场反对封建地主制度的战争。几乎有十年时间,尤卡坦从墨西哥分裂出来。

在美国于1845年吞并了得克萨斯之后,北美侵略墨西哥战争即墨西哥战争(1846—1848)是保守派的另一场灾难。战争爆发的直接原因是美国和墨西哥在得克萨斯边境的一次冲突,但爆发的决定性因素还是美国波尔克政府决定吞并加利福尼亚和新墨西哥。战争以墨西哥失败而结束,这主要是因为保守派不愿调动农民军队反对美国侵略,还有统治者一味妥协,匆忙结束战争。墨西哥历史学家曾说:“墨西哥政府宁愿与美国签订条约也不愿危及统治阶级的利益。”墨西哥于1848年与美签订了《瓜达卢佩·伊达尔戈条约》,使墨西哥丧失了近一半的领土,包括得克萨斯、加利福尼亚和新墨西哥州,美国仅仅付给墨西哥1500万美元作为补偿。

但是,自由派领导人,包括贝尼托·华雷斯、梅尔乔·奥坎波和庞

西亚诺·阿里亚加继续进行反抗。奥坎波呼吁：“让人们认为，他们能保卫自己。”在一些地区，农民起义频发，他们一方面反对大庄园体制，呼吁改革，一方面继续反对侵略者。国会反对派成员起来反对条约的批准，要求战争继续。自由派人士曼努埃尔·德雷洪(Manuel Regén)在他的“评论瓜达卢佩·伊达尔戈条约”中说，这个条约意味着美国对墨西哥的经济控制。他预测新的边界将会让美国的全境更接近墨西哥心脏，这会导致墨西哥的美国化；他还论述：“我们不能够在自由的市场上和美国进行竞争……条约宣判了我们的死刑。”最终，依靠美国最盛的种族主义观点，他怀疑被割让区域的墨西哥公民是否。如条约中自许诺的那样，他们的政治和财产权利会受到保护。

曼努埃尔·雷洪对被割让区域墨西哥公民处境的担心不久就变为现实。加利福尼亚淘金热导致英美淘金人袭击加利福尼亚本地人。来自洛杉矶的安东尼·科罗内尔(Antonio coronel)，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英美势力对本地人进行刺杀、勒索和滥用私刑，并视他们为外国入侵者，这在当地经常发生。”而原加州人的命运更为悲惨，因为他们根据1824年宪法被认为是真正的墨西哥公民。他们成为了并没有得到瓜达卢佩·伊达尔戈条约所承诺的保护，反而成了谋杀、奴役、土地掠夺、饥饿的受害者。在20年里，加州本地居民人口就减少了10万。理查德·格里斯沃尔德·德尔卡斯蒂略(Richard Griswold del Castillo)曾写道：“在描述加利福尼亚印第安人那段时期所发生的一切时，‘大屠杀’只不过是轻微的词罢了。”新墨西哥不再是个州，它变成了一块殖民地，西班牙后裔居民直到新墨西哥在1912年重获州章地位时才获得公民身份，本地民族直到1953年才拥有选举权利。

《瓜达卢佩·伊达尔戈条约》所规定的维护他们的土地权利并没有实现，为此墨西哥裔美国人表示极为不满，并宣称在割让区域的土地分配中存在严重缺陷。美国法院规定美国政府有继承完成土地确认进程的权力。在加州和新墨西哥州，这个规定使墨西哥裔美国地主承担了巨大的诉讼和法律费用，高借贷利率和牛肉价格下跌又使他们的境况急剧恶化，在土地确认进程中幸存的少数人受到来自“强盗们”的巨大

力,这些强盗主要是最富有最具影响力的英美人,他们强占土地,无不作恶。美国违反了《瓜达卢佩·伊达尔戈条约》中关于维护墨西哥人民和财产权利的条款,基于此,墨西哥人为重新获得所丧失的土地而进行坚决斗争,一直持续到现在。

改革,内战和法国干涉

保守党领导下的墨西哥遭受了巨大灾难,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反对独裁政策的浪潮,从而刺激了自由主义的复兴。1846年,在战争期间,自由派控制了瓦哈卡州和米却肯州,在米却肯,新的州长是梅尔塞·奥坎波,他是一位深受卢梭和法国乌托邦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学者和科学家。在米却肯,贝尼托·华雷斯任州长,他是一位出生于萨波特兰的律师,在州内,他以正直、高效率 and 民主简朴而闻名。

奥坎波和华雷斯是创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他们进行了一场名为改革的运动。像18世纪30年代的老套自由主义一样,改革寻求扫清墨西哥封建残余,废除资本主义。但是,它的思想比莫拉的贵族自由主义和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更为灵活。正统派像庞西亚诺·阿里亚加和伊格纳西奥·拉米雷斯(Ignacio Ramirez),他们超越了自由主义思想,攻击庄园体制,提倡保护劳工和妇女权利以及其他先进的思想。1853年,桑塔·安纳重新执政,对持异见的人进行大清洗,从而确立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威。这就刺激了反对势力的联合,包括许多不满的温和派和保守派。1854年初,旧自由主义首领胡安·阿尔瓦雷斯和温和派领导人伊格纳西奥·科蒙福特共同发出呼吁,制定了一个名为《阿尤特拉计划》的起义纲领。该计划要求结束独裁统治,召开一个起草新宪法的新国会。一年之内,桑塔·安娜被迫下台,一个正统派临时政府上台执政。阿尔瓦雷斯任临时总统,贝尼托·华雷斯任司法部长,米格尔·莱尔多·特哈达任财政大臣。

华雷斯一上台就发布一项法令,即《华雷斯法》,宣称把教会和军官的特权仅限于内部纪律事项。1856年由特哈达起草的《莱尔多法》对教会权力的物质基础(土地财富)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这项法律禁止教



墨西哥的何塞·克莱门蒂·奥罗斯科(José Clemente Orozco)在这幅名为《华雷斯的胜利》的画中,歌颂了墨西哥人民英勇抵抗法国的入侵,以及本尼托·华雷斯(Benito Juárez)的英明领导。画中描绘的是1862年11月13日的普埃布拉战役,此役中,普通的墨西哥平民纷纷自发组织起来,帮助武器不足、人数也处于劣势的墨西哥正规军,大胜法国的兵团。

会拥有不用于宗教意图的土地,佃户有买卖财产的权利。它也拍卖不动产给出价最高的人,同时要付给政府许多销售税。

法案意在产生一个农村中产阶级,但是它没有对教会地产的分配做任何规定,所以,大部分土地都落入国内和国外的地主、商人、资本家手中。更糟糕的是,除了用于土著居民的公共用途和公用牧场以外,法案禁止土著人拥有土地,规定以变卖教会财产相同的方式来变卖土地。结果,农村出现了许多抢夺土地的人,他们一方面向法院告发,一方面在拍卖会上购买土地。法律规定本地的业主有优先购买的机会,但是他们连最低的购买价格都付不起。当他们起来抗议和反抗的时候,特哈达却这样解释道,他颁布这项法案的意图就是公用土地应该在土著人中间划分,而不是卖给其他的人。但是又说:“印第安人群体的继续

存在是无法容忍的……”

特哈达也认为,那些租用土著人土地的人有权力进行购买。这样一来,结果就是,在1856年夏季和秋季,许多人失去了耕地和牧场地,他们主要是从这些土地获得收入,用来支付宗教仪式和公共用途的人。从1857至1867年这10年间,《莱尔多法》落实得非常缓慢,这是由于农民反抗,以及自由派在与保守派反革命势力和法国干涉势力的斗争中需要得到农民的广泛支持。自由派长期所倡导的农业政策迫使划归公共土地,这既为农场主甚至是一些小农和中农购买土地提供了便利,也加强了大土地体制,扩大了农村中产阶级的规模。

这时,温和自由派起草了1857年宪法,宣布公民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结社自由;限制教会;禁止教会和民营企业拥有土地;保护私有财产。它恢复了1824年的联邦构架,但是以一院制代替了两院制,并废除了高总统职位。但仍然出现了一些谴责土地垄断、劳役制和财富分配不均的不和谐声音。墨西哥诺·阿里亚加就是其中一个,他抱怨道:“我们宣扬我们的思想,却忽视了现实情况。”“一个饥寒交迫,倍感痛苦的民族怎样来实践我们所推崇的政府?我们仅在言语中谴责奴隶制,却没采取任何行动,实际上,我们的人民比古巴或是美国的黑奴过得更为凄惨。”尽管阿里亚加的语言很力诃,但他提出的解决方案却很温和:国家应该控制和拍卖未开垦的土地。立刻,保守反对派视阿里亚加的方案为“共产主义的”;所以温和的多数派秘密地在国会中通过了该宪法。

因为新宪法吸收了《华雷斯法》和《莱尔多法》,教会就公开宣布将宣誓效忠的公共官员开除教籍,开展政治斗争。反革命势力积聚了数月的力量。1857年,“三年改革战争”爆发。随着战争的进展,双方都消耗了巨大的财力,陷入了财政窘境。但是,保守派有教会支持的优势。1859年,华雷斯颁布改革法令,这项法令无偿没收教会财产,将其国有化,分了教会建筑;废除修道院;确立宗教自由,政教分离。

1860年中期,尽管保守派势力进行摧毁性袭击,但是战争的浪潮正朝着有利于自由派的方向发展。战争结束了,但是顽固势力仍在寻求国外的帮助。英国、法国和西班牙的保守派政府仇视墨西哥自由派和

华雷斯,更有甚者,他们寻找各种借口进行干涉,因为保守派和自由派都控制或损害了外国财产,外国股东叫嚣着要求赔偿,讨还债务,这三个欧洲国家也如此。了解到这些索赔是无中生有的后,华雷斯以国家贫穷而拒绝赔偿。1862年,上数三国毫无缘由地侵略和占领了韦拉克鲁斯,但法国拿破仑三世企图推翻自由党政府,建立一个由法国控制的傀儡政权,继续派出远征军同保守党残余势力勾结,攻占墨西哥大片国土;1863年7月,他宣布奥地利马克西米利安大公为墨西哥皇帝。

为了顺利迎接墨西哥新统治者的到来,法国军队从韦拉克鲁斯一直朝普埃布拉开进,在普埃布拉,法军遭到了墨西哥军队的顽强抵抗,损失严重。最后,法国仍迅速占领了许多主要城市,但是共和派游击队控制着国家大部分领土。

同时,保守派流亡势力代表团1861年为马克西米利安杜世进行了加冕,使其成为墨西哥皇帝。保守反动势力本指望马克西米利安帮助他们重获丢失的财富和权威,但是,马克西米利安考虑到现实情况,没有答应他们的要求。因为本土和外国的地主以及资本家购买土地可为他带来丰厚的利益。而且马克西米利安还极力争取温和自由派的支持。

这样一来,保守派和自由派的希望渺茫,也无法摆脱困境。马克西米利安军队的胜利并没有打击自由派反抗的信心,反而使国内人民更加仇视侵略者。倚仗墨西哥崎岖的地形,1865年,联合政府在与法国和保守反抗势力同盟斗争中取得胜利,并强烈要求法军撤离墨西哥——一个被美国国务卿威廉·西沃德视为美国政治和经济影响下的地区。那时法国国内面临着严重的国内和外交问题,拿破仑三世决定减少损失,终止其在墨西哥的征程。没有了墨西哥和法国同盟的帮助,马克西米利安和他主要的大臣——米拉蒙(Mirámón)和梅希亚(Mejía)因叛国罪被捕,被执行枪决。

战后改革

华雷斯,墨西哥抗击外国侵略势力的英雄,在1867年当选总统,恢复共和政权。他的政府所面临的是一个已被战争毁坏的国家。农业和

1810年,墨西哥出口低于1810年的出口水平。为了应对国内政变和海外军事控制的危险,华雷斯解散了2/3的军队,建立了宪兵制度,不过迅速被镇压。他把国家有限的资源用于公共教育的发展,尤其是初等学校的发展;到1874年为止,有8千所学校在运转,学生达到35万。

但是,墨西哥的农业政策旨在促进农村地区资本主义的发展,而牺牲广大村庄,不是以国王的利益为代价的。确实,1868—1876年,墨西哥通过迫使分割公共土地来努力实施《莱尔多土地法》,导致了土地私有化和抢夺土地的风气。结果就是农民在全墨西哥发动了多次起义,最严重的一次就发生在伊达尔戈州(1869—1870)。这些农民被斥责为“共产主义者”,国王国王在联邦军队的帮助下镇压了这些起义,恢复了秩序。有少数自由派表达抗议,但没引起任何一位总统,一个就是拉米雷斯,他谴责自由派的盗窃和抢夺土地的行为,并呼吁终止法律的实行。

迪亚斯在1876年再一次当选总统。他镇压了由革新战争英雄波萨达斯·迪亚斯领导的叛乱,因为迪亚斯指责华雷斯试图变成一个独裁者。迪亚斯第一任总统因病发作去世,继任总统的是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多·代·迪亚斯。他在1876年,迪亚斯在得克萨斯资本主义势力的帮助下,发动叛乱夺取了政权。

迪亚斯以改革者的名义就任总统。但事实是,他信奉实证主义的反革命思想,认为秩序和进步“在自由之上”。墨西哥资产阶级的意识转换反映了他们从一个支持革命的阶级变成了一个比旧的克里奥尔贵族更为残暴更为贪婪的统治阶级。那种独裁统治的残余迅速渗透到新统治阶级的各个方面。新旧富人的利益需要政治的稳定,被驯化的劳动力,局部改善和有助于外来投资的政治经济环境。迪亚斯的“体面专政”的使命就是达到上述的目标。

阿根廷

1816年,拉普拉塔代表大会宣布拉普拉塔河联合省独立。尽管如

此,“分裂”才能更恰当地描述拉普拉塔地区的政治形势,自克里奥尔人于1810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夺取政权起,原本统一的拉普拉塔总督就一直处于分裂状态。

巴拉圭、乌拉圭和上秘鲁的解放运动

巴拉圭第一个起来反对布宜诺斯艾利斯政权。在克里奥尔人让·巴蒂斯特·何塞·加斯帕尔·罗德里格斯·德·弗朗西亚独裁统治下,巴拉圭宣布自己独立。然后,弗朗西亚迅速将其进行封锁,不但巴拉圭同控制其通往海洋的河流渠道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上缴贡赋。弗朗西亚仅仅允许巴拉圭经由巴西与外界进行有限的许可式贸易,这也主要就是武器贸易。

弗朗西亚统治下的计划经济带来了一定的利益:对农产品的计划分配减少了出口作物如巴拉圭茶、土豆、蔗糖等的生产,从而确保了食物的充足供应,这样土著人及混血平民的健康也就有了保障。弗朗西亚制度一个很有趣的特征就是建立许多国营农场和牧场,这就使牲畜养殖非常专业化,从而终结了巴拉圭主要从阿根廷恩特雷里奥斯省进口畜类的依赖性。而在弗朗西亚统治下最遭殃的还是西班牙人(弗朗西亚利用各种手段对他们进行压迫和虐待)和克里奥尔贵族(受到严格监视和镇压)。

加乌乔人领袖何塞·阿蒂加斯也反对布宜诺斯艾利斯政权,领导乌拉圭脱离联合省,进行独立战争。1815年,布宜诺斯艾利斯洪达从蒙得维的亚撤退,把它交给了阿蒂加斯手中。随后,阿蒂加斯不仅仅保卫乌拉圭民族,而且进行社会改革。1815年,他宣布了一项计划,旨在把贵族土地分给农民,给黑人、土著民族、桑博人和贫困白人以优惠。但是这套方案没有机会得以实施。1817年,一支强大的巴西军队侵入乌拉圭,将其占领。直到1828年,英国不愿看见乌拉圭处于巴西或是阿根廷的统治之下,插手进行谈判,乌拉圭才获得独立。

拉普拉塔总督辖区北部山区一角的上秘鲁,在1810年后也想脱离布宜诺斯艾利斯政权。上秘鲁头三次斗争取得了胜利,但后来被西班牙势力打败。主要是因为本地人的无动于衷和不支持,当地克里奥尔

玻利瓦尔仍很衷心。直到1825年,玻利瓦尔的副手何塞·塞德·布克雷将军,才最终解放了秘鲁。苏克雷以解放者的名义将上秘鲁更名为玻利维亚,第二年,它在玻利瓦尔起草的一部复杂的、完全不切实际的宪法中开始了自己的独立生活。

争取进步和民族统一

各省区之间的纷争在图库曼成立的拉普拉塔联合省中滋生,危及国家统一。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富庶的港口将霸权强加在内部贫困地区,引起了内地的坚决抵抗。西班牙贸易垄断的结束为布宜诺斯艾利斯带来了丰厚的利益。虽然圣达菲、恩特雷里奥斯、科连特斯沿海各省份收入减少了,但是它们的肉类和皮革出口增加了,土地价格也上涨了。相反,那些曾受殖民垄断保护的酿酒业和纺织业却无法与更为便宜、质量更好的欧洲进口商品进行竞争,处于不利地位。

内陆各省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和原始工业,要求获得自主权,甚至获得独立,但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更希望建立一个由港口城市管辖的“自由贸易区”。这就是阿根廷集权派和联邦派斗争的导火索。到1829年,联邦派胜利:联合省分裂成许多独立的共和政权,其中内陆省份被考迪罗们控制了,所代表的是本地区统治阶级的利益,拥有自己的军队。

1821年,出现了统一运动的新浪潮。里瓦达维亚,一位充满激情的自由人,深受英国哲学家边沁的影响,发动了一场彻底的教育、社会和经济改革。他提倡初等教育,创立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废除封建势力和什一税,缩减修道院。里瓦达维亚了解工业和农业平衡发展的重要性,努力引进英国外资。但是,工业化的道路被证明是非常曲折的,效果甚微。所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牛群养殖,其范围迅速向南扩展。为了控制大量加乌乔牧人的流动,里瓦达维亚制定了流浪法,规定他们必须拥有护照,有农场主的书面许可,才能离开。

1822年,为了增加国家税收和产值,里瓦达维亚引进了永佃权制,它是一项旨在以固定的租金把公共土地划给承租人的计划。里瓦达维

在农业改革方面做了很多努力,但是,他没有限制转卖土地规模,也没有规定促进自给自足的具体措施。里瓦达维亚的土地政策吸引了许多本土和外国商人、政治家和军官,使他们加入了地产商行列。由此所产生的最终结果就是产生了一个新的、更强大的、更统一的力量,它是布亚进步思想实施阻碍的地主阶级,而不是小农阶级。

里瓦达维亚的方案还影响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省议会和国民议会;他希望建立一个统一的阿根廷,在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下促进整个国家的经济全面发展。1825年,在里瓦达维亚的倡导下,国民议会会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召开,会上起草了拉普拉塔联合省宪法。里瓦达维亚被推选为新国家的总统,并提出了将布宜诺斯艾利斯与港口联邦化的提案。



虽然他为自己精心塑造了亲民的形象,但胡安·曼努埃尔·罗萨斯(Juan Manuel Rosas)是一名富裕的农场主兼军事考迪罗,因此,其政策不可避免地要捍卫阿根廷有地贵族阶层的利益。

，就是说布宜诺斯艾利斯此后都将归属于整个国家，海关的所有税收也都用于提高整个国家的福利。

里瓦达维亚的这个建议反映了他的民族主义和他需要调动国家资源进行与巴西争夺乌拉圭的战争(1825—1828)。国会批准了他的议案，但是遭到内陆联邦派的反对，他们担心这会出现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削弱他们的力量，因此拒绝批准宪法，甚至要求他们的代表退出国会。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农场主们也站在联邦派的一边，因为他们根本不愿交出他们的特权，认为里瓦达维亚的社会经济改革就是一个愚蠢的阴谋。由于议会无法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1827年6月28日，里瓦达维亚被逐出官邸，后被流放。这项旨在完成国家统一的计划最终失败了。

派系斗争告一段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土地寡头拥护的联邦主义占了上风，联邦派人士罗萨斯在1829年成为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省长。1831年，他提出一个联邦协议：布宜诺斯艾利斯代表其他省份行使外交权力，在其他方面，各省有管理自己内部事务的权力。罗萨斯所定义的联邦主义就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继续拥有海关收入，继续控制贸易。罗萨斯与各省的寡头建立个人联盟，在武力的支持下，整治不服从指挥的领导人，以此来确保他控制内陆的独裁权力。

罗萨斯的长期执政颠覆了里瓦达维亚的政策。罗萨斯和他的地主统治阶级唯一所关心的经济问题就是皮革和腌肉的出口以及外国商品的进口。这个独裁者在1835年的关税法中提出保护麦子的种植和手工业，但是由于土地争夺和随后出现的牲畜养殖竞争，以及手工业的落后性，结果麦子的种植业和手工业都无法从法案中受益。罗萨斯自己是一个大农场主，也是腌制厂主。他发动讨伐南部印第安人的“荒漠远征”，抢占了土地，并以低价出售给地主。自此，里瓦达维亚所推行的国家拥有控制土地权被废除了。

尽管他声称要施惠给加乌乔人，但是却制定更严格的流浪法以防止他们过分强大，他将所谓的闲散人员安置在农场或是军队里。有些历史学家说罗萨斯代表乡村群众反对城市贵族，但这与他的话语是不

相符的。他担心农民反抗,便培养加乌乔牧人和城市工人来控制他们。他曾在一封信里写道:“我们都知道,被剥夺财产的人中已有人起来反对富人和有权力的人。所以……我认为应对这个阶层的人施加决定性的影响,控制和指引他们。”但是罗萨斯的“民粹主义”并没有改善无产者的处境。在罗萨斯的控制下,农场中的纪律非常严格,它无情地重复了殖民时期的拷打、鞭打、足枷、火烙等。罗萨斯的政府就是一个封建等级主体制,它建立在与人地主、军阀非正式结盟基础上的。

罗萨斯极力镇压反对派和潜在的异见者。为了执行独裁者的意志,他还建立了一个秘密组织——“玉米棒子队”。这个秘密组织与警察一起迫害和谋杀大量反对罗萨斯的人。所有的官方杂志和报纸的头条都写着“野蛮、肮脏的集权派去死吧!”的标语,甚至它都享有联邦主义的象征——红丝带。数千名反对分子已死逃往蒙特维的亚、智利、巴西或其他的避难地。

208

在罗萨斯的统治下,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商人和地主享受有繁荣,而这种繁荣并没有带来经济的增长;畜牧业和农业的技术非常落后,港口设施不完全。

同时,沿岸各省在畜牧业和农业方面却发展得更快,它们逐渐意识到罗萨斯所标榜的联邦主义不利于自己的发展,也意识到拉普拉塔河的自由航行制度能确保其繁荣。1852年,反罗萨斯势力形成联盟,并联合恩特里奥斯省省长乌尔基萨,共同打败了罗萨斯军队,推翻了其政权。

反罗萨斯战争的胜利没有结束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和其他省之间或者是联邦主义和集权主义之间的冲突。只有经济的发展才能融合统一的缓慢进程。取得布宜诺斯艾利斯领导权的流亡自由派和在恩特里奥斯的首领乌尔基萨(仍推崇联邦主义)之间出现了裂痕。为了追求现代化和进步,乌尔基萨建议建立一个松散的联盟,各省都能分享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关税。但是这样一来,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领导人担心乌尔基萨(他错误地被视为罗萨斯式的考迪罗)夺走自己的经济和政治权力。

巴尔基萨使用武力都没有迫使布宜诺斯艾利斯省接受统一计划,最后,双方同意和平分治。结果,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代表没有参加在1852年召开的圣菲制宪会议。

1853年宪法反映了一位新闻记者阿尔韦迪的思想,他曾写过一篇文章,里面把美国模式作为阿根廷政权的榜样。这部新宪法在某些方面,和美国宪法如出一辙。原先的联合省变成了一个联邦共和国,总统每六年为一任期,也就是说每六年举行一次总统选举。立法机构由参议院、众议院和众议院。天主教规定为国教,但是人民有宗教自由。各州有权选举自己的州长,组建自己的立法机关,拥有自己的法院,但是联邦政府有权干涉,包括武力干涉,来确保各州遵循宪法的规定。乌尔基萨被选为阿根廷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

保了根地一方势力曾是罗萨斯的最坚定支持者,现在却站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政权一边,拒绝接受1853年宪法,因为他们担心这会产生一个他们无法控制的国家。结果,阿根廷出现了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一个是自乌尔基萨组成的巴拉那政权,另一个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省。两个政权维持了五年的时间。在联邦政权的首都巴拉那,乌尔基萨极力鼓励地主垦殖,刺激经济增长,鼓励教育和移民,取得了不少进步,但是仍然落后于富有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在加强与欧洲国家贸易的基础上实现繁荣)。

为了增加收入,乌尔基萨与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展开了一场关税战:如果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已经支付了商品关税,在巴拉那河罗萨里奥港口卸载的商品还必须征收附加税。布宜诺斯艾利斯对驶往罗萨里奥的商船进行制裁,中断与巴拉那的所有经济活动。于是1859年,两个政权之间的战争终于爆发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省长巴托洛梅·米特雷率军打败了乌尔基萨政权,取得胜利。布宜诺斯艾利斯军事和经济上的优势,其他省份对其港口的依赖性,以及各方国家统一的意识增强,终于使各省达成了妥协。1862年召开的就是代表所有省的大会,最终达成了协议:布宜诺斯艾利斯为临时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关税国有化,附文就是其省里税收不应低于1859年的水平。杰出的历史学家、

诗人和政治家巴托洛梅·米特雷,被选为阿根廷统一国家的第一位总统。

统一后,米特雷在促进经济进步和巩固国家统一方面做了许多努力。正如协议中所承诺的那样,关税被国有化了;制定了首都联邦化的计划。连接布宜诺斯艾利斯和内陆省份的铁路和电话线建设也启动了,来自欧洲的移民越来越多;在建、公共学校方面也取得很大的进步。但是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耗时长耗资大的巴拉圭战争(1865—18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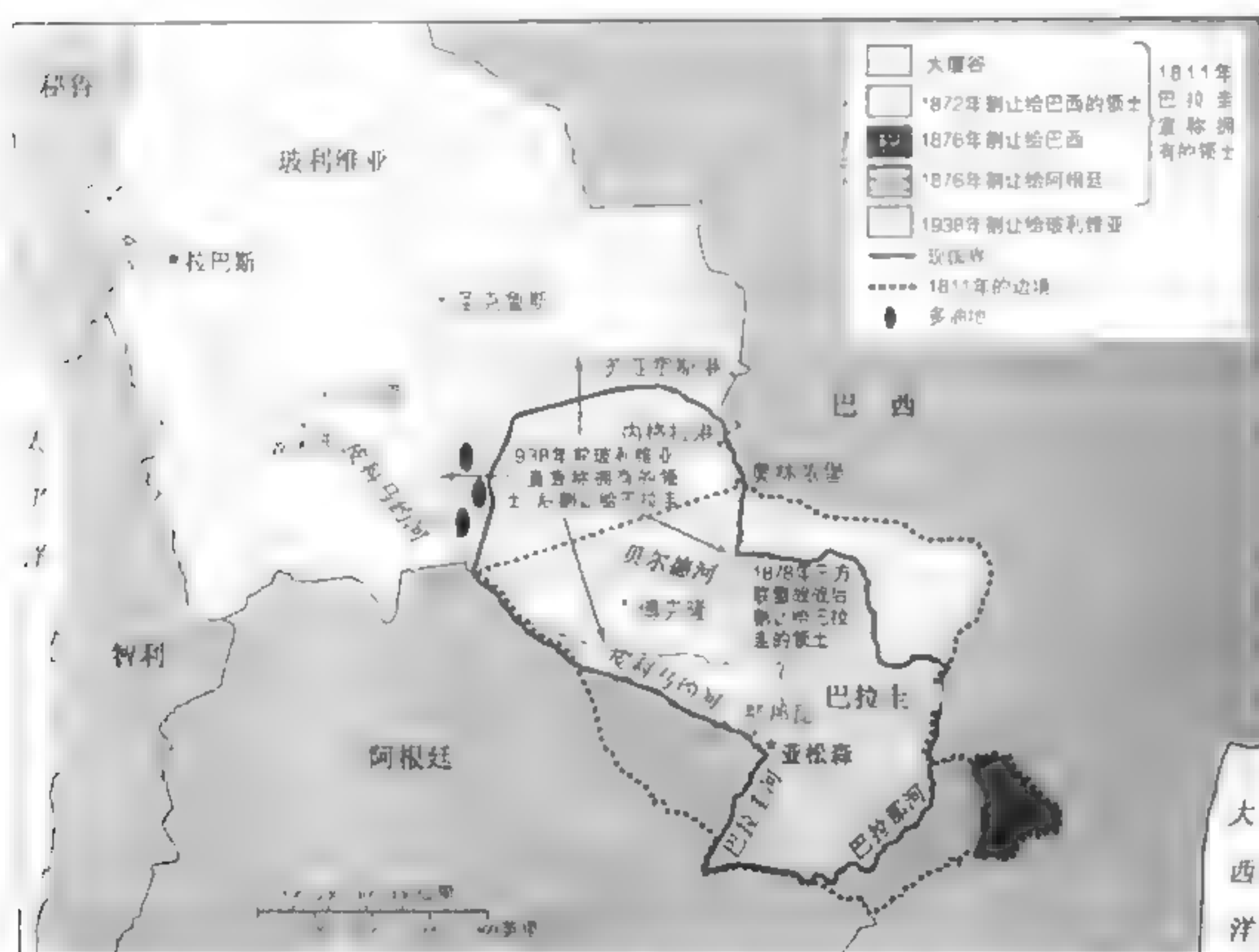
巴拉圭战争

弗朗西亚总统在 1840 年去世后,老洛佩斯继任巴拉圭总统。老洛佩斯继续沿袭弗朗西亚的独裁统治,但政府结构相对松散。既然他接手的是一个稳定而繁荣的国家,老洛佩斯的统治方式也就比弗朗西亚更为宽松,更为灵活。老洛佩斯致力于与外界发展关系,结束巴拉圭外交和经济上的封闭状态。阻碍巴拉圭统一的顽固敌人——罗萨斯政府倒台后,老洛佩斯政权得到阿根廷的承认,阿根廷的巴拉那政府也开放了与巴拉圭的贸易。老洛佩斯与一系列的国家包括英国、法国和美国建立了外交联系。

国家的封闭状态从此结束了,随之经济规模也扩大了。尽管农业(尤其是烟草、巴拉圭茶等出口农产品的生产)仍然是主要的经济活动,但是老洛佩斯非常重视工业的发展。他其中主要的成就之一就是建立了拉美最现代的企业——铸铁厂。他也重视交通运输的改善,兴建道路和运河,生产商船,修建短途铁路等。

在继承弗朗西亚政策的基础上,老洛佩斯加强了国家干预经济的作用。1848 年,他将生产巴拉圭茶和其他经济作物的林地和许多耕地收归国有。这样巴拉圭茶和其他产品的出口逐渐被政府垄断,国营农场的数量增加到 64 个。老洛佩斯也重视发展教育,到他逝世为止,巴拉圭已有 435 所初等学校,招收了 25 000 位学生,有文化的人口比例比其他任何拉美国家都大。

为, 使之成为国家土地, 老洛佩斯将许多土地和企业的所有权纳入国家所有, 使之成为国家土地, 子成和部下, 手中; 因此, 产生了得到国家支持的土地所有者。但是私有土地的规模仍很小; 私有农场受农场主与佃户之间关系的影响, 劳役和债务奴役很少了, 1812 年的《解放法令》使奴隶制废除。这些日子, 资本主义迅速发展, 土著人和混血人生活改善。老洛佩斯在 1862 年逝世后, 巴拉圭已经成为拉美最先进最繁荣的国家之一。



随后, 老洛佩斯的儿子小洛佩斯继位。小洛佩斯在此之前就已经担任了巴拉圭军队的总司令和国防部长, 他从欧洲采购了包括机关枪、迫击炮在内的大量新式武器, 使得巴拉圭军队成为拉美最现代化的部队。在老洛佩斯统治时期, 巴拉圭与巴西时有边界冲突发生。在小洛佩斯时期, 边界冲突终于演变为一场公开战争: 1864 年, 巴西出兵帮助乌拉圭红党颠覆了巴拉圭支持的白党政府。小洛佩斯无法忍受巴西破坏乌拉圭权力平衡的举动, 也担心巴西会限制巴拉圭通往乌拉圭的蒙得维的亚港口, 使巴拉圭的对外贸易要完全看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眼

色行事。

然而巴西政府无视小洛佩斯的抗议,双方矛盾激化,同年11月小洛佩斯对巴西宣战。翌年5月在英国驻阿根廷大使爱德华·桑顿的策划下,巴西、阿根廷、乌拉圭签署协议,结成三国同盟以对付巴拉圭,并签订秘密条约以瓜分其领土。由此,巴拉圭所面对的是一个包括南美最大的两个国家,在人力和其他资源有巨大优势的联盟。

但是战争持续5年才结束,因为在巴拉圭要塞部位驻守着数量比联军多大约7万个纪律严明的精锐部队。1868年5月,巴西军队把小洛佩斯包围在乌边塔(Humaita)要塞。此时,巴拉圭军队已经守了要塞一年多,食品和武器弹药严重缺乏,小洛佩斯不得已率部突围,同盟军随后夺取了要塞,战至12月,加西亚指挥联军部队经过三次血战之后,终于攻到巴拉圭首都亚松森城下,1869年1月亚松森被攻陷。但小洛佩斯带领残部退入北部山区继续进行游击战。巴西人经过11个月的清剿,于1870年3月1日将其俘虏并处决,战争结束。战后巴拉圭的人口从战前的52万多减少到不足22万,其中成年男子不到2.8万,整个国家满目疮痍,土地荒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各种生产活动均由妇女承担,社会经济长期无法恢复。不仅如此,和平条约使巴拉圭丧失了11万平方公里国土,战后赔款更增加了巴拉圭的经济负担。占领国巴西在巴拉圭扶植建立傀儡政权,以恢复巴拉圭经济。

新政策的实质就是推翻弗朗西亚和洛佩斯推行的政策。绝大部分国营土地都以廉价变卖给投机商人和外国商人,而不能递交有效文件的佃户却被排除在外,尽管他们和他们的祖先在这片土地上已耕种好几代。到19世纪90年代早期为止,国营土地几乎不存在了。外国人通过贷款、优惠和购买土地将势力渗透到各个方面,从而剥夺了巴拉圭经济和政治上的独立。

萨米恩托统治下取得的进步和发展

巴拉圭战争给阿根廷也带来了变化:获得了巴拉圭的赔款和领土(福莫萨、查科和米西奥内斯)。政治上,萨米恩托走进权力中心

1868—1871),他致力于阿根廷的统一和经济政治发展。

更为重要的是,在阿根廷掀起了科技革新的浪潮。铁路扩展到内地,还包括牧场和农场。带刺铁丝网和苜蓿的引进极大地提高了牲口产量。1866年,来自法国的冰冻货箱船为腌肉的出口打开了渠道,从而使英国对阿根廷牛肉的需求量大增。牧场和农地的扩大需要更多的劳动力,萨米恩托政府就鼓励向阿根廷移民;在他执政六年中移民人数翻了一番。为了提高教育质量,萨米恩托改善公共学校体制,向国家提供公立学校教师培训机构。但是萨米恩托的政策也有不足之处,许多土著人和加乌乔人视为文明进步的阻碍,利用流浪法或另一些镇压措施控制这些人。

萨米恩托在任时,阿根廷呈现出一派发达、繁荣的景象。但其中也存在着缺陷。经济的增长和土地的升值并没有使悲惨的加乌乔人或大批欧洲移民受益。外来移民没有自己的家园,也无力购买土地;结果,许多人定居于布宜诺斯艾利斯或其他沿河城市,从而形成从事贸易活动或做土产中间商。同时,由于经济的增长更加依赖于外国资本,外国资本家更乐于兴建铁路、电话线、煤气厂以及其他设施,外国人对经济和政治权力、土地所有权的日益集中加强了土地殖民模式;美国对市场和经济基础设施的控制日益严格也强化了这样的殖民模式;对外国大城市的依赖,伦敦取代塞维利亚成为金融中心。但是米特雷、萨米恩托和阿根廷的另外一些建设者被自己所取得的成就和国家繁荣的景象所迷惑了,认为这种繁荣是永久的。他们没有意识到问题会更为严重,也没预测到阿根廷下一代将面临什么问题。

智利

1811年10月秘鲁总督派兵前来恢复殖民统治。智利民族志士在奥希金斯领导下越过安第斯山,与圣马丁的军队会合。1817年,这支军队在圣马丁指挥下进军智利,2月12日在查卡布科和迈普大败西班牙殖民军。同年,智利独立,成立共和国。奥希金斯,这位智利解放运动中的英雄,深受欧洲启蒙思想的影响,被推举为智利最高执政官。执

政后,奥希金斯就推行一系列改革,旨在削弱天主教教会势力,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他取消教士的圣职权授予权,没收教会土地,在人地之间肥沃中大地产地主的土地上的不满;他对保守教会势力和对宗教游行的严格限制惹怒了教会势力。但是他的改革吸引了广大民众也加入了反对奥希金斯的行列。1823年,奥希金斯被推翻后,智利在接下来的7年时间里,智利国内持续动荡,乱起一窝。

波塔利斯和经济增长

和其他拉美国家一样,智利国内政治和武装斗争造成保守派和自由派之间的斗争。保守派也是集权主义者,代表了大地主、矿主和圣地亚哥富有商人的利益;自由派则是联邦主义者,代表的是北部和南部省份的地主、商人和手工业者的利益,他们反对中央集权主义国家政治和经济。在1830年,保守党在智利共和内战中击败自由派,领导下取得胜利。

直到1837年,波塔利斯才把他的思想推广到智利政治和社会生活中。作为一个有贵族血统的商人和一家进口企业的拥有者,波塔利斯真正服务于由大地主组成的寡头集团和数年后控制智利市场的商人。尽管他私下里表达了无神论观点,但是他仍支持教会势力,把他作为控制低等阶级的工具。他深刻了解到贸易、工业和采矿业的重要性,他采取措施扫清内陆贸易的一切障碍。而且,波塔利斯提出了一类和财产税以增加国家税收,解散多余的雇员以减少国家开支。农业受高关税的保护;改善港口设施;加强智利商船建设,1835年,连接智利各港口的轮船队开始运行。在保守党的精心统治下,以及由于各国对智利的银、铜和皮革的需求增加,在18世纪30年代,智利经济取得了稳步发展。

经济的增长增强了大地主的社会和政治权力。波塔利斯恢复了教会的权力,使智利和教会势力关系正常化。

1833年,由保守党控制的议会颁布了新宪法,进一步加强了大地主的权力。实行间接选举,选举权只限定于25岁的男人或是能满足所

的文化精英和财产资格。新宪法恢复了继承权,以确保大庄园的永久存在。天主教被宣布为国教,教会有控制婚姻的权力。总统享受对国会立法、任命国会的绝对否决权。既然总统控制了整个选举机器,那选举只是个形式而已罢了。

在布尔内斯统治下的经济扩张

1811年,曼努埃尔·布尔内斯继任总统;1816年开始第二任期。1817年,经济开始了又一次的飞跃。金融、采矿业和农业空前繁荣。克里奥人战争和19世纪50年代加州和澳洲的淘金热为智利的小麦扩展了国际市场,从而刺激了耕地的扩大。1816年,一位名叫威廉·惠赖特与英国人创建了铜矿商队。他建立了一家公司,1852年,这家公司完成了智利第一条铁路线,为科皮亚波德的矿石出口提供了出路。从圣地亚哥到瓦尔迪维亚的铁路直到1863年才竣工。外资尤其是英国资本开始对智利经济渗透;英国控制了智利外贸,也对智利的采矿业和铁路产生极大的兴趣,但是智利资产阶级组成了一个重要集团,在合资企业和银行建设中发挥很大的主动性。

从经济环境上受益的主要是大地主;他们的土地自然升值。一些大地主将他们的钱投资于铁路、采矿业和贸易。贵族的保守性和封建性阻碍他们转变成资产阶级。在智利南部,出现了小块土地占有格局,19世纪40、50年代,德国殖民势力增强。富有的中央大峡谷仍然被大地园主控制着,依赖于低效率的技术和廉价劳动力。因此,一面是基于采矿业、贸易、银行、集约型农业和工业的资本主义;一面是基于大庄园、劳役和贵族的半封建主义。

尽管智利看起来比其他拉美国家更发达,但像激进分子拉斯塔里亚那样的自由派不满保守党在实现现代化上的犹豫不决。他们想加速变革,呼吁重新修订1833年宪法,结束寡头统治。

一位抨击教会和西班牙文化遗产的作家弗朗西斯科·毕尔巴鄂坚定地站到拉斯塔里亚一边:“拉斯塔里亚在法国待了几年,深受乌托邦社会主义和激进共和思想的影响。1850年他回到智利,团结一批倡导

先进思想的知识分子和工匠。从此开始了反政府运动,在几个月内,人数就达到4 000。”

蒙特的温和改革

平等协会在1850年选举前夕创立,布尔内斯巴蒂斯塔是蒙特力他的继承人。尽管蒙特提出进步的教育改革,赞助艺术和文学,但是自由派仍认为他采用波塔利斯的专政统治方式和1833年死去。自由派像拉斯塔里亚、激进民主派像毕尔巴鄂等人宣称即将进行的是反宪政行为,呼吁要改革宪法。结果政府宣布全国处于戒备状态,并镇压平等协会。圣地亚哥和拉塞雷纳的自由人土起来反抗,但迅速被镇压了。拉斯塔里亚被流放,毕尔巴鄂和阿科斯逃往阿根廷。蒙特继续统治,为了防止叛乱发生,他赦免了反叛者,废除了继承权和什一税。

继承权的废除,使大地主的地产四分五裂,从而使贵族数减少。由于分裂的土地都落在了一些庄园主手中,佃户的生活条件并没有改变,受影响的各方愤怒抗议。什一税的废除,以及蒙特拒绝耶稣会返回,极大地触怒了教士阶层。为了应对他们的叛乱,蒙特于1857年颁布了新的民法:教育处于国家的控制之下,国家对教士有管辖权,天主教徒有采取世俗婚礼的权力。

继承权和什一税的废除是自由派和保守派、新兴资产阶级和大地主之间的一种妥协。在这个过程中,资产阶级没有赢得什么,地主也没有失去什么;主要的输家就是教会了。尽管蒙特的改革疏离了保守党中最反动的分子,但改革使他赢得了温和自由派的支持,他们和温和保守派组成了新的联盟——民族党,它的口号就是“有秩序的自由”。

在蒙特第二任期的最后几年里,出现了一些经济和政治问题。1857年的大萧条使铜价格迅猛下降,澳洲和加州对智利小麦的需求也大量减少。经济停滞点燃了政治不满的火焰,另一场大规模的叛乱在1859年爆发。反叛者包括激进知识分子,北部采矿行业的资产阶级和工人、工匠和小农。他们都反对中央大峡谷大商人和大地主联盟。他

们着手要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国家对采矿业和工业提供支持；分割地，分地；叛乱被镇压。叛乱结束之前，已失去了5000人的生命，一些领导人被处决了，另一些被驱逐出境了，还有一些逃亡了，而许多工人、土著和农民都被处决了。莫里斯·塞特林把这次叛乱作为智利历史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资产阶级叛乱失败意味着智利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已不可能，迫使其选择新的出路，这也意味一种客观的历史可能性没有成为事实。”

从1861年起，智利才逐渐恢复，出现了又一个繁荣时期，产生了新的城市，许多工人和大量的德国人涌入智利南部，建设城市，开发耕地农场。

智利经济重心在其北部，那里有丰富的铜、硝酸盐和海产品；南部则主要是欧洲色彩的。然而，硝酸盐主要储存于玻利维亚和秘鲁的塔拉帕卡省，于是智利资本开始涌入这些地区，迅速控制了玻利维亚和秘鲁的硝酸盐工厂。在北部，出现了一个富有利的矿业和较为先进的采矿资产阶级。莱昂加洛，一位富有矿主，组织了自由党，组建了一个新的中产阶级党派——激进党，它比自由派更激进，反对宗教压迫和专制政策。

自由党上台

在蒙特统制时期，智利的政治权力就逐步转移到自由党手中，1871年，埃拉苏马斯·普尼亚图当选为第一位自由党执政总统。1873至1875年间，自由派和激进分子促使国会进行了一系列的宪法改革：参议员任期由九年减少到六年；参议员由直接选举产生；公民有言论、出版和结社自由。这也意味着新兴资产阶级取得反对大商人大地主的胜利。到1880年为止，在智利个人财富超过100万比索的59个人中，只有21个是在殖民时期就有的；20个是通过农业获得财富的；而剩下的是通过做煤矿、硝磺业、铜和银的生意获得的。阿诺尔德·鲍尔从中观察到一个最有趣的事实：“通过农业来发展财富的不止那20个，那剩下的39个——矿工、银行家和资产阶级——反过来把自己的钱投资到农

业领域。”鲍尔的评论直指“强人的社会结构”。^①智利农业界，继续施加影响。新兴资产阶级的胜利并没有给智利民众、工人阶级、佃户等带来任何帮助。

在智利独立后半个世纪里，对底层社会阶级的共同愿望驱使自由和保守派精英克服分歧，追求一种强调寡头政治集权制与外国资本家合作的国家政治认同。同时，绝大多数智利农民、贫困工人、土著族群，都被排除在公民身份之外，他们在民主、平等和反殖民等议题上被动员起来以促进创立一个更具有包容性的民族国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巴尔马塞达自己虽出生了一个富有的贵族家庭，却站在他们一边，支持改革运动。

中美洲联合省

216

独立前夕，五个共和国——危地马拉、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和哥斯达黎加——原是危地马拉都督辖区的五个省份。在都督的统治下，少数富有的克里奥尔商人组成协会，控制了殖民地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1800年，由于陷入了欧洲混战，贸易减少和国内政治混乱，西班牙无力控制美洲殖民地，引发了美洲西班牙殖民地的独立浪潮。1821年墨西哥宣布独立后，中美洲也宣布独立，危地马拉都督辖区分裂成众多自治市政府。墨西哥“皇帝”伊图维德主张将中美洲并入到墨西哥帝国，得到了中美洲保守派的支持，却遭到众多自由派人士的反对。1822年，大多数议员表决赞同和墨西哥合并，但是第二年伊图维德就退位了，自此，合并就没有再提起。

独立和联盟的未来，1810—1865

尽管其他省反对和憎恨危地马拉的控制，但是中美洲的联合性传

① 为叙述上的简洁，伯利兹和巴拿马也常被包括在中美洲的范围内，但事实上，伯利兹是英国殖民地，巴拿马则是哥伦比亚的一个省，1903年以后独立为巴拿马共和国。因此，从历史上看，与这个地区并没有什么关联。

，仍然存在。1825年，召开了中美洲地区的“全国制宪会议”，成立了中美洲联邦共和国，包括前五省：危地马拉、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和哥斯达黎加。宪法规定建立了一个联邦政府，每个州有自己自由组成的政府，并带有强烈的自由派色彩：如规定废除奴隶制和教会特权，建立世俗政府，又申明，提倡自由贸易和自由合同劳动。第二任总统是努埃斯·德·里·阿尔塞，一位萨尔瓦多的自由派人士，被选为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1826年，各省开始组建自己的政府，在组建过程中，出现了保守派和自由派争夺权力的现象：基地在危地马拉的保守主义，得到西班牙裔大集团、许多大地主和教会的推崇；自由主义是另一派，许多中产地主、工匠和知识分子等中产阶级所坚守的信仰。在这十年中，土地和权力都掌握在大地主和大商人手中，他们经常调动其私人军队和劳工进行斗争。

同时，各省都不能也不能资助自己的政府和危地马拉城的联邦政府，表面上统一的中美洲联邦不久就解体了。阿尔塞政府为维护自己的特权极力抵制自由派的影响，由于萨尔瓦多省进行了许多反教会和社会改革，阿尔塞传播来自法国的自由思想，他派军队侵入萨尔瓦多，引发了内战(1826—1829)。战争中，自由派领袖之一、洪都拉斯人弗南多斯科·莫拉莱斯击败了阿尔塞的军队，解放了萨尔瓦多，然后凭借着来自尼加拉瓜和洪都拉斯的援助，侵入危地马拉，放逐了危地马拉大主教，阿尔塞总统逃亡到墨西哥。自由派赢得了对国家的控制。

1830年，莫拉莱斯被选为联邦共和国总统和军队司令官。同时，加尔韦斯，一位前保守人士和现自由人士、危地马拉执政官，发动了一场危地马拉政治和经济重建运动。这个运动方案包括允许世俗婚姻，建立世俗学校，允许修女还俗，减少教会节日等；农业改革包括允许占地者可以半价购买土地，允许本地人在空余土地上定居。加尔韦斯也谋求危地马拉司法制度的改革：设立陪审团和人身保护令，赋予州长有任命法官的权力。这最后一项措施打压了土地权益集团参与政治生活，也限制了地方官员参与司法和行政事务。

由于失去了地方土地权力集团的支持，再加上1837年席卷中美洲

的霍乱所造成的灾难使加尔韦斯的改革方案无法实行。地方教士宣扬霍乱是神的惩罚,受此煽动,土著人和混血种人开始起来反抗加尔韦斯。主要的一次叛乱发生在1838年,由拉斐尔·卡雷拉领导。

卡雷拉军队占领了危地马拉城,于1842年打败了莫拉桑军队,结束了联邦共和国的统治。然后,卡雷拉在危地马拉建立了一个保守派政权。1851年,他取消选举形式,要求国会任命他为终身总统,直至他1865年去世,并在国内推行保守甚至是反动的变革:恢复教会特权,将财产归还地主和教会,恢复劳役制。公共土地迅速被保守派大庄园主占领。保守党各部长都是从统治者身边的精英中挑选。除了传统上的劳动安排外,出现了自由劳动和货币经济,大地主、土著人和印第安人则因无力偿债而在大种植园中被奴役工作。

在卡雷拉统治时期,尽管绝大多数地区的劳动力已在危地马拉地更为自由,但中美洲各个地区都有相似的趋势和发展。到19世纪70年代为止,世界对咖啡的需求不断增长刺激了农作物生产,生产也不断扩大,同时也侵占了土著人大量的公共土地。哥斯达黎加的咖啡和萨尔瓦多的靛青和咖啡的出口增长使这些国家政治相对稳定。在尼加拉瓜和洪都拉斯这些落后的共和国内,养牛业主之间的冲突不断发生。

加州金矿的发现,使中美洲作为越洋运输路线必经之地的重要性更为突出,同时也加剧了本地区美英势力的竞争。1855年,尼加拉瓜自由派邀请美国冒险家威廉·沃克帮助他们推翻保守派政权,这对中美洲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帮助自由党组建政权后,沃克在一帮人约300乡下人的支持下,发动政变,宣称自己为总统,将奴隶制合法化,并将英语作为官方语言。1856年中期,危地马拉自由派和保守派联合起来,并在其他中美洲共和国的帮助下,进行民族战争,打击美国入侵,在1857年打败了沃克军队。尽管后来沃克几次试图征服中美洲,都未果。

民族战争促使即将垂死的中美洲统一运动再次提上日程。萨尔瓦多自由派总统巴里奥斯是建立联邦国的主要倡导者。但巴里奥斯想实现莫拉桑理想的努力受到卡雷拉的挑战,因为卡雷拉坚定地维持中美

卡雷利派的攻击,并同萨尔瓦多及其同盟洪都拉斯派兵。战争以卡雷利派的结束,巴里奥斯被流放;自此,在中美洲各个共和国,都是由保皇派执政。1861年,巴里奥斯试图东山再起,但最终被捕,被执行枪决。卡雷利派在1863年去世。他死后,中美洲暴力连连的历史也就随之结束。

然而,独立战争无法给墨西哥、阿根廷、智利和中美洲带来经济和文化上的改变。在艰难的非殖民化进程中,年轻的共和国面临着非同寻常的困境,包括地区主义、经济滞后和政治混乱,从而使它们无法形成统一的民族特性。这些国家所采用的共和政治制度在实际操作中却导致了政治腐败。保守和自由派的分歧斗争充斥着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不管在巴西、古巴、秘鲁和哥伦比亚的非殖民化进程中,殖民派以保守主义过程中,时有发生冲突发生,但普遍反对奴隶制、渴望自由的诉求决定性地塑造着这一进程。

第十章 种族、国家和自由的含义(1821—1888)

焦点问题：

- 废除奴隶制运动对巴西、秘鲁、古巴及大哥伦比亚国家认同的发展产生了怎样不同的影响？
- 半个世纪后，巴西奴隶制发生危机的原因是什么？
- 为什么秘鲁克里奥尔精英反对圣马丁和玻利瓦尔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
- 起义集团内部关于种族和奴隶制上的冲突是如何影响古巴 19 世纪民族主义演变的？
- 解放斗争又是如何影响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国内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之间相互争斗的？

219 随着国家取得独立，迅速进入建设时期的新国家却并未解决妥善处理国内自治的一系列问题。谁来管理国家，怎样管理，以及通过政府的什么机构来管理？谁可被称为公民，自由意味着什么？政府将如何限制个人自由，怎样规范不同社会阶层、种族和族裔群体以及外国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在解决上述问题和建立后殖民地代表国家利益的机构的过程中，奴隶制和种族的殖民地遗产起到了重要作用。为塑造统

在民族国家,这些曾在美洲被奴役的非洲人和他们的后裔积极地参与新国家建设中,以摆脱历史上因地域、阶级、人种、种族和性别而形成的社会不公。这些渴望从奴隶主那里获得自由,也就很容易地转变成为一种从父权制、外国控制和贵族统治那里寻求自由的呼声。通过这一斗争,甚至在一部分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之间的精英分子冲突,公民权利的含义得以扩展,在巴西、古巴、秘鲁和大哥伦比亚出现了新的民族主义。白人奴隶主、有色人种自由人、农民、城市工人、商人、激进的知识分子和其他人一起,都要求废除奴隶制,尽管他们的动机不同,但他们都受到来自奴隶主的坚决抵制。在这场冲突中,种族因素可能影响构建公民和国家之间的制度关系,并对19世纪甚至以后的这些新国家作出了界定。

最初,弗兰克·坦嫩巴姆(Frank Tannenbaum)等历史学家认为,拉美新国家的独立领导人如西蒙·玻利瓦尔极力支持废奴主义,其结果是在“没有暴力、没有暗杀、没有内战”的情况下完成的,而这与美国解放黑奴的情况完全相反。此后,历史学家调查了后殖民地掌权者的决策过程,得出结论:在很大程度上,拉丁美洲的废奴主义受到的是政治和军事利益的驱动,而不是对道德的狂热追求。根据这一观点,共和国的大多数精英们接受废奴主义的思想,其中包括招募黑人士兵来反对保王党征募士兵的政策,或者结好外国人,比如海地的亚历山大·佩蒂翁,他以提供食物和军火作为交换,要求玻利瓦尔于1816年承诺保证解放所有奴隶。虽然这与坦嫩巴姆的解释略微不同,更具有批判性,但是,人们仍旧关注精英们的想法和行动,却忽视了被奴役的非洲人以及他们后代的聲音。

然而,最近新生代的历史学家越来越对恢复消失的历史感兴趣,他们提出了新的问题,并且调查了新的有关档案的收藏品。尽管他们认为大多时候掌权者缺乏对奴隶制是错误的作道德上的定罪(或者没能独立地去实行它),但是他们仍然强调奴隶和有色人种自由人在反对奴隶制和迫使无情的掌权者废除奴隶制中起了积极的作用。对拉丁美洲黑人的文化、宗教、家庭生活的研究显示,奴隶和自由的有色人种会

采用合法的或者法律以外的策略,不间断地追寻自由。例如,据法院记载,奴隶将共和国法律当做其诉求的基础,坚持向政府要求自由。然而,奴隶经常使用被杜博伊斯称为“全民大罢工”的策略:公然反抗法律约束、拒绝工作、逃跑并加入到叫帕伦克(palenques)或者坎伦波(quilombos)的逃亡奴隶团体,参加盗窃团伙,甚至公开反抗奴隶制机构。整体说来,历史上的这次民众反抗对政府机构及公民参与新发展中国家建设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总的来说,一个关于解放奴隶的片断以及过程已经呈现出来了。首先,很明显,独立没有马上废除奴隶制。其次,克里奥尔人习以为常或者极力辩论奴隶制的道德性,并且最大程度地寻求打击奴隶,以有效地延长他们存在的时间。最经常提到的是“自由怀孕”法案通过,依照这条法律女奴隶的孩子是自由的,并且在他们成年以前需要奴隶主抚养,成年以后,他们要为了自己的自由而付给奴隶主赔偿金。第三,奴隶主只接受对一部分人废除奴隶制,包括反叛的奴隶和有色人种自由人,经常使用暴力的人,以及威胁到新共和国私人财产权长期安全的人。掌权人士担心下层煽动的改革活动引起社会革命,这些改革活动包括逐渐废除奴隶制,同时设置收入和文化的要求,以限制人们参与政治的自由。最后,对立阶级之间几十年的国内冲突和政治动员,以及多种族联合政府为解放道路做出了充分准备,由于公民中的积极分子为了统一国家的语言而丢弃了导致分裂的种族思想,使得这些经历有效地消解了种族歧视斗争。因此,大多数情况下奴隶解放是赔偿奴隶主损失,而且新兴国家也倾向不谈及这种一直持续到黑人和混血种族子孙后代的种族不平等。

这些国家经历的历史自然各不相同,而这些不同取决于当地的传统、可利用的土地、与大西洋两岸接近的市场、对奴役的依靠、自由有色人种的数量以及外国的影响。因此,一个关于这段复杂历史的审慎研究,需要对秘鲁、哥伦比亚、古巴和巴西的特别事件进行调查,因为这些国家奴隶的数目最为庞大,极不公正的制度存在的时间最长。

巴西

1808年，法国人入侵葡萄牙，迫使葡萄牙王室逃往里约热内卢，1815年把葡萄牙王室所在地，使巴西向独立迈进了最主要的第1步。1818年，佩德罗作为摄政者，代替国王若昂六世统治巴西。1822年，他拒绝了回到葡萄牙的请求，并发出著名的“不独立，毋宁死！”的呼声，从此巴西开始了正式的国家独立。

皇帝唐·佩德罗

唐·佩德罗在贵族贵族的拥护下执政，而这些贵族决定延续自由主义和君主制这个制度，并且决定独立过程不会出现其他拉丁美洲国家所经历的暴乱。巴西贵族有他们自己的意愿，巴西确实赢得了相对较少暴乱和杀戮的独立。但这也意味着独立以后的巴西保留了殖民地社会结构、君主制度、奴隶制度、大庄园制度、单一种植、低效的农业系统、高度分层的社会和文盲占90%的自由民。

唐·佩德罗向巴西人民许诺一部宪法，于是于1823年召集议会开会起草，但是议会起草的文件过分限制了皇帝的权力。作为回应，他在解散议会，并通过皇家声明公布一个个人挑选的委员会，指派他们去完成这部宪法。然而这是一部中央集权的宪法，把权力集中在皇帝手里，该宪法一直用到1889年君主制度垮台。

另外，国会是由两院制议会：一种是上院（贵族院），它是由国王选定议会成员（参议院）；一种是下院（众议院），由选民选举成员，但选民有个人资产和收入限制，这就有效地剥夺了大多数人的选举权。国王有按照自己的意愿任命和罢黜大臣以及召集或者解散议会的权利，还可以任命各省省长或总督。

人们对唐·佩德罗专制解散议会以及1824年宪法的高度集权强烈不满，但南布哥是共和主义者以及联邦制拥护者骚动的中心，不满情绪在这尤为强烈。1824年，由商人马诺伊尔·德卡瓦略领导的反叛集团声称，创建赤道联邦可以把16个北部省团结在共和国政府的

统治下。虽然一些领导者表达了反对奴隶制的态度,但是他们没有为奴隶制废除做任何事情,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担心会把奴隶和自由有色人种鼓动起来,结果产生一场以海地经历为模板的革命。他们失去了奴隶这一潜在的支持者,帝国的军队在一年内最后粉碎了这次起义。

唐·佩德罗虽然取得了一场胜利,但是人们对他专政的不满继续积累着,他的名声也在随之持续减弱。再次,奴隶制问题开始显得严重起来。他的外交政策使他的处境雪上加霜。1825年,唐·佩德罗和英国签署了一份条约,作为对巴西独立的承认和一项贸易协定的回报,这份条约规定巴西在1830年结束奴隶交易。尽管有这项禁令的存在和英国海军对贩卖奴隶船只的奋力抓捕,但是贩奴贸易仍然在巴西政府完全了解和赞同的情况下继续进行。而英国对协约的监督执行造成了奴隶价格猛增。在经济繁荣的里约热内卢、圣保罗、米纳斯吉拉斯,咖啡种植者可以支付高额的奴隶费用,但是在经济萧条的北方,棉花和甘蔗种植者却不能和他们竞争工人,因此国王唐·佩德罗成了造成他们困难的罪魁祸首。

1830年,法国九月革命推翻了不得人心的独裁皇帝的统治,在这个消息的影响下,巴西的城市举行了一场让人激动的暴力游行示威。激进分子(Exaltados)走在反叛队伍的最前列,号召废除君主制,建立联邦共和国。在乡下,奴隶和自由有色人种抓住这个机会要求废除奴隶制,它长期以来一直是脆弱的各省精英联盟的基础,面对这场危机,唐·佩德罗宣布退位,传位给他5岁的儿子小佩德罗,两周以后他回到葡萄牙,再也没有回来。在佩德罗一世统治时期,葡萄牙商人和葡萄牙裔弄臣发挥着重要的影响作用,而这些进展,消除了他们的重要作用,并且使巴西完成了向完全独立的转变。

摄政、叛乱和小皇帝

激进派自由主义者目睹了向建立联邦共和国转变第一步的唐·佩德罗的下台,革命是他们的工作,但是温和主义者却在享受革命果实。

其，上，激进派已经走上了和温和自由主义者一样的道路，温和自由主义者主导了唐·佩德罗从葡萄牙脱离，随后由于国王接受保护种植园，即使国王失去了影响力。唐·佩德罗的离开对温和派来说是一个挫折，他们赶紧恢复自己在中央政府的支配地位，以免使革命脱离自己的控制。

首先，议会任命由温和自由主义者组成的三人摄政委员会，来代替国王主持政务直到他 18 岁成年。另外，从有财产的阶层招募军人，建立民兵自卫军，以镇压城市暴徒和反叛的奴隶。同时，新的政府为了回应共和派的联邦制拥护者的意见，开始实行宪法改革。经过三年的讨论，议会批准通过了 1831 年的增订条例，根据新增法律，各省选举的议会拥有很大的权力，包括对当地政府预算以及税收的控制。这些条款削弱了大地主对他们自己地区的控制权，认同唐·佩德罗反动统治的国务委员会被废除了，但是中央集权仍然存在，按照省级议会条令，国家政府可以通过有偏袒的否决来任命各省省长。

摄政政府开始为反对一系列起义作斗争，而这些起义主要发生在经济受到主要作物、甘蔗、棉花市场损失影响的北部地区。在南部中心地区（里约热内卢、圣保罗、米纳斯吉拉斯）咖啡经济繁荣，贵族种植者有中央政府的安全控制，所以没有发生任何起义事件。这些起义是当地的自身原因造成的。其中一部分有影响力，并且经常发生，比如，帕拉地区的所谓小木屋运动（来源于 *caban*，即小木屋），它缘自于富有的葡萄牙商人对当地贸易进行垄断，这引起了小商贩、农民和低等阶层的怨恨，从而爆发了这场起义。另外，像巴伊亚共和党人以及分裂主义者的起义（1837—1838），它不仅反映了这个曾经繁荣的地区由于经济和政治权利的损失而造成的贵族种植主的挫败，还鼓动了大部分黑人和长期主张废除奴隶制的混血种人。一位奴隶主写了请愿书，抱怨发生在种植园的“不服从”，那里“奴隶甩手不干活还可能会发生不幸的灾难”。除此之外，这些奴隶还会给相邻的庄园带来坏榜样，尤其是在巴伊亚事件之后，大部分奴隶正在失去必需的顺从”。另外，为了减少摄政者对废奴主义者反抗的担心，1834 年修订的法律规定，造反的奴隶可

受到死刑的惩罚。

所有事件中最为严重的是 1835 年发生在南里奥格兰德首府阿雷格里港的暴乱。因这场战争的成员多是中低等阶层出身,因此被轻蔑地称为破汉衫战争,养牛工是实际的起义领导者,他们控制着起义军队的普通士兵——加乌乔牧人。高度的地方分权、由中央政府强加的税收和不得人心的管理者引起的不满以及共和克人观念的影响力,都是导致起义的原因。1836 年南里奥格兰德脱离巴西独立,建立共和国。朱塞佩·加里波第(Giuseppe Garibaldi)是热烈反对奴隶制的共和克人,相当多和他一样的意大利流亡者的存在给起义增添了特别激进的气味。近十年以来,两个政府存在于巴西——共和政权和帝国。



让·巴蒂斯特(Jean Baptiste Debret)的这幅《巴西的奴隶制》(*Slavery in Brazil*)描绘了巴西奴隶制一贯的残忍特性。正是这一特性引发了巴莱阿达起义。这场起义是以非裔巴西编篮工曼努埃尔(Manuel Francisco dos Anjos Ferreira)命名的,他领导数千名非裔巴西人发起了一场浩大的运动,希望废除奴隶制,建立独立的共和国。

帝国军队对南里奥格兰德起义的无能镇压,进一步减弱了摄政政府,1838 年巴莱阿达(Balaiada)起义在马拉尼昂、赛阿拉北部各省燎

奴隶制创建于马拉尼昂,在这有最大的奴隶比率——大概占总额 1/3,这次起义是由低等阶级反对征兵开始的,进而发展到黑人奴隶、自由有色人种、根基稳固的逃亡奴隶团体的一场暴乱。科斯塔·达马·达斯·阿加斯是一个逃跑奴隶领导者,他招募了一支 2 000 人的奴隶军队,迫使当地种植主释放奴隶。根据历史学家马蒂亚·罗瑞拉·托雷斯的话,另外一个混血领导者雷蒙多·戈麦斯声称“所有有色人种都应该和种人和土著人享有同样的权利”。毫无疑问,起义越来越广泛,它清楚地反映了反叛军队广泛的跨阶层和多民族特性,政府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例如,军队指挥官路易斯·阿尔维斯·德利马·戈麦斯是这样一个起义领导者:“他不想让自己与起义的黑人联系在一起,也没有资源以及经常遭受迫害者,所以就力图吸收他们”。在巴西历史上,这对君主制度、种植园寡头以及保护他们私人财产造成了巨大威胁。为了保护他们的权利和特权,掌权者利用戈麦斯作为政治工具,允诺放免所有的起义者,并以追捕逃跑的奴隶为条件。据利马·达·阿加斯,他的放免提案旨在“避免更深远的叛乱,而激发奴隶和自由人叛乱者之间的憎恨”。

在试图恢复各地区秩序时,热衷于向联邦制度妥协的温和自由主义者,由于与在巴西帝国中央政府力量的保守党派在政治上达成和解。在一些重要事件上保守党和自由党看法完全一致,比如对君主制度、奴隶制以及联邦理论。他们一致认为需要镇压格兰德河叛乱以及北部其他地区的起义。共和政府在格兰德河的经历,以及给所有参加共和国武装力量的奴隶自由,两者对君主制度和奴隶制构成了严重威胁。为了在反对分离分子和分裂分子的战争中加强中央政府的力量,自由党和保守党想阻止小佩德罗在他法定年龄以前就管理国家。1840 年议会两院精心策划了一场议会政变,宣告 14 岁的唐·佩德罗皇帝执政。唐·佩德罗任命了一个保守政府,并且在 1831 年的新增法律中废除了联邦改革,重新夺回了省级立法机构的权力,除去了地方选举法院法官和警察机构的权力。

此后,政府着手调查格兰德河起义的真相。1843 年 2 月,由于阿

根廷的侵入而造成与乌拉圭友好结盟的中断,再加上内部斗争,共和国政府处境变得非常困难。面对军事挫败,共和克人政府接受了来自里约热内卢的请求,于1845年2月签订一个和平协议。该协议对所有反叛者进行赦免,省长废除了共和政权的所有法律。但牧场场主也赢得了一定的让步,包括提名候选人以及保留他们的军事头衔。

在一系列起义中,1848年发生在伯尔南布哥的起义是19世纪30、40年代动摇巴西的最后一次大范围起义。它以累西腓为中心的原由包括:对垄断了当地贸易的葡萄牙商人的敌视,保守派政府任命的不受人心的省长,以及对当地大种植园主的怨恨。反叛纲领号召所有的葡萄牙商人从累西腓撤走,扩大省区自治,失业者有工作、分割卡瓦利康蒂家族的土地。然而,即使这个激进计划也不包含任何和废除奴隶制相关的内容。1849年,帝国军队占领了累西腓之后,这项运动宣告失败。许多被俘虏的领导者被判处终身监禁,但是所有人在1852年被赦免。

19世纪30、40年代,起义和武装斗争的起因主要是经济不景气,而经济的衰退是由外国市场对传统巴西出口疲软所造成。咖啡早在1830年就十分重要,在1850年以后咖啡种植业开始繁荣,并且延伸到南部中心,在这里用其日益增加的税收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力,并且为地区精英和国家政府之间合作的新纪元打下坚实的基础。咖啡业新的番繁荣,不仅证实了新殖民主义以农业出口为重点明显的可行性和合理性,还阻碍了在巴西自主发展上采取更为持久但更艰途径的任何想法。

政治博弈 奴隶制的危机

到1850年,巴西看起来处于和平状态。皇帝主持实行一种准议会体制,用其权力为极小统治阶层谋取利益。他重视议会制政体,并且按照自己的意愿任命自由党和保守党首相,如果新的大臣不能在议会获得大多数席位,则会通过操纵选举任命其他人。由于统治阶层在重大事件上能够一致,因此党派斗争中唯一的事情就是政府由谁主持,获得

· 戈利普· 若· 阿金· 纳布科是唐· 佩德罗的拥戴者,在他的《废奴主义》中这样描述了系统的运作:“代表制体系,是议会体制到父权制政府之间的连接,由于参议员和众议员以后会涉及利益问题,因此为了获得自己利益,他们仅仅在民主国家的仿制品中认真地摆摆姿态。如取缔政治腐败,责令停止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利益滥用个人职权,没有人会在这类打太极(shadow boxing)的事情上浪费时间。”

1850年以后的几十年,巴西政治表面上的稳定依赖于里约热内卢、圣保罗和米纳斯吉拉斯等繁荣的咖啡种植地区,以及对巴西咖啡生产者的需求和好的价格。但是由于土地枯竭、技术陈旧和国外蔗糖业的竞争,种植园主的北部地区和种植园社会持续衰退。

英国对巴西施加压力,强迫巴西签订《英-巴协定》,于1831年7月禁止进口奴隶到巴西,由此北部地区危机日益严峻。1850年以前,该条约从来没有有效地执行过,19世纪40年代每年有多于5万个奴隶被卖到巴西。从1849至1850年,英国政府向巴西施加压力,通过反奴隶贸易的《登凡洛兹法》,并指挥军舰进入巴西领海,以备在需要时拦截巴西奴隶贸易船只。19世纪50年代中期,巴西的奴隶进口终于中止。

奴隶贸易的废止有重大意义,劣等食物、严酷的工作条件和其他消极因素造成了奴隶较高的死亡率,使自然繁殖不能维持奴隶的人数,这些促使了奴隶制度的最终消亡。由于咖啡种植主对奴隶劳动力有很强的竞争能力,相当多的一部分奴隶从北部地区迁移到南部地区,这样奴隶贸易的废除造成了很严重的劳动力短缺。奴隶贸易废除运动加剧了日益衰落的北部地区和繁荣的南部中心地区的不平衡。19世纪60年代,越来越多的巴西人确信奴隶制造成了巴西严重的信誉丧失,必须予以废除。美国内战废除了奴隶制,使巴西和西班牙殖民地——古巴和波多黎各,成为西半球唯一存在奴隶制的地区,从而加重了对这一问题的敏感性。巴拉圭战争也对解放事业起到推动作用。为了弥补因前线巨额损失而造成的巨大缺口,政府颁布了一项法令,法令规定,给予愿意参军的一部分政府拥有的奴隶自由,一些私人奴隶主也效仿了官方

的做法。

皇帝由于对奴隶制小心翼翼的处理方法受到了谴责,这种对奴隶制的批判越来越多地和对皇帝的指责联系在一起。独立战争“黑人、白黑混血、土著人”是伴随废奴主义产生的,尽管皇帝相信,他能够挺过废除奴隶这一关,但是非常害怕持反对态度的那些独立派。历史学家皮门塔·布埃罗说:“政治经验告诉我们,最好到现在就是不要谈及这一事宜。如果有人允许这条规则存在,那么社会将发展,最后会得到结果,基于种姓的特权或者分歧往往是不好的;而同一性乃是民族群体渴望的目标,这一点如果不是现实的至少也是可建议的。”这种意见成为了19世纪巴西斗争的缩影,并且最终导致了像杰尼·佩德罗这样的历史学家得出的结论:他们留下了政治排除而非高升贵族的传统。

新生的共和运动和反奴隶制运动同时出现。改革委员会是由激进自由主义分子组成的,1869年,这个组织发表宣言,要求剥夺君主权力,并且保证赋予奴隶新生儿以自由。奴隶制危机很大地造成了巴西帝国的危机。

反奴隶制运动

从巴拉圭战争结束(1870)开始,奴隶制问题蜂拥而出,并且逐渐成为巴西政治中的重要问题。

就个人而言,唐·佩德罗反对奴隶制,但是被困在那些只要有可能便决心拖延的奴隶主同越来越多要求解放奴隶的自由主义领导者、知识分子、城市中产阶级和自由的有色人种(他们甚至不认为自己是奴隶)的激烈交锋之中。1870年,西班牙解放了古巴和波多黎各所有的奴隶,其中包括新生奴隶和年长奴隶,这使巴西成为美洲唯一以最早的殖民地形式保留奴隶制的国家。奴隶对奴隶制的公然违抗预示着社会永久的不稳定,出于对此的恐惧,一位保守派人臣立即施加压力,推动了《里奥布兰卡法》的制定,并使其于1871年在国会通过。这项措施释放了所有妇女奴隶的新生儿,并且赋予奴隶主照顾他们到18岁成年的责任。而在当时,奴隶主不仅可以释放这些儿童以换得政府的补偿,还

，并在1811年，21岁使其成为劳动力。这项法律还释放了所有在1805年或者更早的奴隶，并为解放奴隶创立了基金。



奴隶在巴西圣保罗（特罗罗斯 Terroços）的一家种植园中对咖啡做干燥处理，约1882年

然而，在1850年，为了讨论奴隶制问题最终解决方案而设计的策略失败了。1851年，巴西仍约有超过100万的奴隶，其中仅有113个奴隶通过这项法律得到自由。

反奴隶主义的白人公开指责这项法律是一个假象，并且为最终的解放提出了更有力要求。1880年，反奴隶制运动发展到很强的势头。聚集在城里的反奴隶制运动，在进行的经济、社会 and 智力现代化中吸取了力量。对白的城市群体来说，奴隶制是时代的错误，是和现代性很不兼容的一种社会制度。

奴隶主和庄园主也开始出现分歧。在北部地区，奴隶制在经济上变得非常昂贵，越来越多的奴隶主开始给劳动者发工资，以吸引依附于种植园经济的地主、穷苦白人和混血种人。1877至1879年的大旱是造成巴西地区奴隶人数下降的另外一个原因，这次干旱使该地

区有钱人开始卖出奴隶,或者带着他们的奴隶离开。很多省份,比如说亚马孙和塞阿拉地区,当地和混血的劳动者人数很快超过了为数不多的黑人奴隶,并且该地区于1884年废除了该省境内的奴隶制。相反,里约热内卢、圣保罗和米纳斯吉拉斯地区的咖啡种植者,由于和北部种植者联合起来做奴隶贸易,把奴隶从北部卖到咖啡种植区,所以对废除奴隶制度进行了顽强的抵抗。

废奴运动产生了拥有非凡智慧和道德才干的领导者。其中一个帝国杰出的自由主义政治家的儿子华金·纳布科,他写的《废奴主义》一书对奴隶制的剖析和对腐败迹象的清晰表达,对他的读者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另外,何塞·德·圣马丁是一个优秀的黑白混血宣传员,以激烈和乐观风格而出名的新闻工作者。另外一个黑白混血安德烈·雷博兰斯是一个工程师和教师,凭智慧大分赢得了皇帝的敬佩和友好关系,他是这次运动的一位杰出领导者。对纳布科和他的战友来说,反对奴隶制斗争是一次更大斗争——巴西社会转变——的主要前线。他们希望废除奴隶制能够为出现其他目标,比如土地改革、公民教育和政治民主铺平道路。

由于陷入持续增长的压力,议会于1885年9月28日采取了另外一项措施,这项措施规定,给所有到60岁的奴隶自由,但是要求他们继续服侍他们的主人三年,并且五年内不允许离开居住地。这些条件,以及很少有奴隶活到超过65岁的事实,说明如此之多的奴隶中很少有人获得这个机会。帝国政府还允诺购买剩余奴隶十四年的自由,这是一个很少有人实际按照《里奥布兰卡法》实施的承诺。在确信这项法律只是另外一个精心策划的策略以后,废奴主义者拒绝接受所有的妥协方案,并且要求立即无条件解放黑奴。19世纪80年代中期,反奴隶制运动已经取得可观的规模,更具有战斗力。大量的奴隶表示对自由不赞同,由于赛阿拉的奴隶制度已经废除,废奴主义者通过组织从圣保罗开往赛阿拉的“地下铁路”^①来援助他们。聚集在军事俱乐部的军官,反对用军队追捕逃亡的奴隶。

① 当时秘密运送黑奴的一个组织的名称。——译者注

1887年2月,圣保罗用民众捐款筹募的资金解放了所有的市内奴隶。许多奴隶主在圣保罗所写的文字,释放了所有的奴隶,但前提是他们继续种植园工作一段时间。1887年底,即使是顽固的圣保罗种植园主也做好了调整的准备,他们把付给奴隶工资和提高工作和生活条件作为条件,并且继续努力创造条件,以促使欧洲移民来圣保罗。这一努力取得了最大的成功,圣保罗的移民人数从1885年的人口1.5万,到1887年的多于3.2万人,并于1888年达到9万人。1888年,圣保罗创造了最高纪录。随着劳动力问题的解决,圣保罗已经做好准备,以抵抗废奴隶制,甚至加入了废奴运动的队伍。

1888年2月15日,巴西最终废除了奴隶制。和传统的解释相反,这并不是奴隶主自愿退出的接受过程的顶峰,亦不是奴隶主和平接受不可避免的事实。由于废奴主义者的鼓动、大批奴隶的逃跑、奴隶主和其他政治秩序的人动乱,总的奴隶人数于1885年急速下降。事实上,奴隶制度的废除是通过革命实现的,而非改良。

废除奴隶制这一行动的结果,驳斥了反对者的不祥预言。从奴隶制条件下解放,加上得益于全世界持续偏高的咖啡价格(直到1896年),巴西经济在几十年有了很大的发展,其发展程度甚至多于帝国时期70年的经济增长。种植园主用移民替代咖啡种植园的被释黑奴来为地工作,而城市与工厂的工作也被移民抢走。因此,对于过去的奴隶来说,几乎没有改变什么。废奴主义者对授予被释黑奴土地的要求却被忽视了。在很多地区,以前的主人和奴隶之间的关系很大程度上没有发生任何变化,种族主义的传统以及种植园主的经济和政治权力,使他们几乎完全控制着以前的奴隶。由于政府拒绝给予土地和教育,被释黑奴在“饥饿的鞭子”的逼迫下,坚守在最艰苦、报酬最少的工作岗位。此外,政治改革在高收入和文化水平方面对参与政治事件的公民加设条件,这样便有效地剥夺了自由公民的选举权,除此之外,他们还大量减少有色人种和穷困白人的选票。据1872年统计,社会中仅有16%的人有选举能力,这样这项法规就剥夺了99%有资格的选举人的选举权,为长达一个世纪的隐秘种族歧视创造了条件。

秘鲁

克里奥尔贵族的财富是从当地土著被强制劳动和工作在矿井、车间及大牧场的被奴役非洲人那里剥削而来,他们没有很担心秘鲁从西班牙统治下解放的革命会放火点燃这个易燃物堆成的社会。自由主义者何塞·德·圣马丁和西蒙·玻利瓦尔将军,曾经尝试着去改革所成立的秘鲁国的社会和经济制度。圣马丁在瓜亚基尔会见玻利瓦尔之前,颁布了一项法令,法令规定禁止奴隶进口,秘鲁所有奴隶的新生儿自动获得自由,废除当地贡赋以及解放所有其他的强制土著人劳动的形式;他还发表声明说,所有的秘鲁居住者,不论是当地人或者克里奥尔人,都是秘鲁人。

这些改革措施不符合克里奥尔掌权人士的利益,因此在圣马丁离开利马到瓜亚基尔会见玻利瓦尔之后从未实施过。玻利瓦尔于1823年在秘鲁获得权力,并且他制定了反映相同自由主义态度的改革方案。为了建立一种独立的小农场,他命令解散土著公社,将公社的公有土地分成若干份,每一个家庭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作为私有财产,剩余的作为公有地产。玻利瓦尔触及了土著人公社的财产,却没有触及封建主的财产,就是由当地佃农或农奴耕种的大农场,他们需要付给地主的租金占到其农作物收获总价值的50%至90%。

玻利瓦尔精心策划的土地改革,对大农场、政府官员和商人有利,他们利用改革建立大庄园,却以牺牲土著公社的公共土地为代价。这个过程开始时很缓慢,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势力逐渐大增。玻利瓦尔为废除土著人贡赋作出了努力,但收效甚微。在他1826年离开秘鲁以后,秘鲁的克里奥尔人政府重新以土著捐税的名义对山区人征税(serranos),重新向沿海混血居民开征人头税。

新政府严重依靠贡赋,并且把它作为一项财政收入,反映了秘鲁经济的不景气。矿业和沿海种植园农业在18世纪末就开始衰落,不足的出口量不能支付从巴西制造业的进口,而独立革命造成了这两个产业最终破产。新政府已经背负英国资本家的大量战时债务,因此,开始与

出口量大量增长贸易,而英国是它当时最大的贸易伙伴。1836 年以后,羊毛出口量如里加。1840 年,随着鸟粪的开发利用,沿海地区开始新的经济时代,但是在第一阶段,鸟粪周期并没有完成重新振兴沿海农业的资金积累。

秘鲁的政治和经济

秘鲁落后闭塞的经济、山区和沿海地区的深刻分隔和缺少可给中央、智马领导的管理阶层(比如在智利出现的管理阶层),是造成 19 世纪政治暴乱和内战的原因。这为奴隶争取自我解放提供了大量机会。首先,随着沿海农业和高地矿业生产的日益衰退,城市奴隶制越来越成为其代替品出现。乡村的奴隶主可以通过租赁奴隶获利收高,比如出租奴隶到利马或者其他城市,在那里他们做技术性工作,赚来钱付给奴隶主或者购买自由。其次,城市奴隶制能够给黑人奴隶提供更多的流动性,并且减弱了奴隶主对他们的直接控制。利用这种优势,城市奴隶在法庭上指责他们的主人违反了共和国法律,并声称受到身体上的虐待。有人甚至由于主人是英国人或是新教徒,也要来拥有被解放的权利,其理由是为了投诉他的不公,会不利于利马信奉天主教的克里奥尔人地方法官。再次,城市奴隶还参加各种密谋,比如说 1835 年,为了推翻政府并且杀掉利马的白人,由约翰·德·迪奥斯门尔戈塔领导了一次起义。最后,尽管和加勒比奴隶起义相比相对较少,但是像 1851 年的奇卡马起义一样,黑人奴隶在武装起义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在这种对奴隶制“每天反抗形式”的环境下,这场暴力武装起义注定是秘鲁的“奇怪机制”。奴隶制造成的社会不稳定,不能再被庄园主精英们所忍受,尤其是很长时间以来他们的经济优势已被耗尽。

在这些条件下,一些独立战争时期的平民出身军人考迪罗,开始在新国家政治生涯中起决定性的作用。他们当中有些不只是自私的野心家或者克里奥尔贵族团体的傀儡。混血将军拉蒙·卡斯蒂利亚是最能干最开明的军人考迪罗,并在 1845 至 1851 年和 1855 至 1862 年期间

担任总统。在卡斯蒂利亚的管理下,秘鲁经济在鸟粪出口快速增长的基础上得以发展。这项出口贸易被英国资本家所控制,他们有权把鸟粪卖给特定的地区,以换得秘鲁政府的借款(以货物作为抵押)。极高的利益和回扣率增加了他们的利润。尽管卡斯蒂利亚曾尝试,政府对一定的鸟粪矿藏直接进行开采管理,控制出口价格和数量,并控制价格,并且将肥料收入纳为发展项目,但是任何这些想法从来没有实现。然而,鸟粪业的繁荣刺激了秘鲁当地商务和银行业务的增长,并且建立了一个国家资本主义的核心。鸟粪业的繁荣还为初级阶段现代基础设施提供了资金;1851年,第一条铁路线开始在利马和圣佩德罗·德·切沃运营。

鸟粪业收入的增长,使卡斯蒂利亚能够实行一系列的社会改革,这些改革对国家建设进程也作出了贡献。1851年,他废除了奴隶制和土著人的贡赋,减轻了当地人沉重的政府财政负担,并且解放了人数达2万人的非洲奴隶。废除奴隶制对贵族种植园主十分有利,他们得到的补偿高出奴隶价值10%。种植园主用这些补偿金可以买种子、植物和贩卖到秘鲁的中国契约苦力,这些人就是实质上的奴隶。同时,自由黑人经常会成为佃农,他们生活在大农场边缘,为庄园主提供适当的无报酬劳动和租金。由于这些发展的刺激,棉花、甘蔗和谷物产品延伸到沿海地区。从阿雷基帕和利马用于出口羊毛和皮革的牲畜饲养业规模不断扩大,高地经济在小范围内也在迅猛发展。

1850年以后,秘鲁经济整体向上发展得益于许多因素,比如,美国北部地区棉花产业的暂时混乱和大量外国资金的流入。因此,棉花和甘蔗出口迅猛增长。沿海的大庄园通过把土著公社、佃农和分成农全部赶出他们土地,继续扩张。这个过程是伴随沿海农业的现代化同步进行的,而现代化则是在庄园引进轧棉机、锅炉、糖的提炼设备和蒸汽牵引机。

尽管农业部门的利润使利马商业和土地贵族过着奢侈的生活,但是秘鲁政府却陷入了更深的债务危机。鸟粪储备是秘鲁向外贷款的担保,其存储量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减少,而借款得来的绝大部分收入

用于偿付外国债务的利息。1868年,在军人考迪罗何塞·巴尔塔统治期间,财政部长提出一项计划,这项计划使秘鲁从困境中解脱,并且提供了发展资金。以前鸟粪被卖给很多代销人,而这项计划消除这一过程,已授予美国德雷福斯公司在欧洲的鸟粪产业垄断权。作为回报,该公司同意替秘鲁支付外国债务的利息,并且给予秘鲁新贷款,以帮助其渡过当前难关。这项协议取得了大量的新贷款,给了秘鲁未来无限的希望。

亨利·梅格(Henry Meigg)是美国投机商和企业家,由于在智利和阿根廷的冒险,他轻易地说服了帕尔塔和皮埃罗拉,使他们相信应该投资铁路系统的建设,以开发山区的矿产资源。因此,大量根据德雷福斯公司带来的利润,以及逐渐变少的鸟粪业收入中的很大一部分都被投入到铁路建设计划当中,而这项投资在可预见的未来当中没有显示出可获利。

帕尔多和平民党

对于产生于利马的当地商业和银行业中产阶级,德雷福斯公司的计划冒犯了他们的利益。以商业富豪帕尔多为首,并包括被德雷福斯公司取代的鸟粪代销商在内的一部分中产阶级,向最高法院质问了这项协议的合法性。他们指出,把鸟粪买卖分配到他们公司的当地代理商,会对秘鲁的经济发展更有利。这些当地中产阶级遭到挫败,但是他们于1871年组织了平民党(civilianist party,意为反对军人考迪罗),并提名帕尔多作为总统竞选候选人。平民党是“旧贵族和新生资本家”的混合物,他们反对教权主义和武装力量对政治的影响,并且提倡政府在国家经济发展中起直接作用。帕尔多轻易战胜了两个对手,于1872年就职。

在帕尔多的管理下,农业持续繁荣,一条航运线于1876年出口值达到一个高峰。外国资本不断地流入本国。这些年中,一个爱尔兰移民W·R·格瑞斯开始建立一个工业帝国,主要包括:纺织工厂、一条航运线、巨大的甘蔗种植园和秘鲁第一个大规模糖提炼工厂。虽然私

人工业繁荣了,但是政府却陷入了更深的债务和赤字泥潭。由于价格下降,鸟粪耗尽和另外一个重要肥料来源的竞争,鸟粪循环几乎到了终结点,而竞争是由秘鲁南部省份塔拉帕斯上的英国和智利资本家开发的硝酸盐业造成的。1875年,为了控制硝酸盐工业并增加财政收入,帕尔多征用塔拉帕斯的外资公司并垄断了硝石的生产与销售。私有财产被充为国有,得到不可靠的贷款,英国和智利的企业家被这项举措激怒了一十月,由于政府并不使人满意,这一状态,收归国有的举措也没能收到预期,经济危机。

1876年,秘鲁经受了世界经济风暴的压力。整个国家,利马主要的银行被迫关闭;以后的几年,政府不得不发行无价值的纸币。经济崩溃之后是军事灾难:太平洋战争。尽管秘鲁进行了英勇的反抗,但是由于智利拥有更先进的军事装备、政治稳定并且有英国资本家的支持,秘鲁仍然遭受了失败。太平洋战争对秘鲁经济的影响,从衰退开始到完全崩溃。智利占领了秘鲁的沿海地区,并对该地区进行掠夺,他们向太平洋出口粮食;掠夺大量的机器运到智利;并且派遣部队到山区的庄园、城镇和村庄。在凯赛雷斯将军的领导下,他们开始进行有效的游击战争,以削弱智利占领者的力量。1883年的《安孔条约》最终结束了战争。

古巴

由于不同的殖民地历史,古巴19世纪的发展和大部分拉丁美洲国家有很明显的不同。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于1492年在古巴登陆,在此后的三个世纪,这个岛主要充当西班牙舰队重要的中途停留地。古巴在很大程度上与横跨大西洋的市场孤立,没有珍贵的金属,也没有足够的居住人口,因此是一个被忽略的、人烟稀少的帝国边远居民点。岛上的大多数居民,工作于只贡岛内消费的小规模农场。和加勒比地区的蔗糖生产岛不同,17世纪末古巴奴隶人数很少(非洲后裔人数仅有4万,是海地的十分之一),而且大多工作于非农岗位,从事有技能的手工业。

经济和社会变化：产糖大王的辛酸收获

18 世纪上半叶，急速的经济和政治变化使古巴变成了单一种植的岛屿，即以奴隶单一作物物为生产和出口，作为经济谋生之道。由于 1762 年西班牙在古巴岛的部分领土被英国占领所激励，继而又被 1783 年独立后美国对古巴领土的割让刺激，古巴经历了一场商业的萌动。更为重要的是，19 世纪上半叶的海地革命，最坏了那个岛的糖业生产，使它不再像 18 世纪上半叶（现在他还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即使古巴发展成为了一个产糖大国和奴隶进口国。到下半个世纪，古巴的糖生产量已经赶上，甚至超过了被奴役的非洲人到达古巴海岸。从 1774 年到 1820 年，古巴黑人数量从 171 620 人猛增到 1 396 530 人，其中 30% 是非洲后裔。

最初，古巴糖业转变并没有刺激大庄园的创建。由于大多数转变后的农场主是那些已经拥有大庄园的土荒地，此外，许多农场主也并没有完全放弃其他作物，而是倾向于生产咖啡和土豆，由于废除了这些作物，农场主们开始从农业中享有非常可观的利润。而且，蔗糖作坊本身也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奴隶的需要（转动磨盘）和奴隶对粮食作物的需求。18 世纪下半叶，在农场主的人数有显著的增加，20 世纪的许多古巴社会的领导者都出身于这些农场。

世纪交替之际，因海地糖业生产被坏而造成的经济繁荣结束了，因为加勒比地区的其他岛屿也对同样的刺激因素做出了反应，开始扩大和着手生产。结果造成了严重的过量供应。正当市场从这次挫折中恢复之际，拿破仑战争时期，又利用外交手段关闭了美国港口。不久之后，古巴经济出现了两个新挑战：欧洲引进甜菜糖和英国发起废除奴隶贸易的运动（英国禁止西班牙于 1821 年结束奴隶贸易）。进而由西班牙霸权主义进一步加强，则制造成了更深层面的阻碍：那就是高额关税、欧洲人的垄断世界和拉美美洲独立战争造成的崩溃。

1820 年，首次一系列的科技创新开始改变古巴蔗糖加工业的特点。为了和甜菜糖加工业抗衡，作坊主需要增加运营，大量投资蒸汽



一位名叫布莱克·卡洛塔(Black Carlota)的非裔古巴妇女在1813年领导的一场令人生畏的奴隶起义,吓坏了西班牙派驻当地的官员以及克里奥尔种植园主们。正如这幅1830年的图所描绘的,这些种植园主依赖被奴役的非洲劳力来为他们的糖业种植园卖命。

设备。作坊越大生产的糖越多,消耗的燃料越多,需要的劳动力也越多。规模较小,效率较低的作坊处于极不利的竞争地位。现代化的设备,可以使作坊规模增大,但是由于有限的运输设备,这个过程只能逐渐完成。由于铁路建设耗资巨大,在古巴或者西班牙都还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支付如此大的工程,直到很长时间以后铁路才变得很重要。作坊在淡季大多不再生产,因而也承担着很高的开支。即使在收获季节过后,还需要给奴隶和牲畜提供食物和住处。作坊的燃料问题也限制了它的发展速度。作坊附近的森林很快被耗尽,而木料运输到工厂需要相当高的花费。

由于大作坊的需要,大种植园也在古巴发展起来。传统意义上说,蔗糖加工业建立在以下两种方式中任意一种基础之上:土地由当地居民或者临时劳动力耕种;或者分配给被称为“垦殖者”(Colonos)的农

时,他们可以从中学到工资或者一份作物。他们种植并收获甘蔗,然后送到工厂加工,而生产加工费用则用糖来支付。现在,为了满足市场之需,成功的种植园主开始扩张种植园,并且最大限度地使用大量的非奴隶。他们开垦土地、种收甘蔗并运送到加工作坊,一天工作达16个小时以上。在奴隶高强度剥削之下,大多数奴隶八年之内就死去,而幸存的人亦难以逃脱。土地所有权日趋集中和糖业种植园资本化之趋势,是19世纪上半叶的糖加工业剧增直接造成的结果。

19世纪上半叶,糖加工业的扩张表现在种植园规模增大、作坊数增多、奴隶数目增多。作坊数目从1827年的1000个增加到1846年1412个,到1861年作坊数已达2000个。19世纪的前几十年,再加之奴隶贸易,使得奴隶人数从1788年的1.8万人增加到1810年12.7万人;1811—1820年,西班牙奴隶贸易者贩卖的非洲劳工多16.1万人,其中,有人约20万奴隶劳作于古巴的糖加工业种植园。

贸易的扩张和大规模糖加工业的引入,为巴西创造了异乎寻常的繁荣景象,却促成了克里奥尔人起义,当时这场起义正席卷西属美洲的其他地区。在拉丁美洲独立战争时期,古巴仍忠于西班牙,因为古巴的克里奥尔人领导老土白奴隶起义,而且他们没有找到任何理由来损害所得到的繁荣。同时,由于种植园体制越来越严酷,不满情绪在奴隶和克里奥尔人之间蔓延;他们每人进行反抗,比如减慢工作、假装生病、破坏设备、人工流产等。除此之外,被奴役的非洲劳工定期用较大的奴隶起义来反抗奴隶制度,比如,1812年的阿庞特起义和1844年的拉·埃斯卡莱拉起义。在海地革命和加勒比地区其他奴隶起义的影响下,这些起义把非洲奴隶、古巴出生的黑人奴隶、自由黑人和有色人种团结在一起,共同争取消灭奴隶制和种植园农业。

19世纪下半叶,富有的克里奥尔人对腐败的西班牙官僚越来越感到愤恨,而西班牙政府则决定要克里奥尔人继续服从于西班牙在西半球拥有的这块最后和最富有的殖民地,殖民地越来越不满残暴的西班牙统治,在经济上也更少依赖于母国。随着古巴逐渐变成美国商品倾

销市场和所需物品的进口来源,美国并吞古巴的阴谋,出现在古巴岛上和其他北美洲圈子中。在古巴,保守的克里奥尔种植主在并吞中看到了反对废除奴隶制的保险之策;而在美国,一些赞成奴隶制的群体把并吞看作为种植园奴隶制的扩张获得广阔新地区的一种方式。一些人甚至想把古巴分成三个或者五个州,这样可以给美国南方国家政府提供源源不断的力量,但是内战使这些计划破灭了。

19世纪60年代,克里奥尔人的不满加剧,并且被正在发展的民族和阶级意识所激励。由于受到国内纷争和经济困难所接连打击,西班牙政府变得软弱不堪,因而克里奥尔掌权人士拒绝了西班牙提供的各种形式的改革建议。严重的经济衰退使克里奥尔人越来越清楚地感到,西班牙经济和政治政策严重限制了古巴的发展。

同时,古巴的糖业经济已经发展到局部专业化。在东部地区,人口较为稀少,主要由自由白人组成,黑人只占小部分,他们工作于大牧场,这些牧场为支配古巴西部基于奴隶制的蔗糖种植园的高耗供应肉类。东部的克里奥尔人地主,对奴隶劳动力的依赖比较少,因此,对奴隶的恐惧小于对西班牙统治的恐惧。塞斯佩德斯是一个克里奥尔地主,他于1868年10月10日在马埃斯特腊山区的亚拉村自发释放了自己的奴隶,并发起了古巴第一场反对西班牙殖民统治的独立运动。在接下来的十年战争期间,由于自由黑人和混血种人领导者处于支配地位,种族日益成为造成起义运动分裂的原因。他们的需求简单、直接:独立、废除奴隶制,并且建立殖民地之后的种族平等。

即使西班牙人想利用克里奥尔农场主的种族恐惧操纵分裂起义,但是,越来越多的黑人军事领导人却宣扬一种新观念,那就是国家超越种族。1869年,反抗运动起草了一部宪章,宪章声明“共和国所有的居民都是自由的”,并且给予“自由战争的所有士兵”以公民权,而他们中间大多数是古巴黑人。但是一些克里奥尔起义领导者担心,古巴黑人中的激进主义会同样要求从西班牙和奴隶主那里获得自由,因此,他们企图修订宪法来要求古巴公民,使他们“根据自己的能力任职”,很明显,这是对古巴黑人的歧视。他们还起草了《解放条例》,规定被解放的

奴隶从属于“奴隶主的所有者”或“其他主人”。自然,这些疏远了起义者与古巴主人,他们拒绝在废除奴隶制、独立和种族平等问题上妥协。对他们来说,古巴国民身份(Cubanidad)超越种族;身为古巴人,就应享有平等与自由,不再受到不管是来自西班牙、或是来自克里奥尔人奴隶主、还是来自自己认为的白人的影响。

十年战争

十年战争,是一场持久、充满仇恨和毁灭性的游击战争。1878年,起义者中只有少数白人同意接受和平,政府授予他们一部分自主权但拒绝给予独立,于是十年战争耻辱地结束了。《桑洪和约》的签订结束了战争,但是一些起义领导者却拒绝和解,比如黑人革命者“青铜巨人”安东尼奥·马塞奥,因为这项和约仅仅承认了起义军队中奴隶的自由,没有完成革命的主要目的:完全独立和废除奴隶制。结果,由于古巴主人拒绝投降,更多的奴隶逃到了逃奴社区,并且仍然拒绝工作或服从种植园主人。西班牙统治者企图用新的殖民地法律镇压这次奴隶起义,如限制奴隶运动,惩罚和外界联系的奴隶,禁止奴隶拥有弯刀并控制奴隶销售。

然而,尽管有这些措施,古巴黑人的反抗最终导致了1879年小战争的爆发。其特点是没有克里奥尔人参与,凸显了黑人的军队以及政治上的领导,要求废除奴隶制和平等权利。由于急需稳定岛屿,维持西班牙殖民政权以及防止加勒比地区产生第二个黑人共和国,西班牙政府于1880年废除了奴隶制来获取古巴自由黑人的忠诚,但前提条件是,解放了的奴隶要有一个八年的“保护期”,或曰“学徒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奴隶制的废除也除去了使克里奥尔人种植园主忠诚于西班牙的最后一个主要因素。此后,预期独立、出售自由、与美国无限制的交易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

十年战争和小战争对古巴社会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首先,十年战争期间,克里奥尔地主阶层有相当程度的减少,从而阻止了岛上形成一支传统的拉丁美洲土地贵族精英。其次,他们确信将来的古巴独立

领导者(白人和黑人)会成功废除“种族”概念,并以“民身”替代之。为此,古巴民族主义者何塞·马蒂和古巴黑人记者阿曼·戈麦斯、托·戈麦斯创作出一本战争记事录,记事录不再提19世纪战争中的“黑人起义者”,而是称他们为“国家英雄”。历史学家阿达·费雷罗认为,这些反霸权的文章反驳了西班牙人扬的未来“黑人共和国”,以及据称由“戈麦斯”“白人慷慨”的忠实黑人形象。

自然的,这种消极的黑人起义者形象与1886至1897年黑人政治活动是矛盾的。古巴黑人根据前十年的政治努力,组织了“有色人种阶级协会中央指导委员会”,这是一个把促进本岛和海外等作为最重要目标的团体。他们的目标是:创建免费的公办学校;要求有种族隔离的公民注册和“贵族称号”;保证平等使用公共道路、运输工具和公共住所。

再次,战争期间工厂的变动、1855至1897年的经济危机和岛上海路网的扩张共同刺激了大庄园的扩散。在大庄园发展期,工厂也需要更多的甘蔗,而这些甘蔗来自一个比以前更广阔的地域。同时,便宜铁轨的引进刺激了古巴(和全世界)的铁路建设。为了寻找更多的甘蔗,作坊主开始铺设自己的铁路。而运输的限制,是造成甘蔗需求竞争不为人知的一个条件。

作坊主面对的自然规律,就是在收获时期,在最可能低的价格下保证有足量的甘蔗。他们可以通过减少分成农的独立性,或取得这些人的甘蔗田而做到这一点。第一个办法是把曾经自由的农民变成了大作坊的附属品。第二个办法则创立了大庄园。小的和中等规模的种植园主中途退出,并逐渐被佃户或者临时工所代替。分成农一直到独立时都在维护保管他们自己的土地,但是独立以后他们日益被流入制糖厂的大量国外资本所征服。日益减少的经济资源,使他们难逃一劫。

美国的企业家填补了由克里尔奥贵族破败和西班牙利益团体破产造成的空白,数以千计的北美洲人带着自己的投资资金来到这个岛上,经营制糖厂或者商品住宅。1890年的《麦金利关税法》,废除了原糖和糖浆的进口关税,这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美古贸易和美国对古巴

和影响力；1866年，美国财团在古巴投资了5000万美元，控制了种植业。美国对古巴出口物的购买达到了其出口总量的87%。“制糖大亨”（美国亨利糖业公司）于1888年进入古巴岛，表明美国在古巴的影响力。这导致了制糖业越来越趋于集中。

尽管19世纪末把古巴变成了北美洲人的港口，但它在消除种族隔阂和歧视方面没做什么事情，即使是在古巴独立以后也一样。19世纪末，古巴由古巴精英和克里奥尔人中的白人至上主义者控制，古巴人无力为古巴社会的弊端的背黑锅。统治者拒绝让他们接受教育和自由，有偏见，拒绝平等，在享受充分的公民权利方面对他们设立障碍。直到1881年法律才对种族间的联姻解禁，但是自此以后仍然受社会的责难。

种族和宗教又制造了两个古巴：一个遵从西班牙文化传统和习惯，新教徒天主教和共济会；另外一个以非洲的萨泰里阿教为主，该教是一种融合性的大众宗教，也是一个秘密的相互援助社团。历史学家艾琳·斯奈格，这些古巴人，对其在西班牙社会中上升的能力被强加限制感到失望，因此转而逐渐依靠非洲遗产来保护自己，并且组织要求他们合法权益的社会抗议运动。

哥伦比亚

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的早期历史与解放者西蒙·玻利瓦尔的名字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委内瑞拉是他的祖国，哥伦比亚（后曾叫新格兰纳达）和委内瑞拉是他在拉丁美洲独立战争中首次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地方。玻利瓦尔试图将委内瑞拉和新格兰纳达统一为单一的强大国家，并且期望建立一个由所有使用西班牙语拉丁美洲共和国组成的大联邦，一直从墨西哥延伸到合恩角。1819年，安古拉斯图拉国民大会（在委内瑞拉）通过组建哥伦比亚国（后被叫做大哥伦比亚）将委内瑞拉、新格兰纳达、厄瓜多尔（当时仍然在西班牙的统治下）联合起来。1821年，在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的边境——库库塔，革命议会正式成立联合国家，并起草了一项自由改革计划，包括：逐渐废除奴隶制、废

除本地贡赋、土著人公社的土地划分为私人小块土地(一种叫“拟令土地”的“改革”)、禁止建立较小的男修学校并没收其财产、支持公共中等教育、制定一个教育的总体发展规划。议会还采用了中央集权的宪法,保证所有公民的权利,不分种族和种族。

根据玻利瓦尔的愿望,宪法创造了一个民选国家,这又体现了他对西班牙殖民统治的控诉。在玻利瓦尔看来,西班牙是一个专制主义国家,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奴役它的子民,并且阻碍他们发展与表现其最伟大。因此,受过启蒙教育的“建国之父”提出的共和国,在赋予多数被赋予完全的、平等的公民权利之前,有责任为自由反叛的孩子准备是“我”的责任。玻利瓦尔时代富有的克里奥尔人,与他们对于自由、平等、私有财产以及安全的理想相矛盾,他们是在建设一个共和国的框架,并保护私有财产和秩序,避免遭受妇女、被穷苦人及黑人角斗的暴乱反抗,因为所有这些都渴求自由和平等。

理所当然,新共和国面临的最紧迫问题是奴隶制。奴隶制,对非洲人以及他们的后代,自从奴隶制出现在早期殖民时代以来,对它的适应及反抗。其中包括奴隶起义、逃离到偏远地区,或像科库姆bes或帕伦克的自治村镇,以及其他的日常反抗行为。独立战争期间,玻利瓦尔和他的战友通过招募奴隶参加独立军并鼓励他们要求解放。自由黑人和混血人曾成群结队地走向军队投诚。独立后,奴隶、自由黑人和混血人,依据共和国法律和民族解放的承诺,可政府要求解放。作为对大众要求平等公民权的回答,克里奥耳统治者制定保护私有财产和家长制法律和政治制度。

废奴运动是克里奥尔精英之间以及他们和低级军官之间讨价还价的一个显著例子。1820年,按照军事需要和议会声明,“没有任何人是另外一个人的私有财产”。弗朗西斯科·德·保拉·桑坦德是玻利瓦尔指挥下的一个出色将军,玻利瓦尔命令他在安蒂奥基亚和乔科省通过许诺解放招募大概5000人的奴隶军队。这很自然地在奴隶当中激起极大的热情,但是这项举措疏远了矿山所有者和其他依靠奴隶劳动力的业主。为了缓解这些冲突,桑坦德把军队招募人数缩减到3000。



奴隶起义运动此起彼伏,是大哥伦比亚从殖民地向共和国转变过程中一大鲜明特征,也决定了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国内在19世纪就公民权问题发生的争论的本质。其中的一场起义发生在1761年,是由一名获得自由的桑博人何塞·莱昂纳多·奇里诺斯(José Leonardo Chirinos)领导的。智利画家伊恩·皮尔斯(E. Poir)在加拉加斯所画的壁画正是以这次起义为题材,并使其得到永远铭记。

人,并且命令其他奴隶回到他们主人那里。

像库鲁蒂议会那样的妥协,有效地延迟了奴隶制。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号召通过复杂的解放过程逐渐废除奴隶制。此后,所有的奴隶和生儿都应是自由的,但是他们需要为自己母亲的主人工作直至18岁成年。这项法律还建立了一系列地方奴隶解放洪达,该委员会是由当地的贵族组成,主要负责收集税款以偿付奴隶主的损失。众所周知,这类洪达很不称职,并且很大程度上代表奴隶主的利益,没能解放大多数奴隶。

尽管如此,奴隶仍外通过组织起义来对玻利瓦尔和克里奥尔人的政府施加压力,1821年至1827年,奴隶起义席卷了整个共和国。由于担心国家正在面临的毁灭,1828年玻利瓦尔颁布了一项法令,这项法

令有效集中了对地方洪达的控制,并且对不执行法令的地方洪达成员进行财政罚款。这引起了来自权贵和地方军人考迪罗越来越多的指责,如混血种人领导者何塞·安东尼·帕埃斯,公开指责玻利瓦尔的“独裁”行为,并于1829年号召大哥伦比亚解体。除了奴隶制引起的冲突,大哥伦比亚的存留取决于它的地理位置及经济和社会现实。由于它各部分之间距离很远,又处于多山地形,一封信从波哥大到加拉加斯大概需要一个月的时间,交流十分困难。这些状况还阻碍了委内瑞拉、新格纳那达以及厄瓜多尔同经济联系的发展。同跨越陆地穿越安第斯山脉与波哥大联系相比,加拉加斯和其他委内瑞拉沿海城市同欧洲交流相对容易。玻利瓦尔的理想是把一些独立的拉丁美洲共和国融合成一个联邦国家。但委内瑞拉的可可种植园主和商人连同后来加入的军人考迪罗领导人,不仅一点都不支持玻利瓦尔的这种观点,甚至更不支持他联合所有西属美洲国家组成一个联邦联的思想。

帕埃斯,保守派和自由派之间的分歧,1830至1863年委内瑞拉联邦战争

1830年5月6日,议会在巴伦西亚召开,为独立的委内瑞拉制定一部宪法,这是这个国家在不长的历史中第三部宪法。宪法规定,只有21岁以上自由的高收入男性才有选举权。这项要求排除了大部分的人,使90万人无缘参加政治生活。这些人中60%是非洲人后裔,另外15%是当地人,剩下的25%是白人。他们中只有很少的小部分,大概1万人组成了统治阶层,其中包括富有的商人、大庄园主、官员以及军官,而通常军官也是大庄园主。这个阶层的成员经常通过家庭网络联系在一起,对政治进行控制。

军人英雄何塞·安东尼·帕埃斯,被选为总统兼军队最高指挥官,他很长时间以来都是委内瑞拉独立战争的斗士,也是以前的大庄园工人。他的成功,显示可通过允许通常出身卑微的军人考迪罗成为新的精英,使旧殖民统治阶层得以重生。在帕埃斯管理下的委内瑞拉社会与经济同殖民地社会经济秩序很相似。大庄园仍然是最基本的经济活

一位独立派领袖小温军人考迪罗对保王党人的庄园和公共土地的没收并，土地占有集中十分严重。1830年的法令强迫出售所谓未耕种的土地，给大地主提供了更多的扩张土地机会。在乡下，劳资关系仍然以奴隶制、雇工制以及不同形式的租佃制为基础，其中包括收益分成和强制个人服役。

和拉丁美洲其他地区一样，委内瑞拉的奴隶制很长时间以来也处在动荡状况。被奴役的非洲人对奴役公然反抗，或通过抵制、反叛等被镇压形式，或逃到荒岛（逃跑奴隶的定居点），从而使奴隶制成为社会不稳定、经济低效率的因素。根据1821法令的规定，奴隶主需要在奴隶解放第一代所出生的自由黑人，但他们仍继续坚持保护自己私有产权。因此，1830年的委内瑞拉制宪大会，通过了一项奴隶解放法令，这项法令将奴隶主对奴隶的控制延长到21岁。此后，另一项条例又包含了一项限制性的“学习期”计划，将解放奴隶的年龄从21岁延长到25岁，从而确保此期间主人对其劳动力的控制。由于殖民地后期开始出现的趋势仍在持续，许多奴隶主发现自动解放奴隶更有利可图，因为被债务和其他义务所困，他们作为承租人或者短工依然留在以前主人的土地上。到1841年，有1.1万个奴隶通过这种方式获得自由，其中只有150人是因为到了被解放的年龄。但是1844年，仍然存在着4万名奴隶。

长时间的革命战争造成了极大的原料毁坏和人员伤亡——人口锐减到26.2万人，并且破坏了国家不同地区原本脆弱的经济纽带。然而，到19世纪30年代，委内瑞拉却经历了一场经济繁荣，这场繁荣是以主要出口物由可可转变成咖啡和国家融入资本主义市场为基础的，从此以后，这一市场购入了委内瑞拉咖啡、可可、靛蓝染料和皮革出口的80%。

较高的咖啡价格以及1830年的繁荣，使种植园主渴望通过贷款拥有新的土地以增加产量。外国工商资本家、委内瑞拉进出口商人（前者的代理人）和当地的放款人很乐意用咖啡作物和种植园主的庄园作为担保进行放贷。但是，殖民地法律却设置了障碍，对利率进行规定并且

处罚高利贷。1834年委内瑞拉议会通过的贷款法消除了这一障碍,该法废除了西班牙在契约上所有的传统控制,不管利率多高,只要是合法有效的合同,国家都会强制执行。19世纪50年代后期,随着咖啡价格的下降,委内瑞拉经济逐渐陷于困境。与债权人拒绝再为债务人筹钱,这使得委内瑞拉陷入更严重的萧条时期。经济危机在精英阶层中引发分歧,派系产生了,并且在40年代发展成政治派别。其中一个称为保守党,反对党成员把他们称为“哥特人”,把他们和不受欢迎的西班牙殖民统治联系在一起。帕埃斯是该党公认的领导人,他代表着庄园主、商人、外国合伙人、债权人、高级行政和军事官僚和一些人,他们寻求保护和利益。自由党是安东尼·莱奥卡迪奥·古斯曼领导的,是一个由受债务困扰的种植园主、城市中产阶级、工人、寻求改革的军官、分子和反对帕埃斯长期独裁的考迪罗结合而成的松散联盟。

古斯曼对保守党的经济政策的严厉抨击,促成了圣多明各议会从1839至1852年一系列的公众起义和奴隶暴乱,最终导致圣多明各内战私人财产的公开战争,起义和暴乱使保丁党人陷入,他们发起了黑人、血种人和奴隶间的全面社会种族战争。尽管保丁党人责怪古斯曼的煽动性鼓动,事实上,自由党和他们的对手一样害怕社会革命,并且他们和这些起义没有任何联系。但是政府用想象出来的原因决定对他们进行镇压,对古斯曼进行审判,认定他煽动起义运动有罪,并判处他死刑。

到了1854年,普遍的动乱、奴隶起义以及对奴隶制的被动抵抗,大增加了奴隶制的成本,它和全世界咖啡价格下降结合起来,严重影响了种植主的利润。此后,保守党企图通过支持议会通过许多法律来支持他们的同盟者,这些法律是为了帮助处于困境的种植主而制定的。其中的一项法律废除了委内瑞拉的奴隶制,并且保证对奴隶主的赔偿,其中很多人为了避免提供资助费已经自动释放了奴隶。

事实上,废除奴隶制旨在结束一场经济上花费很高和社会上的破坏稳定的民众运动,但是解放奴隶给大部分自由人的生活没有带来什么改观。由于缺乏可提供各种职位的现代工厂系统,以及任何分给他们土地的计划,很多人不得不作为背负着沉重义务的佃户,继续工作在

，用奴隶工资，而其他一些人赚到以代币发放的勉强工资，只能在市场上以很低的垄断价格兑换想要购买的物品。

19世纪50年代，艰难的日子还在继续。低走的咖啡价格和精英社会制度更让担心，迫使保守党和自由党暂时将力量联合起来，但新政府又很快垮了。一部分极端保守党人夺取了权力，建立了一个新政府，并禁止驱逐了许多自由党人，后者则以一场起义作为回应。这场起义也是联邦战争(1858—1863)的开端。

“自由”这个词对自由党精英人士和普通追随者有不同的意思，后者多是混血儿和土著印第安人，他们集合起来参加联邦战争，高呼“杀白人”。尽管这个词指出自由党精英人士在煽动一场“种族战争”，但“自由党人”看来，这是一场穷苦大众和富有的精英人士之间的战争。胜利以后，自由党领导人给国家制定了一部新宪法(1861)，新宪法有很多改革措施，包括授予全体男性拥有选举权，并增加了20%的公民权。但是没有实质性的社会改革，那些权利实际上都是没有意义的。新宪法下的联邦制度，仅仅意味着地方考迪罗依然存在，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人还是大庄园主。

然而，对于在一场起义中站起来反对保守党政权，聚集在自由主义旗帜下者，这个词有着不同的意义。在瓦韦里·萨莫拉，是在埃基基耶尔·萨莫拉(Zamora)的宣言中被赋予了意义，他是一个退伍的游击战士，支持原来的苦工和佃户占领大庄园，支持建立联邦国家并主张公民推举当地政府机构。萨莫拉是联邦战争平民主义和社会革命趋势的代表，1860年，一颗行刺者的子弹夺去了他的生命。

由于担心农民革命者力量不断壮大，保守党人和自由党人同意和谈。1863年的协议结束了战争，这场战争以将近5万生命为代价，并且对经济造成了沉重的打击。许多庄园被毁坏，并且由于战时劫掠和忽视，大草原上的牛群也完全消失了。和独立战争一样，联邦战争也只造成了有限的改变。旧的保守党寡头统治政权解体了，获胜的一些平民出身的自由党军官占领了他们的庄园。但是普通士兵，战争

的胜利以后,却被迫放弃占有的小块土地,回到原来的大山,山中继续做雇工。

桑坦德与哥伦比亚两党制的诞生,1830—1850

继委内瑞拉和厄瓜多尔 1830 年从大哥伦比亚分离出来后,新格拉纳达共和国名义上其余的领土也走向了分离道路(即今天的巴拿马和哥伦比亚)。在玻利瓦尔的老战友桑坦德的领导下,新格拉纳达通过了一项宪法,宪法规定:总统选举四年一次,设两院制国会及行政司法机构。宪法赋予所有已婚成年满 21 岁、非家佣佣人或家奴的白种男性有选举权。实际上,一小撮贵族统治阶级主导着政治生活。

地理、经济和新国家的社会状况给新生的民族社会的发展造成了更大的障碍。该国处于高等的安第斯山脉的阴影之下,山地、各地和高原是百万人的家园,复杂的地理环境对交通运输带来了巨大障碍。

新格拉纳达显示出许多前资本主义特点。大部分生产活动(编织,纺织,陶器制作,制鞋)在家中以妇女为主进行。许多国家投资的企事业开始努力建立生产肥皂、玻璃制品、纺织品的工厂,并且在波哥大建立了钢铁厂,但是大部分都以失败而告终。19 世纪 40 年代相当大的工匠群体出现在较大的城市,比如波哥大、麦德林和卡利,尽管本地工业有适度的关税保护,它们仍很难与国外进口的产品竞争。经济落后在交通方面表现最为明显,直到 20 世纪,该国部分地区还一直以搬运工人和骡子做运输工具。甚至在轮船航行成为马格达莱纳河的常用交通工具后,从大西洋港口航行到波哥大要花费四至六个星期。生产力的有限发展和经济活动缓慢的节奏,为精英阶层只创造了不多的财富。19 世纪上半叶,波哥大的上层人物大概人均收入达到 5 000 美元,而资产达到 10 万美元的人屈指可数。

缺乏刺激经济的活跃出口基地,并向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提供资源,是 19 世纪上半叶哥伦比亚经济和政治上的主要困难因素。力求用烟草、棉花和其他出口商品取代日益衰退的黄金产业,造成了一系列短暂的经济繁荣期,但是由于市场萎缩、价格下跌和不断增长的国外出口

内战,新的繁荣很快崩溃。出口基地和全国性统治精英的缺乏,可以说明当时发展中出现“经济群岛”、区域隔离和自给自足的原因。专制之外则是政治独裁,而政治独裁则代表着永久的不稳定,因为军事的干预、战争与威胁,甚至有大庄园主出身的将军的分权裂土。私人可以动员由奴隶组成的私人部队,同竞争的军人考迪罗或脆弱的中央政府划分势力范围。

大庄园主控制了经济命脉——农业,它们主要种植小麦、甘蔗、咖啡并且经营牲畜。它们的劳动力通常由混血种人雇工或者佃户组成,佃户按劳动或者实物支付租金,以换得种植自己承租土地的权利;佃户还经常受到债务的限制,有时他们还要为主人个人服务。

在这些大庄园周围,山坡边居住着其他的农民,他们主要依靠农作物或为相邻地区提供农作物来获取靠不住的独立。安蒂奥基省西北部地区有着崎岖的地形和很少的人口,这里庄园不多,但有多数的中小型土地所有者。一个更加独立的农民阶层也出现在桑坦德省。西班牙人奴役了成千上万的非洲人及其后裔劳工在种植园劳作或在西部各州和加勒比海岸开采黄金。然而,这些机构被独立战争、奴隶反抗以及“自由胎儿”法律极大地削弱了。

然而,奴隶主竭力捍卫他们的财产权,并要求限制废除奴隶制的速度以及1821年后出生的自由民的权利。在19世纪40年代期间,为了确保奴隶儿童的主人有丰富的廉价劳动力,法律限制获得自由的奴隶的流动,将违反法律的流浪者关进监狱,并批准庄园主,实行强制“学徒”制度,即将获得自由者安置到贸易行或其他有用的职位上,直到他们25岁。

显然,奴隶和获得自由者们通过激烈的反抗或者逃跑来阻止政府对他们的劳动实行控制。此外,他们还和商人、技工、自由人联合起来创立了一个致力于立即解放跨阶级多种族同盟。一些获得了自由的黑人甚至通过他们所坚持的天主教理想国、无政府主义和平等主义的信念而将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视为一丘之貉。这个大规模的运动成立了一个“民主协会”组织,不断施压何塞·洛佩斯·希拉里奥的自由

党政府废除奴隶制。最终,政府在保释奴隶主获得充足的赔偿以平息他们的反抗以后,于1851年废除了奴隶制。这些措施导致了大概25000个奴隶,这对很大程度上依赖奴隶劳动的全国经济造成了最重大的影响。

但是自由主义者经常将奴隶解放和混血等——了起来,即“同一个上帝、同一个民族和同一种语言”,要求非洲人和不同土著和印第安人作出牺牲,以创造一种统一的全民性的拉丁美洲文化。这导致了印第安人和非洲人牺牲公共土地以及他们的自治政治传统。然而,自由主义者加强攻击本地公共土地及被强制定分的“被解放”土地,前者通常会通过合法或者不合法的手段流入到相邻的大片土地手中。印第安人因此而没有了土地,成了需要服役于白土地主的雅士。

在他们努力创造一个统一的“混血种人”国家的同时,自由派人力图同保守派对于划清界限。直到19世纪40年代,两个流派之间的思想体系和行动纲领的不同越来越不明确。实际上,两者都代表了上层阶级的利益,并且都采用了形式上的代议制民主及共和宪政府;两者都相信社会和科技的进步,并且相信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及其他公民自由,经济政策上采用自由放任的经济策略。没有政党关心农业问题或其他的乡村和城市民众问题。唯一使他们伤神的问题是宗教和政府的关系以及宗教在教育中的作用。新兴的自由党鲜明地反对教权主义,将宗教视为进步的敌人;然而,他们崇尚信仰自由并且将宗教和政府分开。早期的保守党支持宗教宽容,但崇尚宗教和政府的合作,他们相信宗教可以提高道德和增进社会和谐。

在争取解放的斗争中,自由派和保守派的思想意识出现了更大的分歧,并且出现了新的政治派别:各各他分子(gólgotas)^①,城市手工劳动者和德拉古分子(draconianos)^②,以及后来与工匠结盟的低级别军人在烟草种植业迅速扩大、咖啡周期开始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国内外贸易

① 各各他为耶稣被钉在十字架的地方,也是信仰耶稣基督的犹太人。——译者注

② 德拉古为古希腊政治改革家,这里意为改革派。——译者注

下,开成此各各等分子是商人阶层的儿子,而该阶层到 1850 年人口已增长到 200 万。

又对奴隶制的发动、法国浪漫主义、空想社会主义以及 1848 年法国的教育和革命,这些人发展成为自由主义的一个极具情感的派别。这主要是基于对基督教的浪漫主义理解,在他们那里基督被描述为“圣父圣子”,并以 19 世纪世俗改革先驱的身份出现。这一思想体系“是它要求废除奴隶制、教会和军人特权、强制性的十一税和对自由企业的所有限制。”

在 19 世纪前几十年中,人口数量不断增长的城市手工业者面临着外国进口商品和英国廉价竞争,后者导致了严重的失业。他们的困境来自于奴隶制和使他们的利润受益的较低关税造成的,他们很容易接受对奴隶制的政治斗争中的自由平等话语。1847 年,他们创立了一个从波多黎各土协会开始的“民主协会”关系网,该网络差不多有 100 多个成员。这些互助协会成员开展教育和慈善活动,同时也是自由派领导人的政治工具,使那些被土地贵族大力支持的新商人精英能够去追寻自由放任和现代性的胜利。

然而,又对奴隶制的斗争提供了一种历史环境,在这种环境中巴西、古巴、秘鲁、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确立了各自的国家身份,与此有密切关系的种族和身份问题也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自由主义者从根本上抓住了自由和平等的话语,一直坚持进行各地区的废除奴隶制运动,坚持奴隶解放,但是他们也创造一种民族话语,它要求从外国统治和政府控制下获得自由,这也是维护他们的阶级特权和财产的必要条件。这种民族语言试图平息种族平等及群众民主参与的更为激进的要求。

第十一章 新殖民主义和自由国家的胜利(1870—1900)

焦点问题：

- 什么是新殖民主义？它的经济和政治特征是什么？1870至1900年期间，自由国家在推动国家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 墨西哥的波菲里奥·迪亚斯政府对土著社区、土地、劳工、贸易和外国投资等采取了什么样的政策？
- 阿根廷的胡里奥·罗卡政府对土著社区、土地、劳工、贸易和外国投资等采取了什么政策？
- 胡斯托·鲁菲诺·巴里奥斯在危地马拉实施的自由主义改革计划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 安东尼奥·古斯曼·布兰科在委内瑞拉的纲领和拉斐尔·努涅斯在哥伦比亚的计划有什么不同？它们又是怎样分别影响了国家的经济发展？
- 自由主义的一系列计划和何塞·马努埃尔·巴尔马塞达(José Manuel Balmaceda)在智利的发展政策有什么不同？自由主义发展计划是怎样影响社会底层阶级，特别是农民和工人的？

欧洲工业革命大约于1870年开始，其不断加快的步伐刺激着拉丁

的经济和政治以更快的步伐发展。由于原材料和食品需求不断上升,拉丁美洲的工业增加了它们的商品产量。自由国家政权巩固的殖民政治稳定性不断增强,这也减轻了该地区对欧洲和美国不断增长的贸易依赖。

受增强的殖民主义和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鼓励,欧洲资本大量涌入拉丁美洲,修建铁路、码头、工厂和其他扩大生产贸易所需的项目。拉丁美洲国家进入了世界经济体系,在该体系中,它用原材料和食品交换来自美国的工业制成品。自由贸易政策逐渐被拉丁美洲各国所采用,这有助于它们进行了创建本土资本主义体系的努力,从而加速了该区域融入国际劳动分工体系。

新殖民主义

在有人本主义革命和之后的美国取代西班牙和葡萄牙占据主导地位之前,世界经济体系加速了拉丁美洲对英美的依赖,这也可以称作“新殖民主义”。尽管它存在内在的缺陷和在本土市场出现一些衰败迹象,直到1911年新殖民主义秩序还是呈现出相当稳定的状态。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拉美贸易出现混乱,所需制成品的进口面临困难,这标志着新殖民主义和自由国家全面危机的开始。

244

虽然从1870年至1911年的这段时期,拉丁美洲经济的总值在快速增长,但这个发展过程的步伐和程度都非常不平衡,一些国家(如玻利维亚和巴拉圭)加入这个发展的进程远晚于其他国家。新殖民主义秩序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它的片面性(单一耕作)。一种或者几种主要产品成了国家发展繁荣的基础,当国际市场上对这些产品的需求和定价发生波动的时候,这个基础非常容易被摧垮。阿根廷和乌拉圭依赖小麦和肉类;巴西依赖咖啡、糖,也短暂依赖过橡胶;智利依赖铜和硝酸盐;洪都拉斯依赖香蕉;古巴依赖糖。

在拉美国家,现代出口部门变成一个孤立区域,很大程度上与其他经济部门隔离,并且榨干了其他部门的劳动力和资金,从而加重了它们的衰退。现代经济出口导向的经济特点在国家铁路系统建设模式里非

常明显,这个模式不是被设计用来整合国家内的各地区,而是为了满足出口工业的交易需求。此外,现代出口经济经常是建立在极度不稳定的基础上,快速、狂热的增长,然后时不时被突然全面崩溃导致的萧条所打断,这构成了新殖民主义模式的一个部分;这些如流星般短暂兴起和衰落的故事中有:秘鲁的鸟粪、智利的硝酸盐和巴西的橡胶。

19世纪末期,新殖民主义在拉丁美洲的胜利并非是不可阻挡的,或者说这并不是由于欧洲经济“领先”以及这个区域过去的独立史所预先决定的。从殖民或者半殖民经济或社会到自治的资本主义体系的跳跃,虽然很困难,但并不是不可能的,正如日本所做过的那样。独立之后,新生的国家必须要在自治和依赖之间做出选择,或者,如历史学家佛罗伦西亚·马龙(Florencia Mallon)所说的那样:“在拉丁美洲,和资本形成和注重对日益依靠出口生产之间,外国市场和资本最终选择了后者。”但是,如果没有大主国的解体,劳役制度制度或者其他形式的劳工制度的废除,以及对本土工业采取从始至终的支持政策,自治资本主义所需的有活力的企业家阶级和大型国内市场的形成,还是无法达到的。但是这些改革需要一个强大、积极的单一民族国家,致力于玩弄市场力量和重新分配物质资源。然而,大部分精英觉得这些举措成本太高并且具有威胁性。取而代之的,他们接受了自由发展的理念,这些理念强调私有化公共资源,减少政府支出,消除官僚作风,为外来投资者提供优惠,以及鼓励进口贸易。因此,大部分拉丁美洲精英选择了继续保持依赖这条更为轻松的道路,开始是大不列颠帝国,而后是美国分别取代西班牙成为他们依赖的对象。

但是,19世纪的拉丁美洲也采取了一系列非凡举措来打破这种依赖局面。我们已经讨论过这样的两种努力。弗兰西亚博士和洛佩斯父子领导下的巴拉圭提出了一个短暂而又成功的自主发展计划,他们以国家为主导的土地改革和工业多样化计划将巴拉圭从一个落后国家转变成了一个相对繁荣进步的国家,但是灾难性的巴拉圭战争中断了这一计划,并且将巴拉圭又带回那个落后并且依赖性强的国家。1850年代在智利,一个由矿业资本家、小农场主和工匠组成的联盟试图推翻土

自由派领导人,同时推行激进的政治社会改革;但他们“失败的革命革命”被无情地扼杀了。在这一章节我们将探讨智利在“智利革命”后土地发展的第一次努力,也由于其领导者的死亡而以失败告终。

大农场体系的扩张

新殖民主义和自由主义在传统的土地占有和劳动关系构筑的框架中进化。事实上,它导致了大庄园体系扩张,并达到一个远远超出殖民时代。自由主义一方面受到拉丁美洲产品需求的持续增长,以及国内土地价格上涨,大地主阶层在一个又一个国家发起了对土著人居住土地的侵占。至少在部分地区,这样的侵占反映出自由主义者在土地所有者竞争中努力。19世纪50、60年代,墨西哥改革运动为这次侵占奠定了法律基础;并在波菲里奥·迪亚斯时代达到了高潮。在安第斯山脉地区,相似的立法行为将所有的公共土地变成了个人私有品,导致了周期性的土著居民暴乱和政府血腥镇压。但是,不是所有的土著居民都反对这种在19世纪将古老的公共土地所有体系所做出的努力。无论在墨西哥还是安第斯山脉地区,市场经济的兴起已经在村庄中引发了巨大的社会经济差异,土著居民开始经常主动实施公共土地的私有化,并将其视作一条个人致富之路。

自由派政府没收了教堂所有的土地,也促进了大庄园的发展。墨西哥利用《莱尔多法》和《华雷斯反教权法》,再次提供了一种新的模式。跟随墨西哥的先例,1860年代哥伦比亚的自由主义政府也没收了教堂的所有土地;1870年代自由派独裁者安东尼奥·古斯曼·布兰科在委内瑞拉没收了许多教堂的不动产;1895年厄瓜多尔的自由主义者征用了教堂的所有土地。

通过铁路建设和战争而实现的公有土地扩张也促进了大型不动产的扩张。从教堂或者是土著人社区强行征来的土地,通常被以微不足道的价格大量地贱卖出去。土地的集中化,使得土著人或是印欧混

血种人的小型土地所有者拥有的可耕种土地减少了,促使看门是小型庄园的普遍发展,这些小型农场依然低效率地使用原始技术耕种小块土地。

被征用的土著人社区的所有土地,不管是立即使用还是保留着以期望升值,都使大地主们具有了在劳动力需求增长的时候,有计为控制当地的劳动力资源这样一个优势。被没收土地的土著人绝大多数转变成了全部工资以现金偿付的真正工资阶层,因为这样的大大地主,他们拥有太多的精神独立性。一种称作债务租工的劳力制度被广泛使用,在这个制度中,工人工资的全部或者部分以所在公司商店的商品或代币券形式偿付,这些商店的高价和经常性的亏累迫使工人被迫偿付的债务一代又一代传了下去。法律强制规定这些债务(Peón)有义务一直留在这些庄园内直到他们还清债务。反对低工资,反对反对程序所要求的更集中的劳动方式的这些债务雇工们,在地主手下的武装镇压,或者是当地警察或军事当局的压迫下,他们的反抗,失败了。

在一些国家的这个时期可以看到,在土著居民有组织的劳动方案中,殖民地时期的劳役摊派制正在复兴。在危地马拉,这个制度要求健壮的上著居民为庄园主工作一定的人数。自由派总统胡斯托·鲁诺·巴里奥斯向负责此项事务的地方长官发布命令“任何想要逃避自己义务的印第安人将受到严格的法律处罚,农场主要被完全保护起来,并且每个印第安人在工作期间必须要全天工作。”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即使离中世纪已经非常久远,奴隶制依然残留在一些区域——比如,秘鲁残留到了1855年,古巴残留到了1886年,巴西残留到了1888年。与奴隶制相似的是奴役体系,在这种体系下,1849至1875年间,9万个中国苦力被运送到了秘鲁,开采岛上的鸟粪和建设铁路。“奴隶制”这个词,同时也用于这样一种体系,即被驱逐出境者和当地被捕的造反者被墨西哥当局送往墨西哥南部种植咖啡、烟草和剑麻的农场充当劳力,处境苦不堪言。

农业劳动和农场租佃的现代制度仅在巴西南部 and 阿根廷出现,因为这些地区劳动力短缺,需要采取更大的激励措施来鼓励。1870年到

1. 年从欧洲大批涌入到比的数百万移民

在采矿业以及 1890 年之后在某些国家建立的一些工厂中,劳动状况更差。最坏的情况下,每个工作日工作 12 到 14 个小时,微薄的工资以公司专用货币兑换代金券的形式发放,还要忍受雇主和监工专横残暴的对待。拉丁美洲法律一般禁止罢工或者其他要求改善工作条件的有组织的运动,而且警察或者其他被雇佣的武装力量也被用来镇压罢工,经常会导致严重的伤亡。

外资控制资源

与新殖民主义一起兴起的,是掌控这片大陆自然和人力资源的外资的高速度增长。这一过程经历了几个阶段。1870 年,外资主要集中在贸易、造船、铁路、公共事业和政府贷款上;当时,英国资本家在拉美的投资市场享有毋庸置疑的统治地位。至 1914 年,外国公司的所有权已经扩张到大部分采矿业,并且已经深入到房地产业、牧业、种植业和制造业;至那时,英帝国的对手已经有效地挑战了其在拉丁美洲的统治地位。在这些对手中,美国的表现最为耀眼,其在拉丁美洲的投资从 1870 年几乎可以忽略的程度,上升到 1914 年的超过 16 亿美元(当然还是与英帝国的投资有着接近 5 000 万美元的差距)。

外国经济的渗入,是与政治影响的增长甚至是武力介入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年轻的美帝国主义被证实是他们之中最有侵略性的势力。1898 年后,“美元外交”和大棒政策的结合使加勒比海变成了“美国湖”,古巴、多米尼加共和国和几个中美洲国家都陷入了附属国的境地,成为了美国羽翼下的保护国。

政治收获

新的经济要求采取新的政治政策。无论是保守派还是自由派,都为出口激增所带来的繁荣景象而着迷,地价上涨,外资涌入,政府收入增加,使他们抛弃了与对方在意识形态上的差异,都加入到了对财富的追求中。实证主义者的“秩序和进步”的格言,现在变成拉丁美洲统治

阶级的口号。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适者生存理论(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的“劣等民族”学说,常被用在种族主义者的宣言中,以支持他们关于土著人、黑人、印欧混血种人和黑白混血种人内在劣等性的观点,这些理论也进入到了社会阶级的意识形态中。

出口在国家经济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主导地位,自由土地贵族和更多资本主义导向的群体达成了共识,都导致寡头制和中央集权制之间的冲突,或者是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分歧,失去了他们原有的大部分意义;在一些国家,旧的党派界线消失了或者变得微不足道。一些自由派领袖——墨西哥的波菲里奥·迪亚斯,哥伦比亚的拉斐尔·努涅斯,危地马拉的胡斯托·鲁菲诺·巴里奥斯,委内瑞拉的安东尼奥·古斯曼·布兰科——都象征了政治上的融合。

到19世纪末,在一些国家,不满的城市中产阶级、移民和土著人组织联合起来成立各种党派,无论是激进的或者是民主的,都挑战着西班牙奥尔人土地贵族传统的政治领导地位。他们要求政治、社会和教育改革,这些将会给中间阶层更多的关注。但是这些中间阶层——制造商、零售商、专业人士(professions)等——在很大程度上是新殖民主义秩序的产物并且依赖其谋生;因此,他们理所当然地不会怀疑新殖民主义的生存能力。1890年,在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出现了国家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工团主义者的小型组织,对资本主义、新殖民主义和自由国家发起了挑战,但是这些运动的意义在未来才得到全部显现。

从1870至1914年这段时期,刚才所描述的那种趋势使得墨西哥、阿根廷、智利、巴西、中美洲、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在历史上出现了某种一致性。然而,在这些一致性下,各个国家又展现出很大程度的差异性——这个差异反映了其独特的历史背景和环境。

墨西哥的政治和经济

迪亚斯的独裁专政统治

1876年波菲里奥·迪亚斯将军掌权并得到了各个派别的支持,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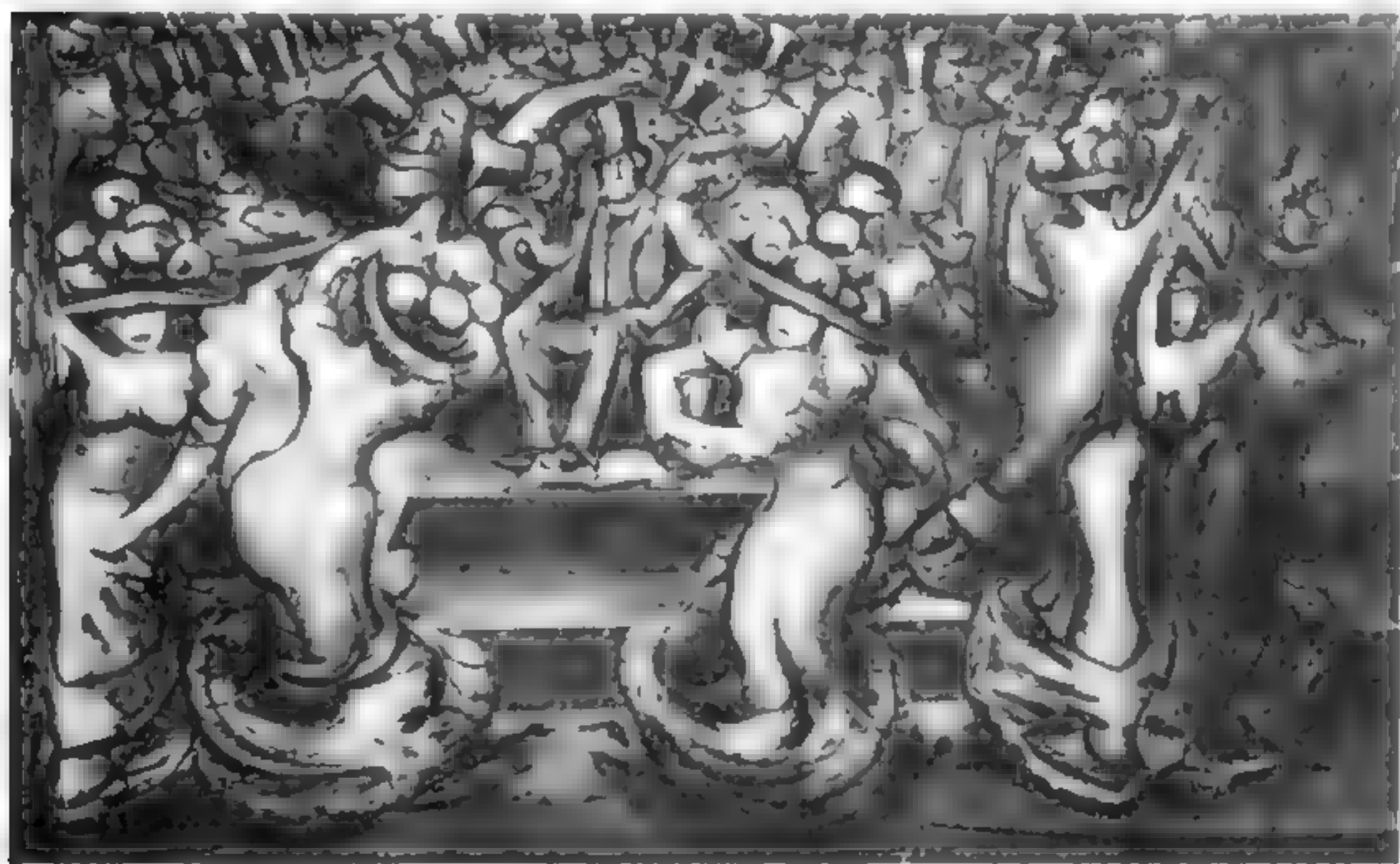
打倒其前任总统迪亚斯和军队领导人,对旧政权家长制政治感到失望的土著人,以及相信迪亚斯会保护他们的土著人和印欧混血儿。迪亚斯之所以成功也主要归功于美国资本主义家,军队指挥官和地主,他们公开支持,而卡斯蒂略人地主认为他的前任是“反美主义者”。迪亚斯提供了军火和钱。之后,波菲里奥·迪亚斯建立了一个独裁政权,它成为墨西哥历史上最长的个人独裁政权之一。

迪亚斯独裁政权的建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他的第一届任期内,他的政策是谨慎的。他接管了一个极权,包括一个态度激进的劳工报刊,都是自由主义者。迪亚斯的经济和政治政策大纲很快就变得清晰了。面对国内外的压力,迪亚斯决定依靠大地主和军队,只有他们能帮助他保住他的政治生命。迪亚斯承诺保护他们与所有权和其他既得利益。迪亚斯曾向墨西哥人民群众与土著斗争中曾经信誓旦旦宣告过要保护土著人民权益的人,现在却派遣军队去镇压农民对征用土地反抗。迪亚斯,虽然在掌权之前他曾公开指责前政府对英国资本和外国人的排斥,但是在1880年,迪亚斯甚至给予修建铁路的北美电力公司特许权。对于迪亚斯来说,经济增长已经变成了最重要目标,也是解决他个人和这个国家的问题的关键。

经济增长需要政治稳定;为此,迪亚斯推行了“面包加大棒”的政策。这种政策就是:向有权势的势力伸出橄榄枝,并且跟他们分享战利品,而不管他们的政治背景和信仰。对嘴里含着骨头的狗,迪亚斯有句口头禅说:“要不就杀死狗,要不就偷走骨头。”事实上,迪亚斯邀请了所有的上层阶级和部分中产阶级,包括享有盛誉的知识分子和新闻记者,参加富人的墨西哥野外烧烤,而穷人和地位低下的人被挡在了门外。迪亚斯推行的改革——比如说政府职位和垄断企业内部的工人——的反对者会遭到报复。不同政见者被殴打、谋杀,甚至是被处决。迪亚斯在圣胡安城堡(San Juan De Ulua)或者是劳森岛(Prison de San Juan)的巴士底狱地牢囚禁。执行这个政策最重要的一支力量是乡村武装队(rurales),它原本是由强盗和游民

组成,之后逐渐被新招募的因波菲里奥时期发生社会大反革命失业的工匠和农民所取代。除了追捕反抗不化的印第安人,警察的另一个重要职责就是镇压农民反抗和破坏罢工」。

通过这些手段,迪亚斯从墨西哥夺去了他所有的有力反对者。1857年宪法和它所承诺的自由只留在了纸面上。选举对于国会——理论上的国家最高机构——只是一场闹剧;迪亚斯只是简单地把他的候选人名单分发给当地行政官员,然后他们只须要确认这个名单。这位独裁者轻蔑地称呼国会为他的马槽。省长也由迪亚斯指定,通常是从大地上或者他的将军中选出。为了换取他们的忠诚,迪亚斯给他们提供金钱,随便恐吓当地居民。这些人之下的有权力“政治大员”(jefes politicos)的地区首领,也是经过迪亚斯同意,由省长任命为残暴的领导人;而在他们之下的是市政长官,掌管当地行政机构。迪亚斯时期的一个特征就是暴力机构的迅速发展;在这个时期政府的行政开支增加了90个百分点。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在国内大部分人支持下,墨西哥建立了一所拥有社会意识的艺术家学校,他们力图唤醒民众充满仇恨的过去和承诺创造革命性的现在。作为在这之中最伟大的艺术家之一,大卫·阿尔法罗·西凯罗斯(David Alfaro Siqueiros)用讽刺的手法描绘了前总统波菲里奥·迪亚斯,在画中他的脚践踏在1857年宪法上,他和他那些富有的跟随者们正在欣赏舞蹈。

军队中军官享有特别的优惠。高级军官有着优厚的薪水和很多损害健康的工作。但是迪亚斯的军队却可悲地无法胜任国防任务。军官的任命并不是以他们的能力高低来任命的,而是依据军官的忠诚度。纪律、士气和训练都非常缺乏。大部分普通士兵是印第安人,甚至为年轻的当地居民。这些士兵,通常被用来镇压印第安人的暴乱,他们自己也被苛刻地对待并且薪水微薄:下级士官一个月的工资为 50 美分。

教会成为迪亚斯统治的另一个支柱,由于独裁者不执行反教权的改革,教会得以支持迪亚斯。修道院,女修道院,教会学校又重新出现,在 19 世纪末又回到了教会的手中。出于维护他们之间交易的原因,教会当局对于来自下层阶级的抱怨声充耳不闻,甚至还教育他们应该服从当局的统治。

迪亚斯的独裁政策不仅用在有钱有势的人物身上,也同样对准享有特权的知识分子。一群由知识分子、专家和商人组成的小团队,紧密结合在一起为迪亚斯出谋划策。他们被世人称为科学家派(Científicos),这是因为他们坚持对国家进行“科学”管理,在 1892 年后他们拥有了显著的影响力。这个团队的核心由大约五十人组成。他们的领导是迪亚斯全军的岳父、曼努埃尔·罗梅罗·卢比奥(Manuel Romero Rubio),1875 年他去世后,这个位置由财政部新任部长,何塞·伊夫·利玛窦(José Yves Limantour)继任。

对于科学家派来说,经济活动意味着一切。大部分科学家派成员接受,土著人和印欧混血种人都是内在劣等人群的观点,因此有必要依赖本地白人精英、外国人及其资本来引导墨西哥走出贫困落后的境地。用记者弗朗西斯科·G. 科斯梅斯(Francisco G. Cosmes)的话来说:“印第安人只拥有劣等民族的消极力量,不能积极地追求文明目标。”

土地的集中

20 世纪初,墨西哥依然是一个农业为主的国家,1 500 万人口中的 77% 仍然依赖土地生存。改革法律推动了土地所有制的集中,并且在

迪亚斯的领导下,这个趋势在渐渐加快。铁路建设和快速发展增加了生产出口产品的可能性,因此刺激了迪亚斯时期土地价格的上涨并强化了抢占土地的行为。

土地立法中很重要的一个是1883年孔切斯公司土地法制定的《划界法》(Ley de Deslindes)。该法授权不动产公司去划分这些土地,并且可以保留三分之一划划过的土地;剩余部分以固定的低价格大面积卖给迪亚斯的心腹支者是他们的兄弟合作者。1883年的法律开辟了一块收购土地的新路。在下加利福尼亚(Baja California)和其他中部的州,个人获取了将近1200万英亩的土地。但是土地公司并不满足这些已收购的土地。1891年,《未开垦土地法》(Ley de Terrenos Baldios)宣布非是没有合法地契的土地就是无所有权土地,为之土地合法征收土著人村落和小土地所有者自古以来耕种和无地契。地契开了大门,如果受害者武力抵抗,迪亚斯就派军队去镇压他们,并将被俘虏的反叛者像奴隶一样卖往尤卡坦州的包林科村,又是一块地主的种植园。这也是西北地区雅基人(Yaquis)的命运,他们虽然进行了漫长的英勇斗争,但依然被打败了。

另一个土地征收手段是1890年颁布的一条法律,旨在落实以前的改革法规,要求将土著人村落土地在村民之间进行分配。这项法规制造了极大的混乱。在很多情况下,土地投机商和大庄园主哄骗不识字的村民卖掉他们的地契,以换取微不足道的利润。大庄园主用其他方式,比如切断村落的水供应或者是直接采取武力,以达到他们掠夺的目的。至1910年,土地征收的过程基本完成。国内人口最密集的中部高原地区超过90%的土著村落,已经失去了他们的公有土地。只有最为顽强的抵抗,才能在大地主们的掠夺中幸存下来,保住村落的土地。没有土地的雇农和他们的家庭占到了1200万农村人口中的950万。

一般来说,新的土地所有者是不会有效地使用从土著人村落或是小土地所有者那儿征用的土地的。大庄园主让大部分霸占过来的土地空闲在那,等待着未来有可能的地价上涨或者是来自美国的收购者。因为一直空占着土地不生产,可使玉米等主要粮食作物人为地维持着

价格。虽然一些土地拥有组织——北部地区的养牛者和棉花种植者，恰帕斯（Chiapas）的咖啡和橡胶种植者，尤卡坦州的灰叶剑麻生产者——应用了更多现代机械和技术，但大庄园农业技术状况普遍来说相当落后，几乎没有使用灌溉、机械和商业肥料等。

食品生产停滞不前，几乎不能满足人口增长的需要，像玉米和豆类这样的主要粮食作物，它们的人均产量直到 19 世纪末事实上一直在持平、下降。在 1907 至 1910 年这三年歉收的年份，产量下降达到最低点，而歉收的根本原因是干旱。因此，在迪亚斯政权的最后几年里，从美国进口的玉米以及其他食品稳定增长。尽管牧区的畜牧业有所发展，但是人均肉类消费量没有同步增长，因为相当一部分比例的家畜是被指定用于出口市场的。

250

唯一超过人口增长的食品是酒精饮料。从墨西哥城中酒吧数量从 1861 年的 31 家上升到 1900 年的 1400 家的事实中可以窥知其消费量的增长。在 19 世纪末，墨西哥由酗酒——一种对于无法忍受的生活和劳动的普遍反应——引发的死亡率估计是法国的 6 倍。同时，在迪亚斯政权的最后时期，通货膨胀肆虐横行，极大地提高了大部分人赖以生存的主要粮食作物的价格。因为工资没有相应地增长，农业和工业劳动者的处境急剧恶化。

经济发展

当面向国内市场的食品产量下降之时，面向外国市场的食品和工业原材料生产却蓬勃发展。至 1910 年，墨西哥变成了灰叶剑麻的最大生产国，灰叶剑麻是一种制作纤维的原材料，国际市场上有着很大需求。墨西哥的出口产品越来越契合美国的需要，美国是生产糖、香蕉、橡胶和烟草的外国人所有的农场的最主要市场。美国公司控制了采矿业，其铜、金、铅、钨的产量在 1890 年后迅速增长。被美国和英国利益集团打制的石油工业，也有着令人瞩目的发展，至 1911 年，墨西哥成为世界第三的石油生产国。法国和西班牙的资本家实质上垄断了纺织业和其他消费品行业，这些行业也在 1890 年后出现了相对快速的发展。

外国对主要经济部门的控制和迪亚斯政权对外国人和外国公司的态度,使得民间有了这样一句俗话:“墨西哥是外国人的母亲,也是外国人的继母。”科学家派统治集团,以快速发展对外贸易,繁荣国内市场,及建立强大国家来保护自己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为由,为这种集中控制。因为外国资本的蜂拥而入,外贸量极大增加,现代银行体系出现,这个国家建立了相对密集的铁路网,将国内和海外市场连接起来。但是这些成功付出了非常昂贵的代价:残暴的独裁统治,土著人口的殖民化,粮食生产的停滞,低效率的工业得到强化,以及墨西哥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残留的封建和半封建印迹。

劳工、农民和中产阶级动乱

封建印迹主要残留在劳工关系领域。1910年,强制劳役和公共劳役,与债务雇工旧制度一样,成为南部尤卡坦州、塔巴斯科、恰帕斯州和瓦哈卡、韦拉克鲁斯部分地区的代表性特征。这些地区的橡胶、咖啡、烟草、灰叶剑麻和甘蔗种植园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强制劳动力,包括政治流放犯、被捕的土著人反叛分子和用各种手段被诱骗到热带地区工作的合同工人。

在墨西哥中部,因为大片村落土地被征收而产生了大量没有耕地的本地无产阶级,土地租借,粮食分成和移民劳工使用增加,生活水平出现降低。该地区劳动力大量剩余,减少了大庄园主通过债务雇工将工人绑在他们土地上的需要。有着高薪酬水平的美国地区和北部大庄园主、矿山老板抢夺劳动力的竞争,使得工资和收益分成制度更受欢迎,债务雇工制度则在弱化。但是在整个国家范围内,农业工人的生活还是充满艰辛,并且经常遭受各种形式的虐待。

采矿业和工厂的劳动条件比乡村要稍微好一点。纺织厂工人每天工作12至15个小时,无技能的女工和小孩的工资是11美分,高熟练技术工则为75美分。雇主们还采用各种办法克扣他们微薄的工资:在使用工具或者机械的过程中犯了所谓的“疏忽”,或者有“残次品”;工人的工资通常全部或者部分地由代金券支付,这个代金券只能在公司



图 11-1 年里奥·布兰科(Rio Blanco)纺织厂正在罢工的工人；这是家由外国资本家控制的工厂。军队镇压了这次罢工，血流成河。

，买东西、雇工价格比其他商店高很多。联邦和州政府法律都禁止罢工和罢工。1900年在奥里萨巴(Orizaba)地区(韦拉克鲁斯州)，纺织工罢工的人，无论男女，都被派来镇压的军队射杀；1906年发生在卡纳纳(Cananea)地区(索诺拉州)的美营附属铜矿公司罢工，也有大量的工人被杀或者受伤。尽管面临镇压，迪亚斯时代最后几年中工会运动依然继续发展，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开始逐渐影响着力量较弱的城市工人阶级。

在迪亚斯统治时代的最后衰落期，不断发展的罢工浪潮和农村暴乱反映出了墨西哥人民中不断增长的更广泛的反抗情绪。由于科学家派、他们的外国同盟者和地区寡头统治者，对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垄断控制，教加、律师、记者和其他行业人士的发展机会受到了严格限制，离心离德的心理在这些入中间渐渐蔓延开来。1905年在美国，一群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在里卡多·弗洛雷斯·马贡(Ricardo Flores Magon)的带领下，呼吁推翻迪亚斯政府，并且推行激进的经济社会改

革计划。

即便是统治阶层的成员也很快也加入到了批判的合唱中来。这些来自上层阶级的不同政见者,包括民族资本家,如鲁伐的工业家及商人弗朗西斯科·马德罗(Francisco Madero),也憎恨外国公司在墨西哥享有的竞争优势。他们也害怕不变的、反动的迪亚斯政策可能会激怒大众推翻资本主义体系本身。怀着对改革的恐惧,这些上层阶级的批评者们催促迪亚斯结束他的个人统治,改组政权,推行温和的改革计划,这是平息大众反抗和保持现有经济政治秩序所必需的。他们的请求仿佛是对牛弹琴,一部分资产阶级改革者只好不情愿地准备走上革命道路。

同时发生的经济衰退和粮食危机削弱了不断增长的抗议声。1906至1907年的经济萧条,从美国蔓延到墨西哥,引起了一系列的银行破产、解雇和降薪。同一时期,1907至1910年的农作物歉收,引起了如玉米和豆类等粮食作物价格的急剧上涨。至1910年,墨西哥的冲突已经到了要爆炸的阶段。工人罢工、农村暴乱、中产阶级改革者的焦虑、一些大地主和资本家的不满,都显示出独裁统治的社会基础已经瓦解。尽管依然有着表面上的稳定和耀眼的光彩,但迪亚斯政权已经从下到上腐烂了。只需要轻轻一推,它就将轰然倒地。

阿根廷的政治和经济

虽然阿根廷的冲突一直主要来源于各省考迪罗和布宜诺斯艾利斯之间,但胡里奥·罗卡(Julio Roca)和其他寡头统治者之间还是尝试通过加强港口城市和内陆省份之间的经济联系来统一整个国家。阿根廷,跟迪亚斯时期的墨西哥一样,自由主义国家的巩固是新殖民主义经济发展的关键。

国家政权的巩固

胡里奥·罗卡通过执行将布宜诺斯艾利斯联邦化的长期承诺,将这个新生成的联盟制度化,布宜诺斯艾利斯现在变成了这个国家的

部,后来,拉普拉塔(La Plata)也变成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首府。内战已经结束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然而这个表面上的胜利却是一个骗局。到1880年,布宜利省的各省律师和政治家接受了这个大城市的商业和金融中心地位,他们希望不要削弱而是分享它。布宜诺斯艾利斯非但不失去它的地位,反而持续稳定地获取财富和权势直到它成功地获得其他地区无法相比的压倒性优势。

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联邦化象征着阿根廷国家巩固的完成,其新领导人在很大程度上和布宜诺斯艾利斯阶层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经常是同一批人。他们被称为“1880一代”,或寡头统治者,正如它的名字那样,他们代表一种混合了完美、欧洲模式的价值体系,但又深深带有犬儒主义、个人主义,以及民众广泛的不信任色彩。这些专制的自由主义者相信,相信自由本身。他们认为加乌乔人、土著居民和涌入阿根廷的欧洲移民无法很好地行使公民职能。当被问到如何定义主权,一个重要的寡头统治者爱德华多·卡尔德(Eduardo Wilde)回答说:“这会是全民无知的胜利。”

寡头统治者将国家利益与大地主、富商和外国资本家的利益联系了起来。通过将国家机构当做他们个人或者他们阶层的财产,他们利用国家公务员系统来中饱私囊。虽然他们维持了议会制政府的形式,但国家是再也不会自己手中的权力溜走,并且形成了所谓一党专政(cunicato)体系,由他们组建的国家自治党行使权力。行政部门权力高度集中,体制僵化,寡头、寡头和内路是这个体系的主要特征。

经济繁荣和通货膨胀

罗卡在大选开始时期当选总统,仿佛证明寡头统治者的乐观主义是有道理的。更早之前,罗卡领导了一次军事远征——所谓的“荒漠远征”。1879年至1880年间,他往南进以征服南美大草原上的土著居民。这次远征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和国家公共领土增加了大片新土地。战役对于当地土著人社区是毁灭性的,却为实施民主的土地政策创造了机会,政策之促进阿根廷小农阶级的产生。但相反的是,罗卡

政府把所有土地大块都卖给了军队军官、政客和外国资本家，只象征性地收取了一点钱。

欧洲对阿根廷牛肉和小麦需求量稳步上升的时候到来了，南美草原的征服引发了无节制的土地投机活动，使得土地价格直线上涨并且导致了养牛业和农业以惊人的速度扩张。这次扩张带有明显的巨大“X”标记。在这个月即进入阿根廷的数百万人把欧洲移民史上，很少有人实现了成为独立的小土地所有者的梦想。即使在19世纪70、80年代的圣达菲省(Santa Fe)和圣罗萨平原地区(La Rio Negro)还能见到一些移民者的农业垦殖地，但是至1890年代早期，随着小麦价格的下降，实现了从小规模农业到大规模粮食耕作的转变。农场主(estanciero)一般不愿出卖自己的土地，这迫使大批欧洲移民——农民变成了大农场的帮手或者是佃农，他们所批有的土地所有权相当不确定的。因为租金通常只交结数年，这些移民开垦了荒地，将南美大草原上的杂草换种成饲养牛群所必需的紫花苜蓿牧草，并且取得了第一次小麦的丰收，但在这之后却不得不搬走，让地主享受所有此等成果。

因此，绝大部分新移民都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安家了，因为这里港口和肉加工厂、铁路、公共事业，以及许多小工厂的兴起，引发了对劳动力不断增长的需求。确实，移民来的工人薪水极低，工作时间长，并且和他们的家人挤在条件恶劣的贫民区一个单间公寓里。但是在城市贫民区里(barrio)，他们和与自己相同的一类人住在一起，没有了远在南美大草原的孤独，没有了大地主的专横统治，并且还有少许机会提高自己的经济和社会等级。因此，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人口从1889年的50万猛增到了1909年的124.4万。在国家财富、人口和文化中占据很大比重的大城市，以牺牲内陆为代价发展起来了，而内陆特别是西北地区，还是一副贫穷、停滞和人口稀少的景象。阿根廷，用一个熟悉的比喻来说，就是矮人般的身子长了个巨大的头颅。

外国资本和管理在这个时期阿根廷经济的发展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克里奥尔人中的精英们，从他们所有的土地价格上涨和出口量的

土地所有者并不反对,但是他们没有兴趣将利润投向工业领域或农业现代化。这些都不是发展出口经济所需要的,他们偏好奢侈的住宅、私人马车、葡萄酒。因此他们把经营土地的工作交给英国资本家或承包商,所以他们将肉加工、铁路、公用事业、码头和公共建筑等一切全面的机会也留给了英国资本。因此,这些资源几乎都集中在英国人手中。拜耳经合会外国利益让步政策的典型例证是,1889年国会决定将国营的东方铁路——阿根廷运营状况最差的铁路——卖给一家英国公司。政府越来越多的收入不得不用来偿付比率越来越大的外国贷款。

同时,钢铁、煤、粮食、机械和消费品的进口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出口。进口原材料价格对制成品的高比率失衡,导致了贸易条件的失衡。国会曾各打各的算盘。带有苛刻条件的新贷款虽然一时减轻了负担,但并没有解决了根本问题。金本主义的消失和政府决定不惜代价维持金本,导致了没有黄金支持的纸币大量发放和严重的通货膨胀。

土地所有者并不关心这些,因为他们通过出口产品换来了法郎和英镑,有了这些钱,他们就能换取廉价的阿根廷比索来支付本地费用;并且,通货膨胀导致了他们土地价格的上涨。通货膨胀中,城市中产阶级和工人是受害的牺牲品,他们工资的实际购买力下降了。

激进党的形成

1889年至1890年,正当这场繁荣渐渐转为萧条之时,城市中产阶级和在灾难性通货膨胀中被掠夺的部分精英阶层,对一党专政以及政府腐败和累起来的怨恨,引发了名为公民联合会(Union Civica)的反抗运动。虽然新的组织建立在中产阶级的基础上,但是其领导层却团结了其他迥然相异的群体,如它的第一任主席莱昂德罗·阿莱姆(Leandro Alem)那样,如心怀不满的城市政客,如新的地主和被剥夺了特权的旧贵族家庭的后代;如被政府反神权法令所激怒的天主教徒。除了需要争取投票权之外,唯一能够将这些异质群体团结起来的就是推翻政府统治的共同决心。

1890年新政党的诞生正巧碰上了金融风暴：股票市场崩溃，银行破产数成倍增长，以及1月份内乱辞职。受到最近形势的鼓舞，依靠军队的支持，公民联合会的领导者们计划发动一次叛乱，但它最终以失败告终。

寡头统治者现在充分展现了其操纵和分裂敌人的能力。他们通过修改国家任命制度以平息精英阶层的负面情绪，并且尝试通过紧缩开支政策来改善经济环境，紧缩政策缓解了通货膨胀，稳定了货币比索，也恢复了阿根廷的海外信用。由于这些措施和逐渐从军事中力复员，群众不满之声开始减少了。

这些改革孤立了莱昂德罗·阿莱姆和其他的不同政见者，这部分人于是组建了一个崇尚“激进”民主的左翼派——激进公民联盟(Union Civica Radical)。这个克派得知靠选票获取选举胜利是不可能的，于是他们策划了又一起叛乱，但由于政府决定将阿莱姆和其他激进派领导人驱逐出境，这场运动被成功镇压下去。

阿莱姆结束流放归来后，于1893年7月又组织了第三次叛乱。这次叛乱主要占领了圣达菲和一些其他城镇，但是在两个星期的战斗中，叛乱由于缺少重要的民众支持瓦解了。受到此次失败和佐伊波利托·伊里戈延(Hipolito Yrigoyen)意图夺取激进党统治权阴谋的双重打击，阿莱姆最终在1896年自杀了。至1910年，由于重新联合后的寡头加强了他们的统治，此时由伊里戈延领导的激进党，被证明无论是以和平还是革命的方式都无法达到他们政治改革的目的。

然而伊里戈延是个充满个人魅力的领袖和永不服输的精明领导者。伊里戈延曾任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警长，之前作为一个末等的政客，利用自己的工作关系获得了相当大的财富，然后将这些财富投入土地和牛群中。现在作为激进党的领袖，伊里戈延是其含糊党纲的设计师，该党纲认为既要有多多种不同诉求，又要全心全意接受经济现状。这个党派的基本口号有“弃权”——拒绝参加被操纵的选举，还有“革命性不妥协”——决心诉诸革命直到恢复自由选举。

激进党代表资产阶级，但这是一个依附性的资产阶级，他们不提倡

工业化经济多样化,或者是外资企业国有化。他们非但没有攻击新殖民主义秩序,反而建议通过推进土地贵族和城市部门之间的合作来强化这一秩序,因此不是挑战克里奥尔精英阶层对政治权利的垄断的。然而,在1870、1875年的人混战之后渐渐走向衰落,但是在1900年又再度复苏,部分是因为伊里戈延的个人领袖魅力和组织天赋。但是,最终,城市精英阶层主要是大部分由移民后代组成的城市和乡村中产阶级的崛起,剥夺了土地贵族的主导地位,限制了工业的发展和企业的机会。中产阶级日益越来越多集中在克里奥尔精英在其中占主导的政治、经济和专业领域。由于克里奥尔人管理委员会限制移民后代入学,精英中也出现了不安和失望的迹象,其中一些在学校园里爆发了罢课运动。

选举改革和劳工运动的成长

在这个时候,精英阶层开始鼓吹改革。这些贵族阶层的改革者们,明白土地贵族会造成永远的紧张和不稳定;他们害怕激进党的斗争努力迟早会取得成功。他们相信,对激进党提出的要求进行让步,修改政治体系,这是更明智的选择,这样执政党——现在一般称之为保守党,便能够保持其权力所需的民众支持和合法性。察觉到来自劳工运动特别是其先驱——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威胁的,保守主义改革者们也期望可以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联盟以对抗工人阶级革命者。因此他们支持统称为《萨恩斯·佩纳法》(Saenz Pena, 1912)中的一系列措施。新的法案赋予年满18岁男性公民普选权。这个被历史学家萨维德·洛克(Savid Rock)称为“统治阶级以退为进的法案”,开辟了依附性资产阶级同土地贵族的权力分享及公职分赃的道路。

社会党(Socialist Party)是实现工人阶级追求的主要政治工具,该政党于1891年从激进公民联盟中分离出来,来自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政治家和煽动分子胡安·B. 胡斯托(Juan B. Justo)领导着该党直到他1928年去世。该政党公开声称的马克思主义,却是一种议会改良性质

的社会主义,主要吸收高技能工人、工人和中低层管理人员。工人中的大部分,依然期待看到某日能回到他们自己的国家。在工人中,许多公民者,虽然对选举政治采取谨慎态度,但要求对工人权益给予更多关注,勇敢地抗议高工资和工作条件,要求;政府应改善劳工权益,给予工人更多权利,或者是将那些与工人利益相违背的工人驱逐出境。工人运动依然持续发展和不妥协,并取得了诸如禁止周日工作、禁止强制休假等初步的胜利。

智利的政治和经济

硝酸盐和战争

1876年,自由派总统高尼巴多·平托(Ambal Pinto)渡过了智利经济危机(1871—1879)后的灾难了:小麦和铜价格下降,出口下降,失业率增加。由于在1865至1875年间阿塔卡马(Atacama)沙漠的硝盐生产量翻倍,硝酸盐出口的持续增长抵消了这些不利因素的影响。但是硝酸盐,既是智利获得重大发展的基础,也成了一场战争的导火线,这场战争给智利和它的两个敌人,玻利维亚和秘鲁带来了灾难化的后果。

在玻利维亚安托法加斯塔省(Antofagasta)和秘鲁塔拉帕卡省(Tarapaca)领土范围内的硝酸盐资源由盎格鲁-智利公司(Anglo-Chilean)开采。1866年智利和玻利维亚签订了一项条约,以南纬21度线作为他们在阿塔卡马沙漠中的国界线,并且保证两国政府各享有一半的整个范围内矿产出口的税收收入。盎格鲁-智利公司的资本很快进入了这个区域,并开发了一套高效的采矿工业设备。根据1871年的第二个条约,智利与玻利维亚接壤的北部国界线仍是南纬21度。智利放弃了征收边境线北部出口税收的权力,却换来了在玻利维亚安托法加斯塔省的智利企业25年内税收不增长的保证。

智利虽然跟秘鲁没有边界之争,但是由于得到英国资本的资助,智利矿业利益集团积极进取,很快将他们的公司从安托法加斯塔省扩张

，秘鲁的塔利卡纳省。至1875年，智利企业在秘鲁的硝酸盐企业雇用了近一万名工人、工程力和管理人员。因为公共建设项目成本高昂，而且国家财政又用于支付贷款的利息和的开采耗尽，秘鲁政府处境非常困难，因此它在塔利卡纳地区的外国公司，垄断硝酸盐的生产。智利和秘鲁、玻利维亚于1871年签订了一项秘密条约，规定两国在发生战争时立即建立军事联盟。

很快，塔利卡纳省格洛里奥萨智利公司资本家，加强了对安托法加斯塔省的控制。至1875年，智利准豆依靠其与秘鲁的军事联盟，在安托法加斯塔省开采的硝酸盐出口征收高税收，这个行动在1871年塔利卡纳省安托法加斯塔省的智利公司拒绝支付新税收时，智利准豆政府开始征收来反对他们。虽然1874年的共同协议禁止智利准豆政府用强权来反对他们。虽然1874年的共同协议禁止智利准豆政府用强权来反对他们，但是智利准豆两次拒绝了智利将争论提交仲裁的请求。

1876年2月，智利准豆政府，征收智利企业将会使1874年的条约失效，安托法加斯塔省征收计划还是有条不紊地展开了。智利军队在11月占领了安托法加斯塔省，占领了安托法加斯塔省，又在当地建立抵抗，直到智利将统治范围扩展到整个省。对战争，智利准豆政府，在智利和玻利维亚之间做着无用的调解努力。但是，智利准豆政府，秘鲁和玻利维亚私下订立的秘密联盟关系，指责秘鲁的联盟是不平等和无效的，在1879年1月5日同时对秘鲁和玻利维亚宣战。

在这场被称为太平洋战争的战争中，智利的敌方联盟人口超过其自身四倍；作为敌对一方的秘鲁，拥有一支可观的海军部队。但是智利仍占据主要优势。与邻居不同，智利拥有稳固的中央政府，具有强烈民族认同感的习惯，以及纪律严明、训练有素的陆军和海军。智利还具有地利的优势，而玻利维亚军队需要翻越安第斯山脉，秘鲁军队则需要穿越阿塔卡马沙漠。

虽然三方政权都存在严重的经济问题，但是智利的情况没有其敌人那么悲惨。更重要的是，智利得到了英国资本家利益集团的有力支

持,他们知道大量英国投资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议定战争后的失败。智利获得安托法加斯塔省和塔拉帕克省,而秘鲁则失去了塔拉帕克省。英国将使英国资本家感到满意。英国资本家也在玻利维亚和秘鲁投资,但是当智利政府坚持归还其所欠债务时,秘鲁和玻利维亚拒绝了。英国提供英国贷款。除此之外,秘鲁在塔拉帕克地区进行殖民化运动,严重损害了英国的利益。

在英国的帮助下,智利赢得了1881年的太平洋战争,并于1881年接受了它提出的条件。根据安孔条约(Ancón, 1883年10月21日),秘鲁永久割让塔拉帕克省给智利。塔拉帕克省(Tarapacá)和阿里卡(Arica)在10年内由智利所有,在此期间,秘鲁保留对塔拉帕克省和阿里卡最终命运。但是公民投票的举行遥遥无期,智利一直在这两个地区。直到1929年,最后秘鲁收复了塔拉帕克省,而阿里卡则留在了智利。在1881年4月玻利维亚和智利签订的停战协议中,智利同意归还安托法加斯塔省割让给智利,但是此后很多年,又有一项类似条约。最终签署正式条约承认割让。1904年,玻利维亚签署了一项条约,条约规定智利同意支付玻利维亚一定的补偿费用,并建造连接玻利维亚首都拉巴斯(La Paz)和阿里卡港口的铁路线。这条铁路在1913年完工。

太平洋战争的余波

智利在与秘鲁谈判的过程中,持续动员武装力量与阿劳加纳人(Araucanians)清算旧账,阿劳加纳人从殖民地时代起就一直对侵占自己土地的白人进行了不懈的斗争。经过两年反对不平等条约的抵抗后,阿劳加纳人被迫承认失败并且签署条约(1983),条约要求把他们安置在保留地,但是保留了部落的政府和法律。1880年至1882年的阿劳加纳人运动,把智利南部的边境界限延伸到一个高原丛林地区,并在那个地区激起了活跃的土地投机买卖和殖民化运动。

太平洋战争在经济和心理上对秘鲁造成了巨大打击,并把玻利维亚前所未有地同外部世界隔绝开来,智利则变成了西海岸地区最强大的国家,控制着大量的硝酸盐矿和白银,这些矿产是它经济的主要依

但是这些财产的一部分很快就会落入外国人的手中。1881年,智利政府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决定将塔拉帕卡省的硝酸盐矿归还给那些有所有权证书的友邦国有化补偿证书的私人所有者。

在战争期间,对于智利将如何处理那些财产存在着不确定性,因而那些友邦国有化补偿证书大幅贬值,直至跌到票面价值的零头。投资者,主要是英国人,大量买进这些贬值的证书。1878年,英国资本差不多控制了智利硝酸盐矿的13%,到1890年,持有量已经上升到了50%。英国不仅通过建立公司直接开发硝酸盐矿,而且通过提供大量的贷款为企业活动提供资金,投资铁路建设,投资其他或为开发硝酸盐矿相关的公司来加强对硝酸盐矿的渗透。一家叫做安托法加斯塔铁路公司的英国铁路公司垄断了塔拉帕卡的运输,公司由约翰·托马斯·诺斯(John Thomas North)控制,支付的红利高达20%—25%,而相比之下,南美洲的其他铁路公司只有7%至14%的利润。

智利的民族资产阶级,曾是阿塔卡马矿区工业铁路联合企业的开拓者,对于外国投资他们几乎没有抵抗。由于缺乏自由派政府的强力支持,加上智利资产阶级资金相对缺乏,以及智利寡头政权和英国和聚集于英国的利益关系,智利硝酸盐矿和铁路所有权转向英国人手中并加速了这一进程。这一进程也把智利的矿主转变为满足于从英国公司的利益中分红的依附型资产阶级。

但是在智利的其他一些方面,战争给国家经济带来了活力,并且动员了当地制造商和工人,奋起要求进行选举改革;1884年,选举的财产资格证明被识字测试代替。因为大多数的智利男性是不识字的季节性农场工人(*rotos*)和佃农(*inquilinos*),这个改变并没有实质性增加参加投票的人数。直到1915年,在350万人口中,只有15万人参加投票。但是这又促成了1886年何塞·马努埃尔·巴尔马塞达(José Manuel Balmaceda)总统在选举中取胜,他就职时提出了一整套设计完美的由国家指导的经济现代化计划。到19世纪80年代,受到太平洋战争的刺激,工业资本主义在智利扎根了。除了消费品工业——面粉厂、酿造厂、皮革厂、家具厂等,还存在为矿产业、铁路和农业服务的铸造厂和造

铁企业。巴尔马塞达力图巩固智利人这种本土的“重工业主义”。

巴尔马塞达的民族主义政策

巴尔马塞达就职时，政府收入处于空前高纪录时期（从太平洋战争前的大约每年1500万比索至1887年的大约4500万比索）。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是硝酸盐矿的出口税收。当他预见到有硝酸盐矿的减少，这种资源的收入也会越来越少时，巴尔马塞达明智地打算用这些资金来发展基础设施——如果硝酸盐矿哪一天消失，这些设施还会留下来。因此，公共工程在他的计划中占据重要地位。1887年，他建立了一个新的实业和公共工程部门，部门花费大量资金扩展和改善电信和铁路系统，建设桥梁、道路和码头等。为了给智利提供技术工人，巴尔马塞达还慷慨地资助公共教育。在他的总统任期内，智利学校的总入学人数4年间有了极大的提高，从1886年的7.5万人上升到1890年的15万人。他还赞成提高工人工资，但他的劳工政策却常常前后不一致；在外国和国内雇主的强烈压力下，他也曾多次派遣部队镇压罢工。

巴尔马塞达计划的核心是他决定要实现硝酸盐工业的“智利化”。在国会的就职演说上他宣称，他的政府将会考虑采取措施“把目前主要使外国人受益的工业国有化”，这明显是指硝酸盐工业。巴尔马塞达的策略后来出现改变，他鼓励智利私有资本进入硝酸盐矿的生产和出口，以阻止外国控制的硝酸盐企业联盟的形成，因为这种联盟企业通过限制出口获取利益，这便与希望保持较高产量以收取更多出口税收的智利政府利益发生了冲突。1888年12月，他谴责智利精英阶层缺乏企业精神：

为什么被引进的贷款和资本在我们大城市的各种投机买卖中停滞不前，却让外国人在伊基克(Iquique)建立银行，把塔拉帕卡的硝酸盐开采留给陌生人？外国人开采这些丰富的资源，从我国的财富中得到利润，用在别人的土地上，送给那些我们不认识的

人，可以真正是我们所需要的自己土地上的宝藏、我们的财产和财富。

英国硝酸盐铁路公司昂贵的货物运输费减少了硝酸盐矿的产量和出口，为此，巴尔马塞达发起了一场决定性的战斗，结束了英国硝酸盐铁路公司在智利。他的民族主义政策不可避免地激起了英国硝酸盐矿主的反对，正如诺巴，他和智利精英阶层有着密切的联系，并建立了一个私人银行，由民族主义政治家作为其法律顾问。

巴尔马塞达有着许多国外敌人一样，巴尔马塞达也有着诸多的国内敌人。他反对对他进一步限制教会权力的计划。由于他的公共政策，如建立国家银行和为农民，还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因此，土地贵族和教会反对他。银行对他建立国家银行并垄断货币发行的建议表示反对，因为这些银行将通过货币发行而获得收益，但这种不受控制的货币发行会导致通货膨胀，并使办理抵押贷款的地主和出口商受益。自由派、保守派、自由主义者和保守者，都反对他利用中央政府作为经济进步和社会改革的工具。

这个时候，政府所面临的经济问题成堆，巴尔马塞达的群众基础也在缩小，这更加剧了他政治上的困难。到1890年，外国对铜和硝酸盐的需求减少了一部分，在世界市场上出现过剩，价格出现下跌。英国的硝酸盐利益集团通过形成企业联盟减少生产量来应对这次危机。硝酸盐和铜矿产量及出口的减少使国内的出口税收锐减，还造成了失业的增多和工资的下降，甚至通货膨胀也在降低工资的实际购买力。结果导致1890年瓦尔帕莱索(Valparaíso)和硝酸盐矿地区爆发一系列大罢工。尽管巴尔马塞达同情工人，不愿意用武力对付他们，但是在国内外雇主的压力下，他最终还是派遣部队镇压了罢工。这些镇压措施招致在后来巴尔马塞达与其敌人的最终对决中，工人阶级对总统的态度冷漠甚至充满敌意。

当危机来临的时候，巴尔马塞达没有什么牢固的盟友支持他。他热切地促进工业资本家集团的发展，但他们的力量还不够强大。矿产

利益集团更加紧密地与英国资本结合在一起,或者直接受控于英国资本,他们与银行家、牧师及地主联合起来,反对他的独裁发展经济计划。反对者还动员了议会的力量,使巴尔马塞达在议会中得不到过半数的支持,并迫使他废除议会制政府,回到了1833年宪法下的总统统治制度。他行动鲁莽,没有做任何努力去动员群众的力量,又向美国、英国等在准备内战的敌人的下怀。

260 1891年1月7日,议会领导人以合法性和宪法的名义,在发动反对总统的叛乱。接着,当时由出身贵族的官员领导的海军迅速表示支持叛乱,他们占领了北部的港口和海关,并在塔拉帕卡省的要港瓦尔迪维亚克建立了自己的首都。

所有的英国企业积极地支持叛乱。在圣地亚哥,英国大使的声明称,“我们的海军军官,瓦尔帕莱索和所有海岸地区的英国居民,都向叛乱者提供物质帮助,并承诺不再保持中立。”许多在瓦尔帕莱索的人,因为巴尔马塞达镇压罢工的行为而疏远了他,都保持中立,甚至有些人参加了由德国军官埃米·柯纳(Emil Körner)将军组织的叛乱军队。政治上孤立,军事上失败的巴尔马塞达到阿根廷大使馆寻求政治庇护;1891年9月19日,在他的法定任期结束的那一天,巴尔马塞达向自己的头部开枪,结束了生命。

智利第一个反帝国主义总统的死亡,使寡头统治的政权又重新复活,这是一个由地主、银行家、商人组成,与英国资本息息相关的矿业利益集团的联盟。一个新时代,即所谓的议会共和时代开始了。接受过往的经验,寡头政治现在更倾向于通过分成不同派系的议会进行统治,而不是依靠一个强有力的执行人。这种非集权的政府有益于维护乡村贵族及其盟友的利益。1892年通过的一个新法律,赋予了地方政府对地方和国家官员的选举进行监督的权力,这就加强了反对巴尔马塞达进步政策的地主、教士和政治头领们的力量。

议会制共和、外国控制的经济和工人阶级的成长

在议会共和时代,智利的经济越来越从属于外国资本,这从外债的

土地增殖和国内产量逐步成为外国所有的现象中反映出来。英国人在智利的投资到1880年达到了2400万英镑,到1913年上升到6400万英镑,其中的3000万英镑变成了智利公共债务的一部分。同一时期,美国资本开始挑战英国在智利的霸权。英国仍然是智利的贸易伙伴,但是美国、德国与智利之间的贸易快速增长。德国对智利军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德国向智利南部的移民潮一直在持续,这造成了反德国裔、德裔控制的小块殖民地的形成。智利经济从1890年代中期开始复苏,带来了硝酸盐矿、铜矿和农业出口的增长,也带来了社会被更加分化,但是佃农、矿工和工厂工人还是贫困依旧,工人在1880年至1900年之间,从12万人上升到了25万人,工团主义、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在这一阶层中逐渐流行。

被称为“智利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父”的路易斯·埃米利奥·雷卡瓦伦(Luis Emilio Recabarren, 1876—1924),在智利无产阶级的社会和政治觉醒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1906年,雷卡瓦伦从一个矿区被选到议会,但因为拒绝在圣经下宣誓而未就职。1909年,他组织了智利工人联盟,这是智利的第一个国家工会运动。三年后,他建立了社会党——一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运动政党,并担任它的第一书记。

智利工人阶级不断增长的自信和军事能力在不断增加的罢工浪潮中表现出来。1911年至1920年之间,共发生了大约300次罢工,超过30万人卷入其中。很多罢工被传统的残酷方法镇压,导致了成千上万的工人死亡。

巴西的政治和经济

独裁统治的垮台

1888年奴隶制的废除,也破坏了它的姐妹制度——君主制,后者长期依靠农场主阶级的支持,尤其是北部的农场主,他们把君主制当做奴隶制度残存的保障。1888年以前,共和党的主要支柱是咖啡利益集团,他们对帝国政府给予甘蔗种植园主的好处感到愤慨,并希望获得与

他们经济势力相称的政治权力。现在,奴隶制被废除,再加上政府并没有对他们的损失给予补偿,过去又对反对奴隶制的激进农场主也加入了共和运动。在过去的67年中,为地主精英利益服务、寡头政治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



《共和宣言》发布后,唐·佩德罗二世前往欧洲的离别场景。这幅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绘画表明,很多巴西人,包括共和的支持者,对被驱逐的帝王的尊敬和爱戴。

共和主义和与之密切联系的意识形态——实证主义,也使官员阶层中发生了许多改变,他们不满帝国政府对他们的忽视和不公平待遇。很多年轻官员属于新的城市资产阶级,或者是贵族后代,但是不接受父辈们的道路。实证主义,正如刚才所说,变成了“军事学院的信条”,一名受欢迎的年轻数学教授贡斯当·博特略·德马加良斯(Benjamin Constant Botelho de Magalhães)对其进行了出色的阐释,他是这个主义创始人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的忠实信徒。实证主义理

立科学、民主型与独裁的共和制度,并且不信任大众,这些正好满足保守精英和大地主、进步官员和商人、农场主的需要,这些人希望现代化,但不想对土地所有制和阶级关系做出巨大的调整。1889年11月,巴西爆发了由咖啡种植业诺·佩肖托(Floriano Peixoto)元帅领导的事起义推翻了政府,宣布成立以德奥多罗·达丰塞卡(Deodoro da Fonseca)为第一任总统的共和国,并且将唐·佩德罗二世流放到法国。

就像带给巴西独立的革命一样,共和革命也是自上而下的;政变(1889年)军队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但也没有引起民众的热情。权力仍然紧紧掌握在大地主和军队上层的代表们手中。

新生统治者迅速颁布一系列改革措施,包括结束军队体罚的法令,将识字考试取代财产证明(因为财产和识字通常是一体的,这个措施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选举人数)来决定投票资格,以及建立世俗国家和公证结婚等后续法令。

新生共和国

起义后两年,立宪议会召开了一次选民议会,起草新生共和国的宪法。宪法规定成立一个联邦制和总统制政府,实行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三权分立。最主要的争论是:一些党派希望各州拥有更多的自主权,但另一些则害怕过度联邦化会导致分裂的结果。统治着富有的中南部地区的咖啡利益集团,希望通过中央权力来加强自己的地位。在制宪大会中,城市商业团体的代表主要是律师,赞同建立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因为中央权力会促进工业发展,有助于建立民族市场,并且能在与英国的竞争中得到保护。

妥协的结果是一个仅保留了头衔的联邦制。20个省实际上都变成了自治政府:官员由民众选举,有权决定出口税收(对于像圣保罗和米纳斯吉拉斯这样富有的州是项有利可图的特权),有权保留民兵。联邦政府被授予控制关税和进口税收入之权,总统拥有最大的权力:可以任命内阁部长和其他高官,宣布戒严状态,当发生威胁到政治体制的

事件时,可以调用联邦军事力量干预各州事务。宪法,在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并且保证出版、演讲和集会的自由。

如果说这些自由与现代化运动所触及的城市和内地有关系,那么它们对于大部分国家地区来说,就没有什么意义。农场主,也就是贵族的奴隶主,实际上垄断了国家的主要财富土地。垄断土地,他们绝对控制了乡村人口。封建和半封建式的土地所有制,以及佃农为个人和军事服务的义务,在偏僻地区,尤其是在东北部地区仍然存在。强大的内地军队头目(coroneis)拥有全职私人士兵(jaguncos)组成的军队,彼此之间相互发动战争。

在这种持续的缺乏安全感和社会分裂的中世纪气氛中,救世主的运动出现了,反映了被压迫的巴西腹地人(sertanejos)对和平和统一的渴望。最重要的一个运动发生在巴伊亚境内,这里的主要产业是养牛。在这里,劝世者安东尼奥(Antonio Conselheiro)在卡努杜斯(Canudos)的废弃牧牛场建立了定居点。安东尼奥反对私人财产,并要求加入他神圣团体的人都要放弃自己的财产,但是他承诺在他的“城里,通过分享“失落的圣巴斯蒂安(Sebastian)”(1478年在非洲,亡国的葡萄牙国王,但是会作为救世主转世)的财富,或者通过瓜分敌对国主的财产,将会拥有一个繁荣的未来。

尽管他带有宗教性色彩,但这种社会和政治动荡的集中存在,是大地主和国家政权无法容忍的。当1896年,腹地人轻松地击败了派来镇压他们的本州军队,省长要求联邦政府给予帮助。为了粉碎卡努杜斯男人、女人和儿童艰苦卓绝的反抗,联邦军队共发动了四次攻击,在最后一次进攻中,几乎所有的人都被杀死了。一部由欧克利德斯·达·库尼亚(Euclides da Cunha,1856—1909)撰写的巴西文学巨著《腹地》(O sertão),记录了保卫者的英勇和胜利者的罪行。它还向城市精英展示了巴西现实中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经济革命

一个巨大的历史鸿沟把荒凉的腹地——卡努杜斯悲剧发生的地

与城市斗争以来,城市中有雨后春笋般成长的银行、股票交易和佩德罗·卡尔蒙(Pedro Calmon)写道:“在里约热内卢,有大量民用工业部门——商业代理、繁忙的律师、各行各业的投资人、新政治家等这个时代的人物”甚至,巴西一些大型城市中心的外貌有所改观。这些改变在联邦首都里约热内卢最明显,在1902年到1904年这里变成了一座健康而美丽的城市,这一时期,省长佩雷拉·索斯(Prefect Pereira Passos)无情地拆毁了狭窄的旧街道,建设现代城市,杰出的科学家奥斯瓦尔多·克鲁兹(Oswaldo Cruz)为了预防传染病进行了斗争,通过填满坑塘沼泽,提供充足的卫生饮用水系统,最终取得了战斗的胜利。

共和政权经济政策面对着来自不同团体的压力:农场主阶级、城市资本家和工人。很多农场主,因为奴隶制的废除而处于不利地位,要求得到补偿和贷款以适应新的工资制度。新兴的工业中产阶级,要求巴西必须发展一个工业基地以使巴西摆脱落后状况,因而要求实行保护关税、建设基础设施和实施有利于资本形成的政策。临时政府,这些希望得到了财政部长鲁伊·巴尔博萨(Ruy Barbosa)的强烈支持,他相信,这是一个能够铸造巴西“智慧和独立民主”的坩埚。最后,在建军共和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并获得威望和影响力的军队,要求增加武装部队的财政拨款。这些不同的需求远远超过联邦和州政府的收入。

联邦政府最初试图求助于印钞机以满足这些不同的需求,并允许私人银行仅仅以巴西未来的信用作为担保发行货币。两年后,纸币的流通量翻倍,巴西货币单位米尔雷斯(milreis)与国外货币的汇率灾难性地猛跌。因为客观的经济条件(狭小的国内市场 and 缺乏足够的技术基础,包括其他一些因素)限制了巴西增长的真正潜力,大多数新资本被用于高度投机的目的,包括建立皮包公司。

最终的经济崩溃给很多投资商带来了毁灭,工人失业和工资降低,副总统弗洛里亚诺·佩德罗元帅发动政变,取代了总统达丰塞卡。在短期内,城市中产阶级团体因此受到了较多影响,通货膨胀持续高涨。

很多进口产品的价格增长到几乎无法购买的水平,但这却刺激了巴西制造业的发展:1890年到1895年间,制造企业的数量几乎翻倍。

但是一次带有强烈贵族和独裁色彩的对新起义的镇压,却增加了佩肖特总统对圣保罗州的财政和军事支持的依赖,圣保罗的咖啡寡头们试图用他们的权力遏制城市中间阶级的上升。寡头政治家们不再信任中产阶级快速工业化的政策,并且奇怪金融的不稳定使得共和国在头几年遭到烦扰。1893年,老牌农场主的寡头政治家们重新联合组建了联邦共和党,其自由主义党纲支持联邦主义、财政责任和有限政府,而之前他们的分裂曾使中间阶级和军队结盟暂时占据了上层的位置。由于他们控制了选举机器,因此轻易地获得了总统宝座,又一次将咖啡利益集团的统治制度化,而城市资本家在政治活动中降到了次要地位。

继位的自由派政府把农业出口放在首要位置,并且完全接受了劳动的国际经济分工,从而导致巴西对外国制造业的进口依赖。曼努埃尔·费拉斯·德坎波斯·萨莱斯(Manuel Ferraz de Campos Sales)总统(1898—1902年在位)宣布:“是我们选择正确道路的时候了;在那条路的尽头,我们必须努力出口我们生产的比其他国家更好的所有产品,并且进口所有别的国家生产的比我们好的产品。”这个信条确立了从帝国到整个共和初期的新殖民主义的延续。为了遏制通货膨胀,自由主义者大量减少公共工程支出,增加税收,竭尽全力回收货币以提高巴西的国际信用,并且提供新的贷款来填补政府收入赤字。

咖啡成了国王。1880至1889年之间,巴西生产了世界咖啡产量的56%,从1900至1904年,这个比例达到了76%。咖啡最有力的竞争者——橡胶,在巴西1901年的出口中只占28%。曾经统治巴西经济的糖,现在只占出口量的5%。米纳斯吉拉斯,尤其是圣保罗,变成了主要的咖啡生产地区,里约热内卢的重要性下降了。由于享有巨大的优势——有名的肥沃而疏松的红土,大量的移民劳动力和靠近重要港口桑托斯,圣保罗人(Paulistas)收获了国内咖啡产量的60%。

从19世纪80年代末期至19世纪90年代中期的咖啡潮,在1896年后很快出现了生产过量、价格下跌和存货积压。因为咖啡树在种植

1890年后才有产量,所以在价格下跌后仍能感受到咖啡种植在向圣保罗和南部边境扩张。1896至1900年间,仅在圣保罗,用于生产咖啡的树木数量就从1.2亿上升到5.7亿株。大型国际咖啡贸易公司控制着世界市场,它们在每个季节的高峰期时以低价购入,当周期性缺货而价格上涨的时候,再把存货卖出去,这些做法增加了种植者的困难。

种植者强烈要求帮助,圣保罗政府采取了措施,在1902年迈出了“保卫战”的第一步,在未来五年内禁止种植新的咖啡树。其他州很快也被证明是必要的。面对1906年丰收的庄稼,圣保罗为了保护其经济命脉而实施了一个支持咖啡价格的计划。由于得到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的银行资金支持,最终与联邦政府合作,圣保罗囤积了几百万包咖啡,阻止它们进入市场,使咖啡价格保持在一个有利可图的水平。囤积持续到1907年;从那时起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些存货在市场波动很小的情况下逐渐全部卖出。这次运作的主要获利者是国外商人和银行,因为他们控制着为了变现购买咖啡存货而建立的咖啡委员会,他们渐渐把存货处理掉,并获得大幅利润。问题只是暂时解决,但必定会以更严峻的形式再度出现。

稳定物价的措施计划,有利于种植咖啡的州,却牺牲了其他州的利益,它反映了咖啡种植者在政治上的统治地位。坎波斯·萨莱斯总统任期间,这个支配地位被所谓的“州长政治”(política dos governadores)制度化。它的实质是维持一个原则,即最富有和人口最多的两个州(圣保罗和米纳斯吉拉斯)实际上具有联邦政治和选择总统的垄断权。因此,从1894至1906年的前三任民选总统都来自圣保罗;从1906年到1910年的两任总统分别来自米纳斯吉拉斯州和里约热内卢州。

反过来,其他州的寡头统治者被赋予司法权限内几乎完全的行动自由,只有在有利于当地寡头政治利益的情况下,中央政府才会使用管辖权进行干预。各州统治者之间的私下讨论决定了总统的人选,总统选举只是重复之前的决定,因为只有不到2%的人口有选举的资格。在1930年之前,没有哪位官方指定的总统候选人会输掉选举。同样互

惠互利的安排还存在于州长和城市或乡村的地方政治头目(coronels)之间,这些人汇集当地选票而选出州长;作为奖赏,他们可以在各自的领地内不受约束。

265 尽管官方偏向支持农业,但工业仍在继续增长。到1908年,巴西以它超过3000个的工业企业而引以为荣。国外公司控制着银行、公共工程、公用事业、交通和进出口贸易等领域。另一方面,制造业几乎全部由巴西本地人和永久移民经营。这个国家工业主要集中在4个州:圣保罗、米纳斯吉拉斯、里约热内卢和南里奥格兰德。重工业并不存在;过半数的企业是纺织厂和食品加工厂。很多“企业”是小作坊,只雇佣几个工匠,或者用原始技术进行生产,而处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巴西人仍然进口高质量的产品。工业产品的数量增长和质量提高受到了一些因素的束缚,其中包括在乡村占优势地位的半封建生产关系,极度贫困的农民极大地限制了国内市场发展,缺乏有技术和文化的劳动力,以及大地主和外国利益团体对工业发展的敌意。

随着工业的发展,工人阶级出现了,他们注定在国家生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一部分巴西无产阶级是从佃农和小庄园农民演变而来的,他们为了躲避惨淡的贫困和地方政治头目的暴政而逃到城市;但最重要的是,无产阶级是由大批欧洲移民组成的,每年有10万至15万新移民来到这里。工人阶级的工作和生活条件通常是难以忍受的。童工很普遍,年纪达到12岁的儿童就能被合法雇佣了。一些技术工人每天工作9小时,而很多工种的非熟练技术工人每天工作超过16小时。工资少得可怜,而且经常用代币券代替,这些代币券只能在公司的店铺兑现。完全没有任何立法来保护工人免遭失业、老龄或者生产事故的伤害。

在欧洲移民中,有很多激进分子,有社会主义者、工团主义者或者社会民主主义的背景,他们帮助组织巴西的劳工运动,并赋予它激进的政治方向。工人中间民族和宗教的不同、大量的文盲,以及社会主义者和工团主义的不和,都阻碍了工会运动和劳工党的成长。

但是工会在1900年后仍迅速成长,代表了该国大多数工会的第一

巴西劳工代表大会在1906年举行,为八小时工作制而斗争。大会的一个成果是成立了第一个全国工会组织——巴西劳工联盟。它组织了总罢工,当权者和地主逮捕劳工领袖进行镇压,并遣返移民,把反对修筑通过的马托·格多索(Mato Grosso)铁路建设工地强制劳动。“工会问题是给帝国提出的课题”这句话经常被用来总结巴西自由派政府的劳工政策。

中美洲的政治和经济

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初,有三个中美洲国家值得特别研究——危地马拉、尼加拉瓜和萨尔瓦多。由于这里大量生产两种需求量逐渐增加的产品咖啡和香蕉,因此也就发生了重要的经济变化。变化包括土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但却完好地维持着现存的阶级和权力关系。这个自由主义纲领也产生了新的依赖:只出口一种或两种主要产品,外国控制主要的自然资源,并且接受美国的政治霸权。在所有的地方,变化都伴随着土地所有制的集中,劳动力剥削的加剧,以及富人和穷人之间日趋扩大的鸿沟。

危地马拉,1865—1898

1865年埃塞奎尔·卡雷拉去世之后,对危地马拉的保守统治来说,是持续六年的自由主义政治和军事挑战。自由派对世界经济的变化,尤其是外国对咖啡的需求大量增长,以及对所需的危地马拉经济和社会结构的调整作出了回应。1871年,自由派夺取了权力,两年之后,充满活力的胡斯托·鲁菲诺·巴里奥斯成为总统。巴里奥斯和他的继任者都下定决心要巩固国家政权,征服相对比较自治的原住民社区,并且建立土地、劳动力和商品的统一市场。

他们的自由主义改革计划包括经济、社会和意识形态的重要转变。意识形态改革接受了欧洲和美国流行的白人至上主义学说,实施“白种化人口”的种族主义移民政策。它拒绝了教权主义和形而上学主义,坚定支持科学和物质进步的信仰。这就要求教育的世俗化和扩大化。然

而,公共资金的缺乏极大地限制了公共教育;直到1921年,危地马拉的文盲率仍超过86%。为了降低教会的权力和权威,自由派政府将教会的土地国有化,结束了它的特权,并且确立了宗教自由和世俗婚姻。

经济转型涉及三大领域:土地所有制、劳动力和基础设施。土地所有制的改变对于建立新的经济秩序是十分必要的。危地马拉的传统特产,靛青(indigo)和胭脂(cochineal),已经被中小生产者种植了几千年;然而,咖啡需要大面积的土地,但土地却集中在相对较少的人手里。在巴里奥斯总统任期内,“农业改革”开始了,目的是使咖啡种植者得到可用的土地。巴里奥斯政府的第一个目标是将教堂和修道院的土地没收充公。然后将未开垦的国家所有土地,进行分割并且廉价卖出,又分给私人利益集团,最后是原住民社区的土地。法律要求为征收提供合法基础的私人财产提供契证。这个过程中,国内的主要受益者是中小咖啡种植园主,他们可以购买或者从政府获得土地。然而自由派政府热烈欢迎的外国移民,也从新的立法中获得好处。到1911年,外国人(主要是德国人)拥有的土地几乎生产了危地马拉一半的咖啡。到1926年,土地所有制的集中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只有7.3%的人口才拥有土地。

土地改革帮助达到了自由主义纲领的另一个目标:国内外新的咖啡种植团体得到了大量廉价劳动力。很多高山地区的土著失去了土地,移民到海岸附近新兴的咖啡种植区域。最常见的劳工制度是债务雇佣制——在危地马拉法律下是合法的,世袭的债务将印第安人拴在了种植园(fincas)中。还有一些当地人被招募为工人,他们从山里走出来,在大庄园和种植园做季节性劳工,这样除了他们拥有的一小块土地外,可以多增加一点微薄的收入。巴里奥斯还恢复了殖民地时期的派遣制度(mandamientos),在这个制度下,印第安人被要求接受种植者的工作。为这个目的,地方官员保存当地人的登记材料,这些登记材料还可用于招募他们服兵役和从事公共工程。那些不能支付两个比索人头税的大多数人被要求从事道路修筑工作(每年两周)。

19世纪末期,印第安占全国100万人口的70%,他们自然反抗这

和自由派的屠杀,有时还举行公开的地方起义。但是面对着准备铲除任何无情的军人政府,他们通常通过利用“弱者的武器”存活下来,这成为为了减少被消灭的危险而进行的抵抗方式。在危地马拉的乡村,这些原住民社区依靠根植于殖民地天主教传统的独立的宗教性兄弟会组织(guachibales),维护他们共同的文化认同,保卫他们的自治权,并保留社区风俗、传统语言以及反抗自由主义那种不受约束的市场势力的同化政权的宗教仪式。

尼加拉瓜,1870—1909

中美洲联邦在1838年垮台后,尼加拉瓜20年的历史同样充满着内战和保守派与自由派之争。自由派邀请威廉·沃克(William Walker)来帮助他们,接着开始试图在中美洲建立自己的个人帝国,于是自由主义者又不被信任,保守主义者在几乎没有反对的情况下统治了尼加拉瓜30多年(1857—1893)。

尽管早在1848年,咖啡就作为经济作物进行种植,但直到1870年,尼加拉瓜的主要经济活动还是局限在养牛业和温饱型农业。原住民社区仍然拥有大量土地,独立的小农阶级依靠公共土地生活,债务雇工制很少见。在太平洋沿岸,自治的莫斯基托王国(Mosquitia)从1678年开始受到英国统治,这里居住着传统米斯基托人(Miskitos)、苏木人(Sumus)和非洲克里奥尔人(Afro creoles),他们在英国和美国所有的兴建的香蕉种植场、木材厂、金矿和商业码头工作,拿着微薄的薪水。但是世界市场对咖啡需求的意外增长,使得尼加拉瓜的一些民族主义精英产生对土地的需要,他们需要适合耕种咖啡的土地,除此之外,还需要廉价的劳动力。

从1877年开始出台的一系列法律要求这些村庄卖掉公社土地,并把原住民和印欧混血种人赶出他们的土地,渐渐把他们变成一个依附的雇农或者佃农阶级。流浪者(vagrancy)法的通过和允许征用当地人作为农业和公共劳动力的这项法律,同样确保了咖啡种植者所需的廉价劳动力。这些法律激起了一次较大的原住民起义——公社社员

(Comuneros)战争(1881),这次起义最终以印第安人的失败告终,在随后进行的凶残镇压中,5 000 人被杀。

由咖啡种植者组成的新阶级,对尼加拉瓜 1857 年资产阶级掌握权力的保守的养牛业主的传统方法极力不满。1893 年,种植园主们发动了起义,何塞·桑托斯·塞拉亚(José Santos Zelaya)坐上了总统的位子。塞拉亚作为一名主张现代化的独裁总统连续统治了 17 年。他进行道路、铁路、码头设施和电信通信的建设,为经济秩序提供所需要的基础设施。他重新组织脱离教会和政府领导的车队,并发展公共教育。像同时代的其他拉丁美洲的自由主义领导人一样,他认为,单一投资是实现经济快速发展所必需的,并给予外国资本尤其是美国公司以人的优惠。到 1919 年,美国控制了大部分的烟草、金子、木材和香蕉产业,其中香蕉是尼加拉瓜财富的主要来源。

萨尔瓦多,1876—1911

到 19 世纪中叶,萨尔瓦多已经经过了两个经济周期。第一个周期是由可可主导,它的繁荣在 17 世纪衰落了;第二个经济周期是由靛蓝,它在 19 世纪后半期进入急剧下滑期,首先是因为来自其他生产地区的竞争,其次是由于人造染料的发展。它于是开始寻求新的出口作物,咖啡最终登上了出口量首位的宝座。咖啡种植大概始于独立时期,但直到 19 世纪 60 年代才开始迅速扩大。像中美洲的其他地方一样,咖啡的兴起是以上等土地的征用和侵占为标志的——以私有财产和物质进步的名义进行,因为大多数最适合种植咖啡的土地都被原住民公社拥有。

靛青每年都可以种植和收获,但咖啡树在种植的头三年没有产量。因此,种植者必须有充足的资本或者贷款,而拥有资本或者贷款的人都是大地主,他们已经通过种植靛青变得非常富有。为了帮助大地主得到种植咖啡的土地和劳动力,政府在 1856 年通过的一个法令宣布,如果一个印第安人村庄公有土地的三分之二没有种植咖啡,土地所有权就会被移交到政府手中。后来,自由派总统和军事强人

拉斐尔·扎尔迪瓦尔(Rafael Zaldivar),通过1881年的法律直接冲击印第安土地所有权,法律命令所有的公社土地必须在共同拥有者手中,否则这一土地将被剥夺的印第安种植者通过合法或者不合法的手段获得(例如,通过开了道路);13个月后,他颁布法令宣布废除所有印第安土地所有权。新的立法不仅损害了这些社区,还损害了印欧混血儿和土生白人的利益。这些农民通常依靠地方政府的公共土地(公共牧场、公共免费农场和植林地)作为他们谋求生存的重要依靠。1870年,印第安人依靠公有的公社土地生活,这些土地占据耕地总量的40%。

然而,公共土地的所有权迅速集中到土地寡头的手中,这些人被称为“土地精英”。这个数字尽管不是一个确切的数据,但象征性地反映了土地精英统治这一现实,他们控制着萨尔瓦多的经济和政府。在19世纪下半叶,大地主用他们自己的私人军队对付拒不服从的农民。1884年和1889年的政府法令将这些私人武装力量整合成公共乡村警察的基础,后者后来被重命名为国民警察。1912年,建立了一个西班牙皇家军队为榜样的国民警卫队(Guardia Nacional)。和国民警察一样,国民警卫队在乡村巡查,并为大地主提供治安保护。

对于印第安人,悲惨繁荣的社会结果是灾难性的。少数失去土地的农民被允许留在种植园或者新庄园,作为雇农,他们会得到一个居住的地方,以及耕地或者菜地,在那里他们可以种植一些口粮作物。但是,古老的靛青或者糖的大农场需要大量的长期劳动力,而咖啡种植园需要劳动力是季节性的,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咖啡种植园主依靠雇佣劳动力。环境决定了多数萨尔瓦多农民们的生活方式。他们可以作为土著(squatter)在小地块上耕种,或者在种植园做雇工,但是他们的小地块并没能力他们的家庭提供生存必需品。因此,他们更倾向于在不同的作物收获季节更换工作,咖啡收获季节就在咖啡种植场工作,然后再去砍甘蔗或者在八九月份的时候收棉花,最后再回到自己的耕地,盼着玉米的收成。这种不稳定的迁移方式造成了很多社会问题。

委内瑞拉的政治和经济

联邦战争余波造成的骚乱在 1870 年结束了,这个时候委内瑞拉 19 世纪最强有力的统治者安东尼奥·古斯曼·布兰科开始掌权。像他的父亲一样,布兰科极其擅长蛊惑人心的讲演。他自称是自由主义者,是寡头政治的敌人,反对神职人员涉政,是虔诚信仰科学和进步的实证主义教义的人,他的雄心是建立一个“文明人”的“注重实际的共和国”。为了实现这一愿景,他与加拉加斯的保守派商人阶级、地区考迪罗,以及国外经济利益团体达成协议,其国外利益团体从他雄心勃勃的道路、铁路和电信建设计划中获益。结果,古斯曼·布兰科想要建,资本主义委内瑞拉的梦想被证明是一个幻想;在他统治的 20 年后,委内瑞拉还是一个乡村式的、单一农作的和依附型的国家,这个国家里,考迪罗们在展开权力斗争时,依然猖獗横行。

他的制度被称为“考迪罗的全国联盟”,当他开始担任最高领袖的时候,那些阿谀奉承的国会和媒体称他为“杰出的美洲人”。1864 年宪法定期性地被加强中央集权新宪法所取代。尽管古斯曼的独裁与委内瑞拉历史上其他独裁者相比较温和,但他也毫不犹豫地对他的敌人实行镇压。

借助他与各地军阀的协议,古斯曼的统治维持着相对稳定的和平(尽管在 1879 至 1888 年间有几次大规模的反对他的暴动,并且在整个统治时期一直贯穿着地方起义)。在他掌权后不久,他和加拉加斯一个强大的商人团体共同建立了一个信贷公司(*compania de crédito*)。公司给他提供了开始一项改进交通和通讯计划所需的资助。1870 至 1874 年间,51 个修路项目开始动工。但是当地资金不能满足需求。古斯曼谋求与外国资本合作,但由于这个国家近代历史上经常发生内战,其他国家不愿意向这样一个国家投资。1879 年,他获得了同英国投资者团体签署的第一个外国合同,内容是建设一条连接加拉加斯和主要港口拉瓜伊拉(*La Guaira*)的铁路。到他离职的时候,委内瑞拉已经有 11 条铁路完工或者正在建设中,所有的铁路都是服务于进出口贸易,

加拉斯,主要的农业及矿业地区同港口连接起来。考虑到对委内瑞拉不利的贸易条件——出口产品价格会下降,而进口制造品价格会上升,因此建造铁路网的后果是增加了委内瑞拉经济的依附性,导致了去工业化,并且留给国家大量未偿付的对外债务,后者迟早会带来外国干预的威胁和统治权的丧失。

古斯曼·布兰科人员涉政的政策导致了教会力量的进一步衰弱。布兰科主义在全体公民身上的“多余税负”已经被废除。在古斯曼·布兰科时代,教会特权(fuero)结束了,世俗结婚和出生死亡的注册,以及遗嘱,都实行了,修道院和神学院被关闭了。教会禁止继承地产,许多教会的地产被政府没收。古斯曼还试图禁止黑人移民和亚洲人移民,他甚至曾尝试过吸引欧洲人移民。但最终还是失败了,委内瑞拉依然是一个由“白人”的富有的少数人统治着大多数“黑人”的社会。

在其他方面,古斯曼·布兰科的发展计划几乎没有引起国家经济和社会结构的改变。1891年,250万人口的绝大部分都在乡村;只有三个城市人口超过1万。大多数的在职人员都在从事农业劳动;小型现代工业仅存在于纺织业和纺织业这样的轻工业中。雇佣了约5万名工人的手工业店铺在经济上还是举足轻重。

古斯曼·布兰科去世后,接下来的是十年动乱,来自安第斯塔奇拉(Andean state of Táchira)的精力充沛的年轻考迪罗西普里亚诺·卡斯特罗(Cipriano Castro),和他的搭档(compadre)胡安·维森特·戈麦斯(Juan Vicente Gomez)夺取了政权。他的搭档是富有的养牛场主和咖啡种植园主。西普里亚诺·卡斯特罗的上台反映了日趋增长的安第斯咖啡种植区或经济的重要性。尽管,他也想延续古斯曼·布兰科的中央集权政策,建设一个强大的国家军队代替旧时私人或政府的警卫队。但由于咖啡价格下降导致政府收入减少,他的军事改革计划失败了。这造成了地方考迪罗们一系列的叛乱,镇压叛乱花费了政府大量气力,还引发了与外国势力的冲突,外国封锁了委内瑞拉的港口,使政府的重要收入来源海关税收大量减少。

卡斯特罗接管的是一个被残暴内战和长期遭严重毁坏的国家。德国和英国政府要求立即支付未偿还的债务和赔偿它们在与战中遭受的损失,但是委政府却支付不起。1902年12月,尽管卡斯特罗表示愿意协商,两个国家还是派出了一支由12支军舰组成的英德舰队进入了委内瑞拉水域,他们将执行夺取或者毁坏委内瑞拉舰队并封锁港口的命令。英德舰队的强大火力很快击退了委内瑞拉海岸炮队的攻击,占领了几个委内瑞拉的港口。战斗双方实力的不平衡,英德封锁港口造成的灾难性经济影响,以及委内瑞拉内部一些地区的持续动乱,使和解变得十分必要。因此,卡斯特罗请求美国大使出面调解,以达成和解协议。协议条款要求委内瑞拉把30%的海关税收作为借款以解等利息,要求重新建立交战双方之间的外交关系,但是和解协议否定了委内瑞拉自身损失获得赔偿的要求。

在卡斯特罗掌权的最后时期,他受到外国政府、商界、银行和美国之间冲突的严重干扰,这些冲突往往是因为他坚持外国人必须服从委内瑞拉的法庭和法律。随着卡斯特罗健康状况的恶化,高利贷势力、尤其是美国支持的胡安·维森特·戈麦斯,结束了卡斯特罗的政权,并开始了新的自由主义独裁统治。

哥伦比亚的政治和经济

270 1853年,自由派总统和自由派控制的哥伦比亚国会,起草了新宪法,赋予男性以选举权,这个条款使一些自由主义者感到担心,他们害怕不识字的信教农民会投保守主义者的票。实际上,在大多数地区,投票者还是根据当地头目(gamonales)或者老板的意愿投票,所以新的选举法律并没有改变什么。

在经济方面,自由主义者希望不使用殖民地的传统做法,如限制和垄断等。他们废除了政府对烟草的垄断,取消了省级税收中的什一税(迄今为止,它由政府收取但用于支持教会),对金子和其他贵重金属征收的“五一税”,以及国民政府的其他传统税收。各省也授权废除这些税收。为了补偿政府收入上的损失,国会采取了向个人收税的措施。

在手工业者们的支持下,自由主义者达到了预期的目标,但他们却忽视了盟友的关税保护需求。这在1854年引发了一次新的政治危机,这是何塞·玛丽亚·梅洛(José Maria Melo)将军领导的一场短暂的政变爆发,政变得到了手工业者们的支持,工匠们组成了工人部队来保卫革命。但是自由派和保守派的将军们,抛弃了他们之间的分歧,组建了私人军队,并在一次极短的战役中击败了梅洛。梅洛的手工业者盟友被关进监狱,自由工人被驱逐到巴拿马。最终以手工业者们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的失败而宣告结束。

1855年,自由派进行了宗教和政治改革,并将这些改革推进到极端。他们废除了专制性的什一税和教会特权,废除所有的宗教秩序,关闭所有修道院和教堂,并没收了教会的财富。然而,其结果是教会的土地和财产转到了私人手中,但对土地所有制度几乎没有产生一丁点的影响;自由派的农场主只是变成了世俗的农场主,促进了土地所有权的进一步集中。主要的土地购买者是自由派商人、地主和政治家,保守派也参与了对教会土地的掠夺。

1863年,当宪法全力推行联邦主义时,自由主义的政治改革达到了高峰。9个自治的州实际上变成了独立的国家,每个州都有自己的武装力量,拥有给予中央政府之外的立法权,中央政府因此变得越来越缺乏权威。直到1885年,自由派一直在一种近乎制度化的无政府主义氛围中执政:中央政府无力干预地方的革命,而这些地方革命却在颠覆或建立各州的政府。

经济活动及建立出口基地的要求,使哥伦比亚不断地融入到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到1870年代,烟草出口严重下降,但是这个下降是因为咖啡、奎宁和其他产品的出口造成的。咖啡变成了国家的主要出口产品,但是咖啡的发展仍落后于巴西,巴西更多地依靠欧洲来的自由劳动力。在哥伦比亚,咖啡生产主要在桑坦德和昆迪纳马卡(Cundinamarca)的中心区域,它的生产是建立在传统的大庄园基础上,依靠在残酷的生活和劳动条件下雇工及佃农们的劳动。在安蒂奥基亚和卡尔德斯(Antioquian Caldas)地区出现了稍微令人满意的情

况,其特点是大庄园和更开明的分成租佃制和小地块土地所有制相融合,以及以高产量为标志的运作。在这些地区,产生了20世纪的哥伦比亚咖啡工业起飞。

成为主要出口品的咖啡的发展,国内外商人和咖啡种植园主之间联系的日益密切,以及征收教会土地给贸易和投租买卖带来的利益共同创造的经济利益,需要新的政治模式,这种模式是一个强大的政府,能够下达强制命令,并建设咖啡工业发展所需的铁路和全国基础设施。自由主义改革为资本主义发展排除了很多障碍,但是联邦制则过分滥用又制造了新的障碍。到19世纪80年代早期,不仅是保守派,还包括很多中间派的自由主义者都相信,政治和社会稳定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1879年拉法埃尔·努涅斯(Rafael Nunez)开始实施这一规划。

拉法埃尔·努涅斯、重生和千日战争,1880—1903

努涅斯以一名激进的自由主义者开始其政治生涯,并在欧洲从事了13年的咨询服务工作。他在1875年回国,于1879年当选总统,在一个自由派和保守派的联合党派的帮助下实施统治。1884年再度当选后,他迅速粉碎了一次激进自由派的起义,并宣布1863年宪法已经“不复存在”。1886年,新宪法颁布,宪法规定由总统任命的厅长管理各个部门,以代替具有独立自治权的各州,把总统的任期延长至六年,建立了选举众议员的文化和财产资格认证制度,并规定了参议员实行间接选举。在这个宪法下,努涅斯通过自己或者代理人的统治,一直控制着哥伦比亚,直到1894年去世。

努涅斯的专制共和国的基础是其强大的常备军队和国家警察力量。该国早期的政权实质上已解散了正规军;由大地主用他们的佃农和雇工组成的私人军队,在联邦时期的起义和内战中进行战斗。这些地区私人武装和民兵的存在与努涅斯的统一全国军队计划发生了冲突。1886年的宪法规定建立常备军队,只有中央政府才能拥有军队和武器。建立于1891年的国家警察,一直监视着政治上的可疑分子,并

摧毁了反对政府的多次密谋。

努涅斯进行了两项主要的经济改革。他宣称贸易自由或者低关税是经济衰落和贫困的原因,而经济上的衰落和贫困造成了战争,因此,他建议用关税保护措施来刺激某些工业的发展。他相信这会产生一个新的中产阶级,这个阶层将在统治阶级和不识字的平民大众之间形成一个缓冲带。但是他对于这个计划的实行是缩手缩脚而且矛盾的。新政策获得了成功,为国内工业提供了适度的保护。

为了缓解哥仑比亚处于破产边缘的政府财政压力,努涅斯的另一项经济改革措施是在1881年建立了国家银行。国家银行有发行货币的垄断权力;国家根据需求提供货币供应,直到1890年,国家银行都管理得很谨慎。而在这之后,失控的纸币发行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原因是1899年发生的一场花费巨大的内战引起纸币发行泛滥,以至于到达这样一个程度,即印刷机来不及印出需要的纸币量,国家已被成千上万在流通中贬值的比索淹没了。

努涅斯时代被称为“重生”的时代,“重生”表现了自上而下的努力实现国家统一的进程;这个时代可以与俾斯麦将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因素混合在一起的德国统一事业相媲美。在努涅斯的统治下,具备了形成一个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条件。在这点上,最重要的一步是他建立了常备军队,以及国家对军队的绝对控制。他拆除了内部的贸易壁垒,而适度的关税保护政策,又促进了内部市场的形成。国家银行,尽管后期存在着管理不当的丑闻,还是做出了建立国家信用体系的初步探索;而且政府还促进内部改善建设,尤其是铁路。最后,他正式否认非洲裔哥伦比亚人和原住民公社的存在,否认他们的所有权要求,并允许私人企业有权使用边境地区的土地。这些政策,加上咖啡出口的繁荣,共同造就了土地、劳动力和商品市场,并为哥伦比亚资本主义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当他去世后,腐败、公然操纵选举、出版自由和选举改革上的分歧,以及咖啡价格的猛烈下降造成的经济衰退等因素,共同引发了政治危机,军队开始出面解决问题。面对一个完全不受欢迎的政府,自由主义

者充满自信,并于1899年发动了起义,引发了灾难性的千阳战争。战争延续了三年,造成了大约10万人的死亡和巨大的人员财产损失。最终以政府的胜利而告终。

在19世纪的最后三分之一时期,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推动了拉丁美洲各个国家的发展。这其中典型的是鼓励出口、外国投资,和诸如土地和地下权利这样的公共资源的私有化。但是,它是依靠强有力的,甚至是残酷独裁统治的巩固,独裁者们用他们对国家权力的垄断建立了统一的国家市场,控制着劳动力,使地方考迪罗臣服,并且征用平民的土地。自由派的独裁巩固了政治权威,并促进了经济增长,但是他们没能成功地支撑一个国家的真正发展,而这样的发展会让广大的民众受益。因此,他们所遗留下来的是社会的不稳定和政治局势动荡,还经常伴随着由于社会改革而产生的暴力运动。

索引

本部分条目前数字为原书页码,即本书边码,页码后的 illus.
表示插图, map 表示地图, table 表示图表)

A

Abad y Queipo, Manuel 曼努埃尔·阿瓦德
凯波 113

Abalos, José 何塞·阿瓦洛斯 158

Abolition and abolitionism 废除黑奴制度与
废奴主义: enslavement of indigenous
peoples and 奴役原住民与 83; Bolívar
and 玻利瓦尔与 219; in Brazil 在巴西
的 223, 225-228, 260-261; in United
States 在美国的 225; in Cuba 在古巴
的 233; in Venezuela 在委内瑞拉的
238-239

Absolutism 专制主义: in Spain 在西班牙
的 95; Bourbon reforms and 波旁王朝
改革与 135-137

Acapulco 阿卡普尔科港口, trade with
Manila 与马尼拉的贸易 91

Acculturation of indigenous peoples 土著民
的同化融合 151

Acosta, José de 何塞·德阿科斯塔 87, 88,
107

Acuña, Hernando de 埃尔南多·德阿库尼
亚 47

Additional Act(1834, Brazil) 补充法(1834
年于巴西) 222, 224

Adelantado 先遣官 72

Administration 行政管理: by bureaucracy
官僚的 10; of Inca civilization 印加的
31; colonial 殖民地的 95-96; by royal
agents 土宰代理人的 96-98; provincial
省区的 98-99; monarch's concessions to
maintain loyalty and 土宰为换取忠诚与行
政管理而作出的妥协 100; of Brazil 巴

西的 129-130. 另见 Government; 具体
国家

Africa 非洲: Portugal and 葡萄牙与 52-
53; Cape of Good Hope and 好望角与
53; slaves from 的奴隶 53, 115-116.
另见 Slaves and slavery 奴隶与奴隶制
度; Slave trade 奴隶贸易

Afro-Cubans 非洲裔古巴人 232 (illus.);
discrimination against 对其的歧视 233

Afterlife; belief in 来生; 对其的信仰 19

Agrarian reform; lack of 农业改革; 缺
乏 176

Agrarian unrest, in Mexico 农民动乱, 在墨
西哥的 251

Agriculture 农业 8; of Maya 玛雅的 9,
18; in Chibcha chiefdoms 奇布查酋邦
的 10; of Taino 泰诺人的 12; in
Teotihuacán 在特奥蒂瓦坎的 15; Aztec
阿兹特克的 23, 27, 28; in Peru 秘鲁
的 29, 229-230; of Incas 印加人的
31-32; Spanish 西班牙的 37, 136; in
Castile 卡斯蒂利亚的 39; commercial
经济农业 85-86; on haciendas 大庄园
农业 85-86; in Spanish America 在西
属美洲的 86-88, 139; in Mexico 墨西
哥的 139, 199, 249; large estates in 大
地产的 193; Juárez policy and 华雷斯
的政策与 204; labor for 的劳动力
245-246; in Brazil 巴西的 264, 265;
in Guatemala 危地马拉的 266; in El
Salvador 萨尔瓦多的 267; in Nicaragua
尼加拉瓜的 267. 另见 Haciendas
(estates); Landowners; Latifundio (great
estate)

Aguilar, Jerónimo 赫罗尼莫·安吉尔 63
 Aguirre, Lope de("the Wanderer") 洛佩·德阿吉雷("流放者") 74-75
 Agustín I (Mexico) 阿古斯丁一世(墨西哥) 175
 Ahuitzotl (Aztec) 阿威佐特尔(阿兹特克) 28
 Alamán, Lucas 卢卡斯·阿拉曼 86, 104, 199
 Al-Andalus 安达卢斯王国 37
 Alberdi, Juan Bautista 胡安·巴蒂斯塔·阿尔韦迪 208
 Albuquerque, Alfonso de 阿丰索·德阿尔布开克 54
 Alcabala (sales tax) 销售税 42, 89, 153
 Alcaldes 市长 39, 42
 Alcaldes mayores 市长 82; as provincial administrators 作为省区长官 98-99
 Alcoholism, in Mexico 酗酒问题, 墨西哥的 250
 Alem, Leandro 莱安德罗·阿莱姆 254
 Alemán, Mateo de 马特奥·德阿莱曼 50
 Alexander VI (Pope) 教皇亚历山大六世 43; Treaty of Tordesillas and 《托德西利亚斯条约》 55
 Aljubarrota, battle at 阿尔茹巴罗塔的战斗 52
 Allegory of the Departure of Dom Pedro II for Europe After the Declaration of the Republic (illus.) 《共和宣言》发布后, 唐·佩德罗二世前往欧洲的离别场景 (illus.) 261
 Almagro, Diego de 迭戈·德阿尔马格罗 66, 71
 Almanacs 历书 20
 Alphabet (Mayan) 玛雅的字符 20
 Altamira caves 阿尔塔米拉洞穴 36
 Altiplano 阿尔蒂普拉诺高原 9
 Alvarado, Pedro de 佩德罗·德阿尔瓦拉多 62, 65
 Alvarez, Juan 胡安·阿尔瓦雷斯 183, 201
 Alves de Lima, Luis 路易斯·阿尔维斯·德利马 223
 Alzate, Antonio de 安东尼奥·德阿尔萨特 148

Amalgamation process (silver) 汞齐法 88
 Amazon region 亚马孙地区; Brazilian tribes of 的巴西北部部落 9;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of 的考古线索 11n
 Amazon River 亚马孙河; naming of 的命名 71; Aguirre's expedition and 阿吉雷的探险与 74-75
 America 美洲 56-60; ancient 古代的 4; first human habitation of 的最早居民 7-8; early civilizations in 的早期文明 14-17; European conquest of 欧洲对其的征服 52-75; naming of 的命名 61; papal grant to Castile and 教皇将其赐予卡斯蒂利亚 78; spiritual conquest of 精神上的征服 101-104. 另见 Ancient America; Indies; Spanish America
 American Indians 美洲印第安人, 参 Indigenous peoples
 American Revolution 美国独立战争 159
 Anarchism, in Chile 无政府主义, 在智利的 260
 Ancestors; of Ancient Americans 祖先: 古代美洲人的 7
 Anchieta, José de 何塞·德安谢塔 125
 Ancient America 古代美洲 4, 7-35; peoples of 的居民 7; migrations to 来此的移民 7-8; Aztec civilization of 的阿兹特克文明 9, 14, 23-29; Inca civilization of 的印加文明 9, 14, 30-34; demographic history of 的人口史 11-12; Maya civilization of 的玛雅文明 12, 13, 14, 17-23. 另见具体民族
 Ancón, Treaty of 《安孔条约》 256
 Andagoya, Pascual de 帕斯夸尔·德安达戈亚 66
 Andalusia 安达卢西亚 37, 45; Reconquest in 收复失地 38
 Andean region 安第斯山脉区域; altiplano of 的阿尔蒂普拉诺高原 9; civilizations of 的文明 12-14; in Classic period 古典时期的 13; coastal civilizations of 的沿海文明 29; Incas of 的印加 29; highland civilizations of 的高地文明 29-30; repartimiento in 的劳役摊派制 81; mita in 的米塔制度 142; Martín in 圣马丁在 167; Colombia and 哥伦比亚

- j 240; land in 245. 另见 War on Drugs; 具体国家
- Anglo-American competition; for influence in Mexico 英美之间的争斗:为了在墨西哥的影响力 199
- Anglo-Brazilian treaty; banning slave trade 《英巴协定》:禁止奴隶贸易 225
- Anglo-Chilean capitalists 在智利的英国资本家 229, 230
- Anglo-Chilean companies; in nitrate industry 英国在智利投资的企业:在硝酸盐工业 255
- Angostura; Bolívar in 安戈斯图拉:玻利瓦尔在 165, 166
- Animals 动物: prehistoric 史前的 8; Aztec 阿兹特克的 26; of Andes 安第斯山脉地区的 29; Spanish domestic 西班牙本土的 86-88 另见 Cattle industry; 具体动物
- Annexation, U. S. interest in Cuba and 吞并, 美国在古巴的利益与 233
- Anticlericalism 反教权主义 190. 另见 Catholic Church; Clergy
- Antilles 安的列斯群岛 61
- Anti-Semitism 反犹太主义 45-46. 另见 Jews
- Antislavery movement 废奴运动 260; in Brazil 在巴西的 222-228
- Antofagasta; nitrates in 安托法加斯塔省的硝酸盐 255-256
- Apaches 阿帕切族 106
- Apatzingan; constitution drafted at 阿帕特辛镇:在此起草的宪法 174
- Aqueducts; Aztec 阿兹特克的水道 27
- Arabs 阿拉伯人; numeration system of 的记数法 20; spice trade and 香料贸易与 53-54. 另见 Muslims 穆斯林
- Aragon 阿拉贡 38; civil war of 1462-1472 in 1462-1472 在此的内战 40; unity with Castile 与卡斯蒂利亚的联合 40; autonomy of 的独立 95
- Araucana, La (Ercilla) 《阿劳坎纳》(埃尔西利亚) 73
- Araucanian people 阿劳坎人 68, 71; revolt by 的反叛 153; Chile and 智利与 256
- Arawak Indians 阿拉瓦克印第安人 62, 77
- Arce, Manuel José 曼努埃尔·何塞·阿尔塞 216-217
- Archaeology 考古: evidence from 从考古发现的线索 7-8, 11n; about Maya 关于玛雅的 19
- Archaic period 古代阶段 13, 29
- Architecture 建筑: in Classic period 在古典时期的 13; of Maya 玛雅的 21; in Tiahuanaco 在蒂亚瓦纳科的 30; Spanish 西班牙的 43
- Arcos, Santiago 圣地亚哥·阿科斯 214
- Areche, José Antonio de 何塞·安东尼奥·德阿雷切 140, 154
- Arequipa 阿雷基帕 30
- Argentina 阿根廷: domestic animals imported into 进口的本土动物 88; liberation movement and 解放运动与 161, 163; independence of 的独立 166, 205-212; junta in 的洪达(执政委员会) 166; conflict within 与其的冲突 167; unification and 的统一 205-212; government of 的政府 206, 207; war between Confederation and Buenos Aires in 布宜诺斯艾利斯省与邦联的战争 208; Mitre as president of 米特雷担任该国总统 209; Paraguayan War and 巴拉圭战争与 209-211; economy in 的经济 211, 252-255; immigrants in 的移民 211, 253; technological changes in 的技术变革 211; Brazil and 与巴西 224; consolidation of 的政权巩固 252; rulers of 的统治者 252; politics in 的政治 252-255; labor in 的劳动力 255. 另见 Buenos Aires; Constitutions; 具体领导人
- Argentine Confederation 阿根廷邦联 208
- Argentine Republic, Buenos Aires as capital of 阿根廷共和国, 以布宜诺斯艾利斯为首都 208-209
- Aristocracy 贵族 194; of Maya 玛雅的 19; in Spain 西班牙的 49, 94; in Indies 西印度的 110; native 本地的 112; in Spanish America 西属美洲的 151; dominance of 的优越地位 176; in Mexico 墨西哥的 205; in Argentina 阿根廷的 206; in Chile 智利的 214; in

Brazil 巴西的 221. 另见 Elites
 Aristocratic hegemony 贵族的霸权 94
 Arizona 亚利桑那 70
 Armada (Spain) 无敌舰队(西班牙) 48
 Armed forces 武装力量. 参 Military
 Arobe, Francisco de 弗朗西斯科·德阿罗韦 117 (illus.)
 Arriaga, Ponciano 庞西亚诺·阿里亚加 197, 200, 201, 203
 Arrón, Silvia 西尔维娅·阿罗姆 153
 Artigas, José Gervasio 何塞·赫瓦西奥·阿蒂加斯 167, 205
 Artisans 工匠 10; of Maya 玛雅的 19; Aztec 阿兹特克的 28; Inca 印加的 33, 34; in Spain 西班牙的 46; in Brazil 巴西的 133; in Colombia 哥伦比亚的 240, 241
 Artistic culture 艺术文化 13. 另见 Arts; Culture
 Arts 艺术; in postclassic period 前古典时期的 14-15; Olmec 奥尔梅克的 15; of Maya 玛雅的 21, 21 (illus.); Aztec 阿兹特克的 28; Chavín 查文文化的 30; of Inca 印加的 35; of Muslim Spain 穆斯林统治时期西班牙的 37; in Spain 西班牙的 50-51; in colonial era 殖民时期的 108-110; in colonies 殖民地的 147
 Asia 亚洲; invaders from 来自亚洲的外来者 7-8; European colonialism in 在亚洲的欧洲殖民主义 53; trade with 与亚洲的贸易 91
 Asiento 黑奴贩卖权 83
 Assassinations 暗杀 4-5; of Pizarro 皮萨罗被 68. 另见 具体人物
 Assimilation 同化, of indigenous peoples 土著居民的 150
 Astrolabe 星盘 53
 Astronomy 天文学 13, 108
 Asunción, Paraguay 亚松森城, 巴拉圭的 71
 Atacama Desert 阿塔卡马沙漠 255
 Atahualpa (Inca) 阿塔瓦尔帕(印加) 14, 31, 66, 67, 67 (illus.)
 Atlantic Ocean region; Portuguese exploration of 大西洋地区; 葡萄牙对其

的探索 54-55
 Audiencia (high court) 检审庭(高等法庭) 97; in Mexico 墨西哥的 66; in New Spain 新西班牙的 79; government by 的政府 96; in 16th century Spanish America 在 16 世纪西属美洲的 97 (illus.); creoles in 的克里奥尔人 146; in Cuzco 库斯科地区的 156
 Augustinians 奥古斯丁修会 103
 Auto-da-fe 信仰行动 106, 148
 Ayacucho 阿亚库乔 30, 169
 Ayllus (kinship group) 艾柳(亲属集团) 32, 33, 112, 156
 Azcapotzalco 阿兹卡波特萨尔科 23-24, 28
 Azores 亚速尔群岛 53, 123
 Aztecs 阿兹特克 9, 10, 25-29; gods of 的神祇 15; in 1519 在 1519 年 16 (illus.); human sacrifice by 的人祭 20; imperial expansion by 帝国的扩张 23-26; warfare in 的战事 24-26, 69; militarism 的军事主义 26; education of 的教育 26-27; culture and society of 的文化与社会 26-29; legal system 法律体系 27; political system 政治体系 28; Spanish and 西班牙人 61-62, 65; as New Spain 成为新西班牙一部分 65; *Natural and Moral History of the Indies* (Acosta) 《西印度的自然和道德史》(阿科斯塔) 107; classes in 的阶级 112-115

B

Backcountry of Brazil 巴西的偏远地区 127
 Badamier, Basilio 巴西利奥·巴达姆勒 142
 Bahamas, Columbus in 哥伦布在巴哈马 55
 Bahia revolt 巴伊亚起义 222
 Baja California 下加利福尼亚 249
 Bajío 巴希奥地区 171
 Balaiada rebellion 巴莱阿达起义 222
 Balance of power (Spain) 权力的平衡(西班牙) 6
 Balboa, Vasco Núñez de 巴斯科·努涅斯·德巴尔博亚 61, 66, 72

- Balbuena, Bernardo de 贝尔纳多·德巴尔布埃纳 108, 117
- Balmaceda, José Manuel 何塞·曼努埃尔·巴尔马塞达 213, 216, 258-260
- Balmus, Francisco Xavier 弗朗西斯科·哈维尔·巴尔米斯 136
- Balta, José 何塞·巴尔塔 230
- Bananas; Nicaragua plantations and 香蕉: 尼加拉瓜的种植园与 267
- Banda Orienta. 参 Uruguay
- Banco de Avío (Mexico) 阿维奥银行 197, 199
- Bandeirantes (slave hunters) “捕奴队” 125
- Bands 群落 9
- Banks 银行: in Peru 在秘鲁的 230; in Colombia 在哥伦比亚的 271
- Barbosa, Ruy 鲁伊·巴尔博扎 263
- Barcelona 巴塞罗那 40
- Barriers to trade 贸易壁垒 参 Tariffs
- Barrios, Gerardo 赫拉尔多·巴里奥斯 218
- Barrios, Justo Rufino 胡斯托·鲁菲诺·巴里奥斯 245, 246, 266
- Barrios (slums) 巴里奥斯(贫民窟) 117. 另见 Slums
- Bases and Points of Departure for the Political Organization of the Argentine Republic* (Bautista Alberdi) 《阿根廷共和国的政治组织的基础和出发点》(包蒂斯塔·阿尔韦迪) 208
- Bastidas, Micaela 米卡埃拉·巴斯蒂达斯 155 (illus.)
- Beet sugar 甜菜糖 232
- Belgrano, Manuel 曼努埃尔·贝尔格拉诺 159, 161
- Belize 伯利兹; Maya in 的玛雅人 17; and United Provinces of Central America 与中美洲联合省 216n
- Bell, J. Franklin J. 富兰克林·贝尔 5
- Benavente, Toribio de 托里维奥·德贝纳文特. 参 Motolinía (Friar Toribio de Benavente)
- Bennassar, Bartolomé 巴托洛梅·巴纳萨尔 4
- Bentham, Jeremy 杰里米·边沁 190, 206
- Berbers, Spain and 柏柏尔人, 西班牙人 与 38
- Bering Strait migration 白令海峡迁移 7
- Berkeley school 伯克利学院 11-12
- Bermejo y Roldán, Francisco 弗朗西斯科·贝尔梅霍·伊·罗尔丹 110
- Big-game hunters 捕获大猎物的猎人 8
- Bilbao, Francisco 弗朗西斯科·比尔瓦奥 183, 190, 213 (illus.), 214
- Bilingualism 双语制 181
- Birthrate; of Brazilian slaves 出生率: 巴西奴隶的 132
- “Biru,” Peru as 秘鲁(黄金国) 66
- Black Death 黑死病 40
- “Black Legend” “黑色传奇” 5, 12
- Blacks 黑人: as slaves 黑奴 81, 82-83; in racial mixture 在民族混合中 110-111; in colonial social order 在殖民地社会秩序中 115-116; status of 的地位 115-116; in Brazil 在巴西的 124-126; in Spanish America 在西属美洲 150; revolts by 的起义 152-153; in Venezuelan Federal War 在委内瑞拉的联邦战争 239
- Bobadilla, Francisco de 弗朗西斯科·德博瓦迪利亚 56
- Bogotá 波哥大 71, 137; chiefdom at 的酋邦 10; Bolívar and 玻利瓦尔与 166; distances to 的偏远 237
- Bolívar, Simón 西蒙·玻利瓦尔 163-166, 163 (illus.) 175, 175 (illus.); San Martín and 圣马丁与 167; in Peru 秘鲁的 168, 228; abolition of slavery and 与废奴运动 219; Colombia and 哥伦比亚与 235, 236, 237; Venezuela and 委内瑞拉与 235
- Bolivia 玻利维亚 12, 88; Tiahuanaco in 的蒂亚瓦纳科文明 30; revolt of 1780-1781 and 1780-1781 的暴乱 156; Upper Peru as 别称上秘鲁 205; nitrate industry in 的硝酸盐产业 215, 255-256; War of the Pacific and 太平洋战争 与 255-256; war with Chile (1879) 与智利的战争 256. 另见 specific leaders
- Bonampak frescoes 博南帕克壁画 21, 21 (illus.)
- Bondage system in Peru 秘鲁的奴役系统 245

Bonifácio de Andrada, José 若泽·博尼法西奥·德安德拉达 170
 Books 书籍: of Maya 玛雅的 20; Aztecs and 阿兹特克与 24; in colonies 殖民地的 148
 Borah, Woodrow 伍德罗·博拉 3, 11, 12
 Border (Chilean-Bolivian) 边境(智利-玻利维亚) 255
 Bourbon dynasty 波旁王朝: colonial administration and 殖民地管理与 135 - 147; Mexico and 墨西哥与 170
 Bourbon reform objective 波旁王朝改革目标 146 - 147
 Bourgeoisie 资产阶级, in Mexico 墨西哥的 205; Argentine Radical Party and 阿根廷激进党与 254; in Chile 智利的 258; in Brazil 巴西的 263
 Boves, José Tomás 何塞·托马斯·博韦斯 164
 Boxer, Charles R. 查尔斯·R. 博克瑟 125, 131
 Boyacá 博亚卡 166
 Brading, David 戴维·布雷丁 139
 Brazil 巴西, Portugal and 葡萄牙与 6, 124 - 126; Amazon basin tribes in 的亚马孙盆地部落 9; Cabral in 卡夫拉尔在 53 - 54, 61; colonial 殖民地时期的 122 - 134, 123 (illus.); indigenous peoples in 的土著 124 - 126; labor in 的劳动力 124 - 126; mixed race soldiers in 混血士兵 124 (illus.); Dutch in 的荷兰人 126; minerals in 的矿产 126 - 128; church in 的教会 128 - 131; government of 的政府 128 - 131, 224 - 225; administration of 的行政机构 129 - 130; militia in 的民兵 130; slavery in 的奴隶 131 - 133, 132 (illus.), 225 - 228; gold from 的黄金 140; liberation movement and 解放运动与 163; independence of 的独立 169 - 170, 220 - 221, 220 - 228; Uruguay invaded by 入侵乌拉圭 205, 209; Argentinean war with 与阿根廷的战争 205 - 206; Paraguay governed by 统治乌拉圭 211; Dom Pedro and 唐·佩德罗与 221 - 222; economy in 的经济 224,

260 - 265; politics in 的政治 225, 260 - 265; antislavery movement in 的废奴运动 225 - 228, 260 - 261; immigration to 到此的移民 227, 265; fall of monarchy in 王室的没落 260 - 262; republic in 的共和国 262 - 263. 另见 Agrarian reform; Agriculture; Constitutions; 具体领袖

Brazilian Labor Confederation 巴西劳工联盟 265

Britain. 参 England (Britain)

British Guiana. 参 Guiana

Brujos, El. 参 Hernández Martínez, Maximiliano

Bruno, Giordano 焦尔达诺·布鲁诺 57

Bucareli y Ursua, Antonio María 安东尼奥·马利亚·布卡雷利-乌尔苏亚 140

Buccaneers (French) 海盗 93

Bueno, Pimenta 皮门塔·布埃诺 225

Buenos Aires 布宜诺斯艾利斯 71, 205; vicerealty of 总督辖区 143; English attack on 遭受英国的攻击 161; creole party in 的克里奥尔人党 166; Argentine constitution and 阿根廷宪法与 208; as separate province 作为独立省 208; as capital 作为首都 252; rivalry with caudillos 考迪罗之间的竞争 252. 另见 Argentina

Buffon, Georges de 乔治·德布冯 149

Bullion shipment 金银运输 91

Bulnes, Manuel 曼努埃尔·布尔内斯布尔内斯 213 - 214

Bunge, Carlos 卡洛斯·本赫 183

Bureaucracy 官僚阶层 10; Mayan 玛雅的 19; Aztec 阿兹特克的 28; expansion of 的扩张 195

Burgundy, Charles V and 查尔斯五世与勃艮第 47

Burkhart, Louise M. 路易斯·M. 伯克哈特 103

Business, of Cortés 科尔特斯的商业 85

Bustamante, Carlos María 查尔斯·马利亚·布斯塔曼特 180

C

Cabanagem revolt (Brazil) 小木屋运动(巴

- 西) 222
- Cabeza de Vaca, Alvar Núñez de 阿尔瓦·努涅斯·卡维萨·德巴卡 69, 73
- Cabildos (town councils) 市政会 98, 99, 170
- Cabral, Pedro Álvares 佩德罗·阿尔瓦雷斯·卡夫拉尔 53, 61, 122
- Cacao 可可 89, 267
- Caceres, Andrés 安德烈斯·卡塞雷斯 231
- Cacique families 卡西克家庭 113
- Caciques (chiefs) 卡西克 98
- Cádiz 加的斯 162; merchant monopoly of 的垄断商人 91; trade monopoly of 的贸易垄断 137, 138n, 166
- Cajamarca 卡哈马卡 30
- Calderón, Fanny 范妮·卡尔德龙 186
- Calendar 日历: Olmec 奥尔梅克的 14; Mayan 玛雅的 20
- California 加利福尼亚 200; cession to U.S. 割让给美国 200; Mexican-Americans in 的墨西哥裔美国人 201
- Calleja, Félix 费利克斯·卡列哈 174
- Calmon, Pedro 佩德罗·卡尔蒙 263
- Calpulli (Aztec landholders) 卡尔普利(阿兹特克地主) 4, 23
- Campania de crédito 信贷公司: in Venezuela 在委内瑞拉 268
- Campbell, John 约翰·坎贝尔 93
- Campeños; in El Salvador 268. 另见 Farmers and farming; Peasants
- Campillo, José 何塞·坎皮略 137
- Campos Sales, Manuel Ferraz de 曼努埃尔·费拉斯·德坎波斯·萨莱斯 264
- Canary Islands 加那利群岛 54
- Cancillerías 最高法庭 41
- Cañete (Viceroy) 卡涅特(总督) 74
- Cannibals 食人族 60
- Canterac, José de 何塞·德坎特拉克 169
- Canudos 卡努多斯 262, 263
- Cão, Diogo 迪奥戈·康 53
- Cape Bojador 博哈多尔角 53
- Cape of Good Hope 好望角 53
- Cape Verde Islands 佛得角群岛 123
- Capital; in Europe 资本:在欧洲的 57
- Capital cities, wealth in 首都的财富 117
- Capitalism 资本主义 57, 185; in colonial economy 在殖民地经济中 5-6, 93-94; colonial 殖民的 94; retardation of 的停滞 194; in Paraguay 巴拉圭的 209; in Chile 智利的 212; in Peru 秘鲁的 229
- Capitalism and Under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Frank) 《拉丁美洲的资本主义和欠发达》(弗兰克) 93n
- Captaincy 都督: system in Brazil 巴西的都督管辖系统 122-124; of "São Paulo and the Mines of Gold" "圣保罗和金矿" 127
- Captain general 都督 129, 145
- Caracas; liberation movement and 加拉加斯:自由运动与 163
- Caracas Company 加拉加斯公司 137
- Carbajal, Francisco de 弗朗西斯科·德卡瓦哈尔 68
- Caribbean region 加勒比地区: sugar production in 的蔗糖生产 54-55; Columbus in 哥伦布在 55-56; early Spanish voyages in 的早期西班牙航行 59; Spanish voyages in 西班牙航行 59 (illus.); smuggling and 走私与 137; as American "lake" 作为"美国内湖" 246. 另见 特定国家
- Carib people 加勒比族 60
- Carlota 卡洛塔 232 (illus.)
- Carrera Rafael 拉斐尔·卡雷拉 217, 265
- Cartagena 卡塔赫纳 91, 137, 164-165
- Cartels (nitrate production) (硝酸盐)企业联盟 259
- Carvajal, Luis de 路易斯·德卡瓦哈尔 106
- Carvalho, Manoel de 马诺埃尔·德卡瓦略 221
- Casa de Contratación 贸易署 138
- Cash crops 经济作物 138
- Castas (mixed-race persons) 混血人群 5, 110, 150
- Castes 种姓 110-121. 另见 Class
- Castile 卡斯蒂利亚 37; Muslims in 的穆斯林 37; León and 莱昂王国与 38; Reconquest and 收复失地运动 38-39; Cortes (parliament) in 的议会 39; unity with Aragon 与阿拉贡王国的联合

40; Council of 的王室会议 41; Charles V and 与查尔斯五世 47; conquistadors from 来自此处的征服者 72; bureaucracy in 的官僚 95
 Castilla, Ramón 拉蒙·卡斯蒂利亚 183, 184, 229
 Castro, Vaca de 巴卡·德卡斯特罗 68
 Catalonia, Spain 加泰罗尼亚: 西班牙 41, 49
 Catholic Church 天主教会: in Spain 西班牙的 42 - 43; nature of indigenous peoples and 与土著人的本质 76; in Indies 西印度的 100 - 110; ideals of 的理想 101; on slave marriages 关于奴隶婚姻的观点 116; in Brazil 巴西的 130 - 131; Bourbon reforms and 波旁改革与 135 - 137; in colonies 殖民地的 146 - 147; Consolidation and 综合券与 146 - 147; strength of 的权力 196; Mexico and 墨西哥与 199, 248; Juárez and 华雷斯与 202 - 203; in Argentina 阿根廷的 208; in Chile 智利的 213; land seizure by liberal governments 自由派政府没收其土地 245; in Venezuela 委内瑞拉的 269; in Colombia 哥伦比亚的 270, 271. 另见 Clergy; Missionaries
 Cattle industry 养牛业 86 - 88; contraction of 的收缩 87; in Brazil 巴西的 127 - 128, 133 - 134; ranches and 牧场与 139; in Argentina 阿根廷的 206
 Cauca Valley (Colombia) chiefdoms 考卡山谷的首邦 10
 Caudillo (strongman) 考迪罗 191, 194; "progressive," 进步的 192, 246; use of term 词语用法 194n; chief executive as 助理执行人 195; Artigas as 阿蒂加斯作为 205; Rosas as 罗萨斯作为 206 (illus.); in Venezuela 委内瑞拉的 237, 268; in Argentina 阿根廷的 252
 Cavalcanti family (Brazil) 卡瓦尔康蒂家族 (巴西) 224
 Celestina, La (Rojas)《塞莱斯蒂娜》(罗哈斯) 43
 Celts, conquests by 被凯尔特人征服 36
 Censorship 出版审查 107, 148, 189
 Censorship, of colonial literature 出版审

查,殖民地文学作品的 108
 Central America 中美洲: population density in 的人口密度 11; civilizations of 的文明 12 - 14; U.S. - British rivalry in 美英在此的争今 216 - 217; United Provinces of 的联合省 216 - 218; unity of 的联合省 216 - 218; economy in 的经济 265 - 268; politics in 的政治 265 - 268. 另见 El Salvador; Guatemala; Maya civilization; Nicaragua; 具体的领导人和国家
 Centralists 集权主义者: in Mexico 墨西哥的 199; in Chile 智利的 212
 Centralization 中央集权: in Spain 西班牙的 95; in Venezuela 委内瑞拉的 268
 Centralized government 中央集权政府 196
 Ceremonial sites 仪式场所 13, 17, 18
 Cerro de Pasco 塞多德帕斯科 88
 Cervantes de Saavedra, Miguel 米格尔·塞万提斯·德萨维德拉 50, 71
 Ceuta (Morocco), and Portugal 休达港(摩洛哥)与葡萄牙 52
 Cevallos, Pedro de 佩德罗·德塞瓦略斯 143
 Chac Mools (figures) "恰克莫尔" 18
 Chaco War 大叟谷战争 210
 Chalhoub, Sidney 西德尼·沙卢布 225
 Chanchan 昌昌 30
 Chapeton (tenderfoot) 查佩通 111, 151
 Charles II (Spain) 查尔斯二世(西班牙) 51, 135
 Charles III (Spain) 查尔斯三世(西班牙) 136, 146, 154; reconstruction under 领导的复兴 136; colonial reforms and 殖民地改革与 136 - 137, 137, 140; mining and 矿业与 140; Inquisition and 宗教裁判所与 148
 Charles IV (Spain) 查尔斯四世(西班牙) 161; conservatism of 的保守主义 136; Napoleon and 拿破仑与 170
 Charles V (Holy Roman Empire) 查尔斯五世(神圣罗马帝国的); as Spanish ruler 作为西班牙统治者 47 - 48; Pizarro and 皮萨罗与 68; new conquests permitted by 批准的新的征伐 74; Las Casas and 拉斯卡萨斯与 78; provincial officers

- and 省级官员与 99; fear of colonial feudalism by 对殖民地封建主义的惧怕 102
- charters of liberties 自由特许状 39
- chin culture 查文文化 30
- checks and balances 监督和制衡制度: in Spanish colonial administration 在西班牙殖民政权的 97-98; in Brazil 巴西的 129
- Chiapas 恰帕斯州: Maya frescoes in 的玛雅壁画 21, 21 (illus.). 另见 Zapatista Army of National Liberation (EZLN, Chiapas, Mexico)
- chibcha people (Colombia) 奇布查人(哥伦比亚) 10, 71
- hicaña Revolt (1851) 奇卡马起义 229
- hichen Itzá 奇琴伊察城 18, 19
- michimec people 奇奇梅克人 23, 68, 105
- chiefs, native 酋长,本土的 98
- childbirth; Aztec 儿童出生:阿兹特克 27
- child labor, in Brazil 童工,巴西的 265
- children of the Sun 太阳之子. 参 Inca civilization
- Chile 智利 71, 212-216; as captaincy general 智利都督辖区 145; revolt in 的暴乱 153; independence of 的独立 167; San Martín and 圣马丁与 167; government of 的政府 212; politics in 的政治 212-213, 255-260; economy in 的经济 213-214, 255-260; labor in 的劳动力 215; attacks on Peru by 进攻秘鲁 231; development in 的发展 244-245; War of the Pacific and 太平洋战争与 255-256; reforms in 的改革 258; voting in 的选举 258; foreign economic domination in 国内的外资投入 260; Parliamentary Republic in 的议会制共和 260; working class in 的劳动阶级 260. 另见 Constitutions; 具体领导人
- Chilean-Bolivian war (1879) 智利—玻利维亚战争 256
- Chilpancingo 奇尔潘钦戈 174
- Chimu empire (Peru) 奇穆帝国 30
- Chinampas (Aztec gardens) 奇南帕(水中田畦) 23, 26, 27
- Chinese immigrants 中国移民; as coolies in Peru 作为秘鲁的苦力 229; bondage labor of 的契约劳工 245
- Chirinos, José Leonardo 何塞·莱昂纳多·奇里诺斯 236 (illus.)
- Cholera epidemic; in Central America (1837) 霍乱:在中美洲 217
- Cholula 乔卢拉 24, 65
- Choquehanca, Diego 迭戈·乔克安卡 156
- Christianity 基督教: in Spanish Visigothic kingdom 在西班牙的西哥特王国 36; Spanish Reconquest and 西班牙收复失地运动与 38-39; papal grant to Castile for conversion and 教皇为了皈依目的将美洲赐予卡斯蒂利亚与 78. 另见 Catholic Church; Protestant evangelicalism / fundamentalism
- Christophe, Henri 亨利·克里斯托夫 160
- Church 教会; and education 与教育 106-108; decline in influence of 影响力的下降 189; confiscation of church lands 对教会土地的没收 245, 266. 另见 Catholic Church; Religion
- Cid (Ruy Díaz de Vivar) 熙德(鲁伊·迪亚斯·德比瓦尔) 38
- Científicos, in Mexico 科学家派,在墨西哥的 249, 250, 251
- Cieza de León, Pedro 佩德罗·谢萨·德莱昂 68-69, 73
- Cigarettes 香烟 141, 142
- Cigars 雪茄 141, 142
- Cinco de Mayo de 1862 (Mexico) 1862年5月5日(墨西哥民族节日) 204
- Cipangu. 参 Japan
- Circum-Caribbean area chiefdoms 环加勒比海地区酋邦 10
- Circumnavigation of globe 环球航行 61
- Cisneros, Cardinal 西斯内罗斯,红衣主教 101
- Cities 城市: of Maya 玛雅人 18; in Castile 卡斯蒂利亚的 39; in Spain 西班牙的 41; lifestyle in 里的生活方式 116-118; wealth in 里的财富 117; in Brazil 巴西的 134, 263; in Venezuela 委内瑞拉的 269. 另见 Urbanization

- Civil code 民法; Chile 智利 215
- Civilianist Party (Peru) 文官主义党 230 - 231
- Civilizations 文明: as state level of organization 作为城邦一级组织 10; of Ancient America 古代美洲的 11; of Nuclear America 核心美洲的 12 - 14; early American 早期美洲的 14 - 17; of Peru 秘鲁的 29 - 30; Conquest as end of indigenous 对本土文明的征服 57. 另见 具体文明
- Civil war; in Peru 内战: 秘鲁的 229
- Class 阶级 19; monarch's fear of seigncurial 王室对领主的担心 5; Aztec 阿兹特克的 28; ruling 统治的 110 - 111; in Indies 西印度的 110 - 121; in Brazil 巴西的 131 - 133; mestizo and mulatto families and 梅斯蒂索和穆拉家庭 150 - 151; voting and 投票与 195; hierarchical social structure and 阶层化的社会结构与 196; in republican Brazil 在巴西共和国的 263; in Nicaragua 尼加拉瓜的 267. 另见 Castes; Elites; Social stratification; 具体阶级
- Classic Maya society 传统玛雅社会. 参 Maya Classic civilization
- Classic period 古典时期 13; end of 的结束 13; Teotihuacán in 时的特奥蒂瓦坎文明 15
- Clavigero, Francisco Javier 弗朗西斯科·哈维尔·克拉维赫罗 148, 149
- Clearance certificates 血统证明 141
- Clergy 教士: in Spain 西班牙的 42; reformist 革新派的 101 - 102; secular vs. regular 世俗传教士和受教规约束的传教士之间的冲突 103 - 104; American-born vs. peninsular 美洲出生的传教士和半岛传教士之间的冲突 104; moral laxity of 道德败坏的 104 - 105; moral decline of 道德的堕落 104 - 106; influence of 的影响 136; Jesuit intellectuals and 耶稣会的知识分子和 148; privileges of 的特权 196; Juárez and 华雷斯与 203. 另见 Catholic Church; Missionaries; 具体人物
- Climate 气候: after Ice Age 冰川期之后的 8; in Glacial ages 冰期之中的 8; in Peru 秘鲁的 9
- Closed-port policy 闭关政策 91
- Clothing 衣着: of Maya 玛雅的 19; Aztec 阿兹特克的 26; European style of dress 欧洲风格的服饰 186, 187 (illus.)
- Coal 煤 214
- Coastal society, in Peru 沿海的社会, 秘鲁的 229
- Coatsworth, John 约翰·科茨沃思 94n, 140
- Cochineal (dye) 胭脂虫(颜料) 87, 266
- Cochrane, Thomas, Lord 托马斯·科克伦爵士 168
- Codices, of Maya 抄本, 玛雅的 21
- Coelho, Duarte 杜阿尔特·科埃略 124
- Coercion 强制: by state 被城邦 10; in colonial labor systems 在殖民地劳动力系统 83
- Coffee industry 咖啡产业 138; in Brazil 巴西的 127, 222, 227 - 228, 261, 264; in Central America 中美洲的 217; in Venezuela 委内瑞拉的 238; in Guatemala 危地马拉的 266; in El Salvador 萨尔瓦多的 267; in Nicaragua 尼加拉瓜的 267; in Colombia 哥伦比亚的 270
- Cole, Jeffrey 杰弗里·科尔 152
- Colegio de Santa Cruz (Mexico) 圣克鲁斯学院(墨西哥) 103
- Colegios (secondary schools) 学院 104
- Colombia 哥伦比亚 61, 71, 137; chiefdoms in 的酋邦 10; liberation of 的独立 165 - 166; freedom of 的解放 166; New Granada Venezuela union and 新格拉纳达委内瑞拉联盟与 166; Panama and 巴拿马与 216n; as Gran Colombia 大哥伦比亚 235 - 243; economy in 的经济 240, 270 - 272; church lands confiscated in 的教会被没收土地 245; government of 的政府 270 - 272; politics in 的政治 270 - 272. 另见 Constitutions; Guerrilla movements; New Granada; 具体领袖
- Colonial caste society 殖民地的种族等级社会 180

- Colonial era 殖民地时代: sexuality in 的性生活 118 - 121 另见 Social order, in colonial era
- Colonial Latin America 殖民地化的拉丁美洲 4; education 的教育 106 - 108
- "Colonial subversive discourse" 殖民地颠覆性的布道 108
- Colonies and colonization 殖民地与殖民化: in Pleistocene period 更新世时期 8; by Inca 被印加人 31, 33; da Gama and 达伽马和 53 - 54; Madeira Islands as 马德拉群岛作为 54; Columbus and 哥伦布和 61; autonomy in 自治 89; 的商业 91 - 92; 的经济 93 - 94; Brazil and 巴西与 122 - 134, 123 (illus.); in Brazil's mining area 巴西矿区的 126 - 127; culture in 的文化 147 - 148; church in 的教会 148; education in 的教育 148; society in transition in 中的转型期社会 150 - 152; Establishment in 一个很强势的 159; neocolonialism and 新殖民主义 244 - 247. 另见 Portuguese America; Spanish America
- Colonos (farmers): in Peru 在秘鲁 228; in Cuba 在古巴 232
- Color 颜色, 参 Skin color
- Columbus, Bartholomew 巴托洛缪·哥伦布 56
- Columbus, Christopher 克里斯托弗·哥伦布: Spain in the time of 时代的西班牙 44; Hispaniola and 伊斯帕尼奥拉岛与 55 - 56, 77; voyages of 的航行 55 - 56; assessment of 对其评价 60; on indigenous peoples 对上着人的观点 60; wealth of 的财富 60
- Columbus, Ferdinand 费迪南德·哥伦布 55
- Comanches 卡曼其人 105
- Commerce 商业: in postclassic period 在后古典时期的 14; licensing of 的许可 91; colonial system of 在殖民地的系统 91 - 92; in Spanish colonies 西班牙殖民地的 137 - 138; Bourbon reforms of 波旁的商业改革 138; peninsular Spaniard control of 西班牙人对其的控制 158 - 161; in Peru 秘鲁的 229. 另见 具体国家
- Commercial agriculture 经济作物 85 - 86, 89. 另见 Agriculture
- Commoners 公社成员: Aztec 阿兹特克的 24; Inca 印加的 34; indigenous 土著的 114
- Communal landholding system 公社土地保有制度: of Inca 印加的 32; usurpation by creole landlords 被地主篡夺 176; in El Salvador 萨尔瓦多的 267
- Communication 通讯: between special units 特定单位间的 23; in Chile 智利的 258 - 259
- Communist Manifesto (Marx)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 188
- "Communists" Mexican peasant revolts and "共产党人", 墨西哥的农民起义与 204
- Comonfort, Ignacio 伊格纳西奥·科蒙福特, 201
- Compadrazgo 干亲家关系 185
- Compañía (warrior band) 战友会 72
- Comte, Auguste 奥古斯特·孔德 261
- Comuneros 公社社员: revolt in Spain 在西班牙的暴乱 47; revolt in New Granada 在新格拉纳达的暴乱 156
- Concertaje "学徒"制度 240
- Concubinage, among clergy 传教士的, 非法同居 104 - 105
- Condamine, Charles Marie de La 夏尔·马里·德拉孔达米内 148
- Condorcanqui, José Gabriel 何塞·加夫列尔·孔多尔坎基 113, 155 (illus.)
- Conflict, state resolution of 城邦对此的决策, 冲突 11
- Conflict of interest 利益冲突: among planters, slave hunters, and Jesuit missionaries 在种植园主、奴隶猎人, 和耶稣会传教士之间的 125
- Congo River 刚果河 53
- Congregations 人口聚集居住区 86
- Congregations, indigenous towns as 土著城市作为人口聚集居住 115
- Congress of Angostura (Venezuela) 安戈斯图拉会议(委内瑞拉) 235
- Conquest 征服 52 - 75; nature of Spanish 西班牙的征服本性 4 - 5; populations in

1492 and 1492 年人口与 11 - 12; as theme of Spanish history 作为西班牙历史的主题 36 - 37; American civilizations and 美洲文明与 57; reasons for Spanish success 西班牙征服成功的原因 68 - 69; conquistador's vision of 征服者的视野看待 74; in making of Latin America 与拉美的形成 84 (illus.); problems left by 遗留的问题 96 - 97. 另见 具体国家

Conquest of America (Todorov) 《美洲的征服》(托多罗夫) 60

Conquest of the Desert (Argentina) 荒漠远征(阿根廷) 253

Conquistadors 征服者 4; accounts of Aztec and Inca empires 认识中的阿兹特克与印加帝国 14; in Mexico 在墨西哥 61 - 62; in Tenochtitlán 在特诺奇提特兰 64 - 65; characteristics of 的特点 71 - 73; motives of 的动机 72, 73; royal jealousy of 皇室的妒忌 95. 另见 具体人物

Conselheiro, Antônio 孔塞列罗·安东尼奥, 262

Conselho de Índia 印度会议 129

Conservatism 保守主义; in new states 在新的城邦的 191; in Mexico 在墨西哥 195 - 196; vs. liberalism in Mexico 墨西哥的保守主义对阵自由主义 199 - 201; in Chile 智利 212 - 213; in Central America 中美洲的 216

Conservative Party 保守党; in Mexico 墨西哥 199; in Chile 智利的 215; in Brazil 巴西的 224; in Colombia 哥伦比亚的 241

Conservatives 保守派; in Nicaragua 尼加拉瓜的 218, 267; in Venezuela 委内瑞拉的 238; in Colombia 哥伦比亚的 270

Consolidación de Vales Reales 皇家综合券 146 - 147

Consolidated Copper company 附属铜矿公司 251

Consolidation 巩固 252

Constant Botelho de Matalhães, Benjamin 本杰明·贡斯当·博特略·马加良斯

261 - 262

Constituent Congress (1830, Venezuela) 制宪会议(1830, 委内瑞拉) 238

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 in Santa Fe (Entre Ríos) (1852) 制宪会议; 圣菲(恩特雷里奥斯)(1852), 208

Constitutions 宪法 180, 195; in Venezuela 委内瑞拉的 165, 235; in Mexico 墨西哥的 199; in Argentina 阿根廷的 205, 206 - 207, 207, 208; in Chile 智利的 212; in Brazil 巴西的 221; in Gran Colombia 大委内瑞拉的 235; in Colombia 哥伦比亚的 270 - 271

Consulado (merchant guild) 康苏拉多(商业行会) 137

Continental System 大陆封锁体系 161

Contraband trade, in Spanish colonies 走私贸易, 在西班牙殖民地的 137, 138

Contribucion de indigenas (Peru) 土著人贡赋(秘鲁) 228

Conucos agriculture (泰诺人的) 耕地种植 12

Convent life 女修道院生活 120 - 121

Conversion 皈依; papal grant of America to Castile for 教皇为了皈依将美洲赐予卡斯蒂利亚 78; as task of church 作为教会的目标 102 - 103; lack of success of 的努力缺乏成功 103

Conversos 皈依教者 41, 45 - 46, 46 (illus.); in New Spain and Peru 在新西班牙与秘鲁的 106; prohibited from going to Indies 被禁止进入西印度 106

Cook, Sherburne 谢尔本·库克 11

Coolies 苦力, 参 Chinese immigrants

Copernicus 哥白尼 147

Córdoba, Francisco Hernández de 弗朗西斯科·埃尔南德斯·德科尔多瓦 62

Córdoba, Gonzalo de 贡萨洛·德科尔多瓦 43, 62

Córdoba, Spain 科尔多瓦, 西班牙 37; caliphate of 的哈里发国 38; capture by Ferdinand III (Castile) 被费迪南德三世(卡斯蒂利亚)获取 38

Coronado, Francisco Vázquez de 弗朗西斯科·巴斯克斯·德科罗纳多 70

Coronéis (Brazil) 军队头目(巴西)

- 262, 264
- Coronel, Antonio 安东尼奥·科罗内尔 201
- Corregidores 督办 41, 82, 98 - 99, 98 (illus.)
- Corregidores de indios 西印度的督办 98
- Corruption; in Brazil 腐败:巴西的 130
- Cortes; in Santiago, Cuba 科尔特斯:在古巴的圣地亚哥 62
- Cortes, Hernando 瓦尔南多·科尔特斯 62, 64 (illus.), 72; Quetzalcóatl legend and 羽蛇神传说与 22; Tenochtitlan and 特诺奇蒂特兰城与 27, 64 - 65; Aztec Empire as Kingdom of New Spain and 将阿兹特克帝国称为新西班牙王国 65; encomiendas forbidden to 禁止其实行委托监护制 78 - 79; as businessman 作为商人 85
- Cortes, Martin 马丁·科尔特斯 66
- Cortes (parliament) 科特(议会): of Castile 卡斯蒂利亚的 40, 41, 42, 48; of Madrigal 马德里加尔的 41; of Toledo 托莱多的 41; of Spain 西班牙的 44, 162, 175; of Aragon 阿拉贡的 48; in Portugal 葡萄牙的 170
- Cosa, Juan de la 胡安·德拉·科萨 61
- Cosmes, Francisco G 弗朗西斯科·G. 科斯梅斯 249
- Costa Rica 哥斯达黎加: chiefdoms in 的西邦 10; in United Provinces of Central America 在中美洲联合省中 216 - 218; coffee in 的咖啡种植 217
- Cotton industry 棉花产业: in Brazil 巴西的 127; dislocation in United States 美国北部棉产业的混乱 229; in Peru 秘鲁的 229
- Council of Castile 卡斯蒂利亚王室会议 95, 96
- Council of State 国务会议: in Brazil 巴西的 222
- Council of the Indies 西印度院 95 - 96, 99, 138
- Councils, self-rule and 议会,自治与 99
- Counterrevolution; in Mexico 反革命,墨西哥的 203
- Coups d'état; in Venezuela 政变,委内瑞拉的 269
- Courts 法庭: Aztec 阿兹特克的 27; audiencia as 作为法庭的检审法庭 66; in Brazil 巴西的 129
- Couturier, Edith 艾迪斯·考图里耶 119 - 120
- Cozumel, exploration of 科苏梅尔岛,对其的探索 63
- Crafts 工艺品: in Colombia 哥伦比亚的 10; in postclassic period 在后古典时期的 14
- Credit 信用: in Spain 西班牙的 42; in Venezuela 委内瑞拉的 238
- Creek Indians 克里克印第安人 5
- Creoles (American-born Spaniards) 克里奥尔人(美国出生的西班牙后裔) 6, 111; in town councils 在镇议会的 99; on haciendas 大庄园的 118; Consolidation and 政权巩固与 146; military service by 的兵役制度 146; social position of 的社会地位 146; nationalism of 的民族主义 148 - 150; resentment of immigrants 移民的不满 151; revolt of 1780 - 1781 and 1780 - 1781 年的暴乱 150; New Granada insurrection and 新格拉纳达暴动与 157; peninsular Spaniards and 半岛西班牙人和 158 - 161; defeat of British army by 英国军队被其击败 161; independence as goal of 独立作为其目标 162; in Argentina 在阿根廷的 166, 253; in Guayaquil 在瓜亚基尔的 166; in Mexico 墨西哥的 170, 171, 172, 173, 174, 175; constitutions of 的宪法 195; in Peru 在秘鲁的 228; in Cuba 在古巴的 233, 234; as white supremacists (Cuba) 作为白人至上主义者(古巴) 235
- Crespes, Jehuda 耶胡达·克雷斯普斯 53
- Criollo values. 参 Creoles (American born Spaniards)
- CROM. 参 Confederación Regional Obrera Mexicana (CROM) 墨西哥区域工人联合会
- Crops 作物: in Mexico 墨西哥的 8; of Maya 玛雅的 19; Aztec 阿兹特克的

23; of Inca 印加的 32; cash 经济作物 138. 另见 Agriculture; Farmers and farming

Cruz, Juana Inés de la 胡安娜·伊内斯·德拉·克鲁斯 106, 109, 109 (illus.), 119

Cruz, Oswaldo 奥斯瓦尔多·克鲁斯 263

Cry of Ipiranga (Brazil) “伊比兰加呼声”(巴西) 170

CTM. 参 Confederación de Trabajadores Mexicanos (CTM) 墨西哥劳工联合会

Cuauhtémoc (Aztec) 夸乌特莫克(阿兹特克) 65, 70 (illus.); surrender of 的投降 65

Cuauhtémoc contra el mito (Siqueiros) 《与神话相反的库奥特默克》(西卡洛斯) 70 (illus.)

Cuba 古巴 61; chiefdoms in 的西邦 10; Columbus and 哥伦布与 56; sugar in 的糖种植业 138; isolation of 的交通不便 231; 19th-century development in 在 19 世纪的发展 231; economy in 的经济状况 231 - 234; independence of 的独立 231 - 234; society in 社会 231 - 234; labor in 的劳动力 232 - 234; Oriente Province in 奥连特省 233; Ten Years' War in 十年战争 234 - 235; two societies in 的两种社会 235; white supremacists in 白人至上主义者 235

Cúcuta 库库塔 164, 235

Cuenta (count) 账目制度; of tribute payers 纳贡者的 79

Cuitlahuac (Aztec) 库伊特拉华克(阿兹特克) 69

Cultivation 养殖; techniques of 养殖的 8; in Colombia 哥伦比亚的 10. 另见 Agriculture; Farmers and farming

Cultural relativism 文化相对主义 58

Culture 文化; in stages of history 在历史舞台上的 13 - 14; Aztec 阿兹特克的 26 - 29; of Peru 在秘鲁 29 - 30; Muslim 穆斯林 37; colonial 殖民地的 147 - 148. 另见 Arts; Popular culture; Popular music; specific arts

Cumbes 自治村镇 236

Cunha, Euclides da 库尼亚, 欧克利德斯·

达 263

Curacao 库拉索 137

Curacas (hereditary chiefs); of Inca 库拉克(世袭酋长们), 印加的 33, 34, 67

Currency 货币; in Spain 西班牙的 42

Cushner, Nicholas 尼古拉斯·库施内尔 142

Customs 关税; in Venezuela 委内瑞拉的 269

Cuyo province 库约省 167

Cuzco 库斯科 34, 35; Incas and 印加与 30; Spanish in 在此的西班牙人 67

D

Da Gama, Vasco 瓦斯科·达伽马 53 - 54

Darien 达连; in Panama 在巴拿马的 61

Dávila, Pedrarias 佩德拉萨里亚斯·达维拉 61, 66

Death to the Invader (Siqueiros mural) 《入侵者的死亡》(西凯罗斯壁画) 213

De Bry, Theodore 泰奥多尔·德布吕 90 (illus.)

Debt. 参 Foreign debt

Debt peonage 债务劳役制 94; in Indies 在西印度的 142

Debt servitude 债务奴役 82 - 83

Decadencia (decadence); in Spain 颓废; 在西班牙, 50

Decentralization; in Spanish American administration 非中央集权化; 在西属美洲的政府 143 - 144

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Man; translation and printing of 《人权宣言》: 的翻译与印刷 160

Deforestation; population crisis and 森林砍伐; 人口危及与 12

Degredados (exiled criminals) 流放者(从西班牙流放) 122

De la Barca, Calderón 卡尔德龙·德拉巴尔卡 51

Del Valle, Juan 胡安·德尔巴列 102

Democratic Societies; in Colombia 民主社会; 在哥伦比亚的 241

Demographic history; of Ancient America 人口史; 古代美洲 11 - 12

Demonstrations; between patriots and

- royalists 亦威游行：爱国主义者与保皇主义者之间的 162
- Denevan, William T. 威廉·T. 德内文 12
- Dependence: on Europe and U. S. 依赖性：对欧洲和美国的 244
- Depression 经济萧条：in 17th century 17 世纪的 89, in Chile 智利的 215; in Mexico 墨西哥的 252
- De Soto, Hernando de 埃尔南多·德索托 70
- Despotism 专制主义：Aztec 阿兹特克的 28, enlightened “开明专制” 136
- Dessalines, Jean Jacques 让·雅克·德萨林 纳 160
- Diamonds: in Brazil 钻石：巴西的 127
- Dias, Bartholomeu 巴尔托洛梅乌·迪亚斯 53
- Díaz, Porfirio 波非里奥·迪亚斯 190, 192, 204, 246, 248 (illus.); positivism and 实证主义和 204 - 205; Mexican Reforma and 墨西哥改革和 245, 246; dictatorship under 其独裁统治 247 - 249; reaction against 对其的反抗 251, 252
- Díaz del Castillo, Bernal 贝尔纳尔·迪亚斯·德尔卡斯蒂略 73
- Dictatorships 独裁 191; underlying constitutions 相关的宪法 195; in Paraguay 巴拉圭的 205; in Argentina 阿根廷的 207; of Díaz, Porfirio (Mexico) 波非里奥·迪亚斯的(墨西哥) 247 - 249, 另见 具体独裁者
- Diente del Parnaso (*Tooth of Parnassus*) 《诗人的牙齿与杂诗》(巴列·卡维德斯) (Valle y Caviedes) 109
- Diplomacy 外交：dollar diplomacy 美元外交 246, 另见 Imperialism: specific acts
- “Discovery” “发现” 57
- Discrimination 歧视：by colonial law 殖民地法律中的 100; in Cuba 古巴的 233, 另见 Racism
- Disease 疾病：from European contact 从欧洲大陆来的 12, 57, 124, 125; Spanish 西班牙的 68
- Dispensations 豁免：purchase of legal whiteness through 通过购买获得法律上的白种 151
- Divination: by Inca 占卜：印加人的 35
- Divinity: of king 神圣性：王的 10
- Division of labor 分工 10; Aztec 阿兹特克人的 28
- Dobyns, Henry 亨利·多宾斯 12
- Dollar diplomacy 美元外交 246
- Domesticated animals 本土动物：Aztecs and 阿兹特克人与 27; introduction of Spanish into America 从西班牙引进到美洲的 86 - 88
- Domesticated plants 本土植物 8
- Dominican Republic 多米尼加共和国 55, 另见 Hispaniola
- Dominicans 多米尼加人 103; protests against treatment of indigenous peoples by 发动的对土著政策的抗议 77
- Dom Pedro 唐·佩德罗 221 - 222
- Donatory system of government: in Brazil 政府的受赠制度：巴西的 128
- Don Quixote (Cervantes) 堂吉珂德(塞万提斯) 50
- Dowries: costs of 嫁妆：的成本 120n
- Draconianos (lower military) 德拉古人：in Colombia 在哥伦比亚 241
- Draft labor: for indigenous peoples 劳役摊派制：针对原住民的 245
- Drake, Francis 弗朗西斯·德雷克 92 - 93
- Dreyfus firm 德雷福斯公司：Peruvian guano monopoly and 秘鲁的鸟类垄断与 230
- Dual monarchy 二元君主制：in Portugal 葡萄牙的 170
- Du Bois, W. E. B. 杜波依斯, W. E. B. 220
- Durán, Diego 迭戈·杜兰 103, 107
- Dutch 荷兰：independence of 的独立 49; Portuguese spice trade and 葡萄牙的香料贸易与 53 - 54; in Brazil 巴西的 126; smuggling by 的走私行为 128
- Duties 关税 91; on trade 贸易的 91
- Dyes 染料：in El Salvador 萨尔瓦多的 267

E

- Ecclesiastical patronage 教职任命权：in Brazil 巴西的 130

Economic archipelago 经济群岛: in Colombia 哥伦比亚的 240

Economic crisis 经济危机: debate over 关于此的辩论 88-89

Economics: impact of Discovery and 经济: “发现”的影响与 57

Economy 经济: colonial 殖民地的 5-6, 93-94; Maya 玛雅的 18-19; of Inca 印加的 30-34; Andean “vertical” 安第斯山的“垂直经济” 32; of Castile 卡斯蒂利亚的 39; of Aragon 阿拉贡的 40; of Spain 西班牙的 42, 43, 45, 49-50, 82-85; repartimiento system and 商品摊派制与 81-82; haciendas and 大庄园与 85-86, 118; Bourbon commercial reforms and 波旁王朝贸易改革与 138; after independence 独立后的 191-192; stagnation after independence 独立后的经济停滞 194-195; in Río de la Plata region 在拉普拉塔河流域 205-206;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工业革命与 243; neocolonialism and 新殖民主义 244-247; in Central America 中美洲的 265-268. 另见 Encomienda; Labor; Slaves and slavery; Trade; 具体国家

Ecosystems 环境系统: pre-Conquest 征服前的 12; European destructions of 欧洲人对其的破坏 57

Ecuador 厄瓜多尔 235; in Classic period 在古典时期的 13; freedom of 的解放 166; union with Colombia 与哥伦比亚的联盟 235

Education 教育: Aztec 阿兹特克的 26-27; of Inca 印加的 35; for indigenous youth 土著儿童的 103; in colonies 殖民地的 148; Enlightenment writings and 启蒙著作 159; bilingualism 双语的 181-182; in Mexico 墨西哥的 204; in Argentina 阿根廷的 206, 211; in Gran Colombia 在大哥伦比亚的 235; in Chile 智利的 258. 另见 Schools

El Carnero《绵羊》109

El Dorado : search for 黄金国: 寻找 69-75

Elections 选举: in indigenous communities 在土著聚居地的 114; in Argentina 阿根廷的 208; in Chile 智利的 213; in Mexico 墨西哥的 247-248

Electoral reform 选举改革: in Argentina 阿根廷的 255; in Colombia 哥伦比亚的 271

El Greco 格列柯 51

Elites 精英: colonial 殖民地的 6; in chiefdoms 酋邦的 10; Maya 玛雅的 17-18; Aztec 阿兹特克的 24; instability of 的不稳定 86; loyalty of colonial 殖民地上层的忠诚 100; domination of native peoples by 对当地人民的统治 102; in Brazil 巴西的 133-134, 169; Consolidation and 的巩固 147; mestizos and mulattos in 中的混血人种 151; in Mexico 墨西哥的 170; Europeanization of 的欧化 186; military 军队的 194; political and military careers of 的政治与军事生涯 194; in Peru 秘鲁的 228; in Cuba 古巴的 234, 235; in Colombia 哥伦比亚的 239; dependency on Europe and U. S. by 对欧美的依赖 244; in Argentina 阿根廷的 253; in Chile 智利的 259; in Nicaragua 在尼加拉瓜的 267

Elizabeth I (England) 伊丽莎白一世(英国) 48, 92

El Salvador 萨尔瓦多: Maya in 的玛雅人 17; in United Provinces of Central America 在中美洲联合省的 216-218; Carrera and 卡雷拉与 217; crops in 的作物 217; economy in 的经济 267-268; politics in 的政治 267-268; labor in 的劳动力 268

Emancipation 解放. 参 Abolition and abolitionism

Emperor 皇帝 10

Emphyteusis system (Argentina) 永佃制: for land distribution 土地分配 206

Empires 帝国: growth of 的扩张 9; conditions for 的环境 11; in Postclassic period 在后经典时期的 14

Employment 雇佣: of immigrants 对移民的 151

- Encomenderos 委托监护主 73; scale of enterprises of 产业的范围 85; Las Casas and 拉斯卡萨斯与 102
- Encomienda 委托监护制: for Hernando Cortés 授予赫尔南多·科尔特斯的 62; in Peru 在秘鲁的 74; slavery and 奴隶制与 77-79; Las Casas on 拉斯卡萨斯对此的看法 78; forbidden to Cortés 向科尔特斯传达禁止委托监护地的命令 78-79; decline of native populations and 本地人口的减少与 80; mitava 米达制 80-81; originaria 初始委托监护制 80-81; haciendas and 大庄园与 85
- "Encounter" 相遇: use of term vs. "discovery" 发现 57
- Encyclopedists 百科全书派: influence of 的影响 136
- Engineering 工程: Aztec 阿兹特克的 27; Roman construction in Spain 罗马在西班牙的建筑 36
- England (Britain) 英国(不列颠) 247; Portuguese spice trade and 葡萄牙香料贸易与 54; piracy and 海盗与 92-93; Treaty of Madrid and 《马德里条约》与 93; merchant class in 商业阶级与 137-138; Falkland Islands and 福克兰群岛与 143; defeat by people's militia 被民兵打败 161; Spanish shipping and 西班牙航运与 161; Mexico and 墨西哥与 197, 203; Uruguay and 乌拉圭与 206; Argentina and 阿根廷与 212; Chile and 智利与 214, 255-256, 258, 259, 260; United States and 美国与 216-217, 246; Brazilian independence and 巴西的独立与 221; neocolonialism and 新殖民主义与 244; Venezuela and 委内瑞拉与 269
- Enlightened despotism 开明专制主义 136; in Portugal 在葡萄牙 128
- Enlightenment 启蒙运动: Spanish 西班牙的 136; creole discontent and 克里奥尔人的不满与 159
- Entails 限定继承财产 196; in Chile 在智利 214, 215
- Enterprise of the Indies 西印度的产业 55
- Entrepreneurial class 企业家阶级 244
- Environment 环境: of Maya culture 玛雅的文化 17; cattle damage to 养牛业对其破坏 87. 另见 Pollution
- Equality 平等: under Spanish law 西班牙法制下的 110; of mulattos 穆拉托人的 119
- Erasmus writings of 伊拉斯谟的著作, 101
- Errilla, Alonso de 阿隆索·德埃尔西利亚 73
- Errazuriz Zañartú, Federico 费德里科·埃拉苏里斯·萨尼亚图 215
- Establishment: colonial 成立: 殖民地的 159
- Estancias (cattle ranches) 大牧场 139, 193
- Estancias de la patria (Paraguay) 国有农场和牧场(巴拉圭) 205
- Estancieros (landed oligarchy) 大牧场主: in Argentina 阿根廷的 206, 207, 253; Rosas as 罗萨斯作为 206 (illus.), 207
- Estates 庄园: in Spain 西班牙的 38; in Brazil 巴西的 133-134, 221; system of 的体系 176; in agriculture 农业的 193; dominance of 的占有 193-194; in Paraguay 巴拉圭的 205; in Chile 智利的 214. 另见 Estancias (cattle ranches); Fazenda (estate); Haciendas (estates)
- Estremadura 埃斯特雷马杜拉 45, 72
- Ethnic groups 民族团体: in Colombia 哥伦比亚的 270
- Ethnocentricity 民族优越感: of term "discovery" "发现"一词反映的 57; European 欧洲的 58
- Ethnographic data 人种志资料: of Las Casas 拉斯卡萨斯的 58
- Ethnography 人种: to inventory pre-Columbian cultures 统计前哥伦比亚时期的文化数量 103
- Europe 欧洲: impact of Discovery on "发现"对其的影响 57; neocolonialism by 的新殖民主义 244-245
- Europeans 欧洲人: diseases brought by 携带的疾病 12; in Mexico 墨西哥的 61-62; in Spanish America 西属美洲的 150
- Exaltados (radical liberals); in Brazil 激进分子: 巴西的 221

Exemplary Tales (Cervantes) 《训诫小说集》(塞万提斯) 71

Expansion 扩张; assessment of Western 对西方扩张的评价 57

Exploitation 开垦; by colonial law 殖民地法律规定的 100

Exploration 探索; to find trade routes 寻找贸易航线 52; by Portugal 葡萄牙的 52-53

Exports 出口 181, 194, 243, 244, 245; from Spain 从西班牙 43; from Paraguay 从巴拉圭 211; from Peru 从秘鲁 229, 230; from Colombia 从哥伦比亚 240, 270; from Mexico 从墨西哥 250; from Argentina 从阿根廷 253-254

Extended family 大家族; Maya 玛雅的 19

Extramarital affairs 婚外情; women and 妇女与 119

F

Factories 工厂; in Mexico 墨西哥的 250-251; in Brazil 巴西的 263

Factory capitalism 工厂资本主义; in Mexico 墨西哥的 197

Falkland Islands 福克兰岛. 参 Malvinas

Family 家庭 118; Classic Maya 典型的玛雅的 19; slave 奴隶的 116

Famine 饥荒; in Mexico 墨西哥的 139
另见 Malnutrition

FARC. 参 Revolutionary Armed Forces of Colombia (FARC) 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

Farmers and farming 农民与农业 85-86, 193; as subsistence base of chiefdom 作为酋邦的基础 9; in Colombia 哥伦比亚的 10; terraced farms 梯田 10, 32; Aztec 阿兹特克的 24; agricultural tools 农具 32; in Hispaniola 伊斯帕尼奥拉岛的 57; mixed-blood 混血的 86; indigenous 土著的 114; in Cuba 古巴的 231; in Argentina 阿根廷的 253; in El Salvador 萨尔瓦多的 267-268. 另见 Agriculture; Haciendas (estates); Tenant farming; 具体作物

Fazenda (estate) 法曾达(庄园) 133, 193

Fazendeiros (former slave owners) 法增戴罗斯(大庄园主,前奴隶主) 262

Federalism 联邦主义; in Argentina 阿根廷的 206, 207, 208, 252; in Venezuela

委内瑞拉的 239; in Brazil 巴西的 262

Federalists 联邦派 195-196; in Mexico 墨西哥 196; in Argentina 阿根廷的 206, 208; in Chile 智利的 212

Federal Republican Party (Brazil) 联邦共和党(巴西) 263

Federal War (Venezuela) 联邦战争(委内瑞拉) 239

FEHCIF. 参 Chilean Federation of Feminine Institutions (FECHF)

Fencing 围栏 211

Ferdinand III (Castile) 费迪南德三世(卡斯蒂利亚) 38

Ferdinand VI (Spain) 费迪南德六世(西班牙) 136, 137

Ferdinand VII (Spain) 费迪南德七世(西班牙) 161, 162, 164; revolt against 反对其的暴乱 165-166; Napoleon and 拿破仑与 170; return to throne 回到王位 174

Ferdinand and Isabella (Spain) 费迪南德与伊莎贝拉(西班牙); historical reappraisal of 对其的重新历史评价 43-46; Spanish exploration and 西班牙 55; Laws of Burgos and 《布尔戈斯法》与 77; Catholic Church and 天主教与 100; Pope and 教皇与 101

Ferdinand Maximilian 费迪南德·马克西米连(Hapsburg 哈布斯堡). 参 Maximilian (Mexico)

Ferdinand of Aragon 费迪南德(阿拉贡) 40, 40 (illus.), 47

Ferrer, Ada 阿达·费雷尔 234

Fertility goddesses 生育女神; in Valley of Mexico 墨西哥谷地的 14

Fertilization: by Inca 施肥: 印加人 32

Fertilizer 肥料; Chilean nitrates, guano, and, 智利的硝酸盐、鸟粪与 215. 参 also Guano; Nitrate industry

Feudal colonial economy 封建殖民地经济 5-6, 93

Feudalism 封建主义; of Inca 印加的 34;

- in Peru 秘鲁的 228; in Mexico 墨西哥的 250
- Fico: in Portugal “我留下” 171
- Fidelity: importance of 诚信的重要性 118
- Finances: in Mexico 财政 203
- Financial crisis: in Cuba 经济危机: 古巴的 233
- Fine arts, school of (Mexico City) 美术学院(墨西哥城), 147
- Fleet system; Spanish 船队制: 西班牙的 137-138
- Florentine Codex 《佛罗伦萨抄本》62n
- Flores, Juan José 胡安·何塞·弗洛雷斯 183
- Florescano, Enrique 恩里克·弗洛雷斯卡诺 104
- Flores de Oliva, Isabel 伊莎贝尔·弗洛雷斯·奥利瓦. 参 Rose of Lima (Saint)
- Flores Magon, Ricardo 里卡多·弗洛雷斯·马贡 251
- Florida 佛罗里达: Ponce de León in 庞塞·德莱昂在 69; Spanish loss of 西班牙失去 138
- FMLN 参 Farabundo Martí 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 (FMLN, El Salvador)
- Folsom stone projectile points 福尔松石弹头 7
- Fonseca, Manuel Deodoro da 曼努埃尔·德索多罗·达·丰塞卡 262
- Food 食物: domesticated plants as 本土植物作为 8; shift from gathering to producing 由采集向生产转变 8; Aztec 阿兹特克的 26; shortages in Spain 西班牙的食物短缺 45; production in Mexico 墨西哥的生产 250. 另见 Malnutrition
- Food processing 食物加工: in Brazil 巴西的 265
- Foraker Amendment. 参 Turpie-Foraker Amendment
- Forasteros (outsiders) 异乡人 142, 150
- Forced labor 强迫劳动力: of Incas 印加的 33; in Peru 秘鲁的 228 另见 Slaves and slavery
- Foreign corporate ownership 外国企业所有权 246
- Foreign debt 外债: in Mexico 墨西哥的 197; in Peru 秘鲁的 230
- Foreign investment 国外投资 197; in Argentina 阿根廷的 212, 253; in Peru 秘鲁的 229-230; in Mexico 墨西哥的 250; in Chile 智利的 260; in Guatemala 危地马拉的 266. 另见 United States
- Foreign loans 外国贷款: to Mexico 向墨西哥 197. 另见 Foreign investment;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World Bank
- Foreign policy 外交政策: of Ferdinand and Isabella (Spain) 费迪南德与伊莎贝拉(西班牙)的 43
- Foreign trade 外贸 89; dependence on 对其的依赖 6
- Forests: in Cuba 森林: 古巴的 232
- Formative period 形成时期 13; Olmecs in 的奥尔梅克文明 13, 14-15; Maya and 玛雅与 17; in Peru 秘鲁的 29
- “Fourteen families”: in El Salvador “十四个家族”: 萨尔瓦多的 268
- France 法国: Spain and 西班牙与 43, 48, 160; Treaty of Ryswick and 《里斯威克条约》与 93; Rio de Janeiro founded by 建立的里约热内卢 126; war with Spain and 与西班牙的战争 161; invasion of Portugal by 入侵葡萄牙 169; Mexico and 墨西哥与 203-204; July Revolution in (1830) 七月革命(1830) 221; Venezuela and 委内瑞拉与 269
- Francia, José Gaspar Rodríguez de 何塞·加斯帕尔·罗德里格斯·德弗朗西亚 167, 205, 209, 244
- Francis I (France) 法兰西斯一世(法国): on Spanish America 关于西属美洲的看法 92
- Francisca 弗朗西斯卡 Josefa María 何塞法·玛丽亚 114
- Franciscans 方济各会修士 103, 105
- Frank, André Gunder 安德烈·冈德·弗朗克 93n
- Free blacks: in Cuba 自由黑人: 古巴的 233
- Freedmen 自由人: in Peru 秘鲁的 230; in Venezuela 委内瑞拉的 239

Freedom 解放: for Brazilian slaves 巴西奴隶的 133
Freedom of religion 宗教解放: in Argentina 在阿根廷的 208
Free trade 自由贸易: in Mexico 墨西哥的 170
Free trade decree (1778) 自由贸易法令 (1778) 138, 143
Free-trade policies 自由贸易政策 243
Free-trade zone factories 自由贸易区工厂: 参 Maquiladoras
“Free Womb” laws 《新生儿自由法》 220
French Revolution 法国大革命 136, 160
Frescoes: Mayan 壁画: 玛雅 21, 21 (illus.)
Freyre, Gilberto 弗雷雷·吉尔伯特 131
Friar-anthropologists 修士人种学家: Las Casas as 拉斯卡萨斯作为 58
Friars. 参 Clergy; Missionaries
Frontier 边境 105
FSLN. 参 Sandinista Front for National Liberation (FSLN) 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
FTAA. 参 Free Trade Area of the Americas (FTAA)
Fuel 燃料: for Cuban sugar mills 供古巴糖厂的 232
Fuero military 军队特权 146
Fueros (charters of liberties) 福埃罗(特权) 95; in Castile 卡斯蒂利亚的 39
Fugger 福格尔 German house of 德意志家族 47, 48
Fugitive slaves 逃奴: in Brazil 巴西的 133

G

Gachupines (tenderfoot) 加丘平 111, 151, 173
Galán, José Antonio 何塞·安东尼奥·加兰 157
Galicia 加利西亚: mines in 矿藏在 48
Galleons 大帆船 91
Gallo, Pedro León 佩德罗·莱昂·加略 215
Gálvez, José de 何塞·德加尔维斯 141, 146
Gálvez, Mariano 马里亚诺·加尔维斯 217
Gamboa, Francisco de 弗朗西斯科·德甘博亚 143
Gamio, Manuel 曼努埃尔·加米奥 182
Garibaldi, Giuseppe 朱塞佩·加里波第 222
Gasca, Pedro de la 佩德罗·德拉加斯卡 67, 73, 74
GATT. 参 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GATT) 关贸总协定
Gaucha 加乌乔人 128; in Argentina 在阿根廷的 206, 207, 211; Rosas and 罗萨斯与 206 (illus.), 207
Gender 性别: Inca and 印加人与 33. 另见 Women
Gender parallelism; of Inca 性别平行: 印加人的 33
Gender-related honor 性别相关的荣誉 118-119
General History of the Things of New Spain (de Sahagún) 《新西班牙史实录》(萨阿贡) 107
General strike 总罢工 220
“Generation of 1880”: in Argentina “1880年一代”: 在阿根廷的 252
Geography: of Colombia 地理: 哥伦比亚的 240
Germans 德国人: in Spain 在西班牙的 36, 47; in Chile 在智利的 215
Germany 德国: investment in Chile 对智利的投资 260; intervention in Venezuela by 对委内瑞拉的干预 269
Gibraltar: to England 直布罗陀: 至英国 135
Gibson, Charles 查尔斯·古本 112, 113, 150
Gil, Juan 胡安·希尔 60
Gil de Castro, José 何塞·希尔·德卡斯特罗 163 (illus.)
Girls: education of Aztec 在阿兹特克的教育 27. 另见 Women
Glaciation 冰期作用 8
Godfatherhood; in Brazil 教父制: 巴西的 133
Godoy, Manuel de 曼努埃尔·德戈多伊 161
Gods and goddesses 神和女神: fertility

- goddesses 生育女神 14; Aztec 阿兹特克的 15; Tlaloc (Aztec god) 特拉洛克 (阿兹特克神) 15; of Maya 玛雅的 19; of Inca 印加的 35
- Gold 黄金 83; Inca and 印加与 35; Portuguese African trade in 葡萄牙与非洲的黄金交易 52; in Peru 秘鲁的 67; Spanish search for 西班牙的寻金者 70; conquistadors and 征服者与 73; mining of 的开采 88 - 90; in Brazil 巴西的 126 - 127, 140; Central America as transoceanic transit route and 中美洲作为跨洋航运通道与 217 - 218
- Gold Coast; Portuguese slave trade and 黄金海岸; 葡萄牙奴隶贸易与 53
- Golden Age: of Spanish literature 黄金时代; 西班牙文学的 50 - 51
- Golgotas (urban artisans); in Colombia 城市内的工匠; 哥伦比亚的 241
- Gomes, Fernão 费尔南·戈麦斯 53
- Gomes, Raimundo 雷蒙多·戈麦斯 223
- Gomez, Juan Gualberto 胡安·瓜尔韦托·戈麦斯 234
- Gomez, Juan Vicente 胡安·比森特·戈麦斯 269
- Gomez Farías, Valentín 巴伦廷·戈麦斯·法里亚斯 199, 200
- Gongora, Luis de 路易斯·德贡戈拉 108
- Goths; in Spain 哥特人; 在西班牙 36
- Government 征服; rise of 的崛起 11; Aztec 阿兹特克的 28; of Inca 印加的 34; of Aragon 阿拉贡的 38 - 40; Spanish colonial 西班牙殖民地的 137; Bolívar on 玻利瓦尔在 165; San Martín and Bolívar on 圣马丁与玻利瓦尔在 167; centralized 中央集权的 196; of Central America 中美洲的 216 - 218. 另见 具体国家与领导人
- Governor 总督; in Brazil 巴西的 128
- Grace, W.R. W R 格雷斯 230
- Graham, Richard 理查德·格雷厄姆 185
- Granada, Spain 格拉纳达, 西班牙; Muslims in 穆斯林在 38; Spanish conquest of 西班牙征服格拉纳达 43, 46
- Gran Colombia 大哥伦比亚 166, 235 - 242; Peru and 秘鲁与 168; distances in 里的距离 235; Venezuela, Ecuador, and, 委内瑞拉、厄瓜多尔与 235; Colombia and 哥伦比亚与 239
- Grandeos 大贵族; in Spain 西班牙的 49
- "Grandeza Mexicana, La" ("The Grandeur of Mexico City") (Balbuena) "墨西哥城的辉煌"(巴尔武埃纳) 117
- Grantees 大贵族; in Hispaniola 伊斯帕尼奥拉岛的 77
- Great Britain 大不列颠 参 England (Britain)
- Great City of Tenochtitlán, The (Rivera) 《特诺奇蒂特兰大城》(里维拉) 3 (illus.)
- Greater Antilles 大安的列斯群岛 61
- Grijalva, Juan de 胡安·德格里哈尔瓦 62
- Griswold del Castillo, Richard 理查德·格里斯沃尔德·德尔卡斯蒂略 201
- "Growth without 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无发展的增长": 在拉丁美洲 140
- Guachibales (religious brotherhoods) 宗教兄弟会 266
- Guadalupe, ruling of 瓜达卢佩的统治 41
- Guadalupe Hidalgo, Treaty of (1848) 《瓜达卢佩-伊达尔戈》条约 200 - 201
- Guanajuato 瓜纳华托 88, 159, 171, 172
- Guanches people 古安切人 54
- Guano 鸟粪 29; from Chile 来自智利的 215; Peruvian export trade in 秘鲁的鸟粪出口贸易 229
- Guaraní people 瓜拉尼人 71; lifestyle of 的生活方式 80 - 81; missionaries and 传教士与 105
- Guararapes, battle of 瓜拉拉皮斯战役 126
- Guardacostas 海岸警卫队 137
- Guardia Nacional 国民卫队; in El Salvador 萨尔瓦多的 268
- Guardino, Peter 彼得·瓜迪诺 196
- Guatemala 危地马拉 13, 216 - 217; Teotihuacán and 特奥蒂瓦坎文明与 17; Maya civilization of 玛雅文明与 17 - 23; Spanish conquest of 西班牙对其的征服 65; in United Provinces of Central America 在中美洲联合省中 216 - 218; government in 的政府 217;

repartimiento system in 的摊派制度 245; labor in 的劳动力 266. 另见具体领导人

Guayaquil 瓜亚基尔 168

Guerrero, Vicente 比森特·格雷罗 175, 182-183, 199

Guevara, Andrés de 安德烈斯·德格瓦拉 148

Guiana 圭亚那: Aguirre and 阿古雷与 74

Guilds 行会: Spanish-controlled 西班牙控制下的 90, 91

Gulf of Guinea 几内亚湾: Portugal and 葡萄牙与 53

Guzmán, Antonio Leocadio 安东尼奥·莱奥卡迪奥·古斯曼 238

Guzmán, Fernando de 费尔南多·德古斯曼 74

Guzmán Blanco, Antonio 安东尼奥·古斯曼·布兰科 192, 245, 246, 268

Guzmán de Alfarache (Alemán) 《古斯曼·德阿尔法拉切》(阿莱曼) 50

H

Habeas corpus 人身保护状: in Guatemala 在危地马拉 217

Hacendados 地主 81; kurakas as 库拉卡作为 112; in Mexico 墨西哥的 204, 249; in Brazil 巴西的 228

Haciendas (estates) 阿西恩达(大庄园) 85-86, 181, 191, 193; decline of native population and 本地人口下降与 80; self-sufficient 自足的 89; colonial social life on 基于此的殖民地的社交生活 116-118; in Mexico 墨西哥的 139, 197; peasants on 的农民 176; dominance of 的主导地位 193-194; in Colombia 哥伦比亚的 240, 270; expansion of 的扩张 245-246

Haiti 海地 55; Toussaint L'Ouverture in 杜桑·卢维杜尔在 160; Bolívar in 玻利瓦尔在 165. 另见 Hispaniola

Haitian Revolution 海地革命 160

Halperin-Donghi, Tulio 图利奥·阿尔佩林-唐吉 190

Hammond, Norman 诺曼·哈蒙德 18

Handicrafts industry 工艺品行业 90

Hapsburgs 哈布斯堡王朝: in Spain 西班牙的 47-51, 95, 96; church under 管辖的教会 100

Al-Haquem II (Muslims) 哈基姆二世(穆斯林) 37

Hasinai people 哈西奈人 105

Hassan, Abdul 阿卜杜尔·哈桑 43

Hassaurek, Friedrich 弗里德里克·哈苏雷克 186

Havana: England and 哈瓦那: 英国与 146, 231

Havemeyer, Henry Q 亨利·Q 哈夫迈耶 235

Hawkins, John 约翰·霍金斯 92

Health: pre-Conquest 健康: 预征服 12. 另见 Medicine

Helg, Aline 艾林·赫尔格 235

Henequen; in Mexico 龙舌兰: 在墨西哥的 249, 250

Henige, David 戴维·赫尼格 12

Henry IV (Castile) 亨利四世(卡斯蒂利亚) 39, 40

Henry of Navarre 亨利(纳瓦拉的) 48

Henry ("the Navigator") 亨利(航海者) 52-53

Heretics; conversos as 异教徒: 改宗 106

Hermmandades (military associations) 埃尔曼达德斯(兄弟会, 军事组织): in Castile 卡斯蒂利亚的 39

Heskett, Robert 罗伯特·赫斯克特 113n

Hidalgo (noble) class 伊达尔哥(贵族)阶级 4; in Spain 西班牙的 49

Hidalgo (state): revolt in 伊达尔戈州的起义 204

Hidalgo y Costilla, Miguel 米格尔·伊达尔戈-卡斯蒂利亚 147, 150, 172-173, 172 (illus.), 173, 196

Hidalguía 贵族身份 110

Hierarchical social structure 等级制社会结构 196

Hierarchy 等级制: of social organization 社会结构 9, 10; of Aztec courts 阿兹特克的法庭 27. 另见 Class; Social stratification; Status; 具体人群

Hieroglyphic writing 象形文字符号: Olmec 奥尔梅克的 14; Zapotec 萨波特

- 克人的 15; of Maya 玛雅人的 19, 20
- Highlands 高地: agriculture in 的农业 8, 9
- Hinojosa, Antonio de 安东尼奥·德伊诺萨 113n
- Hispania 西班牙: origins of term Spain and 西班牙一词的语源 36
- Hispaniola 伊斯帕尼奥拉岛: chiefdoms in 的西邦 10; native population of 的本地人口 11; population before Conquest 征服前的人口 11-12; Columbus at 在此的哥伦布 55-56; as Española 被称为 Española 55; Spanish colonization of 西班牙在此的殖民 77; sugar in 的糖 87
- History of Ancient Mexico* (Clavigero) 《墨西哥古代史》(克拉维赫罗) 148, 149
- History of Chile* (Molina) 《智利史》(莫利纳) 149
- History of the Indians of New Spain* (Motolinia) 《新西班牙的印第安人史》(莫托利尼亚) 107
- Holland; Venezuela and 荷兰: 委内瑞拉与 269
- Holloway, Thomas 托马斯·霍洛韦 75n
- Holy Roman Emperor; Charles V as 神圣罗马皇帝: 查尔斯五世作为 47-48
- Home rule 自治: in Mexico 墨西哥的 170
- Honduras 洪都拉斯: Maya in 的玛雅人 17; Spanish conquest of 西班牙对其的征服 65; in United Provinces of Central America 在中美洲联合省的 216-218; Carrera in 卡雷拉在 217; government in 的征服 217
- Honor; sexual 荣誉: 性的 118-119
- Horses 马 87, 88
- House of Trade 贸易署 91
- Housing 居住: of Maya 玛雅的 18; Aztec 阿兹特克的 26; of Inca peasants 印加农民的 34
- Houston, Sam 山姆·休斯敦 200
- Huacas (local objects and places): of Inca 瓦卡斯(当地的物体和地方): 印加的 35
- Huari Empire 瓦里帝国 30
- Huascar (Inca) 瓦斯卡(印加) 31, 67
- Huayna Capac (Inca) 瓦伊纳·卡帕克(印加) 66
- Huemac (Toltec) 休马克(托尔特克国王) 22
- Huitzilopochtli (god) 威奇洛波奇特利(神) 23, 24
- Humanists; in Spain 人文主义者: 西班牙的 43
- Human sacrifice 人祭 24n; Maya 玛雅 18, 20; Toltec influence and 托尔特克人的影响与 18; Aztec 阿兹特克的 20, 24, 24n; Inca 印加 35
- Humboldt, Alexander von 亚历山大·冯·洪堡 139, 141-142, 148, 151, 159
- Hunter/gatherers 猎人、采集者: in Ancient America 在古代美洲的 7-8
- Hurtado, Andrés 安德烈斯·乌尔塔多 74
- I
- Iberians 伊比利亚半岛: conquests by 征服的地域 36
- Ice Age 冰河时代: colonization in 的移民活动 8
- Illegitimacy 非婚生 119
- Illiteracy 文盲. 参 Literacy
- IMP. 参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 Immigrants and immigration 移民与移民活动: creole resentment of 克里奥尔人对其的怨恨 151; European (post 1880) 欧洲的(1880后) 187; in Argentina 在阿根廷的 208, 211, 253; in Brazil 在巴西的 229; in Guatemala 在危地马拉 266; in Venezuela 在委内瑞拉 269
- Imperialism 帝国主义: in postclassic period 在后古典时期 14; of Aztecs 阿兹特克人的 23-26; of Inca 印加人的 31; by United States 美国的 246
- Imports 进口: Aztec 阿兹特克的 27; into Argentina 进入阿根廷的 253
- Inca civilization 印加文明 9, 10, 11, 68-69; Aztecs and 阿兹特克人与 25; origins of 起源 29-30; economy and society of 经济与社会 30-34; growth of empire 帝国的成长 31; resettlement 定居 31; masculinity and 男性与 33; soldiers 士兵 33; human sacrifice by 人

祭 35; learning in 教育 35; oral literature of 口头文学 35; religion of 宗教 35; remnants of 遗迹 35; Pizarro and 皮萨罗与 66-67; warfare in 战争 69; *Natural and Moral History of the Indies* (Acosta) 《西印度的自然和道德史》(阿科斯塔) 107; José Gabriel Condorcanqui (Tupac Amaru II) and 何塞·加夫列尔·孔多坎奎(图帕克·阿马鲁二世)与 153, 155 (illus.); revolt 起义 153-156; idealization of 理想化的 154

Income 收入: from tribute 从进贡得到的 79-80

Independence 独立: struggles for 争取 152-153; revolt in Peru for 秘鲁的为争取独立的起义 154; of Haiti 海地的 160; of Chile 智利的 167; declared in Argentina 阿根廷宣布 167; of Peru 秘鲁的 168, 228; of Brazil 巴西的 169-170, 220-221; in Mexico 墨西哥的 170-176, 196-205; wars for 为此的战争 182; dictators and revolutions after 此后的独裁者与革命 193-218; economic stagnation after 此后的经济停滞 194-195; of Paraguay 巴拉圭的 209; of Central America 中美洲的 216-218; of Cuba 古巴的 231-234; of Venezuela 委内瑞拉的 237

Independence Day; in Brazil 独立日: 巴西的 170

India: Portugal and 印第安人: 葡萄牙与 53

Indian Ocean 印度洋: Portuguese trade in 葡萄牙贸易 54; Columbus and 哥伦布与 56

"Indian" policy; of Spain "印第安"政策: 西班牙的 5

Indians 印第安人: Columbus' naming of 哥伦布对其的命名 60. 另见 Indigenous peoples

Indies 西印度: Columbus and 哥伦布与 55; legality of Spain's claim to 西班牙占领其的合法性 77; Inquisition in 宗教裁判所 106; class and caste in 阶级和种姓制度 110-121. 另见 Portuguese

America; Spanish America

Indígenas 土著 180

Indigenous peoples 土著居民 150; Jackson, Andrew, and 安德鲁·杰克逊与 5; agriculture of 农业 8; hunting/gathering by 打猎与采集业 8; European perspective on 欧洲人对其的观点 56-60; Conquest as end of civilizations of 征服作为其文明的终结 57; in Chile 智利的 68; in Mexico 墨西哥的 68; nature of 的自然环境 76; encomienda and 委托监护地与 77; Requerimiento and 《要求书》与 77; prohibition against enslavement of 对奴役土著的禁令 79; decline of population of 人口的下降 80; treated as serfs 被当做农奴 81; abolition of enslavement of 废除对其的奴役 83; black slavery as replacement for 黑奴成为其替代 83; handicrafts of 的手工业制品 89-90; provincial administration of 省级行政 98-99; regulating labor of 劳动管制 100; cities for 城市 101; Spanish ruling domination of 西班牙对其的统治 102; Inquisition and 宗教裁判所与 106; social order, in colonial era 殖民时代的社会秩序 112-115; status of 的地位 112-115; as commoners 作为平民 114; on haciendas 大庄园的 118; women of 妇女 121; Portuguese policy toward 葡萄牙对其的政策 124-126; extermination of 灭绝 125; acculturation of 同化 152, 182; opposition to mita by 对米塔制的反对 152; protests by 的示威游行, 152-153; repartimiento de mercancías and 商品摊派制 152-153; revolt in Peru by 在秘鲁发动的起义 153-156; New Granada insurrection and 新格拉纳达暴乱与 156-157; interest in 对其的兴趣 196; rights of 权利 196; in California 加利福尼亚的 201; land uses by 土地使用 201-203; in Argentina 阿根廷的 206; in Peru 秘鲁的 228; community lands of 的公共土地 245; draft labor for 对其的劳役摊派制度 245; village

- lands of 村庄土地 249; Conquest of the Desert (Argentina) and 对沙漠的征服 (阿根廷) 与 253; in Guatemala 危地马拉的 266; War of the Comuneros (Nicaragua) and 公社社员战争(尼加拉瓜) 与 267. 另见 Indigenismo; Menchú, Rigoberta
- Indigo 靛青 217, 267; in Guatemala 危地马拉的 266
- Industrialization 工业化; in Argentina 阿根廷的 206; in Brazil 巴西的 263
- Industrial Revolution 工业革命 191 - 192, 243
- Industry 工业; Spanish 西班牙的 42, 45; colonial 殖民地的 89 - 90; mercantilist trade and 重商主义贸易与 91; Portuguese 葡萄牙的 126 - 128; in Spanish America 在西属美洲 142 - 143; modernization in Mexico 墨西哥工业的现代化 197; in Paraguay 巴拉圭的 209; in Chile 智利的 215; Grace, W. R., in Peru, and 格雷斯在秘鲁与 230; in Colombia 哥伦比亚的 240, 270; in Mexico 墨西哥的 250; foreign management in Argentina and 外国控制阿根廷与 253; in Brazil 巴西的 265
- Inflation 通货膨胀; in Mexico 墨西哥的 250; in Argentina 阿根廷的 253 - 254; in Colombia 哥伦比亚的 271
- Informal economic sector 非正式经济部门. 参 Service (informal) sector
- "Infrapolitics" 底层政治 510
- Infrastructure 基础设施; in Argentina 阿根廷的 212, 253; in Peru 秘鲁的 229; in Nicaragua 尼加拉瓜的 267; in Venezuela 委内瑞拉的 268 - 269
- Inheritance 继承权; by heir of encomendero 委托监护主的继承人的 79; Spanish laws of 西班牙关于此的法律 86
- Inquisition 宗教裁判所 189; in Spain 西班牙的 46; in New World 新世界的 106; restrictions on 对其的限制 136; Mutis and 穆提斯与 147; radical ideas and 激进的想法与 148; independence and 独立与 176
- Intellectual thought 学术思想 13; of Maya 玛雅的 19 - 21; of Ferdinand and Isabella 费迪南德和伊莎贝拉 41 - 43; Inquisition in Spain and 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与 46; about Discovery 关于“发现”的 56 - 60; in Spanish colonies 西班牙殖民地的 147 - 148; of Jesuits 耶稣会的 148; Creole 克里奥尔人的 148 - 150. 另见 Literature; Positivism
- Intendant system 监政官体系; in colonies 殖民地的 145
- Intermarriage 通婚 118 - 119
- Interracial unions 跨种族结合; in Brazil 巴西的 131
- Intervention by United States 美国的干预. 参具体国家词条
- Invasions 入侵; of Mesoamerica (A. D. 800) 中美洲的 23; of Spain 西班牙的 36
- Investment 投资; in Argentina 在阿根廷的 206, 253; U. S. investment in Cuba 美国在古巴的 234; in Latin America 在拉美的 244. 另见 Foreign investment
- Irrigation 灌溉 9, 10; by Aztecs 阿兹特克人的 27; by Incas 印加人的 31 - 32
- Isabella of Castile 卡斯蒂利亚的伊莎贝拉 40, 40 (illus.); Columbus and 哥伦布与 55. 另见 Ferdinand and Isabella (Spain)
- Isolation 孤立隔绝的状态; pre-Conquest 征服前的 12
- Isthmus of Panama 巴拿马地峡 96; trade in 贸易 91, 92. 另见 Panama
- Italian possessions; Spanish 意大利属地; 西班牙的 135
- Iturbide, Agustín de 奥古斯丁·德伊图尔维德 175, 196, 199, 216
- Iturrigaray, José de 何塞·德伊图里加拉伊 170
- Itzam Na (Maya god) 伊扎姆纳(玛雅神) 19
- Itzcoatl (Aztec) 伊兹科亚特尔(阿兹特克) 23, 24; water system under 建设的供水系统 27
- Ixtlilxochitl, Fernando de Alva 费尔南多·德阿尔瓦·伊斯特里尔霍齐特尔 107

J

Jackson, Andrew 安德鲁·杰克逊 5
 Jacobsen, Nils 尼尔斯·雅各布森 156
 Jamaica 牙买加 61; chiefdoms in 酋邦 10;
 Columbus in 哥伦布在 56; English in
 此地的英国人 93; Bolívar in 玻利瓦尔
 在 165
 Japan 日本 55
 Jefe político (Guatemala) 政治首领(危地
 马拉) 217
 Jesuits 耶稣会 105, 189; wealth of 财富
 104; expulsion from colonies 被从殖民
 地驱逐 105-106; missions of 传教团
 105-106; as state within a state 作为国
 中之国 106; expelled from Brazil 被从
 巴西驱逐 125; protests against
 mistreatment of natives 因本地人受虐而
 举办的游行 125; in Brazil 巴西的
 130-131; expulsion from Spain 被从西
 班牙驱逐 136; debt peonage and 债务
 劳役偿还制度与 142
 Jews 犹太人: in Spain 西班牙的 37, 37
 (illus.), 45-46; as conversos 作为皈依
 者 41, 45-46, 46 (illus.); expulsion
 from Portugal 被从葡萄牙驱逐 54;
 prohibited from going to Indies 被禁止
 进入西印度 106, 另见 Judaism
 Jiménez de Cisneros, Francisco 弗朗西斯科·
 希梅内斯·德西斯内罗斯 42, 43
 Jiménez de Quesada, Gonzalo 贡萨洛·希
 门尼斯·德克萨达 71
 João III (Portugal) 若昂三世(葡萄牙) 122
 João IV (Portugal) 若昂四世(葡萄牙) 221
 João VI (Portugal) 若昂六世(葡萄牙) 169,
 170
 John II (Aragon) 约翰二世(阿拉贡) 40
 John II (Portugal) 约翰二世(阿拉贡) 53
 Johnson, Julie Greer 朱莉·格里尔·约翰
 森 109
 José I (Portugal) 何塞一世(葡萄牙) 128
 Juana (Castile) 胡安娜(卡斯蒂利亚) 40
 Juana (daughter of Ferdinand and Isabella)
 胡安娜(费迪南德与伊莎贝拉的女
 儿) 471
 Juárez, Benito 贝尼托·华雷斯 195, 201,

202 (illus.); Ley Juárez (Juárez Law)
 and 华雷斯法案与 200, 201, 202;
 clergy and 神职人员与 203; as president
 作为总统 204; anticlerical decrees of 反
 教权的法令 245

Juárez Law 华雷斯法案 参 Ley Juárez
 (Juárez Law)

Judaism, converso return to 重新皈依犹太
 教 106

Judicial review 司法审查 98-99

Judicial system 司法系统, 参具体国家词条

Julius II (Pope) 尤里乌斯二世(教皇) 101

July Revolution (1830, France) 七月革命
 (法国, 1830) 221

Júnior, Caio Prado 卡伊奥·普拉多·胡尼
 奥 130, 134

Juntas de manumission 解放奴隶委员
 会 237

K

Kamen, Henry 亨利·卡曼 94

Karttunen, Frances 弗朗西斯·卡尔特
 宁 63n

Kingdom of Mosquitia 莫斯基托王国 267

Kings 国王: priest-kings 祭司-国王 10,
 13; of Castile 卡斯蒂利亚的 39

Kinship 亲属: in tribes 部落里的 10;
 groups in Formative period 形成时期的
 聚落 13; Aztec 阿兹特克的 24; of Inca
 印加的 32

Korner, Emil 埃米尔·柯纳 260

Koster, Henry 科斯特·亨利 131

Kroeber, A. L. 克罗伯·A.L. 11, 12

Kropotkin, Peter 彼得·克鲁泡特金 190

Kurakas (headmen) 库拉卡(头人) 112; in
 Peru 秘鲁的 112; Hispanicized 西班牙
 化的 113

L

Labor 劳动力: tribute 纳贡 4; Aztec 阿兹
 特克的 27; of Incas 印加的 33; slave
 奴隶 54; shortage of 短缺 61;
 indigenous 土著的 76, 100;
 encomienda and 委托监护地与 77-79;
 enslaved Mayan 被奴役的玛雅人 78
 (illus.); concubines and 情妇与 80;

- repartimiento system of 摊派制度 81;
debt servitude and 债务奴役与 82-83;
for silver mining 银矿开采的 88, 140;
enslaved in Potosí 波托西的奴隶 90
(illus.); slave trade and 奴隶贸易与
126; of Brazilian slaves 巴西奴隶的
131-132;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农业生产与 139; on haciendas 大庄园
的 139; debt for holding 控制劳动力的
债务 142; struggles in colonial Spanish
America 在西属美洲殖民地的斗争
142-143; in Potosí silver mines 波托西
银矿的 154; in Central America 中美洲
的 217; agricultural 农业的 245-246;
conditions of 生活状况 245-246. 另见
Slavery, Indentured servants, Yanaconas
(permanent servants) 及具体国家词条
- Labor movement: in Argentina 劳工运动:
阿根廷的 255
- Labor strikes 罢工. 参 Strikes
- Labor systems 劳动力系统: in 18th century
18 世纪的 142-143
- Labor unrest 劳工动乱 251
- Ladd, Doris 多里斯·拉德 143
- Ladino (mestizo) farmers 拉迪诺(梅斯蒂索)
农民: in El Salvador 萨尔瓦多的
268
- La Escalera Conspiracy “梯子”阴谋 232
- Lafaye, Jacques 雅克·拉法耶 149
- Lakes, as Aztec water supply 湖泊, 作为阿
兹特克的水源 27
- Lake Texcoco 特斯科科湖 23
- Lake Titicaca 的的喀喀湖 30
- Land 土地: Aztec 阿兹特克的 28; in
Spain 西班牙的 44-45; concentration
of 集中 85-86; Spanish settlements and
西班牙定居点与 105;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农业生产与 139;
church-owned (Mexico) 教会所有的(墨
西哥) 202; in Mexico 墨西哥的 202-
203; in Argentina 阿根廷的 205-206,
211; in Brazil 巴西的 221; in
Venezuela 委内瑞拉的 237-238;
hacienda system and 大庄园系统与
245-246; in El Salvador 萨尔瓦多的,
267-268; in Colombia 哥伦比亚的
270-271. 另见 Communal landholding
system; Haciendas (estates)
- Landa, Diego de 迭戈·德·兰达 19, 21
- Landed aristocracy 地主贵族 194, 230. 另
见 Aristocracy; Haciendas (estates);
Landowners; Latifundio (great estate)
- Landholding 土地所有权 181
- Landowners 地主: Aztec 阿兹特克的 24;
supreme power of 至高无上的权利 95;
in Andes 安第斯地区的 139; in Mexico
墨西哥的 139, 249-250; revolutions
and 革命与 176; in Chile 智利的 213-
214; in Guatemala 危地马拉的 217,
266; in Brazil 巴西的 224; in Cuba 古
巴的 234; in El Salvador 萨尔瓦多的
268
- Land tenure 土地使用权: in Mexico 墨西
哥的 139; in Brazil 巴西的 262; in
Guatemala 危地马拉的 266
- “Land to the Tiller” “耕者有其田” 462
- Languages 语言: evidence of ancient
settlement and 古代定居点与语言的线
索 8; Quechua 克丘亚的 31, 35;
Castilian 卡斯蒂利亚的 43
- La Plata (capital of Brazil) 拉普拉塔(巴西
首都) 252
- La Plata river system 拉普拉塔水系 208
- Las Casas, Bartolomé de 巴托洛梅·德拉斯
卡萨斯 4, 12, 58, 73, 74, 101, 102
(illus.); population of Hispaniola and
伊斯帕尼奥拉岛的人口与 11-12;
struggle against indigenous slavery and
反对土著奴隶的斗争与 78; on
indigenous welfare 关于土著人福
利 102
- Lascasian wing, of clergy 拉斯卡萨斯派传
教士 102
- Lastarria, José Victorino 何塞·维克多利
诺·拉斯塔里亚 214
- Latifundio (great estate) 拉蒂芬丁(大庄
园);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农业生
产与 139; in Chile 智利的 214; in
Cuba 古巴的 231; in Colombia 哥伦比
亚的 237, 270
- Latin America 拉丁美洲: colonial
conquest, trade, and enslavement 殖民

- 地征服、贸易、奴役与 84; viceroalties in 总督辖区 144 (illus.); independence of 独立 158 - 176; liberation of South America and 南美的解放与 162 - 163; in 1830 1830 年的 198 (illus.); U. S. challenges to Britain in 美国在此向英国的挑战 246
- Latin language 拉丁语, and Spanish language 与西班牙语 36
- Lavradio, marquis de 拉夫拉迪奥侯爵 130
- Lavrín, Asunción 业松森·拉夫林 119
- Law 法律: Roman 罗马的 36; Spanish colonial 西班牙殖民地的 100; land owners protected by 保护的土所有者 114; indigenous peoples and 土著与 195; in Guatemala 危地马拉的 217
- Laws of Burgos 《布尔戈斯法》 77
- Laws of the Indies (1681) 《西印度法》 96, 110
- Lazarillo de Tormes (novel) 《托马斯河畔的小孩子》(小说) 50
- Learning 教育: of Maya 玛雅的 19 - 21; of Inca 印加的 35; in Spain 西班牙的 42 - 43. 另见 Education; Intellectual thought
- Le de Terrenos Baldíos (vacant public lands) 空置的公共用地 249
- Legend, of Spanish cruelty 有关西班牙人残酷的传说 5
- León and Castile 莱昂与卡斯蒂利亚 38
- León y Gama, Antonio de, 安东尼·德莱昂-伽马 148
- Lepanto, battle at 勒班陀之战, 48
- Lerdo de Tejada, Miguel 米格尔·莱尔多·德特哈达 201, 203
- Lerdo de Tejada, Sebastian 塞巴斯蒂安·莱尔多·德特哈达 204
- Lerdo Law 《莱尔多法》. 参 Ley Lerdo (Lerdo Law)
- Lesser Antilles 小安的列斯群岛 93
- Letrados 律法官 41
- Ley de Deslindes (1883) 《划界法》 249
- Ley de Terrenos (1894) 《未开垦土地法》 249
- Ley Juárez (Juárez Law) 《华雷斯法》 202, 203
- Ley Lerdo 《莱尔多法》(Lerdo Law) 200, 202, 203, 245
- Liberalism 自由主义 195 - 196; in new states 在新的城邦 191; in Mexico 墨西哥的 195 - 196, 199 - 201; in Chile 智利的 212, 215 - 216; in Central America 中美洲的 216. 另见 Neoliberalism
- Liberal Party 自由党: in Mexico 墨西哥的 199; in Colombia 哥伦比亚的 241
- Liberals 自由派; in Nicaragua 尼加拉瓜的 218; in Venezuela 委内瑞拉的 238; land seizure by 征用土地 245; in Argentina 阿根廷的 252; Guatemalan reforms 危地马拉的改革 265; in Nicaragua 尼加拉瓜的 267
- Liberation 解放: of South America 南美的 162 - 170; southern liberation movement and 南方解放运动与 166 - 169; of Río de la Plata region 拉普拉塔地区的 205 - 206. 另见 Independence
- Liberator 解放者. 参 Bolívar, Simón
- Libertadora, La 女解放者 175
- Libertos 自由人 240
- Lifestyle 生活方式: of Chibcha and Muisca chiefdoms 奇布查与穆斯卡西邦的 10; of Maya 玛雅的 18 - 19; Aztec 阿兹特克的 26 - 29; of Guaraní people 瓜拉尼人的 80 - 81; in cities 城市的 116 - 118; on haciendas 大庄园的 139 另见 Standard of living
- Lima 利马 116, 117; Spanish in 在此的西班牙人 67; university in 大学 106; independence and 独立与 169
- Lima Inquisition 利马的宗教裁判所 106
- Limantour, José Yves 何塞·伊夫·利玛案 249
- Limpieza de sangre (purity of blood) 血统纯正性 110
- Liniers, Santiago 圣地亚哥·利涅尔斯 166
- Literacy 识字能力: as voting requirement 作为投票的要求 195, 213, 220, 258; in Paraguay 巴拉圭 209; in Guatemala 危地马拉的 266
- Literature 文学: Spanish writers of Latin Literature 西班牙的拉丁文作家 36; in

- Spain 西班牙的 50-51; of colonial era 殖民时期的 108-110; in 16th century colonies 16 世纪殖民地的 147-148; Jesuit 耶稣会的 148; 1820-1900 1820-1900 年的 190
- Littoral provinces; in Argentina 沿岸各省 208
- Livestock 畜牧业; in Argentina 在阿根廷 211; in Cuba 古巴的 231. 另见 Cattle industry
- Llaneros 亚内罗斯(草原居民) 164, 165
- Loans 贷款. 参 Foreign loans
- Local government 当地政府; in New Spain and Peru 在新西班牙与秘鲁 114, 115; in Brazil 巴西的 129-130
- Lopez, Carlos Antonio 卡洛斯·安东尼奥·洛佩斯 209-211, 244
- Lopez, Francisco Solano 弗朗西斯科·索拉诺·洛佩斯 209, 244
- Lopez, Pero 佩罗·洛佩斯 74
- Lopez de G6mara, Francisco 弗朗西斯科·洛佩斯·德葛梅拉 4, 56-57
- Lopez de Palacios Rubios, Juan 胡安·洛佩斯·德巴拉斯奥斯·卢比奥斯 77
- L'Ouverture, Toussaint 图森·卢韦杜尔 184
- Lucan (poet) 卢坎(诗人) 36
- Lula. 参 Silva, Lu6s Inacio da (Lula)
- Luque, Hernando de 赫尔南多·德卢克 66
- Lynch, John 约翰·林奇 94, 186, 207

M

- Machualtin (commoners) 马塞瓦尔丁(平民) 24
- Maceo, Antonio 安东尼奥·马塞奥 233, 234
- Machu Picchu 马丘比丘 35
- Madeira Islands 马德拉群岛 53, 54, 123
- Madero, Francisco 弗朗西斯科·马德罗 252
- Madrid, Treaty of 《马德里条约》93
- Magellan, Ferdinand 费迪南德·麦哲伦 61
- Maize 玉米 8, 13, 18, 29, 30, 118; in Peru 秘鲁的 20
- Making of Bourgeois Europe, The* (Moore)
- 《欧洲中产阶级的形成》(穆尔斯) 93n
- Malacca 马六甲 54
- Malay Península 马来半岛; Portugal and 葡萄牙与 54
- Malinche 马琳切 63, 63n
- Mahinda, Kenya 肯尼亚·马林达 53
- Mallan, Florencia 佛罗伦西亚·马龙 196, 244
- Malnutrition 营养不良 501. 另见 Food
- Malvinas 马尔维纳斯群岛 143
- Mamacuna (holy women); of Inca 玛玛库纳(圣女); 印加的 35
- Management 管理; foreign, in Argentina 外国势力在阿根廷的 253
- Manco (Inca) 曼科(印加) 67
- Manco II (Inca); revolt by 曼科二世(印加); 暴动 153
- Manifesto to the Citizens of New Granada 新格拉纳达公民宣言 164
- Manila 马尼拉; Acapulco trade with 阿卡普尔科与其的贸易 91; loss to England 英国占领 146
- Manioc 木薯 8
- Mann, Horace 贺拉斯·曼 211
- Manuel de C6spedes, Carlos 卡洛斯·曼努埃尔·德·塞斯佩德斯 233
- Manuel I (Portugal) 曼纽尔一世(葡萄牙) 53, 54
- Manufactured goods 工业产品 194
- Manufacturing 制造业; Aztec 阿兹特克的 28; Spanish colonial 西班牙殖民地的 140-141; in Brazil 巴西的 265
- Manumission 奴隶解放 184, 229; in Brazil 巴西的 133; in Paraguay 巴拉圭的 209; in Venezuela 委内瑞拉的 238, 另见 Slaves and slavery
- Maps 地图 53
- Marcos (Fray) 马科斯(弗雷) 70
- "Marginal elites" "边缘精英" 171
- Marinha e Ultramar 海外委员会 129
- Markets 市场; Portuguese 葡萄牙的 128; Chilean products 智利产品的 212; internal 内部的 244
- Maroon communities 马隆人(逃亡黑奴)团体 220
- Marquez, Pedro Jos6 佩德罗·何塞·马尔

- 克斯 148
- Marriage 婚姻: Aztec 阿兹特克的 27; with indigenous women 与土著妇女的 73; for land consolidation 土地的固定 86; in colonial era 殖民时代的 118; sexuality, women, and 性行为、妇女与 118-121; civil, in Venezuela 委内瑞拉的平民的 269
- Martí, José 何塞·马蒂 184, 234
- Martí (Bishop, Venezuela) 马蒂(主教, 委内瑞拉) 119
- Martín, Luis 路易斯·马丁 121
- Martínez, Hildeberto 伊德贝尔托·马丁内斯 152
- Marx, Karl 卡尔·马克思 5, 57, 188
- Marxism 马克思主义: of Argentina's Socialist Party 阿根廷社会党的 255; in Chile 260
- Mascates, War of the (Brazil) 商贩之战(巴西) 134
- "Mask of Ferdinand" "费迪南德的名义" 170, 172
- Masses 群众: revolt of 起义 152-157; in Argentina 阿根廷的 207
- Mass human sacrifice 大量的人祭 24, 24n
- Material culture 物质文化 13
- Material wealth 物质财富, and missionaries 与传教士团 104
- Mathematics 数学: in Classic period 古典时期的 13; of Maya 玛雅的 20
- Matto Grosso, Brazil 马托格罗索, 巴西 127
- Mauá, Viscount 马乌阿子爵 185
- Maurice of Nassau 拿骚的莫里斯 126
- Mawe, John 马威·约翰 127
- Maximilian (Mexico) 马克西米连(墨西哥) 204
- Maya civilization 玛雅文明 14, 17-23; agriculture of 农业 9, 10; collapse of 崩溃 12; in Classic period 在古典时期 13; lowland culture of 低地文明 17; age of 时代 17-18; economy and society of 经济与社会 18-19; urban areas 城市地区 19; writing of 书写 19, 20-21; theology and 神学与 19-20; intellectual life of 精神生活 19-21; religion of 宗教 19-21; human sacrifice by 人祭 20; arts of 艺术 21, 21 (illus.); decline of 衰落 22-23; Spanish and 西班牙人与 62, 65; codex of 法典 78 (illus.); uprising by 起义 152-153 另见 Maya Classic civilization
- Maya Classic civilization 玛雅的古典文明 17-23; collapse of 崩溃 17-18; dates of 分期 17n; settlements of 定居点 18-19; disintegration of 解体 22-23
- Mayapan 玛雅潘城 18, 19
- Maveque (serflike peasants) 马耶克(类似农奴的农民) 24
- Mavorazgo (entailed estate) 长子继承制 86
- Mazombos 马松博人 170
- Mazorca terrorist organization (Argentina) "玉米棒子队"恐怖组织(阿根廷) 207
- McFarlane, Anthony 安东尼·麦克法兰 153
- McKinley Tariff Act of 1890 1890年的麦金利关税法 235
- Measles 麻疹 12
- Meat 肉类 87. 另见 Cattle industry
- Medici family 梅第奇家族 61
- Meiggs, Henry 亨利·梅格 230
- Mejía, Tomás 托马斯·梅希亚 204
- Melchor de Talamantes (Frav) 梅尔乔尔·德塔拉曼特斯(弗雷) 170
- Melo, José María 何塞·玛丽亚·梅洛 270
- MEMCH. 参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 (MEMCH. Chik)
- Men; clothing of Aztec 男人: 阿兹特克男人的服装 26; Inca 印加男人 33
- Mendoza, Antonio de 安东尼·德门多萨 70, 96
- Mendoza, Pedro de 佩德罗·德门多萨 71
- Meninas, Las (Velazquez) 《少女的荣耀》(委拉斯开兹) 50, 50 (illus.)
- Mercado, Ramón 拉蒙·默卡多 179
- Mercantilism 重商主义: Spanish-colonial trade and 西班牙殖民地贸易与 92; Spanish 西班牙的 142
- Merchant class 商人阶级 194
- Merchant guilds 商业行会 91
- Merchants: Aztec 阿兹特克的 24, 28; in

- Brazil 巴西的 122, 134; Portuguese 葡萄牙的 128; English 英国的 137 - 138; domination of trade by 对贸易的统治 194; in Argentina 阿根廷的 208; in Chile 智利 212; in Central America 中美洲的 216; Colombian Golgotas and 哥伦比亚的城市工匠与 241
- Mercury 水银; for silver processing 白银提炼用 88
- Merino sheep 美利奴羊 39
- Mesa da Consciência 道德委员会 125
- Mesoamerica 中美洲: in Classic period 在古典时期的 13, 14; sites of pre-Conquest culture in 征服前的文化遗址 16 (illus.); Time of Troubles in 战乱时期 22. 另见各个具体地区词条
- Messianic movements 救世运动 262
- Mesta (stockbreeders' association) 梅斯塔(牧羊者的组织) 39, 45, 136
- Mestizos (mixed race people) 梅斯蒂索人(混血人种); Guaraní and 瓜拉尼人与 81; as farmers 作为农民 86; status of 地位 110 - 112; equality of 平等 119; Virgin of Guadalupe and 瓜达卢佩圣母与 149 (illus.), 150; social movement by 社会运动 151; as tributary category 作为纳贡阶级 154; revolt of 1780 - 1781 and 1780 - 1781 年暴动与 156; New Granada insurrection and 新格拉纳达暴动与 157; tribute from (Peru) 来自秘鲁的纳贡 228
- Metallurgy 冶金, 35
- Metate; Aztec 三条腿的磨石, 阿兹特克的 26; maize as 118
- Methuen treaty (1703) 《梅休因条约》(1703) 128
- Mexican-Americans 墨西哥裔美国人, and Treaty of Guadalupe Hidalgo 《瓜达卢佩·伊达尔戈条约》与 201
- Mexicans, treatment of, in U. S. 墨西哥人在美国的待遇 200 - 201
- Mexican War 墨美战争 200
- Mexico 墨西哥; domesticated plants in 本土作物 8; Aztecs of 的阿兹特克人 10, 23 - 29; demographic history of 人口史 11 - 12; after Conquest 征服后的 12; civilization of 文明 12; pre-Conquest population of 征服前的人口 12; early civilizations of 早期文明 14 - 17; Mayan 玛雅人 17; Toltecs and 托尔特克人与 22; Spanish conquest of 西班牙对其的征服 61 - 66; expansion of Spanish conquest beyond 西班牙在墨西哥之外的征服 65 - 66; Spanish right to control 西班牙控制其的权利 78 - 79; decline of native population in 本土人口的下降 80; agricultural repartimiento abolished in 农业摊派制度的废除 81 - 82; cattle and sheep imported into 牛羊进口至 87; silver in 银矿 88 - 90; Acapulco Manila trade and 马尼拉-阿卡普尔科的贸易与 91; status in 社会地位 113; haciendas in 大庄园 139; land and 土地与 139, 245, 249; report on economy 经济报告 140; Mixton war in 米斯顿战争 152 - 153; liberation movement and 解放运动与 163; labor in 劳动力 171, 250 - 252; politics in 政治 195 - 196, 199 - 201; independence and 独立与, 196 - 205; industrial modernization in 工业现代化 197; trade deficit in 贸易逆差 197; economy in 经济 197 - 199, 204, 250; first president of 第一任总统 199; government of 政府 199, 203, 247 - 248; liberals vs. conservatives in 自由派与保守派的对阵 199 - 201; cession of lands to U. S. 割让给美国土地 200; La Reforma in 改革 201 - 204; legislature 立法机关 203; socially conscious artists in 有社会意识的艺术家 248 (illus.); real estate in 地产 249; alcoholism in 酗酒事件 250; foreign control of economic sectors in 外国势力对经济的控制 250; strike in 罢工 251 (illus.). 另见 Aztecs; Constitutions; Mexican Revolution; Silver mining; Valley of Mexico 及各位领导人的词条
- Mexico City 墨西哥城 116; Teotihuacán and 特奥蒂瓦坎文明与 14; university in 大学 106; science in 科学 147 - 148; riots in 骚乱 152 - 153; cabildo

(creole stronghold) 克里奥尔人据点 170

Michoacán 米却肯地区 173, 201

Middle Ages, in Spain 中世纪: 西班牙的 37-41

Middle class 中产阶级: in Spain 西班牙的 136; in Spanish America 西属美洲的 151; in Mexico 202; in Central America 中美洲的 216; dissatisfaction by 不满情绪 246; unrest in Mexico by 导致的墨西哥社会不安 250-252; in Brazil 巴西的 263; in Colombia 哥伦比亚的 271. 另见 Class

Middle Passage 中间通道 115

Mier, Servando Teresa de 塞尔万多·特山萨·德米尔 150

Migrant labor 移民劳动力 268

Migration 移民: to Ancient America 去古代美洲 7-8. 另见 Immigrants and immigration

Militarist period 军国主义时期 22

Military 军队: Aztec 阿兹特克的 26; in Castile 卡斯蒂利亚的 39; Spanish 西班牙的 41; defense of Spanish colonies and 西班牙殖民地的防御与 146; expansion of 的扩张 194; standing armies and 常备军与 194; privileges of 特权 196; in Mexico 墨西哥的 200, 204, 247-248; in Central America 中美洲的 218; in Brazil 巴西的 222-224, 263; in Nicaragua 尼加拉瓜的 267; in Colombia 哥伦比亚的 270. 另见 Dictatorships; School of the Americas (SOA)

Military elite 军事精英 194

Military junta 军人执政委员会: in Spain 西班牙的 162; in Argentina 阿根廷的 166

Military state (Teotihuacán) 军事国家(特奥蒂瓦坎文明) 17

Millenarianism 千禧年说 101, 101n

Miller, Francesca 弗朗西斯卡·米勒 176

Millones, Luis 路易斯·米洛尼斯 89n, 112

Milis (sugar processing) 制糖 124

Milonga. 参 Tango (Argentina)

Milpas (farmplots) 从林中开垦的小片土地 18

Minchom, Martín 马丁·闵乔 152

Minerals 矿物: in Brazil 巴西的 126-127; in Atacama region 在阿塔卡马地区的 255

Mingas (free workers) “民咖”(自由劳动力) 154

Minifundio 小农场 245

Mining and mining industry 采矿与采矿业 194; Cortés and 科尔特斯与 85; colonial 殖民地的 88-90; in Mexico 墨西哥的 171, 197, 251; in Peru 秘鲁的 228; in Colombia 哥伦比亚的 240; in Chile 智利的 260 另见 Copper industry

Mining guild 矿业工会 140

Mining repartimiento 采矿的劳役摊派制度 81

Minorca 米诺卡岛 135

Miramón, Miguel 米格尔·米拉蒙 204

Miranda, Francisco de 弗朗西斯科·德米兰达 160-161, 164

Miscegenation 异族通婚 116, 131

Missionaries 传教士: conversion as task of 以皈依作为目的 102-103; disputes among 之间的纠纷 103-104; decline of 减少 104-106; success of 成功 105; taming of wilderness by 对野性的驯服 105; wilderness and 野性与 105; and historical record 与历史记录 107. 另见 Catholic Church; Clergy 及各个人物词条

Missions 传教团 105

Mita 米塔制度: repartimiento as 劳役摊派制 81; replacement by silver 白银替代劳役 82n; in Peru 在秘鲁 96; in Andean area 在安第斯地区 142; opposition to 反对 152; burdens of 的负担 153, 154

Mitayos (drafted workers) 米塔约(劳役摊派劳工) 153

Mitimaes (colonists) 殖民地居民 31, 33

Mitre, Bartolomé 巴托洛梅·米特雷 208, 209

Mixed races 混血种族 110; soldiers of 士

- 兵 124 (illus.), 另见 Mestizos (mixed race people)
- Mixton war (Mexico) 米斯顿战争 152
- Mochica civilization 莫奇卡文明 13, 30
- Moctezuma, Isabel 伊莎贝尔·蒙特祖玛 73
- Moctezuma II (Aztec) 蒙特祖玛二世(阿兹特克) 24, 28
- Moctezuma (Montezuma) (Aztecs) 蒙特祖玛(阿兹特克) 14; Europeans and 欧洲与 61-62; Cortes and 科尔特斯与 63-65; daughter of 女儿 73
- Moderados (Mexico) 现代派(墨西哥) 199
- Molina, Juan Ignacio 胡安·伊格纳西奥·莫利纳 149
- Monarchy (Brazil) 君主(巴西) 260-262
- Monarchy (Portugal) 君主(葡萄牙的): Brazil taxation by 巴西的征税 129; church and 教会与 130
- Monarchy (Spain) 君主(西班牙) 6, 41; in Castile 卡斯蒂利亚的 39; indigenous labor regulated by 土著劳动力受其安排 100; San Martín and 圣马丁与 168
- Monasteries 修道院 42, 49. 另见 Missionaries
- Money 钱: Aztec 阿兹特克的 27; in Peru 秘鲁的 230; in Brazil 巴西的 263; in Colombia 哥伦比亚的 271
- Monoculture 单作 138, 244
- Montaigne, Michel de 米歇尔·德·蒙田 9, 58, 126
- Monteagudo, Bernardo 贝尔纳多·蒙蒂个多 168
- Monte Alban culture 蒙特·阿尔万文化 13, 15
- Monteclaros, Marques de 蒙特克拉罗斯侯爵 104
- Montejo, Francisco de 弗朗西斯科·德蒙特韦 65
- Montesinos, Anton 安东·蒙特西诺斯, 77
- Montesinos (Father) 蒙特西诺斯(神父) 125
- Montevideo 蒙得维的亚 205, 211
- Montt, Manuel 曼努埃尔·蒙特 214
- Monument ruins 纪念碑的遗址 35
- Moore, Colin 科林·穆尔斯 93n
- Mora, José María Luis 何塞·玛丽亚·路易斯·莫拉 199, 200
- Morals 道德: laxity of missionary 传教士道德松弛 104-105; in Brazil 在巴西 130-131
- Morazán, Francisco 弗朗西斯科·莫拉桑 217, 218
- Morc, Thomas 托马斯·摩尔 58, 101
- Morelos, José María 何塞·玛丽亚·莫雷洛斯 173-174, 196
- Moreno, Gabriel García 加夫列尔·加西亚·莫雷诺 190
- Morillo, Pablo 帕布洛·莫里略 165
- Morineau, Michel 米切尔·莫里诺 89
- Moriscos (Muslims) 摩里斯科人(穆斯林林) 110
- Morison, Samuel Eliot 塞缪尔·艾略特·莫里森 77
- Morocco 摩洛哥 52-53
- Moscoso (Bishop of Cuzco) 莫斯科索(库斯科主教) 155
- Motolinía (Friar Toribio de Benavente) 莫托里尼亚(托里维奥·德贝纳文特修士) 11, 102, 103, 107; *History of the Indians of New Spain* 《新西班牙印第安人史》107
- Mounds 土丘 13, 14
- Mozarabes 莫扎勒布人 37
- Muisca chiefdoms 缪斯卡酋邦 10
- Mulattos 穆拉托人. 参 Mestizos (mixed race people)
- Mulattos, in colonial social order 穆拉托人, 在殖民地社会秩序中 115
- Mules 骡子 87, 88
- Municipal councils 市政议会: taxation in Brazil and 巴西的税收与 129-130. 另见 Town councils
- Murals 壁画; of Maya 玛雅的 21, 21 (illus.)
- Music 音乐: of Inca 印加的 35
- Muslims 穆斯林; in Spain 新西班牙的 37-38; Spanish Reconquest and 西班牙再征服运动与 38; Portugal and 葡萄牙与 52-53; prohibited from going to Indies 被禁止进入西印度 106; as Moriscos 被称做摩里斯科人 110

Mutis, José Celestino Bruno (botanist) 何塞·塞莱斯蒂诺·布鲁诺·穆提斯(植物学家) 147

N

Nabuco, Joaquim 华金·纳布科 224

NAFTA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参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NAFTA)

Nahuatl-speaking people 讲纳瓦特尔语的民族 23

Náningos 尼亚尼戈 235

Napoleon 拿破仑: Spain and 西班牙与 161; fall of 没落 164; capture of Charles IV and Ferdinand VII by 被卡洛斯四世与费迪南德的七世抓获 170; defeat of 被击败 174

Napoleon III (France) 拿破仑三世(法国) 203

Nariño, Antonio 安东尼奥·纳里尼奥 160

Narváez, Pánfilo 潘佛罗·德纳尔瓦埃斯 69

National bank (Colombia) 国家银行(哥伦比亚) 271

National guard; in Brazil 国民卫队, 在巴西 222. 另见 Nicaragua

Nationalism 民族主义: Creole 克里奥尔人的 148-150, 159; of Rivadavia 里瓦达维娅的 207

Nationalization 国有化: of nitrate industry 硝酸盐工业 259

National Police and National Guard 国家警察与国民警卫队: in El Salvador 萨尔瓦多的 268

National War 民族战争 218

Native peoples 本地人. 参 Indigenous peoples

Natural and Moral History of the Indies (Acosta) 《西印度的自然和道德史》(阿科斯塔) 107

Natural slavery, Aristotelian theory of 自然奴役, 亚里士多德的理论 102

Navarre 纳瓦拉 43

Navas de Tolosa, Las; Christian victory at 拉斯纳瓦斯·德托洛萨: 基督教在此的胜利 38

Navigation 航海: Henry of Portugal and 葡萄牙的昂利与 52-53; astrolabe and 星盘与 53

Nazca culture 纳斯卡文明 13, 30

Nebrija, Antonio de 安东尼奥·德内夫里哈 43

Neocolonialism 新殖民主义 244-247; hacienda system and 大庄园系统与 245-246

Netherlands 荷兰 48-49, 135

Neutrals 中立国 138

New Castile, Spain 新卡斯蒂利亚, 西班牙 39

New Chronicle (Waman Puma) 《新编年史》(瓦曼·普马) 107

New Granada 新格拉纳达 137, 143, 164; trade in 贸易 91; insurrection in (1781) 暴乱 156-157; Bolívar and 玻利瓦尔与 166; freedom of provinces in 各省的独立 166; Colombia in 哥伦比亚 235, 239; Panama in 巴拿马 239. 另见 Colombia

New Laws of the Indies (1542) 《西印度新法》(1542) 68, 79-81, 102

New Mexico 新墨西哥; cession to U. S. 割让给美国 200; Hispanics in 西班牙裔在此 201; Santa Fe Ring in 圣菲集团在此地 201

New Spain 新西班牙: Aztec Empire as 阿兹特克帝国成为 65; audiencia of 检审法庭 79; encomiendas and 委托监护地与 79-81; repartimiento in 的摊派制度 81-82; 17th century economy in 在17世纪的经济 89; trade in 贸易 91; viceroyalty of 总督辖区, 96; indigenous local government in 当地的土著政府 114; free trade in 的自由贸易 138; mining guild in 矿业工会 140; Bourbon monarchy in 波旁君主 170; autonomy within empire 在帝国的自由权 174-175

New World 新世界; Isabelline religious reform and 伊莎贝拉的宗教改革与 42; Spanish agriculture in 西班牙农业 86-88; Inquisition in 宗教裁判所 106

Nezahualcoyotl (Texcocoan) 内萨瓦尔科约

- 特尔(特斯科科人) 23
- Nicaragua 尼加拉瓜: Spanish conquest of 西班牙对其的征服 65; in United Provinces of Central America 在中美洲或合省 216-218; government in 的征服 217; Walker in 沃克在 218; economy in 经济 267; 1870-1909 1870-1909 年的 267; politics in 政治 267 另见各位领导人的词条
- Niña (ship) 妮娜号(特) 55
- Nitrate industry 硝酸盐工业: in Chile 智利的 215, 255; in Peru 秘鲁的 230; in Bolivia 玻利瓦尔的 255; British control of 英国对其的控制 255-256; nationalization of 国有化 259
- Nitrate Railways Company 硝酸盐矿铁路公司 258, 259
- Nobility 贵族: Aztec 阿兹特克的 28; Inca, 34; in Castile 卡斯蒂利亚的 39; in Spain 西班牙的 40, 41, 43-44, 49
- "Noble savages" "高贵的野蛮人" 60, 126
- Nobrega, Manoel da 马诺埃尔·达诺布雷加 125
- Nomads 游牧民族 9
- Nombre de Dios 诺人山德迪奥斯港 91, 92
- North, John Thomas 约翰·托马斯·诺斯 258, 259
- North America 北美: gold and slave hunters in 黄金和奴隶猎人 69; Coronado in 科罗纳多 70
- North American Invasion 北美入侵. 参 Mexican War
- Northern Andean region 北安第斯地区 137
- Northern frontier 北部边境 105
- Nuclear America 核心美洲 11, 12-14
- Numeration 计数方式: of Arabs 阿拉伯人的 20; of Maya 玛雅人的 20
- Núñez, Rafael (Colombia) 拉斐尔·努涅斯(哥伦比亚) 190, 192, 246, 270-271
- Núñez Vela, Blasco 布拉斯科·努涅斯·贝拉 68
- O
- O abolicionismo (Nabuco) 《废奴主义》(纳布科) 224-225
- OAS. 参 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States (OAS)
- Oaxaca 瓦哈卡地区 14, 15, 201
- Obrages (workshops) 作坊: debt servitude in 的债务劳役制 82-83; growth of 增加 90
- Observants 严守教规的教徒 in Spain 西班牙的 42
- "Observations on the Treaty of Guadalupe Hidalgo" (Rejón) "评论瓜达卢佩·伊达尔戈条约"(雷洪) 200
- O'Callaghan, Joseph F. 约瑟夫·F. 奥卡拉汉 39
- Ocampo, Melchor 梅尔乔·奥坎波 200, 201
- "Of Cannibals" (Montaigne) "论食人部落"(蒙田) 58
- O'Higgins, Ambrosio 安布罗西奥·奥希金斯 145
- O'Higgins, Bernardo 贝尔纳多·奥希金斯 167, 169, 212, 213 (illus.)
- Oidores (royal agents) 奥伊多尔(检审法官) 98
- Oil industry 石油工业: in Mexico 墨西哥的 250
- Ojeda, Alonso de 阿隆索·德奥赫达 61
- O *Jornal das Senhoras* (Manso de Noronha) 《太太杂志》(胡安娜·保拉·曼索·德诺荣哈) 189
- Oligarchies 寡头: merchant 商业的 91; underlying constitutions 相关宪法 195; in Chile 智利的 212, 213, 260; in Argentina 阿根廷的 252, 254; in Brazil 巴西的 263, 264; in El Salvador 在萨尔瓦多的 268
- Obvares, count (Spain) 奥利瓦雷斯伯爵(西班牙) 49
- Ollantaytambo 奥兰太酒馆 35
- Olmec civilization 奥尔梅克文明 14-17; in Formative period 形成时期的 13, 14; Maya and 玛雅与 17
- "On Cannibals" (Montaigne) 《论食人族》(蒙田) 126
- Ordinance of Intendants 监政官条例 145, 146, 156
- Orejones (big ears) 大耳朵 31 (illus.) 34

Orellana, Francisco 弗朗西斯科·奥雷利亚纳 71
 Organization, social/political 社会或政治的组织 9-11, 19
 Oriente Province 奥连特省. 参 Cuba
 Orinoco River 奥里诺科河 56
 Orizaba area textile strike 奥里萨巴地区纺织业罢工 251
 Orozco, José Clemente 何塞·克莱门蒂·奥罗斯科 202 (illus.)
 Ortelius, Abraham 亚伯拉罕·奥特琉斯 58
 Ortiz de Domínguez, Josefa 何塞法·奥蒂斯·德多米尼格斯 175
 Orton, James 詹姆斯·奥顿 186
 Ossertoes (*Rebellion in the Backlands*) (Cunha) 《腹地》(库尼亚) 262-263
 Outsiders (forasteros) 外来者 142
 Ovando, Nicolás de 尼古拉斯·德·奥万多 77
 Oviedo, Gonzalo Fernández de 贡萨洛·费尔南德斯·德·奥维多 71-72, 77
 Owens, Jack 杰克·欧文斯 41

P

Pachayachachic (god) 帕查亚查奇科(神) 35
 Pachucuti Inca 印加帕查库提国王 31, 31 (illus.)
 Pacific Ocean region, Balboa and 太平洋地区, 巴尔沃亚与 61
 Pact of Zanjón (Cuba) 《桑洪协定》(古巴) 234
 Páez, José Antonio 何塞·安东尼奥·帕埃斯 165, 166, 237-239
 Pagans and paganism 异教徒和异教: Thomas More on 托马斯·莫尔对其的说法 58; signs of 迹象 103
 Painting 绘画: by Maya 玛雅的 21, 21 (illus.); in Spain 在西班牙的 50-51 另见各位艺术家词条
 Palacios Rubios, Juan López de 胡安·洛佩斯·德帕拉西奥斯·卢比奥 77
 Palenques 帕伦克 220, 236
 Palmares, republic of (fugitive slave settlement in Brazil) 帕尔马雷斯共和国

(在巴西的逃亡奴隶定居点) 133
 Pampas 潘帕斯: in Argentina 阿根廷的 88
 Panama 巴拿马 61; chiefdoms in 酋邦 10; Columbus in 哥伦布在 56; Davila in 达维拉在 66; freedom of 的解放 166; in Colombia 在哥伦比亚中 216n. 另见 Colombia; New Granada
 Pan o palo policy “面包或人棒”政策 247
 Paraguay 巴拉圭 71, 167, 209-211; encomienda in 委托监护地 80; independence of 独立 205; economy in 经济 209-211; Brazilian rule of 巴西对其的统治 211; labor in 劳动力 211; development in 发展 244 另见各位领导人词条
 Paraguayan War 巴拉圭战争 209-211, 225, 244, 260
 Parallel descent 血缘平行; in Inca society 印加社会的 33
 Paraná 巴拉那 208
 Pardo, Manuel 帕尔多·曼努埃尔 230
 Pardos (free mulattos) 帕尔多人(自由的穆拉托人) 151, 239
 Parliamentary Republic (Chile) 议会共和国(智利) 260
 Parral (silver center) 帕拉尔(银矿中心) 88
 Patagonia 巴塔哥尼亚 8
 Patriarchal family 父权制家族 185
 Patriarchy 父权制 219
 Patriots 爱国者: Bolívar and 玻利瓦尔与 163; in Caracas 加拉加斯的 163; in Argentina 阿根廷的 167; navy of 海军 168. 另见 Creoles (American-born Spaniards) 及各位领导人词条
 Patronato (apprenticeship) 庇护: for liberated Cuban slaves 针对解放的古巴奴隶 184, 234
 Patrón (master) 主人 195
 Pauw, Cornelius de 康尼利乌斯·德·包弗 149
 Paz, Octavio 乌塔维奥·帕斯 120
 Peace of Basel 《巴塞尔和约》161
 Peasants 农民: Aztec 阿兹特克的 24, 28; Inca and 印加与 34; in Spain 西班牙的 37, 44; in Brazil 巴西的 133; 18th-

- century revolts by 发动的 18 世纪的起义 152; in Peruvian revolt' of 1780 - 1781 在 1780 - 1781 年的暴乱 154; Hidalgo and 伊达尔戈与 172, 173; as peons or serfs 作为雇农或农奴 176; in Mexico 墨西哥的 200, 202 - 203; in Colombia 哥伦比亚的 240, 270; in El Salvador 萨尔多瓦的 268. 另见 Indigenous peoples
- Pecheros (taxpayers) 平民(纳税人) 49
- Pedro I (Portugal) 佩德罗一世(葡萄牙) 170, 220 - 221; as constitutional emperor of Brazil 作为巴西的立宪皇帝 170
- Pedro II (Portugal) 佩德·二世 221, 224, 261 (illus.), 262
- Peixoto, Floriano 弗洛里亚诺·佩肖托 262, 263
- Peninsulars 半岛人 111; vs. creoles 对克里奥尔人 111; Consolidation and 巩固与 147; wars of independence and 独立战争与 158 - 161; in Mexico 墨西哥的 170, 176
- Peonage 劳役偿债制 142, 176, 181; in Mexico 墨西哥的 196 - 197, 203; in Paraguay 巴拉圭的 209; in Nicaragua 尼加拉瓜的 267
- Peralta Barnuevo, Pedro de 佩德罗·德·佩拉尔塔·巴尔努埃沃 108
- Pereira Passos, Francisco 弗朗西斯科·佩雷拉·帕索斯 263
- Pernambuco colony 伯南布哥殖民地 124, 126
- Pernambuco uprising (Brazil) 伯南布哥州起义(巴西) 221, 224
- Peru 秘鲁 8, 14, 69; ancient peoples in 的古代人 8; agriculture in 农业 9; pre-Conquest population of 征服前的人口数量 12; cultures of 文化 13, 30; Incas in 印加人 29 - 35; Balboa and 巴波亚与 61; Spanish conquest of 西班牙对其的征服 66 - 68; after conquest 征服后的 67 - 68; Gonzalo Pizarra revolt in 贡萨洛·皮萨罗的暴动 68; Aguirre and 阿吉雷与 74; Spanish right to control 西班牙对其控制的权利 78 - 79; New Laws in 新法 79; decline of native population in 本土人口下降 80; labor in 的劳动力 81, 228; mita in 的米塔制度 81; crops in 农作物 87; viceroyalty of 总督辖区 96; conversion in 皈依情况 103; status in 社会地位 113; wealthy indigenous/mestizo nobles 富有的土著/梅斯蒂索贵族 113; indigenous local government in 的本地土著政府 114, 115; local government structure in 的本地政府结构 114; successful commoners in 的成功平民 114; convent in 的修道院 120 - 121; separation of viceroyalty of 总督辖区的分裂 137; revolt in 暴动 153 - 156; liberation movement and 解放运动与 163; independence of 独立 168, 228; Bolívar in 玻利瓦尔在 168 - 169; nitrates in 硝酸盐矿 215, 255; guano exports from 出口的鸟粪 229; politics in 政治 229 - 231; slavery and tribute abolished in 奴隶与纳贡制度的废除 229; leadership of 领导者 229 - 230; economy in 经济 229 - 231; Chilean mining and 智利的采矿与 255; War of the Pacific and 太平洋战争与 255 - 256; Tarapacá ceded to Chile by 塔拉帕卡割让给智利 256. 另见 Inca civilization; Upper Peru 及各个领导人名字
- Petén region (Guatemala) 佩腾地区(危地马拉) 17 - 23
- Pétion, Alexandre 亚历山大·佩蒂翁 160, 220
- Philip II (Spain) 菲利普二世(西班牙) 48 - 49; Aguirre and 阿吉雷与 74 - 75; Spanish motives under 其统治下西班牙的动机 79; Catholic Church and 天主教会与 100; Las Casas and 拉斯卡萨斯与 102
- Philip III (Spain) 菲利普三世(西班牙) 104
- Philip IV (Spain) 菲利普四世(西班牙) 49
- Philip V (Spain) 菲利普五世(西班牙) 136; reconstruction under 领导下的复兴 136; colonial commerce and 殖民地

- 商业与 137 - 138
- Philippines 菲律宾: revolt of 1899 - 1902 1899 - 1902 年的起义 5; Spanish acquisition of 西班牙获得 61
- Philip the Handsome (Burgundy) 英俊的菲利普(勃艮第) 47
- Pichincha 皮钦查 166
- Pierola, Nicolas de 尼古拉斯·德皮埃罗拉 230
- Piety 虔诚 104
- Pinotl (tribute collector, Mexico) 品诺特(贡赋征集者) 61, 62
- Pinto (ship) 品达号(船) 55
- Pinto, Aníbal 阿尼瓦尔·平托 255
- Piracy 海盗 92 - 93
- Pisac 皮萨克 35
- Pizarro, Francisco 弗朗西斯科·皮萨罗 54, 66 - 67, 72
- Pizarro, Gonzalo 贡萨洛·皮萨罗 68, 71, 74
- Pizarro, Remando 雷曼多·皮萨罗 67
- Place-value numeration 位值记数 20
- Plan of Ayutla (Mexico) 阿尤特拉计划(墨西哥) 201
- Plantation society 种植园社会: in Canaries 加那利群岛的 54; in Brazil 巴西的 124 - 126, 133 - 134; slave hunters, Jesuits, and 奴隶猎人、耶稣会与 125; in Peru 秘鲁的 229; in Cuba 古巴的 232 - 234
- Plants, domesticated 植物,本土化的 8
- Plateresque style 繁冗的装饰风格 43
- Plebiscite 公民投票 256
- Pleistocene period 更新世时期 8
- PLM. 参 Mexican Liberal Party (PLM)
- PNAC. 参 Project for the New American Century (PNAC)
- PNR. 参 National Revolutionary Party (PNR, Mexico)
- Poetry, of colonial era 诗歌,殖民地时代的 109
- Poinsett, Joel Roberts 乔尔·罗伯茨·波因塞特 199
- Política dos governadores (politics of the governors) 政治家的政治 264
- Political institutions, of Spanish Empire 行政机构,西班牙帝国的 95 - 100
- Political organization 政治组织: of Spanish American empire 西属美洲帝国的 95 - 100
- Political parties 政党: in new states 新大陆的 191; in Venezuela 委内瑞拉的 238; in Colombia 哥伦比亚的 241. 另见 具体国家与政党
- Political reforms 政治改革: in Spanish America 西属美洲的 144 - 146
- Politics of acquisition 政治收购 191 - 192
- Poma de Ayala, Felipe Guaman 费利佩·瓜曼·波马·德阿亚拉 98
- Pombal, marquis de 蓬巴尔侯爵 130; reform by 改革 126, 130; on marriage between Portuguese men and native women 关于葡萄牙男性与当地女性的通婚问题 131
- Ponce de Leon, Juan 胡安·庞塞·德莱昂 69
- Popham, Home 霍姆·波帕姆 161
- Populations 人口: of bands and tribes 族群与部落的 9; 1492 - 1492 年的 11 - 12; Maya 玛雅的 12, 18; increase in Classic period 古典时期的 13; of Teotihuacan 特奥蒂瓦坎的 15, 15 (illus.); Aztec 阿兹特克的 24; ruled by Aztecs 被阿兹特克人统治的 24; of Brazil 巴西的 129; of Spanish America 西属美洲的 129, 150; in Colombian highlands 哥伦比亚高地的 137; of Buenos Aires 布宜诺斯艾利斯的 252, 253; in Venezuela 委内瑞拉的 269
- Porfiriato (dictatorship) 波菲里奥制度(独裁) 247
- Portales, Diego 迭哥·波塔利斯 212
- Portinari, Candido 坎迪多·波尔蒂纳里 179 (illus.)
- Ports 港口 91
- Portugal 葡萄牙; Brazil and 巴西与 6; independence from Castile 从卡斯蒂利亚独立 38, 52; Castile and 卡斯蒂利亚与 40; independence from Spain 从西班牙独立 49; Henry the Navigator of 航海家昂利 52; exploration by 的探索 52 - 53; African slave trade and 非洲奴隶贸

- 易与 53-54; Jews expelled from 犹太人驱逐 54; Madeira colonies of 殖民地马德拉群岛 54; Atlantic exploration by 大西洋的探索 54-55; Treaty of Tordesillas and 《托德西利亚斯条约》与 56; conversos from 来自葡萄牙的皈依教者 106; Spanish annexation of 西班牙合并 106; threat from 的威胁 143; Continental System and 大陆封锁系统 161; French invasion of 入侵法国 169; independence of Brazil and 巴西的独立与 169-170; court in Brazil 巴西的法庭 170; 1820 revolution in 1820 年的革命 170
- Portuguese America 葡属美洲: colonial Brazil and 巴西殖民地与 122-134; indigenous peoples in 土著人 124-126; Spanish America compared with 与西属美洲的比较 129
- Positivism 实证主义 180, 190, 261
- Postclassic period 后古典时期 13, 14; in Mesoamerica 在中美洲的 22-23, in Peru 秘鲁的 30
- Potato 马铃薯 8, 10
- Potosí 波托西: silver coins adulterated with copper in 银币铜掺假 89n; slave labor in 奴隶劳动力 90 (illus.); city of 117
- Potosí silver mines 波托西银矿 88, 89, 143
- Pottery: Nazca 陶艺: 纳斯卡的 30
- Poverty 贫困: in Spain 西班牙的 44-45; and illiteracy 与文盲 106
- Power (political) 力量(政治的): Aztec 阿兹特克的 28; in Spain 西班牙的 95-100
- Preclassic period 前古典时期, 参 Formative period
- Pre-Conquest cultures 征服前的文化: demography of 人口 11-12; in Mexico 墨西哥的 12, 14-17, 16 (illus.). 另见各个文化的词条
- Prehistoric hunters 史前猎人 7-8
- Prejudice 偏见, 参 Racism
- Premarital sex 婚前性行为 119
- Presidencias (subdivisions) 检审庭辖区 96
- Presidio 驻防 105
- Prester John 祭司王约翰 52-53
- Price revolution 价格革命 57
- Price support 价格保护: for coffee 咖啡的 264
- Priest-kings 祭司-国王 10, 13
- Priests 祭祀 10; in postclassic period 史前时期的 14; at Teotihuacán 特奥蒂瓦坎人的 15; Maya 玛雅的 20; Aztec 阿兹特克的 28; Inca 印加的 35; in Brazil 巴西的 130-131, 另见 Clergy
- Prieto, Joaquín 华金·普列托 212
- Principales 小贵族 113
- Prisoners of war, as Aztec sacrifices 战俘, 作为阿兹特克的人祭牺牲 24
- Private property 私人财产: in Guatemala 危地马拉的 266
- PRM. 参 Party of the Mexican Revolution (PRM)
- Production 产品: on Mexican estates 墨西哥地产上的 139; in Río de la Plata area 拉普拉塔地区的 139
- Projectile points 石弹点 7
- Property 财产; women and 妇女与 119-120; as voting requirement 作为投票资格 195, 213
- Prosperity: for creoles 159; in Buenos Aires 208
- Protection, of Castilian industry 对卡斯蒂利亚的产业的 42
- Protective legislation 保护性法律 100
- Protective tariffs 保护性关税 270, 271
- Peoples 民族 152-153, 另见 Resistance; Revolts and rebellions
- Protomedicato (chief physician) 医官 110
- Provincial administration 省级行政 98-99
- Provincial autonomy 省级自治 200
- Public domain 公共领域 245
- Public hearings, for royal officials 听证会, 对皇室官员的 98-99
- Public schools 公共学校, 参 Education; Schools
- Public works 公共工程 258-259
- Pueblo people 普韦布洛人 105
- Puerto Rico 波多黎各 61, 69; chiefdoms in 酋邦 10
- Pulque 龙舌兰酒 87

Puma de Ayala, Waman 瓦曼·普马·德阿亚拉 112

Puna (plateau) 高原 29

Punishment, Aztec 惩罚,阿兹特克的 27

Puros (Mexico) 正统派(墨西哥) 199, 200, 201

Pyramids of Sun and Moon 太阳与月亮金字塔 15, 15 (illus.)

Q

Quechua language 克丘亚语 31, 35

Queiroz anti-slave-trade law 凯罗斯反奴隶贸易法 225

Querétaro; Mexican independence and 克雷塔罗;墨西哥独立与 171

Quesada, Gonzalo Jiménez de 贡萨洛·希门尼斯·德·克萨达 71

Quetzalcoatl and Guadalupe: *The Formation of Mexican National Consciousness* (Lafaye) 《羽蛇神与瓜达卢佩圣母:墨西哥国家意识的形成》(拉法耶) 149

Quetzalcóatl (god) 羽蛇神 15, 22; myth of 之谜 22, 29, 149; Europeans as 欧洲人被当做 61, 62-64, 62n

Quevedo, Francisco 弗朗西斯科·克维多 50

Quinoa (grain) 昆诺阿藜(谷物) 10

Quinto tax 伍一税 88, 89, 270

Quipu (Inca memory aid) “奇普”(印加辅助记事法) 31

Quiroga, Vasco de 巴斯克·德·基罗伽 101

Quiterra de Jesus, Maria 玛丽亚·奎特伊拉·德耶苏斯 175

Quito 基多省; indigenous peoples in 的土著居民 152; Bolívar and 玻利瓦尔与 166

Quito Insurrection 基多暴动 153

Quivira 基维拉 70

R

Race 种族; castas and 混血人种与 5; mixtures of 的混合 110; under Spanish law 根据西班牙法律的 110, 111; colonial categories of 殖民地的等级 150; notion of inferiority of 种族自卑

246. 另见 Mestizos (mixed race people); Racism

Race war 种族战争; in Venezuela 委内瑞拉的 238, 239

Racial conflict 种族冲突 183

Racism 种族主义: European 欧洲的 58; American 美洲的 200; in Cuba 古巴的 233-235

Radicalism 激进主义; in Brazil 巴西的 221

Radical Party (Argentina) 激进党(阿根廷) 254

Railroads 铁路 181; in Argentina 阿根廷的 211; in Chile 智利的 214; in Cuba 古巴的 232; land and construction of 占地与建设 245-246; in Venezuela 委内瑞拉的 269

Rain forests 雨林 57

Ramírez, Ignacio 伊格纳西奥·拉米雷斯 201

Ramírez, Susan 苏珊·拉米赖斯 86

Rancheros 农场主 86

Ranching 农场运作 85-88

Rank, in chiefdoms 等级,酋邦的 9-10

Rationalism, of Encyclopedists 理性主义,百科全书派的 136

Reactionaries 反动派 200

Real del Monte mines; worker struggle at 雷亚尔-德尔蒙特矿:工人斗争 143, 143n

Rebellions 暴动. 参 Revolts and rebellions

Rebouças, André 安德烈·雷博萨斯 227

Recabarren, Luis Emilio 路易斯·埃米利奥·雷卡瓦伦 260

Recife 累西腓 126

Reciprocal trade agreements 互惠贸易协定. 参 Trade

Reconquest (Spain) 再征服运动(西班牙) 38, 43

Redeemer (Quetzalcóatl legend) 救世主(羽蛇神传说) 22

Reductions, indigenous towns as 居留地,土著城镇作为 114

Reforma, La (Mexico) 改革时期(墨西哥) 201-204, 245, 248

Reform Club (Brazil) 改革俱乐部(巴

- 西) 225
- Reforms 改革: in Spain 西班牙的 42-43; by clergy 神职人员的 101-102; of marquis de Pombal 蓬巴尔侯爵的 126, 130; Bourbon 波旁的 135-137; Spanish colonial 西班牙殖民地的 137-138; political 政治改革 143-146; after Inca revolt 印加起义之后的 156; in Argentina 阿根廷的 167, 206; adopted by Spanish Cortes (1820) 被西班牙议会采纳(1820) 175; in post-independence Mexico 在独立后的墨西哥的 199; in Mexico 墨西哥的 204; in Uruguay 乌拉圭的 205; in Peru 秘鲁的 228, 229; in Gran Colombia 大哥伦比亚的 235; electoral (Argentina) 投票的(阿根廷) 255; in Chile 智利的 258; in Brazil 巴西的 262, 351-355; in Guatemala 危地马拉的 266; in Colombia 哥伦比亚的 271. 另见 Agrarian reform; Land reform
- Refugees 难民 101
- Regency 摄政: in Brazil 巴西的 222-224
- "Regeneration" "再生" 271
- Regidores (councilmen) 市政议员 39, 42-44
- Regional specialization 区域专业化 138
- Regular clergy 正规神职人员 103-104
- Regulation 法规: of Indian labor 关于印第安劳动力的 68; of provincial officials 省级官员的 98-99
- Reinóis 宗主国人 170
- Rejón, Manuel 曼努埃尔·雷洪 200, 201
- Relaciones (reports) 报告 96
- Religion 宗教: rise of 的崛起 10; rise of state and 城邦的崛起与 11; of Maya 玛雅的 19-21; in Tula 图拉的 22; of Inca 印加的 35; in Spain 西班牙的 36, 36 (illus.), 42-43, 45-46; Spanish Reconquest and 西班牙光复与 38; conquistadors and 征服者与 73; in Spanish colonies 西班牙殖民地的 100-110; in Argentina 阿根廷的 208; in Chile 智利的 213; in Cuba 古巴的 235; in Colombia 哥伦比亚的 270
- Religious orders 修会 120. 另见 Clergy; Missionaries; Missions 及各个修会词条
- Religious toleration 宗教宽容: in Colombia 哥伦比亚的 241
- Repatriamiento de mercancías 商品摊派制 140
- Repatriamiento (labor system) 分派劳役制(劳动系统) 81-82; de mercancías 商品摊派制 146, 153; of draft labor 劳役摊派制 245
- Representative democracy 代议制民主. 参 Democracy
- Repression 镇压. 参各个国家词条
- Répública de españoles 西班牙人城镇 82
- Répública de indios 印第安城镇 82
- Republican Party (Brazil) 共和党(巴西) 261, 262
- Republics 共和国. 参 具体国家
- Requirement (Requerimiento) 《要求书》 69n, 77
- Reservations 保留地: for Araucanians 给阿劳坎人的 258
- Resguardos (native communal lands) 保障地: in Colombia 在哥伦比亚 241
- Resistance 反抗: by Brazilian indigenous peoples 巴西土著的 125; to enslavement 奴隶制 160. 另见 Protest; Revolts and rebellions
- Resources 资源: foreign control of 外国控制的 246; in Mexico 墨西哥的 250
- "Restored Republic" (Mexico) "恢复共和"(墨西哥) 204
- Revolts and rebellions 起义与暴动 117 (illus.); Filipino 菲律宾人 5; against Maya 反玛雅的 18; of Comuneros 公社社员的 47; Catalonia 加泰罗尼亚的 49; by Tainos 泰诺人发起的 60; by Gonzalo Pizarro (Peru) 贡萨洛·皮萨罗发动的(秘鲁) 68, 74; by black slaves 黑奴的 116; in Brazil 巴西的 125, 169, 221, 222, 223, 263; by oppressed peoples 被压迫的人民 152-153; in Peru 秘鲁的 153-156; 1780-1781 1780-1781 年 154; by Tupac Amaru II 图帕克·阿马鲁二世发动的 154-155, 155 (illus.); in New Granada 新格拉纳达的 156-157; Creole 克里奥尔人的 166; in Mexico 墨西哥的 170-176,

200; in Spain 西班牙的 174; Plan of Ayutla and 阿尤特拉的计划与 201; in Hidalgo 伊达尔戈的 204; in Chile 智利的 214, 215, 260; in Cuba 古巴的 233 - 234; in Venezuela 委内瑞拉的 238 - 239, 268 - 269; in Colombia 哥伦比亚的 239. 另见 *Revolutions*

Revolução Farroupilha (Brazil) 破汉衫战争 (巴西) 222

Revolutions 革命 192; American 美国的 159; in Haiti 海地的 160; Spanish decline and 西班牙的衰落与 161; American vs. Latin American 美国与拉美的比较 162 - 163; in Portugal 葡萄牙的 170; in Mexico 墨西哥的 203, 251 - 252; in Venezuela 委内瑞拉的 238; in Gran Colombia 大哥伦比亚的 238 - 239; in Colombia 哥伦比亚的 239, 270, 271; in Brazil 巴西的 261 - 262. 另见 *Social revolutions* 及各场革命词条

Riño, Juan Antonio 胡安·安东尼奥·里亚尼奥 159

Rights 权利; of indigenous peoples 土著的 196; of Mexican-Americans 墨西哥裔美国人的 201. 另见各项权利的词条

Riley, James D. 詹姆斯·里雷 142

Rio Blanco textile strike (Mexico 1909) 里亚奥·布兰科纺织厂罢工 (墨西哥 1909) 251

Rio Branco Law 《里亚奥布兰科法》226, 227

Rio de Janeiro 里约热内卢 263; French founding of 法国人建立 126; Brazil and 巴西与 224

Río de la Plata (Argentina) 拉普拉塔河 (阿根廷) 88; trade in 贸易 138, 139; viceroyalty of 总督辖区 143; independence of 独立 205; unity in 的团结 205, 208. 另见 *Argentina*; *Paraguay*; *Upper Peru*; *Uruguay*

Rio Grande rebellion (Brazil) 里约格兰德暴乱 (巴西) 222

Riots; in Mexico 墨西哥的暴动 152

Rivadavia, Bernardino 贝纳迪诺·里瓦达维亚 206 - 207

Rivera, Diego 迭戈·里维拉 3 (illus.) 64

(illus.)

Roads 道路; of Inca 印加的 31

Robbers 抢劫 197

Roca, Julio 胡里奥·罗卡 252 - 253

Rock, David 戴维·洛克 255

Rocroi, battle at 罗克鲁瓦之战 49

Roderic (Goths) 罗德里克王 (哥特) 37

Rodríguez, Mariano Ospina 马利亚诺·奥斯特皮纳·罗德甲格斯 188

Rodríguez Freile, Juan 胡安·罗德里格斯·弗雷莱 109

Rojas, Fernando de 费尔南多·德罗哈斯 43

Roldan (Spanish rebel leader) 罗尔丹 (西班牙的暴乱首领) 56

Roman Catholic church 罗马天主教教会
参 *Catholic Church*; *Missionaries*

Roman law 罗马法 36

Romanticism 浪漫主义 180

Rome conquest (by Spain) 罗马的征服 (被西班牙) 36

Rosas, Juan Manuel 胡安·曼努埃尔·罗萨斯 183, 206 (illus.), 207

Rosas, Mateo de Oquendo 马特奥·德奥科恩多·罗萨斯 108 - 109

Rosenblat, Angel 安占尔·罗森布拉特 11

Rose of Lima (Saint) 利马的玫瑰 (圣人) 120 (illus.)

Royal agents 皇家代理 96 - 98, 99

Royal Commentaries of the Incas (de la Vega) 《印加王史述评》(德拉维加) 107, 154

Royalist revolt against Ferdinand VII and 保皇党反对费迪南德七世的起义 165 - 166

Royal patronage 王宰任免权; of church 对教会的 101

Rubio, Manuel Romero 曼努埃尔·罗梅罗·卢比奥 249

Ruiz, Eduardo 爱德华多·鲁伊斯 182

Ruling class 统治阶级; domination of native peoples by 统治当地人 102; in colonies 在殖民地的 110 - 111; in Brazil 巴西的 224. 另见 *Class*; *Elites*

Ruling class (colonial era) 统治阶级 (殖民时期) 110 - 111

Rurales (mounted police) 乡村骑警 247

Ryswick, Treaty of 《里斯维克条约》 93

S

Salvedra, Cornelio 康卓里奥·萨阿贝德拉 167

Sacrifice 献祭: Maya 玛雅的 18; Toltecs and 托尔特克人与 18, 22; Aztec 阿兹特克的 20; human 人祭 20, 24, 25, 35

Sacsahuaman 萨科萨瓦曼 35

Saenz, Minuela 曼努埃拉·萨恩斯 175, 175 (illus.)

Saenz Peña Law (1912, Argentine) 《萨恩斯-培尼亚法》(阿根廷, 1912年) 255

Sahagun, Bernardino de 伯纳迪诺·德·萨贡 62n, 107

Saint Domingue 圣多明各: English in 英国人 93; French in 法国人 93

Saints 圣人. 参各仁 圣人词条

Salamanca, University of 萨拉曼卡大学 43

Salvarrieta, Policarpa 波利卡耳帕·萨尔瓦利埃塔 175

Sanders, William T. 威廉·T. 桑德斯 12

Sandoval, Alonso de 阿隆索·德桑多瓦尔 115

San Martín, José de 何塞·德·圣马丁 166-169, 212; Bolívar and 玻利瓦尔与 168; reforms and 改革与 228

San Salvador 圣萨尔瓦多 55

Santa Anna, Antonio Lopez de 安东尼奥·洛佩斯·德圣安娜: conservatives and 保守派与 200; as dictator 作为独裁者 200

Santa Cruz, Andrés 安德烈斯·圣克鲁兹 183, 195

Santa Fé de Bogotá 圣菲波哥大. 参 Bogotá

Santa Fe (Entre Ríos): 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 in (1852) 圣菲(恩特雷里奥斯省): 制宪会议(1852) 208

Santa Fe Ring 圣菲集团 201

Santa Hermandad (police force) 伸圣兄弟会(治安力量) 41

Santa Maria (ship) “圣玛利亚”号(船) 55

Santa Marta, Colombia 圣玛尔塔, 哥伦比亚 71

Santander, Francisco de Paula 弗朗西斯科

科·德·波拉·桑坦德尔 166, 190, 235, 239

Santería 萨泰里阿教 235

Santiago, Chile 圣地亚哥, 智利 71

Santiago de Compostela 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 38

Santo Domingo 圣多明各. 参 Dominican Republic

Santos, Juan 胡安·桑托斯 154

Santo Tomás, Domingo de 多明戈·德圣托马斯 102

São, Mem de ()·德萨 126

São Paulo 圣保罗 127, 264

São Vicente 圣维森特 122

Sapper, Karl 卡尔·扎佩尔 11

Sarmiento, Domingo Faustino 多明戈·萨米恩托 183, 211

Satire, in colonial literature 讽刺, 在殖民地文学中的 108-109

Savages, Indians portrayed as 野蛮人, 印第安人被描绘成 60

Scholasticism 经院哲学 76

School of mines 矿业学校 140

Schools 学校: Aztec 阿兹特克的 26-27; for indigenous youth 为土著儿童开设的 103; in Mexico 墨西哥的 204; in Argentina 阿根廷的 209, 211; in Paraguay 巴拉圭的 209. 另见 Education 及具体大学

Schwartz, Stuart 斯图尔特·施瓦茨 132

Science 科学 147-148

Science, in colonial era 科学, 殖民地时期的 108

Scobie, James 詹姆斯·斯科比 186

Scottish Rite lodge 苏格兰仪式派共济会 199

Sculpture (Inca) 雕塑(印加) 35

Secondary schools 中学: of Society of Jesus 耶稣会的 104

Second Letter (Vespucci) “第二封信”(韦斯普奇) 58

Secular clergy 在俗教士 103-104

Secular reformism 世俗改革 241

Seed, Patricia 帕特里西亚·西德 119

Seigneurial class 领主阶层 5

Self-rule, town council and 自治, 市议会与

99

Self-sufficiency, colonial 自给自足, 殖民地的 89

Semifeudal land tenure system 半封建土地所有制 139

Senado da câmara (municipal council) 市政议会 129

Sendero Luminoso, 参 Shining Path (Peru)

Seneca 塞内卡 36

Señor natural (natural/legitimate lord) 自然主 112

Serfs 农奴 176, 181; in Spain 西班牙的 37; indigent peoples as 土著作为 81; in Peru 秘鲁的 228

Sertanejos 巴西腹地人 227, 262 - 263

Servants 仆人; of Incas 印加的 33; yanaconas as 永久的仆人 34, 142, 152, 156

Servitude 受奴役; in colonial labor systems 在殖民地劳动力体系中 83; in labor system 劳动力体系中 142

Settlements 定居点; ancient 古代的 7 - 8; cultivation techniques and 栽培技术与 8 - 9; Maya 玛雅的 18 - 19; missions and 传教团与 105; in Brazil 巴西的 122, 126 - 127, 133

Seven Cities of Cibola 西沃拉的七城 70

Seven Years' War 七年战争 138, 146

Seville, Spain 塞维利亚, 西班牙 41; Reconquest of 再征服 38; merchant oligarchy in 商业寡头 91; merchant monopoly of 商业垄断 92

Seward, William H. 威廉·H. 苏厄德 204

Sex and sexuality 性与性生活: marriage, women, and 婚姻、妇女与 118 - 121; double standard 双重标准 188

Sharecroppers 佃农; in Brazil 巴西的 133; in Peru 秘鲁的 228, 229 - 230; in Nicaragua 尼加拉瓜的 267

Sheep 绵羊 39, 87

Ships and shipping 船舶与航运; Spanish 西班牙的 161

Sigüenza y Góngora, Carlos 卡洛斯·西古恩萨·伊·贡戈拉 108

Silk industry 丝绸业 85, 87, 91

Silva Xavier, José da 何塞·达·席尔瓦·

哈维尔 134

Silver 白银 83; in Potosí 波托西的 88; sales tax on 销售税与 89; trade of 贸易 91; from Mexico 从墨西哥来的 140

Silverblatt, Irene 艾琳·西尔弗布拉特 33, 112

Silver mining 银矿开采 88 - 90; labor for 的劳动力 81, 142 - 143; in Spanish colonies 西班牙殖民地的 140

Simpson, Lesley B. 莱斯利·B. 辛普森 11

Siqueiros, David 大卫·西凯罗斯 213

Skin color, in Brazil 肤色, 巴西的 131 - 133

Slash-and-burn cultivation 刀耕火种 9, 10; of Maya 玛雅的 17, 18; of Aztecs 阿兹特克的 27

Slaves and slavery 奴隶与奴隶制; Aztec 阿兹特克的 28; Portuguese 葡萄牙的 54; Columbus on 哥伦布对此看法 60; Arawaks as 阿拉瓦克人作为 77; indigenous 土著的 77; encomienda and 委托监护地与 77 - 79; prohibition against 对其的禁止 79; black 黑奴 81, 82 - 83, 115 - 116, 184; in making of Latin America 在拉丁美洲的形成 84 (illus.); in Americas 美洲的 116; in Brazil 巴西的 124, 125, 131 - 134, 132 (illus.), 169, 225 - 228, 260 - 261; struggles for independence 为解放而作的斗争 164; abolished in Venezuela 在委内瑞拉被废止 165, 239; in 19th century 19世纪的 185; in Paraguay 巴拉圭的 209; colonial legacy of 殖民地遗留的 219; coffee plantations and 咖啡种植业与 226 (illus.); in Peru 秘鲁的 229; in Western Hemisphere 西半球的 229; in Cuba 古巴的 231, 232, 232 (illus.), 233; in Venezuela 委内瑞拉的 237 - 238; in Colombia 哥伦比亚的 240 - 241; in late 1800s 19世纪头十年后半期 245; in Mexico 墨西哥的 250 另见 Slave trade 奴隶贸易

Slave trade 奴隶贸易 57, 126; Portugal and 葡萄牙人与 53 - 54; Tainos sold in 中被出售的泰诺人 60; Spain and 西班牙人与 69, 232; Brazil and 巴西人与

- 221; Cuba and 古巴与 231, 232
- Slaves 贫民窟 117
- Smallpox 天花 12, 69
- Smith, Adam 亚当·斯密 57
- Smuggling 走私行为: Dutch 荷兰人的 128; in Caribbean 加勒比地区的 137; reducing 减少 137
- SOA 参 School of the Americas (SOA)
- Social Darwinism 社会达尔文主义 246
- Social democrats 社会民主党 265
- Socialism 社会主义; in Chile 智利的 260; in Brazil 巴西的 265
- Socialist Party 社会党: in Argentina 阿根廷 255; in Chile 智利的 260
- Social mobility 社会流动性 150 - 151
- Social order 社会秩序: in colonial era 殖民地时代的 110 - 121; ruling class 统治阶级 110 - 111; mestizo status 梅斯蒂斯人的地位 111 - 112; indigenous peoples 土著人种 112; blacks, mulattos, and zambos 黑人、混血人种与土著人种的 115 - 116; major centers of social life 社交生活的主要中心 116 - 118; marriage, sexuality, and status of women 婚姻、性生活、妇女的地位 118 - 121
- Social reform 社会改革: Morelos and 莫雷洛斯与 173
- Social stratification 社会分层 6, 9, 10, 13 另见 具体人群
- Society 社会: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of 的考古学线索 7 - 8, 11n; egalitarian 的平等 9; before Spanish conquest 西班牙征服之前的 9; levels of organization of 社会组织的 9 - 11; at time of Conquest 征服时的 11 - 12; in stages of history 在历史舞台的 13 - 14; of Peru 秘鲁的 29; of Inca 印加的 29 - 35; Roman impact on Spain 罗马对西班牙社会的影响 36; class and caste in 中的阶级与种姓 110 - 121; Aztec 阿兹特克的 112 - 115; in indigenous towns 在土著城镇的 115; haciendas and 大庄园与 118; in Brazil 巴西的 131 - 133; Brazilian estate (fazenda) and 巴西大种植园与 133 - 134; in Spanish colonies 在西班牙殖民地的 150 - 152; hierarchical structure of 的层次结构 196; in Cuba 古巴的 231 - 234; in Colombia 哥伦比亚的 239. 另见 Aztecs; Class; Creoles (American-born Spaniards); Inca civilization; Maya civilization; Organization; Stratified society; Women; 及具体阶级、具体人群词条
- Society of Equality (Chile) 平等社(智利) 214
- Society of Jesus 耶稣会. 参 Jesuits
- Soil 土壤: cultivation methods and 种植方法与 8 - 9; population crisis and 人口危机与 12; erosion 侵蚀 57
- Solórzano Pereira, Juan 胡安·索罗萨诺·佩雷拉 111
- Song of Quetzalcóatl 羽蛇神之歌 22
- Sor Juana, Inés de la Cruz 伊内斯·德拉克鲁斯·索尔·胡安娜 108, 109 (illus.) 120
- Sousa, Affonso de 阿丰索·德索萨 122
- Sousa, Tomé de 托梅·德索萨 128 - 129
- South America 南美: Andean civilizations in 的安第斯地区文明 12 - 14; Vespucci and 韦斯普奇与 61; Spanish frustrations in 西班牙在此受到的挫折 71; liberation of 的解放 162 - 170; Bolívar, Simon, and 西蒙·玻利瓦尔与 163 - 166, 163 (illus.). 另见 Central America; Latin America 及各个国家词条
- Southern liberation movement 南方解放运动 166 - 169
- South Sea Company (England) 南海公司(英国) 137
- Spain 西班牙: conquistadors from 来自西班牙的征服者 4; climate of violence and 的气候与暴力 4 - 5; decline of 的衰落 6; Germanic invasions of 日耳曼入侵 36; origins of term 起源 36; writers of Latin literature from 拉丁文学作家 36; conquest as historical theme of 征服作为其历史主题 36 - 37; multicultural background of 多民族背景 36 - 37, 37 (illus.); Jews and 犹太人与 37, 37 (illus.), 45 - 46; Muslims in 的

穆斯林 37 - 38; kingdoms in 的王国 37 - 41; medieval period in 在中世纪 37 - 41; Castile and 卡斯蒂利亚与 38 - 39; nobility in 贵族 40, 41; unification of 统一 41; under Ferdinand and Isabella 在费迪南德与伊莎贝尔的统治下 41 - 46; foreign policy of 对外政策 43; in time of Columbus 在哥伦布时代 44, 44 (illus.); religions in 宗教 45 - 46; Inquisition in 宗教裁判所 46, 46 (illus.); Charles V in 卡洛斯五世在 47 - 48; Hapsburgs in 哈布斯堡王朝在 47 - 51; Philip II in 菲利普二世在 48 - 49; economic decline in 经济衰落 49 - 50; decadence in 衰败 50; Columbus' voyages and 哥伦布的航行与 55 - 56; Treaty of Tordesillas and 《托德西利亚斯条约》与 56; Mexico conquered by 征服墨西哥 61 - 66; expansion of conquest beyond Mexico 越过墨西哥的征服 65 - 66; Peru conquered by 征服秘鲁 66 - 68; North America and 与北美 69; characteristics of conquistadors and 征服者的性格与 71 - 73; emigration of women from 女性移民 73; legality of claim to Indies 占领西印度的合法性 77; misfortunes of 不幸 92 - 93; Portugal annexed by 合并葡萄牙 106; possessions of 的财产 135; silver mining and 银矿开采与 140; loyalty to 对其的忠诚 158; colonial conflicts with 与殖民地的冲突 158 - 161; colonial revolutions and 殖民地革命与 161 - 162; liberal revolt in 解放起义 174; Mexican liberals and 墨西哥解放与 203; slave trade ended in 西班牙奴隶贸易的结束 231; uses of Cuba by 231. 另见 Ferdinand and Isabella (Spain) 及具体地区词条

Spalding, Karen 凯伦·斯伯丁 115

Spaniards 西班牙人: as headmen in Gauraní society 瓜拉尼社会里的首领 80; vs. creoles 与克里奥尔人的对比 111

Spanish America 西属美洲: tribute and labor in 的纳贡与劳动力 77 - 83; economy of 经济 83; Spanish

agriculture in 西班牙农业 86 - 88; England and markets of 市场与英国 92 - 93; political institutions of 政治机构 95 - 100; ineffectiveness of law in 效率低下的法律 100; church in 教会 100 - 110; Inquisition in 宗教裁判所 106; Portuguese America compared with 与葡属美洲的比较 129; centralization of 的集权 137; Spanish government in 西班牙政府 137; commerce in 商业, 137 - 138; economic activity in 的经济活动 138 - 142; silver mining in 银矿 140; manufacturing in 制造业 140 - 142; labor struggles in 劳动权益斗争 142 - 143; territorial reorganization of 地区重组 143 - 146; society in transition in 社会转型 150 - 152; revolts by oppressed peoples in 发生的受压迫民众的起义 152 - 157. 另见 Colonies and colonization; Indies

Spanish Character: Attitudes and, Mentalities from the Sixteenth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 (Bennassar) 《西班牙人的性格: 从16世纪至19世纪的处世态度和心智状况》(巴纳萨尔) 4

Spanish Netherlands 西属尼德兰 135

Specialization 专业化 10

Speculation, land 土地投机 249

Spencer, Herbert 赫伯特·斯宾塞 246

Spice Islands 香料群岛 69

Spices and spice trade 香料与香料贸易: Portugal and 葡萄牙与 53 - 54; Spanish search for 西班牙寻找 71

Spinden, H. J. H.J. 斯平登 11

Stagnation (economic) 停滞(经济) 194 - 195

States 城邦: as social/political level of organization 作为社会、政治层面的机构 9, 10; compared with chiefdom 与酋邦的比较 10; in Brazil 巴西的 130 - 131

Status 地位: of mestizos and mulattos 混血儿的 150 - 151; of 18th-century immigrants 18世纪移民的 151 - 152

Stelae 石柱 19, 20

Stern, Steve 史蒂夫·斯特恩 112, 114, 152

- Stratified society 等级森严的社会 6
- Strikes 罢工: in Spanish America 西属美洲的 142-143; in Mexico 墨西哥的 251 (illus.); Rio Blanco textile workers (Mexico 1909) 哥甲奥·布兰科纺织厂员工(墨西哥 1909) 251 (illus.); in Chile 智利的 259, 260; in Brazil 巴西的 265
- Strongman 强人 191 另见 Caudillo (strongman)
- Subdelegados 代理人 146, 156
- Subsistence societies 自给自足社会: before Spanish conquest 西班牙征服之前的 9; of Chibcha and Muisca chiefdoms (Colombia) 奇布查和穆伊斯卡西邦的 10; of Maya 玛雅的 19
- Suburbs, Mayan 郊区, 玛雅的 18
- Sucre, Antonio José de 安东尼奥·何塞·德苏克雷 166, 205
- Sugar industry 制糖业 87; in Madeira 马德拉群岛的 54; black slave labor for 黑奴劳动力 83; Cortés, Hernando, and 埃尔南多·科尔特斯与 85; in Brazil 124, 225; Dutch and 荷兰人与 126; Brazilian slavery and 巴西奴隶与 133-134; in Cuba 古巴的 138, 231-234
- Sugar mills 榨糖厂 232
- "Sugar Trust" 糖业托拉斯 235
- Sun, Moon, and Witches (Silverblatt) 《太阳、月亮与巫师们》(西尔弗布拉特) 33
- Swidden system 刀耕火种体系。参 Slash-and-burn cultivation
- Syllabic writing 音节文字; of Maya 玛雅的 20
- Syndicalism 工团主义 265
- T**
- Tabasco 塔巴斯科海岸 63
- Taino people 泰诺人 12, 56, 60
- Tannenbaum, Frank 弗兰克·坦嫩鲍姆 219
- Tarapacá, Peru 塔拉帕卡, 秘鲁的 230
- Tarasians 塔拉斯科人 24
- Tariffs 关税: in Mexico 墨西哥的 200; in Argentina 阿根廷的 207; in Colombia 哥伦比亚的 270, 271
- Taxation 税收 154; in Spain 西班牙的 44, 45, 48; under Charles V 卡洛斯五世时期的 48; of silver 对银征收的 89; of trade 贸易的 92; in Brazil 巴西的 129-130; in Central America 中美洲的 217; in Guatemala 危地马拉的 217; on individuals in Colombia 对哥伦比亚个人征收的 270
- Taylor, William 威廉·泰勒 121
- Technology 技术: in Classic period 在古典时期 13; in Postclassic period 在后古典时期的 14; in Argentina 阿根廷的 211
- Tecuixpo 德主希珀 73
- Tehuantepec 特万特佩克 24
- Temple, of Maya 神庙, 玛雅的 21
- Temple of the Sun (Inca) 太阳神庙(印加) 35
- Tenant farming 佃农制度 246; among Aztecs 阿兹特克人中的 24; in Brazil 巴西的 133, 262; in Mexico 墨西哥的 196-197; in Chile 智利的 215; in Peru 秘鲁的 230
- Tenantry 佃农 181, 184
- Tenochtitlán 特诺奇蒂特兰城 23, 25; population of 的人口 26; Cortés and 科尔特斯与 27, 64-65; white men in 来比的白人 61; smallpox in 在此发生的天花 69
- Ten Years' War (Cuba) 十年战争(古巴) 234-235
- Totihuacán 特奥蒂瓦坎: in Classic period 古典时期的 13, 14, 15; temples and pyramids at 寺庙与金字塔 14-15, 15 (illus.), 21; civilization of 文明 14-17, 21
- Tepoztlán 特波斯特兰 114
- Terraced farming 梯田耕作 10, 32
- Terrazas, Francisco de 弗朗西斯科·德·特拉萨斯 111, 111n
- Terreros, Romero de 罗梅罗·德特雷罗斯 143
- Texas 得克萨斯; Mexican cession to U. S. 墨西哥将其割让给美国 200
- Texcocan civilization 特斯科科文明 23, 107
- Textile industry 纺织业 140; strike in

- Mexico 墨西哥发生的纺织业罢工 251
(illus.); in Brazil 巴西的 265
- Tezcatlipoca (god) 特兹卡特利波卡神 22
- Theocracy 神权政治 28
- Theory of liberation 解放理论. 参 Liberation Theology
- Thomas, Saint 圣托马斯 150
- Three Years' War (Mexico) 三年战争(墨西哥) 203
- Tiahuanaco 蒂亚瓦纳科文明 14, 30
- "Tiempos difíciles" 艰难时期 512
- Tierra del Fuego 火地岛 8
- Tikal 蒂卡尔 17, 18
- Time of Troubles 战乱时期 14, 22 - 23
- Tithing 什一税: in Brazil 巴西的 130; in Chile 智利的 215; in Venezuela 委内瑞拉的 269; in Colombia 哥伦比亚的 270
- Tlacopan 特拉科潘 23
- Tlaloc (Aztec god) 特拉洛克(阿兹特克神) 15
- Tlaxcala 特拉斯卡拉 24, 65
- Tlaxcalan people 特拉斯卡拉民族 64, 69
- Tobacco 烟草: Columbus and 哥伦布 55; Dutch and 荷兰人与 126; labor for 需要的劳动力 142; in Colombia 哥伦比亚的 270
- Todorov, Tzvetan 茨维坦·托多罗夫 60
- Toledo, Francisco de 弗朗西斯科·德托莱多 68, 81, 96, 115
- Toledo, Spain 托莱多, 西班牙 39, 41
- Toltec empire 托尔特克帝国 18, 22 - 23, 28
- Tools, agricultural 工具, 农业的 32
- Topa Inca 印加国王托帕 31
- Topiltzin-Quetzalcóatl 托皮尔津-羽蛇神 22
- Tordesillas, Treaty of 《托德西利亚斯条约》 56, 122
- Toscanelli, Paolo 保罗·托斯卡内利 55
- Totonac people 托托纳克人 64
- Town councils 市镇议会 98, 99
- Towns 城镇: indigenous 土著 115; Brazilian colonial 在巴西的殖民地城镇 133 - 134. 另见 Cities
- Trade 贸易: in Teotihuacan 特奥蒂瓦坎的 17; Aztec 阿兹特克的 24, 27; exploration and 探索与 52; Portuguese 葡萄牙的 52 - 53; Aztec-Spanish 阿兹特克-西班牙的 62; in making of Latin America 在拉丁美洲的形成 84 (illus.); cacao 可可 89; time required for 需要的时间 91; trans-Atlantic 跨大西洋的 91; dangers of voyages 航行的危险 91 - 92; protection of 的保护 91 - 92; piracy and 海盗活动与 92 - 93; in Brazil 巴西的 122, 221, 264; in Spanish colonies 西班牙殖民地的 137 - 138; Spanish free trade policy 西班牙自由贸易政策 138; class and 阶级与 151; peninsular Spaniard control of 半岛西班牙人对其的控制 158 - 161; merchant houses in 商业家族 194; in Mexico 墨西哥的 197; in Paraguay 巴拉圭的 205; in Argentina 阿根廷 206, 208; in Chile 智利的 214; in Colombia 哥伦比亚的 271
- Trade monopolies 贸易寡头 193
- Trade unions 贸易联盟: in Chile 智利的 260; in Brazil 巴西的 265. 另见 Labor; Labor unions
- Trading companies 贸易公司 137
- Trans-Atlantic trade 跨大西洋贸易 91
- Transportation 交通: Inca roads and 印加的道路与 31; in Spain 西班牙的 45; in Paraguay 巴拉圭的 209; in Chile 智利的 258 - 259; in Venezuela 委内瑞拉的 269
- Travel dangers, in Mexico 旅行的危险, 在墨西哥的 197
- Treaties 条约: Chile-Bolivia 智利-玻利瓦尔 255; Araucanians and 阿劳加诺人与 258. 另见 具体条约
- Tres Zapotes 特雷斯萨波特斯 14
- Trial by jury 陪审团审判 217
- Tribes 部落: as level of social organization 作为一个社会组织级别 9; populations of 的人口 9
- Tributary towns (Aztec) 附属国(阿兹特克) 29
- Tribute 进贡 82; to Aztecs 向阿兹特克人 25, 29; Inca and 印加与 32, 34; Indian

- 印第安人的 68; amount collected in New Spain 在新西班牙收集的进贡数量 79; population decline and 人口下降与 79-80; in Paraguay 巴拉圭的 81; vs trade 与贸易的比较 83; to Cortés 向科尔特斯的 85; Spain's dependence on 西班牙对其的依赖 94; gathering of 的收集 154; in Peru 秘鲁的 228, 229
- Tribute labor 劳力进贡 4
- Trinidad 特立尼达岛 56
- Triple Alliance 三方同盟: Aztecs and 阿兹特克与 23, 24; war 战争 210; Brazil, Argentina, and Uruguay 巴西、阿根廷与乌拉圭 211
- Tristan, Flora 弗洛拉·特里斯坦 188
- Triumph of Juárez, The* (Orozco) 劳伦斯的胜利, 奥罗斯科 202 (illus.)
- Tucuman, congress of 图库曼会议 205
- Tula 图拉, 22, 23; Toltec from 来自图拉的托尔特克人 18; fall of 没落 23
- Tunja chiefdom 通哈酋邦 10
- Tupac Amaru (Inca) 图帕克·阿马鲁(印加) 67
- Tupac Amaru II (José Gabriel Condorcanqui) 图帕克·阿马鲁二世(何塞·加夫列尔·孔多尔坎基) 113, 154, 155, 155 (illus.)
- Turkish Empire 土耳其帝国 48
- Tutino, John 约翰·图蒂诺 196
- Two-party system (Colombia) 两党制(哥伦比亚) 241
- Typhus 斑疹伤寒 12
- U
- Ulloa, Jorge Juan and Antonio de 豪尔赫·胡安和安东尼奥·德乌略亚 152
- Umayyads 伍麦叶王朝 37
- Underemployment. 参 Economy; Unemployment
- Underground railway (Brazil) “地下铁路”(巴西) 227
- Unification of Spain 西班牙的统一 41
- Unión Cívica (Civic Union) 公民联盟 254
- Unión Cívica Radical 激进公民联盟 254, 255
- Unitarianism (Argentina) 一神论(阿根廷) 195, 206, 208
- United Provinces of Central America 中美洲联合省 216-218
- United Provinces of the Río de La Plata 拉普拉塔联合省 167, 206-207, 208
- United States 美国: Philippine revolt against 菲律宾的反美起义 5; power in Spanish America and Brazil 在西属美洲与巴西的势力 6; Spanish colonial trade with 西班牙殖民地与其的贸易 138; Mexican War and 墨西哥战争 200; Mexico and 墨西哥与 204, 246, 250; British rivalry with 与不列颠的竞争 216-217; abolition of slavery in 的废奴 225; Cuba and 古巴与 233, 234; neocolonialism and 新殖民主义与 244; Chile and 智利与 260; Nicaragua and 尼加拉瓜与 267; Venezuela and 委内瑞拉与 269. 另见 Foreign investment; Foreign loans 及各个拉丁美洲国家词条
- Universities 大学: in Spain 西班牙的 43
- Universities of Lima and Mexico City 利马大学与墨西哥城 106
- UP. 参 Popular Unity (UP)
- Upper class 上层阶级: in Mexico 上层阶级在墨西哥的 252
- Upper Peru 上秘鲁 143, 166; as Bolivia 玻利维亚 205; independence of 的独立 205; liberation of 解放 205-206. 另见 Bolivia; Potosí; Silver
- Urquiza, Justo José de 胡斯托·何塞·乌尔基萨 186, 208
- Ursúa, Pedro de 佩德罗·德乌尔苏亚 74
- Uruguay 乌拉圭 166-167; Brazilian invasion of 巴西入侵 205, 209, 211; Britain and 不列颠与 205; independence of 独立 205; liberation of 解放 205; Brazil-Argentina war over 巴西-阿根廷为其的战争 207; invasion of Paraguay and 巴拉圭入侵与 209, 211. 另见各位领导人词条
- Utopia (More) 乌托邦(莫尔) 58, 101
- Utopian ideals; clergy and 乌托邦思想, 神职人员与 101
- Utopian socialism 乌托邦社会主义 180
- Utrecht, Treaty of 《乌得勒支条约》135; English merchants and 英国商人与 137

V

Vacant land 空置土地 249

Vaccination 疫苗接种方法 136

Valdivia, Pedro de 佩德罗·德·瓦尔迪维亚 71

Valdivieso, Antonio de 安东尼奥·德巴尔迪维索 102

Valencia, Spain 巴伦西亚, 西班牙 38

Valle y Caviedes, Juan del 胡安·德尔巴列·卡维德斯 109

Valley of Mexico 墨西哥谷地 25 (illus.); early civilizations in 的早期文明 14 - 17; invasion by Nahuatl-speaking peoples 被说纳尔特瓦语的民族入侵 23; Tula and 图拉与 23; Aztecs in 在此的阿兹特克人 23 - 29. 另见 Mexico

Valorization program 稳定物价的措施 264

Valverde, Vicente de 比森特·德·巴尔韦德 66

Van Young, Eric 埃里克·范·杨 142, 173

Vaqueiros (cowboys) 牛仔 127

Vatican. 参 Catholic Church

Vega, Garcilaso de la 加尔西拉索·德拉维加 107, 119

Vega, Lope de 洛佩·德维加 51

Velázquez, Diego 迭戈·贝拉斯克斯 50, 50 (illus.), 51, 62, 63, 65

Velázquez Cárdenas y León, Joaquín 华金·贝拉斯克斯·加迪纳斯-莱昂 148

Venegas, Francisco Javier de 弗朗西斯科·哈维尔·德贝内加斯 171

Venezuela 委内瑞拉 96; chiefdoms in 的酋邦 10; as Welser family fief 韦尔泽家族封地 48; Vespucci in 韦斯普奇在 61; Aguirre in 阿吉雷在 74 - 75; experimental colony in 在此的殖民实验 78; encomienda in 委托监护地 80; free trade in 自由贸易 138; as captaincy general 作为都督 145; revolution and 革命与 160 - 161; liberation movement and 的解放运动 163; llaneros in 的牛仔 164; liberation of 的解放 165 - 166; Gran Colombia and 大哥伦比亚与 235; New Granada and 新格拉纳达与 235; union with Colombia 与哥伦比亚

的联盟 235; economy in 经济 237, 268 - 269; slavery in 奴隶制 237 - 238; church estates in 教会土地 245; government of 政府 268 - 269; politics in 政治 268 - 269; German and British intervention in 英德对其的干预 269. 另见 Oil industry; 各位领导人词条

Venta, La 拉文塔 14

Veracruz 维拉克鲁斯州 91; ancient sites in 古代遗址 14; Spanish in 到此的西班牙人 62, 63; invasion by European powers 欧洲势力的入侵 203

Vertical economy 垂直经济 32

Vértiz y Salcedo, Juan José de 胡安·何塞·德贝蒂斯-萨尔塞多 143

Vespucci, Amerigo 亚美利哥·韦斯普奇 58, 61

Vetancurt, Agustín de 奥古斯丁·德贝当古 149

Vicens Vives, Jaime 海梅·比森斯·比维斯 45

Viceroy 总督 96, 98; lifestyle of 生活方式 98; in Brazil 巴西的 129

Viceroyalties 总督辖区; of New Spain 新西班牙的 96; of Peru 秘鲁总督辖区 96, 137; in 16th century Spanish America 在16世纪的西属美洲 97 (illus.); of Buenos Aires 布宜诺斯艾利斯总督辖区 143; of Rio de la Plata 拉普拉塔河的 143; in Latin America (1780) 拉美的总督辖区(1780)144 (illus.)

Victoria, Guadalupe 瓜达卢佩·维多利亚 199

Vieira, Antônio 安东尼奥·埃维拉 125 - 126

Villages 村庄; chiefdom in 的酋邦 9 - 10, 13; of Inca 印加的 32 - 33; in haciendas 大庄园的 118; Jesuit settlement of native converts in 耶稣会的当地皈依者定居点 125

Villas de señorío 领主的城镇 42

Violence 暴力; climate of 气候 5; in colonial cities 殖民地城市的 117 - 118; in period 1820 - 1870 1820 - 1870 年的 191

Viracocha (god) 维拉科查(神) 35

Virginity, importance of 贞操的重要性 119

Virgin of Guadalupe 瓜达卢佩圣母, 149 (illus.) 149n, 150, 172

Virgin of Los Remedios 救难圣母 150

Visigoths 西哥特人 36

"Vision of the Vanquished, The" "视觉征服" 57

Visita (inspection) 巡查制度 79, 99

Voting 选举; rights for women 妇女选举的权利 176; requirements for 的要求 195; in Chile 智利的 213, 258

Voyages 航海: Portuguese 葡萄牙的 52 - 54; of Columbus 哥伦布的 55 - 56; Spanish in Caribbean 西班牙人在加勒比海的 59 (illus.); for waterway to East 寻找通往东方的海路 61

W

Wachtel, Nathan 内森·瓦赫特尔 33, 103

Wage labor 雇佣劳动 226 - 227; in Spanish America 在西属美洲 81 - 82

Waldron, Kathy 凯西·沃尔德伦 119

Waldseemüller, Martin 马丁·瓦尔德泽米勒 61

Walker, William 威廉·沃克 218, 267

Waman Puma, Felipe de Ayala 费利佩·德·阿亚拉·瓦曼·普马 107 - 108

Ward, Henry 亨利·沃德 199

Warfare 战争; in chiefdoms 在酋邦的 10; change from chiefdom to state and 由酋邦向城邦的转变与 10 - 11; in Postclassic period 在后经典时期的 14; of Aztecs 阿兹特克人的 24 - 26; under Charles V 卡洛斯五世发动的 47 - 48; Aztec vs. Spanish 阿兹特克对西班牙 69. 另见 具体战争与战斗词条

War of a Thousand Days (Colombia) 千日战争(哥伦比亚) 271

War of Granada 格拉纳达战争 43, 44, 46

War of the Comuneros (Nicaragua) 公社社员战争(尼加拉瓜) 267

War of the Pacific 太平洋战争 231, 255 - 256, 257 (illus.), 258; Peru and 秘鲁与 231

War of the Spanish Succession 西班牙王位

继承战争 135

Warrior band 72

Warrior class 武士阶层 10, 14

Warrior-nobles; Aztec 阿兹特克的 23

Water 水 27

Wealth 财富: Aztec 阿兹特克的 29; of conquistadors 征服者的 73; of Cortés 科尔特斯的 85; of monasteries 修道院的 104; of conversos 皈教犹太人的 106; equality and 平等与 119; social mobility and 社会流动与 150 - 151; under Bourbon rule 波旁管辖的 153; in Mexico 在墨西哥的 203, 248 - 249; in Chile 智利 215 - 216

Weapons 武器 63, 69

Welser, German house of 日耳曼韦尔泽家族 48

West Africa 西非; Portugal and 葡萄牙与 53

West India Company (Dutch) 西印度公司(荷兰) 126

West Indies 西印度 69; Taino people of 的泰诺人 12; cattle industry in 养牛业 88; English in 在此的英国人 92 - 93; Treaty of Madrid and 《马德里条约》与 93; Dutch in 在此的荷兰人 126; commerce with 商业 138

Wheat 小麦 87, 215

Wheelwright, William 威廉·惠尔赖特: steamship line in Chile and 智利的轮船航线与 214

Whites 白人: as ruling class 作为统治阶级 110; in Brazil 巴西的 131; in Venezuela 委内瑞拉的 269

White supremacy; in Guatemala 白人至上主义; 危地马拉的 266

Wilde, Eduardo 爱德华多·维尔德 252

Wisconsin glaciation 威斯康星冰期 8

Women 妇女: clothing of Aztec 阿兹特克妇女的服饰 26; Aztec 阿兹特克的 27; Inca 印加的 33; emigration of Spanish 西班牙移民 73; in Guaraní society 瓜拉尼社会的 80; as Spanish concubines 作西班牙人的情妇 80; native 当地的 112; in black slave population 在黑奴人口 116; marriage, sexuality, and status

of 的婚姻、性生活与地位 118 - 121; status of, in colonial era 殖民地时代的地位 118 - 121; convent life for 的修道院生活 120 - 121; Portuguese, in Brazil 在巴西的女葡萄牙人 131; in Latin American revolutions 在拉美的革命 175 - 176; status of 地位, 188; feminist movements 女权运动 189

Workday 工作日 246; in Spanish America 在西属美洲 142 - 143; in Brazil 巴西的 265

Workers 工人; in tobacco industry 烟草业的 142; in Brazil 巴西的 265. 另见 Working class

Working class 工人阶级; in Chile 智利的 260; in Brazil 巴西的 265

World atlas of Ortelius 奥特琉斯的世界地图 58

Worldview, Discovery and “发现”与世界观 57 - 58

World War I: disruption from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混乱 244

Writers and writing 作家与写作; in Classic period 在古典时期 13; Olmec 奥尔梅克 14; of Maya 玛雅的 19 - 21; Inca and 印加与 31; in 16th century colonies 在 16 世纪殖民地的 147 - 148; Enlightenment 159. 另见 Literature 及各个作家的词条

Writs of pardon 特赦令 4

Y

Yanaconas (permanent servants) 亚纳科纳

(永久的仆人) 33, 142, 152, 156; in Andean region 安第斯地区 81 - 82; in Peru 秘鲁的 228

Yaqui people 雅基人 249

Yermo, Gabriel de 加夫列尔·德叶尔莫 171

York Rite Masonic lodge 约克仪式派共济会 199

Yrigoyen, Hipólito 伊波利托·伊里戈延 254

Yucatán Peninsula 尤卡坦半岛 13; Maya civilization in 的玛雅文明 17, 18, 19; Spanish in 的西班牙人 62, 65

Z

Zacatecas 萨卡特卡斯 87, 88, 176

Zaldívar, Rafael 拉费尔·萨尔迪瓦 267

Zambos (African and indigenous peoples) 桑博人 115; in colonial social order 在殖民地社会秩序中 115 - 116

Zamora, Ezequiel 埃塞基耶尔·萨莫拉 239

Zapotec culture 萨波特克文化 15, 17

Zeitlin, Maurice 莫里斯·蔡特林 215

Zelaya, José Santos 何塞·桑托斯·塞拉亚 267

Zero, Mayan concept of 玛雅人对零的概念 20

Zipa (Chibcha) 奇帕(奇布查族) 71

Zorita, Alonso de 阿隆索·德·索里塔 100, 115

Zumárraga, Juan de 胡安·德苏马拉加 101

Zuñi people 祖尼人 70

译者分工

孙洪波：前言、第二部分序言、第4至10章

王晓红：导言、第一部分序言、第1至3章

郑新广：第11章

孙赛雄：索引

张家哲：全书译校